

元代文学编年史

YUANDAI WENXUE BIAN NIAN SHI

杨镰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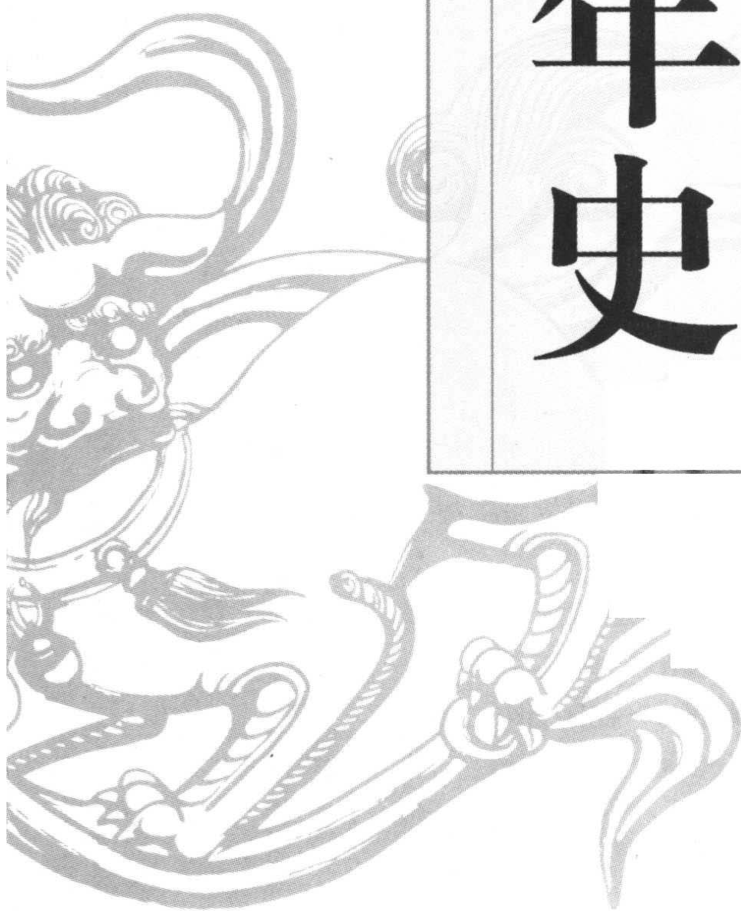


山西教育出版社



元代文学编年史

※杨镰 著



山西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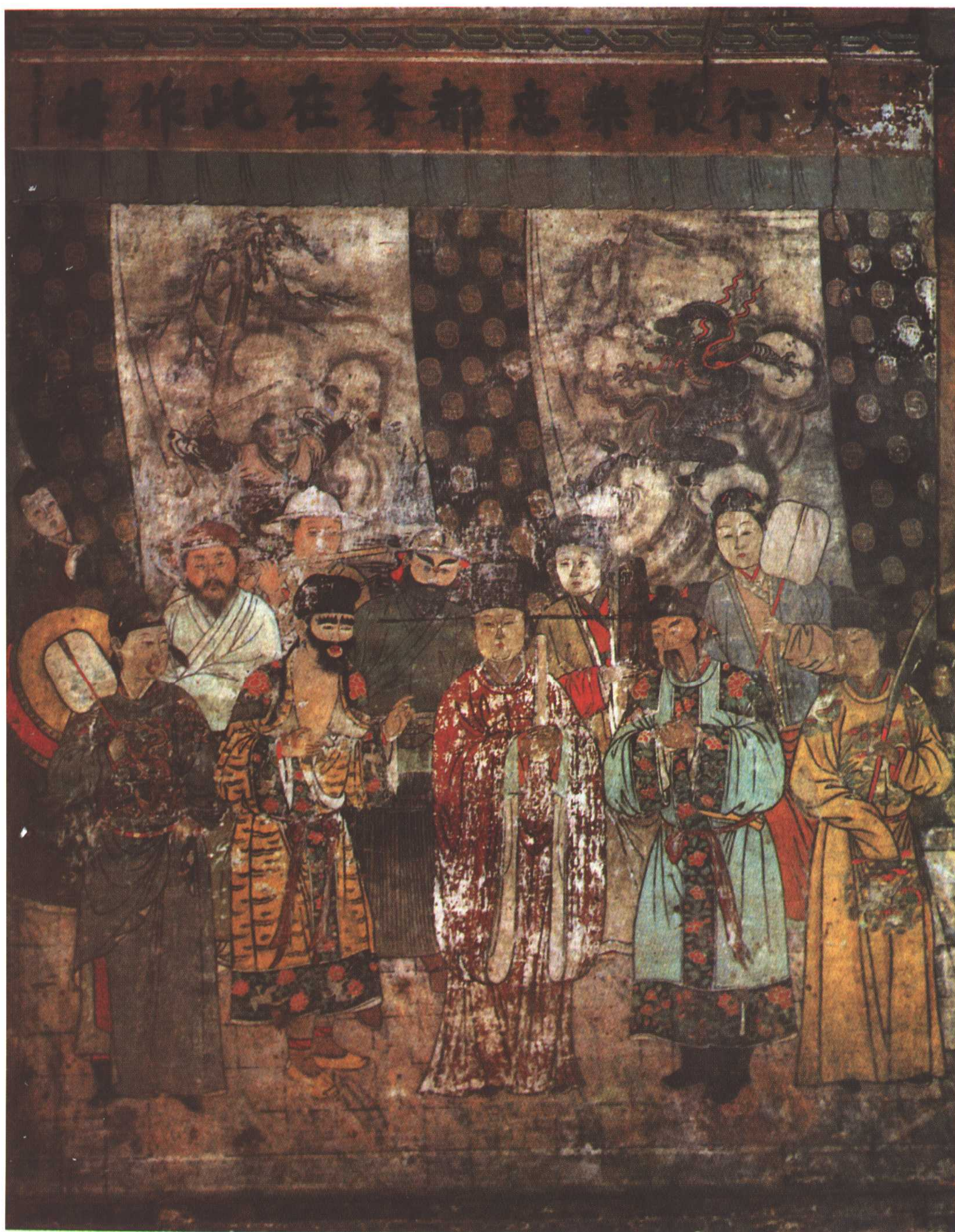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元代文学编年史/杨镰著.—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7
ISBN 7-5440-2928-X

Ⅰ.元… Ⅱ.杨… Ⅲ.文学史-中国-元代 Ⅳ.I209.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4730 号

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迎泽园小区 2 号楼)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新华印刷分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960 毫米 1/16 印张:40.5
字数:722 千字 印数:1—2000 册
定价:58.00 元



山西洪洞县明应王庙的元代壁画。就此可以了解到元杂剧的演出形式，与元代的“角色”当行的号召作用。



郑思肖画《墨兰图卷》。现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兰花是“无根无土”，作于“丙午正月十五日”，即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已经是《心史》沉井二十年之后。



元人画《名贤四像》或《四学士像》。画中的四人（右起）是：吴澄、虞集、欧阳玄、揭傒斯。除吴澄，三人均曾在奎章阁任职。现藏美国辛辛那提美术馆。作者佚名。



元武宗



元武宗的儿子元文宗

原来武宗与仁宗说好，仁宗之后，由武宗的儿子继位，但仁宗食言了。元文宗是元代对汉文化最感兴趣的君主。这两幅画都出自故宫收藏的《历代帝后像》。



释来复像。元人（佚名）画。这幅画大约在元明之际就流传到日本。现藏日本佐贺万岁寺。原画已经看不大清了，这是经过修复之后，用红外线技术拍照的。在画像上方有来复的自赞，还有张翥、杨彝分别作的像赞。画与赞均作于至正二十五年乙巳仲春。当时来复四十七岁。请注意他的胡须。后来就是这部长髯，使来复受到朱元璋特别关注。

例　言



一、作为文学史著的一种,《元代文学编年史》通过对文学与历史的结合部的研究,寻找文学发展的脉络。研究对象主要是作家、作品。作家,是文学现象的主体;作品,是文学活动的体现。

二、《元代文学编年史》,不同于"元诗纪事"或"元文纪事"等"纪事体"的合编,更不同于"文学史料长编",是一部体例有别的文学史著。系年,是视角与切入点。元代文学体裁多于以往,仅有作品传世者就不少于6000人,而前人研究成果相对要少。本书的写作,以反映元代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为出发点。

三、本书以年代为经,文学现象为纬,对元代文学家的活动作了相应的观照与探讨,使元代文学的不同体裁、不同流派、不同时期的作家、作品,在发展过程中有各自的位置,并遵循史著的纪传互见,尽量使人物、事件头绪清楚可循。

四、元处在文学的转型期,传统的诗文与新兴的代言体小说戏曲并存,近世人文、科技观念初步形成,使传统文化面临多种选择,正因为如此,元代文学丰富多彩。这是元代文学编年史必须体现出的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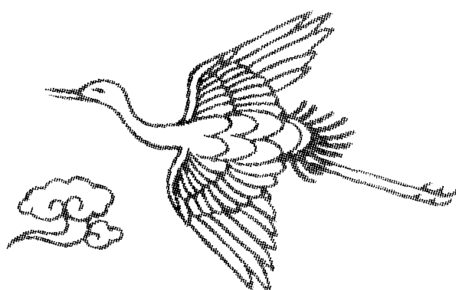
五、元是北方民族建立的第一个统一中国的王朝,对于中国历史,甚至对于世界历史,都是重要时期。元代文学以元曲最受关注,就文学现象而言,诗文仍然是内容最丰富的文学体裁。元代戏曲、小说的系年,历来就是难点,这与戏曲、小说的传播方式有密切关系。

六、至元八年,蒙古汗王忽必烈以"大元"为国号并统一中国,元朝终结于元顺帝退出大都遁归漠北。为便于叙述,本书主要内容则以忽必烈即位(以"中统"纪年)开始。在这个范围中的年号,不再注明相应的公元年。此前到铁

木真(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的有关内容,纳入“前编”;此后到明永乐时期的有关内容,归于“后录”。

七、全书共分“序论”“前编”“元世祖”“元成宗”“元武宗”“元仁宗”“元英宗”“泰定帝”“元文宗”“元顺帝”“后录”十一部分。除“序论”,均为系年编排,“序论”的立意则是尽可能对纵向的发展作出补充,探讨不同文体的联系与互相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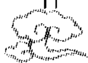
八、本书涉及的文献范围广泛,版本复杂,为免篇幅过大,暂未单列“徵引书目”。行文中徵引的文献,均已注明出处卷次。与版本文献有关的问题,注释中有相应说明。



CONTENTS 目 录

例言 …… 1

序论 …… 1
前编 …… 51
元世祖 …… 75
中统 …… 77
至元 …… 84
元成宗 …… 193
元贞 …… 195
大德 …… 204
元武宗 …… 237
至大 …… 239
元仁宗 …… 253
皇庆 …… 255
延祐 …… 270
元英宗 …… 307
至治 …… 309
泰定帝 …… 325



泰定 …… 327
致和 …… 342
元文宗 …… 345
天历 …… 347
至顺 …… 358
元顺帝 …… 373
元统 …… 375
后至元 …… 384
至正 …… 414
后录 …… 589

附记 …… 643



序　论

一

元是中国历史上由北方民族蒙古族建立的统一王朝。

自秦汉以来，北方民族一直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起着独特作用。西北古族从发祥之地南下，是中华民族充满活力的动因。匈奴与秦汉的战争，促进了东西方的交通，使“丝绸之路”成为结系当时世界上东西方两大文明的纽带。经过了南北朝时期的交流融合，结束第一个循环的南北对抗的隋唐，成为世界文明的象征。伴随唐朝的瓦解过程，新一轮的南北对抗开始了。蒙古，是这个时期的主导力量。

漠北草原是蒙古族的摇篮、学校和婚床。在契丹（辽）、女真（金）等民族相继崛起并雄踞一方的时期，蒙古长期扮演了配角。公元1206年，世界历史上发生的一件大事，就是统一了诸部的蒙古乞颜部世袭领主铁木真在斡难河河源被推举为“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一般认为它含有“海洋”“强大”之意。蒙古族有了自己的成吉思汗，向西，打通前往地中海之路；南下，走向太平洋，成了草原民族新的使命。

先是西域诸城邦绿洲，然后是西辽、西夏、金，最终是南宋。蒙古诸汗用了大约70年、三四代人的时间，结束了华夏区域长期分裂局面，建成了一个疆域广大的王朝。公元1260年，雄才大略的蒙古君主忽必烈首先采用了中华王朝的惯例，以中统为年号，中统五年，又改元至元。至元八年，忽必烈听取了汉族谋士刘秉忠的建议，取华夏典籍《易》的“大哉乾元”之意，正式用“大元”为国号。不足一个世纪，到至正二十八年，元顺帝在朱元璋北伐大军兵临城下时，放弃宗庙社稷连夜遁回蒙古草地。

虽然此后一个时期内，元皇廷在漠北仍然以元为国号（一些史书称为“北元”），但一般认为，元朝终止于大都易主。

元有两个显著特点，即疆域是中国历代最大的一个；但立国时间却不足百年。

至元十三年，元灭掉了最后一个与之抗衡的王朝——南宋。从此，分裂

了几个世纪的中国又恢复一统。元统一中国的八九十年间，仅能繁衍四五代人。一个文天祥在世时出生的人，如果他有机会的话，还可以被朱元璋延入幕府。由于时间相对短暂，统一中国以后的元朝没有明显的历史分期。元代文学史，也没有如唐宋明清那样有特点明显的阶段。生于宋而终于明兴的元代文学家并不罕见。

元是中国封建王朝之一，除了封建王朝的共同点之外，它当然有自己的特点。

元以蒙古为宗主。而元朝的一项国策，就是将治下的臣民分为四个等级（层次）：蒙古，色目，汉人，南人。蒙古，是元朝的主体民族，在元朝，蒙古人被称为“国人”“国族”，蒙古语被称为“国语”。色目，是四个等级中内容最丰富的一个，它包括了西夏、唐兀、撒里畏吾等以及河西走廊以西，直至西亚欧洲的各个民族，在文献中，元代的西域人与色目人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但内涵大致相当。“色目”这一称谓的真实含义到底是什么，目前仍无定论。元代有广泛影响的作家马祖常、萨都剌、贯云石以及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都是色目人。汉人，不能等同于汉族，它是指在原金朝治下的女真、汉、契丹、渤海等民族，当然，人数最多的仍是汉族。契丹望族后裔耶律楚材、遗民元好问、“河汾诸老”“封龙山三老”、高丽访学者等等，都是汉人。实际在元朝，人们将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又都叫做“北人”，特别是在江南，普遍将北方人泛称“北人”。南人，大致是指原南宋治下的汉族和南方其他民族。

将人群分为四个等级，当然与蒙古扩张顺序有关。蒙古称雄于漠北，西域色目人率先归附，然后在色目人的参与下，依次灭掉了西辽（公元1211年）、西夏（公元1227年）、金（公元1234年）。最终于公元1276年使南宋国母谢太后草签了降表。这四个等级是元朝立国的基础。在这个序列里，蒙古色目人居于上层位置。清人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七“元人”节）特意说：“元名臣，如移剌楚材（耶律楚材），东丹王突欲孙也；廉希宪、贯云石，畏吾人也；赵世延、马祖常，雍古部人也；孛术鲁翀，女真人也；迺贤，葛逻禄人也；萨都剌，色目人也；郝天挺，朵鲁别族也；余阙，唐兀氏也；颜宗道（伯颜宗道），哈剌鲁氏也；赡思，大食国人也；辛文房，西域人也。事功、节义、文章，彬彬极盛，虽齐鲁吴越衣冠士胄，何以过之？”

在这里，王士禛列举的是元代（无论是历史还是文学）起过重要影响的色目人①。

---

① 其中，耶律楚材、孛术鲁翀、郝天挺属于“汉人”。

元代历史和元代文学史的特点，往往与蒙古色目人士的积极参与有关系。对历史和文学史影响至巨的，是元代相当独特的“文化政策”：一种漠视文化的、无为而治的、没有政策的“政策”。这就使得元成为中国历史诸统一朝代——唐、宋、元、明、清——惟一没有文字狱者。

元是自汉代以来惟一一个没有明确以儒家思想为精神基础的统一王朝。但是元也是惟一一个没有文字狱的统一王朝。这两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但后者确实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元明之际人叶子奇这样指出：“宋朝有诗狱，诸儒之过。”（《草木子》卷四上）而这句话，是叶子奇在明初受到株连身陷大狱时说的。

也许是出于对儒家的忽视，元朝在前期取消了科举。延祐年间虽然恢复，但也时断时续。科举的断续，阻断了文人士子的传统出路，但在一定程度上说，它又促进了文学创作的繁荣。元代社会生活中，北方民族的成分占有相当大的份额，而儒家正统思想处于守势。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妇女相对来说有一定的自由。元人孔齐《至正直记》（卷一“妇女出游”节）开始即说：“人家往往习染不美者，皆由出游于外，与妇客燕集，习以成风。始则见不美者诮之，终则效之。”进而他说，这种风气是受蒙古色目人的影响。他的亲戚出任溧阳州同知，曾男女混同“燕集者数，一致外议纷纷，渐起‘变夷’之诮”。“盖同知之妻，嫂氏之同母姊，畏吾氏也”。对于久在南宋治下的江南来说，这种男女公开的“授受”是社会风气的“倒退”。职业的艺妓不是起于元朝，但元朝社会生活中艺妓相当活跃，对文化、文学都有广泛影响。元代艺妓的“列女传”《青楼集》，一再提到艺妓与达官显宦的婚配。《至正直记》（卷二“婢妾命名”节）还记录了元代的一则针对以妓女为妻妾为时尚的江南谚语，说妓女“席上不可无，家中不可有”。妇女的参与，是社会生活丰富多彩的一个动因，而诗文词曲也就因之更加生动多情。

重视读书的社会风气仍然普遍。当时，江南还有这样一个谚语“日进千文，不如一艺防身”，“盖言习艺之人可终身得托也。艺之大者，莫如读书。达者致君泽民，穷则隐学授徒，亦能流芳百世”，除读书，农、桑、工、商，“皆可托以养身，为子孙计”。——这些民谣就是民间的“诗经”。

明朝末年，在苏州寺院的古井之中出土了元初郑思肖写的《心史》，从此“九儒十丐”之说长期影响了人们对元朝社会结构的认识。据《心史》记载，元初有这样一条“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各有所统辖。”它的一个异说是“……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也就是说，儒士处在社会等级的第九级，也是“老九”，社会地位甚至在娼妓之下，仅仅略强于乞丐。但这个说法其实是孤证，在元代史

籍与其他文献中，目前还没有见到能够支持这一记载的相关资料。而且，这也与元朝将人群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这四个等级的国策相抵触。深入的研究与了解，足以证明实际在元代，儒士（儒户）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主要宗教的教士，都享有一定程度上的优待。虽然科举时断时续，但是儒士们的生活出路并没有断绝，也并不比其他朝代——比如南宋——更差。

中国历史上的统一王朝，仅元朝对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一视同仁，同时这几种主要宗教对元朝社会生活都产生过广泛影响。元朝以佛教为国教，但对于其他宗教一律予以接纳。所以相对而言，元朝对于精神世界的异端相当宽容。

元代虽然立国时间不长，又处在北方民族统治之下，但其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占有特殊位置。中国书法绘画史一直以“宋元”并称，而中国画自从宋元以后，便失去了创意的契机。在书籍版本印刷史，元代的特殊地位也不容忽视，“百宋千元”成为藏书家追求的一种境界。“全相”（带插图的书籍）是元版书的冠冕，它的出现，不能不说是与元代书籍面对的读者群更宽泛、文化更普及相关。

除文学艺术，水利、建筑、农业、天文、历法、数学、军事等科学技术领域，元代都开近世风气之先。以元人王祯《农书》、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与贾思勰《齐民要术》比较读之，不难把握住学科的技术发展脉络。而王祯与鲁明善之书，正是社会对农耕的需求进入了一个新的平衡时期的反映。英国汉学家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技史》中，元代的篇幅不但不能略过不读，而且读之使人耳目一新。

二

元代在历史上的位置，正处在一个单元结束、另一个新的单元开始的谷地，是一个长期分离对峙之后的“大一统”，是唐宋与明清之间的引桥。元代文学的面貌，正是通过这个历史上的位置得到充分的表现。

元朝两个互相制约的特点：地域大，时间短，对元代文学艺术影响广泛。元朝所处的历史转型时期，为元代的文学创作留下了深刻印记。元立国不足百年，而这四五代人之间，却已足够形成自己的特色与面貌——无论是历史的或是文学史的。

元有历史上代表性最广泛的文坛，就作家而言，不论民族、地域、宗教，都是前所未有的丰富。而大量母语并非汉语的各族作家使用汉语写作，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仅见的情况。就作品而言，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这四种文

体首次在文坛分庭抗礼。但是，元代文学没有明显的历史分期（只能大致分为前后期），没有众多的流派与聚讼纷纭的文坛门户之争，提到元代文学，首先就会联想到元曲。除了元曲，元代文学没有大作家和大作品。

元代之前，传统的诗文一直是文坛主流，元代诗文是唐宋的延续。在元代诗文的经典选本《元文类》中，选诗七卷，选文六十三卷，反映了元人对于本朝诗文高下的评判。元诗研究历来积累较少，然而仅清人顾嗣立《元诗选》与《元诗选癸集》中，就选录了近2000位诗人的25000首诗。可以说，从《元诗选》问世的三个世纪以来，它一直是人们研究的出发点，——同时又是终点。这说明元诗研究亟待改观。实际我们已经知道，流传至今的元诗有12万首以上，分属约5000个诗人。这个数字是《全唐诗》的四倍，是《全宋诗》的二分之一。唐宋八大家之后，古文——散文，似乎是无山可攀，但新的社会因素与新的语言体系注入文坛，使元文自有特色，特别是诗文与代言体的小说戏曲出现了互相“接近”的倾向，具体说就是叙事成分增加，使元文不难与唐宋文并立。据《全元文》资料，有作品传世的元文作者在3000人以上，文章达到30000篇，大多数散文作家仅有一两篇作品传世，但虞集、马祖常、姚燧、黄溍等人，完全具备大家风范。历来对元词多略而不论，或是将其作为宋词附庸，或是将其视为散曲雅化。据唐圭璋《全金元词》，元代有词人212家，词作3721阕。《全宋词》收入约1330位词人的20000首词，仅从作品的数量而言，元词远不能与宋词比肩。但元词与元曲相比，仍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事实上，历来将许多元代词人归之于宋，也在很大程度上屏蔽了研究视野。当然，元代文学的精华在元曲。

元曲分为散曲与戏曲两部分。戏曲以杂剧为主，此外还有南戏、诸宫调等形式。元杂剧一直是元代文学阅读与研究的热点。

元杂剧久负盛名，对元代社会生活产生过深刻影响。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元杂剧的兴盛，元曲才成为元代文学的标志性文体，在中国文学史上与汉赋、唐诗、宋词、明清小说并称。但元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仅在于此。元代是中国文学史的“古典”与“近世”的分水岭。元代之前，传统的代言体的诗歌、散文统治文坛；自元代，叙事体的小说（白话小说）、戏曲为文坛注入了活力。传统的诗文经历了唐宋空前繁荣，已经处在了顶点；新起的代言体的戏曲小说，不但充实了元代文坛，也成了元代文学的特征。元曲（散曲与戏曲），是元代文学的冠冕；元曲研究，一直是元代文学研究的显学，而杂剧、南戏、诸宫调等戏曲的写作与表演，确实使元代社会生活丰富多彩。中国小说并非发端于元，但通俗小说成为气候，始自元代。到了元代，文学作品的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的接近，才使通俗小说走出“学龄

前”时期，可以占据社会生活的一席之地。上图下文的“全相平话”，是整个社会喜闻乐见的“连环画”，是完整意义上的长篇通俗小说的雏形。

与其他文明古国（比如希腊、印度）相比，中国戏剧的成熟期特别漫长。

中国古典戏曲成型于元杂剧。元杂剧借助以前的戏曲艺术的发展，才最终定型。“杂剧”一词在唐朝就出现了，但唐人所谓的“杂剧”是一个泛称，含义比元代要宽泛得多。元杂剧的基本特征是代言体的综合表演艺术形式，是一种戏曲。一般认为元杂剧直接来源是金代的“院本”。

古波斯史家拉施特编著的蒙古史名著《史集》，记载了一则有名的窝阔台汗（元太宗）时期的轶事：

> 一个戏班从中原的汉人聚居地来到和林，为汗王演出异彩纷呈的戏剧。一出戏有个胡须斑白、头缠丝巾的老人，被捆在马尾上。这是来自大食的回回俘虏。窝阔台汗下令，停止演出，并说：“你们怎能用演戏来侮辱大食人呢？这次我不惩罚你们，快走吧，下次就不行了！”[①]

这则轶事是有关蒙古与早期戏曲史的重要资料，也是色目人进出中原生活的旁证。而这里所说的“汉人聚居地”，指的是金朝疆域。窝阔台在位于公元1229—1241年，这正是金朝为蒙古攻灭的时期。那时南宋还是敌国。无疑，蒙古人对戏曲的喜好是带有普遍性的，而这种喜好又是与它的西北敌国——金、西夏等有相通之处。杨弘道《优伶语录》（《小亨集》卷六）中，记述在金都汴梁即将失陷时自己仓皇奔走中的一则见闻：“行次济水之阳，有同途者亦欲逾大河之南，不负不荷，若有余赀，言语轻杂，容止狎玩。怪而问之，曰：‘我优伶也。’且曰：‘技同相习，道同相得，相习则相亲焉，相得则相恤焉。某处某人优伶也，某地某人亦优伶也，我奚以资粮为？’言竟，自得之色浮于面。”这个例子表明，一个戏班子可以从容穿行于战争间隙，随时可以指望得到通行或容留。它证实，当时戏曲艺人已经是一个特殊群体，可以言及普及。同时，他们得到了交战双方的善待。

元人钟嗣成《录鬼簿》记录了以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为代表的152位杂剧作家的名字，并记录了当时流传的450余种杂剧剧本。明初人撰写的《录鬼簿续编》中，又写出元明之际的杂剧作家71人，杂剧剧本156种。这当然是“不完全”的名单。但仅仅由此也可以感受到元代杂剧兴盛状

---

① 见《史集》第二卷第三部分，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三部分。

况，同时也证明当时最重要的杂剧作家都有作品流传至今，而没有被岁月淹没。所以，文学史家们以杂剧为元代文学的特征，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见于著录的元代杂剧有大约550种，其中50种是“无名氏”的作品。另外有187种无名氏的作品，归于元明之际，难于具体断代，也不可能确认作者。其中，作家写作的杂剧流传至今的仅仅是四五分之一。这个比例与元代诗文等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的情况大致相称。而流传至今的元杂剧主要是保存在《古今杂剧三十种》《古名家杂剧》，特别是明人臧懋循编刊的《元曲选》等书之中。相比之下，《元曲选》收录的杂剧最多，最完整，但是大多经过了后人（或即是臧懋循本人）删改。所以有的研究者曾说，对于元杂剧臧懋循是“功之魁，祸之首”（孙楷第语）。但另外一点则不见得经常提及，那就是元杂剧一些精彩段落，实际却不是元代一出现这部杂剧就有的。

元代戏曲的一个公认的难点，是作品难于具体系年。这与文献散失有关，也与戏曲作品的成型过程密不可分。作为一部戏曲，一次次的演出实践，就是它一步步完善、一遍遍润色的过程，这一过程甚至延续到作家故去之后，越是有影响的作品，这一过程往往就越漫长，越复杂，而且难以用文字来记述。所以，这个难点其实正是特点。

如果对元代文学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就会发现：元代并不是传统的文体诗文的衰退时期。在元代，作家最多，作品最多的，仍然是诗文。而元代诗文与前朝相比，普及程度更高，涉及的范围更广。诗文成了不同种族的文人们凝聚力的体现。特别是元代诗文有一个“被忽略”的特点，那就是“叙事化”倾向。

诗文的走向“叙事化”，是社会风尚所趋。元代的碑传文字，以细节描写见长，一些著名碑传的传主，比如阿里海涯（姚燧撰）、贯云石（欧阳玄撰）祖孙二人，比如“北包公”姚天福（虞集撰），比如赵孟頫（杨载撰）……都具有鲜明的形象感召力。而一些优秀者，已经具有小说的基本要素。

诗中的例子不胜枚举，仅以朱德润、迺贤为例略作分析。在朱德润《存复斋集》中，《外宅妇》《无禄员》等都是面对社会的叙事诗，迺贤的《金台集》中，《新乡媪》《颍州老翁歌》就是纪实体的乐府诗，叙事化是它们的基本特点。余阙为《颍州老翁歌》写了这样一则题记：“至正四年，河南北大饥。明年，又疫，民之死者过半。朝廷尝议鬻爵以赈之，江淮富人应命者甚众。凡得钞十余万锭，粟称是。会夏小稔，赈事遂已。然民罹大困，田莱尽芜，蒿蓬没人，狐兔之迹满道。时余为御史，行河（北）河南，请以富人所入钱粟贷民，具牛种以耕，丰年则收其本。不报。览易之之诗，追忆往事，为之恻然。八年三月，翰林待制武威余阙志。”这是读一首诗产生的联想，

而这首诗在当时曾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

词、曲也莫不如此。套曲《牛诉冤》《羊诉冤》《庄家不识勾栏》等等，特别是《上高监司》《高祖还乡》，有的已经成为一部微型戏曲。而戏曲小说的人物减少、情节集中等这些戏曲化的过程，受诗文的影响显而易见。

三

元代文学的发端，与契丹王族后裔耶律楚材关系密切。

耶律楚材家族源自大辽（契丹）王族。公元10世纪初，契丹崛起辽东，12世纪初金代辽而兴，13世纪前期蒙古又以数十年的血战灭金。从耶律楚材父亲耶律履那一代起，中国文学史出现了一个家族：契丹耶律氏。作家辈出的四五代人中，耶律楚材是成就最高的一人。以往著述中，耶律楚材对元初政治的影响往往被夸大了，而耶律楚材在北方文学传承方面，其影响、作用则被低估了。

耶律楚材（1190—1244），字晋卿，号湛然居士。契丹族，籍贯在辽东医巫闾山西麓的宜州弘政（辽宁义县）[①]。生长在燕京（北京市）。“耶律”，元人文献也译作“移剌”，他的蒙古语名字叫“吾图撒合里”，含义是“长髯人”，最初或是绰号。耶律楚材家世可以上推到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长子耶律倍。耶律倍，小名“图欲”[②]。他不但孔武有力，而且喜爱作歌诗。耶律阿保机死后，皇太后立其弟耶律德光（辽太宗），耶律倍受到猜忌，曾作《乐田园诗》明志。后唐明宗招其来归，他立木于海上，刻诗云：“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然后便“载书浮海”投奔后唐。后晋代兴，后唐亡国。耶律倍为人刺死，年仅三十八岁。辽太宗将其归葬于医巫闾山，这便是耶律楚材家族视医巫闾为祖籍的原因。《辽史》本传这样评述耶律倍：“倍初市书至万卷，藏于医巫闾绝顶之望海堂。通阴阳，知音律，精医药、砭焫（针灸）之术。工辽、汉文章，尝译《阴符经》。善画本国人物，如《射骑》《猎雪骑》《千鹿图》，皆入宋秘府。”耶律倍有五子，楚材家族出自第二子耶律娄国。耶律倍精通契丹、汉双语，是辽代文学的创

---

① 关于耶律楚材家族的籍贯，参见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余记》。

② “图欲”，元人宋子贞《耶律楚材神道碑》（即《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见《元文类》卷五十七）说是“辽东丹王突欲”。图欲，《辽史》卷七十二有传，但图欲虽曾追谥辽义宗，可生前身后均无东丹王封爵。据《辽史》，图欲不为太宗所容，投奔后唐，唐明宗“赐姓东丹，名之曰慕华”。“东丹王”之说或由此而来。关于“神道碑”的“辽东丹王突欲之八世孙”之说，在前人文献中一直没有深究。事实上耶律楚材是辽—契丹的开国英主耶律阿保机（辽太祖）的直系后裔。

立人之一。耶律楚材不但继承了"双语"传统，而且成了辽—契丹文明的最后体现，只不过其间相隔了七八代人、两个世纪、二百余年。

耶律楚材三岁，耶律履就去世了，官终尚书左丞。史称他通六经百家之书，精历算和书法绘画，善属文，特别是通晓大字和小字的契丹文。从公元920年前后创制了契丹本族的文字以来，由于时代变迁，到金朝后期懂契丹文的人已经寥若晨星。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曾下诏明令罢契丹文字。耶律履是契丹文字仅存的解读者，他可以使用汉语写作诗文，元好问《中州集》卷九，录存耶律履诗一首。耶律楚材十七岁时，与十七人一同受金章宗面试，所对独优，遂特辟为吏；考满，授开州同知。就在同一年，金的北方强邻蒙古诸部在斡难河集会，举铁木真为"成吉思汗"。从此，金朝鼎盛时期结束，国难即将临头。公元1211年，蒙古大败金师于野狐岭。经过五年残酷征战，公元1215年蒙古围攻金中都燕京（北京）。耶律楚材久居燕京，并在金尚书省任职。围城过程耶律楚材"绝粒六十日，守职如恒"①，中都陷落，耶律楚材成为蒙古治下的子民。成吉思汗1218年徵召耶律楚材赴行在，见到他，成吉思汗说："辽与金为世仇，吾与汝已报之矣。"耶律楚材回答："臣父祖以来皆尝北面事之。即为臣子，岂敢复怀贰心，仇君父耶?"成吉思汗雅重其言，留在身边，以备咨询②。十六年后——公元1234年——金才亡国。

公元1220年，西域城邦杀害了蒙古派出要求臣服的使者，成吉思汗亲自统军出征西域。耶律楚材随军西行，开始了他一生跨度最大、历时最久、创作欲最旺盛的时期。在《湛然居士集》中，可以明确系年的诗文，始于1220年③。此后数年中，他写的"西域诗"不但数量颇多，而且是他平生诗作的冠冕，也是元诗史的开篇。

西域河中府曾是耶律楚材久驻之地。1220年，成吉思汗亲率大军攻克了原属于西辽的河中府。中亚河中府，又译"寻思干"或"斜米思干"，今称撒马尔罕，位于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新疆阿尔泰山以北。耶律楚材在河中府驻守期间写下了大量的诗篇，其中《西域河中十咏》（《湛然居士集》卷五）是代表作。

这十首诗都是以"寂寞河中府"起兴。耶律楚材的诗篇主要写自己的见

---

① 释行秀《湛然居士集序》。

② 宋子贞《耶律楚材神道碑》。

③ 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将《湛然居士集》卷五的《过闾局河四首》系于1219年。诗是和丘处机诗韵，而且有"亲见阴山冻鼠冰"之句，王国维又说"乃辛、壬间在西域所追作"。

闻与印象，在这十首诗中只有一个人物，那就是诗人自己。他写的虽然是与家乡迥不相同的风光人物，但始终如一的却是那个为时代潮流簇拥着浪迹天涯的契丹青年。中原战乱频仍，金在最后挣扎，西夏亡国在即。耶律楚材在战事已经平息的中亚河中府留守，河中宽厚的民情、迟缓的生活节奏，使出自西北来历久远的古族、在内忧外患中长大成人、在生离死别中品尝人生百味的耶律楚材，产生了终老于寂静的西域小城的念头。河中地处中西交通要道，来自东西两极的冲突侵扰，给这一寂寞天涯留下了深刻的思变烙印。蒙古势力进入西域，并成为主导力量，改变了延续几个世纪的政治格局，人民面临新的劫难，也面临着新的机遇、新的挑战。

就这样，耶律楚材在异域度过了几年有意义的岁月。他的“西域诗”是诗歌创作的主要成就。时隔五六百年，一个契丹籍诗人应时代而生，重张骆宾王、岑参之帜，使传统的“边塞诗”或“西域诗”有了清晰的发展脉络。耶律楚材的西域诗特点不只是笔下山川风情之新奇，也体现出诗人诗思之苦。13世纪前期西北民族的激烈冲突和移位，使诗人过早成熟。故国王孙耶律楚材在诗中咏唱道：“半纸功名未可呈，无心何处不安生。十年沧海尘空起，百岁黄粱梦乍惊。”（《和李振之》）“渐经白发宁辞老，未济苍生曷敢归？”（《和移剌继先韵》）“清明时节过边城，远客临风几许情。野鸟间关难解语，山花烂漫不知名。”（《庚辰西域清明》）……他知道时代已变，世风不再；他感慨“自怜西域十年客，谁识东丹八叶孙？”（《过云中和张伯坚韵》），谁都读得明白他是在自伤身世。在《和王巨川》诗中，他离开自身背景，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今年扈从入西秦，山色犹如昔日新。诗思远随秦岭雁，征衣全染灞桥尘。含元殿坏荆榛古，花萼楼空草木春。千古兴亡同一梦，梦中多少未归人。”

《湛然居士集》十四卷，收入耶律楚材的诗文776篇。他的创作在元代前期不仅作品多，而且成就高，他确实是诗坛重要一人。

《西游录》二卷，是耶律楚材的另一部著作，也是完整保存至今、产生过广泛影响的西行记之一，写的是公元1219—1224年这六年间耶律楚材在西域的见闻，而《湛然居士集》前九卷就是这一时期所作的诗文。

耶律楚材《西游录》的写作与蒙古史的一件大事——北方道教宗师丘处机远赴西域谒见成吉思汗，有密切关系。

丘处机（1148—1227），字通密，号长春子。金元之际是北方最有影响的道教徒，民间广泛传说他有长生之术，已三百余岁，正在西域征战的成吉思汗于1219年派专人到他所住山东莱州昊天观，敦请他赴行营相见。是时丘处机已经七十二岁，但他欣然启程，由尹志平、李志常等十八个弟子陪同，

踏上坎坷漫长的西行之路。历时三年，1221 年在阿富汗境兴都库什山北麓八鲁湾行宫，丘处机谒见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并在西域河中府讲道。1223 年，丘处机回到燕京（北京），定居太极宫，受命掌管天下道教。1227 年夏七月，丘处机病逝于燕京；同年冬，耶律楚材至燕京。在燕京，故旧乡亲知道他曾留居西域六年，一再询问异域风土人情，使他一时难于应对，便提笔写下了《西游录》，记录出自己的西域见闻，以满足好奇者。实际耶律楚材写作《西游录》主要为攻击丘处机①。在 1229 年耶律楚材为《西游录》写的序之中，充斥着对道教的贬斥。考虑到《西游录》的写作时期适逢丘处机去世、《长春真人西游记》开始编辑②，所以这两者之间应该有一定联系。

耶律楚材死后，他的儿子耶律铸倾向道教，所以《西游录》在其身后罕见流传。实际长期以来都将《西游录》中攻击道教的内容作了删节，而保存了西行见闻部分。1926 年于日本发现《西游录》两卷原本之前，人们所见的《西游录》是一部纯粹的“西行记”。这也说明从《西游录》问世，人们读到的主要是他笔下的西域风光，换句话说，人们看重的是它的文学与地志学内容。时过境迁，当年耶律楚材与丘处机的佛道之争，已经褪尽感情色彩，还原为历史。今天，《西游录》和《西游记》(《长春真人西游记》)是关于西域史地——特别是楚河、阿姆河与锡尔河地区中世纪史地——同样重要的著作。

关于耶律楚材的生平和创作，有两个相关问题应该探讨：一个是与道教、佛教、儒家的关系，另一个是与契丹文化的关系。

耶律楚材是契丹族作家。在他之前，契丹族的作家并不多；在他之后，契丹人用汉语或母语写作者也少见——作为一个民族它的主要特征已经消失。耶律楚材则始终以契丹文化的继承者自居。

西域是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不同宗教相处的沃壤。在西域的六年中，耶律楚材吸收了西域民族的文化精华，特别是他竟找到了一个学习本民族（契丹）传统文化的机会。

《湛然居士集》卷八有一篇特殊的诗作，即七言歌行《醉义歌》。《醉义歌》诗序说：辽国的寺公大师是一时的俊杰之士，不但品行超卓，而且有文采，尤其长于诗歌。“其旨趣高远，不类世间语，可与苏黄并驱争先”。寺公大师的绝唱就是《醉义歌》。这首诗是用契丹语写成的，我的父亲文献公耶律履曾特意将其译成汉文，但父亲早逝，可惜我竟未能见到译稿。及追随蒙

① 向达《西游录前言》(《西游录·异域志》，中华书局 1981 年)。

② 向达认为，《西游录》写于 1228 年，刊行于 1229 年。而《长春真人西游记》书前的孙锡序，写于 1228 年，但书中写到了 1230 年丘处机的葬礼。所以应编写于 1228—1230 年间。

古大军西征,在西域遇到了前朝西辽国的郡王李世昌,我向他学习了契丹文字。整整一年之后,我已精通契丹文字,于是将《醉义歌》从契丹文译成汉文。

通过这篇序，可知在随军西征之前，耶律楚材已经不能阅读契丹文文献了。——实际上中原已经没人能正确使用契丹文字。耶律楚材的父亲大约就是契丹文最后的使用者之一。然而，立国西域伊塞克湖畔的虎思斡耳朵的西辽，还以契丹文字为官方语言。西辽由契丹远支王族耶律大石创立。耶律大石（1087—1143）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八世孙，比耶律楚材只大一辈。他自幼通辽、汉文字，长于骑射。天庆五年（1115）进士，出任翰林。契丹语中称翰林为“林牙”，所以史料中也称耶律大石为“大石林牙”。大约就在同时，金朝崛起。几年后——保大二年（1122），金兵大举攻辽，连取辽国中京（内蒙古昭乌达盟宁城）、西京（山西大同）、南京（辽宁辽阳）三都，世敌北宋与金相约北上，试图在民族更迭之际分取一杯羹。南北夹击中，耶律大石渐渐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一度被金兵俘虏，逃脱后，又与辽天祚帝反目，于公元1124年自立为王，并率200名死士宵遁。一路西行，越过黑水（额济纳河）到达可敦城，在可敦城召集旧属辽国的七州十八部首领大会，并征集了精兵万人；1125年，耶律大石获悉天祚帝已为金人阶下之囚，便在可敦城称帝，1132年正式建立西辽，成为契丹王统的继承者。到公元1213年，西辽最后一代皇帝耶律直鲁古死；1223年，耶律楚材出征西域一年后，蒙古大汗封出守中亚花剌子模的西辽旧臣博拉克为“库鲁汗”，建立了一个蒙古的附庸“科尔曼国”，即后西辽，直到元武宗至大二年后西辽才消亡。在西域，西辽以佛教为国教，并使用契丹文字，撒马尔罕则是西辽的河中府。在河中府，耶律楚材以西辽前郡王李世昌①为师，学习了生疏已久的契丹文字，一年后，不但掌握了契丹文字，还成为契丹语文与诗歌的最后的传人。

耶律楚材早年就信奉佛教。万松老人释行秀1234年为《湛然居士集》

---

① 关于精通契丹文的西辽郡王李世昌，汉文文献中没有相关的记载。由于姓李，曾是西辽国郡王，所以李世昌祖上可能是曾以李为姓氏的西北部族比如沙陀、西夏人士，当耶律大石在可敦城召集辽国旧属时，加入了西辽。《湛然居士集》卷二有《赠李郡王笔》，卷七有《赠西辽李郡王》（中华书局排印本，“西辽”误为“辽西”）。两处的“李郡王”应该都是指李世昌。前者有“中书休笑不中书”之句，并有注：“李郡王尝为西辽执政。”所谓“中书”应是中书令。后者有“我本东丹八叶花，先生贤祖相林牙。”可知李世昌祖先曾为耶律大石辅弼之臣。魏良弢《西辽史纲》（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1页）对李世昌作过论列，但说李世昌是汉族，恐未必是。《长春真人西游记》提到在西域河中府时，“太师府提控李公献瓜田五亩”，这里的李公必是当地人；还提到“司天台判李公”。李世昌以西辽旧臣，入蒙古后成为太师阿海的“提控”，或有可能。不管怎么说，不见于史传的李世昌与耶律楚材、丘处机均有密切关系。

所写的序中说，耶律楚材在二十七岁时从释行秀“受显诀”，以“湛然居士从源”为法号。在语言、宗教、风俗迥异的西域，他与丘处机是有同好（写诗）、有共同文化（汉文化）背景的“他乡故知”，他们之间的牵系并非信仰。然而《西游录》的写作却是他贬斥道教的明证，这与他此后在燕京的经历有关。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余记》曾说：“文正（耶律楚材）师事万松老人，称嗣法弟子从源。其于禅学所得最深，然其所用以佐蒙古安天下者，皆儒术也。公对儒者则倡以儒治国，以佛治心之说。”“公虽洞达佛理，而其性格实与儒家为近，其毅然以天下生民为己任，古之士大夫学佛者，绝未见有此种气象。”耶律楚材是成吉思汗及窝阔台汗时期有作为的政治家之一，他虽皈依佛门，但从根本上讲，他实际是“迹释而心儒，名释而实儒，言释而行儒，术释而治儒”（芳郭无名人《湛然居士集后序》）。

耶律楚材与元好问都是由金入元的重要诗文家。但汉族诗人元好问以一个金源遗民身份立言；而出自契丹最主要的华族之一的耶律楚材，则以新朝的匡正势力苦心孤诣地往返于文学与政治之间。作为通晓契丹文的最后一人、契丹文明的传人，耶律楚材也是将古老契丹文明融入华夏文明的第一人。

元代文学史以耶律楚材为发端，因为元代文学的萌生，与金代文学一样，其发展过程是以地域（区域）文明取代单一民族文明为特征。金能够抗击蒙古 20 多年，一定程度上就是与女真在一个多世纪间已经完成了北方区域的文化整合有关。与蒙古骑兵对抗的，不是女真皇室，而是整个北方区域的人群。对于耶律楚材来说，出入于儒、道、释诸家调和异端也好，穿越于契丹、女真、蒙古、西域等多元文明化解广袤时空也好，原本是单一的民族文化，正是从他那一代人身上，归纳荟萃为北方地域的多元文化。元代的历史与文学，就是建立在这样的模式之上。

四

元曲是元代文学的冠冕。历来以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为最重要的、最有代表性的元曲家——元曲四大家，关汉卿当之无愧是“元曲四大家”之首。这四个作家都以杂剧创作为特点。

在关汉卿活跃于杂剧写作、演出队伍的时期，元杂剧基本成型。相对于传统的诗文而言，元杂剧是一种新型的代言体文体，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表演来与观众沟通的。

元杂剧剧本已经是比较完备的戏曲文本。它的基本结构，是由四折加一个楔子组成一本杂剧，某些杂剧实际超出了一“本”，比如《西厢记》就由五本组成。四折采取四种不同的宫调，每折一种，因此，一折又可以叫做一

套。而组成“折”的同宫调曲牌有多少，并不一致，以目前见到的而言，最少的只有三个，最多的可达二十六个，一般常在十个左右。杂剧的音系是北方语音，没有入声。到了元代中期出现了南曲北曲合用的情况，叫做“南北合套”。

在明初的《太和正音谱》之中，根据内容将杂剧分为“十二科”，即十二个类别。现代学者一般将杂剧分为爱情婚姻剧，神仙道化剧，公案剧，历史剧，社会剧，等等，这些分类都是立足于剧本的内容与主题。



元杂剧《东堂老》插图。据明刊本《元曲选》。论者认为这部杂剧具有“也里可温教”（基督教）背景。

爱情婚姻剧是元杂剧引人注目的部分。所谓“四大爱情剧”——《西厢记》《拜月亭》《墙头马上》《倩女离魂》——历来传诵不息，特别是《西厢记》是公认的元杂剧压卷之作。神仙道化题材在元代有广泛的社会基础，《黄粱梦》《柳毅传书》虽然都来源于传统题材，但赋予了元代的时代色彩。公案剧因为涉及社会公正的伸张与否，长期盛演不衰，《灰栏记》很早就被翻译成外文，影响至巨；《鲁斋郎》《陈州粜米》曾引起社会底层的共鸣。对历史往事表达看法，历来是文学作品的热门话题，元代的历史剧《赵氏孤儿》在西方享有盛誉，一定程度上成了中国古典戏剧的代名词。在元代杂剧之中，有许多是正面反映社会生活的，这部分作品不但有深度，而且具有感染力，《窦娥冤》《东堂老》等是元代社会生活的真实再现。当然，上述分类都是相对的，例如《梧桐雨》《汉宫秋》等就介于爱情剧与历史剧之间。

长期生活在民间的元代杂剧作家们，与普通人有广泛深切的交往。数以百计的元杂剧作家，关汉卿是其中勤奋、执著的一个人。从他仅存的作品来看，他关注社会生活，有强烈的正义感，即便历史剧，也是力图从中寻找现

实的镜鉴。元代杂剧，没有比关汉卿更典型的体现者。与他大致同时的另一个杂剧作家高文秀，被大都文坛称为“小汉卿”；比他年辈稍晚的沈和甫，被叫做“蛮子汉卿”——南方的关汉卿。这都说明，关汉卿始终处在一个无法替代的位置。尽管如此，关于关汉卿的生平，迄今所知甚少。《录鬼簿》将关汉卿作为“前辈才人有所编传奇于世者五十六人”之首，赞许为“梨园领袖”“杂剧班头”，“姓名香，四大神洲”，并著录了关汉卿所作的杂剧剧本62种，但是关于关汉卿的生平，则只有一句话：“大都人，太医院尹，号已斋叟。”这就是关于关汉卿生平的基本史料。而这只有十一个字的小传，除了姓“关”，几乎都有争议。他的籍贯，历来有解州（山西解县）、祁州（河北安国）等异说；惟一简历“太医院尹”，别本《录鬼簿》又作“太医院户”；别号，或说是“一斋”“乙斋”“已斋”。

关于关汉卿的生平，主要内容需要从他的作品之中去探寻。南宋亡国之后，他和许多世居北方的文人学子一样，曾前往江南游历。在〔南吕·一枝花〕《杭州景》套曲里，南宋“行在”的“水秀山奇”“人烟辏集”给他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一般认为他的小令〔大德歌〕是写于元成宗大德年间，如果此论无误，那么他应该是出生在金朝末年而去世于大德年间，在元朝生活了六十年之久。而这个时期正是杂剧风靡文坛，倾倒了社会不同人群的全盛时期。

关汉卿除了写作杂剧剧本，还经常亲自参加杂剧的舞台实践。明代阅读元杂剧剧本最多的人臧懋循曾指出，关汉卿“躬践排场，面傅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优倡而不辞”（《元曲选序》），在这一点上，东西方两大剧作家关汉卿与莎士比亚有相近之处。由于他始终身处社会下层，在身后不久，人们对他的身世经历就不甚了了。好在他的作品历来传诵不息，流传至今。

关汉卿公认的优秀作品，是《感天动地窦娥冤》（简称为《窦娥冤》）。它不但是关汉卿的代表作，也是元杂剧艺术性与思想性统一的典范。

《窦娥冤》的主人公是孤女窦娥。窦娥三岁丧母。父亲窦天章是穷儒士，窦娥七岁时为了抵债并筹措上京赶考的路费，将女儿送到蔡婆婆家作童养媳。窦娥成年后，丈夫却又死去，青春守寡，与婆婆相依为命。年迈的婆婆是以放债为生，有一次出门索债时为人所害，被张驴儿父子救了下来。地痞张驴儿与他的父亲对蔡婆婆的家产垂涎已久，又欺她们婆媳都是寡妇，就以救了蔡婆婆一命为由，公然住进了蔡婆婆家。这两个人并非善良之辈，他们控制了懦弱的蔡婆婆，张驴儿得陇望蜀，觊觎年轻的寡妇窦娥，指望彻底成为这个家庭的主人。窦娥虽然是一个孤苦无助的弱女子，但她一眼就看穿张驴儿的用心，并予以回绝。然而，她同样不知道该如何保护自己和年迈糊涂的婆

婆。急不可耐的张驴儿设计想毒死蔡婆婆，结果反而毒死了自己的父亲，张驴儿竟以此逼迫窦娥就范，否则就向官府首告窦娥，诬称窦娥毒死他父亲。窦娥惟一能寄希望的就是官府，她不向张驴儿的讹诈低头，宁愿要"官休"，不要"私休"，因为她认定官府会伸张正义。然而，接受张驴儿状词的楚州太守桃杌是集世间昏庸糊涂之大成的"父母官"。在严刑拷打的逼供之下，窦娥屈打成招，招认是自己毒死了张驴儿之父，她希望由自己承担一切，使相依为命的婆婆免遭苦刑。一直到即将行刑的前夕她才为"负屈衔冤"的自己高声喊冤，并许下三个大愿，死后将有三桩奇异天象同时出现，证实自己是蒙冤屈死。她死后果然颈腔无血落地，盛夏六月下起大雪，当地三年间滴雨未见。后来，窦娥多年不见的父亲成为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他衣锦还乡时屈死的窦娥的鬼魂出现，冤案终于昭雪。



《窦娥冤》选取的是窦娥在临死前发愿的场面。

《窦娥冤》应该是关汉卿晚年的作品。剧本第四折窦天章曾出任"提刑肃政廉访使"，而至元二十八年以后，才将原来的"提刑按察使"改为"肃政廉访使"。所以，《窦娥冤》反映的是元代全盛时期的社会生活场景。

窦娥是杂剧的主人公。《窦娥冤》第三折的〔滚绣球〕是元杂剧极具感染力的段落：

> 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



《望江亭》插图。出自明刊本《元人杂剧选》。画家选取的是正在接近主题的场面，颇引人悬心。

这个只曲写得极其投入，通过主人公呼天怆地的申诉，将全剧的悲剧氛围营造得浓烈欲燃。元代的杂剧作家往往是诗人气质十足的人，而关汉卿更是善于在习见的社会环境中营造诗的空间。

关汉卿的杰作，还有《望江亭中秋切鲙》（简名《望江亭》）、《赵盼儿风月救风尘》（简名《救风尘》）、《关大王单刀会》（简名《单刀会》）等等。《望江亭》的故事不是从前人书中取材，而应该是来自作家对生活的观察概括。寡妇谭记儿与白道姑是方外友。适逢白道姑的侄子白士中妻子去世，两人便由白道姑作和，结为夫妻，一同到潭州（湖南长沙）赴任。但宠臣杨衙内垂涎谭记儿貌美，向皇上参奏白士中“贪花恋酒，不理公事”，并奉旨携势剑金牌到潭州取其首级。白士中闻讯不知所措。适逢中秋，谭记儿则扮作渔女来到杨衙内的驻地，以献鲙接近了杨衙内，并将杨衙内一行灌醉，将势剑金牌与关防文书一并窃走。杨衙内要将白士中斩首，但临时发现凭证全失，同时谭记儿上堂击鼓鸣冤，状告杨衙内调戏民女。结局是杨衙内杖责削

职，谭记儿夫妻美满如初。这个杂剧是“旦本”，谭记儿当然是主角，而谭记儿的形象也确实生动饱满，为追求并保住爱情与幸福，她付出了自己所能够付出的。

《救风尘》是一部有喜剧意蕴的杂剧。纨绔子弟周舍意欲娶妓女宋引章为妻，宋引章不听结拜的姐姐赵盼儿的劝告，执意嫁给了周舍。一过门周舍原形毕露，使宋引章不堪虐待。宋引章向赵盼儿求救，赵盼儿设计使周舍迷恋上自己，周舍按赵盼儿的要求写了休书，使宋引章得以逃出火坑。周舍最终人财两空。在这部杂剧之中，赵盼儿是作者着意描写的风尘女子，并以轻松幽默的笔调写出了有严肃社会意义的内容，寓惩恶扬善于嬉笑怒骂之中，使人读之充满快意。

《单刀会》写关羽一人以超群的胆略战胜对手，对民间的关羽崇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杂剧中，身染悲剧色彩的关羽是精光四射的英雄。

总之，在关汉卿的杂剧作品里，关注人间的悲欢离合与生老病死，是共同的出发点。在关汉卿笔下，平常的苦难具有了不平常的诗意。他的杂剧中的正面人物，除古代的贤臣良将，还有一个个就生活在他身边的人，特别是普通的妇女。窦娥、赵盼儿、谭记儿、杜蕊娘、谢天香、燕燕……，她们是妓女、婢妾、童养媳、年轻的寡妇……正是关汉卿在他的杂剧之中赋予了这些历来被轻忽的人以人格的感召力量。在关汉卿的杂剧之中，总是正面人物（特别是弱女子）更具有光彩，吸引了更多的目光。剧中人的“成功”，就是关汉卿杂剧成功的基础。

在阅读关汉卿的杂剧时，人们总会为他流畅的驾驭语言的才能所倾倒，也为他的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所感染。

据元曲史文献记载，关汉卿在元曲家之中相当活跃、相当有影响，几乎人人都知道他，但罕见有人能够真正理解他。梁进之是他的“故友”，杨显之是他的“莫逆之交”，同时他与王和卿、费君祥交往密切，而且与艺妓关系不同寻常，他的著名套曲《赠珠帘秀》就是与杂剧女演员珠帘秀（朱帘秀）交往的告白。显然，无论是从作品，还是从个人的人格魅力，关汉卿都是元曲最抢眼的亮点。

除《录鬼簿》，元人对关汉卿其人最重要、最具体的记载，就是元末人熊自得《析津志》的“名宦”节关汉卿传略：“关一斋，字汉卿，燕人。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是时文翰晦盲，不能独振，淹于词章者久已。”实际这个小传的最后一句最值得重视。正是这简略得不能再简略的评述告诉我们，关汉卿是放弃了不得不放弃的，才最终在一个原本被世俗轻忽的领域永远站立了起来，他使这个领域得到了社会的承

认，但对他的承认却有所保留。很遗憾，除了姓关，在元曲史料之中关于关汉卿几乎没有一致的记载，可元曲史料中惟一没有争议的，就是他的“杂剧班头”（可以理解为“杂剧领袖”）的地位。他力图振文风于晦盲，又不得不淹于词章，这就是他在自己的杂剧之中力图表达的和始终未能表达到的。

五

《西厢记》是元代杂剧巅峰。但关于它的作者王实甫的生平与经历所知甚少。

元曲史基本史料《录鬼簿》将王实甫列名于“前辈已死名公才人”节，据晚出的天一阁抄本《录鬼簿》中一则不见于其他版本的记载，一般认为王实甫名叫王德信，是大都（北京市）人。目前有关《西厢记》作者的第一手史料也就是这些。从有关文献可以推断，王实甫主要活动于元成宗元贞、大德年间。元代文献中有几个叫做王实甫或王德信的文人，但他们只是同名者。好在《西厢记》不但完整流传至今，而且是元代杂剧之中最有影响、版本最多的一种。

据《录鬼簿》记载，王实甫一共写有 14 部杂剧，除《崔莺莺待月西厢记》（简名《西厢记》），完整流传至今的还有《吕蒙正风雪破窑记》（简称《破窑记》）、《四丞相歌舞丽春堂》（简称《丽春堂》）。此外今存残曲的尚有《苏小卿月夜贩茶船》《韩彩云丝竹芙蓉亭》两种。除了杂剧，他还有少量的散曲。

《破窑记》是元代比较知名的杂剧，写宋史名臣吕蒙正由穷书生“变态发迹”的故事，整个故事的支撑点是他与妻子刘月娥的悲欢离合。这样的结构更容易打动金元时期经受生活磨难，一心企盼转机或奇迹出现的普通文人。《丽春堂》通过金代当朝丞相乐善与副统军使李圭在官场的明争暗斗，寄寓了对世事无常、人生苦短的慨叹。尽管这两部杂剧都有较高的水准，但与《西厢记》相比，它们只能算是“练笔”之作。《录鬼簿》所有不同版本与《太和正音谱》，都明确记载《西厢记》的作者是王实甫；明代一些文献又出现了关汉卿作《西厢记》与“关作王续”——全剧主要是关汉卿所作，而由王实甫续成——的说法。其实只要有《西厢记》传世，元杂剧就无愧于元代文学的冠冕之称。

《西厢记》是王实甫在唐代传奇《莺莺传》与金代诸宫调《西厢记》基础上写作的杂剧。它是目前可见的元代杂剧中篇幅最长的一部：五本二十折加一个楔子。它也是元代形式最完美、内容最丰富的戏曲剧本。

唐人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会真记》）久已脍炙人口。《莺莺传》

的故事发生在唐中期贞元年间。落拓士子张生在蒲州古刹普救寺偶然与随寡母寄居在寺院西厢院的崔莺莺相遇并相爱，但张生中举并改变了处境后，竟遗弃了家道中衰的崔莺莺，另择高枝。这种“始乱终弃”的故事在唐代不难见到，想必是当时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两难问题。但《莺莺传》的特殊性在于，后人往往认为这个传奇故事实际上是元稹的自传。从《莺莺传》问世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开始，到宋元时期，它都是诗文重要的典故，在文坛，在民间，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到雄踞北方的金朝，民间文人“董解元”以此为背景，写出了长篇戏曲作品《西厢记诸宫调》，一般也称其为《董解元西厢记》。《董解元西厢记》是讲唱文学。在《董解元西厢记》之中，以 193 套组曲，5 万多字的篇幅，将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故事写成一部感人至深的作品。《董解元西厢记》对《莺莺传》的主要改动，是改变了故事的结局，将一个始乱终弃的社会悲剧变为“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董解元西厢记》一问世就成为当时最流行的文学作品之一。20 世纪的 80 年代，远在新疆且末的一座位于古丝绸之路交通要道上的古城曾出土了元初人写本《西厢记诸宫调》残页，那是戍守于此的汉人军士的遗物，以此可见“董西厢”影响之广被四裔。王实甫杂剧《西厢记》就是在《西厢记诸宫调》基础上重新创作的。



这是《西厢记》的“解围”——打破僵局的惟有武力。出自明万历刊本《绘图新校注古本西厢记》。

自从传奇《莺莺传》问世，张生—莺莺的本事，几乎无人不知。在故事脉络发展与时代背景方面，《西厢记》受到《莺莺传》与《西厢记诸宫调》的影响与限制。但是，就好比《水浒传》与宋元的“水浒故事”关系一样，只有《西厢记》写就，从《莺莺传》开始的、处在发展之中的人物形象才最终定型。杂剧《西厢记》最成功的地方就在于塑造了张生、崔莺莺、红娘以及崔母这几个典型的形象。《西厢记》的故事基本结构出于《莺莺传》，《西厢记诸宫调》又为它设置了丰富多彩的“背景”，但始终在前台紧紧抓住读者与观众的，正是这几个具有充分的说服力与可信性的人物，他们的活动构

成了基本的戏曲情节，他们的每一举手投足，都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西厢记》的“长亭送别”的场面。出自明人凌濛初刊本《西厢记》。实际有了这一出之后，关于张生与莺莺，再写什么也都属于多余了。

王实甫酝酿并写出《西厢记》的元代前期，传统的科举体系已经被弃置。实际上士人不能够如同唐、宋、金等朝，依靠一举成名彻底改变自己的处境。但是，在杂剧《西厢记》之中，男主角张生仍然以中举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崔母为自己设置的难题。在科举的“全盛时期”唐代，元稹却并没有为自己笔下的人物安排这样的结局，中举反而成了人物躲避责任的理由。这个改变一方面是时尚所趋：人们希望在文学作品中能更多地体现出自己在生活之中无法达到的境界；同时它也是人们无法摆脱时代束缚的明证。张生不是

《西厢记》最出彩的人物，然而在《莺莺传》之中却是。但是从《莺莺传》到《西厢记》，张生却成了最可信的人物。崔莺莺这个人物的成功，在于充分表现出她的和普通人不一样的特定身份与她的和普通人完全一样的对爱情的本能追求之间的落差。在整个剧本中地位最卑微的红娘，则是全剧最"有戏"的角色。此后"红娘"就成了成人之美的媒介的代称。崔母、郑恒，这在当时都是人们司空见惯的反面角色，可是将这一组人物组合在一起，集人们对生活的追求、对成功的理解、对失落的认同、对反悔的宽容等等至情至感于一编，将文人学子的理想境界写得如同近在眼前。

可以说，《西厢记》从一问世，就成了最知名的戏曲剧本。元明清三代，《西厢记》长演不衰，为了使杂剧《西厢记》适应更多的读者、观众，一些戏曲家与艺人纷纷尝试将其改编为"南调"，以期使它在经历了时代的变迁之后还能拥有更多的观众。《西厢记》被称为"第一才子书"，改编本、评点本、注释本、批校本层出不穷，成了版本最多的戏曲剧本，拥有一代又一代的观众与读者，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为之倾倒，受到深刻影响。一部戏曲获得如此广泛的关注，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就是她的艺术魅力所在，这也是她的艺术生命力之所在。

六

除关汉卿，"元曲四大家"之中的白朴、马致远、郑光祖都有着广泛的影响，生前都写有十数种杂剧，写作与流传至今的杂剧剧本并不多。但他们的成就大致相近，而且都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才能。

白朴出生于北方汉人世家，父亲仕于金，白朴早年随父居住在金朝的南京（河南开封）。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蒙古大军围南京，权臣崔立劫持了金朝皇室与满朝文武以城降，白朴的母亲也在这场灾难中为蒙古军队劫掠。这时白朴年仅八岁，当时他的父亲白华不在南京城中。第二年金亡，他随父执元好问北渡黄河，避居山东。金亡后，白华像许多金朝臣民一样，一开始南渡投向南宋，但在几年之后又回到了世居的北方。白朴父子在大乱初定时来到已经在蒙古治下的真定（河北正定）寄居。白朴就在社会动乱、家国倾覆的背景之下长大成人。他一生不愿出仕于蒙元，"栖迟衡门，视荣利蔑如"（王博文《天籁集序》），终老于山林。

作为"元曲四大家"之一，白朴一生写有 16 部杂剧，流传至今的只有《裴少俊墙头马上》（简称《墙头马上》）、《唐明皇秋夜梧桐雨》（简称《梧桐雨》）、《董秀英花月东墙记》（简称《东墙记》），但最后一种是否为白朴所作尚有争议；残存佚曲的还有《韩翠萍御水流红叶》《李克用箭射双雕》。

除了杂剧，白朴还有散曲作品流传至今，共包括 16 首小令，4 套套曲。同时，白朴也是元代重要的词人，他的《天籁集》是不多见的单行元人词别集，词风爽朗明快，与散曲颇为接近。

《墙头马上》是元代四大爱情剧之一。它的创意来源于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名篇《井底引银瓶》“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而《井底引银瓶》诗写的就是男女的私奔。《墙头马上》剧中的女主人公李千金爱上了偶然相逢的青年裴少俊，她本可以等待裴少俊获得一官半职之后来正式迎娶，但她却不愿将青春岁月流失在等待之中，毅然与裴少俊私奔，并且在裴家的后花园同居七年，生了一双儿女。秘密被裴少俊父亲裴尚书发现，裴尚书强行拆散了这对情侣，但最终他们得以团聚。李千金是元杂剧中较早出现的具有个性魅力的女子，敢爱敢恨、泼辣洒脱。在白朴笔下，爱不需要理由，爱也不需要等待。全剧的矛盾冲突就是建立在对爱的不同理解之上。

同是爱情主题，但《梧桐雨》却以感伤为基调。《梧桐雨》写的是唐玄宗与杨玉环的情爱悲剧。与《墙头马上》相同的是，这个杂剧的创意契机也是来自唐人白居易的诗。白居易久负盛名的长诗《长恨歌》有“春风桃李花开夜，秋雨梧桐叶落时”之句，而《长恨歌》写得正是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情爱。《梧桐雨》在写成之后相当流行，较早流传到江南，这也与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情爱故事历来就受到广泛关注有关。可以说，《梧桐雨》是白居易《长恨歌》与清人洪昇杰作《长生殿》之间的桥梁，在这个故事的发展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如果说《墙头马上》以人物取胜，《梧桐雨》就是以文辞优美、情景交融著称。近人王国维曾说:“白仁甫《秋夜梧桐雨》剧沉雄悲壮，为元曲冠。”(《人间词话》)

马致远，号东篱。大都（北京市）人。一则晚出的资料说他字千里，但这不一定靠得住。在“元曲四大家”中，他的创作时期比较长，经历比较丰富，影响也比较广泛。至元年间他曾向皇太子（即所谓元裕宗）真金献过诗，至元二十二年以后，曾出任江浙行省务官。壮年时期，有二三十年在宦游南北的“漂泊生涯”中度过，但他始终沉沦下僚，五十岁前后就辞官归隐了。元成宗元贞年间，他是元曲家的社团“元贞书会”的成员。他的杂剧创作开始较早，在元贞大德年间他已经是曲坛相当活跃的人物。

马致远写有 15 部杂剧，流传至今有 7 种：《破幽梦孤雁汉宫秋》《吕洞宾三醉岳阳楼》《马丹阳三度任风子》《西华山陈抟高卧》《夜半雷轰荐福碑》《江州司马青衫泪》《开坛阐教黄粱梦》。最后一种是与他人合作的。另外有一部仅存残曲。在散曲方面，马致远的成就也相当突出，近人任讷曾将

他的散曲辑成《东篱乐府》。今存有 115 首小令，22 套套曲，此外还有 4 个残套（据《全元散曲》）。他的小令，数量在元人之中名列前茅，质量也罕见其匹。

《破幽梦孤雁汉宫秋》（简称《汉宫秋》）是其代表作。与《梧桐雨》相近似，《汉宫秋》写的是无人不知的历史故事：昭君出塞。汉昭帝宫人王昭君出塞本事最早见于《汉书》，当时即成为人们关注的题材。从汉朝以来反映王嫱（王昭君）远嫁匈奴的文学作品不计其数。马致远的《汉宫秋》除了写到汉昭帝与王昭君的缠绵爱情，极力渲染了汉昭帝对王昭君的思念，还写到王昭君在“番汉交界处”以酒向南祭奠然后投江自尽。也就是说马致远并没有拘于史实，而是对传统的昭君出塞的故事作了较大的改造。而《汉宫秋》受到人们的喜爱，还由于它的文辞典雅优美。清代曲论家焦循曾说：“马东篱《汉宫秋》一剧可称绝调。臧晋叔（臧懋循）《元曲选》取为第一，良非虚美。”（《剧说》）

在《汉宫秋》第三折之中，有两个著名的曲子：

〔梅花酒〕呀！俺向这迥野悲凉，草已添黄，兔早迎霜，犬褪得毛苍，人搠起缨枪，马负着行装，车运着糇粮，打猎起围场。他他他伤心辞汉主，我我我携手上河梁。他部从入穷荒，我銮舆返咸阳。返咸阳，过宫墙；过宫墙，绕回廊；绕回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黄；月昏黄，夜生凉；夜生凉，泣寒螀；泣寒螀，绿纱窗；绿纱窗，不思量。

〔收江南〕呀！不思量除是铁心肠，铁心肠也愁泪滴千行。美人图今夜挂朝阳，我那里供养，便是我高烧银烛照红妆。

这是历来受到人们激赏的曲辞。《汉宫秋》之中，这样的文字很容易使读者受到感染，因为它们既符合剧情的需要，又推动了人物的感情波澜，同时渲染了整个的生离死别的氛围。

马致远的其他杂剧主要是神仙道化剧。渲染神仙道化是金元之际北方的社会时尚，这与道教盛行不无关系。

郑光祖在“元曲四大家”中年辈最晚，是元后期杂剧作家。钟嗣成说郑光祖原是儒户，“以儒补杭州路吏。为人方直，不妄与人交，故诸公多鄙之。久则见其情厚，而他人莫之及也”。与关汉卿、白朴、马致远不同的是，他的生活与创作主要在杭州，在当地文坛有较高的声誉，“名香天下，声振闺阁，伶伦辈称‘郑老先生’，皆知其为德辉也”。死后，就火葬在西湖灵芝寺，“诸公吊送，各有诗文”。

据《录鬼簿》记载，郑光祖写有18种杂剧。今存8种：《辅成王周公摄政》《立成汤伊尹耕莘》《钟离春智勇定齐》《虎牢关三战吕布》《程咬金斧劈老君堂》《醉思乡王粲登楼》《㑳梅香翰林风月》《迷青琐倩女离魂》。还有一种仅存残曲。

《迷青琐倩女离魂》（简称《倩女离魂》）是郑光祖的代表作。

《倩女离魂》的本事来源于唐代陈玄祐的传奇《离魂记》，以情节与人物而言，《倩女离魂》比《离魂记》有了明显的改进。良家女子张倩女与王文举是"指腹为婚"的未婚夫妻，王文举进京赶考，途经张家，张母让他们两人暂时以兄妹相称，并应许一旦王文举中举就可以成亲。张倩女不愿将自己的未来寄存在王文举是否得中之上：如果不中，母亲就可能悔婚；如果得中，王文举也可能"别就新婚"，另择配偶。这许多疑虑使纯情女子张倩女病倒在床，可她的魂魄却离开了躯体，追随王文举踏上路途。两人相随三年，直到王文举真的状元及第，衣锦还乡，领着妻子来向岳母谢罪，倩女的魂魄才与卧床三年之久的躯体相合。

作为元代四大爱情剧之一，《倩女离魂》剧中最有光彩的形象就是离魂的女主角张倩女，与《墙头马上》的"淫奔"的李千金相比，她们面对的都是世俗的偏见与压力，但离魂的张倩女更具理想色彩。

元代前期，杂剧的中心在大都。到了元代后期，杭州成了杂剧新的演出传播集散地。相比之下前期杂剧的繁荣，也在于人才辈出；后期杂剧有了更大的市场与影响，然而却缺乏关汉卿、马致远那样有感召力的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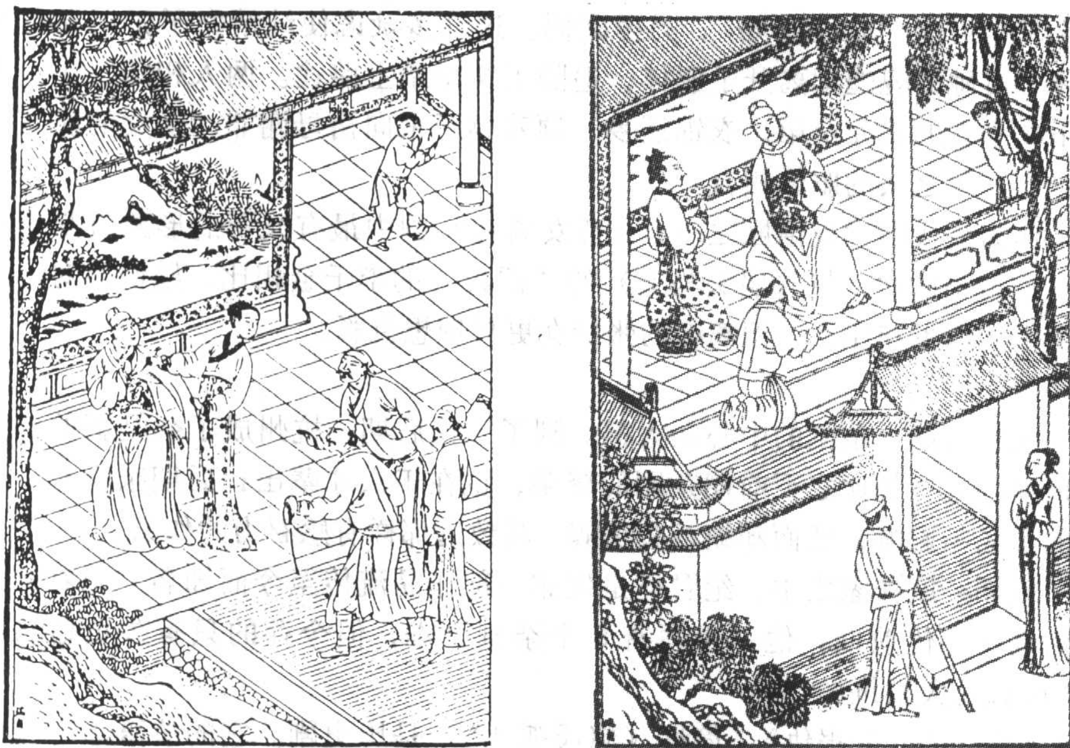
前期杂剧作家之中，纪君祥是仅靠一部作品流传至今而知名。纪君祥主要活动于元代前期，他一生写有6个杂剧剧本，但今存的只有久负盛名的《赵氏孤儿大报仇》。

《赵氏孤儿大报仇》（简称《赵氏孤儿》）是历史剧。它的故事出于《左传》《史记》等史籍，久为人所知：春秋时晋灵公宠臣屠岸贾与赵盾有嫌隙，几次设计企图杀害赵盾都未得逞，但最终将赵盾三百余口斩尽杀绝。赵盾之子赵朔是驸马，也被赐死，并殃及赵朔的遗腹子。为保护忠臣之后，公主、韩厥、公孙杵臼等人都毅然赴死。二十年后，程婴将真相告诉了长大成人的赵氏孤儿，赵孤发誓报仇雪恨。晋灵公死后，晋悼公即位，正义终于得到伸张，屠岸贾被凌迟处死。

在元代杂剧之中，《赵氏孤儿》是五折一楔子的大手笔。它结构复杂，气韵贯通，人物繁多而且形象鲜明。它的核心是知恩报恩，有冤必申，有仇必报。"报仇"历来是社会下层人民群众感情宣泄的通道。从纪君祥在剧中

对“救孤”的强调渲染看来，有的论者提出，《赵氏孤儿》的作者通过剧本表达了对宋朝的留恋。《赵氏孤儿》对后世有广泛影响，同时早在18世纪就被翻译成了英文，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还曾将其改编为《中国孤儿》剧本，成为西方人认识中国的窗口。历来元曲研究家对《赵氏孤儿》评价颇高，公认“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王国维语）。

杨显之与关汉卿同时，而且是“莫逆之交”，因为善于对别人的作品提出一些中肯的修改意见，所以被同行叫做“杨补丁”。经常与关汉卿在一起讨论作品，切磋文字。在元初曲坛有较大的名气与知名度。他与杂剧演员们交往颇多，著名的艺妓顺时秀称他为“伯父”。他写过8个杂剧，流传至今的有《临江驿潇湘夜雨》《郑孔目风雪酷寒亭》两种。



杂剧《潇湘夜雨》的两幅插图。出自明刊本《顾曲斋元人杂剧选》。这两幅图的特殊之处在于，为《潇湘夜雨》张本，居然回避了最感人的场面。

《临江驿潇湘夜雨》（简称《潇湘夜雨》）是元杂剧的名篇。剧本的基本情节是：宋代官员张商英贬官，携女儿翠鸾经淮河前往江州途中，遇难覆舟，父女失散。翠鸾为渔父救起，认为义女，并许配给其侄崔通。崔通中状元，另娶主试官的女儿，远赴秦川任县令。渔父见侄儿三年不归，就叫翠鸾前往秦川寻夫。崔通竟然不认翠鸾，并诬为逃奴，严刑之后发配沙门岛。途中在临江驿驿站遇雨，翠鸾思念往事身世痛哭失声。这时已经起复为提刑廉访使的张商英正好也在驿站落宿，夜梦受到哭声惊扰，追究哭声来源，父女始得

重逢。这个故事本是宋元广泛流传、一再写入文学作品的著名素材。剧中翠鸾在雨中悲啼前行的段落，写得相当感人。

尚仲贤，真定（河北正定）人。生卒年不详。曾出任江浙行省务官，元曲家马致远也担任过这个职务。在元代曲坛曾与杂剧作家戴善甫“相辅行”（天一阁本《录鬼簿》贾仲明补吊曲）。写有10种杂剧，今存4种，即《洞庭湖柳毅传书》《尉迟恭三夺槊》《汉高祖濯足气英布》《武成庙诸葛论功》。还有三种仅有佚曲。

《洞庭湖柳毅传书》（简称《柳毅传书》）与李好古的《沙门岛张生煮海》（简称《张生煮海》）是元代最著名的神话剧。《柳毅传书》本事来源于唐代传奇小说《柳毅传》。元杂剧的《柳毅传书》之所以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是因为作者找到了人与神两个不同的世界的结合部位——来自两界的爱情。同时，从金代以来的南北对峙，使许多家庭妻离子散，一家人天各一方，难以团圆。“家书”难于送达，却又是家人感情牵系。金元之际，长达二十年的战乱，又是新一轮的妻离子散。因此，类似于“柳毅传书”的故事在北方特别受到关注。

李好古，东平（今属山东）人。写有3个杂剧剧本，流传至今的只有《沙门岛张生煮海》（简称《张生煮海》）。

《张生煮海》的本事来源不详。剧本写瑶池会上金童玉女因思凡被谴下界，金童投胎为书生张羽；玉女为东海龙王三公主琼莲。投胎后，两人偶然相见并定情，相约八月十五再相会。张羽等不到时间到来，就前往龙宫寻找琼莲。仙姑毛女送给他三件法宝：银锅、金钱、铁勺，并教张羽“煮海”。龙王怕将海水煮干，只得将琼莲许配给张羽。剧本结构顺畅，文辞优美，想像绮丽。虽然是神仙道化剧，但张羽上天入地追求爱情的执著与描写大海的壮观眩目（前人曾将本剧称为《海赋》），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李潜夫是一个“恬淡齑盐”，隐于市朝的“高隐”。据元曲文献记载，他只写过一个杂剧剧本并流传至今，那就是《包待制智勘灰栏记》。

《包待制智勘灰栏记》（简称《灰栏记》）是元代著名公案戏——包公戏。它的内容是：妓女张海棠从良，嫁给马员外为妾，与马员外生了孩子。马员外被妻子害死，她自然难于在马家容身，只希望领了自己的孩子去自谋生路，结果反而被诬为杀害马员外的凶手。在公堂上，贪官苏太守竟用酷刑屈打成招，使她承认害死员外，好谋他家产。最后由于包拯为其平反，才没有含冤九泉。为判断到底谁是孩子的亲生母亲，包公在大堂上用灰画了一个圈，当堂看似荒唐地宣布，马妻与张海棠谁能够将孩子拉出灰栏，谁就是孩子亲生母亲。张海棠怕伤着骨肉，没有拼命抢夺。于是包公断定：因为她体现出亲

情，所以她是孩子的母亲。这个杂剧在欧洲影响极大，它与《赵氏孤儿》先后译成外文，成为国际学术界认识中国的窗口，从19世纪后期起出版了英、德、法等国文字的不同版本，在欧洲流传颇广。20世纪的德国戏剧艺术家布莱希特还将其改编为《高加索的灰栏记》，并亲自执导上演。

乔吉与宫天挺都是后期的杂剧作家。他们的个人经历并不一致，但有一个共同点：两人籍贯都是北方人，生活与创作都在江南。

乔吉祖籍太原（今属山西），流寓杭州。一生未仕，他解嘲式地自称为“不应举”的“江湖状元”（〔折桂令〕《自述》）。钟嗣成对他的人生态度相当激赏，《录鬼簿》小传中说乔吉“美姿容，善词章，以威严自饬，人敬畏之”，并在吊词中赞誉他：“平生湖海少知音，几曲宫商大用心。”他写有11种杂剧剧本，今存《玉箫女两世姻缘》《李太白匹配金钱记》《杜牧之诗酒扬州梦》3种。他的今存杂剧水平大致相当，特点都是文辞优美，故事简洁。同时乔吉还是散曲家，有散曲集《文湖州集词》《惺惺道人乐府》等编，但后者已经散佚。乔吉的散曲有辑本《乔梦符小令》，共录入小令209首，套曲11套。有人认为乔吉的散曲创作成就超过了杂剧，明人李开先甚至将乔吉与张可久比做“曲中李杜”。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八“作今乐府法”节）记载了乔吉的作曲理论：“乔梦符吉博学多能，以乐府称。尝云：作乐府亦有法，曰‘凤头，猪肚，豹尾’六字是也。大概起要美丽，中要浩荡，结要响亮。尤贵在首尾贯穿，意思清新。”这六个字来自乔吉本人的创作实践，对后世影响颇大。

《玉箫女两世姻缘》（简称《两世姻缘》）本事源于晚唐范摅的《云溪友议》。书生韦皋热恋妓女韩玉箫。韦皋上京应试五年未归，玉箫因苦苦思念而死去。韦皋为怀念情人从此不再言婚娶。十八年后，官至镇西大元帅的韦皋，在荆襄节度使张延赏的家宴之上见到张延赏的义女张玉箫，宛若死去多年的韩玉箫复活。张玉箫果然是韩玉箫转世，两人生死不渝，由皇帝特许，终于奉旨成婚。历来论者往往以《两世姻缘》与《倩女离魂》相提并论，因为它们都是以跨越生死两界的情爱为主题，都以剧情曲折跌宕，文辞优美感人见长。《金钱记》《扬州梦》，水准与《两世姻缘》近似。

宫天挺是钟嗣成的父执，也是长期在江南生活的北方籍人士。曾出任儒学学官，担任过钓台书院山长。受权豪中伤获罪，后来虽然辨明事情真伪，但只能退居林下。死在寓居常州时。他写过6种杂剧剧本，今存《生死交范张鸡黍》《严子陵垂钓七里滩》两种。

《生死交范张鸡黍》（简称《范张鸡黍》）与《严子陵垂钓七里滩》（简称《七里滩》），都是元杂剧中典型的历史剧。《范张鸡黍》全剧是依据《后

汉书·范式传》改编。山阳范式和汝阳张劭本是国子监的同学，两人志趣相投，因朝政不清，一同回归家乡，并相约两年后在张劭家中相聚。两年后，范式远赴汝阳，张劭以鸡黍招待；临别约定再过两年在范式家中重聚。但届时张劭病故……这个杂剧写的是两个身处乱世的文人的生死之交。歌颂友情生死不渝、信义彪炳千古。自问世以来，《范张鸡黍》就在失意文人中引起了广泛持久的共鸣。明人将乔吉《两世姻缘》、郑光祖《㑳梅香》《王粲登楼》、宫天挺《范张鸡黍》等几部文辞优美，情节生动的杂剧，并称为“四段锦”（高儒《百川学海》）。

无论从戏剧形式的完备上，还是从容量的扩充上，与杂剧相比南戏都是它的下一个梯次的成品。南戏已经是经典的戏剧了。

南戏，也叫做“戏文”或“传奇戏”。提到南戏，人们往往将宋元联系到一起。实际上，南戏是宋元明文学的过渡引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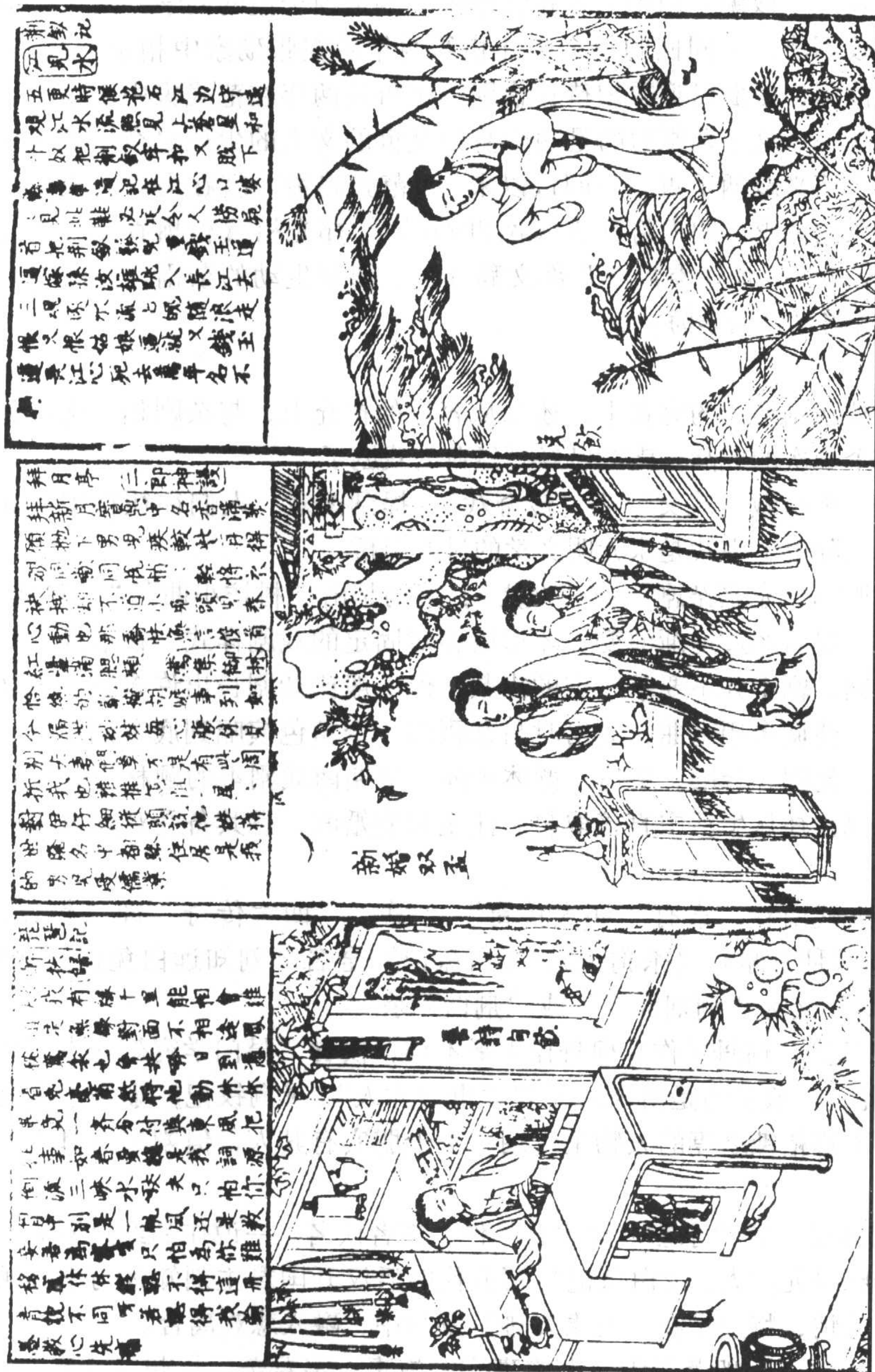
南戏原称“永嘉杂剧”或“戏文”，最初是由“村坊小曲”“里巷歌谣”发展而来，以后经过逐渐演变，才形成相对固定的戏剧样式。在形式上南戏与杂剧不同，剧本并不要求一定的出数，但一般比杂剧长出许多倍。戏文用南方方言，曲调多用南曲，演出时与杂剧的一个角色演唱到底不同，可以独唱、对唱、轮唱、合唱，更适宜群体表演。早期南戏剧本的题材主要出自民间传说，也往往从生活中直接取材。注重情爱婚配，是其备受观众喜爱的原因之一。

关于元代南戏，素有“四大传奇”之说。“四大传奇”即《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白兔记》全名《刘知远白兔记》，所以“四大传奇”又称“荆刘拜杀”或“荆白拜杀”。

《荆钗记》，柯丹丘作。柯丹丘生平不详，仅署“吴门学究敬先书会柯丹丘”。据此，一般认为是由宋入元的“书会才人”。《荆钗记》歌颂了身处荣华富贵而不忘糟糠之妻的人物王十朋。王十朋实有其人，但剧本与真人的关系颇远。

《白兔记》，署“永嘉书会才人”作，作者佚名。一说作品经过刘唐卿改编，刘唐卿是元初人。《白兔记》写五代时后汉开国君主刘知远与李五娘忠贞不渝的爱情，特点是在“变泰发迹”题材中，融入悲欢离合。

《拜月亭》，一般著录为元人施惠作。施惠，字君美，杭州（今属浙江）人，应是元代前期人。《拜月亭》，全名《王瑞兰闺怨拜月亭》，故事取材于关汉卿《闺怨佳人拜月亭》，但内容更丰富。以金元兴替过程的悲欢离合，演述书生蒋世隆、蒋瑞莲兄妹和兵部尚书之女王瑞兰、左丞之子陀满兴福四



《荆钗记》《拜月亭》《琵琶记》这几幅元代南戏的插图风格相当接近。都是以女性为中心，着意表现人物。出自明万历年间蓝印本《元明戏曲叶子》。『叶子』是明清文人宴集时的游戏用品。

人的爱情婚姻故事。蒋世隆和王瑞兰结识与相爱，是作品的关键情节。他们在战乱中偶然相识，患难中产生了感情，为他们的爱情增添相互了解的基础，这与一般描写才子佳人“一见钟情”的模式不一样。剧作歌颂了男女主人公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和不畏困境折磨的品质。王瑞兰本是生活优裕的大家闺秀，战争把她抛进完全陌生的艰难环境，她没有因之随波逐流，与能够尊重她、爱护她的蒋世隆互相帮助。经过犹豫彷徨，最终克服心中疑虑，决心为婚配做主，嫁给蒋世隆。当她父亲以蒋世隆“穷形状”，斥责她自作主张，并意欲强迫将他们分开时，她拒不服从。最终皆大欢喜。《拜月亭》是元人戏曲作品中情节丰富曲折，人物形象丰满可信的代表作。

《杀狗记》为元末明初人徐畛作。今本经明代吴中情奴、沈兴白、冯梦龙等人改编，是一部家庭伦理戏。孙华、孙荣是亲兄弟，孙华却结交市井恶棍而敌视自己的亲弟弟。孙华妻杨氏为让丈夫改变对孙荣的态度，定计杀狗，把狗扮做人尸，孙华以为有人栽赃陷害他杀人，慌忙找他的“朋友”帮他私埋死尸，但他的酒肉朋友不仅不为他出力，反而为了勒索钱财，到官府状告孙华杀人灭尸。关键时刻，杨氏俱陈始末，真相大白。

元代最有名的南戏，是高明的《琵琶记》。高明，字则诚，温州瑞安（今属浙江）人。南戏又名为“永嘉杂剧”，永嘉与瑞安近在比邻，都属于温州路。《琵琶记》由高明撰写，不是偶然。《琵琶记》全名为《忠孝蔡伯喈琵琶记》，剧情主要是：新婚只两个月的蔡伯喈赴京赶考，得中状元，被牛丞相看重，以奉旨的名义强使其成为自己的女婿。同时，家乡正在饥荒中，妻子赵五娘为侍奉公婆卖尽首饰细软，自己则以糠充饥。公婆一病不起，赵五娘则剪发为葬。此后，身背琵琶一路卖唱，前往京师寻找多年未归的丈夫。在相府与丈夫相逢，因牛夫人贤明，夫妻得以团聚。一般认为蔡伯喈就是东汉著名的文学家蔡邕，即蔡文姬的父亲。史传中，蔡邕是笃孝义的完人，但民间一直将其作为反面人物。作为宋元“戏文之首”的《赵贞女蔡二郎》，结局是蔡二郎“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徐渭《南词叙录》）。但高明在《琵琶记》中则处理成“全忠全孝”的人物，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与王实甫对《西厢记》的处理有近似处。也许这是因元代观众倾向所致。尽管是“大团圆”的结局，《琵琶记》仍然立足于“讽世”——足以为世人鉴戒。可以说，全剧没有反面人物，牛丞相也算不上是“坏人”，这与历史剧的“忠奸水火”不同。《琵琶记》成功之处还在于以情动人，作者善于发掘寻常生活中的感人细节，与同期作品相比，文辞流畅优美，不但耐听，而且极具可读性。从一问世，《琵琶记》就风行草偃，不胫而走，受到社会不同层次的人群的一致喜爱。据说连朱元璋也为之叹赏不已。

除杂剧、南戏，元代戏曲还有诸宫调，但作者与传世作品都不多。

七

元代笔记与小说是后人谈论得多，但具体研究较少的文学体裁。特别是关于元代小说，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等待填补。

笔记，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一般来说，笔记中较受重视的是见闻杂记。历来笔记就存在互相抄撮以充卷数的情况，所以笔记的价值除了作者的眼界与笔力，还有他的资料来源问题。出自自己的见闻感受的、“独家”的内容，无疑最有价值。这与作者的生活阅历关系相当大。如同唐宋，元人笔记也相当丰富，其中许多内容远未受到足够的重视。除了所提供的见闻视角，笔记的人文内涵，甚至作者的修养与情感，也应该是研究的对象。元人的笔记，很大一部分是出自文人的未经编定的手书，比如《北巡私记》等，类似这种情况，还有较大的发掘空间。

元代笔记，《四库全书》收入的不少，但不一定全在子部，而是分散在一些不同的门类中。一般认为元代比较重要的笔记有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三十卷、王恽《玉堂嘉话》八卷、孔齐《至正直记》四卷、鲜于枢《困学斋杂录》、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三卷、杨瑀《山居新话》四卷、蒋正子《山房随笔》一卷、陆友《吴中旧事》一卷、郑元祐《遂昌杂录》一卷等等。另外，周密的《癸辛杂识》前集一卷、后集一卷、续集二卷、别集二卷，《浩然斋雅谈》三卷，《齐东野语》二十卷，一般作宋人笔记；刘祁《归潜志》十四卷、元好问《续夷坚志》二卷一般归于金；叶子奇《草木子》四卷一般归于明，但这些书中的内容往往出自元代。类似这种情况还有许多。

在笔记与小说之间的是文言传奇。唐代以后，宋元的文言传奇小说已经不能自立门户。宋远《娇红记》是元代传奇小说的代表作，同时它的篇幅应是历代传奇小说中较长的一部。明清戏曲小说中的才子佳人题材，直接受到了《娇红记》与郑禧《春梦录》的影响。

白话通俗小说的出现，是元代文学也是中国文学史的标志性事件。元代白话通俗小说今存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梁公九谏》《大宋宣和遗事》《新编五代史平话》《薛仁贵征辽史略》等，特别是著名的《全相平话五种》，其中包括：《武王伐纣平话》《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平话后集》《秦并六国平话》《前汉书平话续集》《三国志平话》①。上述只是就传世情况而言。元代曾经有过的平话小说，肯定远不止此数。据《朴通事谚解》的引证，足以证实在元

---

① 一般认为是宋元作品的，还有《京本通俗小说》，但这部书尚有疑问，暂不论。

代有《西游记平话》存在。《全相平话》应该也不止五种，仅据今存者推想，至少就还应该有《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平话前集》《前汉书平话前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与《大宋宣和遗事》究竟是宋人作品，还是元人作品，历来有争议。但在元朝自称“大元”之前，中国历代王朝从未有以“大”作为前置称呼的惯例，“大唐”“大宋”，这都应该是元人的习见语式，必不会出现在此前。

上述元代的平话小说（通俗小说）都没有作者，这也是元人小说在一次次讲述过程中逐渐成熟的例证。《全相平话五种》有准确的刊行年代，因为它明确标示是“至治新刊”，而元英宗的至治年号，仅使用了三年。也就是说，《全相平话》这种文学形式在1321—1323年之间已经出现并受到欢迎。

通读元代小说，则很容易确认：这些平话小说的水平相当接近，形式也比较一致。特别是语言的讲述方式，无一不打上元代的印记。可是，它们确实离开《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名著太远了。有一种见解认为，《三国志演义》《水浒传》，是元人的作品，至少是成书于元明之际。但这与我们从文献中感受到的背景颇不一致。《全相平话五种》确实是元人作品，而且直到至正年间，仍然需要“盗版”——以《三分事略》的面貌面世，就说明社会上还没有它们的升级替代的“产品”，它们仍然是公认的代表作，那么，想必《三国志演义》那样成熟杰出的作品还没有出现。《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演义》之间的差距，绝不是某个作者个人水平修养高低之别，而是整体的文化积累程度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元代的“水浒戏”颇多，而且受到普遍欢迎，可其中的情节距《水浒传》相当遥远。如果在元代甚至是元明之际“水浒”故事已经基本成熟，那就不可能有这种情况出现。杰作就是杰作。有《水浒传》作对比，离题太远的故事、小题大作的枝蔓，观众不会认可。《西游记》的情况也是如此。不只是杂剧《西游记》与小说《西游记》颇为疏离，就是《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也没有将故事汇拢到主流上来。《朴通事谚解》中的“取经”故事，王振鹏的《唐僧取经图册》的题目，几乎没有一个能在《西游记》中找到依据。

旧题元人王振鹏所画《唐僧取经图册》，是一种罕见的元人制作的连环画。目前保存在日本。原作是32幅单开的画，每幅的尺寸不一致，但差别很小。高在33.0至35.1公分之间；宽在25.5至28.5之间。发表者拟题为《唐僧取经图册》。32幅画大都有题签。全图装裱为上下两册，上册卷首有清人梁章钜题签“元王朋梅画取经图上册”。第十六幅的左下角，有“孤云处士”的竖写款识。款识的左侧被有意识的刮毛了一小条，大小与款识相等。

按书画收藏惯例，这大约是曾经有人想改题作者动的“手术”。这些图画的内容，特别是取经途中的故事，几乎就与《西游记》，甚至也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完全不匹配。看了上述连环画，对元人杂剧《西游记》演绎的“另类”西游故事，就有了新的理解。

《朴通事谚解》有这样一段对话：

> 我两个部前买文书去来。
>
> 买甚么文书去？
>
> 买《赵太祖飞龙记》《唐三藏西游记》去。
>
> 买时买《四书》《六经》也好。既读孔圣之书，必达周公之理。要怎么那一等平话？
>
> 《西游记》热闹，闷时节好看。有唐三藏引孙行者。[1]

一般认为《朴通事谚解》成书在14世纪中期，它可以证明，新兴文体——通俗白话小说开始成为元人的阅读热点。但这确实不是杰作《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的成熟时期。

读过元人罗贯中《赵太祖龙虎风云会》杂剧，无论如何也难于将他和写出《三国志演义》的罗贯中视为同一人。当然，文体有别：一个是杂剧，一个是小说；另外，也许前者是少作。但这远不能化解掉文化积累方面的差距。

所以我们认为：元代是白话通俗小说（平话）的成型阶段。在元代，由于不同民族喜好听故事的共同特点，使得小说赢得了不同层次的读者（听众）。但元代不是通俗长篇小说的成熟期。从成型到成熟，这段路是在明中期才走完的。

八

散曲是元代新的文学体裁，散曲与词都是诗歌的分支。一般认为散曲源于宋金时期市井歌谣——“俗谣俚”，形成于金元之际，元初很快就风靡一时，与词分庭抗礼，受到了南北、雅俗等不同人群的欢迎。

形式上，散曲分为套曲与小令两种。套曲是两只以上的、同一宫调的小令的联唱。小令则是一只单独的曲子，所以又叫做“只曲”。在散曲这个范畴之中，小令更为流行，优秀的作品更多。

元代前期，许多散曲作家是达官贵人。元世祖忽必烈的谋士刘秉忠就是

---

[1] 《奎章阁丛书》第8种，第293页。

其中之一。他的〔干荷叶〕是典范的小令："干荷叶，色苍苍，老柄风摇荡。减了清香，越添黄。都因昨夜一场霜，寂寞秋江上。"文字干净利落，但意蕴深长。这是刘秉忠的自度曲，就像南宋词人姜夔的创调之词。曲咏干涸的荷叶，就以其为曲牌，这一点与唐五代的早期词颇为相似。

散曲是杂剧的基础，但散曲家不一定就会由此步入杂剧的殿堂。散曲与戏曲（杂剧）关系密切，但是明清的曲论家曾一再指出：与杂剧作家群体相比，散曲家们的社会地位一般要高一些，杂剧更贴近生活底层。重要的散曲家比如卢挚、张养浩、贯云石、徐再思、薛昂夫、张可久等人都是"不作杂剧"。反之，一些重要的杂剧作家比如关汉卿、马致远等等，则同时是散曲大家。元人邹祗谟在《远志斋词衷》曾称散曲为"马贯音学"。马，是马致远；贯，是贯云石。

一般来说，人们也套用宋词的"婉约""豪放"将元散曲大致分作"清丽""雄浑"等风格。实际上，元代散曲风格有近于词者，也有更贴近民间歌谣者。而这两种风格之中，又都有"清丽""雄浑"等不同的特点，但在元曲，这主要是由曲作者个人修养、咏唱的题材以及散曲的不同体制所致，流派的特征并不明显。

元仁宗皇庆二年，贯云石为杨朝英编选的当代散曲集《阳春白雪》写了一篇序文。《阳春白雪》的结集，是散曲在文坛占据了一席之地的标志之一，而贯云石的《阳春白雪序》是第一篇元代散曲风格论，很快散曲就风靡大江南北，成了当行的文学体裁。它既有与杂剧共同的曲调旋律，又不受演出所需要的场地人员的限制，几乎可以无处不在。它比传统的诗文以至于词更容易普及。

在元代，有许多散曲作家"不作杂剧"，可是也有许多杂剧作家同时又是优秀的散曲家。"元曲四大家"中，关汉卿、马致远的散曲创作一点不比杂剧创作逊色。

〔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与《赠珠帘秀》两套套曲是关汉卿的代表作。元曲家关汉卿就是通过这两篇作品站立在元代曲坛。《不伏老》中的〔黄钟尾〕是元代散曲极具个性化特征的杰作：

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踘、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

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

如果非要说这里表达的是“战斗”“反抗”精神，那也是对世俗偏见的一种蓄意挑战。他赞颂的是自由自在的“真人”。这样的作品无疑迥出于流辈之上。

小令《大德歌》一共有10首，其中一首写道：

雪纷纷，掩重门，不由人不断魂，瘦损江梅韵。那里是清江江上村。香闺里冷落谁瞅问，好一个憔悴的凭栏人。

使人断魂的不只是大雪纷纷，而是大雪中应归人未归；让凭栏人憔悴的，不只是江梅瘦损，而是失期的归人，已经走出了凝望已久的视野。我们说不出这首小令到底具体脱化于前人的哪首诗词，但关汉卿营造的整个意境则让我们徘徊在古典诗歌的树林里几乎迷失了路径。

通过关汉卿的散曲，我们注意到这个享誉已久的作家的作品题材，与他同时代人所作大致相应，主要是抒写个人的离别、情爱、困顿、企望……而贯穿全部作品的抒情主人公，就是散曲家自己。正是散曲家本人所具有的人格感召力量，使他的散曲占据了时代的巅峰。

马致远写的三首小令〔天净沙〕《秋思》，可以说是典范的、知名度最高的散曲：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平沙细草斑斑，曲溪流水潺潺，塞上清秋早寒。一声新雁，黄云红叶青山。

西风塞上胡笳，月明马上琵琶，那抵昭君恨多。李陵台下，淡烟衰草黄沙。

这三首小令是“上京纪行词”。写的是一个天涯孤旅前往北方草原的滦河岸边的元代夏都——上都的旅途情景。“断肠人在天涯”、“黄云红叶青山”，无论情、景都很容易引起共鸣。它们在元代就曾广泛流传于文人学士之间。它具有了小令所能够具有的一切长处，并将小令的艺术表现力发展到了极致。元人已经将它称为“秋思之祖”（周德清《中原音韵》）。同时，马致远还写有一个同体的套曲〔双调·夜行船〕《秋思》。相比之下，套曲《秋思》实际

上写的是“倦仕思隐”，这是从陶渊明开始代代相承的主题，它的容量更大，内容更复杂，但是反而缺失了真正打动人心的火花。

较早的可以说是元曲家的文人，有卢挚与冯子振。他们都是北方籍人士，在江南平定之后较早到南方做官，很快为江南文人所接纳、认同，在南方有广泛的社会交往与影响，同时，他们都是诗文与词曲兼长。

卢挚在作诸生时直接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赏识，以侍从之臣出为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使，历仕南北。元成宗大德年间，入朝为翰林学士，晚年寓居于宣城。他是元代前期较早“南来”的北方籍人士。贯云石《阳春白雪序》之中，就提及“近代疏斋妩媚，如仙女寻春，自然笑傲”，可见他对散曲的影响之大。他的散曲与马致远、关汉卿等人有不同的风格，与词比较接近，不但数量较多，而且题材广泛，几乎涉及了元曲家写过的所有领域。他的作品对后来的张可久等“雅正”一派的小令有开启作用。卢挚今存有120多篇小令，此外还有数十篇诗文与词。

与卢挚情况近似的元曲家是张养浩。对张养浩来说，诗文与散曲几乎同等重要，而且政绩官声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文学创作成就。张养浩的散曲主要保存在《云庄乐府》之中，有小令160首，套曲2套。《全元散曲》在此之外增加了8首小令，1套套曲。他的散曲以怀古伤时之作最有特色，〔中吕·山坡羊〕《潼关怀古》是元曲名篇。这样的意境与眼界，在文学作品之中迥出时辈。这首散曲写于元文宗天历二年，是年关中大旱，“饥民相食”，朝廷特旨拜已经致仕在家的张养浩为西御史台中丞，赋予救灾职责。在这之前，他几次辞谢了朝廷的徵召（“七徵不起”），但这次临危受命，他立即“登车就道”，在陕西灾区，“遇饥者则赈之，死者则葬之”，并在救灾过程之中写下了《骊山怀古》《沔池怀古》《潼关怀古》等9首〔中吕·山坡羊〕曲，以这首《潼关怀古》最有名。几个月之后，他就因积劳成疾死在任上，成为人们凭吊的对象。

另一个著名的散曲家贯云石的身世经历要比卢挚、张养浩更富于传奇色彩。贯云石祖父阿里海涯是高昌王国柳中城（新疆鄯善鲁克沁）的自耕农。高昌王国臣民追随蒙古宗主南征北战，致使阿里海涯改变了自己与家族的命运，成为元代攻灭南宋的主要将领之一，家族定居在大都高梁河畔（北京西郊白石桥）。贯云石本名小云石海涯，因父亲叫做贯只哥，就以贯为汉姓，号酸斋。早年承袭父职，出任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不久便弃官回到大都，成为曲坛名家。又受到元仁宗赏识，被授予翰林学士之职。几年后，他最终离开大都官场，以一介布衣周游江南山水胜迹，最终定居在杭州。死时年仅39岁。他同时有诗文名，但他的《贯酸斋集》早已散佚不存。近人任讷在

20 世纪 20 年代首次将贯云石的散曲辑佚成集，与号“甜斋”的散曲家徐再思的作品合刊，题为《酸甜乐府》。散曲今存小令 79 首，套曲 9 套（据《全元散曲》）。

贯云石在当时影响相当大，他与他的创作受到各族文人的认可。他的散曲以豪爽清新为特点，隐逸情怀与男女恋情是反复表现的题材。他写西湖风光的套曲、小令历来受到元曲选家与论家的重视。他的一组〔正宫·小梁州〕分咏西湖春夏秋冬四季，是有影响的元曲之一，从元到明清，几乎成了西湖景致的特征。他的〔双调·清江引〕是元曲豪爽清新风格的典范：

若还与他相见时，道个真传示。不是不修书，不是无才思，绕清江买不得天样纸。

而〔双调·殿前欢〕之一，则表达出有异于传统文人的情怀：

畅幽哉，春风无处不楼台。一时怀抱俱无奈，总对天开。就渊明归去来，怕鹤怨山禽怪，问甚功名在。酸斋是我，我是酸斋。

总之，贯云石是极具个性色彩的诗人、作家。他的散曲，与词、诗等诗歌类型有明显的区别。

与酸斋贯云石并称的散曲家“甜斋”徐再思，则更接近传统的独吟诗人。徐再思仅知活动在元中期，曾任嘉兴路吏这类的小官，在元代曲坛与别号“酸斋”的贯云石齐名，但他们两人的身世经历迥不相同，徐再思的散曲风格有接近于词的一面，这也与贯云石不同。与酸斋贯云石合集的《酸甜乐府》之中，收入了甜斋徐再思的 104 首小令。他的作品虽然没有涉及重大的题材，也没有传诵不息的杰作，但几乎首首可读，保持着比较一致的水平。他的〔双调·水仙子〕《夜雨》纯是个人生活经历的浓缩：

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三更归梦三更后。落灯花，棋未收，叹新丰逆旅淹留。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忧，都到心头。

作者长期沉沦下僚、为生计奔波驱驰，小令表现的情愫已经被南宋的江湖诗人们写得提不起人们的兴致，但结句之“忧”仍然打动了读者。那是因为徐再思将一生都“在路上”的不归旅人对于“家”的依恋写得极具真实感，在他笔下，“家”就是人生的地平线。徐再思的“忧思”被王世贞评为“情中

紧语"（《艺苑卮言》附录一），而清代词曲家李调元则认为这篇〔水仙子〕"皆人不能道"（《雨村曲话》卷上）。

与徐再思颇为类似的是元代作品最多的散曲家张可久。事实上，张可久与徐再思相似的不只是身世经历，最主要的还有作品的情调。

张可久原名张久可，字可久，以字行；号小山。庆元（浙江宁波）人。出身于儒户，早读诗书，在元代前期就与贯云石、刘致等元曲家唱和。半生出入官场，但始终是身为小吏。他是元代最多产的散曲作家，作品主要保存在《小山乐府》《张小山小令》《北曲联乐府》等集之中。今存小令855首，套曲9套（据《全元散曲》），不但数量最多，而且仅他一个人所作就占今存元散曲总数的五分之一。这个比例，是古今任何一种文体也不曾有的。他也是常年在为生计奔波，一生未获舒展。他的散曲以小令为主，文辞清雅，接近于词。而作品表达的大多是自己羁旅行役的感受，与久在异乡的寂寞。〔越调·凭阑人〕《江夜》是张可久作品的范例：

江水澄澄江月明，江上何人搊玉筝。隔江和泪听，满江长叹声。

全曲短得如同一首绝句，但却颇耐讽诵。读到结句"满江长叹声"，使读者仿佛也成了"隔江和泪听"的作家。创作契机显然受到唐人白居易《琵琶行》的启发，并浸润着仕途失意的失落感。这首小令是凡选元代散曲必录的代表作，它很容易使过去的读者产生共鸣，那是因为被曲中意境情感打动、并为之潸然泪下的，实际上正是作者自己。

元曲家，特别是下层的作者，生平事迹往往"隐而不显"（孙楷第语）。元代有一套相当有名的套曲〔正宫·端正好〕《上高监司》，它的作者名叫刘时中。但关于这个刘时中，迄今为止只知道他是元代后期的江西人。但是他流传至今的惟一一首《上高监司》，使他名著元曲史，成为元代重要的作家。《上高监司》套曲又分为前后两套。前套由15支只曲组成，反映了元代百姓在灾荒时期的惨状；后套长达34支只曲，揭示了江西行省在流通"大元宝钞"时，钞法、库藏等方面存在的弊病。这是元曲之中少见的大容量、直接面对社会现实的杰作。前套只曲〔叨叨令〕写道："有钱的贩米谷置田庄添生放，无钱的少过活分骨肉无承望；有钱的纳宠妾买人口偏兴旺，无钱的受饥馁填沟壑遭灾障。小民好苦也么哥，小民好苦也么哥。便秋收鬻妻卖子家私丧。"将贫富对立写得如此尖锐，判若水火。元末，江西是战乱最频仍的区域，其端倪已经见于《上高监司》。

如同诗文一样，元散曲的作者也包括了当时的所有蒙古、色目、汉人、

南人四个人群。

九

由于地域广大，但立国时间并不长，所以元代诗文没有明显的分期。由于元代之前长期存在的南北对峙状态，所以元代文坛有显而易见的地域特点。在元代文坛，前期的北方诗文家以耶律楚材比较著名，耶律楚材是契丹（辽）王族后裔；前期的南方诗文家则以赵孟頫影响比较广泛，赵孟頫家族是宋皇室分支。

清人顾嗣立在论及耶律楚材的学问渊源之后，这样评价耶律楚材的文学创作："当经营创制之初，驰驱绝域，宜若无暇于文。而雄篇秀句，散落人间，为一代词臣倡始，非偶然也。"（《元诗选》小传）耶律楚材无疑是元代诗文的首倡者。

元代前期的北方文坛，地域特征颇明显。姚氏是北方世族，姚枢、姚燧叔侄两代一直以学者、诗文家的双重身份活跃在文坛与学坛。姚燧仕途大致顺遂，他的诗文曾是当世典范。

姚燧是姚枢的侄子，三岁父亲去世，由姚枢养育成人。早年师从许衡，二十四岁始读韩愈古文，并学习写古文。大德五年到江南任职，出任江东廉访使。至大年间授翰林学士承旨。至大四年告老南归。有《牧庵集》五十卷，但久已不存，今存《牧庵集》三十六卷，是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姚燧是元代有名望的大儒，一代文宗，并以"慎许可"著称。当朝三十年间，名臣勋戚的碑传多出其手，以至于孝子顺孙为了阐发先德，必求得他亲笔写的碑传，否则会感到羞耻。他的文章被称为"闳肆该洽，豪而不宕，刚而不厉，舂容盛大，有西汉风。宋末弊习，为之一变。盖自延祐以前，文章大匠，莫能先之"（《元史》本传）。他的文章主要是应制、应酬之作，以结构讲究章法，措词委婉，行文繁简有致见称，如《阿里海涯神道碑》《姚枢神道碑》都是元代碑传的典范之作。而一些小品，如《归来园记》《暖翠亭记》等则写得比较有情致，又相当简洁。总之，他是元代倡导古文的第一人，论者曾把他比做唐代的韩愈、宋代的欧阳修。相比之下，他的诗词则缺乏力作，分量也轻。

提到元初的江南文坛，不能不提到方回其人。方回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争议在于他的人品，而不在于他的诗文。

方回在宋理宗景定三年（1262）登进士第，受到贾似道赏识。贾似道兵败鲁港，方回又首先上书论其罪当斩。在出知严州时，元军兵临城下，方回遵从南宋谢太后降元诏书不战而降，被元任命为建德路总管，不久罢官，徜

徉于杭、歙间。晚年崇尚理学，学宗朱熹。周密《癸辛杂识》曾称方回老而无耻，凡遇妓则跪之，所爱二婢其一为人夺去，乃作《怅惋诗》揭于通衢，人咸笑之。清人纪昀则说："文人无行，至方虚谷而极矣。"（《瀛奎律髓刊误序》）但他是宋元之间的重要诗人与诗论家，曾选唐宋近体诗加以评论，名为《瀛奎律髓》。论诗大旨排斥西昆体而宗江西派，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就是他提出的。《瀛奎律髓》在宋元诗论上有无可替代的地位。方回诗亦受到江西诗派影响，朴拙粗劲，不事浮华，是宋末元初依傍江西诗派门户的最后的大家。诗中有不少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作品，如《路傍草》感叹战后荒凉，人生之艰难；《石头田》感慨人世之沉降变迁；《彭湖道中杂书》对农民颇多同情心；《苦雨行》写杭州久雨，一方面米价飞涨，民无所食，另一方面则是豪富权贵之家的醉生梦死。散文成就不如诗，应酬之作较多，而且往往敷衍塞责。有些短小的抒情散文如《送徐君奇入燕序》等，写的富有文学情趣，驾驭文字的功力颇不一般。论者以为其诗文"实出宋末诸家之上，更不能以其人废"（《四库全书总目》），方回"固宋末元初一作家也"（《四库未收书目提要》）。

同是由宋入元的江南文人，戴表元的人品几乎没有受到非议。戴表元幼习诗文，宋咸淳年间入太学，登乙科进士，任建康府教授。元兵南下攻占临安，戴表元避兵邻郡，两年后才回到奉元。经过战乱，家无生计，戴表元反而专意读书授徒，以卖文养家糊口。元成宗大德八年，执政者荐于朝，拜信州教授。大德十年从信州任满而归，再调婺州教授，以病辞不就。晚年翰林、集贤两院以修撰、博士二职论荐，但已老病不能起。他后半生所教学生很多，最著名的是袁桷。早年戴表元以振起宋末萎靡文风为己任，并就学于王应麟、舒岳祥。其文清深雅洁，被称为能化腐朽为神奇。元初至元、大德年间，东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时的，惟有戴表元而已。尽管入元曾出任过儒学教官，但内心淡泊，安于贫贱。曾自号质野翁、充安老人，表示与新朝保持一定距离。由于身经宋、元易代的大动乱，他的诗多有伤时闵乱、悲忧感愤之词。有《剡源集》三十卷，是重要的、流传较广的元人别集。

如果说戴表元是以诗文学术为一生理想境界，赵孟頫则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天才作家。他没有深刻的思想，没有上天入地的艺术追求，但他确实是江南丰厚的文化土壤孕育的奇葩。

作为宋宗室之后，赵孟頫在南宋时以父荫补官，任真州司户参军。宋亡闲居于家，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程钜夫到江南搜访遗才，将赵孟頫举荐于朝。元世祖曾让他评论南宋降臣叶李与留梦炎优劣。赵孟頫赋诗有云："往事已非哪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受到赏识。元成宗即位，诏赵孟頫修世

祖实录，曾奉旨书写金字《大藏经》。元仁宗即位，授集贤侍讲学士。元仁宗曾把他比做唐代的李白、宋代的苏轼。延祐六年辞官南还。赵孟頫是元代最主要的书法家之一，真草隶篆各体皆精；他又是元代画家之首，山水、花鸟、人物，无所不能，尤长于画马。他的诗文颇为书画所掩，戴表元为《松雪斋集》作序时说，赵孟頫古诗"沈涵鲍（鲍照）谢（谢灵运）"，这是行家的定评。他的诗文清邃奇逸，在元代文坛独树一帜。他写有不少应酬文字，比如碑铭序跋，在这些体裁中，他也能显示出个性特色，一般均颇具文采又比较恰如其分。他以南宋宗室之后的身份仕于元，"荣际五朝，名满四海"（夏文彦《图绘宝鉴》卷五），曾一再受到时论批评。其实他自己也常流露出无所适从的心态。他的一些诗文，如《罪出》《赵村道中》《和姚子敬韵》等，都不加修饰地写出自己的矛盾与犹疑的情绪，而且往往相当真切。他忠于元朝，但在《岳鄂王墓》诗中，借咏岳飞却又表述出对宋朝国运兴衰、天下分和大事的看法：

鄂王墓上草离离，秋日荒凉石兽悲。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湖光山色不胜悲。

这首诗之所以历来受到诗选家重视，其中当然也含有作者身份特殊这一因素。

十

元常以"四"作为最高水准的评定范围。元曲有"四大家"：关白马郑——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元"四大南戏"是：荆刘拜杀——《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劝夫》，元代绘画的"四家"[①] 是：黄公望、王蒙、吴镇、倪瓒，道德文章则有："儒林四杰"：黄溍、虞集、揭傒斯、柳贯，"四学士"是：吴澄、虞集、欧阳玄、揭傒斯，元诗也有"四大家"之评，元诗四大家——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是元代中期影响比较大的诗人群体。

元仁宗皇庆、延祐年间，江南籍的文人在京师形成了一个文化圈，其中较活跃者包括袁桷、虞集、贡奎、范梈、杨载、揭傒斯、柳贯、黄溍等人，他们都曾任职于集贤、翰林两院，驰骋清要，翰墨往复，更为倡酬。虞、杨、范、揭更是交往密切，而且齐名当世，他们作诗都宗法唐诗，时人以四人并

---

① 一般认为，这实际是"元末四家"。

称为元诗“四家”或“四大家”。四家中，虞集成就、影响均比较大，一般认为，杨载才具不及虞集，范梈、揭傒斯又次之。四家均以古诗、歌行见长，杨载五言律诗、排律较见功力，范梈以七言绝句较优秀，揭傒斯工于七言律诗，虞集是众体兼备的诗人。除虞集之外，其余三人均不长于写词。应酬之作太多是四人通病。元文宗天历至元顺帝初期，正是馆阁诗人对朝野诗坛影响最大的时期，这又正是虞杨范揭“四大家”活动在诗坛、创作达到顶点的巅峰时刻。“四家”其中两人是江西籍诗人①，但元诗彻底走出宋代江西诗派阴影，正是从“四家”开始。

在元代中期，继袁桷、马祖常、王士熙等之后，接续了馆阁诗风的，除了虞、杨、范、揭“四大家”，与“四大家”风格比较一致，年辈相当，出入同道的，还有柳贯与黄溍。在“儒林四杰”之中，虞集是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明初诗人王翰在一首题为《读元人诗选选中虞（集）诗居多》（《梁园寓稿》卷九）的诗中感慨说：“适来文物百余年，总萃才华共一编。瀚海高风鲲独运，朝阳日暖凤鸾孤。”元代诗文，虞集确实独步一时。

虞集是南宋丞相虞允文五世孙，早年曾师从吴澄，元成宗大德初年，以荐授大都路儒学教授，此后久居馆阁。元文宗即位，命虞集为奎章阁侍书学士，与中书平章赵世延同任《经世大典》总裁。书成，虞集以目疾请求解职归里，未获准许。元文宗死，他称病辞还临川，病故于家。虞集是元代中期最有影响的文臣之一，也是元代最负盛名的诗文家。他不但执笔撰写了大量的朝廷典册、公卿碑铭，还以奖掖后进，提携时彦，倡导古学，深刻影响了一代士林文风，并精通蒙古语，能够直接使用蒙古语为历代皇帝讲解儒家经典。在“四大家”之中，实际成就和影响他都比杨载、范梈、揭傒斯高出许多。一生著述繁富，号称“平生为文万篇”（《元史》本传），但“稿存者十二三”。而这仅仅十分之二三的存稿，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是其他诗文家难于比肩的。他的诗文结集为《道园学古录》五十卷、《道园类稿》五十卷、《道园遗稿》六卷、《翰林珠玉》六卷、《虞伯生诗续编》三卷等多部专集。他还长于词曲。他的文章以应制、应酬之作最为典范，数量也较多，与欧阳玄、马祖常、许有壬等馆阁名士相比，比较讲究文辞，以博洽精微为特色。一般认为他的文风能体现出他做学问的特点，“蔼然庆历、乾（道）淳（熙）风烈”（《元史》本传）。有的学者曾把他对元代文坛的影响比之欧阳修对于宋代文坛。虞集的诗歌历来颇受诗选家、诗论家重视。他自称自己的诗如“汉廷老吏”，这显然是以章法讲究、格律工稳自许。七律《挽文山（文天

① 范梈籍贯虽然是清江（湖北恩施），但徙家江西新喻（江西新余）。

祥）丞相》是其代表作。如果全面论及虞集诗风，就可以看到他往往在深沉老练之余，体现出典雅、甚至清新感人的一面。《听雨》中的名句“京国多年情尽改，忽听春雨忆江南”，诗人的难言之隐在不知不觉中流露了出来。当然，虞集的诗也多为应酬之作，这就使得他的许多诗篇难得有诗意。

“四大家”都身处馆阁，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其中杨载、范梈专心为诗，虞集、揭傒斯则以诗文并称。在“四大家”中，杨载年辈略高。

杨载祖籍浦城（今属福建），后迁居杭州（今属浙江）。少孤，博览群书，为文跌宕可观。年逾不惑由贯国英举荐于朝，以布衣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延祐初，元仁宗恢复科举，杨载应举，登进士第。由于受到赵孟頫推重，才名满京师。其诗一洗宋代的风习，他曾对学诗者说：“诗当取材于汉、魏，而音节则以唐为宗”（《元史》本传）。当时论诗法诸家，首推杨载。有《杨仲弘诗集》八卷。还有诗学著作《诗法家数》，但真伪有争议。《四库全书总目》评其诗：“清思不及范梈，秀韵不及揭傒斯，权奇飞动尤不及虞集。而四家并称，终无怍色。”杨载的诗，题画、赠答、送别等应酬之作所占比例很高，作品表现的生活面比较窄小，往往是有工整可诵的句子，少见通篇俱佳的好诗。名句如“气蒸云雾藏乔岳，声转沧溟放大河”；“窗间夜雨消银烛，城上春云压彩旗”等等，都曾受到诗论家与诗选家的称赏。而长诗如《古墙行》《梅梁歌》也传诵一时。

范梈家贫，早孤，靠母亲抚养成人。三十六岁北游京师，卖卜燕市。以荐为翰林编修。后数次改任南方的地方官吏。因病辞官回归故里，并徙家新喻（江西新余）百丈山。病故于家。范梈耽诗工文，用力精深；执身廉正，居官疏食饮水。吴澄以道学自任，很少称许他人，但曾说：“若亨父，可谓特立独行之士矣。”并为其撰写了墓志铭。人称为“文白先生”。有《范德机诗集》七卷，另著有论诗文章《木天禁语》《诗学禁脔》两篇，但真伪有异说。揭傒斯称范梈“工诗，尤好为歌行”（《范先生诗序》）。他的诗也以歌行较有特色。史载，范梈为闽海道知事时，因文绣局取良家子为绣工，作《闽州歌》述其事，廉访使得知，遂奏革其弊，可见范梈是关心世事的。至于范梈诗的风格，揭傒斯则形象比喻为：“如秋空行云，晴雷卷雨，纵横变化，出入无朕；又如空山道者，辟谷学仙，瘦骨崚嶒，神气自若；如豪鹰掠野，独鹤叫群，四顾无人，一碧万里。”并进一步指出，“郡人傅若金得其神”。以元代后期的诗人傅若金，作为范梈诗法的发扬光大者。

傅若金自幼工于写诗，常出语惊人。至顺三年他带着自己的诗篇北游京师，数月之间，公卿大夫皆知其名，虞集等以异材推荐给朝廷。元顺帝即位，选派傅若金为参佐出使安南（即今越南）。出使归来，授广州路儒学教授，

他正在兴办学校，恢复学田，却暴病而死，年仅四十岁。傅若金精通《毛诗》，学诗喜读汉魏盛唐之作。早年家贫，织席为生，受知于同郡范梈，曾向他学习作诗之法。他的文章，由其弟傅若川编为《傅与砺文集》十一卷，诗也由傅若川重编成《傅与砺诗集》八卷。他的妻子孙淑（孙惠兰）也有诗名，有遗作《绿窗遗稿》，附于《傅与砺诗集》之末。傅若金文章典雅整洁，但比较拘谨。他以诗知名，并被视为“四大家”特别是范梈的传人。清代诗论家王士禛在《居易录》中评傅若金诗，说歌行得老杜（杜甫）一鳞片甲，七律亦有格调。

“四大家”以揭傒斯活动时期最长，几乎贯穿了元代全盛时期。在“四大家”中，揭傒斯名在最后，但他实际是一个相当活跃的人物，从元仁宗到元顺帝，影响遍及朝野。他的诗文问题主要在于缺乏鲜明的特色，不论文学主张还是学术思想都是如此。揭傒斯出身于书香门第，早有盛名，延祐元年荐为翰林编修，天历二年元文宗开奎章阁，置授经郎，揭傒斯首获其选。此后数任集贤、翰林学士，并且被委派为《辽史》与《金史》的总裁官之一。去世时《辽史》成稿，《金史》垂成。揭傒斯颇有影响，朝廷典册诏令多经其手，元文宗很赏识他的文才，每逢中书省奏用儒臣，必问：“其才何如揭曼硕?”

《梦武昌》是揭傒斯晚年的作品：

> 黄鹤楼前鹦鹉洲，梦中浑似昔时游。苍山斜入三湘路，落日平铺七泽流。鼓角沉雄遥动地，帆樯高下乱维舟。故人虽在多分散，独向池南看白鸥。

写这首七律时，“四大家”凋零殆尽，只剩下诗人自己。诗人在诗中表达了无可诉说的孤单寂寞。

“四大家”在枢要任职，与其呼应者遍布朝野。柳贯与黄溍都是与“四大家”声气相通，地位相当的诗文家。

元初，诗坛以宗唐为时尚。江南诗人戴表元的“宗唐得古”理论，对元诗影响深远。明代诗论家李东阳有一句名言是“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麓堂诗话》）。元代诗人之中的宗唐，在很大程度上是宗晚唐，具体说是受到李贺、李商隐“二李”影响。元代受到晚唐影响的诗人，前期比较典型的是贯云石，后期则是杨维桢，而色目诗人萨都剌是贯云石与杨维桢之间的桥梁。

作为西域“答失蛮”，萨都剌早年家境贫寒，曾远涉吴、楚，经商谋生。

泰定四年进士。萨都剌是元代重要的出身于色目人的诗人，在诗坛比较活跃、交游面广泛。他一生仕途失意。除作过一任翰林应奉，二十余年游宦各地，沉伦下僚。但他的诗才则受到时人的推重，虞集曾说："进士萨天锡者，最长于情，流丽清婉，作者皆爱之。"（《清江集序》）元末文坛盟主杨维桢甚至说："天锡诗风流俊爽，修本朝家范。《宫词》及《芙蓉曲》，虽王建、张籍无以过矣！"（《西湖竹枝集》）"最长于情"是"修本朝家范"。他的诗词不仅是在蒙古色目诗人群中，就是在整个元代文坛上也占有重要地位。他的作品比较富于文采，有较强的文学性，《鬻女谣》《早发黄河即事》表达了面对现实的正义感；《即事》《过居庸关》《醉歌行》《奎章阁感兴》以其深刻的反思受到称赏，怀古之作有相当高的成就，《台山怀古》是元人同题材的压卷之作：

> 越王故国四周山，云气犹屯虎豹关。铜兽暗随秋露泣，海鸦多被夕阳还。一时人物风尘外，千古英雄草莽间。日暮鹧鸪啼更急，荒台丛竹雨斑斑。

"一时人物风尘外，千古英雄草莽间"是历来传诵的名句。

萨都剌还以宫词著称，这类诗篇为他赢得了许多读者。他的词，流传至今的仅有十几首。〔满江红〕《金陵怀古》，〔念奴娇〕《登石头城》以洗练的笔触熔铸古今于一篇，脍炙人口。萨都剌还是元曲家，《太和正音谱》评他的作品"如天风环佩"，但散曲作品没有流传到今天，文章则传世极少。他还是名列《书史会要》的书法家，并有绘画作品传世。

元代在至正年间，诗坛达到鼎盛时期。元末长期的战乱，使江南民生凋敝，生灵涂炭，但却造就了一批直面现实的诗人。江西是"重灾区"，江西籍诗人周霆震、郭钰等人以"述难诗人"自居，他们无人不受到杜甫的影响，他们的诗成了元代亡国过程的"诗史"。

周霆震出身于书香门第，颖敏好学，早年受到宋朝遗老刘将孙、龙仁夫等人的器重。数次参加江西乡试，但均未中举，于是专意写作诗文。至正十二年战乱波及家乡，他迁居吉安，在郡城设馆，闭门课徒，几乎从头到尾亲历了江西的旷世之灾。周霆震一生足迹未离江西，曾身历元朝盛世，又亲见元朝为明朝取代，所作诗歌沉郁苍凉，感愤极深。他的诗文集《石初集》十卷，成就主要在于诗，所作忧时伤乱，论者目为"元末之诗史"（《四库全书总目》）。陈谟在《石初集序》中说，周霆震有三大幸事：一是未仕于元，二

是经战乱仍健在，三是元末江南野史不多，而周霆震所作可为国史补。

元是蒙古人建立的皇朝，蒙古与色目（色目世臣之后）是统治阶层。元末的战乱期间，造就了一批蒙古色目诗人，其中有蒙古人月鲁不花，色目人余阙、廼贤、王翰、丁鹤年等。月鲁不花的诗集散佚不存，但余阙、廼贤等都靠存世的诗篇为自己树立了诗人的完整形象。廼贤是葛逻禄族，汉姓马，又称为马易之。他的祖上从蒙古大军入主中原，先居于南阳，后迁居于庆元（浙江宁波）。早年师从乡贤郑觉民，以诗知名乡里。至正五年北游京师，一路上问风俗，访古迹，写成《河朔访古记》一书。留居大都的几年间，以文会友，结识颇广，还曾到上都观礼。直到至正十五年，战乱已经阻断南北，才回到乡里。至正二十二年，被选授翰林编修，因交通梗阻，便暂摄东湖书院山长以等待入京时机，次年五月，由海道入京就职。至正二十四年，以代祀南镇、南岳、南海，曾暂还乡里。回到京师，于至正二十八年初出参枢密院同知桑哥实里军，移驻蓟州，明朝大军兵临城下之际，因中风死于驻地。廼贤是元末重要诗人，他的处境颇有代表性。他倾慕中原文明，但作为色目人，他只能与元朝共终始，这一矛盾几乎贯穿了他的后半生。有诗集《金台集》二卷。他生前受到诗坛重视，每有新作，便传诵一时。欧阳玄为《金台集》作序时特意指出："九州共贯之久，而士有斯作。"论及廼贤诗篇的人，几乎都注意到他是用汉语写作而且达到相当水平的葛逻禄人。他的诗，近体以清丽为特色，而古诗则多直面现实，颇得风人之旨。《卖盐妇》《新乡媪》《枫亭女》等曾被比为白居易的《新乐府》。《河朔访古记》一书久已亡佚，清乾隆时修《四库全书》，由《永乐大典》中辑出三卷，是元代文化含量较高的游记散文。

元代在诗坛最有个人影响力的诗人是杨维桢。杨维桢与顾瑛，同是解读元明诗的联系与异同的钥匙。

杨维桢自泰定四年中进士，多年出任下级官吏，后来曾被任命为江西儒学提举，但战乱已起，他曾避兵富春山而未赴职。元末，他旅居吴中、钱塘。张士诚据苏杭，他不应其召，浪迹于浙西山水之间。明洪武二年（1369），召修礼乐书，杨维桢说："岂有八十岁老妇，就木不远，而再理嫁者邪！"明确表示自己不忘故国。次年初赐安车诣京师，留居三月，放还。杨维桢是元末最主要的诗文家之一，作品的数量、影响与成就都相当可观。他的诗以务求新奇为特点，号称"铁体"或"铁崖体"，曾风靡一时，元明之际风行草偃，受他影响深刻的诗人有数十位之多，使元末明初诗坛风气为之一变。同时对于明初的诗风影响至巨。所作以古乐府与竹枝词流传最广，他的"古乐府"能面对现实，比较客观地反映出元末社会生活；他倡导了七言绝句的

"竹枝体"，并编有《西湖竹枝集》。他的文章，风格与以怪异标榜的诗并不一致，以使人易读易懂为出发点。《四库全书总目》评他的诗文时说："诗歌乐府出入于卢仝、李贺之间，奇奇怪怪溢为牛鬼蛇神者，诚所不免。至其文，则文从字顺，无所谓剪红刻翠以为涂饰，聱牙棘口以为古奥者也。"这是相当准确的论断。为了使自己的文章好读，避免误解，他还常于句读容易致误的地方旁注一字，使读者不致产生歧义。他对诗文的这种不同的写作尺度颇有代表性。他的文章之中序的数量相当多，这与杨维桢在元代文坛的地位相符。著有《东维子文集》三十卷、《铁崖古乐府》十六卷、《铁崖咏史注》十八卷、《铁崖赋稿》二卷等多种诗文集。但是，他身后最大的遗憾，应是诗文散乱而缺乏定本，这与他诗坛盟主的身份不符。

杨维桢诗中成就较大、影响较广泛的是《宫词》与《竹枝词》等若干组七言绝句。《宫词》第二首即：

开国遗音乐府传，白翎飞上十三弦。大金优谏关卿在，伊尹扶汤进剧编。

这是元代诗歌中咏及杂剧之盛的仅见之作。通过这首小诗可见杨维桢举重若轻的才华，确实是"其才纵横豪丽"。但杨维桢的诗读之总有不满足的感受，明人胡应麟对他的经典评语"大器小成"（《诗数》外编卷六）确有其根据。

其实，几乎所有的"铁门"诗人，又都是顾瑛玉山草堂常客。杨维桢最赏识的追随其风格的诗人项炯、陈谦、郑东、郭翼，除陈谦，这些人的诗均见于《草堂雅集》。一般认为，杨维桢本人曾在顾瑛家塾执教。在两浙吴中诗坛，元后期的二三十年间（其中主要是战乱），杨维桢一直是领军人物，而顾瑛则是最大的东道主。当然，顾瑛本人也是诗人，而且成就并不低，但他的诗名长期为他的好诗、好事之名所掩。

顾氏是昆山（江苏太仓）世族，顾瑛出身豪富之家，年近四十，将旧业悉付子婿，在原来宅地之西重建一处园林，名为"玉山佳处"（即"玉山草堂"），顾瑛每月在其中不同景点广招文人墨客，饮酒赋诗为会，是元代末期江南文坛影响相当大的人物。顾瑛的吴中园林"玉山佳处"和倪瓒在无锡的园林"云林隐居"，同是至正前期江南文人的两大活动中心。顾瑛本人风流文雅，不屑仕进，三十岁开始折节读书，并购买古书名画及古器物，以品题鉴赏为能事。举茂才，署会稽教谕，又辟行省属官，都不赴职。他的儿子顾元臣曾为元朝官员（水军副都万户），明初，全家都被迁徙到临濠。洪武二年三月，顾瑛去世于临濠编管地。他是当时江南诗坛盟主，与杨维桢齐名。

曾与他唱和的诗人有几十上百人，有关的唱和之作多达数千首。他的诗曾被编为《玉山草堂集》二卷、《玉山璞稿》二卷、《玉山逸稿》四卷。他还将自己与同仁的唱和之作编为《玉山名胜集》八卷、外集一卷、《草堂雅集》十四卷、《玉山纪游》一卷。在这几种之外，散失者尚不在少数。他的诗主要为应酬题咏之作，表现了优游诗酒的生活情趣，但由于他身处江南动乱时期，而且亲身经历了改朝换代的整个过程，作为一个诗人他并不比作为诗坛东道主逊色。

顾瑛与杨维桢是当时江南诗坛的并峙双峰，但顾瑛的诗，从风格上来说与杨维桢的"铁崖体"或"铁体"并不一致，存在较大的距离。顾瑛的七言近体学杜甫的气格，总的来说成就较高，只是全篇俱佳的不多见，而往往以佳句称胜。他的问题是在酒宴上耽搁的时间太多，人们往往以为那就是顾瑛了，其实他的作品从不同方面反映了元末群雄并起、战乱频仍的社会现实，如《乙未五月口号》中说："二斤十贯新交钞，只直仓黄米四升"，"堤头放马是何人，两两三三矮作群。强把新钱买村酒，口称曾去作苗军"等，一定程度上超出了他忠于元朝的基本立场。七言歌行《长歌寄孟天暐都事》反映元军出师无功，米价腾贵，并高呼"自此天下何由安"。

然而，就在这一二十年间，江南鼎沸，国家一直处在风雨飘摇之中。顾瑛和他的客人们对于诗，已经执迷到了不知轻重，不辨生死，不在乎除了诗以外的一切的地步。醇酒，美女，诗，等于一切。顾瑛以一种身处末世，被排除在轮回之外的轻松超脱对待身家性命。这就是顾瑛在《乙未书实和孟天暐都司见寄五首》其四诗中说的：

> 娄上人家不识春，檐头蛛网亦生尘。朱门桃李皆零落，只有东风未嫁人。

这是对张士诚的腹诽，还是为自己解嘲，不论具体所指究竟是什么，那都是顾瑛和他的"玉山诗友"必须面对的现实。顾瑛诗受到苏黄影响，脱胎于杜诗。在至正十六年，"兵后朋旧星散"，但因为友人缪侃来访，顾瑛仍然在可诗斋聚会。当时"烽火隔江"已经"近在百里"，不但目前的会集"诚不易得"，而且"后会无期"，诗人权以这首诗为"绝唱"。

实际顾瑛的诗大部分是写于战乱之前与之中的玉山草堂，尽管是身在艺伎宾朋环绕之下。他的诗不能仅仅以觞咏之作视之，"谩是羁情浓似酒，独怜世事薄于云"（《次龙门琦公见寄二首》其二）；"秋江更待澄如练，击楫中流缓缓归"（《九月七日复游寒泉登南峰有怀龙门云台二首》其二）……这

可不是什么人都说得出来的感受，这些诗句证明，顾瑛不单是诗酒沙龙的东道主，也是占据了当时诗坛高处位置的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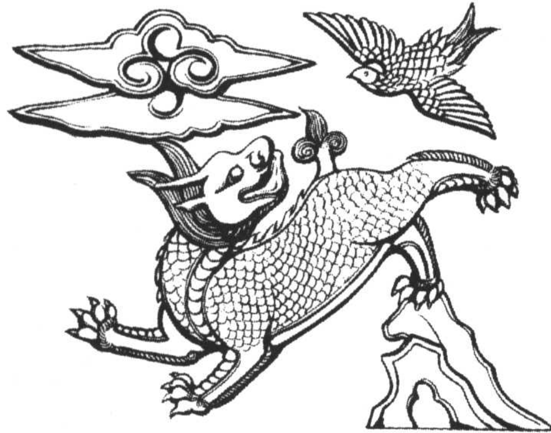
事实上，有些诗论家不喜欢杨维桢，对顾瑛执反面意见的也不少。但无可否认，元诗最繁荣，成就最高的时期，就是在元末至正年间，而杨维桢，再加上顾瑛，是支撑（或说推动）元诗在至正年间（主要是战乱期间）走向繁荣顶点的主要动力。正因为如此，明诗的起点也高。

明朝起始，与元朝终结，以大都易主为分界。

这是历史的界定。文学史有另一个交接仪式：明代文学起始于元末昆山“玉山草堂”的不夜之游与吴中诗人会集竞技，萌生于江西、福建、两浙、两广等地的战乱废墟。明初“吴中四士”，是元末“北郭十子”的延续；贯穿整个元与明的过渡，杨维桢的诗坛盟主地位，从未受到挑战。所以，明代文学不需要另起炉灶。

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元朝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历史使命，结束了中国长期的割据，建立了其疆域古今所无的大元，又以近一个世纪时间将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种不同内涵的文明，容纳在中华区域文明的整体范畴之中。如同金所经历过的，金代文学，不是女真文学，也不是传统的汉族文学，而是以两山两河为主的北方文学。元代文学的特点，正是在将一个或几个民族的单一文化整合成为区域内所有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的这一发展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的。





【前　编】





成吉思汗（元太祖）十五年庚辰（1220）

随军出征西域的耶律楚材，留守中亚河中府，几年间在此营造了中原文化环境。

随成吉思汗大军，耶律楚材长期驻守在河中府（中亚撒马尔罕）。在异域几年间，耶律楚材与前来谒见成吉思汗的丘处机、丘处机的十几个随行弟子、汉人王君玉、前西辽郡王李世昌等，共同营造出一个华夏文化“社区”。这是传统的中原文坛向西延伸的“极点”。组诗《西域河中十咏》，是耶律楚材在河中府几年生活的结晶。王国维将《西域河中十咏》的写作时间归于1222年，并说耶律楚材“在西域所作无年代可考者”，都是1220—1222这三年之间所写①。除这一组10首五言诗，还有《西域和王君玉诗》（20首七律）、以“西域河中游春”为总题的若干诗篇②、《西域从王君玉乞茶因其韵七首》等，被视为诗人在西域河中地区生活的实录。1220年，刚出现在离中原万里之遥的河中府时，成吉思汗称为“吾图撒合里”——“长髯人”的祖籍辽东的耶律楚材年方三十三岁。元代文学，就发端于历史的“大移位”时期。

成吉思汗（元太祖）十六年辛巳（1221）

西行万里谒见成吉思汗后，丘处机再次来到河中地区，并宣讲教义。地处丝绸古路孔道的河中府，出现了华夏文明的“驻守者”。

中原道教宗师丘处机，应邀前往西域谒见成吉思汗。此行跨越了四个年

① 《耶律文正公年谱》，《湛然居士集》（中华书局1986年）附录。

② 有《庚辰西域清明》《壬午西域河中游春四首》《游河中西园和王君玉韵》《河中游西园二首》《河中春游有感》等诗篇。

度，十一年十月十八日，丘处机初次抵达西域河中府——邪米思干大城。本年，于八鲁湾（阿富汗兴都库什山西北麓）行营，为成吉思汗接见。

公元1219年（元太祖十四年），在西域攻城掠地的成吉思汗，派专人来丘处机驻锡的山东莱州昊天观，敦请丘处机前往西域相见。在此之前，他曾不应金主之召；而借金已经不能自保的机遇而将山东的一部分重新纳入版图的南宋，也曾邀丘处机南下，又为他婉辞[①]。但他不能拒绝成吉思汗的邀请。公元1220年，丘处机在成吉思汗亲随护持下启程，一路北上，渡过克鲁伦河便折向西，前往西域新城——镇海城。越过阿勒泰山则南下，经河中府前往八鲁湾。丘处机一行在西北大地画了一个巨大的“？”，历时三年，行程万里，由十八位弟子陪伴，终于抵达成吉思汗行营。他们多次讲论了长生之术，丘处机受到礼遇，他的道教观念也为成吉思汗所接纳。

离开成吉思汗行营，丘处机一行先回到河中府，应邀为蒙古西征军将士讲道。这是道教史上的重大事件，是道教走出传统的中原，宣讲教义的西极。东归途中，先在阿力麻里（即今新疆伊犁）小驻，路经别失八里——北庭（即今新疆吉木萨尔），重返镇海城。公元1223年回到中原，他与弟子们移住已经为蒙古攻占的燕京，居住在太极宫，受命掌管天下道教。1227年去世。元世祖时赐号为“长春演道主教真人”，简称“长春真人”。太极宫，又叫长春宫，就是今天北京的白云观。丘处机的西行是当时一件大事，他四年间的行踪与作品都记载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

此行在中亚留下文学作品的，还有丘处机的弟子尹志平。

尹志平（1169—1251），字太和，或作大和，号清和子。东莱（山东掖县）人。年仅十四岁，从马钰入道。金章宗明昌初，住盘山栖霞观，师事全真丘处机，受丘处机赏识；又学《易经》于郝大通。金末住潍阳玉清观二十年。兴定四年（1220）随丘处机应元太祖成吉思汗之召，远赴西域。丘处机死后，嗣主长春宫，继掌全真教事。有诗名，其诗结为《葆光集》三卷，今存。虽然主要生活在金代，但今存之诗大多是入元后所作，特别是与丘处机一样，在西行途中写有纪行诗。

耶律楚材的儿子耶律铸出生在西域军旅。

耶律楚材有两个儿子。长子耶律铉早卒，次子耶律铸（1221—1285），字成仲，号双溪。1219年至1226年这几年间，耶律楚材都在西域军中，所

① 《南村辍耕录》卷十“丘真人”节：丘处机“己卯（1219），居莱州，时齐鲁入宋，宋遣使来召，亦不起。”己卯，相当于南宋中期的宋宁宗嘉定十二年。

以耶律铸应出生于西域某地，耶律铸的许多诗篇都写于西域。

成吉思汗（元太祖）十七年壬午（1222）

耶律楚材驻守在中亚交通枢纽河中府已经几年，《西域河中十咏》以及其他写于河中府的诗篇是他异域生活的升华。

《西域河中十咏》每首都以“寂寞河中府”起兴。到本年，耶律楚材在这天涯地角已经生活了三个年头。这段时间里，他本就是从寂寞开始，到“品尝”寂寞、“破解”寂寞，消磨着自己的青春岁月。

寂寞河中府，连甍及万家。葡萄亲酿酒，杷榄看开花。饱啖鸡舌肉，分餐马首瓜。人生惟口腹，何碍过流砂。

寂寞河中府，临流结草庐。开樽倾美酒，掷网得新鱼。有客同联句，无人独看书。天涯获此乐，终老又何如。

寂寞河中府，遐荒僻一隅。葡萄垂马乳，杷榄灿牛酥。酿春无输课，耕田不纳租。西行千余里，谁谓乃良图。

寂寞河中府，生民屡有灾。避兵开邃穴，防水筑高台。六月常无雨，三冬却有雷。偶思禅伯语，不绝笑颜开。

寂寞河中府，颓垣绕故城。园林无尽处，花木不知名。南岸独垂钓，西畴自省耕。为人但知足，何处不安生。

寂寞河中府，西流绿水倾。冲风磨旧麦，悬碓杵新粳。春月花浑谢，冬天草再生。优游聊卒岁，更不望归程。

寂寞河中府，清欢且自寻。麻笺聊写字，苇笔亦供吟。伞柄学钻笛，宫门自斫琴。临风时适意，不负昔年心。

寂寞河中府，西来亦偶然。每春忘旧闰，随月出新年。强策浑心竹，难穿无眼钱。异同无定据，俯仰且随缘。

寂寞河中府，声名昔日闻。城隍连畎亩，市井半丘坟。食饭秤斤卖，金银用麦分。生民怨来后，箪食谒吾君。

寂寞河中府，遗民自足粮。黄橙调蜜煎，白饼糁糖霜。漱旱河为雨，无衣垄种羊。一从西到此，更不忆吾乡。

这十首五言律诗，是元代文学的起点——零公里里程碑。

河中府，是富庶、开放、不设防的古老绿洲。诗人在异乡学会了酿造葡萄酒，枇杷、橄榄等珍奇果木中原根本见不到，可在这地角天涯竟遍布山野。耶律楚材的一大娱乐是与友人联句或分韵作诗，而只在自己独处时才沉潜在典籍之中……春天，整个河中府如同巨大无匹的花园，中原听都没听说的风力磨盘、水动木杵，成了一道道特殊的风景线。当地特产的桑皮纸，写起字来笔力略感迟滞；可使用土著的芦苇秆笔作诗，并不会妨碍灵感到来。在这异乡，人们已经超前地学会种植棉花（“垄种羊”，喻指在地里收获“羊毛”），解决穿衣御寒问题。河中地区降雨极少，灌溉全靠河水，但来自雪山的丰沛河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随大军西征时带来的雨伞因无用而弃置，诗人为排遣烦闷，也为思念家乡亲人，就用雨伞的竹柄钻孔制成一支笛子。河中府原是西辽重镇，西辽开国君主耶律大石（大石林牙）曾在此地故主苏丹的宫室基础上设立了行宫，当地人还将那些已经倾颓的建筑叫“拉巴特”（王宫）。耶律大石实际上是耶律楚材的远房亲戚。女真崛起，逼迫旧日宗主辽国屈膝，耶律大石避兵锋西行，在西域建立了西辽；耶律楚材的父祖则为金朝所用。当耶律楚材追随蒙古铁骑横扫西域占据西辽重镇河中府时，他得到了“拉巴特”旧宫门上的三尺门框，那是用不知名的硬木制成。他将门框改制成一具凤尾琴。每每临风岸帻，鼓琴寄意。他一时还不明白：琴心是促使他面对历史潮流呢，还是让他沉潜在如水逝去的岁月里。

窝阔台汗（元太宗）元年己丑（1229）

元日。耶律楚材的西行记——《西游录》成书。

自署“己丑元日湛然居士、漆水移剌（耶律）晋卿叙”的《西游录自序》中，耶律楚材自云“著《西游录》以见予志”，“其间颇涉三圣人教正邪之辨”。

留驻西域期间，丘处机是耶律楚材难得寻觅的交谈对象，相同的大文化背景，是他们唱和酬答的基础。《湛然居士集》之中许多写于西域的诗，原本都是与丘处机唱和之作。《湛然居士集》正式出版时编刊者却特意作了细致删改，隐去了写作背景。这些诗的存在和对这些诗写作背景的涂抹，反映出耶律楚材对道教、佛教的基本态度。至少在西域期间，耶律楚材对道教并未排斥，而且他与丘处机都身处异域，都需要精神交流，即便是对手，也有惺惺相惜的感情。但耶律楚材回到中原，信奉佛教，贬斥道教的倾向日益明显。1227年七月，丘处机病逝于燕京；同年冬，耶律楚材至燕京。在燕京，

故旧乡亲知道他曾留居西域六年，一再询问异域风土人情，使他难于应对，便提笔写下《西游录》，记录西域见闻，以满足好奇者。但研究者曾认为，耶律楚材写作《西游录》主要为攻击丘处机①。《西游录自序》充斥着对道教的贬斥。《西游录》的写作时期适逢丘处机去世、《长春真人西游记》开始编辑②，这两者之间应该有一定联系。

耶律晋卿像



传世的耶律楚材像中，这幅比较写实。但还是很难以其与写《西域河中十咏》的那个年轻的、浪迹天涯的诗人融为一体。

在《西游录》中，这样写到河中府——中亚名城撒马尔罕：

寻思干（撒马尔罕）者，西人云“肥”也，以地土肥饶故名之。西辽名是城曰“河中府”，以濒河故也。寻思干甚富庶。用金铜钱，无孔郭，百物皆以权平之。环郭数十里皆园林也。家必有园，园必成趣。率飞渠走泉，方池圆沼；柏柳相接，桃李连延。亦一时之胜概也。……盛夏无雨，引河以溉。率二亩收锺许。酿以葡萄，味如中山九酝。颇有桑，

---

① 向达《西游录前言》（《西游录·异域志》，中华书局 1981 年）。

② 向达认为，《西游录》写于 1228 年，刊行于 1229 年。而《长春真人西游记》书前的孙锡序写于 1228 年，但书中写到了 1230 年丘处机的葬礼。所以说它编写于 1228—1230 年间是比较妥当的。

鲜能蚕者①，故丝茧绝难，皆服屈眴（棉布）。土人以白衣为吉色，以青衣为丧服，故皆衣白。

与《西游录自序》相比，这才是更真实的耶律楚材。

李志常著《长春真人西游记》成书。

孙锡《长春真人西游记序》作于“戊子秋后二日”。序中说：丘处机西行，“门人李志常，从行者也。掇其所历而为之记，凡山川道里之险易，水土风气之差殊，与夫衣服食饮百果草木禽虫之别，灿然靡不毕载。目之曰‘西游’，而徵序于仆。”

《长春真人西游记》以丘处机历时三年的西域之行的见闻为主要内容。这部著名的古西行记，长期以来并不为世俗读者所知，直到清乾隆六十年（1795），元史学家钱大昕在苏州玄妙观发现，并借抄出一部，才开始广泛流传。它不但是文字洁雅的游记，而且保存了丘处机西行时期众多诗篇，这些作品丘处机《磻溪集》未收入。与充斥《磻溪集》的“有韵语录”相比，这是真正的文学作品。

李志常（1193—1256），字浩然，道号真常子。祖籍永年（今属河北）。是丘处机主要的弟子之一，丘处机死后，尹志平继掌教门。尹志平死后，李志常接掌全真道，但在与佛教的辩论中败北，愤恨而卒。

窝阔台汗（元太宗）三年辛卯（1231）

在与蒙古的战争中，金帅府经历商衡死于兵难。

商衡，字平叔。曹州济阴（今属山东）人。金崇庆年间进士，正大末，出任秦蓝总帅府经历，与元兵遭遇，拒不降，死之。其弟商衢，其子商挺，元初均有文名，并同是曲家。商衢（1194—?），字正叔，入元，官学士，曾编《双渐小卿诸宫调》，今不传；今存散曲有小令一支，套曲八套（据《全元散曲》），其套曲成就颇高。商挺，入元出仕长达数十年，诗文词曲均有时名。商挺之子商琦、商琥等，都是文坛名人，商琦工山水画。

① 这里的记载相当耐人寻味。河中地处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尽管桑树是当地土产，但丝绸却要取之于中原。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特意提到了“东国公主”传入蚕种的故事。

——窝阔台汗（元太宗）五年癸巳（1233）——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初次结集。

本年编订的《湛然居士集》共九卷（即今存十四卷本的前九卷），由中书省都事宗仲亨辑录。此后又补辑了1233年至1236年的作品，编为五卷（即今存本的卷十至卷十四），自1236年以后的作品已经散失。《湛然居士集》前后序跋，由元人所写的共四篇，其一是“甲午年仲冬晦日”万松老人行秀序，其二是“癸巳岁十二月望日”王邻序，其三是“岁次癸巳十有二月初吉”孟攀麟序，其四是“癸巳年十月晦日”李微序。癸巳，是元太宗五年（1233），甲午，是元太宗六年（1234）。作为元代诗文别集的第一部，《湛然居士集》成书，是北方蒙元文坛的一件大事。

——窝阔台汗（元太宗）七年乙未（1235）——

南宋重镇德安陷落，儒士赵复被蒙古俘获，拘押在北方，因此赵复将南宋理学与文学提前引入北方学坛。

赵复，字仁甫。德安（湖北云梦）人。元太宗七年，元将阔出攻占德安，德安民数十万俘戮无遗，北方大儒姚枢正在阔出军中，奉诏从战俘中将儒士挑出，其中有赵复和砚坚[1]。赵复写诗寄示友人皇甫庭，对余生已不抱希望。为防赵复自杀，姚枢特意将其留住自己营帐。押解到燕京后，赵复冒死拒绝为蒙古南下部队前驱，被安置在江汉之上，学者称为“江汉先生”。当时南北隔绝，宋儒经典难以传到北方，赵复凭记忆将朱熹诸经传注默写下来，尽以付之姚枢，并应邀主讲太极书院。姚枢退隐苏门山，就使用赵复亲传的理学著作讲授给门徒。许衡、窦默、郝经、刘因，都因此间接接受了朱程之学。

《元诗选癸集》甲集的开卷第一首诗，就是赵复被蒙古羁押之后写的

① 砚坚，字弥坚。砚为其姓氏。见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七《元故国子司业砚公墓碑》。

《覃怀春日》:

江南江北半浮生，踪迹居然水上萍。竹鸡啼罢山雨黑，蚕子生时桑柘青。

鲜于枢《困学斋杂录》则说:“江汉先生赵复，字仁甫。武昌之役，始初渡江时，寄皇甫庭:‘寄语江南皇甫庭，此行无虑隔平生。眼前漫有千行泪，水自东流月自明。’又，《自遗》诗:‘醉乘鸾驭到仙家，彩笔云笺赋落霞。老去空山秋寂寞，自锄明月种梅花。’”实际《寄皇甫庭》是赵复的“绝命诗”;《自遗》是对生活意义的重新认定。

与赵复同时被俘的砚坚，则周流河朔，不获宁居。后来定居真定，著籍儒户。“中原硕儒，若容城刘公因、中山滕公安上，亦皆从公授经。”经赵复与砚坚的教授，儒学传承才逐渐打破南北格局，走向融合。

夏。刘祁《归潜志》成书，并写出自序。

两年之前金亡，一年之前，刘祁回到家乡，开始结构本书。可以说，除《中州集》，最重要的金代文学文献就是《归潜志》十四卷。

《归潜志自序》云:“余生八年，去乡里，从祖父游宦于大河之南。时南京为行宫，因得从名士大夫问学。不幸弱冠而先子殆。其后进于有司，不得志，将归隐于太皞之墟。一旦遭值金亡，干戈流落，由魏过齐入燕，凡二千里。甲午岁，复于乡，盖年三十二矣。因思向日二十余年间所见富贵权势之人，一时烜赫如火烈烈者，追遭丧乱，皆烟消灰灭无余，而吾虽贫贱一布衣，犹得与妻子辈完归，是亦不幸之幸也。由是其所以经涉忧患与夫被攻劫之苦、奔走之劳，虽饭蔬饮水，囊中无寸金，未尝蒂诸胸臆。独念昔所与交游，皆一代伟人，人虽物故，其言论、谈笑，想之犹在目。且其所闻所见可以劝戒规鉴者，不可使湮没无传，因暇日记忆，随得随书，题曰《归潜志》。‘归潜’者，予所居之堂之名也。因名其书，以志岁月，异时作史，亦或有取焉。岁乙未，季夏之望，浑源刘祁京叔自叙。”与元好问相同，刘祁也是特意为保存金源文献而著书。

八月。刘祁出游封龙山，作《游西山记》。

元太宗六年，刘祁还归浑水。七年秋，进入封龙山游览。金朝刚刚亡国，对于一个遗民，游山玩水不是最好的选择，但山水之间却能使其产生皈依感。桃花源就存在于深山密林间。通过《游西山记》以及十年后（1244）写的

《游林虑西山记》，刘祁将山水之美与游人心境之淡然结合得如同无缝天衣。《游西山记》是封龙山的工笔画卷，拿他的话说："生三十年，局促城市间，不意今朝见天地伟观。"

窝阔台汗（元太宗）九年丁酉（1237）

本年度，平阳路（山西临汾）举行了所属地区的贡举。北方金源区域虽已改朝换代，但科举对文人影响仍在。

据杜思问《修建水谷乐全观记》（《山右石刻从编》卷二十七），乐全观道士何志渊"幼习儒"，"值乱北归，遇丁酉国家设贡举于平阳，师中甲科，由是免俘，入道为黄冠师，往来汾晋间。"可知这个科举涉及的是临汾与太原之间的区域，当时金朝亡国不久，金朝的科举制度在北方的"两山""两河"影响深远。当然，这次贡举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文人"竞技"，中举者的待遇仅仅是"免俘"。

由徐霆编订了彭大雅所著《黑鞑事略》，并为之作疏解。《黑鞑事略》是早期蒙古政治社会情况的实录。

南宋使臣彭大雅于绍定六年（1233）随邹伸之出使蒙古，并撰有漠北见闻录《黑鞑事略》。此后，徐霆于南宋端平初又出使蒙古。嘉熙元年（1237），由徐霆编订了彭大雅的《黑鞑事略》，并为之作疏解。这是关于蒙古早期政治社会情况的实录。

在《黑鞑事略》结尾部分，徐霆记述了耶律楚材见到南宋使臣时的场景。那时，对于"为晋用"的"楚材"，人们还很陌生。耶律楚材说："你们只恃着大江。我朝马蹄所至，天上天上去，海里海里去!"这段话无疑是原文，而不是经过"语译"的白话文。它忠实记录出耶律楚材的未经"修饰""加工"的话。"天上天上去，海里海里去"，还有比这更阔大的眼界心胸吗?通过这句话，人们仿佛直接面对着"长髯人"本人，意气风发的"长髯人"就活跃在字里行间。

元太宗在位时期，耶律楚材仍然受到信任。

成吉思汗晚年，屡次对元太宗说："此人天赐我家，汝他日国政当悉委之。"元太宗嗜酒，后期尤甚，日与大臣酣饮。耶律楚材一再劝阻，但太宗

不予理会。一天，耶律楚材拿着一个酒槽漏斗的口沿，面见皇帝，说：这是铁器，为酒所蚀，尚致如此。况人之五脏，有不损耶？太宗为之所动，敕左右：日进酒三钟而止[1]。

窝阔台汗（元太宗）十年戊戌（1238）

元好问历经丧乱，辗转回到家乡。

天兴二年（1233）金汴京陷落，元好问被蒙古军队拘押在山东聊城。获释后，元好问寄居冠氏（山东冠县）。直到元太宗十年，金朝亡国几年后才回到家乡秀容（山西忻州）。在家中构筑了一个亭子，叫“野史亭”。晚年居家著述，以“国亡史兴，己所当任”为生活目标。立志于使金一代史籍不至于“泯而不传”。这十年间他的生活安定，但思想痛苦矛盾。一生中，他足迹遍及北方。在旧金区域，他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

窝阔台汗（元太宗）十一年己亥（1239）

三月。杨奂作《汴故宫记》以及《录汴梁故宫人语》（十九首）。

《汴故宫记》（《元文类》卷二十七）云：“己亥春三月，按部至于汴。汴长使宴于废宫之长生殿。惧后世无以考，为纂其大概云。”他的《录汴梁故宫人语》则是19首五言绝句，等于是“宋宫词”。“虽一时所寄兴，亦不无有感伤之意。”[2]

杨奂任用员炎监嵩州酒。员炎是与时迥异的游侠式诗人。

王恽《员先生传》（《秋涧集》卷四十九）云：

员炎，字善卿，同州人。性落魄，嗜酒。业诗，有能声。不事生产。大元己亥岁，故人杨紫阳主漕洛师，愍其窭，用监嵩州酒。时兵后，邑居

---

① 以上据元人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元文类》卷五十七）。

② 《南村辍耕录》卷十八“记宋宫殿”节。

榛荒，日与鹿豕伍，非所乐也。已而随所征上谒，杨方据案坐堂上，吏凫雁行立。员挂布囊腋下，杖巨挺直前曰："杨使君不相知，置我于此，几为老罴所噬，此汝酤镪，持取。吾不能为汝再辱。"遂揖而去。其疏诞如此。自是长游河朔，以诗鸣诸公间。……西归过卫，先君馆焉，褐衣麻屦，酒近酣，巨挺横膝上，掉头吟讽歌谣，慷慨之气，轩轶四座。素不能骑乘，人强之，辄色变堕地，或以诗戏云："靴有镫青虽可爱，面无人色实堪怜。"尝怀金一饼，曰："镇心不可以阙此。"后用以易妾，继为人窃去。家居壁四立，余诗稿酒瓢而已。卒年六十七。

员炎、阚举都是与传统文人迥异的诗人，但不能不承认他们有鲜明的个性，仅随时以"巨挺横膝上"，就使人印象深刻。与此同时，江南的诗坛则是江湖游士的天下。在《员先生传》中保存了几首员炎的诗，他的诗与阚举风格并不一致。

窝阔台汗（元太宗）十二年庚子（1240）

《蒙古秘史》成书[①]。

《蒙古秘史》是蒙古族文学的里程碑，是以蒙古族崛起为背景，以成吉思汗为主人公的史诗式作品。

《蒙古秘史》即《元朝秘史》，原名为"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原文为用畏吾文字转写的蒙古文字。今存本有十二卷、十五卷等几种版本，但内容基本一致。而且都是出于用汉字注音的写本。在一个时期之内，本书因"事关禁秘，非可令外人传写"，所以秘藏在宫禁中，即便史官也难得一见。元亡，明廷以其作为学习蒙古语的文本，才采取了用汉字逐字将原文的读音注出的特殊翻译方式。《蒙古秘史》包含着12世纪至13世纪间蒙古民族的历史往事以及智慧与经验，而就是凭借这些才使得一个游牧在漠北的民族深刻影响了中国以及世界历史的进程。

---

① 《蒙古秘史》成书于子鼠年，有成书于戊子（1228）、庚子（1240）、壬子（1252）等说。一般认为是庚子年成书。

乃马真后二年癸卯（1243）

王若虚去世。享年七十岁。

王若虚（1174—1243），字从之，号慵夫，晚号滹南遗老。藁城（今属河北）人。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经义进士。调鄜州录事，正大年间仕至翰林直学士。天兴元年（1232），金哀宗避蒙古兵锋遁走归德，次年春，金将崔立拥立梁王，自任太师、都元帅，以汴京降蒙古。附和崔立的大臣请为其立“纪功碑”，命王若虚撰碑文，若虚自知作则名节扫地，不作则死，反复拖延，直到蒙古入城，也没有写出碑文。金亡，北归镇阳。在出游泰山时垂足坐大石上，瞑目而逝。有《滹南集》（全名《滹南遗老王先生文集》）四十五卷，续集一卷，其中包括《滹南诗话》三卷。论诗重杜甫、白居易、苏轼，但以为黄庭坚诗一无是处。

乃马真后三年甲辰（1244）

耶律楚材去世，其子耶律铸嗣领中书省事，并将所作结为《双溪小稿》。

《双溪小稿》收录的主要是耶律铸的“少作”。麻革《双溪小稿序》（《双溪醉隐集》卷首）说：“公生长北庭戎马间，甫十岁，已能为歌诗至于斯。”并特意提到，自己在金亡之际避难居居延海时，就读过耶律铸的诗。

贵由汗（元定宗）元年丙午（1246）

杨奂从南下攻宋的人手中得观《通鉴纲目》，打消了自己为更正《资治通鉴》的汉魏正闰观而重修《汉书》的想法。

除女子金帛，《通鉴纲目》也是重要的“战利品”。《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四“汉魏正闰”节）说：“紫阳杨焕然先生读《通鉴》，至论汉魏正闰，大不平之，遂修《汉书》，驳正其事。”1245年，蒙古将领察罕与张柔掠南宋治下的淮西，至扬州而还。带回的战利品中有朱熹《通鉴纲目》，见到《通鉴纲目》，杨奂知道自己的意见已经得到前人发挥，“其书乃寝”。并特意为

此写了一首诗：

风烟惨淡驻三巴，汉烬将燃蜀妇髽。欲起温公问书法，武侯入寇寇谁家。

金元之际人杨奂、郝经等对“汉魏正闰”的不平，是潜在社会思潮的反映。以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创意滥觞于此。宋、金分治之后，南北两方学界在这个问题的意见不但凸现于各自的背景，而且不谋而合。南北学者所以共同对这一问题表示异乎寻常的关切，是因为宋、金、西夏的最终统一于元，与八九个世纪以前的三国归晋有近似之处。

十二月。赵复为杨奂文集作序。

赵复《杨紫阳文集序》（《元文类》卷三十二）是借题发挥之作，主要表述自己对南北文化同源的看法。他对杨奂的肯定也是由此而生。在序中赵复说：“惟秦君子杨氏，其志其学，粹然一出于正。盖自其为诸生，固已无所不窥，坐是，重困于有司之衡石。晚居洛阳，著书数十万言，沉浸庄、骚，出入迁、固，然后折衷于吾孔、孟之六经。其言精约粹莹，而条理肤敏。”

释行秀去世。享年八十一岁。

释行秀（1166—1246），号万松老人。河内（河南沁阳）人。俗姓蔡。早年出家，居仰山，金章宗巡游，行秀作迎驾诗以献，受到赏识。后居京师（北京市）报国寺，筑蜗舍名为“从容庵”，死后葬于京师。耶律楚材受释行秀影响颇大，《湛然居士集》有其所作的序，诗文传世不多①。

贵由汗（元定宗）三年戊申（1248）

六月。张德辉作《岭北纪行》。这篇游记与刘祁的《北使记》、刘郁的《西使记》，不但扩大了人们的视野，也为散文的写作提供了范例。

张德辉（1195—1274），字耀卿，号颐斋。交城（今属山西）人。金贞祐间试掾御史台，金亡隐居，与元好问、李冶并称“封龙山三老”（即“龙

① 行秀坟塔，至今仍在北京西城区砖塔胡同东口。明人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四库全书》本）卷二七七，有行秀诗5首，未注明出处。但这5首诗是明初释子时蔚所作，时蔚，号万峰，误为“万松”。

山三老”），是著名的金遗民。元定宗二年，忽必烈在潜邸，召见问政。六月，赴召北上，历时数月抵达和林汗廷。定宗三年六月望日，写定《岭北纪行》。《岭北纪行》（《全元文》第二十二册），又名为《边堠纪行》《塞北纪行》，曾收入《说郛》等丛书。张德辉经历的岭北区域，在汉人心目之中原是神秘陌生的异域，他笔下所写都是“新闻”。这是较早的一篇将笔触伸至蒙古草原腹心地带的散文。《岭北纪行》的行文风格与其大致同时的游记如刘祁《游林虑西山记》、麻革《游龙山记》等颇相近，初读或有距离感，但在整个阅读过程中，作者的情绪与修养始终与读者相伴。

十一月。滞留在北方的赵复著《伊洛发挥》，并自印数百部，借出游分赠各地学人。

杨弘道作《送赵仁甫序》（《小亨集》卷六），对赵复在北方传播南宋理学作了评述：“君始北徙，羁穷于燕。已而，燕之士大夫闻其议论证据，翕然尊师之，执经北面者，二毛半焉。乃撰其所闻，为书刻之，目曰《伊洛发挥》。印数百本，载之南游，达其道于赵、魏、东平，遂达于四方。著雍涒滩十有一月，至于济南。愚虽敬受其书，而所居僻陋，不足以馆君；因病止酒，又不能与君对酌。但日相从游，听其谈辨而已。于其行也，先原仁甫之所学，次祝以敬慎威仪。尊其所学，视兼金之贶则有愧。其于送人以言，则无甚愧焉耳。”实际“战俘”赵复在北方原金源区域有相当的活动自由。

海迷失后元年己酉（1249）

元好问为杨弘道诗集作序。

元好问《杨叔能小亨集引》对刚刚成为过去的金诗时代，作了扼要评定。与金亡前夕结集的《中州集》相比，是从一个具体的诗人视角来透视他所处的时代。

《杨叔能小亨集引》（《遗山集》卷三十六）说：“贞祐南渡后，诗学大行。初亦未知适从，溪南辛敬之、淄川杨叔能，以唐人为旨归。敬之旧有声河南，叔能则未有知之者。兴定末，叔能与予会于京师，遂见礼部闲闲公及杨吏部之美，二公见其‘幽怀久不写’及《甘罗庙诗》，啧啧称叹，以为今世少见其比。及将往关中，张左相信甫、李右司之纯、冯内翰子骏，皆以长诗赠别。闲闲作引，谓其诗学退之‘此日足可惜’，颇能似之；至比之金膏

水碧，物外自然奇宝，景星丹凤，承平不时见之嘉端。叔能用是名重天下，今三十年，然其客于楚，于汉沔，于燕赵魏齐鲁之间，行天下四方多矣，而其穷亦极矣。叔能天资淡泊，寡于言笑，俭素自守，诗文似其为人。其穷虽极，其以诗为业者不变也，其以唐人为旨归者亦不变也。今年，其所撰《小亨集》成，其子复见予镇州，以集引为请。予亦爱唐诗者，唯爱之笃而求之深，故似有所得。尝试妄论之。”见微知著，是本文的观照点。

海迷失后二年庚戌（1250）

元好问为杨鹏（杨云鹏）诗集作序。

杨鹏，一名杨云鹏，字飞卿，号陶然。韩城（今属陕西）人。金末为详议官，金亡，寓居东平。诗名颇著，所作《陶然诗集》，原本未流传至今，《元诗选》三集有《陶然集》，选诗仅19首，是顾嗣立辑佚而成。

《陶然集诗序》（《遗山集》卷三十七）云：“贞祐南渡后，诗学为盛。洛西辛敬之、淄川杨叔能、太原李长源、龙坊雷伯威、北平王子正之等，不啻十数人，称号专门；就诸人中其死生于诗者，汝海杨飞卿一人而已。李内翰钦叔工篇翰，而飞卿从之游，初得‘树古叶黄早，僧闲头白迟’之句，大为钦叔所推激，从是游道日广，而学亦大进。客居东平将二十年，有诗近二千首，号《陶然集》。所赋青梅、瑞莲、瓶声、雪意，或多至十余首；其立之之卓，钻之之坚，得之之难，积之之多乃如此。此其所以为贵也欤。岁庚戌，东平好事者求此集刊布之。飞卿每作诗，必以示予，相去千余里亦以见寄，其所得予亦颇能知之，飞卿于海内诗人，独以予为知己，故以集引见托。”①

入元前后，元好问通过为友人写序跋碑传表达了自己的文学思想，特别是面对沧桑之变的回顾与探索。《陶然集序》与《杨叔能小亨集引》是其中重要篇什。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杨弘道、杨鹏自身在金元之际文坛的地位所致。元好问没有为杨奂文集作序，只是写了一篇神道碑。

刘祁去世。享年四十八岁。

刘祁（1203—1250），字京叔，号神川遁士。浑源（今属山西）人。父

① 《元诗选》三集《陶然集》的小传，几乎全据元好问《陶然集诗序》隐括而成。中华书局排印本《元诗选》小传，“有诗近二千首”作“有《诗述》二十首”。

祖皆仕于金，刘祁自幼随父宦居汴京。弱冠举进士，廷试失利，遂闭门读书。金亡之际，辗转河南山东，又北还故乡，将居室名为“归潜堂”。年逾四十，仕元为山西东路考试官。由征南行台粘合珪聘至相州，居住七年而卒。金亡甫二年，作《归潜志》十四卷，是重要的金代文献。诗文结为《神川遁士集》二十二卷，久无传本，但诗文流传颇广。刘祁《归潜志》与元好问《壬辰杂编》是金末丧乱的实录。《壬辰杂编》亡佚于明，金末史事特别是文学家事迹往往靠《归潜志》获知。

蒙哥汗（元宪宗）二年壬子（1252）

四月五日。杨奂写作《东游记》。

杨奂《东游记》（《还山遗稿》卷上）是本年春三月以来，出游曲阜，谒阙里、访孔林、拜孔庙等活动的纪实。游记从三月十六日抵达东平行台起笔，幕府文人商挺、卢武贤、李桢、句龙瀛等特意为他饯行。此后，杨奂就生活在追思古圣贤的氛围中。他一一寻访了与先圣有关的古迹。文章最后，他说：“读圣人之书，游圣人之里，幸之幸者也。然有位者多以事夺，而无位者或苦力之不足也。况以丰、镐之西，望邹、鲁之远，与南北海之所谓不相及者，何异焉！流离顿挫中有今日之遇，伯达既绘为图，且属仆记之，敢以衰朽辞？勉强应命，将告未知者。”在大乱初定时，杨奂追思古贤是寻找精神皈依的惟一途径。

蒙哥汗（元宪宗）四年甲寅（1254）

二月。随军出征的姚枢，在吐蕃满底城与刘秉忠唱和言志。

这一年，深受忽必烈器重、一直“备顾问”的姚枢，写出了长达21首的组诗《聪仲晦古意廿一首爱而和之仍次其韵》[1]。诗后有姚枢自书跋语：“甲寅春，二月廿有七日，书于吐蕃满底城东北二百里荒山行帐中，为子益

---

① 这21首诗，出自清人顾嗣立的《元诗选》二集《雪斋集》。应是据手迹抄录，但手迹没有流传至今。

恳求故也。敬斋姚枢识。”这组诗是中国文学史的一个“奇迹”：惟一可见的写作于吐蕃满底城并完整保存下来的汉语文学作品。

据《元史·宪宗本纪》记载，元宪宗三年，命忽必烈出征大理。据《元史·世祖本纪》，忽必烈从甘肃临洮首途，穿越吐蕃（即今青海）前往云南大理。九月，至满陀城，并在满陀建立大本营。次年二月，北还途中再次路经满陀。满陀，就是满底，又叫满坦，是吐蕃语地名的音译，今地在青海与云南交界处的群山环抱中。随军出征的有谋士刘秉忠（即聪仲晦）与北方大儒姚枢。抵达吐蕃满底城之前，在满底城东北二百里的荒山野岭的军帐中，为行军“迷途”姚枢始终在苦思冥想，他要面对的除艰苦坎坷的征战，还有对儒家学术传承的反思。他肩负的使命是：将北宋南渡以来就与江南隔绝的北方儒学，纳入正统儒学——理学的范畴。刘秉忠写了一组五言古诗，姚枢应邀和诗 21 首。

姚枢手迹。

在这个组诗中，首先接受了理学的北方儒士姚枢，表达了对世事沧桑的宏观思考，并且坚信可以顺应时代潮流。组诗全文是：

圣圣继天机，授受惟一中。宣尼集大成，玉振条理终。尽性无思勉，中道何从容。乾坤有全德，尚资参赞功。

韦编日三绝，孳孳何所嗜。人道合天心，天人本无二。盈虚消息几，进退存亡事。何当拟虚玄，百世老辅嗣。

观人莫观貌，相马不相肉。群经无释辞，熟读意自足。易道微九师，春秋散公谷。古今有成言，此论非余独。

人皆与时行，吾斯未能信。士子有当忧，忧在不如舜。至哉伊洛传，为发前圣蕴。先儒固所师，未暇穷诂训。

高明悬万象，经纬成纵横。君子动静机，一以踪天行。后来英伟士，概举名书生。胡为事无用，篆刻风物情。

天命日流行，维仁亦无息。君子以自强，兹言致其力。求仁固多方，寸心惟自克。四勿犹勇兵，摧枯破敌国。

任重不易胜，无为鼎折足。小利害成事，不达缘欲速。闭户岂遗世，入仕非干禄。出处贵适时，违时招自辱。

洙泗浸微没，继世承末流。谁能溯渊源，跬步还自留。安宅久旷居，正路奚弗由。知津定何人，接淅吾将求。

夷齐顾名节，不食饿首阳。尚父应天讨，奋时清渭傍。心迹异天壤，日月同辉光。道义有如此，人惟重行藏。

切问复近思，干行求艮止。人道无他焉，仁义而已耳。原始可要终，知生乃明死。伥伥失路人，何当与闻此。

志士慕功业，富贵鸿毛轻。仁人怀道义，不为功业萦。富贵讵可求，功业从自生。狂狷奚所取，无由见中行。

大舜与人同，人心本无恶。未达为善资，凡民曾不若。临深莫为高，见是方知错。出门有余师，刍荛未应薄。

中孚自有喜，无妄从生灾。达人弭忧乐，世俗生嫌猜。短翼登云衢，鹓雏栖草莱。要知庸玉汝，天亦惜良才。

富贵惟润屋，德艺能润身。蓬门信寒寂，道胜生阳春。颜渊百世士，原思千载人。先贤尝有此，吾辈甘常贫。

得鹿未足喜，丧马勿用逐。初萌得失心，方寸成百曲。织人恣物情，熊掌又鱼肉。曾推万祸原，古今从一欲。

美人有硕德，辉光映儒衿。□□□为食，生民以为心。螭蟠久存蛰，岩栖□□霖。忧时恒若疾，不为风雨淫。

有士气凌云，孤松挺高节。壮怀入酣歌，歌长击壶缺。鬓发日以秋，肝肠老于铁。从知养浩然，此意潜□歇。

四海一红炉，焦心待时雨。群生日熬熬，无从求乐土。百拜吁苍天，吁天天未许。亨嘉会有期，此非容力取。

拔茅连其茹，激浊扬其清。云山兴大厦，谅非一木成。嶷嶷万斛舟，水积舟乃行。群材惟柱石，国势何用倾。

旷世少知音，为谁歌白雪。风云重三顾，捐躯轻呕血。考盘在涧阿，永矢心如铁。千秋见钟期，朱弦难遽绝。

天道有定常，推行无少忒。人心复何为，迁□莫能测。古人贵全交，所贵在恒德。黄金百炼余，不改当年色。

刘秉忠《刘文贞集》三十二卷今已不存，今存《藏春集》只有七言近体，没有五言诗，但卷一有两首七律《满坦北边》与《九日满坦山》。所谓“满坦北边”，就是姚枢提到的设在“吐蕃满底城东北二百里荒山”的“行帐”。另外，《永乐大典》卷九〇一，保存有刘秉忠的组诗《古诗泛言》，其中包括121首五言诗，仅从存诗篇数来说，是元人组诗之最。从用韵分析，在前往满底途中姚枢所和就是这组《古诗泛言一百二十一首》。从未为论者提及的《古诗泛言一百二十一首》，也是这次漫长坎坷征途的思想结晶。与耶律楚材、丘处机在河中情况相近，有同调同行，对刘秉忠、姚枢都是难得的好事。从文化背景看，他们一释一儒，并不一致，但深刻思想正是产生于摩擦碰撞之中。

“二妙”的兄长段克己去世。享年五十九岁。

段克己（1196—1254），字复之，号遯庵。本贯河东，世居绛州稷山（今属山西）。段成己之兄。自幼兄弟并有才名，受到礼部尚书赵秉文（赵闲闲）赏识，目为“二妙”，还为其居里大书“双飞”二字。又称为“稷山二段”或“河东二段”。段克己在金末以进士举，金亡，与其弟避地隐居龙门山。段成己是金哀宗正大年间进士，授宜阳主簿。克己死后，成己迁居晋宁（山西临汾）北郭，闭门读书，足不出户。元世祖降玺书，即其家起为平阳儒学提举，辞不赴。优游以终。除在《河汾诸老诗集》之中各占一卷（卷六、卷七），段氏兄弟有合集《二妙集》八卷。

蒙哥汗（元宪宗）五年乙卯（1255）

元廷屡次征召杜仁杰，均不赴。

杜仁杰，字仲梁，号止轩。原名杜之元，字善夫。济南长清（今属山东）人。《太和正音谱》评其词“如凤池春色”。金末，与麻革等人隐居山中，以诗唱和酬答。麻革《送杜仲梁东游》诗云：“商岩不足稽此士，又欲东略宋与梁。”元好问与之相交较深，在送杜善夫出山诗中说：“青眼高歌望

君久。”入元后，屡徵不起，隐逸以终。

杨奂卒于家，享年七十岁。

杨奂（1186—1255），字焕然，号紫阳。乾州奉天（陕西礼泉）人。金末，举进士不第，作《万言策》指陈时病，未上而归，教授乡里。元太宗九年（1237）以儒生就试东平，两中赋论第一。耶律楚材荐为河南路征收课税所长官，兼廉访使。到任有治绩，时论归之。在官十年，请归老，生前受到在潜邸的忽必烈器重。卒于家，赐谥文宪。杨奂博览强记，作文务去陈言，以蹈袭古人为耻。与人言不离名教，时有“关西夫子”之谓。朝廷耆宿皆折行辈与之交往。所著《还山集》六十卷（卷数从《元史》本传）行于世，今不存。现存《还山遗稿》二卷，是明人所辑遗作。有《天兴近鉴》三卷、《正统书》六十卷，俱不传，《山陵杂记》一卷，今存。

元宪宗六年十月，元好问撰《杨公神道之碑》（全名《故河南路课税所长官兼廉访使杨公神道之碑》，《遗山集》卷二十三），将杨奂视为文学从金向元过渡的代表人物，他说:“初，泰和、大安间，入仕者惟举选为贵科。荣路所在，人争走之。程文之外，翰墨杂体悉指为无用之技。尤讳作诗，谓其‘害赋律尤甚’。至于经为通儒,文为名家,不过翰苑六七公而已。君授学之后,其自望者不碌碌。举业既成,乃以余力作为诗文,下笔即有可观。”

蒙哥汗（元宪宗）六年丙辰（1256）

耶律铸将家中珍藏的《李贺歌诗编》重刊于燕京。

赵衍《重刊李长吉诗集序》（《四部丛刊》本《李贺歌诗编》卷首）云：“双溪中书君诗鸣于世，得贺最深，尝与龙山论诗及贺，出所藏旧本，乃司马温公物也，然亦不无少异。龙山因之校定，且曰：喜贺者尚少，况其作者耶？意欲刊行，以广其传，冀有知之者。会病不起，余与伯成绪其志而为之。此书行，学贺者多矣，未必不发自吾龙山也。丙辰秋日碣石赵衍题。”这段文字写明《李贺歌诗编》的刊刻经过。“双溪”，指耶律铸。“龙山”，则是吕鲲[1]。“伯成”，姓孙。论诗者历来认为重视李贺与李商隐，是元诗特点之一。

[1] 《四部丛刊》本《李贺歌诗编》卷末有清人何焯（义门）的跋，何焯说：“金刘仲尹，字致君，盖州人。有《龙山集》。”以为“龙山”是刘仲尹。此说不妥。吕鲲与耶律铸交往密切，而且为《双溪醉隐集》作序。

耶律铸据家藏北宋名臣司马光旧藏的李贺诗集，重新校勘《李贺歌诗编》，使这一特点的源头上溯到金元之际的北方诗人之间。

赵衍，北平人。金末进士。据《元史》卷一八〇《耶律希亮传》，元宪宗六年时，元宪宗曾派遣耶律铸核钱粮于燕京，耶律铸说："臣先世皆读儒书。儒生俱在中土。愿携诸子至燕受业。"宪宗从之。于是，耶律铸让自己九岁的儿子耶律希亮师事"北平赵衍"，"未浃旬，已能赋诗"。这篇《重刊李长吉诗集序》正写于本年。所以这两件事——教授耶律希亮与重刊《李贺歌诗编》必有联系。直到至元五年，耶律铸请宋子贞为耶律楚材撰写神道碑时，依据的就是赵衍为耶律楚材写的"行状"[①]。而赵衍与耶律氏家族的联系也发端于此。

蒙哥汗（元宪宗）七年丁巳（1257）

元好问去世，享年六十八岁。

元氏源出于北魏拓跋氏，是中国北方来历久远的家族之一。其父元德明终身隐居，未仕于金，以诗文自娱。元好问生当金元之际。但实际上他与南宋的"四大诗人"年辈相差不大。元好问的生卒年大致与刘克庄（1187—1269）相当，元好问活跃于金代文坛时，江南正是江西诗派与江湖诗派互相渗透的时期，刘克庄以其《江西诗派小序》为江西诗派"排座次"，但同时自己又是最大的江湖派诗人。元好问对苏轼、黄庭坚的尊重，与他不肯拾江西派诗人牙慧，都说明他的眼界迥出流辈。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山西忻州）人。早年随做官的叔父在金朝治下宦游各地，曾受教于古文家路铎、学者郝天挺。金宣宗兴定五年（1221）进士，但未赴吏部选，往来于箕、颍间；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中博学鸿词科，授儒林郎、权国史院编修。正大三年任镇平令，历内乡令、南阳令，又调尚书省左司都事。从大安三年（1211）起，蒙古成吉思汗启动了攻灭金的战争。这一年秋高马肥之际，成吉思汗亲自挥师南下，一战便使金朝统帅纥石烈的30万劲旅溃不成军，元好问中博学鸿词科的前一年，金重镇凤翔在成吉思汗得力助手木华黎国王[②]指挥下，被围攻了

---

① 见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元文类》卷五十七)。

② 木华黎（1170—1223），蒙古开国的"四杰"之一，1212年封为"太师国王"，主持对金与中原地区的战和事务。

40多天，仍然固若金汤。同时，金向南宋求和，以避免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是一边倒的“围猎”，在蒙古骑兵的锋镝下，金以难以想像的坚忍不拔，居然坚持了20多年。金亡之际崔立兵变，用保全生灵为由，以金皇族为代价挟汴京投敌，事后有人竟要求为其立碑歌功颂德，元好问被动与其事，这使他受到时人责难①。一度在遗民之中处境不佳。据说元好问晚年，在藩邸的元世祖忽必烈闻其名，拟“以馆阁处之”，但“未用而卒”②。他的诗词文章是北方公认的泰斗，特别是诗，影响广泛深远。有《遗山集》四十卷、《遗山乐府》五卷传世。《元诗选》初集，选入其诗445首，是全书之冠。著有笔记《续夷坚志》四卷（别本二卷）。此外，编辑《中州集》十卷，成书于金亡前夕，长期以来是金诗史的惟一史源，如果没有这本书，今天难以能言及金诗甚至金代文学。他还将金词辑成《中州乐府》一卷，附《中州集》以行。此外，据记载曾著《杜诗学》一卷、《东坡诗雅》三卷、《锦机》一卷、《诗文自警》十卷以及《南冠录》《壬辰杂编》《金源君臣言行录》等，都未见传本。

——蒙哥汗（元宪宗）九年己未（1259）——

忽必烈南征路过彰德，召见杜瑛。

金朝将亡，杜瑛避地河南缑氏山中，读书讲学，隐居不出。战乱期间，他一度辗转于汾晋间，中书粘合珪开府于相州，杜瑛应其聘请，到相州居住。金亡后，文物凋零，典籍散失，他注意搜访、保存文献。后迁居彰德。元宪宗九年，忽必烈南征路过彰德，召见问计，颇感意外地说：“儒者中乃有此人乎！”

---

① 崔立以城降元，代价是驱杀金皇族殆尽，但未曾想到他自己的家也被蒙古骑兵劫掠一空。当时汴京城内气氛紧张，省廷每日杀人，那主要是崔立在迫害不附己者。崔立想以立碑为其遮丑，元好问被迫参与其事。金亡后，曹居一（字通甫，又字听翁）写了一首诗，将为崔立立碑时，因一时找不到上好的石材，便把宋徽宗所立《甘露碑》原文刊磨光，重新刻上为崔立歌功颂德的碑文一事，钉上了耻辱桩，事见刘祁《归潜志》卷十二《录崔立立碑事》。因为关系到自己，元好问在《外家别业上梁文》之中曾特意为之剖白。这个“立碑”事件动因、经过颇复杂，牵涉的人也较多，郝经《陵川集》卷八《辨磨甘露碑》说“作诗为告曹听翁，切莫独罪元遗山”。“切莫独罪”，这就比较客观了。

② 《元诗选》初集元好问小传。





【元世祖】



建元：中统（四年），至元（三十一年）



中统元年庚申（1260）

郝经与友人阚举探讨诗学，作《与阚彦举论诗书》①。

在《与阚彦举论诗书》（《陵川集》卷二十四）中，郝经针对起自社会底层、有能诗之名的阚举（字彦举）提出尖锐批评。他开篇即说："经白：昨得足下诗一卷，瑰丽奇伟，固非时辈所及。然工于句字而乏风格，故有可论者。……呜呼！自李杜苏黄，已不能越苏李，追三代，矧其下乎？于是近世又尽为辞胜之诗，莫不惜李贺之奇，喜卢仝之怪，赏杜牧之警，趋元稹之艳。又下焉，则为温庭筠、李义山、许浑、王建，谓之晚唐。轰轰隐隐，啅噪喧聒，八句一绝，竞自为奇，推一字之妙，擅一联之工，呕哑嚼拉于齿牙之间者，只是天地风雷，日月星斗，龙虎鸾凰，金玉珠翠，莺燕花竹，六合四海，牛鬼蛇神，剑戟绮绣，醉酒高歌，美人壮士等。磨切錙铢，偶韵较律，斗饤排比而以为工，惊嚇喝喊而以为豪；莫不病风丧心，不复知有李杜苏黄矣，又焉知三代苏李性情风雅之作哉！足下之作，不为不工，不为不奇，殆亦未免近世辞人之诗。愿熟读三百篇及汉魏诸人。唐宋以来，只读李杜苏黄，尽去近世辞章，数年之后，高咏吟台之上，则必非复吴下阿蒙矣。经再拜。"

这篇诗论，郝经针对的是当时风行的粗豪诗风，对"症结"痛下针砭，

① 郝经《与阚彦举论诗书》未注写作年月。但郝经在本年四月即出使南宋，直到十多年后才回来，回来不久就去世了。所以《与阚彦举论诗书》必作于中统元年四月前。同时，王恽在中统元年冬曾与阚举有交往，可知中统元年阚举在大都。故系于此。

并对症下药提出“医治”方略。它的意义在于指出“辞胜之诗”与“斗饤排比而以为工，惊嚇喝喊而以为豪”，同是诗人的误区。据此，可以看出诗坛风向所指，等于为元诗调音定调。在诗论中，针对性之明确，批评之尖锐，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阚举，字彦举，号函谷道人。陕西人。早年为里啬夫，不解文字。一日忽能做诗，吐语阔大怪奇。客居京师十余年，不遇而卒。王恽将其与员炎并论，在《员先生传》（《秋涧集》卷四十九）的后半部分对阚举有形象描写。在元初诗坛，员炎与阚举是主流之外的诗人的代表人物。

大都曲坛名家辈出。王和卿因赋大蝴蝶，声名益著。王和卿是关汉卿的友人，两人均以风流高才，影响一方。

《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三“嗓”节）提到：“大名王和卿，滑稽挑达，传播四方。中统初，燕市有一大蝴蝶，其大异常。王赋〔醉中天〕小令，由是名益著。时有关汉卿者，亦高才风流人也。王常以讥谑加之。关虽极意还答，终不能胜。”

王和卿，作为曲家时名颇大，《录鬼簿》不同版本或称为“学士”[①]（天一阁本），或称为“散人”（孟称舜本）。当是书会才人，并未入仕。年辈与关汉卿相当，交往密切，去世则在关汉卿之前。其〔醉中天〕《咏大蝴蝶》是流传较广的元曲名篇。今存散曲有小令 11 支，套曲 1 套（据《全元散曲》）。

元人熊梦祥《析津志》，有关汉卿传记[②]：

> 关一斋，字汉卿。燕人。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是时文翰晦盲，不能独振。淹于辞章者久矣。

元代文献中，关于关汉卿的记载不多，而且颇不一致。这是地方史志中的关汉卿。显然，中统初期的大都文坛是关汉卿、王和卿活跃的场所。

四月十日（丁未）。郝经率领四十人的使团出使南宋。

《元史·世祖本纪》：四月丁未，“以翰林侍读学士郝经为国信使，翰林

---

① 在这里的“学士”不是官称，而是尊称，类似于现在的“老师”。

② 《析津志辑佚》（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第 147 页。《析津志》是北京的地方志，由元人熊梦祥编著。孙楷第《元曲家考略》说，《析津志》的人物小传，则是元人梁有撰写。

待制何源、礼部郎中刘人杰副之，使于宋。”

从此，郝经一去无归，而且十六年间音信全无。两个副使何源、刘人杰更不幸：此后再无任何记载。南宋扣押郝经使团，看似毫无理由。他们并不负有任何特殊使命，也未涉及机密。40人（经过自然减员，最后是38人）一押十六年，光这就所费不赀，更不用说影响两国关系，特别是当时蒙古强，南宋弱。蒙古汗廷倒是从未忘记郝经使团。中统二年五月——郝经出使一年不回并毫无音信之后，又“遣崔明道、李全义为详问官，诣宋淮东制司，访问国信使郝经等所在。仍以稽留信使、侵扰疆埸诘之。”中统四年二月，“以王德素充国信使，刘公谅副之，使于宋，致书宋主，诘其稽留郝经之故。”[1]看来，不能说是贾似道一手遮天，只能得出南宋君主早就无心理政的推论。

七月。王鹗请修辽金史。

据《元史·世祖本纪》，王鹗同时建议：“今宜拜除学士院官，作养人才。乞以右丞相史天泽监修国史，左丞相耶律铸、平章政事王文统监修辽金史，仍采访遗事。”元世祖“并从之”。而真正开始修辽金史，已经是八十多年以后。

冬。王恽与阚举相见于燕市酒楼。

阚举是诗坛另类。王恽《员先生传》（《秋涧集》卷四十九），对自己与阚举的交往，特别是对阚举其人的印象做了如下记述：“阚举，字彦举。亦陕人。面黯惨，目光迷离，殆鬼物凭者。少为里啬夫。初不解文字。一日，忽能作诗，吐奇怪语，皆古人所未经道。虽苦无义意，其豪侈诡异，时辈属和，终不能及。中元冬，见余于燕市酒楼。殊寒素，浮大白数行，径步出炉间，嘤嘤然吻作露蚓声，欻跃来扼余腕，忻甚，曰：‘吾有以赠子。’其诗有‘气凌太华五千仞，诗绕国风三百篇’之句，醺酣中惜不全忆也。尝谒得楮币若干，醉过里井，即投其中，曰‘为尔俾予，区区若此，奚用为?’其狂易如是。后客死保塞（按：保塞，指清苑县），殡西南门外，路北若干步。揭曰‘诗人阚某墓’。诗三卷，号《函谷道人集》。好事者刊行于世。”[2]

王恽《员先生传》是元人传记中颇成功的一篇，因为传主就非同常人。通过他的描写，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员先生”，指员炎。在这里，王恽是将阚举视为员炎的同调。《函谷道人集》三卷，未见传本。郝经《陵川

---

① 均见《元史·世祖本纪》。

② 这段文字，原文多有脱误，孙楷第《元曲家考略》作过节要。此据《全元文》第6册第365页《员先生传》所作的校勘。

集》（卷二十四）有《与阚彦举论诗书》。作为元曲家，《录鬼簿》卷上列阚举之名于“前辈名公”节。鲜于枢《困学斋杂录》对阚举的描述是:“性嗜酒，工于诗。客京师十余年，竟流落以死。同时有郑云表者，慕彦举之为人，作诗挽之云：形如槁木因诗苦，眉锁苍山得酒开。人以为写真云。”同时，鲜于枢还说：“诗人阚举有诗集行于世。今得佚诗数篇，信手录之。”所录诗共5首。这几乎就是阚举流传至今的全部作品。

阚举与后来的何失，属于元初北方（大都）诗坛的一部分，不同于馆阁诗人，不同于寓居京师的文人，甚至也不同于“河汾诸老”“封龙山三老”。阚举、员炎出自社会底层，形迹近似游侠。诗是他们生活的组成部分，他们的幸运在于，不但当时在诗坛有一席之地，而且作品流传至今，不是“影子”诗人。

李俊民去世。享年八十五岁。

李俊民（1176—1260），字用章，号鹤鸣老人。泽州（山西晋城）人。金章宗承安五年（1200）状元，授翰林应奉，不久弃官授徒为生。金宣宗南迁，隐于嵩山、鸣皋山，又北渡客居覃怀，不久潜入山西，皆为避蒙古兵锋。元世祖在潜邸，以刘秉忠荐其精于术数，曾召问休咎，后皆应验，颇信从之。卒，赐谥“庄靖先生”（或作“庄静先生”）。有《庄靖集》十卷行世。

中统二年辛酉（1261）

五月。元廷设立翰林院。

元世祖于上都诏立翰林院，王恽是翰林院首批成员之一。王恽《玉堂嘉话》纪事，就从中统二年夏五月开始。至元元年，又设立了翰林国史院。

金元之际以来，元好问首倡正学，麻革、张宇、陈赓、陈庾、房皞、段克己、段成己、曹之谦等与之游于河汾之间，人称“河汾诸老”。

“河汾诸老”在这一时期对北方文坛产生较广泛影响。“河汾诸老”共八人，其中除“二妙”中的段克己去世较早外，其他七人是：

段成己（1199—1279），字诚之，号菊轩。本贯河东，世居绛州稷山（今属山西）。段克己之弟。金哀宗正大年间举进士，授宜阳主簿。金亡与兄同隐。克己死，成己迁居晋宁（山西临汾）北郭，闭门读书，足不出户。元

世祖降玺书，即其家起为平阳儒学提举，辞不赴。优游以终。诗存《二妙集》与《河汾诸老诗集》。

房皞[①]（1199—?），字希白，号白云子。平阳（山西临汾）人。金末与元好问、杨弘道等游。因避兵隐居卢氏山中。金亡之前，曾南下流寓南宋境内的荆楚，曾隐于庐山。正大五年（1228），客居樊城等地。后北归故土，隐居以终。有《白云子集》，今不存。顾嗣立说，其诗“多别致，造语亦新”（《元诗选》小传）。《河汾诸老诗集》卷五存其诗31首。

张宇，字彦升，号石泉。平阳（山西临汾）人。河汾诸老之一。《河汾诸老诗集》卷二存其诗21首。

麻革，字信之，号贻溪。临晋（山西临猗）人。金正大年间，与张澄、杜仁杰等隐居河南内乡山中，日以吟诗为业。金末为太学生，汴京围城期间陷于城中。金亡，从雁门关越代岭，避处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旗）。蒙古太宗十一年（1239）赴试武川，归途，访刘祁于浑源，并登览龙山。隐居教授以终。他与房皞等在金亡国前后的经历颇具代表性。有《贻溪集》二十卷，未见传，《河汾诸老诗集》卷一存其诗35首。元好问作《麻杜张诸人诗评》（《遗山集》卷三十九），对麻革诗评价颇高。

陈赓（1190—1274），字子飏，号默轩。猗氏（山西临猗）人。与其弟陈庾、陈膺齐名，元好问称为“三凤”。金崇庆中，为避河南乱，奉亲寓居华阴，后又买田洛西，与辛愿、元好问、杨奂、姚枢等讲学于洛西书院。正大初，携其弟陈庾至汴京，与一时名士赵秉文、麻九畴等游，曾伏阙上书，乞斩丞相高汝砺。正大末以父荫入仕，为蓝田子午镇酒监，改陕州盐场管勾。金亡，荐为帅府经历，辟解盐司判官，历河东两路宣慰司参议。至元二年辞归。著有《默轩集》二十卷、《坞西漫录》十二、《嵩隐谈露》五卷、《敝帚集》十卷，均不存。《河汾诸老诗集》卷三存其诗20首。

陈庾（1194—1261），字子京，号澹轩。猗氏（山西临猗）人。陈赓之弟。早年与同郡赵定、刘绘、张澄并称“四秀”。曾客居青州，出游汴京时，翰林学士赵秉文、杨云翼先后引荐，未果。与元好问、杨奂、麻革、杜仁杰、商挺等名士交往密切。兴定四年（1220），隐河南卢氏山中。正大间举经义进士。金末兵乱，转徙无常，后应平阳高鸣邀请，署郡学教授。中书令耶律铸奏置经籍所于平阳，命陈庾领校雠事。元宪宗四年（1254），忽必烈徵至六盘山，与语大悦。中统初，荐授平阳路提举学校官。有《经史要论》三十卷、《三代治本》五卷、《唐编年》二十卷、《澹轩文集》三十卷，均不存。

① 房皞，又作房颢、房灏。

旭烈兀（又名旭烈）是成吉思汗之孙、蒙哥之弟。公元1253年至1259年统帅蒙古大军第三次西征，攻灭今地在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地的地方政权，元宪宗九年（1259），常德奉蒙哥汗之命从和林汗廷出发，前往西亚探望旭烈兀。次年冬天返回和林覆命。往返共十四个月。几年后，刘郁依据常德的回忆，写出中西交通史名著《西使记》[①]，记述了此行的见闻。《西使记》完稿一年后——至元元年，旭烈兀被封为伊尔汗，建立了位于西亚与中亚的伊尔汗国。



这是元特别铸造的、发给伊尔汗国的钱币“伊藩吉昌”。这不是通用的货币，只是“吉语钱”——供吉庆场合发放。

蒙古汗廷重申：对于“通文学”的儒士，给以优待，免除差役。这个政策没有前提，“驱口”与居民一视同仁。

《通制条格》（卷二《户例》节）著录了当时颁布的如下政令：

> 中统四年，分拣过儒人内，今次再行保勘到委，通文学依旧免差。不通文学者，收系当差。
>
> 中统四年不经分拣，附籍儒人，或本是儒人，壬子年（元宪宗二年，1252）别作名色附籍，并户头身故，子弟读书。又，高智耀收拾到驱儒，仰从实分拣，委通文学者，依例免差；不通文学者，收系当差。外诸色人户子弟读书深通文学者，止免本身差役。

这等于是对江汉先生赵复遭际的解答。

元初，“通文学”的儒人，实际上是与工匠以及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教士，享有一样的待遇。算不上优待，但在蒙古崛起的12世纪至13世纪，已经是给予被征服地区民众的礼遇了。“通文学者”上一个档次是“深通文学者”，两者都包括在“儒人”与“附籍儒人”里，而“驱儒”则属于“驱口”的一部分，这个区别是元代仅有的[②]。

---

① 《西使记》版本较多，最早见于元人王恽《玉堂嘉话》。校注本有王国维的《古行记校录四种》本以及丁丙的《西使记地理考证》。

② 在本书泰定四年进士赵期颐的记事之中，关于原南宋“庐州通判胡某”的遭际，对“驱口”与“驱儒”的处境有形象说明。

至元元年甲子（1264）

九月一日（朔）。元廷始立翰林国史院。

终于元朝，翰林国史院的影响有限，但翰林国史院的设立仍然对于文人们具有号召力。

大都从元朝的行政枢纽，逐渐转化为文化中心。文坛不但人物荟萃，而且对社会风气影响深刻。

李庭《送荆干臣诗序》（《寓庵集》卷五）通过评论诗人荆干臣，进一步对大都的文化氛围作了介绍："干臣家世东营，虽生长豪族，能折节读书。自幼游学于燕，夫燕，诚方今人物之渊薮也。变故之后，宿儒名士往往而在，干臣日夕与之交，得以观其容止，听其议论，切磋渐染，术业愈精。一旦崭然见头角，遂为明天子所知……出使万里之外。"在中统、至元年间，大都不但有原金朝的社会名流以不同身份出入，而且南宋的"战俘"赵复也安置于此。元世祖不断在辇下拔擢人才，是大都文学界相当活跃的推动力之一。而荆干臣于至元十一年随军出征日本，是元代文学家"出使"并走出国界的例证。

至元二年乙丑（1265）

李冶被元世祖任命为学士，但在职仅期月就辞归。

李冶是金元之际北方著名的隐士、诗文家，"封龙山三老"之一。李冶，一些文献又作李冶，原名应该是李治[1]，人元更名李冶。

李冶（1192—1279），字仁卿，号敬斋。真定栾城（今属河北）人。早年登金朝进士第。任钧州知州。蒙古大军压境，城溃，李冶微服出逃，流落民间。元世祖在潜邸，听到他的贤名，召见询政。李冶据实对答，很受元世祖赏识。晚年迁居元氏县，买田封龙山下，从学者益众，与元好问、张德辉并称"封龙山三老"（"龙山三老"）。元世祖即位，想置以清要之职，李冶

① 《元人传记资料索引》（第1册，第464页）认为，李冶其兄李澈，其弟李滋，名字偏旁皆从水，所以李冶原名应是李治。此从其说。

以老病恳求还山。本年授以学士之职，就职期月，辞还故山。卒年八十八岁。李冶与元好问声名相当，两人又多有唱和之作，世人以“元李”并称。所著《敬斋文集》四十卷，已不传。另著《测圆海镜》十二卷、《益古演段》三卷，均存；《敬斋古今黈》四十卷，原书久佚，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八卷。

郭昂上书言事，受到权臣廉希宪的赏识，因之走上仕宦之途。

为此，郭昂感激万分，写了两首《寄呈廉平章》，诗中说“百金止乏求虚誉，一死惟当报大恩”①。

郭昂，字彦高，号野斋。林州（河南林县）人。早年喜弯弓驰马，长于刀槊骑射；稍通经史，尤喜读兵书。在以后的平定江南的阶段，他一直在林莽山区征战，写出大量诗篇。他的诗与他的功绩，则不大为人所知。

至元三年丙寅（1266）

刘因出游燕京，作《横翠楼赋》。

《横翠楼赋》（《刘文靖集》卷一）的序中，刘因说：“金台雄壮甲天下，而山水人物为最也。”在一次登临览胜时写了这首赋。作为早期元赋，对以后写京师风光的作品如黄文仲《大都赋》（《天下同文》卷十六）、陈栎《燕山八景赋》（《定宇集》卷一）等，有一定影响。

至元四年丁卯（1267）

以杨时煦为兴文署丞校雠，但未赴职。

兴文署是集贤院的下属机构，掌管国子生的饮膳以及文字簿书之事。

杨时煦（1208—1271）②，字春卿，号庸斋（一作慵斋），又号采亭。蓟

① 见《诗渊》第589页。

② 杨时煦，魏初《青崖集》卷五《庸斋先生哀挽诗引》作杨时照，误。卒年，据《玉田杨先生哀辞》“先生殁矣，后五年”为至元丙子；生年，据《析津志辑佚·名宦》，杨时煦享年六十四岁推知。

州玉田（今属河北）人。早年家贫，金末曾避居河南，金哀宗壬辰北渡后，寓居燕京，教授生徒二十余年。因好客，素有“布衣孟尝君”之称，时名颇大。入元，奉命提举河间常平事，改卫辉劝农使，未几谢去。享年六十四岁。有诗千余篇，为世人所重。在金元之际，他是大都闻人，与“河汾诸老”“封龙山三老”等遗民齐名，刘因自幼就与其互通问讯，商挺、李庭、魏初等均相当推崇他。所作散佚，今存诗仅数篇，以至金元文学史均无其名。

至元五年戊辰（1268）

宋子贞为耶律楚材撰写神道碑。

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元文类》卷五十七）是在耶律楚材安葬（中统二年十月）之后七年，依据“进士赵衍”撰写的行状所作。这是元人碑传的典范，其中丰富生动的细节描写已经是传记文学的轨范，也成为后世认识耶律楚材以及耶律楚材所处时代的重要史料。比如关于是否屠汴梁城的争论，在神道碑中写道：“汴京垂陷，首将速不台遣人来报，且言此城相抗日久，多杀伤士卒，意欲尽屠之。公驰入奏曰：‘将士暴露凡数十年，所争者，地土人民耳。得地无民将焉用之？’上疑而未决，复奏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实之家，皆聚此城中，杀之则一无所得，是徒劳也。’上始然之，诏除完颜氏一族外，馀皆原免。”又比如写道：“奥都剌合蛮奏准事理，令史若不书填，则断其手。公曰：‘军国之事，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与焉？事若合理，自是遵行。若不合理，死且不避，况断手乎？’因厉声曰：‘老臣事太祖、太宗三十余年，固不负于国家，皇后亦不能以无罪杀臣。’后虽怨其忤己，亦以先朝勋旧曲加敬惮焉。”读之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这些内容给人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从一开始它们的意义就被“放大”了。

宋子贞，字周臣，号鸠水野人。潞州长子（今属山西）人。金时入太学，入元，在东平严实、严忠济父子幕，任详议官兼提举学校。元太宗七年（1235），改行台右司郎中。中统元年授益都路宣抚使。至元二年，任翰林学士，参议中书省，迁中书平章政事。至元三年致仕，享年八十一岁。有诗文名，但所作多已散失。所以《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对于耶律楚材与宋子贞同样重要。

至元六年己巳（1269）

正月十四日（庚申）。杨果以参知政事出任怀孟路总管。

怀孟路在至元前期有特殊的地位，它既是南下攻宋的起跳踏板，也是南宋情报的集散地，又是金源文化的潜藏所。怀孟路总管是一个繁剧并艰难的位置。

杨果（1197—1271），字正卿，号西庵。祁州蒲阴（河北安国）人。早年以授徒为业，十多年间流寓各地。金正大元年（1224）进士，参政李蹊荐为偃师令，历任蒲城、陕县县令。金亡，起为经历。史天泽经略河南，以杨果为参议。元世祖中统元年，命杨果为北京宣抚使，次年拜参知政事。至元六年出为怀孟路总管。在怀孟，与曲家白朴、奥敦周卿等优游唱和，白朴有〔木兰花慢〕词，词序是："覃淮北赏梅，与参政西庵杨丈和奥敦周卿府判韵"。后以年老致仕，卒于家。谥文献。杨果工文章，尤长于乐府。外若沉默，内怀智用，善谐谑，常使闻者绝倒。有《西庵集》行世，已不存。杨果是元初期曲家，《录鬼簿》列其名于"前辈名公"节，《太和正间谱》评其词"如花柳芳妍"。贯云石《阳春白雪序》以"平熟"代表杨果散曲的艺术风格。

五月。陈祐路经"单父琴堂"（即琴台）时写了四首诗，题于城北的琴堂遗址，并模刻上石。这就是"琴堂诗刻"系列之一。

陈祐写的诗是《单父道中》与《琴堂书事》，后者共三首：

> 四郊麰麦接云平，绿野人家晓又耕。怪得公堂民讼简，里闾元有读书声。
>
> 前杨后马宇民心，只与先贤间古今。巫宓英灵如有在，九原应喜得知音。
>
> 鸣琴闲暇戴星忙，秋菊春兰各自芳。珍重邑人怀旧德，殷勤为筑二公堂。①

诗后有题记："予按部东鲁，及于此州，作是四诗，以实所见云。嘉议大夫、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使、赵郡陈祐庆父，题于北城之琴堂。偕行者，历下士

① 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48册。

人李衎侃甫、张斯立可与。至元六年夏五月十有三日也。”题诗上石，是为了传之久远。所谓“琴堂”或“琴台”，是单父县古迹，源自《论语·公冶长》“宓子贱治单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在至元前期，“琴堂诗刻”（一名“琴台石刻”）颇著名，当时文人缅怀先秦宓子贱“鸣琴治县”，有深切内涵。

历尽战乱，为避蒙古锋镝由金赴宋，由宋又还归家山，八十三岁高龄的杨弘道寓居山东益都，并赐号“处士先生”。

杨弘道[1]（1187—?），字叔能，号素庵。淄川（今属山东）人。十一岁时，父母相继去世。金末，补父荫，但未赴职。与元好问、刘祁、杨果以诗知名于时。金宣宗兴定末年赴京师，以《幽怀久不写》及《甘罗庙》二诗受达官称赏，并与元好问结识。正大元年（1224）尝监麟游酒税。蒙古攻灭金朝的战乱期间，避走南宋治下的襄阳，于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任襄阳府学教谕，次年摄唐州司户。但任职仅三个月，唐州又为蒙古大军所占，守将弃师宵遁。与此同时，杨弘道自唐州北还故里，从此再未出仕。至元初，寓于益都，赐号“处士先生”。延祐三年追谥文节。杨弘道亲身经历了元攻灭金的战乱，又曾仕于宋，平生流离南北，身世坎坷。他写诗号称以唐诗为旨归，五言古诗有汉魏遗风，律诗风格高华。有《小亨集》十五卷，已不存。清乾隆时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小亨集》六卷，在文学史上重新为他设置了一席。赵秉文甚至将他的诗比做“金膏水碧，物外自然奇宝，景星丹凤，承平不时见之嘉端。”（元好问《小亨集序》）与前期所作相比，时人曾批评他于金亡后北还故里以来所写的诗“澹不可读”（鲜于枢《困学斋杂录》）。实际是他的心境诗情已经化解在这北上南下之间。

杂剧作家李潜夫于此前后在世。

李潜夫，字行道，一字行甫。绛州（山西新绛）人。至元年间在世，生平事迹无考。李潜夫是著名元曲家，《太和正音谱》列名于俱是杰作一百五十人中。所作杂剧仅存一部，即《包待制智勘灰阑记》（简称《灰阑记》）。《包待制智勘灰阑记》是影响极大的元杂剧，有法、德、日等文字的译本，德国著名戏剧家布莱希特据其改写的《高加索灰阑记》是世界戏剧的经典。

---

① 杨弘道，清人避讳作杨宏道。

至元八年辛未（1271）

三月。许衡以老疾辞去中书机务，出任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监祭酒。

《元史·世祖本纪》："许衡纳还旧俸，诏别以新俸给之。命设国子学，增置司业、博士、助教各一员。选随朝百官近侍蒙古、汉人子孙及俊秀者充生徒。"在国子监，许衡亲自教授过数届蒙古色目与汉人子弟，其中不乏俊杰之士。实际就是在国子监的位置提升了许衡在北方学坛的名望。

十一月。蒙古正式改国号为"大元"。

元世祖忽必烈采纳谋士刘秉忠建议，取《易》"大哉乾元"之意，建国号为"大元"。在这之前，蒙古以"大朝"为国号。同时，采纳刘秉忠、王磐、徒单公履等建言："元正、朝会、诏敕及百官宣敕，具公服迎拜行礼。"并废除了金《泰和律》。这些举措，特别是以元为国号，是蒙古"进入"中国正史体系的标志性步骤。

至元九年壬申（1272）

赵良弼出使日本，历时一年使还，作《日本纪行诗》，是较早的一种将视野延展到域外的纪行作品集。

赵良弼是至元前期关于高丽、日本的事物的专家。至元八年，赵良弼以秘书监身份代表元朝出使日本，在日本滞留一年，其间一再受到南宋、高丽、耽罗等国使臣的干扰，几遭不测。在其身后，后人将赵良弼诗百数十首结为《樊川集》，姚燧为之作《赵樊川集序》①，但《樊川集》未见传。张之翰《题赵樊川日本纪行诗卷》（《西岩集》卷九）序云："公弼御史以樊川先生《日本纪行诗》见示，三复之余，使人心移神动，如亲在其洪涛绝岛中。然

① 姚燧《赵樊川集序》，见《牧庵集》卷三，但这篇文章错讹颇多，几乎不能卒读，《牧庵集》除《武英殿聚珍版书》本，又无别本可校勘。据《赵樊川集序》，仅知此集存诗百数十首，是其去世十八年之后由其"中子"所编。《元人传记资料索引》中，未提及赵良弼与"樊川"有关涉，笔者将"赵樊川"判为赵良弼，一是据《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一所载赵良弼事迹；二是据魏初《青崖集》卷一《赵樊川》诗说"赵樊川"是赞皇人，曾在陕西任职；三是《赵樊川集序》所说的情况与赵良弼吻合。

叙事之工，写物之妙，皆从大手中来。苟非名节素重，忠义不屈，其于使远方，历殊俗，将危疑倥偬之不遐，又安能出此语耶?”赵良弼从不以能诗知名，在日本期间写的纪行诗也没有流传至今，但至元初期诗人与诗走出大陆，亲历异域，毕竟是文学史大事。

关于元史名臣赵良弼，更有名的是他与元世祖忽必烈的一次对答①：

> 圣主尝问佥院赵良弼：“高丽小国，匠人棋人皆胜汉人。至于儒人通经书，学孔孟，汉人只是课赋吟诗，将何用?”良弼对奏：“此非学者之病，实在国家所尚。尚诗赋，则人必从之；尚经学，则人亦必从之矣。”

在这里，经学与诗赋是处在对立的位置上。关于这段对答，原始文献没有注明具体时间，但赵良弼是在至元十年（1273）授同佥枢密院事一职的，在任共九年。

至元十年癸酉（1273）

元世祖即将攻宋，曾驿召徒单公履、姚燧、许衡等问计。

姚燧、许衡均是元史名臣。徒单公履，字云甫，号颙轩。获嘉（今属河南）人。金末登经义进士第，仕元，至翰林侍讲学士。与王恽、李庭交往密切。博学，善执论，立朝多所献替，受到元世祖器重。《元文类》卷八存其诗1首，《御选元诗》《元诗选癸集》等均据以选入。

杜瑛去世。享年七十岁。

杜瑛（1204—1273），字文玉。霸州信安（河北霸县）人。金将亡，杜瑛避地河南缑氏山中。战乱之后，文物凋丧，他注意搜访诸书，并转徙于汾、晋间，后迁居彰德。元宪宗九年（1259），忽必烈曾召见问计，忽必烈即位，于中统初徵杜瑛入朝，辞而不赴，杜门著书，安闲度过晚年。临终前对亲属说：“吾即死，当表吾墓曰：‘缑山杜处士’。”天历间，追封魏君公，谥文献。有《缑山文集》十卷，未见传本。《元诗选》三集辑录其十一卷。

① 《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一“枢密赵文正公”节。

王鹗去世。享年八十四岁。

王鹗（1190—1273），字百一。东明（今属山东）人。金正大元年（1224）进士第一，授翰林应奉，累迁尚书省郎中。金亡，张柔留馆于保定十余年。聘入元世祖潜邸，徙居大都。中统元年任翰林学士承旨，制度典章多由其裁定。至元五年致仕。卒，谥文康。诗文均有时名，有《应物集》四十卷，未见传世；另著笔记《汝南遗事》四卷、《论语集义》一卷。

至元十一年甲戌（1274）

正月。廷议南征宋朝的方略。

据《元史·世祖本纪》，元世祖在听取了史天泽的建议后说："伯颜可以任吾此事矣。"伯颜的左右手阿术、阿里海涯因此进言："我师南征，必分为三。旧军不足，非益兵十万不可。"于是，"诏中书省签军十万人"。此后的南征，几乎如同一场军事演习。结局在提出计划时就已经安排好了。元朝灭金与灭宋，都遇到顽强抵抗，但金朝国祚延续了二十年，几死几生；南宋则与之相反。造成这个反差，除了宋、金具体国情的不同，也与元朝对宋金的战略构想不同有关。

八月。刘秉忠去世。享年五十九岁。

刘秉忠是元初颇富神秘色彩的人物之一，正因为如此使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因之减色。与耶律楚材一样，他在政治上的作用长期处在被"放大"的位置。

刘秉忠（1216—1274），字仲晦，号藏春散人，初名刘侃，出家为僧时法名子聪。祖籍瑞州（辽宁秦皇岛），后迁居邢州（河北邢台）。刘秉忠八岁入学，十三岁在帅府作质子，十七岁任邢台节度使府令史。后出家为僧。元世祖忽必烈在潜邸，他因海云禅师被召入见，成为忽必烈的主要谋士，被称为"聪书记"。忽必烈继位，至元元年拜光禄大夫、太保，参领中书省事。至元八年，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建议蒙古建国号为大元，并以中都为大都（北京市）。至元十一年八月于上都无疾端坐而卒。刘秉忠自幼好学，至老不衰。虽位极人臣，每以吟咏自适，其诗萧散闲淡，类其为人。死后还葬于大都，赠太傅，封赵国公，谥文贞。元成宗时赠太师，谥文正。刘秉忠无子，过继其弟之子为后。弟刘秉恕，字长卿，同仕于世祖朝。刘秉忠

有《刘文贞公全集》[1]三十二卷，未见传本；今存仅有《藏春集》六卷。《藏春集》中没有五言诗，他的五言诗主要保存在《永乐大典》中。刘秉忠是元初曲家，《录鬼簿》列名“前辈名公”节。散曲今存小令12首（据《全元散曲》），〔南吕·干荷叶〕是代表作。

荆干臣随军出征日本[2]。

荆干臣，北京路兴中府（河北昌黎）人。出身豪族，能折节读书。自幼游学于燕，选入宿卫。曾出使万里之外。从征日本，任参军。以制曲知名，《录鬼簿》列其名于“前辈名公”节，《太和正音谱》以其词入上品，谓“如珠帘鹦鹉”。《全元散曲》存其套曲2套。亦能诗，但作品未见流传。

至元年间他曾两次出征日本，一次是至元十一年，一次是至元十八年。在此之前出使日本的赵良弼曾明确反对出征日本。赵良弼出使是在至元八年，一年多以后才回到大都，此行的惟一“收获”是一卷《日本纪行诗》。赵良弼的看法是：即便占领了日本，也没有扩大多少土地、获得多少可以役使的劳力，而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一“枢密赵文正公”节关于高丽与日本的内容，摘自“野斋李公撰墓碑”，但李谦（号野斋）写的赵良弼墓碑没有流传至今。

十月。伯颜挥师于五天内攻陷南宋边境的两座要塞，渡过长江支流汉水，在潜江赋诗言志，并刊刻石。

元人选元诗的第一部——《皇元风雅》就选录有伯颜诗，而且排列在刘因之后，是全书第二家。潜江县西六十里的长瑙垸白鹤寺有一通石刻，其内容是：

> 小戏轻提百万兵，大元丞相镇南征。舟行汉水波涛息，马践吴郊草木平。千里阵云时复暗，万山营火夜深明。皇天有意亡残宋，五日连珠破两城。至元甲戌十月，伯颜。[3]

---

① 集以“文贞”为名，应当编定于元世祖至元十一年至元成宗改谥“文正”之间。而《刘文贞公全集》则一直在隐显之间，二三十年前一度据闻有原本传世，但始终未见其书。《永乐大典》本录有《刘文贞公全集》，但当初清人据《永乐大典》辑佚书时竟未涉及。

② 荆干臣出征日本的时间，或作至元十八年。此从孙楷第《元曲家考略》说。

③ 见甘云鹏《潜江贞石志》卷一。

除快马利剑，伯颜居然还携诗思南下。这首诗是江河不足以为宋屏障的宣言。

十二月。元军兵临鄂州城下，兵燹中百姓流离失所。无名氏杂剧《货郎担》即以鄂州失陷为背景。

杂剧《货郎担》（全名《风雨像生货郎旦》），《元曲选》作无名氏作品，第四折〔正宫·端正好〕，提到了当年鄂州百姓流离失所的情景："记得打破了鄂州一似亡家犬，拿住我麻绳子剪。"此后在〔滚绣球〕中，具体写出"驱口"所经历的磨难。据《元史·世祖本纪》，在鄂州前线的元军将领是阿里海涯（即贯云石祖父），而后来阿里海涯受到追究，一个罪状就是将数以千计的"降民"没入为家奴，与杂剧所写正相呼应。一俟战争成为过去，至元十七年时便诏核阿里海涯等所俘三万二千多人，并放为民。对此，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三专门作过论列。在金元之际的战争中，把战乱中俘获的百姓抑逼为奴，以供驱使，这些平民百姓被称为"驱口"，妻离子散往往也由此而生。

至元十二年乙亥（1275）

三月。有人射得一只北返大雁，发现雁足有一封帛书，并附诗一首。从中统元年出使南宋起，已经失去消息十六年的国信大使郝经，成了朝野关注的中心。

郝经（1223—1275），字伯常。泽州陵川（今属山西）人，金亡，徙居顺天（河北保定）。郝经祖父郝天挺是元好问的老师，元好问曾对郝经说："子貌类汝祖，才器非常，勉之。"守将张柔、贾辅待郝经以上宾礼，郝经得便历览了两家的丰富藏书。元世祖在潜邸，召见郝经，郝经又随蒙古南下攻宋。元世祖即位，拜翰林侍读学士，并充任"国信大使"，率40人的使团出使南宋。南宋权相贾似道曾谎称大捷，怕郝经入朝后泄漏底细，就把他软禁在真州，使之与世隔绝。他弟弟郝庸曾随即出使江南，但南宋竟不予接纳。在软禁期间，郝经勤于著述，诗文作品颇多。元世祖大举南下时，派人责问拘押使臣之罪，郝经成为"争执点"，此后才得以北还。还朝不久，宿疾发

作，其子执笔问以后事，他写下“天风海涛”四字[①]，余无所言。卒，谥文忠。郝经之文丰蔚豪宕，长于议论，诗以奇崛为特色。一生留下数百卷著作，今存《陵川集》三十九卷，是流传较广的元人文集之一。郝经作品中，诗最受评论家推重。写于拘押在真州时期的诗篇，如《冬至后在仪真馆赋诗以赠三伴使》《仪真馆中暑一百韵》等，都是鸿篇巨制，内涵丰富。《幽思》是一组多达60首的组诗，组诗力图承继阮籍《咏怀诗》及陈子昂《感遇》诗风的初衷，使人印象深刻，其七言律诗《秋兴五首》，则无论从题目到写作契机，都受到杜甫的影响。

元世祖派郝经出使南宋，本意是不愿在未清理好北方（蒙古贵戚中的异己成分）时，同时面临南北两条战线而做的试探。但郝经一去无归，在真州软禁16年。他在真州期间写了著名的《续后汉书》一三〇卷（今传本九十卷）。实际他是想写一部以蜀汉为正统的新《三国志》，正式出版时可能是考虑到陈寿《三国志》已经成为正史，便更名《续后汉书》。这部史著与后来赵居信的《蜀汉本末》，在《三国志平话》以致《三国志演义》的成书过程中，都起了造势的作用。

所谓“雁足帛书”，是元初一件大事，朝野耸动。宋濂有《题郝伯常帛书后》（《宋文宪全集》卷八），《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农田馀话》卷上等均有记载。它的经过是：

早在上一年九月，思乡心切的郝经也许是受汉代使臣苏武的传说的启发，便在一只原准备食用的大雁腿上，捆绑了一幅用帛写的文字，并将大雁放生。帛书有59个字：

霜落风高恣所如，归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缴，穷海累臣有帛书。中统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获者勿杀。国信大使郝经书于真州忠勇军营新馆。

本年三月，有人在汴梁金明池上捕获了这只南来大雁。帛书辗转为安丰儒学教授王时若所得。然而，本年二月，随着南宋政治格局的变化，郝经已经解除了拘押，得以北还。正是因为这个插曲，使得他的出使、被敌国拘禁而不屈、16年后得以回归，富于传奇色彩，广为朝野所知。至于帛书，延祐五年时，集贤学士郭贯出持淮西使节，将确实存在帛书一事上奏朝廷，元仁宗命

① 据明人杨慎《升庵诗话》卷二“天风海涛”节，宋人赵汝愚诗有“江月不随流水去，天风长送海涛来”，朱熹“爱之，遂书‘天风海涛’字于石”。如是，郝经书此四字大有深意。

中使专门将其取来，装潢成卷，并让文臣题跋于卷末，保存在秘书监。直到至正年间，还有人在秘书监亲眼见过这幅帛书。

苏武牧羊与雁足帛书，本是汉朝对匈奴的托词。郝经还朝，也并非由于雁足帛书使其仍然在世的秘密揭穿，而与南宋朝政变迁有关。但人们偏爱忠臣义士，对传奇更乐于传播。元与南宋对峙的半个世纪，对使节非礼是常事，而且郝经也不是被拘押时间最长的使团。正是雁足帛书与《续后汉书》重建正统观的意愿，使他在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

关于郝经出使，帛书传递信息，在元朝就有若干“版本”流传。最有名的一个是，元世祖见到帛书，有“四十骑留江南，曾无一人如雁”的感叹，并由此而兴师伐宋。事实上在郝经回归后，那只负有特殊使命的大雁，才为人捕获。

七月十五日。元军兵临宁海城下，舒岳祥写《渔父》诗。

这首“渔父”诗（《阆风集》卷六）的长题，等于是诗序：“七月十五日，竞传有铁骑八百来屠宁海，人惧罹仙居祸，僦船入海，从鸱夷子游。余在龙舒精舍，事定后而闻之，幸免奔窜，深有羡于渔家之乐也。作《渔父》一首。”这篇序与诗，表达的是在战乱中无处藏身的苦恼。而将被屠城的血腥前景，实际是元军在江南攻城掠地时，比大炮（巨型投石器）、冲城车、铁甲骑兵更有威慑力的“武器”。除“渔父”一诗，舒岳祥《阆风集》中还有《丙子兵祸自有宇宙宁海所未见也予家二百指甔石将罄……》（卷一）、《去年大兵入台仙居幸免今冬屠掠无噍类衣冠妇女相随俱北闻而伤之作俘妇词》（卷三）、《丙子兵祸台温为烈宁海虽经焚掠然耕者不废……》（卷八）。在舒岳祥笔下，宁海的“丙子兵祸”为当地“自有宇宙”“所未见”，但比之台温，宁海“虽经焚掠，然耕者不废”。可见，心理“伤害”要远大于具体的战火。

至元十三年—德祐二年丙子（1276）

正月一日。伯颜部将阿里海涯攻陷潭州（湖南长沙），南宋潭州守将、湖南镇抚大使李芾死之。

潭州之役，是元军南下最酷烈的战事。在阿里海涯麾下正面攻占潭州的将领崔斌，战后写诗凭吊李芾，其诗在宋元之际流传颇广。

崔斌出身豪族，随色目将领阿里海涯（贯云石祖父）南下攻宋。江南平定，任湖广、江淮左丞。至元中，为权臣阿合马罗织罪名处死。除崔斌，李思衎也写过《吊李肯斋》（李芾号肯斋），是出使安南时路经潭州而作。

陷落时的潭州，简直是人间地狱："城无虚井，缢林木者相望。"李芾，是除死战而不要任何借口的南宋疆臣。而潭州，则是南下元军的锐利"武器"——降，则活口，战，则屠城——发挥作用的"样板"。除了崔斌等的诗，刘埙《补史十忠诗》第一人就是"知潭州湖南安抚使李公芾"。李元美也写有《长沙死事本末》，专门为李芾等张目，为此，赵文特意写了《长沙死事本末后序》①。这本相当敏感，但崔斌、李思衎是元朝官员，刘埙、赵文是认可改朝换代的文人，无人避讳。

李芾死，潭州陷落，对南宋朝野有负面的影响，从根本上动摇了以战争对抗元军的决心。正是这一战后，南宋朝廷才真正看清了战争的代价。

至正年间，孙华以《凤山怀古》（《大雅集》卷六）诗回顾了南宋亡国的历史过程：

宋家事业如汉晋，遗史斑斑今尚存。南渡衣冠元帝纪，中山庙社靖王孙。海门龙去秋潮横，宫树乌啼夕磷繁。已恨无人似诸葛，生憎何物学桓温。

王气中流甲马营，残星遥绕凤皇城。斯文自可同三代，吾老犹能语二京。稚帝有车将白璧，太皇无舰载苍生。只今四海慚声教，共戴尧天乐太平。

故汴人材轶汉唐，东南文物尚张皇。荆吴形势倾丹凤，伊洛源流到紫阳。宇宙自来开历数，江山浑不管兴亡。空余车马尘埃市，犹作鹍鹏变化乡。

莫向登临起叹吁，故宫今是梵王都。麒麟駊娑荒荆棘，鹦鹉频伽张苾蒭。辇道久无黄曲盖，寝垣谁置白浮屠。望江亭子依然好，时有胡僧置酒壶。

第二首注出本事，说："天兵压境，陈宜中启谢太后，欲请三宫浮海，且云：舟航已具。后曰：临安十万百姓，能尽载否？——遂迎王师。"逃入汪洋大海是仅有的退路，但对于以土地人民为象征的国家来说，逃不逃的后果都是

---

① 李元美《长沙死事本末》未流传至今；赵文《长沙死事本末后序》见《天下同文》卷十三。

亡国。

正月十八日（甲申）。伯颜大军驻扎在临安（杭州）郊外的皋亭山。

正月十八日，伯颜派遣千户囊加歹代表元军入临安，命令临安居民必须在自家门首贴上“好投拜”三个字，表示一心归顺。南宋主政的太皇太后曾望祝：海若有灵，当使波涛大作，一洗而空之。但潮汐竟然三天不至。南宋奉表以及传国玉玺降。

很多宋元人的著作中，都记载了这样一首民谣：“江南若破，白雁来过。”这个民谣在宋亡之前曾流传颇广。后来人们便将“白雁”（或百雁）喻指伯颜。据刘敏中《平宋录》（卷中）：伯颜驻扎在皋亭山，丞相娘子来到军中。伯颜问：“你怎生来?”答曰：“俺自来。”伯颜说：“你来呵俺跟前要富贵也。你吃一盏酒。大事未了，你回去者。”果然，“娘子回程”。伯颜与其妻子的对白朴素无华，当非史官所代拟。在即将毕其功于一役的激动人心的时刻，能如此平淡处之，非伯颜而不能为。

南宋皇室决定向元称臣，由谁来执笔撰写“降表”，“降表”怎样措词，成了满朝官员皆由进士出身的南宋朝廷一大难题。

德祐帝是个孩子，一切听祖母的。既然已经决定不战而降，降表则必不可少。可满朝朱紫，却没有人愿意承担代德祐帝草拟降表这个任务。任务落在翰林直学士高应松身上，他明确表示不能草拟降表，并要求辞去职务。一位下级官吏——丰储仓所检察——刘褒然却“肯任其责”。于是，先将刘褒然任命为太常丞、翰林，以便“权宜使之秉笔”。刘褒然写的降表保存在《癸辛杂识》等书中，应该说，刘褒然在这不长的文字中尽力保全了南宋皇室的颜面。此后，刘褒然成了亡宋影子朝廷的重要人物，元军要求将有影响的人士与皇室一并押解北上时，这个原本是小小的“检察”的人，也在北行之列。最后，他客死在异乡燕京。而这篇几百字的表文，就是他的（也是南宋的）“绝唱”。他本意无非是出名，他出了名，但照样为历史淹没。

南宋皇室离开“行在”临安，临安就不再是首都，而是元江浙行省的省会。刘褒然也走了。谁继续为行省代拟祝贺大元“平南宋”表文呢?另一个士人陆威中“欣然承命”，他的贺表里有这样的句子：“《禹贡》之别九州，冀为中国；《春秋》之大一统，宋亦称臣。”他以此非常得意，这也确实是绝妙好词，只是不该由他来做就是了。写完贺表，他在行省门前的茶寮里等候回报，时间长了一些，就伏案假寐。再叫他时，却发现他已经在假寐中死去了。南宋（特别是后期）风气是重视“四六”，这可以说是“最后”的“四

六"。刘褒然与陆威中，原来都是不得志的、永无出头之日的闽籍士子，同样为了写名公巨卿们不敢写的表文，最终出名。——可这种出名方式是对读书人整体的亵渎。

二月四日（庚子）。南宋向元廷奉上降表。

《元史·世祖本纪》说："庚子，宋主㬎率文武百僚诣祥曦殿，望阙上表，乞为藩辅。"从正史谱系来说，本年本月本日，南宋已为元替代。

伯颜是个有政治家眼光的职业军人，他立即行动，首先将南宋原来政治格局中对社会有号召力的人物与皇室成员一起押解北上。同时，将南宋"三学"（太学、文学、武学）中的士子择优迁往燕京。择优，不是为了录用，而是免得留在杭州生事。这一年春天，通过运河北上的"三学"士子共99人。抵达大都后，于本年九月元廷命姚枢、王磐负责"选宋三学生之有实学者留京师，馀听还家"[①]。到至元十五年，留在大都的还剩18人，都分配了具体工作：担任各路儒学教授。这些人实际是宋元兴替后江南首批北上的文人群体。这18人一一列名在《癸辛杂识》，但其中竟然没有一个在文学史上留下名字，惟一例外的是张观光。

但张观光却是一个"问题"人物。

张观光，字用宾，一字直夫，号屏岩。祖籍东阳（今属浙江），徙居金华（今属浙江）。是文学家张枢的父亲，也是黄溍的友人。早年因品学兼优，受到时人器重。宋末以《诗》义为浙士第一，二十六岁入太学。不久南宋亡国，随皇室北徙，经历坎坷，"道途之凄凉，羁旅之郁悒，悯时悼己，悲歌长吟，又有不能自己者。"（吴师道《张屏岩文集序》[②]）在大都几年后，授婺州路儒学教授，在任十年，改绍兴路平准行用库大使，以母亲年老为由，辞而不就。家居近四十年而故。去世后，张枢搜集遗稿编辑成集，题为《屏岩文集》。张观光辞官正值壮年，杜门隐居，沉潜经籍，不轻易为文。前半生身遭亡国之痛，使他对待世物颇为超然。现存署名"张观光"撰的诗集《屏岩小稿》一卷，全同于元人黄庚的诗集《月屋漫稿》，出于明人作伪[③]。实际他今存的作品也就是《春日田园杂咏》中的断句了，所以他留下的还是只有一个名字。

---

① 《元史》卷九《世祖本纪》。

② 《吴正传文集》卷十四。

③ 参见《中国文学大辞典》（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中，笔者撰写的"张观光""月屋樵吟""月屋漫稿"等辞条。

二月。元世祖下《归附安民诏》[1]，除土地人民，也“接收”了江南文化。

这个诏书下达，对江南局势起了稳定作用。较早对其作出回应的，是京口天庆观主聂守真。他几首有名的诗都与之有关，表达出对改朝换代的感受。

《归附安民诏》全文是：

间者，行中书省右丞相伯颜遣使来奏，宋母后、幼主暨诸大臣百官，已于正月十八日赍玺绶奉表降附。朕惟自古降王必有朝觐之礼，已遣使特往迎致。尔等各守职业，其勿妄生疑畏。凡归附前犯罪，悉从原免；公私逋欠，不得徵理。因抗拒王师及逃亡啸聚者，并赦其罪。百官有司、诸王邸第、三学、寺、监、秘省、史馆及禁卫诸司，各宜安居。所在山林河泊，除巨木花果外，馀物权免征税。秘书省图书，太常寺祭器、乐器、乐工、卤簿、仪卫、宗正谱牒，天文地理图册，凡典故文字，并户口版籍，尽仰收拾。前代圣贤之后，高尚儒、医、僧、道、卜筮，通晓天文历数，并山林隐逸名士，仰所在官司，具以名闻。名山大川，寺观庙宇，并前代名人遗迹，不许拆毁。鳏寡孤独不能自存之人，量加赡给。

这不长的诏书应有尽有，几乎解答了改朝换代带来的一切疑难。

聂守真，号碧窗。江西人。元初为龙翔宫书记、京口天庆观主。有诗名，所作《北朝诏赦至感而有诗》以及《哀被虏妇》等，在第一时间对江山易代作出了反应，“为一时称颂”（元林坤《诚斋杂记》[2] 卷上）。他的诗在元人的笔记，比如《山房随笔》《南村辍耕录》《诚斋杂记》之中，都有记载与评述。

《北朝诏赦至感而有诗》诗云：

乾坤杀气正沉沉，又听燕台降德音。万口尽传新诏好，累朝谁念旧恩深。分茅裂土将军志，问舍求田父老心。丽正立班犹昨日，小臣无语泪沾襟。

“分茅裂土将军志，问舍求田父老心”，在他写出这些诗句时，新一轮的

① 原载《元史》卷九《世祖本纪》。又见于《通制条格》卷二十七“前代遗迹”节，并说是本年元月发出的诏书。

② 《诚斋杂记》，或著录为周达观著。但在周达观《诚斋杂记序》明言是林载卿（讳坤）所著。

反元战事尚未开始，他却已经写到了结局。

《哀被虏妇》诗云：

当年结发在深闺，岂料人生有别离。到底不知因色误，马前犹自买胭脂。

《咏胡妇》诗云：

双柳垂鬟别样梳，醉来马上倩人扶。江南有眼何曾见，争卷珠帘看固姑。

这两首诗是写因江山易代，南北妇女的不同处境。南人妇女被掠北上，成了“战利品”；而随军南下的放荡不羁的北人妇女，即将使江南社会价值取向面临新的选择。

《题赵太祖真容》诗云：

凤表龙姿俨若新，一回展卷一伤神。天颜亦怪君非虏，河北山东总旧臣。

蒋正子《山房随笔》具体写出这首诗的背景：“京口天庆观主聂碧窗，江西人。尝为龙翔宫书记。观中有赵太祖真容，北来者见必拜，聂因题其上。”

三月二日（丁卯）。伯颜入杭州城，临时住在万松岭的卢源宅邸。

伯颜以最快的速度，拣选出对元巩固江南会产生副作用的人物，在三月甲戌，由杭州动身押送到北方①。抵达镇江时，文天祥逃脱，因为此行文天祥还不是重要人物，才有机会逃身。这样大的感情落差，使本年春夏间依大运河北行的人群中，出了不少名载文学史的人物，其中最有名的是汪元量，还有王昭仪。

让伯颜不放心的是宋廷原主政者、名流、皇室成员以及接近皇室的人，也包括对国事一无所知的后宫宫人——当然，还有一个几种情况都不属于的

① 其中有皇太后全氏以及幼主德祐帝，但没有太皇太后谢道清。以年老多病，谢道清获准不必北上。一些文献说谢太后也一起北上，不确。

人，那就是宫廷琴师汪元量。如果没有他，后人对于这段历史的了解，对于感受文学作品所表现的这个特殊人群与特殊时刻的人文情绪，会有很大的缺失。除汪元量，这批首先被强制北上的南宋人之中，受到关注的还有宋度宗的昭仪（嫔妃）王清惠。路经汴梁（北宋的首都东京）夷山驿时，王清惠写了一首〔满江红〕[①]：

太液芙蓉，浑不似、旧时颜色。曾记得、春风雨露，玉楼金阙。名播兰馨妃后里，晕潮莲脸君王侧。忽一声、鼙鼓揭天来，繁华歇。

龙虎散，风云灭。千古恨，凭谁说。对山河百二，泪盈襟血。驿馆夜惊尘土梦，宫车晓碾关山月。问姮娥，与我肯从容，同圆缺。

这就是词史驰名的《题驿壁》。这首词与它的写作情况，见载于《南村辍耕录》《浩然斋雅谈》《东园友闻》等书。关于作者，《南村辍耕录》（卷三“贞烈”节）与《浩然斋雅谈》都说是王昭仪，《东园友闻》[②] 则说是宫人中的“王婉仪”，并特意说“或云王昭仪下张璚英所赋也”。记述了这首词之后，《南村辍耕录》又说，五月二日，这批人抵达上都（不是大都[③]，每年这个时期元朝皇室已经在上都避暑了），朝见了元世祖。十天之后——五月十二日——“夜，故宋宫人安定夫人陈氏、安康夫人朱氏，与二小姬，沐浴整衣焚香，自缢死。朱夫人遗四言一篇于衣中……明日，奏闻。上命断其首悬全皇后寓所。夫此四人之贞烈，视前日之托隐忧于辞章者，相去盖万万矣。”对王昭仪颇有微词。

① 这首词在不同文献中文字略有不同。这里依据胡云翼《宋词选》（出于《浩然斋雅谈》）录出，因为读者对它已经比较熟悉。

② 《东园友闻》，传本未署作者。据《千顷堂书目》卷十三，作者为夏颐。但这是典型的误读。《东园友闻》在一些条文字之下注有出处，比如“曲江钱惟善书”“贫谷邵焕识”等，全书最后一条则署“华亭夏颐”，那只是说明这一节文字是得自夏颐。至于《东园友闻》的作者，应名为□璋（姓氏阙，名璋），元代中期曾客居京口，至顺元年在南宫侍虞集座，是陶宗仪同时期年辈略早的人。《东园友闻》关于〔满江红〕词之后的下一条记述，则注明出自“南村陶宗仪书”。笔记内容互相转抄，是其惯例，但这条记载（关于词的作者）的内容，却有出于《南村辍耕录》之外者。

③ 据刘敏中《平宋录》卷中，伯颜于闰三月二十一日回到大都。二十四日，“宋太后幼主至燕京。宿会同馆”。一行于四月十五日离开大都前往上都，四月二十八日抵达上都，在明德门官舍安歇。五月一日在上都西门五里外的草地上临时设家庙祭祖。五月二日，面见世祖。据说在伯颜回到燕京时，“有大旗书‘天下太平’四字”。《平宋录》依据的是元廷档案，日期准确。是汪元量一行北上日程的参照。

宋度宗的昭仪王秋儿，字清惠，后来出家于大都，道号冲华。曾以“善属文”，受度宗宠信，“虽鹤骨癯貌”（想必是“骨感美人”），“上即位后，万几之暇，批答画闻，式克钦承，皆出其手。然则，王非以色事主”[1]。这首〔满江红〕词，从题写时刻起就相当有名，据说邓剡、文天祥等，都写过和词，对王昭仪其人也是褒贬相兼。

汪元量为亡国而作《醉歌》十首。南宋面临的不只是蒙古南侵，在亡国之际朝臣们的表现颇有特点。

有两篇著名的史诗，正面描写到南宋亡国过程，其一是俞德邻《京口遣怀呈张彦明刘伯宣郎中并诸友一百韵》(《佩韦斋集》卷二)，另一篇，就是汪元量《醉歌》(《湖山类稿》卷一)。《醉歌》是一组十首七言绝句：

吕将军在守襄阳，十载襄阳铁脊梁。望断援兵无信息，声声骂杀贾平章。

援兵不遣事堪哀，食肉权臣大不才。见说襄樊投拜了，千军万马过江来。

淮襄州军尽归降，鞞鼓喧天入古杭。国母已无心听政，书生空有泪千行。

六宫宫女泪涟涟，事主谁知不尽年。太后传宣许降国，伯颜丞相到帘前。

乱点连声杀六更，荧荧庭燎待天明。侍臣已写归降表，臣妾佥名谢道清。

衣冠不改只如先，关会通行满市廛。北客南人成买卖，京师依旧使铜钱。

北师要讨撒花银，官府行移逼市民。丞相伯颜犹有语，学中要拣秀才人。

涌金门外雨晴初，多少红船上下趋。龙管凤笙无韵调，却挝战鼓下西湖。

南苑西宫棘露芽，万年枝上乱啼鸦。北人环立阑干曲，手指红梅作杏花。

伯颜丞相吕将军，收了江南不杀人。昨日太皇请茶饭，满朝朱紫尽降臣。

[1] 元陈世崇《随隐漫录》卷二。

宋亡这一历史过程，本有许多争议，而争议多在细节。但对这一组诗则没有争议，尽管它的细节生动得使人不敢逼视。据《隐居通义》（卷十[①]）说：年辈晚于汪元量的闽人龙仁夫，曾写有一首讥讽吕文焕（即守襄阳十年的“吕将军”）负宋降元的诗《陈平章席上题琵琶亭》：“老大嫦娥负所天，忍将离恨寄哀弦。江心正好看秋月，却抱琵琶过别船。”以至吕文焕“纳贿”，请求龙仁夫改赋，为自己遮丑。但是在至元十三年，吕文焕却是悲剧人物。《醉歌》自“吕将军”始，又自“吕将军”终。“吕将军”身份的转换，完成了宋元的交接。

南宋亡国之际，另一种趋势始终被掩盖了。也许是文天祥们的拼死抵抗，左右了舆论导向。实际在蒙古人兵临城下时，南宋皇廷已经被自己的元老重臣抛弃。元人吴海曾说，德祐二年“少帝北迁，参政高应松、佥枢谢堂、台臣阮登炳、郭珙、陈伯春等从行。是时，王爚为相而去，章鉴为相而遁，陈文龙、黄镛佥枢密，辞母老而遁。陈宜中、留梦炎为相又相继而遁。惟前相江万里家居，赴水死。其余执政、台谏、侍从、制帅、监司、守臣，往往多降与遁。殆景炎十月，陈宜中又遁，而宋亡矣。”[②] 身居高位的王爚、章鉴、陈文龙、黄镛等，尽管曾位居“执政、台谏、侍从、制帅、监司、守臣”，在历史与文学史上却毫无印迹，也是“一逃了之”。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文天祥会受到民间如此普遍的尊崇。——在“朱紫降臣”之外，弃职遁逃者不应被忽略，作为个人可以，作为现象则不能。

就像特意为《哀被虏妇》作注释，“北人”王宥释放俘获的女子还家，并写《归妇吟》[③] 为其送行。

王宥，东平（今属山东）人，元军南下攻宋，在军旅任郎中。在江西吉安，他得到了一件特殊的“战利品”——一位刘姓女子。当他得知刘氏的家人俱在时，决定放刘氏还归家乡，并相送一程。他的《归妇吟》诗就因此而作。诗序说：“天马浮江，兵强将锐，所征无敌，所掠无遗。俘戮之民，奚啻亿万，然生死存亡，悲欢聚散，岂无数存乎其间？夫刘氏者，吉之永丰人也。问其父母、兄弟、舅姑、夫与子，皆在焉。夫我不知则已，既知之，何独不令其归宁于父母乎？呜呼，不幸之幸，莫大于斯！故不可无一言以送之。”仅凭这篇诗序，已经将人们的关注之心调动起来。诗云：

---

① 这是比较广泛流传的故事。《草木子》卷四上也有内容基本一样的记载。

② 《闻过斋集》卷七《宋少帝赐高应松辞参政不允诏后书》。

③ 诗及事，均见元人蒋正子《山房随笔》（《说库》本）、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七“归妇吟”节）。

烈火都将玉石焚，死生契阔忆中分。信音一绝思青鸟，望眼双穿见白云。残日鹡鸰还有难，北风鸿雁正离群。新诗送尔还家去，重续当年织锦纹。

陶宗仪评述道："吁！固虽刘氏有莫大之幸，而王亦仁人者矣。"

随着元军依次祸及江南城镇村落，被俘获的南方女子成为元军序列中一道特殊风景线。

战乱中，妇孺历来是战利品之一。人们往往将她们的遭遇付诸诗词，以表同情。而她们自己倾吐苦难的作品也出现在途中的驿站旅社、关隘荒郊，其中有的已经成为名篇，比如王昭仪的那首〔满江红〕。以这类作品而知名的，有万俟惠柔（《元诗选癸集》壬集下："遭北虏，被执至寿沙驿，题诗驿中"），徐君宝妻（《东园客谈》，题〔满庭芳〕词），雁峰刘氏（《梅涧诗话》卷下，被掠，题诗长兴酒库）等。到至正中战乱期间，这类作品更是层出不穷。那是后话。也许为了表示同情，也许仅为了展示才华，这类生离死别的诗篇当时竟出现了诸多的拟作。

蒋正子《山房随笔》记述一个姓杜的妇女为元军掳掠，一路北行途中，写了一首诗题在驿站墙壁："江南幼女别乡闾，一似昭君出塞图。默默一身离故国，区区千里逐狂夫。慵拈箫管吹羌曲，懒系罗裙舞鹧鸪。多少眼前悲泣事，不如花柳旧江都。"但蒋正子又特意说："此等多有戏作，题之驿亭，以为美谈。"

在国子监学习的康里人不忽木和色目同学坚童等上书世祖，请求推行蒙古、色目子弟学习儒家经典的制度。

上书由不忽木执笔，原文保存在《元史》本传。它不但是元西域人华化的重要文献，也是西域人用汉语写作的最早文本之一：

为今之计，如欲人材众多，通习汉法，必如古昔遍立学校然后可。若曰未暇，宜且于大都弘阐国学。择蒙古人年十五以下、十岁以上质美者百人，百官子弟与凡民俊秀者百人，俾廪给各有定制。选德业充备足为师表者，充司业、博士、助教而教育之。使其教必本于人伦，明乎物理，为之讲解经传，受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其下复立数科，如小学、律、书、算之类，设置教授，各令以本业训导。……或一艺通然后改授，或一日之间更次为之。……有余力者，听令学作文字。



『秋宜食麻』是元人风俗。这是元刊本《饮膳正要》的插图之一，而这本讲究饮食的书，是西域人忽思慧著。忽思慧是元文宗时的内廷膳医，他的成功之处在于能够为蒙古色目与汉人南人都接受。

“文字”，指诗文等文学作品。这篇上书不但从立国根本大计论述了华化（学习儒家学说）的重要，还具体拟设了实行的步骤。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把这“凡千言”的文章称为《兴学疏》。

不忽木祖父海蓝伯是康里国世袭贵族。曾代表康里侍奉克烈部主王罕。公元1223年，在成吉思汗袭取康里王国时，“虏其全部以归”。灭掉了这个邻国。海蓝伯“不知所终”，十个儿子都被俘虏。幼子燕真年仅十几岁，由皇后养育成人。贵由汗在位时，燕真成为忽必烈心腹，并娶高丽“美人”为妻。忽必烈即位不久，燕真去世。不忽木是燕真次子，由元世祖指派给皇太子真金（即元裕宗）作侍从。仅十二岁又为国子监祭酒许衡识拔，面请元世祖，“欲教之读书”。世祖下令，让不忽木入国子监学习。许衡期许他“必大用于世”，就为他起名“时用”，表字“用臣”。而这篇《兴学疏》，就是不忽木的“毕业论文”。

三月至四月。为元军押解北上途中，汪元量开始酝酿写作《湖州歌》。

汪元量《湖州歌》长达98首，是宋元诗史最长的组诗之一[①]。这个大型组诗，可以视为宋代历史终结的形象记录，也是诗人人生经历中最富有感情色彩的段落。南宋德祐二年（1276），元将伯颜从临安东北方的皋亭山，移师至湖州，截断了首都的进出通道。在湖州大营，伯颜派人向主政的谢太后索取归降的手诏，并封了南宋的库府衙署，解散了政府机构与侍卫亲军。此后南宋国家的象征已经不复存在。所以，写到亡国过程时，汪元量以“湖州”为总题。《湖州歌》不仅写亡国，还写了自己作为随行人员陪南宋后宫皇室，从临安北上抵达大都的过程。

《湖州歌》从“丙子正月十有三，挝鞞伐鼓下江南。皋亭山上青烟起，宰执相看似醉酣”开始，到“杭州万里到幽州，百咏歌成意未休。燕玉偶然通一笑，歌喉婉转作吴讴”终结。他们离开杭州北上，江南烽烟四起、勤王兵兴的跌宕反复时期尚未到来，等历时“一纪”他回到故乡，一切已经平息，人们已经试着习惯在异族统治之下生活，也找到了活下去的充足理由。沧海桑田，就在这短短一瞬间弹指而过。

随着南宋向元递上降表，“大一统”到来。一个新的汉语词汇“北人”随之出现。

南宋亡国，南北人员交流，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展开。所谓“北人”，是南方人眼中的“外人”——包括蒙古、色目、汉人。北人南下，南人北上，成为社会潮流。

当然，最初来到江南的北人，是伯颜麾下全副武装的军士；第一批北上的南人，是作为人质的南宋皇室成员与贵戚。但情况马上就改变了。涓涓细流，很快奔涌成江河；元好问这样的文学家，竟然以最快的速度在江南赢得了读者。在这之前，“河汾诸老”中的人物来江南寻根时，还会有被视为异类的感觉。较早到江南任职的“北人”，有胡祗遹、卢挚、燕公楠、高克恭、陈思济、鲜于枢等人。较早到大都任职的南人是陈孚、贡奎、程钜夫等人。

作为清点南宋皇室文献的官员，临安刚刚易主，王构与李衎就受命到临安调取三馆图籍及礼器仪仗。此外，畅师文本来就是元南征的军士[②]。而民

---

① 比它更长的，是刘秉忠《古诗泛言一百二十一首》以及元末诗人张昱的《辇下曲》102首、杨允孚的《滦京杂咏》108首。这里没有将“梅花百咏”一类的组诗计入，一般它们每首诗还有具体的题目。

② 畅师文，字纯甫，号泊然，从伯颜南征。据邓文原《巴西集》的高克恭行状，始建江浙行省，畅师文就在行省任掾史。

间的交流如同潮流涌动：刘因、白朴、关汉卿、曾瑞等几乎所有重要的北方籍文学家都曾先后前往南方。

在经历了南宋亡国全过程的汪元量笔下，“北人”的“出场”颇带喜剧性：“南苑西宫棘露芽，万年枝上乱啼鸦。北人环立阑干曲，手指红梅作杏花。”（《醉歌》其九）终止了一个多世纪的南北人员交流，一经启动，就难于理顺。

江南各界人士对广袤的北方陌生已久，实际上在北宋时期，也只能依白沟望北兴叹，运河、汴梁、大都以至于上都，这原本早就是“禁区”的地方，成了南北文人汇聚之区。在人员的交流中，僧人与道士似乎空前活跃，他们是较早脱出局限的人群。然而富庶的江南水乡，西湖、茅山、武夷、雁荡等地方出现了“手指红梅作杏花”的陌生人，不只是僧侣、道士，基督教、伊斯兰教以至于摩尼教、祆教都有了广泛的受众，并且很容易落地生根。人们的视野一下子就拓展到地平线之外。周密《癸辛杂识》提到的新鲜事有“北方大车”与“押不芦”①。游牧民族的高轮车嘎嘎作响的巨大木车轮（勒勒车），回回国之西的极毒、但可以使人在三日间复活的“人形草药”，都是此前江南最博学的人也闻所未闻的。“北人”带给江南的，除了战争，还有丰富的内涵。

北方大儒姚枢出任翰林学士承旨。

姚枢（1203—1280），字公茂，号敬斋，又号雪斋。祖籍营州柳城（辽宁朝阳），后迁居洛阳（今属河南）。金亡后，携家住辉州。元世祖在潜邸，派赵璧召姚枢入见，姚枢陈治国平天下之策，并汇总为八目，受到元世祖的器重。曾谏世祖远征云南大理，劝其学宋朝大将曹彬不杀一人而取南唐，为世祖采纳。元世祖即位，立十道宣抚使，以姚枢出使东平。任大司农。中统四年任中书左丞。至元十年，拜昭文馆大学士，至元十三年拜翰林学士承旨，是元代翰林学士中较早的一人。

仇远记录了一则口口相传的故事，反映出宋元替代时期的社会心态，也证明当时在临安等繁华之区广泛流行由伶人演出的小品。

《稗史》“钟神”节，讲述了得自戴表元的见闻：

至元丙子，北兵入杭，庙朝为墟。有金姓者，世为伶官，流离无所

① 前者见《癸辛杂识》（中华书局1988年）第157页，后者见第158页。

归。一日道遇左丞范文虎，向为宋殿帅时熟其伶人。怜之，谓金曰："来日公宴，汝来献伎，不愁贫贱也。"如期往为优戏云："某寺有钟，奴不敢击者数日，主僧问其故，乃言钟楼有巨神，怖不敢登也。"主僧亟往视之，神即跪伏投拜。主僧曰："汝何神也?"答曰："钟神。"主僧曰："既是钟神，如何投拜?"众皆大笑，范为之不怿，其人亦不顾。卒以不遇，识者莫不多之。

在这里，"优戏"无疑是指化了装演出的小品。与这种表演形式相关的记载，另一则出自谢枋得《送方伯载归三山序》(《叠山集》卷六)：

景定二年，司历者曰，星相明示，天下三十年无好文章。儒者望清台而诟曰："何物瞽叟为此妖言!"司历者闻而笑曰："岂特无好文章，经存而道废，儒存而道残。科举程文将无用矣。"——皆疾其为妖言也。后十六年而验。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曰："我大元典制，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者；贵之者，谓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

这里"滑稽之雄"是"以儒为戏"——拿埋头学习科举制艺的读书人作为讽刺对象。舞台转换了两个场景，一是宋亡之前十六年（景定二年），出场人物是司历者与儒者；二是当前，由演员拿儒者"开涮"。而戴表元与谢枋得都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文人，这种"优戏"是他们所熟悉的表演形式。与杂剧相比，"优戏"纯粹是南方"土产"。

冬。南宋福建广东招抚使蒲寿庚以泉州降元。

泉州易帜后，蒲寿庚之兄蒲寿宬以隐居避世，将用心转向诗文。蒲寿宬的《心泉学诗稿》是宋元之际较早成集的华化西域人诗集。

蒲寿庚，号海云。祖先为入籍中国的阿拉伯人，先世居广州，南宋时定居泉州（今属福建)。南宋末，为福建广东招抚使，兼提举市舶。降元后，任江西行省参政，至元十五年移福建行省左丞，主持与海外诸国互市，至元二十一年分省泉州。蒲寿宬，号心泉。南宋咸淳七年（1271）知梅州，改知吉州，未赴职。入元，家居以终。有诗集《心泉学诗稿》，原本久佚。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心泉学诗稿》六卷。

正月。南宋亡国后的第一个春节，刘辰翁以词消遣寂寞。

刘辰翁一首著名的〔柳梢青〕，题为《春感》。词中写道：

铁马蒙毡，银花洒泪，春入愁城。笛里番腔，街头戏鼓，不是歌声。那堪独坐青灯。想故国、高台月明。辇下风光，山中岁月，海上心情。

柳梢已青，却不知折赠何人。他对“番腔”“戏鼓”的拒绝，是与“山中岁月，海上心情”密切相关。但不管怎样说，从此人们对“番腔”“戏鼓”将不再陌生。随着征服者的足迹，北曲与杂剧也开始普及。显然，人们对与元取代宋同时出现的这种变化，一开始并不适应。但杂剧很快就成了元代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杂剧剧本的写作成了元代文学的新的增长点。江南的文人也开始在自己的作品中记述北方的风光，许多是陌生已久。花石纲构筑的艮岳、清明上河图、在新一轮聚水成型时期的梁山泊、运河古渡、黄河河套风光、居庸关、滦水之阳的金碧辉煌的帐篷城等等竞相出现在文人笔下。

二月。元廷任命河西僧人杨琏真伽为江南释教总统（江南总摄）。

《元史·世祖本纪》说：二月，“诏以僧亢吉祥、怜真加加瓦并为江南总摄，掌释教，除僧租赋，禁扰寺宇者。”“怜真加加瓦”应是杨琏真伽的原名[①]。元廷设立“江南总摄”（后称江南释教总统），最初的目的只是“除僧租赋，禁扰寺宇者”。

杨琏真伽在任内发掘了南宋皇陵，成为对江南社会生活有重大影响的一件事。关于发掘南宋皇陵的时间，有不同的记载。周密的《癸辛杂识》说是发生在至元二十二年乙酉。但其他文献又说是在至元十五年戊寅。其实，本年杨琏真伽刚出任江南释教总统。他的任期到至元二十五年。至元十五年，江南正是宋祥兴元年，元军先后与文天祥、张世杰等部反复较量，形势紧迫，不具备发掘南宋皇陵的基本条件。

① 杨琏真伽，在《元史》中名字颇混乱，除了上述，还用“琏真加”（《元史》第352页）等名。

白朴的弟弟白恪到江南任职，出任建台扬州的南台掾史。

使人感到陌生的北方人，出现在原南宋治下的城市村镇。“北人”“北客”是南方人对他们的称呼。周密在《癸辛杂识》（别集上）中记载了“北客”白敬甫的一首诗与一则断句：“北客白敬甫有咏前朝诗云：当日陈桥驿里时，欺他寡妇与孤儿。谁知三百余年后，寡妇孤儿又被欺。又咏汴京青城云：万里风霜空绿树，百年兴废又青城。盖大金之亡，亦聚其诸王于青城而杀之。”这是北方人出现在江南文坛较早的记载。

白恪（1247—1309），字敬甫，晚号竹梧。真定（河北正定）人。早慧，受到元好问器重。任河南按察司书吏，至元十四年建南御史台，御史大夫相威表为南台掾史。此后二三十年一直在江南各地任职。白朴中年之后游历南方，显然有其为依托。

陈思济调绍兴路同知、转两浙都转运司同知。

陈思济来江南后，历仕各地，也是较早来到江南任职、并为江南文坛接受的“北人”。又拜陕西按察副使，以丁忧归。至元二十三年任浙东宣慰司同知，再次来江南，任两淮都转运使。历任湖南廉访使、池州路总管、江西廉访使。

奥屯希鲁到江南任职。

奥屯希鲁，其姓奥屯又作奥敦，字周卿，号竹庵。女真族，居淄州（山东淄川）。至元初为怀孟路判官，历河南佥宪、江西宪副，升江东宪使，迁沣州路总管，官终侍御史。元攻取江南之后，是较早到南方任职的北人，工乐府，有诗文名。《录鬼簿》卷上名列于“前辈名公”节，《太和正音谱》列名于俱是杰作一百五十人中。《全元散曲》存其小令2支，套曲2套。

十一月十六日。舒岳祥以《跋王矩孙诗》一文，披露文人经历沧桑之变，传统的生活模式被打破，感到无所适从的惶惑。

舒岳祥《跋王矩孙诗》（《阆风集》卷十二）说：

> 自京国倾覆，笔墨道绝，举子无所用其巧，往往于极海之涯，穷山之巅，用其素所习对偶声韵者变为诗歌，聊以写悲辛、叙危苦耳，非其志也。予久逃空谷，岁且再易。归检故畦，花残药堕，已为樵牧之场，猿狙之径矣。王叔范馆于其旁，课童子不废，暇则穿蒙密，入窈窕，又自课以诗，出小编示余。此所谓用其素所对偶声韵变为诗歌者耶？

噫！方科举盛行之时，士之资质秀敏者，皆自力于时文。幸取第一，则为身荣，为时用，自负远甚。惟窘于笔下，无以争万人之长者，乃自附于诗人之列，——举子盖鄙之也。今科举既废，而前日所自负者，反求工于所鄙。斯又可叹也已！叔范于举业甚工，今当弃其所已工，得不痛惜之乎！丁丑十一月十六日。

江山倾覆之后，原来的社会秩序全都被打乱，最先聚敛起人气来的，是诗人与诗。说来，舒岳祥的话还是客气的。若干年前刘克庄在为一部文集作序时，说“近世贵理学而贱诗赋，间有篇咏，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耳”①。在那时，只有被嗤为没出息的人才甘心作诗人。这个状况的改变，竟是因为“举子无所用其巧”。

从南宋末年以来，诗成了江湖诗人求生的技艺。《东南纪闻》（卷二）记载，有个叫朱少游的“诗客”，在街市间安放一张桌子，为人“卖诗”——以客户的要求，当场作诗。而他是“诗客”中以“精敏得名”者。《山房随笔》则记载一个福建三山的七岁儿童，“游嬉市中，以鬻诗自命”。而传统的学子则大多在诗与科举之间选择了科举。至元十四年的一个明显的不同，则是文人面临“无用武之地”，科举不复存在。

与舒岳祥相呼应的，有何梦桂。他们的言论表明：即便没有改朝换代的巨变，南宋诗坛也已经到了必须变革的地步。取消科举则成了诗学兴盛的推动力。

何梦桂《宋君巽诗序》（《潜斋集》卷七）提到，有一个叫做宋君巽的人，少年“以文鸣场屋，尝领荐冰壶”。在新朝取代宋之后，两人相见，互问近业。宋“出袖中诗相示，曰‘士技穷至此’。”原来完全是因为“科举业废”，士人“郁发于诗”，便“有得于诗也”。是“诗之工而文之穷也。时异世殊，士之技亟变如此”。在文末，针对诗、科举之变，何梦桂大有深意地说“安知变有甚于此者”！——这无疑是指家国之变。何梦桂《清溪吟课序》（《潜斋集》卷五）说得更为具体：“诗非古意，去古犹近。科举兴，并与五七言俱废。士非厄于山林，逸于湖海，与夫矢志于朝廷之上而窜逐流徙者，不暇于诗。”

在何梦桂《潜斋集》中，为时人所作的序接近100篇，占全部文章的70%，这些序写于至元中期到大德年间，主要是为诗集而作。而他为之作序的诗集却没有一部流传至今，这些诗集的作者只有极少数几个人是文学史知

① 《癸辛杂识》续集下“押韵语录”节。

名者[1]。仅此就可见入元后诗歌写作突然勃发、但文坛应对失措的盛况。

曲家曾瑞迁居江南。

曾瑞祖上皆由学而仕，南宋亡后，由北方来到江南，定居于杭州，爱杭州景物别致，人才济济，便定居于此。为纪念故里，名居室为“孤竹斋”，据南宋遗民林景熙《孤竹斋记》，曾瑞“凡有作必叩予，予益奇之”。并开始与钟嗣成交往。

曾瑞，字瑞卿，号褐夫。祖籍平州（辽宁辽阳），迁居大兴（今属北京市）。活动于元前期，比钟嗣成年辈高，视其为忘年交，时相过从，并获益良多。祖上皆由学而仕。去世于杭州时，上门吊唁者多达千人。所作小令、套曲并重，散曲今存小令95首，套曲17套（据《全元散曲》）。长于隐语小曲，并编选有散曲集《诗酒余音》，散失于明代。作杂剧一种《才子佳人悞元宵》，今不存。多才多艺，工山水画，画风宗范宽。

元廷任命的浙东宣慰使陈祜[2]，巡部途中在新昌县境遇盗被害。

陈祜（1222—1277），一名陈天祜，字庆甫（庆父），号节斋。赵州宁晋（今属河北）人，寓居洛阳（今属河南）。早年家贫，刻苦读书，遂通经史，能诗文。元宪宗时任河南府总管。元世祖至元二年，改南京路治中。至元六年在山东提刑按察使任上，忤权臣阿合马，除佥中兴行省事。至元十三年授南京路总管，次年升浙东宣慰使，遇盗被害。谥忠定。据王祎《王安国小传》[3]，新昌县民娄覃“执玉山险辟”作乱，陈祜为他们所杀。陈祜死后，行省右丞史弼领兵进击玉山，娄覃为东阳人王安国擒获。陈祜在山东单父琴台题诗并刻石，当时影响颇大。所著《节斋集》，未见传本。清钱熙彦《元诗选补遗》编录其诗11首。

李庭去世。享年八十四岁。

李庭（1194—1277），字显卿。华州奉先（陕西蒲城）人。幼罹兵乱，但十多岁已有能诗之名。十六岁应词赋进士举，成年时两预乡荐。金元之际，避兵商邓山中，金亡，徙居平阳。后辟为陕右议事官，不久辞官还乡。中统元年署陕西讲义，至元七年授京兆教授，十年为安西王府咨议。有《寓庵

---

① 比如《文山诗序》，为文天祥作，《永嘉林霁山诗序》，为林景熙作。

② 陈祜，《元史》卷一六二、一六八以及其他一些文献作陈祐，或陈天祐（《元史》卷一六七），但“琴堂石刻”作陈祜不误。

③ 《王忠文集》（《金华丛书》本）卷十七。

集》八卷，今存。词结为《寓庵词》一卷。

杜仁杰在本年前后去世。

杜仁杰（1198—约1277）①，字仲梁，号止轩。原名杜之元，字善夫。济南长清（今属山东）人。金末，与麻革等隐居河南内乡山中，以诗唱和。麻革《送杜仲梁东游》诗云："商岩不足稽此士，又欲东略宋与梁。"元好问与之相交较深，作送杜善夫出山诗说："青眼高歌望君久。"② 入元，屡徵不起，隐逸以终。据称，"仲梁性善谑，才宏学博，气锐而笔健，业专而心精。"（顾嗣立《元诗选》小传）《自遣二首》云："少日襟怀悔自豪，暮年志节讵须高。敢将议论轻疑孟，闲得工夫细和陶。"道出入元心境。杜仁杰死后，王旭、王恽、胡祗遹等人皆有吊唁之作，其子杜元素仕元任福建闽海道廉访使，杜仁杰以子贵，追谥文穆。杜仁杰诗，《元诗选》三集选人24首，题为《善夫先生集》。《太和正音谱》评其散曲"如凤池春色"，但作品仅存小令1首，套曲3套，残套2套（据《全元散曲》）。套曲《喻情》与《庄家不识勾栏》是元曲名篇。〔般涉调·耍孩儿〕《庄家不识勾栏》叙事化明显，以一个初次进入城市的庄稼汉在勾栏看戏的口吻，将元代初期的戏曲表演展示得如在目前。

至元十五年戊寅（1278）

胡祗遹出任荆湖北道宣慰副使。

在宣慰副使任上，胡祗遹写有〔沉醉东风〕小令③，赠给著名杂剧演员朱帘秀。大致同时向朱帘秀赠曲的，还有关汉卿、冯子振等人。

崔斌出任江淮行省左丞。

崔斌（1223—?），字仲文，蒙古名燕帖木儿。马邑（山西朔县）人。出身于北方豪族。至元初，授中书郎中，镇守东平。除枢密院同签，从色目将领阿里海涯出师江南，改河南宣慰使，江南底定，历任湖广行省参政、左丞，

① 此从李修生《杜仁杰行实系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专刊）。

② 诗题为《去岁君远游送仲梁出山》，见《遗山诗集》卷五。

③ 《元史》卷一七〇《胡祗遹传》说："宋平，为荆湖北道宣慰副使。"宋平，是至元十三年。而涉及此曲本事，均称胡祗遹为"胡紫山宣慰"。故系于本年。

至元十五年迁江淮行省左丞。权臣阿合马视其为阿里海涯党羽，被罗织罪名处死。后平反，追谥忠毅。《元史》本传说崔斌“性警敏，多智虑”，“尤攻文学，而达政术”，早年精于诗文。作品传世不多，但颇有特点。

至元十六年己卯（1279）

正月。被元军俘获的文天祥，渡海时写出著名的《过零丁洋》诗。

祥兴二年/至元十六年，文天祥被拘禁在张弘范战舰上，一路经过了以后陆秀夫负幼主投海的厓山海域之外的零丁洋海面。文天祥写《过零丁洋》明志，并在诗后写到：“上巳日（按：当作上元日），张元帅令李元帅（元将李恒）过船，请作书招谕张少保（南宋统帅张世杰）投拜。遂与之言：‘我自救父母不得，乃教人背父母，可乎？’书此诗遗之。李不能强，执诗以达张。（张弘范）但称‘好人’！‘好诗’！竟不能逼。”《过零丁洋》写道：

>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飘摇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可以说，有了《过零丁洋》文天祥已经名垂青史。

二月。宋元舰队在厓山海域决战，宋军大败，陆秀夫负幼帝投海。张弘范在厓山勒石纪平宋之功。

张弘范之父张柔是从蒙古灭金的功臣。二十岁时，张弘范代其兄张弘略摄顺天路总管府事。中统三年改任行军总管，作战有勇有谋，张柔夸赞他：“真吾子也！”至元元年，授顺天路管民总管，佩金虎符。次年移守大名。至元六年以行军万户之职统兵围南宋重镇襄阳，数年后襄阳陷落。至元十一年丞相伯颜伐宋，张弘范为先锋。以军功授亳州万户，赐名拔都（勇士）。至元十六年，张弘范率水陆大军于厓山击溃宋将张世杰，张世杰退至海陵山，战舰被飓风所损，张世杰本人溺死。宋大臣陆秀夫抱幼主赴水死，张弘范勒石纪功而返，江南成规模的抗击元军失败。

汪梦斗被徵至京师，但不愿接受官职，要求南还。汪梦斗是南宋亡国后，

较早举荐入朝的南人。

汪梦斗，字以南，一字玉南，号杏山。绩溪（今属安徽）人。宋理宗景定二年（1261）江东漕试第一，授承节郎江东司制幹官。宋度宗咸淳初，迁史馆编校。曾与叶李等上书劾贾似道，叶李等坐罪，汪梦斗遁归。入元，荐至大都，不受官而还。此后，除徽州路儒学教授，至元二十二年辞归。本年北上，虽然没有接受官职，但纪行之作却使其作品增色。〔摸鱼儿〕《过东平有感》写道："吟情苦。滴尽英雄老泪，凄酸非是儿女。西湖似我西湖否？只怕不如西子。"〔南乡子〕《初入都门漫赋》是北游佳作：

> 西北有神州。曾倚斜阳江上楼。目断淮南山一抹，何由？载泪东风洒汴流。　　何事却狂游。直驾驴车渡白沟。自古幽燕为绝塞，休愁。未是穷荒天尽头。

在他北上南还之间，随陆秀夫负幼帝赴海，历史的一页已经翻过。

此行从正月启程，到十月还归故里，历时十个月。纪行之作《北游集》自序中说：

> 是岁己卯春正月戊辰如京东，十月丙申归里，舟车几行万里，客食二百七十日。自吴适楚，入宋、入鲁、入齐、入赵，以达于燕。……天时之寒燠，地理之险易，人情之美恶，物产之丰俭，风俗之醇驳，虽不能尽知，有所知随而笔之，目为《北游日志》。至于悲伤怀感，忧惧愁叹，不能自已，又每见之诗兴。夫见人以诗为贽，以及白事迹志，皆不能无诗。初亦杂录之志中，或谓冗长不雅观，因别为此集，亦目为"北游"，非无意也。余生于南，自少至长，冉冉老矣，而未尝得至于南之极。岷峨在吾舆图，而生平未尝西行。东至云间见海矣，自以为东之极。今天下东必至登莱，才为极，足亦未至。而北乃直至秦长城下，则此游可以为北之极。且以余有生时言之，北至淮极矣，借得在全宋盛时，北亦止极白沟耳。今逾淮，又逾白沟，信乎此游为北之极也。吁，其亦可喜也夫，其亦可悲也夫。①

跨越白沟，使汪梦斗百感交集。北宋全盛时期，白沟即是宋的边境，那时宋的臣民已经不能逾越这道小小的沟壑，更不用说偏安江南的南宋了。

① 《全元文》第19册第680页。

至元十七年庚辰（12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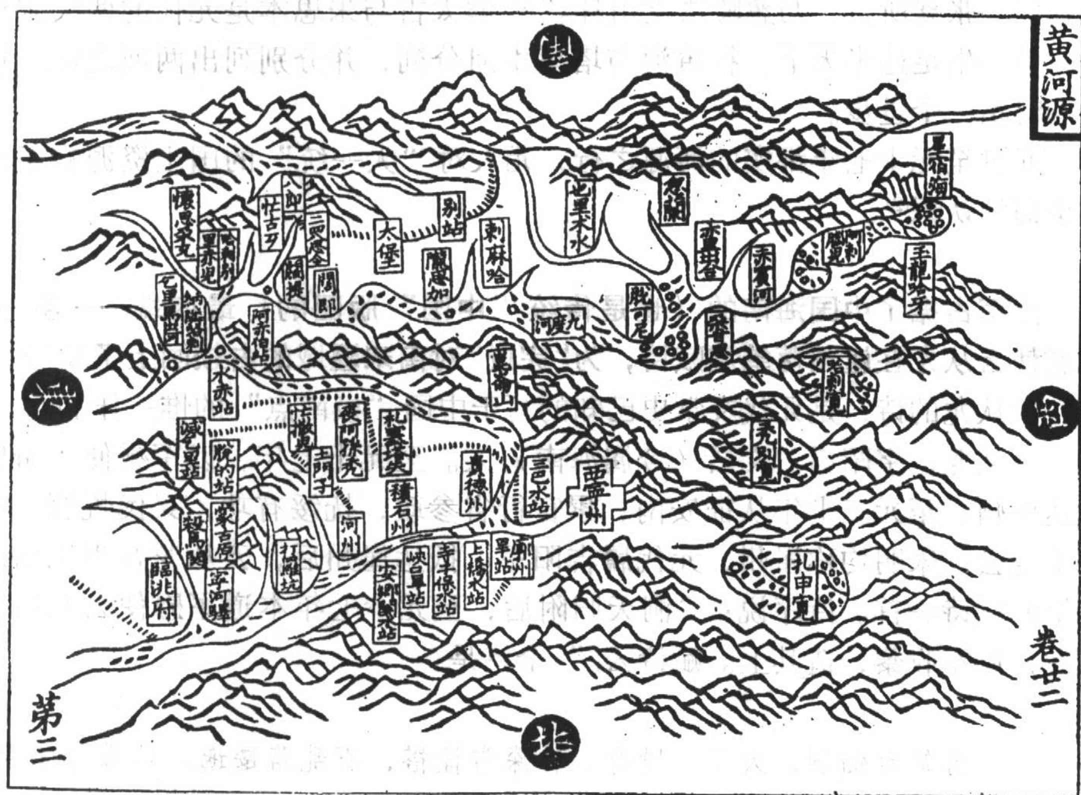
元世祖命潜邸“旧人”都实，前往青海积石山，探索黄河之源。

此行的见闻与成就，由潘昂霄记载在《河源志》中[1]。通过《河源志》，作为“大一统”的象征，昆仑、葱岭，阆风、玄圃，从神仙缥缈之区成为探索者涉足的秘境。为此元世祖特下谕旨：“黄河之入中国，夏后氏导之，知自积石矣。汉唐所不能悉其源，今为吾地，朕欲极其源之所出，营一城，俾番贾互市，规置航传，凡物贡水行达京师，古无有也，朕为之，以永后来无穷利益。”

四月，都实率领的使团抵达河州东六十里处。又经过四个月艰难路程，始抵河源，并将河源区域正式定名为“星宿海”。本年冬天，回到京师。都实出自女真蒲察氏，精通蒙古文，他的行程旷古所无，见闻更前所未有。延祐二年，翰林侍读学士潘昂霄将都实的弟弟（也是同行者）、翰林学士承旨阔阔出讲述的此行经过，记述成《河源志》。特别值得提到的是：通过此行，在历时千年之后，对《史记》《汉书》首倡的“黄河重源说”提出质疑。从张骞通西域开始，人们普遍认为黄河有两个源头，一是出自昆仑，一是出自葱岭，经南北两河汇于蒲昌海—罗布泊，再由蒲昌海潜行地下，从积石山涌出地表，成为河源。《河源志》中则针锋相对说：“史称河有两源，一出于阗，一出葱岭。于阗水北行，出葱岭河，注蒲类海，不流。洑至临洮出焉。今洮水自南来，非蒲类明矣。”对于了解国土资源，这次考察的意义不容忽视。从疆域来说，元代远大于汉唐，对山河的认知也要超越汉唐，这是元世祖探索河源的初衷。当然，终于元未能在星宿海设置河源郡，那个通过航船从河源顺流抵达京师的设想也从未曾施行。但这确实是探讨黄河与中原文明关系的一个重要环节。关于设置河源郡，梁寅在其《河源记》（《石门集》卷一）说：“宪宗命皇弟旭烈征西域，凡六年，拓地四万里，而河源在域内矣。至元庚辰，世祖命臣都实往西域，将城其地以同互市。自河州行五千里抵河源。及还，图城郭位置以闻。上悦，以为吐蕃都元帅，领工徒以往，使其弟阔阔出驰奏，大臣沮之。”也就是说，当时已经有了未来的“河源郡”的具

---

[1] 潘昂霄《河源志》又名《河源记》。关于此行，除《河源志》，元代地志学家朱思本还曾将八里吉思家所藏的梵文河源图志（应该就是都实的出使报告）译为汉文，《元史》卷六十三《地理志·河源附录》全文录出了潘昂霄的《河源志》，并将朱思本译本的异文，一一录在有关文字之下。



这幅《黄河源》图，出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二。《南村辍耕录》没有说明它的来历，但显然不是陶宗仪自己画的，应该是都实的河源之行的成果。作为今存第一幅河源地图，它对河源区域的标识，比汉唐时期前进了一大步。可惜的是，那个从河源漂流到入海口的设想没有进一步实施。我们说，元代科技是近世的开端，这个地图就是例证之一。

体位置。

汉代张骞通西域，一个重点是考察黄河的源头。所谓河出昆仑以及张骞循河源无意中抵达天河得织女的支机石的传说，一直影响了历代学人的思维与视野。这次的河源之行，是中国西部探险考察进入近世的里程碑。河出源头，回环入海，那就是人们心目中的“天上人间”。数十年前耶律楚材面对南宋使臣的“狂言”——“天上天上去，海里海里去”——等于宣告：新一轮的统一不可抗拒，那必将是华夏文明的全新时期。这种心态与思维方式，对元人影响颇大。

经过实地考察，元人对黄河源流有了比较正确的了解。至正十五年，熊太古通过《冀越录》对七八十年前的这次探索河源的成果作了概述：“世皇……又遣使穷河源。在西南平地，泉源涌出，日光射之，形似列星，因名‘星宿海’，北流至河州始浊，复东南入海。河源历汉唐宋所不能穷，我朝方

得其详。张骞所言，乃葱岭之支川耳。”① 熊太古与朱思本是元代的两大旅行家。他一生足迹半天下。将黄河与塔里木河分列，并分别列出两河之源，这在当时是一个进步。

通过至元十七年都实的河源之行，元人对“大一统”的国土资源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②。

元军占据了中国海南的（也是传统“中国”版图的）最南端——崖州。军尉使云从龙在崖州落笔洞赋诗，为“完成”对南宋疆域的占领画上了句号。

云从龙的诗，是元代文学史已知的写于中国“极南点”的惟一作品。

云从龙，字昭勇。文昌（今属海南）人。至元十七年，以军慰使身份曾抵达崖州。至元三十年从征安南，累官行省参政，抚绥有功，兵民悦服。今海南崖县，宋明均称崖州，元代属吉阳军。抵达崖州后，云从龙在当地名胜落笔洞赋诗一首。诗序说：“洞天归附后，至元十七年本道军慰使云昭勇名

从龙，调军收黎，造其上。赋诗云。”全诗是：

落笔古仙洞，天开一段奇。林深常挂搭，石乱路逶迤。仿佛禅僧骨，胡涂墨客诗。何时了公事，相望问仙期。

这首诗见《永乐大典》卷一三〇七五引《崖州志》。诗原无题。《大明一统志》卷八十二崖州“山川”节，有落笔洞：“落笔洞，在崖州东一百里，石壁峭立，上有石门，中有二石如悬笔。转东数步，复有一洞，中有石如屏，外房有窍通光，内房深暗，相传人有井通海。”洞内有深井与大海相通，而洞外就是南中国海的汪洋海面。全诗点睛之笔，是写出无意中走出洞窟，竟与南海相望。

扬州军火库失火，引起巨大灾难。

这次事故使人们不免联系起刚刚硝烟散去的征战。在当时的笔记与诗文中，对它的记述颇谨慎。这个事件，周密《癸辛杂识》（前集“炮祸”）记

---

① 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四库馆臣对熊太古的上述看法提出批评，并因此将《冀越录》仅列入“存目”，而没有编入《四库全书》。

② 据《新唐书·吐蕃传》，长庆二年（822），唐穆宗派刘元鼎出使吐蕃，刘元鼎返回后将得自吐蕃人的信息上报朝廷，其中说：河源在“闷摩黎山”。这比前人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但都实一行是实际考察过星宿海的第一支队伍，《河源志》是探索黄河之源的第一篇纪实之作。

述道：

> 至元庚辰岁，维扬炮库之变尤为酷烈。盖初焉制造皆南人，囊橐为奸，遂尽易北人，而不谙药性。碾硫之际，光焰倏起，既而延燎，火枪奋起，迅如惊蛇，方玩以为笑。未几，透入炮房，诸炮迸发，大声如山崩海啸，倾城骇恐，以为急兵至矣，仓皇莫知所为。远至百里外，屋瓦皆震，号火四举，诸军皆戒严，纷扰凡一昼夜。事定按视，则守兵百人皆靡碎无遗，楹栋悉寸裂，或为炮风扇至十余里外，平地皆成坑谷，至深丈余。四比居民二百余家，悉罹奇祸。此亦非常之变也。

这个“非常之变”由“北人”处置不当引起，但“南人”的不合作则是关键，可见应该消除的是这道无形的南北“界栏”。

在此前后关汉卿出游江南，并作套曲〔南吕·一枝花〕《杭州景》。

作为南北一统的一大景观，是人员交流。世居北方的关汉卿的江南之行，在钱塘达到了“高潮”。

关汉卿是元曲冠冕。但文献中关于他的记载不但稀少而且颇不一致。除姓关，表字（一斋，已斋）、里贯（大都，祁州，解州）、经历（太医院尹，太医院户）、世次（金人，元初人）等，都有歧异。——惟独对他的成就从无他说。一般认为，他长期生活在大都，至元年间在世①。据著录，他一生写出杂剧60余种，今存18种。这是古往今来的戏曲作家之最。今存者（据《关汉卿戏剧集》）是：《感天动地窦娥冤》《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包待制三勘蝴蝶梦》《望江亭中秋切鲙》《赵盼儿风月救风尘》《杜蕊娘智赏金线池》《钱大尹智宠谢天香》《温太真玉镜台》《尉迟恭单鞭夺槊》《关大王独赴单刀会》《王闰香夜月四春园》《刘夫人庆赏五侯宴》《邓夫人苦痛哭存孝》《山神庙裴度还带》《状元堂陈母教子》《闺怨佳人拜月亭》《诈妮子调风月》《关张双赴西蜀梦》。《窦娥冤》《智斩鲁斋郎》《蝴蝶梦》《望江亭》《单刀会》等，是元杂剧的经典之作。除杂剧，关汉卿还存有小令57支，套曲14套（据《全元散曲》）。在元曲文献中，关汉卿从来是领军人物。

关汉卿有三套〔南吕·一枝花〕，一是《赠朱帘秀》，二是《杭州景》，三是《不伏老》，都是元曲名篇。

《杭州景》云：

---

① 关汉卿散曲有《大德歌》，如“大德”是年号，则在大德初年仍在世。

普天下锦绣乡，寰海内风流地。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水秀山奇，一到处堪游戏。这答儿忒富贵，满城中绣幕风帘，一巷地人烟凑集。

〔梁州〕百十里街衢整齐，万余家楼阁参差，并无半答儿闲田地。松轩竹径，药圃花蹊，茶园稻陌，竹坞梅溪，一陀儿一句诗题。行一步扇面屏帏，西盐场便似一带琼瑶。吴山色千叠翡翠，兀良望钱塘江万顷玻璃。更有清溪，绿水，画船儿来往闲游戏。浙江亭紧相对，相对着险岭高峰长怪石，堪羡堪题。

〔尾〕家家掩映渠流水，楼阁峥嵘出翠微。遥望西湖暮山势，看了这壁，觑了那壁，纵有丹青下不得笔。

通过这篇纪游之作，真实地表达出一个“北人”对“人间天堂”的观感——再有想像力，与眼前景物相比也相形见绌。一些文献提到，朱帘秀后期到江南居住，历经扬州，定居于杭州①。有的研究者认为，关汉卿的《赠朱帘秀》，是在朱帘秀定居杭州后所作。这样看来，关汉卿出游杭州与朱帘秀也许不无关系。亲自一见杭州之景，又见到旧友（红颜知己）朱帘秀，并写出赠曲，他才有“不伏老”的强烈情感。《不伏老》则是一篇自叙传。

姚枢去世。享年七十八岁。谥文献。

姚枢在元初首倡经学，与许衡、窦默互相讲习，开一代风气之先。在理学南北融合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他的侄子姚燧也是元代前期主要的古文家之一。

张弘范去世。享年四十三岁。

张弘范（1238—1280），字仲畴。易州定兴（今属河北）人。出身河北豪族，金时就变相割据一方，蒙古灭金，其父张柔从蒙古征战，立下战功，易州张氏是元代著名的汉军世家之一。延祐六年追封淮阳王，谥武略，改谥忠武，再改献武。有诗词曲传世。诗见《淮阳集》一卷；词见《淮阳乐府》一卷；曲见《全元散曲》。张弘范早年颇能为诗歌，曾从学于郝经，留心儒术，属意文事。《四库全书总目》评其诗“颇沿南宋末派，大抵爽朗可诵”，并指出其中某些诗“置之《江湖集》中不辨也”。作为一个北方豪族、世代军人这确实有些奇怪。今存词曲中，既有〔鹧鸪天〕《围襄阳》那样剑拔弩

① 参阅孙崇涛、徐宏图《青楼集笺注》（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0 年）第 87～89 页。

张之作，又有〔天净沙〕《梅梢月》这种愁肠百结的低吟："黄昏低映梅枝，照人两处相思。那的是愁肠断时。弯弯何似，浑如宫样眉儿。"

攻灭南宋过程中，一次宴会，他与伯颜各赋小令〔喜春来〕一首，被称为"帅才相量"。伯颜所作是："金鱼玉带罗栏钩，皂盖朱幡列五侯，山河判断在吾笔尖头。得意秋，分破帝王忧。"张弘范所作是："金装宝剑藏龙口，玉带红绒挂虎头，绿杨影里骤骅骝。得意秋，名满凤凰楼。"[①] 作为一个诗人，使人困惑的是张弘范传世的一卷诗几乎纯是南宋江湖派风格。但伯颜与张弘范的〔喜春来〕，却是非其人不能为。

至元十八年辛巳（1281）

七月。宋无出征日本归来。

宋无本年出征日本，经历惊涛骇浪。自五月出海，到七月，大风摧毁大部分战舰，元军统帅弃师而还。本次出征，调集十五万大军，除随征的高丽船船体坚固，生还者不足五分之一。

关于此行，宋无的自传《吴逸士宋无自铭》[②] 作了具体描写：南宋亡国之际，"考国珍持无奔吴，家焉。先君自场屋顿挫，乃锐意韬钤，遂以材略应枢府辟平江帐前提举。乙亥，城附。至元辛巳，领征东万户案牍，适病痿，无丐以身代，省府然之，俾典书檄。五月，官兵集四明入海。舟偕东北向。而省左右幕属各异舟，号令不相闻。后发者追程，冒进得耽罗国。盖前锋先遭飓风失道而至是。七月，抵竹岛。雹雨风交作，舟不得泊，随惊涛上下，触击皆碎。幸而飘经高丽诸山，复罹沉疴，首发尽脱，瘦骨柴立。"得以生还，他与父母抱头痛哭。直到近六十年之后，对此行宋无仍然记忆犹新。

魏初作《观象诗》[③]，记"北人"亲见大象的经过。

这是魏初在张巨源家中目睹大象之后所写。诗中说："皇帝马箠开云南，始得一象来中国。中国传闻未尝见，一日争睹轰霹雳。"魏初是北方人，此

① 见《草木子》卷四上。伯颜所作，一些文献也作为姚燧散曲。从文意看，这不大像是姚燧的口气。

② 《元人十种诗》的《啽呓集》附录。《吴下冢墓遗文》卷二题为《吴逸士宋无自志》。

③ 《青崖集》卷一。

时正在江南做官。他的诗如《杭州大雪》，记亲历至元二十一年十二月七日钱塘罕遇的大雪，《油井》言及石油的开采利用，都是可以证史之作。

许衡去世。享年七十三岁。

许衡（1209—1281），字仲平，号鲁斋。怀州河内（河南沁阳）人。家世务农，早年研习程朱理学，与姚枢、窦默互相讲习，获益颇多。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前在秦中为王，即以姚枢为劝农使，许衡为京兆提学。中统元年任国子祭酒，但任职时间不长，以有病为由辞去。至元二年复召入京师，议事中书省。至元七年，任中书左丞。次年拜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至元十年辞归，几年以后又被召至京师，修成《授时历》。至元十七年因病回到家乡，元世祖特命他儿子许师可为怀孟路总管，以就近奉养。追封魏国公，谥文正。著有《鲁斋遗书》八卷。

至元十九年壬午（1282）

二月。授洞溪招讨使郭昂等九人以虎符[①]。

从至元十三年起，郭昂一直在湖广山林边远地区提军征戍。军人与诗人，在他身上并存。通过自己诗篇，郭昂表述了超出于“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情愫。尽管握有可以随时调动军队的信物——虎符，却解救不了他的信心危机。在征战于林莽深山时，郭昂写出《白头行》15首、《沅州杂行二十三首》以及一系列的纪行诗《辰州道中》《赣州道中》《惠州道中》《循州道中》《沅州道中》《罗鬼道中》《望云道中》等。

《白头行》[②] 其中三首写道：

> 回首溪山路，崎岖几万层。断崖横独木，绝壁挂孤藤。一妇还当险，三军莫敢登。白头谁问我，六载履春冰。
>
> 世未曾经事，寻常有数端。杀兄因竞土，戮父为争官。刀弩媒归价，蛙蛇荐上盘。白头谁问我，无日不心寒。
>
> 好乱终难养，心多不易拿。语言长索顺，道理敢交差。药箭愁沾血，

① 据《元史·世祖本纪》，至元十九年二月记事。

② 《白头行》见《诗渊》第11页，《辰州道中》见《诗渊》第2003页。

雷枪怕入茶。白头谁问我，图甚不归家。

《辰州道中》诗云：

昨日风中渡马鞍，今朝雪里到牛栏。眼前玉宇千峰暮，脚底冰梯万丈寒。坐处莫忘行处苦，上坡终比下坡难。虚名到底将何用，又努残躯过七盘。

郭昂《野斋集》原本虽然亡佚不存，但郭昂诗的风格显然与元好问颇相近，不过诗人的定位、取舍有所不同。

十二月九日。被元廷拘押数年之久的南宋丞相文天祥，遇害于大都柴市。

押赴刑场时，文天祥高吟在囚室里写的五言古诗《正气歌》。文天祥本不以诗知名，但他是宋诗史的最后一章。文天祥的后半生是南宋抗击元军的统帅与象征。在他死前在大都的拘押期间，江南的宋遗民害怕他会改变初衷降元，多次写出"生祭""望祭"他的文字，促他就义成仁。在未被元将擒获时，他的几组诗《脱京口》《出真州》《至扬州》已经无愧于诗史。这几组诗在各首之下均有小注。三组诗的题记则分别说：

"二月二十九夜，予自京口城中间道出江浒，登舟，溯金山，走真州，其艰难万状，各以诗纪之。"

"予为李制所逐，出真州，艰难万状，不可殚纪。痛哉！"

"予至扬州城下，进退维谷，其彷徨狼狈之状，以诗志其概。"

他写的往往不是豪言壮语，也并不擅长以言词鼓舞人心。他通过自己的艰苦抗争，来体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信念，所以他的诗都可以叫做"正气歌"。《指南录》《指南后录》《文山诗史》（即《集杜诗》）全是如此。

文天祥死前，南宋已经不复存在，他的精神"依托"也已土崩瓦解，是诗伴随他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

杂剧演员朱帘秀受到文人普遍器重①，以诗文词曲相赠成为时尚。

朱帘秀，艺名珠帘秀。作为大都杂剧女演员，胡祇遹、冯子振、王恽、卢挚等特别是关汉卿，均与其交往密切，这些交往不但是文坛轶事，也成为

① 朱帘秀与胡祇遹的交往，据李修生《元代杂剧演员朱帘秀》（《戏曲研究》第五辑）考证，在至元二十六七年间。

诗文词曲写作的题材。

《青楼集》云：

珠帘秀，姓朱氏，行第四。杂剧为当今独步；驾头、花旦、软末泥等，悉造其妙。胡紫山宣慰，尝以〔沉醉东风〕曲赠云："锦织江边翠竹，绒穿海上明珠。月淡时，风清处，都隔断落红尘土。一片闲情任卷舒，挂尽朝云暮雨。"冯海粟待制，亦赠以〔鹧鸪天〕云："凭倚东风远映楼，流莺窥面燕低头。虾须瘦影纤纤织，龟背香纹细细浮。红雾敛，彩云收，海霞为带月为钩。夜来卷尽西山雨，不著人间半点愁。"盖朱背微偻，冯故以帘钩寓意。至今，后辈以"朱娘娘"称之者。

除胡祗遹、冯子振，卢挚写有〔双调·蟾宫曲〕《醉赠乐府朱帘秀》与〔双调·寿阳曲〕《别朱帘秀》，一往情深。朱帘秀也以〔双调·寿阳曲〕作答："山无数，烟万缕，憔悴玉堂人物。倚篷窗一身儿活受苦，恨不得随大江东去。"这也许是朱帘秀在出游江南之前的告别。作为一个著名演员，朱帘秀成了一种"品牌"，她学生辈的演员以"赛帘秀"为艺名。这也可以与关汉卿相比，一个江南的杂剧作家名为"蛮子汉卿"——南人中的关汉卿；年辈略低的曲家被称为"小汉卿"。关汉卿的套曲〔南吕·一枝花〕《赠朱帘秀》是元曲名篇：

轻裁虾万须，巧织珠千串。金钩光错落，绣带舞蹁跹。似雾非烟，妆点就深闺院。不许那等闲人取次展。摇四壁翡翠浓阴，射万瓦琉璃色浅。

〔梁州〕富贵似侯家紫帐，风流如谢府红莲，锁春愁不放双飞燕。绮窗相近，翠户相连。雕栊相映，绣幕相牵。拂苔痕满砌榆钱，惹杨花飞点如绵。愁的是抹回廊暮雨萧萧，恨的是筛曲槛西风剪剪，爱的是透长门夜月娟娟。凌波殿前，碧玲珑掩映湘妃面。没福怎能够见。十里扬州风物妍，出落着神仙。

〔尾〕恰便似一池秋水通宵展，一片朝云尽日悬。你个守户的先生肯相恋，煞是可怜。则要你手掌儿里奇擎着耐心儿卷。

据《绿窗纪事》，朱帘秀晚年流落杭州，嫁给一个道士，境况不佳。

姚天福出任山北辽东道按察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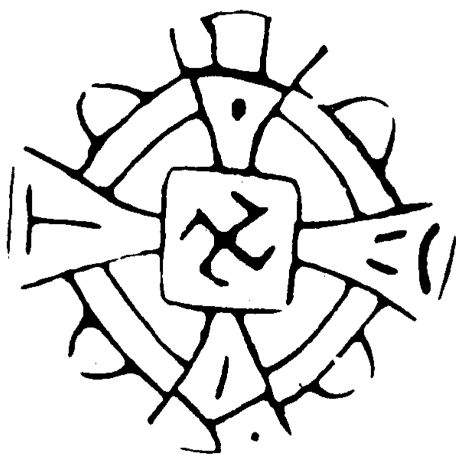
在按察使任上，姚天福审结了一件离奇曲折的杀夫案。这个著名案例，成为后来公案小说戏曲反复取资的“宝藏”。

虞集《姚忠肃公神道碑》[①] 提到姚天福在山北辽东时的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公为山北辽东按察使，武平路武平县车坊寨刘义，军籍也。其兄成暴死，诣官告其嫂阿李与建州王怀通，疑其为所杀。县令丁钦验尸，无死状，言诸府，府不能决。以告公。公曰：安得无死状？期三日，必如期复命。府以责钦，钦忧不知所为。其妻韩问之曰：‘何为忧若是？’曰：‘刘成之狱，有其情而无其迹，府期责甚急，且姚公不可违，奈何？’韩问其事始末，曰：‘验尸时，曾分发观顶骨乎？’‘亦观之，无见焉。’曰：‘子不知，是顶中当有物以药涂之，泯其迹耳。’钦即往濯而求之，顶骨开，得铁三寸许。持告府，府诣公言。公曰：‘敏哉！令胡为前迷而今得也。’召钦来赏之，钦至，具言得妻韩教事。公曰：‘法当赏韩。’以他事苛留钦，而以钦言召韩于家。韩至，即引至公前。公曰：‘汝能佐夫不及，甚善。汝归钦几何时？’曰：‘妾莱州人，嫁广宁李汉卿为妻，汉卿死十月，贫无所依，适丁令半岁矣。’公曰：‘汉卿今葬何所？’曰：‘寄殡广宁某寺中，贫未能还葬也。’乃以韩付有司曰：‘是有事，当问。’即遣宪吏刘某，昼夜驰四百里至广宁，会官吏，即其寺，果得李汉卿棺，启而视之，其顶则果如刘成也。取广宁文书，封顶铁以还。公以铁示韩，韩即款服。而钦亦自缢。不旬日，而两狱皆具平。”

第二件事发生在他行部时：“道过景州，今遵化县也。未至州数十里，有羊角风起马前。公曰：‘此必有冤告我。’吏心诮公，而不敢言。公曰：‘苟有冤风，当先我至驿。’即不见。及至州驿，庭间蓬蓬然转旋不去。公召尉，选老于游徼者二人，曰：‘汝随风往。’仍谕风曰：‘人行，勿越山逾水。’三人者，从风行尽一日，野宿。旦，风复作于前，从之。又半日，指泽中葭苇深处，得杀死者五人，皆无所考辨。独一人腰间系小印[②]，持还以为佐验。公曰：‘吾得之矣。’乃召州长吏语之曰：‘我密奉檄市布帛，赏工数甚伙。’尽括逆旅所有徽验之印文，不类。曰：‘殊少，不足用也。’使令四出邀行贾，吏

① 见《山右石刻丛编》卷三十四。

② 这里的小印，是元代曾广泛使用的“花押”（又称为“元押”）。花押应用范围广泛，不但是元人的“身份证”，信物，甚至可以替代门锁。印文有篆字以及其他各体汉字、图形、其他民族的文字、特意设计的签字，还有十字架、“卍”等等。



十字形花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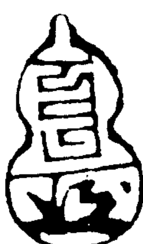




关防　　谨封　　合同







汉字姓氏加花押

元代花押。那个十字形的比较特别，它的使用者显然是也里可温——基督教徒。

出西门，有四人载布五驴北行者，即止之，曰：'官市尔布。'曰：'吾弗鬻也。'曰：'官市，汝安得辞？'即尽驱以至州，视布上印文，如所得者。即推此四人，问以苇中杀人事，款服无异辞。事闻，取而尸之京城之外云。"

这两件事在当时传播颇广。特别是前者，在姚天福的另一篇"神道碑"（孛术鲁翀撰[1]）中，有大致相同、但简略得多的记载，同时还见于《南村辍耕录》（卷五"勘钉"节）。显然，《南村辍耕录》是出于孛术鲁翀撰"神道

---

[1] 见《元文类》卷六十八。

碑”，它的内容没有虞集“神道碑”丰富具体。虞集是撰写碑志文的大家，他曾为写不写这两件事颇费踌躇。因为“国人”传诵的这两个案例“殊神怪”，他“不敢书”。最终，他的结论是:“此二事，世所传说多有之。而姚公之事，岁月地理人氏名姓，悉详如此，故可书。”同时他也做了“察问故吏，考其事实”的考察，终于写在自己的文章中。

“勘钉”这件故事的结尾，《南村辍耕录》的说法是，丁钦“悸卒”——吓死了，“时比公为宋包孝肃公拯云”。事实上这个故事以后一直依附在包公的身上，并成了小说戏剧（特别是公案）的故事素。元无名氏《包待制双勘钉》杂剧即演此事，但未能流传至今①。第二个事件，涉及鬼魂，属于“子不语”的范围。但在《叮叮当当盆儿鬼》② 与《包待制智赚生金阁》等元代杂剧中以及在后世的小说戏曲（公案）中都有它的影子。特别是旋风（“羊角风”）为冤魂所化这个情节。那个通过核对身上携带的印章来判别死者的做法，与元人以“元押”为身份证明的特殊习惯可以互相印证。

元是叙事文学的兴盛时期，代言体的小说、戏曲分立文坛，而诗文的叙事化与想象成分，依靠细节的生动真实，促使文字具有更大的说服力，所以元代文学即便是诗文，也体现出向叙事化靠拢的倾向。从真实的事件为起点，通过口口相传，通过一次次酝酿发酵，诗文终于找到了新的支撑点。实际上，元代诗文与小说、戏曲在充分叙事化、充满想象张力等特点上的互相转化开始得相当早。

四月。郑所南将其诗文杂著集《心史》密封，沉于苏州承天寺古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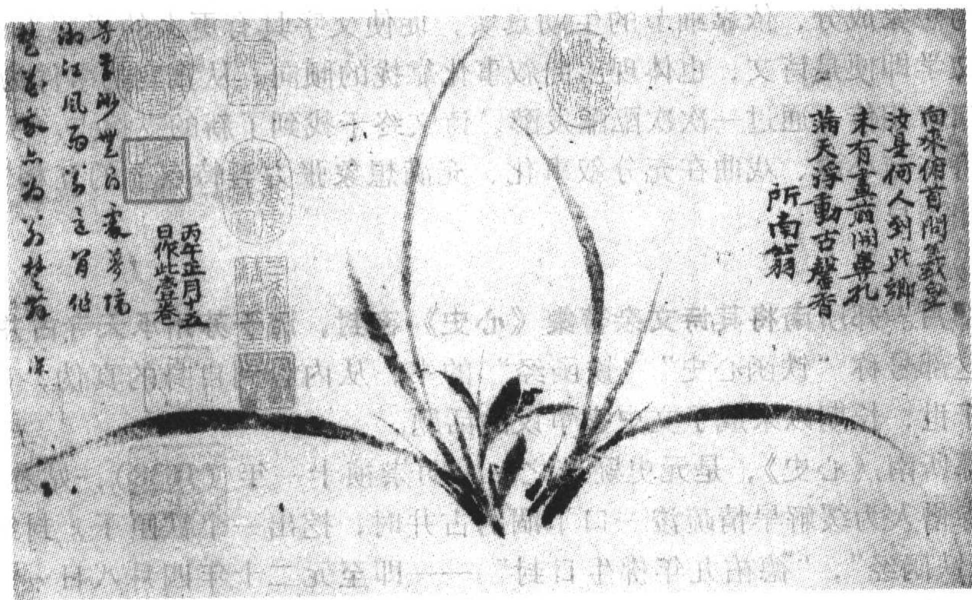
这部号称“铁函心史”“铁函经”的书，从内容到自身的真伪，自明末重现于世，长期以来成了文史家争议的话题。

郑所南《心史》，是元史疑谜之一。明崇祯十一年（1638），姑苏大旱。承天寺僧人为缓解旱情疏浚一口干涸的古井时，挖出一个铁匣子，封纸上书“大宋铁函经”，“德祐九年佛生日封”——即至元二十年四月八日——等文字。打开，又是一个埋在生石灰中的锡匣，由蜡密封，其中是一卷古写本。困惑学术界数百年的“铁函心史”就这样面世了。写本是南宋遗民郑所南的

① 清人焦循《剧说》提到：村中演剧，每演《包待制双勘钉》，一名《钓金龟》。可见它在民间的影响。早在《酉阳杂俎》等典籍中，就出现过与“勘钉”近似的故事素。但姚天福事不可能出自虚构。

② 元人南戏有《包待制判断盆儿鬼》，但剧本不存。京剧中的《乌盆记》就是据《叮叮当当盆儿鬼》衍变。《包待制智赚生金阁》，《元曲选》注明武汉臣作，但或以为应归于无名氏。总之，有关的故事是出于民间传说。

诗文杂著集，总题为《心史》，包括《咸淳集》《大义集》《久久书》《杂文》《大义略叙》。自出土，立即引起轰动，但争议也同时出现。至今，说其真者视为惊世奇书，说其伪者目为明人伪造，代有其人。从今存文献中，还没有发现元人涉及《心史》的文字，实际《心史》的意义与作用，主要是改变了后人对元代历史与文学的看法。特别是其中的《大义略叙》明言：“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它深刻影响了清以至民国期间论者对元代的理解。但是可以肯定，今存的元代文献见不到支持这条记载的旁证，事实上元从未存在过这样一个将人群分为十等的“法”。遗民谢枋得《叠山集》卷六《送方伯载归三山序》则记载了当时的一则“小品”：因为元初取消了科举，“滑稽之雄”，便临场发挥，来了一个“以儒者为戏”的段子：“我大元典制，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倡、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与此近似的说词，肯定当时在社会上流传颇广。它与郑思肖《心史》所云，显然有某种联系。



郑思肖画《墨兰图卷》。现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兰花是“无根无土”，作于“丙午正月十五日”，即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已经是《心史》沉井二十年之后。

郑所南（1241—1318），字思肖，号忆翁。福州（今属福建）人。宋末为太学生，原名不详，宋亡，改今名。所谓“思肖”之“肖”，是“不走之趙”的意思，足见他对江山易主的感受。他以画兰花知名，画时常不画根，以寓“无土”之痛。遇岁时伏腊辄野哭南拜，听到北方人（占领者）讲话，必掩耳亟走，以孤僻知名。元人王逢《题宋太学郑上舍墨兰》（《梧溪集》卷

一）诗序[1]，引了几首郑思肖的诗，其中《过齐子芳书塾》[2] 云："天垂古色照柴门，昔日传家事俱存。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曾别受一人恩。"《寒菊》云："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御寒不藉水为命，去国自同金铸心。"这些诗句确实不同于一般的遗民诗。王逢是忠于元的遗民，《梧溪集》编刊又远远早于《心史》出井，所以，以"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曾别受一人恩"自诩的郑思肖是写得出《心史》中的文字，再加上他晚年寄寓苏州僧寺，也早见于文献。但是，文献中从来没有见到有关他写《心史》的记载，他的别的著作也并不是都流传至今了，在他死后亡佚者居多，可仍然能见于记载。

关于《心史》，判断真伪尚待研究。但元初并不存在"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的"鞑法"是不争的事实。

方回编撰《瀛奎律髓》成书。

《瀛奎律髓》四十九卷是元代重要的诗学著作。对方回的人品历来有争议，但是对于《瀛奎律髓》在诗学上的地位，则从未见异说。

在《瀛奎律髓序》中，方回说："瀛者何？十八学士登瀛洲也。奎者何？五星聚奎也。律者何？五七言之近体也。髓者何？非得皮得骨之谓也。"全书共选唐宋诗人385家的五七言律诗3014首（其中22首重出），自"登览""朝省"至"仙逸""伤悼"，共分为49类，每类一卷，每卷再分五言、七言。每卷（类）之前有一篇"小序"，选录的诗篇又附有评语。由于方回论诗宗江西诗派，所以本书从选诗到批评，都力图体现这一特点。著名的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就是首见于本书的评语。自《瀛奎律髓》问世，古典诗文的评选家、评论家几乎无人不受其影响。

关于方回的人品最集中的讥议出自周密《癸辛杂识》。周密是方回同时人，《癸辛杂识》称其老而益淫，凡遇妓则跪之，略无羞耻心，有所爱二婢，其一为人夺去，乃作《怅惋诗》揭于通衢，人咸笑之。故清人纪昀《瀛奎律髓刊误序》说："文人无行，至方虚谷而极矣。"

通过回顾南宋亡国以来几年间自己的生活内容，俞琰认为取消科举使文人"无所用心"。

俞琰《炉火监戒录自序》(《炉火监戒录》卷首)："予自德祐后，文场扫地，无所用心，但闭户静坐，以琴自娱。读内外二丹书，遂尔成癖。琴之癖，欲

---

① 除《梧溪集》，上述文字又见明程敏政《宋遗民录》卷十三。

② 这首诗的题目，在《郑所南小传》（《宋遗民录》卷十三引《姑苏志》）中作《题郑子封寓舍》。

以六律正五音，问诸琴师，皆无答。”“至元癸未遇异人”，而转向炼丹术。

俞琰，字玉吾，号林屋山人，所居傍石涧，学者称为“石涧先生”。长洲（江苏苏州）人。宋末以辞赋称，举进士不第，入元隐居著述，所作颇丰，今存者有《席上腐谈》《周易集说》《书斋夜话》等，后人编其诗文为《林屋山人漫稿》，但今本问题颇多。

在此前后，韦居安撰写《梅涧诗话》三卷。

韦居安，吴兴（今属浙江）人。南宋景定间进士，入元，于至元年间撰《梅涧诗话》三卷。论诗受江西诗派影响，多有记载南宋民间风气取向的内容。

年已八十二高龄的王磐致仕。

王磐是元初元老重臣，魏初、徐琰、胡祗遹等人都由他举荐于朝。所作文辞宏放，认为文章以不蹈袭前人一言为贵。顾嗣立评其诗“述事遣情，闲逸豪迈，不拘一律”（《元诗选》小传）。

王磐（1202—1293），字文炳，号鹿庵。广平永年（河北邯郸）人。家世务农，岁产麦万石，乡人称为“万石王家”。早年师从金代学者麻九畴，金正大四年（1227）中经义进士，金末动乱，一度南奔投宋。北归后受到东平总管严实礼遇，办学以王磐为教师，受业者常达数百人。元世祖中统元年，拜益都宣抚副使，不久告病辞去。又任为翰林直学士。迁太常少卿。屡求致仕，皆未获准。八十二岁才以资德大夫致仕，仍给半俸终身，离京时，皇太子赐宴圣安寺，百官送出丽泽门。卒年九十二岁，谥文忠。

李衎在江浙行省任职，举荐白珽为太平路学正。

白珽在此前屡辞朝聘，但接受了教职。宋元交替后，任儒学教职是知名文人的重要生活来源。

至元二十一年甲申（1284）

江南释教都总统（后改为江淮释教都总统）、河西僧人杨琏真伽在权臣桑哥支持下，发掘了南宋诸帝的陵墓。

这是至元年间江南的一件大事，对文人影响颇大。至元后期江南的诗文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是围绕这件事展开。

杨琏真伽，又译作杨辇真加，杨，应是姓氏，“琏真”之意是“宝”；“伽”是“大”。发掘南宋皇陵，是当时的重大事件，但是关于这件事的记载并不清晰。其实至元年间的几件大事：汪元量北上南还；郑思肖与《心史》沉井；谢翱在“西台”痛哭的具体年月；发掘南宋陵墓时间，都存在史料的矛盾含糊之处。关系到朝代兴替，这本也正常。《南村辍耕录》（卷四“伐宋陵寝”节），说这件事发生在“岁戊寅”（至元十五年），《癸辛杂识》（别集卷上“杨髡发陵”）则说是发生在乙酉（至元二十二年）。而《元史》没有明确标出具体的年月，只是《元史》卷十三《世祖本纪》中提到：至元二十一年，九月丙申，“以江南总摄杨琏真伽发宋陵冢所收金银宝器，修天衣寺”。至元二十二年正月庚辰，“毁宋郊天台。桑哥言：‘杨辇真加云：会稽有泰宁寺，宋毁之以建宁宗等攒宫；钱塘有龙华寺，宋毁之以为南郊。皆胜地也，宜复为寺，以为皇上、东宫祈寿。’”① ——这显然是掘两地陵墓的十足借口。而至元十五年，杨琏真伽刚赴任，当时江南尚不完全是在元廷控制之下，南宋小朝廷还以“祥兴元年”为年号。《癸辛杂识》还说：杨琏真伽发陵，起因于当地天长寺僧人西山，成于演福寺僧释泽（号云梦）。实际上他们是为了向杨琏真伽献媚，而出此主意②。周密是当时人，他的记载详尽而且具体，不大可能有误。据《元史》③，南台中丞亦力撒合曾在至元二十一年“劾江南释教总统杨辇真加诸不法事，诸道耸动”，而《元史》又说，杨琏真伽“发掘故宋赵氏诸陵之在钱塘、绍兴者，及其大臣冢墓凡一百一所”④，并夷为平地，扬尸野外，还在其上建“镇南寺”以魇。攘夺盗取财物无算⑤。这些陵墓，想必不是一时可以发掘完的。发掘宋陵，主要是发生在至元二十一年、二十二年这两年间的事。这一点《元史》虽无明文，但记载仍然可辨。《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二十九年三月记事云：“壬戌，发给杨琏真加土田、人口之隶僧坊者。初，琏真加重赂桑哥，擅发宋诸陵，取其宝玉。凡发冢一百有一所，戕人命四，攘盗诈掠诸赃为钞十一万六千二百锭，田二万三

---

① 据《元史·世祖本纪》，一则与其相关的记载是：至元二十三年正月“以江南废寺土田为人占据者，悉付杨琏真伽修寺。”

② 《宋遗民录》卷六，有明人作于洪武四年（1371）的《穆陵行》，诗序中说“至元二十一年，僧嗣古建言，毁宋会稽诸陵。江南总摄、夏人杨辇真伽与丞相桑哥表里为奸恶，奏发诸陵金宝，以其遗骸营白塔于钱塘旧内基上，且截顶骨为饮器。”明确指明了时间。嗣古，或作嗣占。

③ 卷一二〇《亦力撒合传》。

④ 卷二百二《释老传》。

⑤ 见《元史》卷二〇二（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521页。

千亩，金银、珠玉、宝器称是。省台诸臣乞正典刑以示天下，帝犹贷之死，而还给其人口、土田。”可知发掘宋陵是在桑哥支持下启动的。至元中，柄政权臣先是阿合马，然后是卢世荣，至元二十一年卢世荣败，才属得上桑哥。在至元十四五年，桑哥并无如此影响力，出了问题也轮不上他来担骂名。

这个重大事件历来记载有异的地方还有，安葬遗骨，或归于林景熙，或归于唐珏[①]。对这个矛盾，一个合理解释是：发陵在两地，而且不止一次。林景熙与唐珏等遗民分别将在钱塘、绍兴的南宋皇室骨骸收集到一起，郑重安葬。其实并不矛盾，唐珏在绍兴重葬，并作《冬青行》以志其事[②]；而林景熙则是在钱塘。因两者都是为收集遗骸重葬，并种植冬青树为标志，所以往往不加区分而已。而据《霁山集》卷三《梦中作》诗的注释（元人章祖程所作），林景熙一度化装为采药的药农，冒死用草囊收集了遗骨。听说宋理宗的颅骨为掘墓的元兵扔到了湖中，他就出钱找渔夫用渔网打捞，并顺利获得。他将所获遗骨封存在两函之中，重葬在越山，并在重葬地点种植了自南宋故宫移植的冬青树作为标志。为此，他不但写了四首七绝《梦中作》，还特意写了一首题为《冬青花》的诗志感。谢翱又以《冬青树引别玉潜》（《晞发集》卷四），表示对唐珏（字玉潜）的敬意。“冬青”成了宋遗民的“图腾”。

元人李材《解酲语》记述了当时从宋陵中掘出的宝物名单（当然只是一部分）：

> 僧嗣占、妙高上言，欲毁宋会稽诸陵，西僧杨琏真伽又请，乃如所请。发陵取宝器，以诸帝遗骨建浮屠于杭之故宫，截理宗顶以为饮器。时会稽有六陵（徽宗、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③]，发掘搜取诸宝器殆尽。徽宗陵，获走花鸟玉笔箱，又同凉泼绣管（外国所进）。高宗陵，真珠戏马鞍（岭南刘鋹所结，以献于太祖者）。光宗陵，交加百齿梳、香骨案。理宗陵，伏虎枕（七宝合成伏虎之状）、穿云琴（金猫睛为徽，龙肝石为轸）、绿玉磬（唐杨妃物）。度宗陵，五色藤盘、影鱼黄琼扇柄。其余器物不可尽举，大抵陵中物，无定式，惟视平生所

---

① 明初人张丁（张孟兼）《唐珏传》（明程敏政《宋遗民录》卷六）说：“至元戊寅，浮图总统杨琏真伽利宋殡宫金玉，故为妖言惑主听，发之。”

② 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六朝皇陵均在绍兴。唐珏《冬青行》，见《元诗纪事》卷三十一。在《元诗纪事》之中，对此事征引考证颇详。唐珏的事迹经《南村辍耕录》卷四“发宋陵寝”节记载，成为元初的重要而感人的事件。

③ 据所说的陵墓名称，这里的“六陵”，实际应为七陵。

玩何如也。

名单侧面证实，发掘诸陵的主意是出自江浙释子，发掘现场包括杭州与绍兴两地。发掘应该是与权臣桑哥的“括财”计划有关。元人诗咏“月氏王头饮器”，即因截宋理宗颅骨为饮器。林景熙在湖中打捞到的宋理宗颅骨，大约是截剩之余。

戍守丝绸之路南道且末塔提让古城的军士，抄录了《董解元西厢记》中张生“待月西厢”的唱词以排遣寂寞。

这些离家万里的军士，以《董解元西厢记》为伴，企盼与亲人团聚，寄希望于未来，也为《董解元西厢记》在元初的影响、传播提供了证据。

1986年9月，且末县塔提让乡一个名叫“苏伯斯坎”的遗址，出土了一批元代初期的文书①，其中最重要的是一页基本完整的曲子词，文字共九行：

依定门儿手托腮闷答海地愁/满怀不免入书斋傥冤家/负约今夜好难捱闷损多/情的张秀才忽的厅得栊门儿哑的开急把眼儿楷/见红娘敛袂遂传士解元咳/莫萦心且暂宁耐略时间且/向书帏待教先生休怪等/夫人烧罢夜香来

以《董解元西厢记》卷五比勘，加上标点，更正几个笔误就是：

〔仙吕·赏花时〕依定门儿手托腮，闷答海地愁满怀，不免入书斋。傥冤家负约，今夜好难捱。闷损多情的张秀才。忽听得栊门儿哑地开，急把眼儿揩。见红娘敛袂，遂传士解元咳。〔尾〕莫萦心且暂宁耐，略时间且向书帏待。教先生休怪，等夫人烧罢夜香来。

看来是戍守的军士据记忆，笔录出《董西厢》这段著名的唱词，以消遣时光，倾吐寄托②。与此相对照的是，距此不远的若羌县瓦石峡古城出土的同

① 《西域考察与研究续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何德修《沙海遗书——论新发现的董西厢残叶》。

② 当然，不能排除这是军士们携带出关的《董西厢》仅存的一页，或是家乡亲人夹在致军士的家书中远寄到塞外的。

期文书中，有“追捕在逃军人程荣”等三人的“通缉令”[1]。这几个人擅离职守，正沿着丝路古道返回家山。对于远戍绝域的中原军士，其精神面貌与生活状况可见一斑。出土《董西厢》文书的塔提让古城，与东南不远处的若羌县瓦石峡古城，都位于元代塔里木的驿路上。据《元史·世祖本纪》，元廷于至元二十三年在罗卜（即“罗布”）、怯台、阇鄽（应即“车尔臣”）、斡端（即“于阗”）等地，设立了新的横穿塔里木东端，由敦煌，经罗布泊，前往于阗（即今和田）的驿站，以加强西域的干线交通。而这出土《董西厢》残页的古城正位于这个区域内，无疑是为维护交通干线而提前设置了支撑点。“苏伯斯坎”遗址与《董西厢》同时出土的文书，都是写于至元二十年、至元二十一年间，是首批戍守军士的遗物。据文书可知这个古城的戍卒，来自延安府的延长、肤施等县，其中还有一封军士苏继瞻的家书，家书通过军邮寄往“延安府东门苏百令宅下”。这页《董西厢》是元代中原文学作品传播广泛，直达丝绸之路南道的明证。古城是元代的兵站与驿站，通过邮传，中原的文学作品沿交通线传向中亚。除了传统认为的商队、僧侣、使团等之外，戍守的军士也是传播文学作品的途径之一。

至元二十二年乙酉（1285）

宋亡出家为僧的陈孚，还俗不久，通过行省上《大一统赋》[2]。

元初，陈孚曾出家为僧，以避世变。一天，他将自己的一首诗题写在父执家的粉墙上，表达了不甘寂寞的入世情愫。父执看了，说：“此子欲归俗也！”果然，他很快就还家蓄发[3]。不久，便向行省上《大一统赋》，受到朝廷重视，并由此出仕新朝，得署上蔡书院山长，又以翰林编修召，是比较早到朝中任职的南人。他的经历，在元初江南士子中间相当典型。作为一个知名诗人，他的特点是诗篇主要写于旅途中，但元诗的气格已现端倪。

一份偶然保存下来的“互告状”，揭出本年八月内发掘绍兴南宋皇陵的

---

① 张平《若羌瓦石峡遗址调查与研究》，《西域考察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② 陈孚献《大一统赋》的时间，一说是至元二十一年。此从《元人传记资料索引》。

③ 《南村辍耕录》卷八“五马入门”节。

具体情况。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杨髡发陵”节）说：“杨髡发陵之事，人皆知之，而莫能知其详。余偶录得当时其徒‘互告状’一纸，庶可知其首尾云。”

这份“互告状”内容是：

> 至元二十二年八月内，有绍兴路会稽县泰宁寺僧宗允、宗恺，盗斫陵木，与守陵人争诉。遂称亡宋陵墓有金玉异宝，说诱杨总统（按：即杨琏真伽，也就是上述“杨髡”），诈称杨侍郎、汪安抚侵占寺地为名，出给文书，将带河西僧人，部领人匠丁夫，前来将宁宗、杨后、理宗、度宗四陵，盗行发掘，割破棺椁，尽取宝货，不尽其数。又断理宗头，沥取水银、含珠，用船装载宝货，回至应恩门。有省台所委官拦挡不住，亦有台察陈言，不见施行。其宗允、宗恺并杨总统等发掘得志，又于当年十一月十一日前来，将孟后、徽宗、郑后、高宗、吴后、孝宗、谢后、光宗等陵尽发掘，劫取宝货，毁弃骸骨。其下本路文书，只言争寺地界，并不曾说开发坟墓。因此，江南掘坟大起，而天下无不发之墓矣。其宗恺与总统（杨琏真伽）分赃不平，已受杖而死。有宗允者，见为寺主，多储宝货，豪霸一方。

据此，在绍兴发掘南宋皇陵实际是以纠正“侵占寺地”为名发起的，其间，省台曾经派出专人予以干涉，但“拦挡不住”，足见僧人势力之大。省台，应该是指行省与南御史台。因为盗掘皇陵，才有了唐珏与林景熙，才有了《冬青树》与《西台恸哭记》。这两篇作品不但流传广泛，实际也是为前朝特制的“安魂曲”。

十月。方回为杨公远诗集《野趣有声画》作跋语。

杨公远是宋元之际相当特殊——如果不能说是相当有特点——的诗人。他不反对任何统治者，写诗就是写诗。与当时遗民诗的主流相比，他离谢枋得、林景熙确实太远了。

杨公远（1227—?），字叔明，号野趣。歙县（今属安徽）人。南宋时居家不出，入元虽未仕于新朝，但不以胜国遗民自居，曾多次向按察使卢挚献诗，希望得到援引资助。诗集名《野趣有声画》，结集于宋咸淳年间，到本年再次编刊，并由方回写跋语。他的七言律诗《回溪道中》较为知名：“山東溪流窄径迂，眼前景物入诗无。田中科斗古文字，柳下春锄春画图。巨室藏

茶供客饭，小旗夸酒诱人沽。行行不记几多里，回首林端日又晡。”方回《野趣有声画跋》(《野趣有声画》卷末)对此诗推崇备至，说:“此五十六字《溪山村落图》也”，“全篇熟而不腐，新而不怪，诗妙至此，非胸中有所养不能也。”《野趣有声画》二卷，传本较罕见，诗论家也很少涉及其人其诗。他的诗作，不出江湖派末流的格局，但与江湖派不同的是，他着力于写景，仿佛在用诗笔作画，但他笔下的景物不只属于山水林壑，更多的是村镇田园。他是元初无法归入流派的诗人，对于宋诗、元诗，都是异数。

徐世隆去世。享年八十岁。

徐世隆(1206—1285)，字威卿。陈州西华(今属河南)人。金哀宗正大四年(1227)进士。金亡，严实开府东平，徐世隆为东平行台幕僚。元世祖中统元年拜燕京宣抚使，中统三年，除太常卿。至元元年迁翰林侍讲学士，兼太常卿、户部侍郎。至元七年，拜吏部尚书。出为东昌路总管，擢山东道按察使，移江北淮东道按察使。告老还乡。至元十七年召为翰林学士，又召为集贤学士，都因病未能就职。著有《瀛洲集》百卷，文集若干卷，均未传。

许月卿去世。享年七十岁。

许月卿(1216—1285)，字太空，学者称“山屋先生”。婺源(今属江西)人。早年从魏了翁学。宋理宗嘉熙四年(1240)以军功补校尉，为江东转运司属官。淳祐四年(1244)进士，授濠州司户参军，迁临安府教授，以言事罢。宝祐三年(1255)为江南西路转运司幹办，摄提举常平。召试馆职，以忤贾似道罢，归隐。宋亡，改字“宋士”，深居不出。有《先天集》十卷、《百官箴》六卷。

耶律铸去世。享年六十五岁。

耶律铸(1221—1285)，字成仲，号双溪。义州弘政(辽宁义县)人。契丹王族后裔、耶律楚材之子。自幼聪敏，善文辞，尤长于骑射。耶律楚材死后，他年仅二十三岁就嗣领中书省事，随元宪宗进击四川时屡出奇计。元宪宗死，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争夺汗位，耶律铸舍弃妻子投奔忽必烈。元世祖忽必烈中统二年，拜中书左丞相。至元二年，行省山东。至元四年任平章政事，次年复拜中书左丞相。至元十年迁平章军国重事。至元十九年再次出任中书左丞相。次年因事免职，家财之半被没收，徙居山后。至顺元年谥文忠。耶律铸自幼继承家风，有出将入相之才，诗文亦为所长。与元好问、李冶等

都有交往。十三岁就有诗名，二十多岁就将诗作结为《双溪小稿》。所著《双溪醉隐集》，据明人钱溥《内阁书目》记载，有十九册之多，已不传。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耶律铸诗，重编为《双溪醉隐集》六卷（《四库全书总目》作八卷）。

耶律铸出生在西域，年十二能诗歌；十三岁"下笔便入唐人之阃奥"。"兴寄情趣前人间有所不到者"，所作"大传燕市"[①]。耶律铸从政也早，经历极广，"足迹涉历，多西北极远之区"[②]，所以眼界相当开阔。在《戏题近日所作诗卷末》[③] 中他说"谁擅风骚上将坛，顿还旧观据吟鞍。自然倚伏行藏在，未要闲人作话端。"耶律铸之子耶律希逸，号柳溪，也是诗文家，有《耶律柳溪集》，但早已失传。从耶律楚材之父耶律履开始，家族四代跨越金元，均有诗名。

至元二十三年丙戌（1286）

二月二十八日。王博文登单父琴台，作《登单父琴台古诗兼简州尹吉甫诸公》。

王博文《登单父琴台古诗兼简州尹吉甫诸公》（《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48 册）诗，刻石于山东单县。当时王博文由大名路总管任上，升南台御史中丞，赴任途中，经过单父，"追感巫、宓二公之旧治"，下车之际，首先登台凭吊。"鸣琴而治单父"是治绩的最高境界，王博文以此诗为自己的南台之任张本。

二月二十九日（丙寅）。召陈俨、萧㪺、虞应龙入京，编地理书。

据《元史·世祖本纪》："丙寅，以编地理书，召曲阜教授陈俨、京兆萧㪺、蜀人虞应龙。惟应龙赴京师。"萧㪺多次不赴徵召。

三月。受元世祖委托，程钜夫到江南寻访应予举荐的人才。

据《元史·世祖本纪》，在本年三月，御史台臣言："近奉旨，按察司参

① 赵著《双溪醉隐集序》。

② 《四库全书总目》语。

③ 《四库辑本别集拾遗》第 777 页。

用南人，非臣等所知，宜令侍御史、行御史台事程文海[①]与行台官，博采公洁知名之士，俱以名闻。”于是元世祖命程钜夫“赍诏以往”[②]。这就是程钜夫此行的缘起。这个举措在朝野产生了广泛影响，在此期间，程钜夫从不同角度对当时的江南社会作了考察，此行对江南融入政治文化的整体格局，关系至巨。

程钜夫行前，元世祖密谕：此行必致的人物是叶李与赵孟藡[③]。提到叶李其人时，周密说：叶李一生受到了两个人的攻击，“先为叶山所攻，后为李性学所窘”，并因此饮恨而死，而他的名字——叶、李——却正是这两个姓氏的组合[④]。元世祖为什么如此重视叶李颇为费解，其实从哪个角度来说，叶李也不是当时江南最具号召力的人物，也许他的名气主要来自对他的争议，宋无《啽呓集》所咏的最后两个人物就是叶李、镏梦炎（留梦炎）。

陈允平在此前后以人才荐至京师。

陈允平，字衡仲，又字君衡，号西麓。鄞县（浙江宁波）人。试上舍不遇，遂放情山水，往来吴淞淮泗间。南宋德祐时，授沿海制置司参议官。宋亡，以人才徵至元大都，不受官，放还。当时举荐江南人才的渠道不止一个。

黎廷瑞摄本路儒学教授。

黎廷瑞（1250—1308），字祥仲，号芳洲。鄱阳（江西波阳）人。宋咸淳七年（1271）进士，授肇庆府司法参军，未上。至元二十三年摄路学教授，至元二十七年代去。有《芳洲集》三卷（《鄱阳五家集》之一），今存。

谢枋得以七言绝句《武夷山中》，写出家国俱失的惶惑。

《武夷山中》（《天地间集》）诗云：

十年无梦得还家，独立青峰野水涯。天地寂寥山雨歇，几生修得到梅花。

---

① 程钜夫，本名程文海。后为避元武宗海山之讳，才以字行，名为程钜夫。

② 程世京《程雪楼年谱》（洪武本《雪楼集》卷首）说，世祖命程钜夫“赍汉字诏书，乘驲求贤江南”。程世京是程钜夫之子。

③ 据揭傒斯《程公（钜夫）行状》，“上素闻赵孟藡、叶李名，临发，密谕必致二人”。

④ 《癸辛杂识》续集上“叶李姓名二士”节。

谢枋得的同调谢翱，编选了《天地间集》，这是标准的“宋遗民集”，今本存诗仅有22首，《武夷山中》就在其中。经历世事沧桑，谢枋得沉潜十年，到再也无家可还时，只剩下了诗。当时江南文坛的实际情况是：从南宋江湖派兴起，梅花成了超级“诗料”，南宋将亡之际，已经有了江湖诗人凡诗必牵涉梅花之讥。如果不是亡国之变被强加到头上，谢枋得甚至谢翱，一生都不见得走得出《江湖前集》《江湖后集》窠臼。品尝了十年的家国之恨，梅花在谢枋得笔下也出落得超凡拔俗。

北方大儒刘因在南宋亡国后曾到江南一游。他的《观梅有感》就像是为《武夷山中》作的疏解。这两首诗的写作时期大致相同，精神一脉相通，尽管他们几乎没有可能相识，即便曾邂逅在江南的某个小小集镇，也绝不可能相知。但在诗中就不同了。《观梅有感》写道：

东风吹落战尘沙，梦想西湖处士家。只恐江南春意减，此心元不为梅花。

就在这前后，江南以至全国，最大的新闻则是南宋皇陵被掘。“西湖处士”林逋的墓也曾被盗掘，其中只有玉簪一支。

九月二十四日。何梦桂作《记梦》诗，并有后序。

何梦桂（1229—?），字岩叟；原名应旂，字申甫，号潜斋。严州淳安（今属浙江）人。宋咸淳元年（1265）进士，仕至大理寺卿，知国事已不可为，引疾去。入元，屡徵不起。有《潜斋集》十一卷。在遗民之中，他不如仇远、戴表元等名气大，他既不曾以强烈情绪表示不能接受改朝换代的现实，也没有拒绝融入新的生活。在这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半夜，他为推敲两句诗而沉溺于梦境，等到醒来，他还是没有得到现成的答案，便写出《记梦》（《潜斋集》卷三）一诗，在《记梦》后序中说：

丙戌九月二十四日己丑之夜半后，梦入山中，景象迥异，不类人世间。数家比居，巷陌相属，其人杂还往来，皆意度闲雅。时觉秋气已深，余忽得诗两句云：“万木萧疏老翠高，此身惭愧独坚牢。”初不经意，又纵意徐行，入一小家，甚爽洁，倚窗而吟，欲续前两句而未得。隔间，有老人坐于窗外，貌古神清，鬓发尽白，问余吟句如何，且云老聋，余遂高唱前两句示之。老人曰：“后句宜用张子房事。”余梦中意不及此，答云：“只用桃源事如何？”老人曰：“武陵事亦好。”余遂续云：“相逢不是

今人世，应是秦民此种桃。”遂觉。次日会昭德侄孙，举似，嗟叹久之。因思桃源事，固可形容老人相遇之意，但与前两句意不甚相属，始悟老人所指子房盖有深意，自相倡和，遂用留侯事作一句，仍以种桃为末句，姑笔记之。他日从老人游，当执此为左契。

这首诗与后序，披露出了文人在新朝无所适从的彷徨。这一年何梦桂五十八岁。

郭天锡任镇江路判官，至元二十九年得代。

郭天锡（1244—?），字祐之（一作佑之），号北山、竹山居士。大同（今属山西）人。长期在江南任职，并寓居杭州，居室名快雪斋。与廉希贡、鲜于枢、赵孟頫、乔篑成等以诗文书画定交。至元二十六年，赵孟頫以珍藏的王献之《保姆砖志》帖相赠。所作诗文散见于书画题跋中。按：元代另有郭畀，字天锡，丹徒（江苏镇江）人。长于诗文书画，久住杭州。在文献中，常将郭畀天锡与郭天锡祐之混作一人，竟将郭畀别集误题为《快雪斋集》（快雪斋为郭天锡书室名）。

十月十五日（望日）。吴渭以浦江“月泉吟社”诗社名义，向各地诗社（吟社）和诗友发出帖子，以“咏春日田园”为题徵诗。

吴渭，字清翁，号潜斋。浦江（浙江金华）人。南宋末年曾出任义乌县令，宦迹不显，在遗民之中名气并不算大。入元，吴渭退居浦江的吴溪，延致南宋遗民方凤、谢翱、吴思齐，于家中倡立“月泉吟社”①，请这三个著名的遗民诗人主持其事，并于本年以“春日田园”为题向江浙广泛徵诗。

除方凤、谢翱，吴思齐（1238—1301），字子善。永康（今属浙江）人。宋末吴思齐曾任饶州节制司准备差遣，辞官寓居桐庐。入元不仕，与谢翱、方凤游。永康与浦江，都属于婺州路（路治在金华）。

这次月泉吟社以“咏春日田园”为题征诗，具体要求是于次年正月十五日（望日）以前收卷，请参赛者“如期差人来问浦江县西地名前吴（村镇）”的原“吴知县”家，“对面交卷”，并“守回标照”（讨取回持）。同时期许在明年三月三日将评定结果揭晓，“赏随诗册分送”。在吴渭“徵诗启”中，对“咏春日田园”这个题目的“题意”，作了具体的解释：“所谓田园杂兴者，

---

① “月泉”是金华名胜。据谢翱《月泉游记》（《晞发集》卷九），“月泉在浦江县西北二里，故老云，其消长视月之盈亏”，由朔至望，由望至晦，随月出现类似潮汐的变化。以“月泉”命名诗社，似有深意。

凡是田园间景物皆可用，但不要抛却田园，全然泛言化物耳。《归去来辞》，全是赋体，其中‘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四句，正属兴。此题要就春日田园上做出杂兴，却不是要将杂兴二字体贴，只为时文气习未除，故多不体认得此题之趣，识者当自知之。”

即便刚刚历经劫难，江南各地特别是一些自古就重视诗学的郡邑，都有吟社（诗社）或类似的组织。这种赛诗之会，也并非惟一一次。但这次的“徵诗”在战争硝烟刚刚散去的江南城镇村墟，引起空前广泛的关注。因为竞技是文人的出名途径，科举便是最大的竞技，人们踊跃参加，是将其视为刚刚被废止的科举的“替代”。

一个俗姓何的和尚，历时十二年，经历了“刺血”“炼臂”的折磨，终于找到了在战乱中被掳掠的母亲。这感人至深的经历，成为文学作品的母题。

赵文《何和尚寻母》诗序（〔雍正〕《江西通志》卷三十五）[1] 说：

何，上饶人。因丙子乱失母，乃削发为僧，刺血写经，遍天下寻之。至燕，值国方会僧六万三千人。何于会炼臂，有一僧问：“有何愿受此苦？”何俱言所以。僧云：“京兆府金乡县张官人宅问之。”即往询求，乃知俱往吉州仕宦矣。何到吉州太和得知张名守德，为太和尹，乞食至门曰：“我信州人，有母在此。”阍人言母，出，不复认。何言：“我辛酉生，母乙巳生。”具言外氏祖父，母方记忆，相向大哭。盖母由他人三易主矣。张令加冠巾，约为儿，许为娶妇。何曰：“初事佛求母，岂可得母负吾初心？”乃陈省，以母不当掳；张以为买，引法力争之。何日哭于省前，冀有仁人哀而助之者，后竟得母以归。

为此，赵文特意写了一首题为《何和尚寻母》的诗。诗中有“弃我十二年”之句，从至元十三年丙子到至元二十三年，正跨越了十二个年头。而最后的解决，还是由于何和尚到行省告状，并张状哭诉于通衢。这个事件不但打动了曾经追随文天祥抗元的赵文，而且成为此后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戏曲）的“寻亲”题材的取资库存。

关于寻母的事件，是当时一个流行的公众话题。另外一则相当有名的是：至元十三年，岳阳民张琦才两岁，他的母亲就被北兵虏走。成年后，为寻找生母下落，他“三十年不得而不倦，风雨往复，晨昏号呼，鬼神为愁，行路

① 本诗及序，未收入赵文的《青山集》，只见于地方志。

相泣”，终于“卒能归其母，使二亲寿终于室家”①。事闻于朝廷，不但旌其门，而且复其家，“又令史官张大其事”，自京师到四方，文人为其所作诗文



左图是《柳毅传书》杂剧的插图，右图为《张生煮海》杂剧的插图。仅从立意上说，《张生煮海》是元杂剧中少见的杰作，特别是当它与《柳毅传书》衔接时，更能使人为之深思。这两个插图，都出自《元曲选》。请注意它们的相同之处：柳毅与张生（张羽）实际是同一个人。这或许提示：送信与煮海，原本是索取亲人的两个步骤。

结为若干卷，并画出了十二幅连环画，总题名为《旌孝图集》，由傅若金作《旌孝图集序》。从诗文，到连环画迈出了一大步。其终点就是小说戏曲了。明清之际，异族入侵的历史又一次“重演”，这个题材有了新的发展。有了这样的故事素材，作为对战乱、离散的反映，对相聚、重逢的企盼，使得元代文学作品中尚仲贤的杂剧《洞庭湖柳毅传书》（简称《柳毅传书》）只负有“阶段性”的传递信息，上天入地以求索，则构成《沙门岛张生煮海》（简称《张生煮海》）打动人心弦的力量。

① 《傅与砺文集》卷四《旌孝图集序》。

随着北人南来日益普遍，北方籍曲家如尚仲贤等纷纷到江南居住。

尚仲贤，真定（河北正定）人，来江南任江浙省务提举。作杂剧 10 种，仅存《洞庭湖柳毅传书》《尉迟恭三夺槊》《汉高祖濯足气英布》，另有《海神庙王魁负桂英》《陶渊明归去来兮》《凤凰坡月娘背灯》3 种尚存残曲。《太和正音谱》评其词“如山花献笑”。

戴善甫，真定（河北正定）人，来江南任江浙行省务官。作杂剧 5 种，仅存《陶学士醉写风光好》，另有《柳耆卿诗酒玩江楼》尚存残曲。《太和正音谱》评其词“如荷花映水”。戴善甫与尚仲贤为同时人。

张寿卿，东平（今属山东）人，来江南任江浙行省掾史。作杂剧《谢金莲诗酒红梨花》，今存。

宋衜去世。

宋衜（？—1286），字弘道。潞州长子（今属山西）人。初入赵璧幕，中统三年擢翰林修撰。后追随赵璧征战，参谋军事。至元十三年授太常少卿，至元十八年除秘书少监。至元二十年迁太子宾客。

卫宗武去世。享年八十多岁。

卫宗武（？—1286），字淇父，号九山。华亭（上海松江）人。宋理宗淳祐初，以门荫为朝官，出知常州，元初退居不仕。有《秋声集》，原本不存，清乾隆时从《永乐大典》重辑出《秋声集》六卷，卷首有至元三十一年张之翰序。

至元二十四年丁亥（1287）

正月一日（元旦）。王义山《稼村类稿》成编，并写出自序（《稼村类稿原序》）。

科举已经停了十年，文人对此反应复杂。《稼村类稿原序》开篇即云：“呜呼！士为科目累甚矣。”进而又说：“盖于科举之外知有义理之学，义理之外知有性命之学，由乎科目之中而不为科目累也。……余一生刻苦文字间止如此，亦特一家说耳。姑以训吾子孙，谨勿以语人，必有取之覆酱瓿者。”而刘诜《建昌经历彭进士琦初墓志铭》回忆起至元二十四年时的情况，则说：“初，至元丁亥，余客印山，琦初在焉。于是时，科举废十年，印山知名

之士尚不少，日夜相与，谈说诗书，谐笑饮酒。”文人已经认可没有科举的新秩序，并在诗文（特别是诗）中找到皈依。

正月十五日。月泉吟社的“咏春日田园”徵诗截止，开始评阅。

自至元二十三年十月十五发出通知，到来年正月十五，短短三个月间，专差一次次叩响浦江“吴知县”吴渭宅门，届时竟收到2735份应征的诗卷，使得至元二十四年的“春日田园”分外热闹。

二月。王博文在江东与故旧之交白朴相逢。

王博文与白朴，在来江南之前相知已久。王博文并应邀为白朴《天籁集》作序。《白兰谷天籁集序》（《天籁集》卷首）全文是：

乐府始于汉，著于唐，盛于宋，大概以情致为主。秦、晁、贺、晏虽得其体，然哇淫靡曼之声胜，东坡、稼轩矫之以雄词英气，天下之趋向始明。近时，元遗山每游戏于此，掇古诗之精英，备诸家之体制，而以林下风度，消融其膏粉之气。白枢判寓斋序云“裕之法度最备”，诚为确论，宜其独步当代，光前人而冠来者也。

元、白为中州世契，两家子弟每举长庆故事，以诗文相往来。太素即寓斋仲子，于遗山为通家侄。甫七岁，遭壬辰之难，寓斋以事远适。明年春，京城变，遗山遂挈以北渡。自是不茹荤血，人问其故，曰：“俟见吾亲则如初。”尝罹疫，遗山昼夜抱持，凡六日，竟于臂上得汗而愈，——盖视亲子弟不啻过之。读书颖悟异常儿，日亲炙遗山，声欬谈笑悉能默记。数年，寓斋北归，以诗谢遗山云：“顾我真成丧家狗，赖君曾护落巢儿。”居无何，父子卜筑于滹阳。律赋为专门之学，而太素有能声，号后进之翘楚者。遗山每过之，必问为学次第，尝赠之诗曰：“元白通家旧，诸郎独汝贤。”未几，生长见闻，学问览博。然自幼经乱丧，苍皇失母，便有山川满目之叹。逮亡国，恒郁郁不乐，以故放浪形骸，期于适意。中统初，开府史公将以所业力荐之于朝，再三逊谢，栖迟衡门，视荣利蔑如也。太素与予三十年之旧，时会于江东。尝与予言：“作诗不及唐人，未可轻言诗；平生留意于长短句，散失之馀，仅二百篇，愿吾子序之。”读之数过，辞语遒丽，情寄高远，音节协和，轻重稳惬，凡当歌对酒，感事兴怀，皆自肺腑流出，予因以《天籁》名之。噫，遗山之后，乐府名家者何人？残膏剩馥，化为神奇，亦于太素集中见之矣，然则继遗山者，不属太素而奚属哉！知音者览其所作，然后知予言之不

为过。太素名朴，旧字仁甫，兰谷其号云。至元丁亥二月上休日，正议大夫行御史台中丞、西溪老人王博文子勉序。

这是白朴的微型评传。文中关于白朴以及元好问词的评价，绝非外人可以道出。

三月三日。由月泉吟社主持的“咏春日田园”徵诗评选揭晓。

三月三日，评选结果公布了。由于应征空前热烈，诗卷太多，三人评选组，不得不选录出前280位诗人作为“入围”者，这个名次空前之长。但与2735份待选诗卷这个数字相比，仍然难尽如人意。为示公正，应征的诗卷全仿照科举，采取密封名字评卷，而且应征者还使用了化名。比如第一名“罗公福”，就是三山连文凤，第十八名“唐楚友”，则是孤山白珽；也有的使用了诗社的集体名义，比如第四名“仙村人”，只注明来自“古杭白云社”。这样参与者就可以免去时名大小的差别，只以本次的应征之作评判高下。

主持者吴渭编成《月泉吟社》[①] 一书。此书是以“春日田园”为主题的诗歌盛会的合集，收入的当然不可能是全部应征之作，仅录有前六十名的74首诗，又附录摘句33联。在编排上首列社约、题意、诗评，然后是入选的诗与摘句。每首诗下列有作者的化名，注明作者籍贯与真名，并有评语。最后是奖品、送赏启以及得奖人的复启。比如第一名“罗公福”，赏“公服罗一缣七丈，笔五贴，墨五笏”，以下依次有差。公布了入围者280人（等于获“提名奖”）的奖品：向每一位应征者赠送月泉吟社的“新诗一册”。《月泉吟社》收入的“获奖作品”，不少流露出家国之感或隐逸思想，如“吴下风流今莫续，杜鹃啼处草离离”（第七名“栗里”），“行歌隐隐前村暖，忽省深山有蕨薇”（第六名“子进”），“名利有危机，老于农圃宜”（“元机老农”），“一生甘作扶犁手，万变宁移抱瓮心” （“扶杖人”）。但总的来说比较平和。——这个题目本就比较平和。以诗社发起，集咏同一题目，并合为一集，此书开了先例。通过一个“徵诗启”，吴渭与月泉吟社之名响彻江南。这一切又全靠《月泉吟社》一书流传至今。

仅就这次诗会的前六十名诗人而言，其中主要来自两浙，但也有以外的

① 《月泉吟社》，往往题为《月泉吟社诗》。一般在本集卷首有明人田汝耔的《刻月泉吟社诗叙》，但这里的“月泉吟社诗”并不是题目。在本集书口上的书名，只是《月泉吟社》四字。《月泉吟社》与《月泉吟社诗》完全是同一本书。《月泉吟社诗》，常见版本是《丛书集成初编》影印本。据田汝耔序，《月泉吟社》一书的初刻本，是浦江人吴直方、吴直方之子吴莱“相嗣传”的。吴莱是元代大儒、著名的金华籍诗人。

呈卷。除了月泉诗社的社友，还有福建三山、义乌、杭州、分水、金华、东阳、桐江、建德、昆山、严陵、双溪、苕溪等地诗人广泛参与。仅设在杭州的诗社参与应征的就有孤山社、武林社、武林九友会、古杭白云社等。它的“代表性”不成问题。

明人李诩曾说：在宋元之间“东南士人有力之家最重诗社，聘有诗名者为主，试如科举之法。……开社命题，鉴别高下，榜示褒赏，诚一时之盛举”[①]。实际这是科举的一种“补偿”或说“另类竞技”。月泉吟社“徵诗”的特别之处在于：当时取消了行之久远的科举制度，只能由“诗社”出面来比试文人的艺技，而能够主持这样的活动，其“满足感”是难以替代的。

至元二十三四年间，谢太后在伯颜的剑锋逼迫下草签降表只是十年前的事，文天祥在大都柴市就义才过去几年，月泉吟社聘请的三位评委之一谢翱的《登西台恸哭记》就写在几年之后的至元二十七年。特别是至元二十一二年之间，“江南释教总统”、西僧杨琏真伽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发掘了南宋诸帝陵墓。难于想象的是，以谢翱之激烈，方凤之圆熟，竟会为这些咏田园的诗担当“评委会成员”。吴渭为什么会以“春日田园”为题而徵诗，没有相应的记载。但可以想到，只有这样的题材，才能够在大乱方定的元初得到广泛回应，而“春日田园”也确实引动了两三千诗人的关注。这就是事实，是宋元之间生活的一部分。《冬青行》《冬青树引别玉潜》《登西台恸哭记》是对江山易代的激烈回应，而月泉吟社的无视异族统治的降临，继续吟咏春光秋色，是另一种形式的反抗——或说拒绝。诗坛与社会一样，从来就不止有一种声音。

春。程钜夫还朝，向元世祖举荐了在江南搜访的“遗佚”。

程世京《程雪楼年谱》（洪武本《雪楼集》卷首）说：“公率所荐赵孟頫、张伯淳等二十余人，赴阙复命。上皆擢以文学风宪清要之职。公复奏陈民间利病五事。”据揭傒斯《程公（钜夫）行状》（洪武本《雪楼集》附录），举荐名单包括：赵孟頫、万一鹗、余恁、张伯淳、凌时中、胡梦魁、曾冲子、孔洙、包铸、何梦桂、曾晞颜、杨应奎、范晞文、方逢振、杨伯大等二十余人。未在以上列名、但在程钜夫举荐之列的有叶李、赵孟藡、吴澄、胡长孺，另外的文献中还提到，谢枋得也在其中，而且是第一名（即赵孟頫的那个位置），只是以后的变故——谢枋得绝食而死——才有所改变。这批

① 见《戒庵老人漫笔》卷六“月泉吟社”节（中华书局1982年排印本，第249～255页）。在这一节文字中，李诩几乎将《月泉吟社》一书全部抄录在其中。

“遗佚”当中作为文学家来说，最有成就与影响的还是赵孟頫。

李源道为谢枋得写的“神道碑”（《元文类》卷六十七）说：“至元廿三年，行御史台侍御史程钜夫以宋遗士三十人荐于朝。于是，江东谢枋得在举中。被徵，丁内艰辞。”可能是在举荐的名单确定后，还曾有所增删，所以举荐的人员有两个数字：二十二人（二十余人）；三十人。

元淮作《吊昭君》等诗篇，留下杂剧开始在江南传播的信息。

元淮的这些诗篇，写在读过马致远与白朴的杂剧（《汉宫秋》《梧桐雨》等）之后，可以印证《汉宫秋》等杂剧在江南的流传与影响，并为这几种著名杂剧的写作时间提出了一个“下限”。据元淮所云，他看到显然的是剧本，而不是演出实况。

元淮，字国泉，号水镜。崇仁（今属江西）人，徙邵武（今属福建）。至元中，以军功著名闽中，至元二十四年秋，任溧阳路总管，有诗云：“卧薪尝胆经营了，更理毛锥治溧阳。”至元二十七年春因公到行省，请改溧阳为州，以苏民力。此后不久致仕还乡。元淮诗多独吟之作，所作结为《金困集》（溧阳古称金困）一卷，又名《水镜诗集》，今存。这一卷之诗，基本上写于至元二十四年以及以后的几年间。



《汉宫秋》插图。出自明刊本《顾曲斋元人杂剧选》。画面的主角不是王昭君，而是那个无能为力的君王。

元淮《吊昭君》诗云：

昔年上马衣貂裘，不惯胡沙万里愁。阁泪无言窥汉将，偷生陪笑和箜篌。环佩影遥青冢月，琵琶声断黑河秋。当时若赂毛延寿，安得高名满蓟幽。

《吊昭君》有诗题注：“马

智远词。”马智远，即马致远。这首诗写马致远杂剧《汉宫秋》的阅读印象。它的特殊不仅在于是罕见的涉及杂剧的元人诗篇，而且更特殊的是，他当时读到的（或听到演唱的）马致远《汉宫秋》，与今天能见到的有所不同，至少在结局并不一致。“偷生陪笑和筌篌”不是阅读今本《汉宫秋》应该有的感受。在马致远笔下，王昭君于汉、匈奴的界河投河自尽。——也许马致远《汉宫秋》确实有不止一个本子，也许它目前的结局经过了后人的改动。



《汉宫秋》插图，出自明刊本《元曲选》。

写《吊昭君》诗之后不久，一次闲暇时观赏书画，宾客有以《昭君出塞》与《杨妃入蜀》二图相示，据说均是宋代画院名笔。元淮特意借为画卷题诗，写出阅读北来杂剧剧本的感受。《昭君出塞》诗云：“西风吹散旧时香，收起宫装换北装。狨帽貂裘同锦绮，翠眉蝉鬓怯风霜。草白云黄金勒短，旧愁新恨玉鞭长。一天怨在琵琶上，试倩征鸿问汉皇。”《杨妃入蜀》则云：“杨妃亡国祸根芽，刚道宫中解语花。惯得禄山谋不轨，酿成中国乱如麻。马嵬坡下东风恶，龙凤旗前战士哗。吹落海棠红满地，至今犹作画图夸。”作者特意在两首诗的诗题下注明是“中州词”——所咏是来自北方的作品。前者咏杂剧《汉宫秋》或主题相同的“昭君出塞”①，后者咏白朴的杂剧《梧桐雨》。元淮另外一首《西风》诗则注明是“仁甫词”。仁甫是元曲家白朴表字。诗中有“荷减翠时黯

① 元人以“昭君出塞”为主题的杂剧，还有关汉卿《汉元帝哭昭君》、张时起《昭君出塞》等。

雨盖，柳添黄处脱枯梢”一联，这两句显然脱化了白朴《梧桐雨》第二折中著名的〔中吕·粉蝶儿〕“天淡云闲，列长空数行征雁。御园中夏景初残：柳添黄，荷减翠，秋莲脱瓣”词意。另外一首《试墨》诗，明言是“岳阳词”，写的是自己阅读马致远《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的感受。《金困集》本不著名，但它关于元杂剧的诗，对杂剧早期在江南的传播留下了珍贵的信息。

这些诗写于至元二十四年、二十五年之间。证明在这期间，杂剧已经进入江南社会生活。对于确认马致远的写作时期，也是准确的参照。不能忽略的是：白朴的弟弟白恪，长期在江南任职：至元十四年建南御史台，御史大夫相威表白恪为南台掾史，至元十八年白恪任江东建康道提刑按察司经历，至元二十四年改浙西提刑按察司经历，溧阳正在其辖境，而元淮则在溧阳任职，这不会只是巧合。此后，除福建宣慰司经历。历湖广行省都事、员外郎，进理问。大德四年改江西行省理问。此后才以荐入为翰林待制。在至元二十年以后的一个时期内，白恪、元淮的活动范围是重合的。显然，白恪是南人认识杂剧的渠道之一。而在此期间白朴与马致远也在江南游学。元淮，则是较早地接受了杂剧的江南诗文家。



《梧桐雨》是元杂剧名篇。从唐朝白居易的《长恨歌》到清人洪昇的《长生殿》，其间居然还容得下《梧桐雨》。



《梧桐雨》插图。出自明刊本《顾曲斋元人杂剧选》。真是别具只眼，画面出现的是孤家寡人的唐明皇，与他作伴的只有崇山峻岭。请注意插图左侧山峰间“潜藏”的月亮——遥远又疏离。

六月。元淮作《水灾行》，诗是灾荒实录。

江浙大水，民心浮动。对民众而言，战争与自然灾害都是不可抗拒的因素。《水灾行》（《金困集》）诗序说："丁亥六月十九日，霖潦大作，苏、湖、常、秀与溧阳，圩田禾苗悉为水毁。黎民绝食，渔舟衔尾过江乞食于中州。因笔赋此。"诗云：

丁亥六月十九日，此日立秋秋叶碧。连宵汹汹雨滂沱，万顷圩田尽作河。高田得此禾倍出，低田不能收一粒。只今斗米值万钱，纵有金珠无处觅。哀哉田夫遭此荒，苏湖富户吃糟糠。富户吃糠犹可为，贫民山中掘野畲。君不见小舟累累若鱼贯，奔入中原乞饭碗。中原有客念尔饥，余哺剩粟悉与之。饥民饥民心勿欺，尔今饱后当自思。不是中原多米麦，浙西无术疗尔饥。

这次水灾涉及面广，延续时间长。饥饿的灾民从苏杭向北涌入中原乞食，原本相对富庶的苏杭与广袤中原相比，是太局促了。诗的结句"饥民饥民心勿欺，尔今饱后当自思。不是中原多米麦，浙西无术疗尔饥"表明，诗人是站在居中的位置看问题。

周密《浩然斋雅谈》记载了江南苏杭大水时的见闻，特别是一首题壁诗，可以与元淮的篇什对照。

周密《浩然斋雅谈》三卷，原本已佚，今本是《四库全书》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上卷谈文章，中卷谈诗，下卷谈词。卷中说："近岁浙右洊水，田野流离可念。震泽小寺壁间一诗云：民力久已竭，天乎不见怜。三年两遭水，十室九无烟。田没官征赋，家贫子卖钱。秋风江上路，忽见渡江船。——真不减聂夷中也。"诗以"秋风江上路，忽见渡江船"作结，已不是聂夷中《咏田家》可比。

杨琏真伽在江南倒行逆施，引起广泛反映。

至元二十三年、二十四年这两年间，杨琏真伽的"政绩"是："恢复佛寺三十余所，时弃道为僧者七八百人，皆挂冠于上永福寺帝师殿梁间。"[1]

所谓"恢复"，实际是将道观硬行"改造"为佛寺；"弃道为僧"，是将道士"改造"为释子。王冕在诗中说："白石皆成佛，苍头半是僧。"就是指在

① 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七十五。

飞来峰的石壁间刻满了佛像。绍兴鉴湖天长观的道士改换门庭成为释子，并将道观"献"给杨琏真伽，并说:"贺知章依托史弥远声势，将寺改观，乞复原日寺额。" 杨琏真伽居然"从其语"。这是元初的《关公战秦琼》。这也是发掘宋陵，建寺以镇的大背景之下的具体内容。贯云石《道隆观记》(《延祐四明志》卷十八）具体指责:"至元间，河西祝发氏杨永福（按：即杨琏真伽的汉语名字）总摄江南僧政。而其玩服子女，饮食起居，悉蚕诸僧之壳而越取。凡唐宋所额宫观稍似丰厚者，以己力经为佛寺。梵其土，金其相，火其额，不下千百所。又尝罗织入罪，戮道士凡三四人。……吾闻是州浮图之居溢三十，老氏仅一区。使胥而为浮图，则老氏之教不几息。"

显然，杨琏真伽的倒行逆施得到了一些僧徒的拥戴。但相反的例子也有，最典型的一个就是释子温。子温敢于当面大骂杨琏真伽为"掘坟贼"，并因此几乎被打死，但仍不改口。

子温，字仲言，号日观，又号知归子。通常称为"温日观"。华亭（上海松江）人。宋亡，出家为僧，萍迹四方，留于杭州玛瑙寺，戴表元说他"放浪啸傲于西湖三竺间五十年"(《剡源集》卷十八)。他是元初狂僧，经常救济贫弱，又从不肯轻易巴结达官贵人。与鲜于枢友善，每到鲜于枢家必抱庭前松树（名为"支离叟"）或歌或哭，发泄心中的积郁。以画葡萄知名，并长于书法，而且将草书结合到画葡萄的技法中，相当成功。

谢翱入越，登延陵钓台（西台）痛哭，并写出《冬青树引别玉潜》。

在元初，谢翱的经历相当典型。早年世受宋恩，中年在抵御元军南下中历尽风险，晚年成为一个诗人。唐珏仅有两首《冬青行》传世，而谢翱则以《冬青树引别玉潜》① 诗与以后写出的《登西台恸哭记》成为遗民诗人的精神象征。《冬青树引别玉潜》的写作背景含糊，其实是为南宋皇陵被盗掘作的祭奠。

谢翱（1249—1295)，字皋羽，号晞发子。长溪（福建霞浦）人，徙居浦城（今属福建)。早年倜傥有大节，咸淳中举进士，不第。元军南下，文天祥开府延平，谢翱率乡民义兵数百，杖策诣军门，自愿效力，署咨议参军。不久别去。获悉文天祥死在大都，只身行浙水，过严陵，登西台，在山野为文天祥设立牌位，哀悼之。至元二十七年作《登西台恸哭记》。在元初，家事凌替，不以贫累人，所居产薪若炭，每年秋暮便载至杭州易米为生计。探访胜水佳山，历凡雁荡、天目、四明等地无不遍涉，并著《宋史》，补写了

① 《全宋诗》第70册第44300页，原诗题误作《冬青树引别王潜》。

历来无传的诗人传记三十多篇。谢翱交游广泛，在遗民中名气颇大。作为遗民诗人，其诗风沉郁悲凉，不少作品表达了对南宋亡国的痛悼，古体诗在元初成就较高。有诗文集《晞发集》。所作《登西台恸哭记》明人张丁（张孟兼）曾以注释本形式别行。还辑《天地间集》，收录文天祥、家铉翁等人之诗。此外，著有《浦阳先民传》《楚辞芳草图补》《浙东西游记》等。因他的诗文，“西台”与“冬青树”成了宋遗民的“图腾”。

大都文坛活跃，寺院道观也成为文人汇集的场所，“雪堂雅集”是其中之一。

“雪堂雅集”以参与者档次高著称，商挺、燕公楠、王磐、徐琰、阎复、王构、徐世隆、王恽、王博文、夹谷之奇……包括刚刚为大都接纳的“南人”赵孟頫，都是雅集的常客。参与者有诗文家、词曲家，有平章、左右丞。

所谓“雪堂”，是大都天庆寺住持释普仁的居室。释普仁，字仲山，号雪堂。许昌（今属河南）人。俗姓张。至元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间，建成天庆寺，成为著名的文坛活动场所。实际从至元九年这种“即寺雅集”的形式已开始出现[1]。

姚燧《跋雪堂雅集后》（《牧庵集》卷三十一）列出了参与“雪堂雅集”的文人名单：“释统仁公见示《雪堂雅集》二帙，因最其目，序四、诗十有九、跋一、真赞十七，《送丰州行诗》九，凡五十篇，有一人再三作者，去其繁复。得二十有七人：副枢左山商公讳挺，中书则平章张九思，右丞马绍、燕公楠，左丞杨镇、参政张斯立，翰林承旨则鹿庵王公讳磐、董文用、徐琰、李谦、阎复、王构，学士则东轩徐公讳世隆、李槃、王恽，集贤学士则苦斋雷君膺、周砥、宋渤、张孔孙、赵孟頫，御史中丞王博文、刘宣，吏曹尚书则夹谷之奇、刘好礼，郎中张之翰，太子宾客宋衜，提刑使胡祗遹，廉访使崔瑄，皆咏歌其所志。喜与缙绅游者，求古人之近似。”

只要略做增补，这便是至元后期大都文坛的主要作家名单。所谓“雪堂雅集”就是那一时期大都的“莲社”。参与者中有一半（共14人）是出于翰林集贤两院，这也是“雪堂雅集”的特点。

二月。王义山去世。享年七十四岁。

王义山（1214—1287），字元高，号稼村。龙兴路富州（江西丰城）人。

---

[1] 王恽《秋涧集》卷五十七《大元国大都创建天庆寺碑铭》。关于这个雅集参加者，王恽还说：“自鹿庵、左山二大老已下，至野斋、东林，凡一十九人，作为文字道。其不凡，时方之庐阜莲社云。”

自淳祐九年（1249），以赋四上春官。淳祐十二年，为九题之魁。景定三年（1262）廷试覆考，文天祥批第一等，拟擢首选，给事侍郎徐经孙详定，抑之乙科，授永州司户，历南安军司理、通判瑞安军等职。德祐二年（1276），宋廷降元，下诏官民归附，遂还故山，以读书著文为事。至元十六年，江西行省俾路学以贽币礼聘于家，教授诸生，明年又以掌教江西学事。至元十八年，退老东湖，因环居皆莲，名其堂为“君子”，又题先庐旁之居所曰“稼村”，四方学者称“稼村先生”。至元二十三年，自志于墓，明年二月十四日以疾终。有《稼村类稿》三十卷。是南宋遗老中较早出仕于元的一人，而且只任儒学之职，这对时论的转换，有前置意义。

至元二十五年戊子（1288）

二月。受上司委派，元淮再次前往灾区查访灾情。

在广德路建平县，元淮写了一首纪实之作《书建平县驿》（《金困集》）。诗序说:“广德路建平县临湖西北之田，与苏、湖、常、秀、溧阳河道相邻，丁亥秋夏之间，霖潦不止，禾苗悉为水毁，农家非唯失望，而官租亦不能免。兹蒙上司委予亲行体访，已得其实。力为保申，少解倒悬，此去不特蠲租，其赈恤之惠兼行矣。就书五十六字，寄邑之驿舍，以为民田水潦之证印也。戊子春仲。”诗云：

> 秋夏霖霖浪拍堤，田畴水与树腰齐。一年岁计成潢潦，万顷洪波入稻畦。户户午炊蒸木叶，家家晚饭煮黄齑。老夫捧檄苏民力，且免田夫日夜啼。

作为一介武夫，元淮与他的诗都是特例。这几首诗不但是水灾纪实，更是诗人面对水深火热中的民众作出的反思。

出家为道士的原南宋宫廷琴师汪元量，为元世祖特许南归。

这时，汪元量在大都、漠北等地羁押了十二年之久，并出家为道士，道号水云。对于元廷他已经不构成危险。

因南宋亡国而被迫滞留大都的江南籍人士——宋皇室与枢要旧臣，都参与送别汪元量还归故乡。这次饯行，还因为有王清惠（王昭仪）为首的十几

个南宋旧宫人（也已经出家为道士或被迫嫁与大都工匠）参与，显得不同一般。关于放汪元量南还以及为其饯行，谢翱在其《续琴操序》① 中说：

宋季有以善鼓琴见上者，出入宫掖间，汪姓，忘其名字。临安不守，太后嫔御北，汪从之行，留蓟门数年，而文丞相被执在狱，汪上谒，且勉丞相：必以忠孝白天下，予将归死江南。及归，旧宫人会者十八人，酾酒城隅与之别。援琴鼓再行，泪雨下，悲不自胜。后竟不知所在。嘻，汪盖死矣。

元人廼贤《读汪水云诗集》诗序②的记载，比谢翱所云具体得多：

水云汪元量，字大有，钱塘人。以善琴受知宋主。国亡，奉三宫留燕甚久。世祖皇帝尝命奏琴，因赐为黄冠师。南归时，幼主瀛国公、福王、平原郡公赵与芮、驸马右丞杨镇、故相吴坚、留梦炎、参政家铉翁、文及翁、提刑陈杰、青阳梦炎，与官人王昭仪清惠以下，廿有九人，分韵赋诗，以饯其行。水云之诗，多纪其国亡时事与文丞相狱中倡和之作。文丞相又与马丞相廷鸾，章丞相鉴，邓礼部光荐，谢国史枋得，刘太博辰翁序其诗集。刘公又为批点。余间闻危太史言曰：水云长身玉立，修髯广颡，而音若鸿钟。北归，数来往匡庐、彭蠡之间，若飘风行云，世莫能测其去留之迹。江右之人以为神仙，多画其像以祠之，像至今有存者。其诸公所赋墨迹，尝见于临川僧舍云。及余至京师，因徐君敏道得《水云集》，读而哀之。偶成二律，以识其后。

送行赠别，元代文坛颇常见，但有后宫嫔妃与宫人（尽管是前朝的）参加，并且逐一赋诗词为别，是为仅见。这些旧宫人原来就是汪元量的学生，又一同来到大都，同时，除汪元量之外，其他人不能再离开北方还乡，所以汪元量的南还，有她们太多的寄托。宋度宗的嫔妃王清惠（王昭仪）为这一组诗作序，序中说："水云留金台一纪，琴书相与无虚日。秋风天际，束书告行，此怀怆然。定知夜梦先过黄河也。一时同人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分韵赋诗为赠。他时海上相逢，当各说神仙人语，又岂以世间声律为拘拘耶?" 十四位旧宫人分韵写了别诗，另有三人写的是别词。这些

① 见《水云集》附录、明程敏政《宋遗民录》卷十一以及《晞发集》附录《晞发遗集》。

② 见《金台集》卷二。

作品，被结为《宋旧宫人诗词》。

除了旧宫人，其他送别者也有诗相饯。瀛国公刚好十八岁，这次送别等于成年冠礼的“预演”，而他的诗，就是那首引来颇多问题的“探问”钱塘风景的五言绝句：“黄金台上客，底事又思家。归问林和靖，寒梅几度花。”

而因有王清惠的参与，又引出这些诗作的真伪问题①。实际上，汪元量留在文学史上的难点颇多。如果《续琴操序》真的是谢翱所作，而卒年在汪元量之前的谢翱，居然不记得（或说不知道）汪元量的名字，还说“汪盖死矣”②，这表明南还之后的汪元量已经从遗民的社交界淡出。

十月二日。王恽为《玉堂嘉话》八卷作序。

“玉堂”是翰林院的别称。中统二年夏五月，元世祖于上都诏立翰林院，王恽是首批翰林院成员之一。《玉堂嘉话》纪事，就从中统二年开始。王恽

①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十一《书〈宋旧宫人诗词〉〈湖山类稿〉〈水云集〉后》提出，这些旧宫人的诗是元明间人见到谢翱《续琴操序》，知有旧宫人送别之事而为，“其实皆伪作也”。他的理由是：谢翱《续琴操序》说“旧宫人会者十八人”，但做诗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为韵，只十四人，人数不符；十四首诗如出一人之手；在此前王清惠已经去世，汪元量就自己写了《女道士王昭仪仙游词》，表明王昭仪死在汪元量南还之前。前两个，都不成问题。谢翱说是十八人，其实留下诗词的一共是十七人，这个差错，应该不构成问题，也许是多记了一个人，也许是有一个来了没有写出诗词。说她们的诗如出一手，因为她们的经历、年龄、见闻相同，又都是汪元量的学生；再者，这些诗也不一定就是宫人们自己亲手所写，代笔，在这种场合颇常见。真正的问题是《女道士王昭仪仙游词》，但不能说它编在《湖山类稿》卷三，就一定写在汪元量南还之前。《湖山类稿》卷一的《杭州杂诗和林石田》，就必是写在他南还之后。在《女道士王昭仪仙游词》之前有《青阳提刑哀些》，而据廼贤《读汪水云诗集》序，青阳梦炎也在为汪元量饯行者之列。王国维提出的这个问题未获最终解决，但笔者认为说这些诗是明人伪造，尚缺乏证据。《女道士王昭仪仙游词》或是汪元量回到江南后所写的挽诗。事实上并非只有谢翱《续琴操序》记述过旧宫人送别事，前引廼贤《读汪水云诗集》序也提到过“宫人王昭仪清惠以下，廿有九人（包括了青阳梦炎等人），分韵赋诗”。当然，不论谢翱还是廼贤所记，都不能排除传闻之误，但他们的记载不能仅因为一首《女道士王昭仪仙游词》就彻底颠覆。应该特别强调的是，所谓《续琴操序》，原来并不在谢翱《晞发集》正文中，而是出于元人吴莱的《渊颖集》。《渊颖集》卷八有《续琴操哀江南》，前有序文，并附《续琴操》四篇，文后有吴莱的跋语：“右，《续琴操哀江南》者四章，章四解。或传粤人谢翱作。”连它究竟是不是谢翱作，都有疑问，从《续琴操序》中居然不知道汪元量已经回到江南，而且死在谢翱之后，这个序也不能排除与跋语一样都是吴莱所写。所以关于《宋旧宫人诗词》的真伪，仍有待研究。

② 事实上，汪元量死在谢翱去世之后。

于至元十四年初次编辑自己在翰林院期间的笔记成书，本年，基本编定《玉堂嘉话》。在序言中，王恽说，“今也年衰气耄，尽负初心”，怕日后记忆缺失，便将“灯火茅堂之夜，尊罍心赏之间”的见闻汇为一书，题名为《玉堂嘉话》。但本书的记事一直延展到元贞元年。其间时间跨度长达三十四年。可见本年之后，王恽仍然在增补其内容。《玉堂嘉话》除了记载作者自己对前人与典籍的看法，其中大量编录了金元之际文人的活动情况。

十一月二十四日，何中专程赶到双桐驿看望了正在被强制赴京途中的谢枋得。本年何中年仅二十四岁。

与汪元量南还相对照的是谢枋得被强制北上。徵召谢枋得，其实也是程钜夫江南访贤的内容之一，不过谢枋得的反应与其他人不同。何中的伯父与谢枋得同属宝祐四年（1256）由宋理宗亲擢的进士。通过与谢枋得交谈，何中已经预感到谢枋得此行必定以死相殉，他的《别谢提刑》诗，是提前作出的悼词。谢枋得为此行写有《北行诗》，谢枋得的友人李谨思将这首诗誉为“与西山《易水之歌》当并行”①。——一去不复返的不只有刺秦壮士荆轲。对于自己的志向与必死决心，谢枋得“绝口不言一字”。这正是决心已下、绝无更改的表现。



谢枋得像。出自《谢氏族谱》。

卢挚出游茅山。

茅山不但是道教圣地，而且是策动宋元诗词写作的渊薮，元初，茅山文人进出频繁。卢挚《游茅山五首》（元刘大彬《茅山志》卷十五）诗序说：

> 闻句曲山旧矣，乃至元戊子春，由宣部行郡溧阳。省俗，其墟距山麓一舍而近，凡隆阜胜川，曰洞天福地，登诸祀秩者，部使者至焉，礼

① 见李谨思《读谢叠山先生北行诗跋》（《全元文》第22册）。

也，予于是有三茅之行。至所谓崇禧观，崇禧主人邹姓，以心远自命。宾予精舍，规构若相第燕室，邃洁藻绚过之。亭翼然水树竹石间，为此山丽玮胜绝。吾二人彷徉相与，不觉日之夕也。远师衣冠褎然，清辩有奇趣，又多艺能，托意绘素，以几物化出。所画鹤，工致诣极，虽古之善史，略无见逾。而神韵超拔，则又得诸方外者如此。因举觞为疏翁寿。羽流之宇于上峰者曰元符万宁宫，亦曰宗坛。宗坛师许君，翼翌日肃予为神明之观，挥杯倚空，引睇无极，恨昔之隐居者，不获仍丹丘以从予游也。下探华阳洞穴，玉膏泓渟，石发纷绀，涓流赴壑，浮花与俱。过喜客泉，泉方井如澈鉴，承以石砥。如广袤丈许，深及寻之半，缭以四庑，固以扃鐍，门阖维谨。罍齐豆萧，于以揭虔，以祇其泉。客至，客也，泉则喜，沸沫湁潗，若跃蚌胎而贯龙髯者，殆不可称数，谓之泉笑；否则否。异哉！予何以见笑。归复憩远师所，留山间者既信宿矣，主人眷客，殊未艾也。予诵乐不可极为解，赋诗为别，序以贻之。

大约在此前后，卢挚作〔双调·蟾宫曲〕《劝世》:“想人生七十犹稀，百岁光阴，先过三十。七十年间，十岁顽童，十载尪羸。五十岁除分昼黑，刚分得一半儿白日。风雨相催，兔走乌飞，仔细沉吟，都不如快活了便宜。”作为卢挚，这些肺腑之言不仅是写给自己的。

这次茅山之行，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一年后，他又出游茅山，并写有《茅山作》《岁旦后四日留别宗坛师松溪许君邹君心远五首》。《茅山作》诗序说:“戊子岁除，复如茅山。己丑春正月朔，举祝厘之典。晓登天市坛，遂偕崇禧主人过积金中峰，留饮松溪方丈，复归远师玉气凝润之室。”

十一月。徐明善随李思衍出使安南。

这是元初较重要的一次出使，元代文献与安南史志中都提到此行。关于出使，《元史·世祖本纪》明言，“己亥，命李思衍为礼部侍郎，充国信使，以万奴为兵部郎中副之，同使安南”。《元史》卷二〇九《外夷传二》与此相同。但《元诗选》二集李思衍小传等文献，则说正使是都省参议秃卢。谁是正使，关涉到此行的一个著名典故：使团到达后，安南奉表款附，并厚赂使节，正使接受了贿赂，李思衍未受。还朝后，元世祖追责正使受安南馈赠一事，李思衍说：正使受，安小国之心；臣不受，全大国之体。元世祖很赏识。如是，《元史·世祖本纪》的纪事就有误。关于李思衍却贿，应必有其事。《安南纪略》卷十七有李思衍在安南写的诗四首，其中一首题为《行赆有礼辞之世子举陆贾事亹亹兑受谢绝以诗》，《安南纪略》是安南人黎崱所编，不

会是给自己人“抹黑”。

李思衍，字昌翁，一字克昌，号两山。馀干（今属江西）人。至元年间，伯颜挥师渡江，曾以李思衍暂理乐平政务，不久授袁州路治中，入朝，任国子司业。至元二十五年，召拜礼部侍郎，作为副使招谕安南，顺利完成使命，受到元世祖赏识，拜南台御史。改任浙东宣慰使，考满赴调，死于京师。张伯淳作诗挽李思衍:“斯文谁与立，卓荦两山名。南粤麾兼馈，东州表独清。”所说的正是他不收安南赠礼一事。

徐明善（1250—?），字志友，号芳谷。德兴（今属江西）人。八岁能文章。随礼部侍郎李思衍出使，在安南，即席为安南王子赋诗一首，声名大振。使归，任龙兴路儒学教授，后入湖北宪使幕，迁江西儒学提举。主持江浙、湖广等省考试时，以善于擢拔人才而知名，黄溍就是他从弃卷中发现而后录取的。致仕归，卒于家。有《芳谷集》二卷，另著《安南行记》一卷，保存在《说郛》之中。

十一月。大都民史立等人请立桑哥德政碑。从之[①]。

所谓“桑哥德政碑”，就是《桑哥辅政碑》，碑文多有过誉之语。几年之后，桑哥败亡，为其立碑事，成为朝廷文臣们互相攻讦的口实。

胡炳文出任江宁教谕。

随时间逝去，南宋遗民因生计的问题，陆续放弃不出仕新朝的道德底线，但一开始做的都是教职，元初江南各路儒学人才空前“拥挤”。与胡炳文同时任教职的是，胡长孺出任扬州路儒学教授。

刘因作《叙学》[②]，申明学术与文学的传承。

《叙学》（《畿辅丛书本》本《静修集》卷一），是刘因自揭学问师承之作，也借以表述自己对文学传统的看法。这篇长文，对元代文学走向作出高屋建瓴的判断。实际金与元都是历史上将单一的民族文化汇合为多元地域文化的重要时期。金的文化与文学，就是中国北方的文化与文学。而元，则不拘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在近一世纪间融会成横贯南北的“大一统”的文化与文学。

---

① 据《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二十五年十一月记事。

② 刘因《叙学》未注明纪年，暂定作于他四十岁“不惑”之时。在不同版本的刘因文集中，《叙学》所在的卷帙不同。《四部丛刊》本《静修集》未收，《刘文靖集》在卷二十四。



曾被认为是元诗第一人的刘因，在《叙学》中这样谈到诗学："学诗当以六艺为本，三百篇，其至者也。三百篇之流，降而为辞赋。《离骚》《楚辞》，其至者也。辞赋本诗之一义。秦汉而下，赋遂专盛。至于《三都》《两京》，极矣。然对偶属韵，不出乎诗之律。所谓源远而未益分者也。魏晋而降，诗学日盛，曹、刘、陶、谢，其至者也。隋唐而降，诗学日变，变而得正。李、杜、韩，其至者也。周宋而降，诗学日弱，弱而后强，欧、苏、黄，其至者也。故作诗者，不能三百篇，则曹、刘、陶、谢；不能曹、刘、陶、谢，则李、杜、韩；不能李、杜、韩，则欧、苏、黄。而乃效晚唐之萎苶，学温、李之尖新，拟卢仝之怪诞，非所以为诗也。"

他进而说："至于作文，《六经》之文尚矣，不可企及也。先秦古文可学矣：《左氏》《国语》之顿挫典丽，《战国策》之清刻华峭，庄周之雄辩，《谷梁》之简婉，楚词之幽博，太史公之疏峻。汉而下其文可学矣：贾谊之壮丽，董仲舒之冲畅，刘向之规格，司马相如之富丽，扬子云之邃险，班孟坚之宏雅。魏而下陵夷至于李唐，其文可学矣：韩文公之浑厚，柳宗元之光洁，张燕公之高壮，杜牧之之豪缛，元次山之精约，陈子昂之古雅，李华、皇甫湜之温粹，元微之、白乐天之平易，陆贽、李德裕之开济。李唐而下陵夷至于宋，其文可学矣：欧阳子之正大，苏明允之老健，王临川之清新，苏子瞻之宏肆，曾子固之开阖，司马温公之笃实。下此而无学矣。学者苟能取诸家之长，贯而一之，以足乎己，而不蹈袭麋束，时出而时晦，以为有用之文，则可经纬天地，辉光日月也。"

刘因的笔下，有以上之学可祖述，这就是"大一统"的元代文学存在的前提。伯颜与其麾下将士实现了地域的"大一统"，文学（文化）必将通过上述的传承，提升到新的层次。

商挺去世。享年八十岁。

商挺（1209—1288），字孟卿（一作梦卿），号左山。曹州济阴（山东菏泽）人。父商衡仕金，死在蒙古灭金的战乱中。叔父商衢是元曲家。儿子商琦、商琥、商瑭等，都有文名。商挺入元，为曹州判官。元宪宗三年（1253），受知于在潜邸的元世祖，后佐廉希宪治理关中，为宣抚副使。元宪宗死，忽必烈召商挺到开平，与廉希宪密赞大计，使忽必烈顺利登上帝位。至元元年，入拜参知政事。至元八年升枢密副使，至元九年为安西王相。后牵连进赵炳屈死一案，两次系狱，并被抄家。后释出，卒于家。商挺有诗千余篇，但其集已散佚。诗文不多见，散曲存小令 19 首，全是〔双调·潘妃曲〕，内容均以闺情为主题。

八月十一日。王博文去世。享年六十六岁。

王博文（1223—1288），字子冕（一作子勉），号西溪。东鲁人，徙居彰德（河南安阳）。早年与王恽、王旭齐名，人称“三王”。至元十八年历官燕南按察使，任礼部尚书、大名路总管，至元二十三年迁南御史台中丞。卒于维扬寓所，谥文定。王博文对至元间文学政事影响均大，主持南台期间，颇得江南文人好评。他的《登单父琴台》诗时名颇大，为白朴《天籁集》所作的序中对南北文学融合论述精辟。

至元二十六年己丑（1289）

正月。谢翱与方凤相邀出游金华名胜洞天。

方凤写《金华洞天行纪》上下篇（《存雅堂遗集》卷四、卷五）[1]，开篇即云:“己丑岁正月，谢翱皋羽、方凤韶卿约游洞天。”此行从正月十一日到二十五日。南宋亡国之后，谢翱、方凤、唐珏、林景熙等遗民历览胜概，以壮美山河消化失去家国的楚痛，所作游记也是元人小品的开山之作，对郭畀《客杭日记》有直接的影响——不同的只是经过世事沧桑郭畀对新秩序已经认可。

经过出游，谢翱则写出《金华洞人物古迹记》（《晞发集》卷十）。这篇散文文笔严谨细致，读之如身临其境，谢翱是将它作为“画图”来写的。今存的谢翱散文，主要是游记文字。谢翱自云“余尝喜独行山水间”，谢翱与其他主要遗民的不同，正在于他实际是一个“独行者”。山水秘境是他的皈依。

回到江南，汪元量与故旧之交相逢，并以其《湖山类稿》相示。

汪元量特意到江西乐平看望了即将去世的马廷鸾。马廷鸾为汪元量诗题写了“诗史”二字，并且说[2]：

> 余在武林别元量已十年矣。一日，来乐平寻见。余且卧病，强欲一

[1] 《金华洞天行纪》，明人程敏政《宋遗民录》卷五归谢翱作，题为《金华游录》，《晞发集》作为附录，编入《晞发遗集》卷下。据谢翱传记，他写过《浙东西游记》九卷，但《金华洞天行纪》不是谢翱的作品，全文最后一句是“皋羽归后作《金华洞人物古迹记》”，而不是《金华洞天行纪》。而且《存雅堂遗集》有关跋语对此异口同声，均归之方凤。

[2] 这段话，不见于马廷鸾《碧梧玩芳集》，出自明人程敏政《宋遗民录》卷十一。

起迎肃不可得也。家人引元量至榻前，相与坐语，恍如隔世，戚然有所感焉。元量出示《湖山藁》，求余为序。展卷读甲子初作，微有汗出，读至丙子作，潸然泪下，又读至《醉歌》十首，抚席恸哭。不知所云，家人引元量出。余病复作，不能为元量吐一语，因题其集曰"诗史"。三月十一日，碧梧马廷鸾翔仲。

马廷鸾（1222—1289），字翔仲，号碧梧，晚号玩芳病叟。饶州乐平（今属江西）人。南宋淳祐七年（1247）进士，以受到权臣丁大全迫害，名重天下。咸淳中拜右丞相，罢归。入元不仕。有《碧梧玩芳集》以及《六经集传》《语孟会编》《楚辞补记》等著述。

为汪元量《湖山类稿》题诗，成了当时江南文坛的时尚。

汪元量的"诗史"《湖山类稿》，使亡国之恸又在文人心中涌动。除马廷鸾，先后为汪元量《湖山类稿》题跋的有周方、赵文、李珏等人。他们在南宋亡国之前就是汪元量的故旧。在汪元量"北上""南还"这十二年间，他们都感受了太多的失意。而为汪元量诗集题诗，则是汪元量之后的文人对往事的记忆。在《诗渊》中，保存有一整卷的《题汪水云诗卷》①，参与者多达43人，来自社会各阶层，为一部诗集"同题集咏"，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这些题诗者的一致之处在于需要宣泄情绪，并不在乎是为什么，比较特殊的是题诗者有43人之多，可绝大多数在文学史上除此再无任何印迹，不能排除其中有使用笔名别署的情况。

四月。为元廷强起北上的谢枋得，抵达大都后绝食而死。

谢枋得（1226—1289），字君直，号叠山。信州弋阳（今属江西）人。宝祐四年（1256）进士，应试建康，语侵权臣贾似道，谪兴国军。德祐初，以江东提刑知信州。元兵南下，信州失守。宋亡，居闽中。至元二十三年，程钜夫到江南访贤，与留梦炎交荐，累召不起。至元二十六年正月，福建行省参政魏天祐集守令与驻军将领，一同迫促谢枋得启程赴都。谢枋得临行前以诗致友朋云：

雪中松柏愈青青，扶植纲常在此行。天下岂无龚胜洁，人间不独伯夷清。义高便觉生堪舍，礼重方知死甚轻。南八男儿终不屈，皇天上帝

① 《诗渊》第4133～413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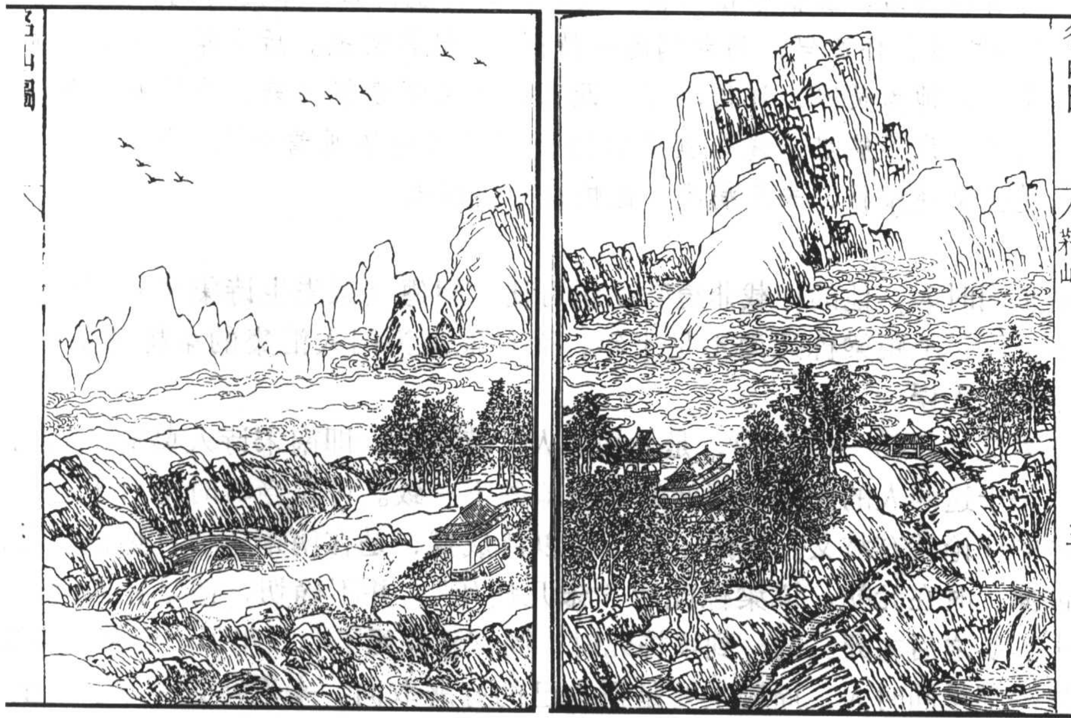
眼分明。

这是一篇绝命诗。

谢枋得到大都不食而死。他的生与死，在元初影响至巨。当时大都有许多被元廷拘押多年的南宋显宦与贵戚。谢枋得与汪元量本不相干，一个北上，一个南还。就在这一来一往之间，南人的精神维系不复存在。

轰动一时的梁栋“诗案”，本年发生在道教圣地茅山。

大茅山是江南文人进出颇多的地方。而“诗案”（“诗狱”）使得茅山与其主人备受争议，案例为深刻认识元代社会文化提供了一个观察点。本案从发生到终结，使宋元间不同的文化环境对文学所具有的影响凸现于世。



茅山。梁栋“诗案”发生在这幽邃深山之中。

元人孔齐《至正直记》（卷二“梁栋题峰”）对这个案件作了概括：“宋末士人梁栋隆吉先生有诗名。以其弟中砥为黄冠，受业三茅山，尝往还，或终岁焉。一日，登大茅峰题壁赋长句，有云：‘大君上天宝剑化，小龙入海明珠沉。’‘安得长松撑日月，华阳世界收层阴。’隆吉先生每恃己才，邈乎众人，众人多憾之。且好多言。一黄冠者与隆吉有隙，诉此诗于句容县，以为谤讪朝廷，有思宋之心。县上于郡，郡达于行省，行省闻之都省。直毁屋壁，

函至京师，抹（此字疑误）梁公系于狱，不伏，但曰：'吾自赋诗耳，非谤讪也。'久而不释。及礼部官[①]拟云：'诗人吟咏性情，不可诬以谤讪。倘是谤讪，亦非堂堂天朝所不能容者。'于是免罪放还江南。"

这件事，元人胡酉《梁先生诗集序》[②]说发生在至元二十六年庚寅。都省，指建康，梁栋入建康狱，未几放还，遂定居建康。"庚寅遭诗祸，自是名益闻。卜居建康，时往来茅山中，江东人士从其学甚众。乙巳岁七月七日，无疾坐逝。"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上"子山隆吉"节）评述这件事说：

> 梁栋，字隆吉，镇江人。登第，尝授尉，与莫子山甚稔。一日，偶有客访子山，留饮作菜，元鱼为馔，偶不及栋，栋憾之。遂告子山尝作诗有讥讪语，官捕子山入狱。久之，始得脱而归，未几病死。余尝挽之："秦邸狱成杯酒里，乌台祸起一诗间。"纪其实也。后十年，栋之弟投茅山许宗师为黄冠，许待之厚。既而，栋又挈妻孥而来，许不从，栋遂大骂之。许不能堪，遂告其曾作诗云"浮云暗不见青天"，指以为罪。于是捕至建康狱，未几病死。此恢恢之明报也。

周密是同时人，他的记载非道听途说可比。胡酉《梁先生诗集序》写于皇庆二年上元，上距梁栋死尚不足十年，而且他是为门人汇集的梁栋诗篇作序，系年必定无误。

梁栋（1243—1305）[③]，是元初名人。莫子山，即南宋诗人莫崙，入元不仕。关于这两人的关系，两处的记载却并不一致。可见当时时论对于这件事本身的议论就有歧义。显然，莫子山以诗成狱，是在南宋末年；梁栋自己因诗被捕，时在元初。说梁栋此后"未几病死"，并不确切，他是在系狱又被释十五年之后才死去的，到梁栋死时，周密已经死了七八年了。周密与梁栋、莫崙等都是同时人，周密主要是据自己的好恶取向，来看待这件事。《至正直记》写于元末，有可能更客观一些。其实只要排除了矛盾的地方，就可以恢复出事实的真相。可以肯定：梁栋在时论中是有争议的人物，待人一贯刻薄应是事实。他得罪了大茅山的道士，为其举报。举报的道士，周密说是

---

① 这个"礼部官"，没有留名。据《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二十八年九月，"以铁里为礼部尚书"。至元二十六年的礼部尚书也应该是蒙古族。

② 见《宋遗民录》卷十二"梁隆吉"。

③ 据《梁先生诗集序》，梁栋"以壬寅年十二月十六日生于鄂"。壬寅，是宋理宗淳祐二年（1242），但本年的十二月十六日则已在公元1243年。

"许宗师"，而前一年卢挚出游茅山时，接待他的是"宗坛师许君"[1]，这个宗坛师，显然就是梁栋惹恼的"茅山许宗师"。而蒋正子《山房随笔》则明言：梁栋"老依元符宫宗师许道杞，许甚礼之，且赒其家。梁好嘲骂，众道士恶之，遂笺此诗告官，以讥时逮捕金陵，备尝笞楚，卒得免，亦终不偶而殂。"

但不应忽略的背景是：梁栋并非南宋遗民，所以也谈不上忠于宋，以至于要为宋亡不平，非得写诗泄愤。胡廼《梁先生诗集序》开篇即说："先生姓梁，讳栋，字隆吉。其先相州人。曾祖讳翼，字羽之；祖讳琛，字仲玉；父讳定，字安道，皆仕金国。金亡，安道公过江南，寓鄂州。先生于壬寅年十二月十六日生于鄂。后迁镇江。弱冠领漕荐，戊辰登龙飞第，初选宝应簿，丁父忧。壬申再调钱塘仁和尉，辟入帅幕，一时声名甚张。甲戌，避地建上。丙子，宋亡，归武林。"

也就是说，梁栋实际是金国难民之后。他父祖三代都仕于金，金与宋本是敌国。金亡于蒙古，许多金国治下的臣民为避难逃入南宋，梁栋父亲是其中之一。胡廼《梁先生诗集序》还提到，梁栋"平日好吟咏，稿无存者。门人问曰：'先生何故不存稿？'答曰：'吾诗堪传，人将有腹稿在。'"

不管怎么说，一首并无多少诗味的《大茅峰》，竟成为至元二十六七年间知名的诗篇，居然还得到将题写了诗句的整堵墙壁作为"罪证"而密封运到京师的"待遇"：

> 杖藜绝顶穷追寻，青山世路争岖嵚。碧云遮断天外眼，春风吹老人间心。大龙上天宝剑化，小龙入海明珠沉。无人更守玄帝鼎，有客欲问秦皇金。颠崖谁念受辛苦，古洞未易潜幽深。神光不破黑暗恼，仙鬼空学离骚吟。我来俯仰一慷慨，山川良昔人民今。安得长杠撑日月，华阳世界收层阴。一声长啸下山去，草木为我留清音。

这一事件是元廷弃绝文字之狱的标志。"诗祸"由它而起，也由它绝迹。否则元代文学将形成另外的格局。其中引起争议的"碧云遮断天外眼"（民间引称为"浮云暗不见青天"）；"大龙上天宝剑化，小龙入海明珠沉"（民间引称为"大君上天宝剑化，小龙入海明珠沉"）等诗句，确实只是赋诗。当时如果因此而成大狱，元诗将难于措词。有了这段经历，梁栋才不再留存诗稿——也是"十年怕井绳"吧。

---

[1] 卢挚《游茅山》诗序说过："羽流之宇于上峰者曰元符万宁宫，亦曰宗坛。""宗坛师"即"许君"，名字是许道杞。

"诗案"发生后，梁栋的弟弟梁柱（梁中砥、梁大柱、梁尘外）的动向值得注意。张之翰《西岩集》卷十四有《梁尘外山中吟序》，张之翰还提到"茅山道士梁中砥"亲自在"燕都画肆中"购买了一幅文与可的《墨竹》。这些文字，没有具体的写作年月，但张之翰的《题诗意图》则是"至元癸卯六月"作，此文开篇即云"此图，赵集贤写茅山梁中砥送僧道存意也"。所以可以推定至元二十八年前后，梁柱在大都。这正是"诗案"发生之后的关键时期。显然他在大都，与其兄的被拘押、被释放不无关系。

蔡正孙撰诗论著作《诗林广记》成书。

《诗林广记》共二十卷（前集十卷，后集十卷）是篇幅较大的诗话。蔡正孙，字粹然，号蒙斋野叟。生平不详，仅知是谢枋得门人。在宋亡十年之后，经历"变乱焦灼"，"暇日采晋、宋以来大名家及其余脍炙人口者，凡几百篇，抄之以课儿侄，并集前贤评语及有所援据摹拟者，冥搜旁引，而丽于各篇之次。"（《诗林广记自序》）

一直在湖广驻守的郭昂，受命移镇江西，不久又调赴广东监造战船，授以广东宣慰使之职。

郭昂早年受知于廉希宪，曾屡佐戎幕，"用其画军旅，率辄效"（姚燧《郭野斋诗集序》[1]）。以功授山东统军司知事，南下攻宋，郭昂率军围南宋重镇襄阳，迁襄阳总军司，困襄阳数年而拔之，又转授沅州安抚司同知，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域，转战于崇山峻岭间。去世于至元末，享年六十一岁。郭昂有诗才，以"横槊赋诗，下马草檄"（《柳待制文集》卷八）著称，刘将孙《题郭招讨野斋》（《养吾斋集》卷六）诗说："千年尚父遇西伯，万里伏波思少游"，"但存物外超然意，何必山庐更钓舟"，可见郭昂在时人心目中的地位。有诗集《野斋集》，久已散佚，今存佚诗276首，《元诗选》二集仅辑存10首。几十年戎马生涯之中，郭昂留下了大量的诗篇，多数作品反映的不是征战杀伐，而反映出诗人的思考与观察。早年他作幕僚奔走于权门，并曾因事系狱，以一组多达27首的组诗《狱中偶得》坦陈了有冤难申的心情。在呈权臣廉希宪的诗中，他表白道："到头泾渭自清浑"，"素色元来照覆盆"。因此，他的《九月梨花》读之大有深意："洁白人多爱异常，西风故使一枝芳。新邻谩惹黄花妒，旧似曾陪艳杏香。雪态只能惊俗眼，玉肌终不耐清霜。可怜此是何时节，刚出头来要洗妆。"他在征战中度过了半生，诗有比较鲜

[1] 见《牧庵集》卷三。

明的个性，更多地是在抒写诗人情怀，而不是渲染战功。

王奕率领同乡学子东行赴山东曲阜祭孔，往返所作诗篇结为《东行斐稿》三卷。

《东行斐稿》，即《玉斗山人集》，是元初较早的一种“北上纪行”集，其中有10首诗题为《金馀元遗山来拜祖庭有纪行十首遂倚歌之先后殊时感慨一也》，这些“追和”诗，也是南人较早接受北方诗人的例证。在“大一统”初期，南北打破界限，人员互动，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南人北上，除与祖籍有关，最初目的往往在大都、上都、汴梁、曲阜、长安等地。

夹谷之奇去世。

夹谷之奇（？—1289），字士常，号书隐。女真加古（夹谷）部人，居滕州（山东滕县）。早年到东平，受业于康晔，初授济宁教授，辟中书省掾。从蒙古攻宋，授行省都事，除浙西宪佥，移淮东。至元十九年入为吏部郎中，迁左赞善大夫，历翰林直学士、吏部侍郎，拜侍御史。至元二十五年丁母忧，以吏部尚书起复，屡请终制，不许。明年卒。

他是随伯颜大军南下的“北人”，宋亡之后，长期在江南任职，在江南文坛颇有名，诗文均受到推许，但所作传世不多。

至元二十七年庚寅（1290）

谢翱写出了著名的散文《登西台恸哭记》。

本年谢翱四十二岁。《登西台恸哭记》（《晞发集》卷十）是作者怀念文天祥的“悼文”，文字不长，但激情喷薄，普遍牵动了江南人士的亡国之痛，也成为南宋文明的“挽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谢翱就是因这数千字的《登西台恸哭记》与《冬青树引别玉潜》而名垂青史。

西台，在江浙行省桐庐的富春山，即汉代著名隐士严光隐居钓鱼之所，又名为“钓台”。本年冬，谢翱与三个友人冒雪冲寒一同前往越中，这三人，他自书为“甲、乙若丙”，意在隐去其名，但一般认为就是吴思齐、冯桂芳、翁衡[①]。渡越江时，“薄暮，雪作风凛，不可留。登岸，宿乙家，夜复赋诗怀

① 见明人程敏政《宋遗民录》卷三张丁（张孟兼）为《登西台恸哭记》作的注。

古。明日，益风雪。别甲于江。予与丙独行三十里，又越宿”，才在风雪中抵达西台。最后，只他自己与一个伴侣（丙，或即翁衡）。他来，就是为了登临恸哭，发泄积郁。他曾三登西台：一是在宋度宗咸淳元年乙丑，时年十七岁；二是在至元二十四年；三是本年冬。在第三次登临之后，才写出了《登西台恸哭记》。张丁（张孟兼）为其释义说：“其恸西台，则恸乎丞相（文天祥）也。恸丞相，则恸乎宋之三百年也。”[①] 他的一首诗题为《江上别友》的诗，是为与甲乙分手而作，另一首《西台哭所思》则是写于风雪之中[②]：“残年哭知己，白日下荒台。泪落吴江水，随潮到海回。故衣犹染碧，后土不怜才。未老山中客，惟应赋八哀。”他的恸哭既有明确所指，又颇泛泛。他就是不能接受宋元兴替的现实。

春。林景熙在浙江平阳仙口亲眼见到了海市蜃楼的奇异景观，以散文《蜃说》借景生情。

《蜃说》（《霁山集》卷四）是林景熙“避寇海滨”时所作。在林景熙笔下，海市蜃楼在一时间“冉冉漫天”，似乎壮观无极，但要不了多久，随着旭日东升，海市消散干净。林景熙的感慨是：“运去代迁，荡为焦土，化为浮埃，——是亦一蜃也。”这已经是在为南宋写悼词了。与《登西台恸哭记》相比，《蜃说》几乎不为人们提及，但其警示意义更明显。

九月。张炎北游大都。

张炎《山中白云词》中那些写于大都的词，是其著意之作，词序涉及北游的还有：“大都长春宫，即旧之太极宫”（〔忆旧游〕）；“北游道中寄怀”（〔凄凉犯〕）；“夜渡古黄河，与沈尧道、曾子敬同赋”（〔壶中天〕）；“都下与沈尧道同赋”[③]（〔声声慢〕）；“席间代人赋情”（〔绮罗香〕）；“都下寒食，游人甚盛，水边花外，多丽环集，各以柳圈袚禊而去，——亦京洛旧事也”（〔庆春宫〕）；“沈梅娇，杭妓也，忽于京都见之，把酒相劳苦，犹能歌周清真〔意难忘〕、〔台城路〕二曲，因嘱余记其事。词成，以罗帕书之”（〔国香〕）；“庚寅秋九月，之北，遇汪菊坡，一见若惊，相对如梦。回忆旧游，已十八年矣。因赋此词”（〔台城路〕）；“海云寺千叶杏二株，奇丽可观，江南所无。越一日，过傅岩起清晏堂，见古瓶中数枝，云自海云来，名芙蓉杏。

---

① 见明人程敏政《宋遗民录》卷三，张丁（张孟兼）为《登西台恸哭记》所作的题解。

② 两首诗均见《晞发集》卷七。

③ 别本作“北游答会心传惠诗”。

因爱玩不去，岩起索赋此曲”（〔三姝梅〕）。这些词，不一定就是在出游期间的全部作品，但将词前题记排列于此等于是一篇游记的提纲，词中打动人之处往往是沧桑之感。

南人北游大都是当时时尚，北上的诗文纪游之作早在十年前就传诵一时，而张炎笔下不同的是，他是南渡大将张俊的后人。从南渡起一百六十余年，对北方已经相当陌生。

商琥拜中台监察御史。

商琥，字台符。曹州济阴（山东菏泽）人。商挺长子。至元十四年以姚枢、许衡荐，为南台监察御史。在中台监察御史任上，曾举荐天下名士十余人，皆受召用，至元三十年迁国子监司业。诗文均有时名，有别集《彝斋文集》，但未见传。

宫天挺在江南以杂剧知名于时。

宫天挺，字大用。大名开州（河南濮阳）人。元世祖至元后期在世，历学官，除钓台书院山长。为权豪所中，虽事获辨明，亦不见用，卒于常州。钟嗣成《录鬼簿》（曹寅刊本）说，宫天挺“先君与之莫逆交，故余常得侍坐。见其吟咏，文章笔力，人莫能敌。乐章歌曲，特余事耳”。作杂剧6种：《生死交范张鸡黍》《宋上皇御赏凤凰楼》《宋仁宗御览托公书》《使河南汲黯开仓》《栖会稽越王尝胆》《严子陵钓鱼台》，仅《生死交范张鸡黍》流传至今，是元杂剧中的名篇。《太和正音谱》称其词“如西风雕鹗”。

王旭受到砀山县令的礼遇，被请到县学主持讲席。

王旭，字景初。东平（今属山东）人。以文章知名于时，与同郡王构、永年王磐并称为“三王”。早年家贫，靠教书为生，足迹遍及南北，但一生未仕，常依靠资助维持生活。主要活动于至元、大德年间。有《兰轩集》二十卷，亡佚不传。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辑出王旭诗文若干篇，重编为《兰轩集》十六卷。与王构、王磐相比，王旭处境最不好，诗文中往往流露出怀才不遇的情绪，《古风三十首》比较集中地表达了自己对人生的感慨。

甘泳去世。

甘泳对宋元之际江西一省诗歌传承影响颇大，对“江西诗派”在元初的走向也有关涉，但身后因岁月流逝而被埋没。

甘泳（？—1290），字中夫，一字泳之，号东溪子。崇仁（今属江西）人。为人刚正不阿，南宋末年，年二十余浪迹东南。受知于徐霖、汤汉。效法林和靖，一生未娶妻成家。读书不拘绳尺，不随人俯仰，尤工于诗。所著《东溪集》，今不传。《元诗选》三集选入其诗 19 首。《元诗选》小传引黄大山为《东溪集》所写的序，评甘泳的诗说："高不诞，深不晦，劲不粗，全体似李贺而不涉于怪怪奇奇。《出岭杂言》一首，凡一千四百字，随事起义，随义炼句，古今大篇，未或过之。"他的《归舟》诗说："天壤岂无苏季子，恨我不识韩荆州。"可见他距离南宋江湖派并不远。与江湖派合流，是入元后江西派的特点。

至元二十八年辛卯（1291）

正月。戴表元为周密《齐东野语》作序。

《齐东野语》二十卷，是元代笔记篇幅较长的一种。书名取自《孟子》"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也表示不忘家族出处（周密祖籍济南）。书中内容很大一部分源于家藏文献，虽然这些资料"悉皆散亡"，但他仍然依据记忆，并参照其他文献作了记录。书中的一些段落，比如卷一"放翁钟情前室"、卷十二"台妓严蕊"与《癸辛杂识》中关于龚开《宋江三十六赞》的文字等，都为后世小说戏曲家所关注。

二月三日。白朴出游杭州西湖。

《天籁集》有〔永遇乐〕词，词序云："至元辛卯春二月三日，同李景安提举游杭州西湖。"李景安，即李浩，金坛人。至元二十三年任江东儒学提举。是年，白朴六十六岁。他应去世于此后①。

---

① 关于白朴卒年，因《天籁集》有序云"丙午秋到维扬，途中值雨，甚快然"的〔水龙吟〕，而元成宗大德十年岁在丙午。所以一般认为白朴卒于大德十年之后，至少活了八十一岁。但这首词，不像是八十一岁的老人所写，"丙午"不能排除是元定宗元年（1246）。或以为，宋金或宋元对峙，扬州不在金、元境内，白朴似不应于二十一岁时前往在南宋治下的扬州。实际上在金亡之际与蒙古治理的初期，许多金朝治下的文人都曾进入南宋疆域，比如"河汾诸老"中的数人。特别是，据《金史·白华传》，白朴的父亲在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金亡前夕，自邓州降宋，有过数年在南宋为臣的经历。所以，白朴在 1246 年有可能出游扬州并写出那首〔水龙吟〕词。故暂将白朴作品最晚的系年订于至元二十六年。

白朴（1226—?），初名白恒，字仁甫，一字太素，号兰谷。祖籍隩州（山西河曲），寓居真定（河北正定）。在金亡之际，其父白华从金哀宗出奔，又进入南宋境内。白朴幼年历经战乱，曾寄寓在元好问家。早年漫游中原，南宋亡，长期在江南游历。与卢挚、王恽、胡祗遹等都有交往，特别是与王博文相知颇深。一生从未出仕，中统初几次受到举荐，都没有应聘。著杂剧16种：《唐明皇秋夜梧桐雨》《裴少俊墙头马上》《十六曲崔护谒浆》《秋江风月凤凰船》《高祖归庄》《唐明皇游月宫》《祝英台死嫁梁山伯》《楚庄王夜宴绝缨会》《董秀英花月东墙记》《汉高祖泽中斩白蛇》《阎师道赶江》《韩翠苹御水流红叶》《薛琼琼月夜银筝怨》《萧翼智赚兰亭记》《苏小小月夜钱塘梦》，除前两种，均已失传或仅存残曲。他的《天籁集》是元人不多见的词别集，存词104阕。另外，还有37支小令，4套套曲（据《全元散曲》）。他的散曲杂剧，都有广泛的影响，历来列为“元曲四大家”之一。今存的两部杂剧《唐明皇秋夜梧桐雨》《裴少俊墙头马上》是元杂剧经典。

春。闽中出现罕见天象——沙尘暴。林景熙以其《雨土》诗，表达出廓清宇宙的意愿。

《雨土》（《霁山集》卷三）诗有题下注：“至元辛卯春，瓯中雨土。”诗云：“丰凶不可问，疑入瘴乡春。高汉枯无润，刚风吹作尘。园林霜后色，樵牧雾中身。四望荒荒白，谁为洗日人。”以“洗日”重见晴天，使天下丰稔天平。

五月，不忽木拜中书平章政事。

桑哥被诛，世祖召见不忽木，欲用为宰相，不忽木举“国族”完泽代己，于是完泽出任宰相，不忽木任平章政事，这是元曲家所踞的最高位置。据《元史》本传，不忽木为政“屏弃凶邪，崇拔善良，饬为吏者皆亲经术”；“人心熙洽，以为复见中统、至元初治”。政事之暇，他以读书写作为乐，自号“静得”。

朱晞颜反映海洋惊涛骇浪生涯的诗集《鲸背吟》结集。

《鲸背吟》存诗仅33首。但相同题材的诗集，元人仅此一种，反映海洋生活的诗篇也不多见。《鲸背吟序》云：“仆初涉诗书，薄游山水，偶托迹于胄科，未忘情于笔砚。缘木以求鱼，乘桴而浮海，观千艘之漕饷，势若龙骧；受半载之奔波，名如蜗角。碧汉迢遥，一似桴槎于天上；银涛涌汹，几番战栗于船中。今将所历海洋山岛，与夫风物所闻，舟航所见，各成诗一首。诗

尾联以古句，盖滑稽也，非敢称于格律。然而风樯之下，柁楼之上，举酒酌月，亦可与梢人黄帽郎同发一笑云尔。至元辛卯[①]中秋，苏台吟人朱晞颜卜名世序[②]。”最后一首诗写道：“乘风破浪万里游，清如王子泛扁舟。早知鲸背推敲险，悔不来时只跨牛。”

因为赵孟頫为宋无《翠寒集》写的序中曾说：“子虚姓宋，旧以晞颜字行。世居晋陵，家值兵难，迁吴，冒朱姓云。”所以一般认为，“朱晞颜”就是诗人宋无。《鲸背吟》应是宋无诗集，顾嗣立《元诗选》初集的宋无小传即取其说。但《四库全书总目》则对此有所保留。

冬。戴表元来吴中，为友人张革（字君信）作《张君信诗序》。

戴表元在《张君信诗序》（《剡源集》卷八）中以自己为例，分析了诗文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并对友人学诗经历作了概括：“人之于艺，苟非其攻而好之者，则不能精。余少时多好：好仙、好侠、好医药卜巫，以至方技博弈、蹴鞠、击刺、戏弄之类，几无所不好。翰墨几案间事，固不言而知也，然皆不精。惟我攻诗最久。而异时以科举取士，余当治词赋，其法难精。一精词赋，则力不能及他学。在杭州见异方之精词赋者，莫如闽士。闽士中有尤精者焉。当是时，张君信闽士中尤精词赋之一人也。余即早成进士，去，益为诗；君信虽精词赋，遇大进取辄不利，然亦数数为诗。尝以贽见其乡先生陈性善学士。陈学士戏曰：‘子欲执是上春官乎？’君信惭之，弃其诗复专攻辞赋。而科举废矣。于是君信若愠若狂，始放意为诗。不复如前时却行顾忌。辛卯春，余来吴，君信尽出所作累百余篇相示。酒酣气张，音吐清畅，余为

① 至元十八年辛巳，宋无参与了元第二次渡海出征日本的战役。《元诗选》初集将《鲸背吟》判归宋无，认为作者朱晞颜，是宋无别名，《鲸背吟》所写的就是至元十八年辛巳渡海的见闻感受。但《鲸背吟序》结集时间却注为“辛卯”，而不是辛巳。然而《鲸背吟》的跋语中又说：“余弟录余海中诗成帙，因名《鲸背吟》，又叙于前，记一时之兴。”如是，辛卯则是结集的时间，而不是写作的时间。

② 这里的文字，一般引为“苏台吟人朱晞颜名世序”，据之又引申为宋无曾名朱晞颜，字名世。但这个署名其实是“苏台吟人朱晞颜卜名世序”，也就是说：朱晞颜自称为“卜名世”——不名氏，等说“无名氏”。这个差别虽细微，但对于宋无或朱晞颜至关重要。《四库全书》本《鲸背吟》与《元诗选》初集《鲸背吟》都是“苏台吟人朱晞颜名世序”。目前尚未见到《鲸背吟》的清康熙以前的单行本（即明刊本），但是明人曹学佺《石仓十二代诗选》的元诗卷六有宋无（选诗 22 首），在元诗卷四十八又全文（包括序跋）录出了朱晞颜的《鲸背吟》，所以，“隐藏”在《石仓十二代诗选》中的《鲸背吟》，是其早于清康熙年间的明刻本。而《石仓十二代诗选》元诗卷四十八的《鲸背吟自序》，其署名正是“苏台吟人朱晞颜卜名世序”。

击节，从容停筋隽永欢乎，适哉！虽然，余与君信皆渐老矣。余自追念少年血气盛强时，所好诸艺，皆为无益，幸而不精。虽精于诗，亦复何用。曾不如医药、卜筮、方技，犹可以自给；蹴踘、博弈之流，犹为人所爱幸。东方生叹陛楯郎之不为优旃，太史公羞节士而尊货殖，非空言也。君信此事姑止。闻新年移家湖上，为我种鱼千数头，栅鸡圈豕，令牧养可作百十日具，艺秫酿美酒数石，余以深冬访子，为子屡醉不一。从来三曹父子、渊明、太白，精于诗者无一诗不及酒。余二人亦可缘此纵言乎。"

在字里行间，披露出复杂难言的心情。张革的诗，一首也没有流传至今，可这篇序不但是宋元之际的重要诗论，也是文字优美、感情真挚的散文。

戴表元陆续写出系列序跋，对文坛现状作了批评与探讨。

《剡源集》中，编入了《赵子昂诗文集序》《仇仁近诗序》《方使君诗序》《周公谨弁阳诗序》《陈无逸诗序》《张仲实文编序》《张仲实诗序》《白廷玉诗序》《陈晦父诗序》《洪潜甫诗序》《方端叟诗序》《顾伯玉诗文稿序》等等。这些序跋主要是为时人而作，就诗学与社会变革而论，契入点之准，探讨之深，眼界之高，关照之细致，在当时文坛确实得领风气之先。尽管同时的诗文家也都涉及过这些问题的某一方面，但戴表元确实是对文学在宋元间过渡感受最深切的人，所具有的高屋建瓴的眼界无人能及。

可以与《张君信诗序》相呼应的，是《张仲实诗序》（《剡源集》卷八）：

> 异时缙绅先生无所事诗。见有攒眉拥鼻而吟者辄靳之曰："是唐声也。是不足为吾学也。吾学大出之，可以歌咏唐虞；小出之，不失为孔氏之徒。而何用是啁啁为哉！其为唐诗者，汩然无所与于世则已耳。吾不屑往与之议也。"诠改举废，诗事渐出。而昔之所靳者，骤而精焉则不能，因亦浸为之。……张仲实，循忠烈王诸孙，在杭友中年最妙，而诗尚最力，强志多学。尝与庐陵刘公会孟往复。是能为唐而不为唐者也。

在至元后期，戴表元在文坛的位置无可替代，他能在别人已经见惯的事情中发现着眼点，并以深入浅出的方式表达出来。

为反映对当时影响颇大的不法僧徒祖杰的败亡，使正义得到伸张，一出以祖杰为主角的戏文——南戏（名字或许叫《义犬记》），广泛流传在两浙。

这个戏文不但与杨琏真伽的掘宋陵有牵连，还是第一部（也是元代惟一

一部）以当时的真人真事为内容的“时事剧”。南戏盛行于温州，别名就叫做“永嘉杂剧”，将本地发生的事件入戏，对于南戏传播起了推动作用。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上“祖杰”节）记录的事件经过是：

祖杰，是温州乐清县僧徒，自号斗崖。曾是一度炙手可热的江南释教都总统——河西僧人杨琏真伽的党羽。乘江山换主之际，聚敛了大批不义之财，通过贿赂来到江南的“北人”，成为政权过渡时期的一霸，住持永嘉名刹江心寺。为留下退路，居然预先在其外建造了居室名叫春雨庵，极其华丽奢侈。当地里正姓俞，不堪科役重负，入寺为僧，法名如思。如思有三个儿子，两个也在雁荡出家。本州元朝任命的总管与祖杰关系密切，总管托他寻访美女。祖杰弄到一个美人，容貌出众，便留在身边作情人养起来，但不久这美人怀孕了，致使众人议论纷纷，他便令如思（俞里正）那个没有出家的长子取其为妻，可祖杰还是不时到俞家与美人幽会，俞生不堪邻人嘲讥，便挈家与妻子避居于远村——一个叫做“玉环”的小地方。祖杰听到这个消息大怒，竟唆使人砍伐俞家祖坟林木寻衅滋事。俞家讼于官，反受杖责；进而向廉访司上诉，祖杰又叫人在他家中藏匿武器栽赃，而且首告他私藏军器，俞生又受到责罚。最后上诉到行省，祖杰贿赂了有关部门，将案子发回本县处理。俞生知道在本县处理会有什么结局，就打算北上大都告御状。祖杰听到消息，知道俞生不会善罢甘休，派遣数十个仆从，将俞家三个儿子（包括两个出家为僧的）都抓起来，用小船载到僻静处，将其全家老小都溺死于水中，怀孕的妇女被剖腹，验看腹中胎儿是男是女。俞家遭到灭门之祸。俞家两个出家的儿子原是在雁荡山寺为僧，雁荡山寺的住持真藏为其不平，越境捕杀了祖杰的两个爪牙，并将这个灭门凶案上告官府。但州县都受祖杰贿赂，无人受理。僧录释印与祖杰有隙，获悉整个过程，遂由僧官出面再次状告祖杰，这时祖杰也有些心虚了，就给了释印20锭钞，求他息事宁人。释印竟将这些钱作为旁证一同交给官府。同时，祖杰自己将事情弄糟了：他居然伪造了一件公文，意欲造成如思（俞里正）一家七人正在平江状告祖杰的假象，证明自己并没有将俞氏灭门。可平江与永嘉毫不相干，平江没有给永嘉发这样的公文的道理。这真应了一句古语“欲盖弥彰”。这时，永嘉官方才有所警觉，并立即移文平江，要求证实此事是否真实。平江的答复不出所料：根本没有这个事，平江从未发出过这个公文。于是，温州路下令要巡检司抓捕祖杰及其党羽。巡检司的巡检是色目人，与祖杰全无关系，而且他当晚梦见数十人浑身是血在向自己泣诉。刚从噩梦中惊醒，温州路要抓人的移文就到了，这个色目巡检当时就出了一身冷汗。他正要出家门，祖杰的党羽就登门来访，目的是要贿赂巡检。党羽拿出美酒，但一打开酒瓶，竟然发出如同裂帛般的

声音，巡检一惊，严词拒绝。等他带人到了寺院所在的村落，却空无一人，为怕受到连累，邻里都逃个干净，只有一只狗在。跑了一天路的士兵又累又饿，准备杀狗充饥，但狗不即不离，居然全无害怕之状。它一步步将士兵引到一间破屋前，自己冲着屋子狂吠不止。士兵进了屋子，在屋角的草堆里找到了三个人，他们竟说不清自己为什么藏匿在这里。还没用刑，三人就招供了。于是，巡检便设计让祖杰从藏身之处露面。过了两个月，抓获了祖杰，他死不开口，因为他已经派死党释普通带着重资潜往大都求援。他的靠山杨琏真伽离开江南释教总统的职务，回到大都了。祖杰死不开口，他的党羽还有人漏网，特别是那个北上的释普通与祖杰的死党陈桥番一直没有抓获。所以一连几个月，审讯没有进展。僧录释印每天都在县衙号诉，要求尽快立案处理这个凶案，为了应付释印，祖杰由县狱转移到州狱。祖杰的囚车即将从县狱出发时，巡检估计陈桥番必然会在当场观察动静。果然，在狱前抓住了前来窥探的陈桥番。在州上，祖杰还凶悍不服，但与陈桥番对质时祖杰立即面如土色，陈桥番说:“此事我已经招供了，你还推托什么?”于是祖杰不得不招认了罪行。州上行文到行省，此前受过祖杰贿赂的人物占据着关键位置，便采取了拖延时日的策略，等待大都的消息。人们纷纷为此感到不平，惟恐罪大恶极的祖杰最终漏网，专门将其罪行编写了一部戏文，在民间广泛演出，使其劣迹无人不知。当局感到民愤难平、众口难掩，就使祖杰不明不白地死在狱中。他死了刚五天，大都的赦其罪的公文就到了。

记录了案件经过之后，周密特意说明，他是听夏若木讲的，而夏若木的哥哥夏若水，当时身为温州路主管此案的官员。

这个事件具备了一部戏剧所要求的一切要素。可以说，它本身比许多经过细致加工的作品更具备戏剧冲突与故事性。同时它又是南戏怎样在民间流传、受到怎样的欢迎的例证。这类活生生的事实，大多已经被岁月消磨干净，因恶僧祖杰而创制的戏文虽然未能流传至今，但上述记载却使它成为文学与社会生活关系的一个极其生动的“化石”。

周密没有提到这件事具体发生在哪一年。但杨琏真伽在至元十四年——二十五年期间，出任江南释教总统，并以发掘南宋诸陵著名。至元二十五年，他奉命集江南诸山住持到大都问法。此后一直在大都。至元二十八年，因权臣桑哥伏诛而失势，省台诸臣要处他以死刑，但元世祖没有允许，可是从此彻底失去了对朝政的影响。祖杰是“杨髡之党”，所以，此事必然发生在至元二十五年到至元二十八年之间。祖杰有恃无恐，也因为有杨琏真伽作他的后台。他派门人赶赴京师，主要是向杨琏真伽求援。而他用来贿赂各级官员的宝货，不少是发掘南宋陵墓所得。

作为一出“时事剧”，这个关于不法僧徒祖杰的南戏的一次次演出过程，就是它的修改成型过程。二十多年后——皇庆、延祐间，一出更为精彩的同题材戏文《义犬记》，开始从温州波及外地。同时，刘埙特意为它撰写了《义犬传》一文。

刘因应召入朝，但未接受官职。

刘因入朝，元廷拟授集贤学士，刘因称病固辞，并上书丞相以明心意。元世祖只好表示:“古有所谓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欤!”

张炎从大都返回江南，除了仆仆风尘，还带来了寂寞情愫。

北游，是张炎一生的重大事件。在一阕新词〔八声甘州〕的词序中，张炎写道:“辛卯岁，沈尧道同余北归，各处杭、越。逾岁，尧道来问寂寞，笑语数日，又复别去。赋此曲，并寄赵学舟。”至元二十七年，张炎与友人沈钦（字尧道）一同出游燕京。一年之后，两人一同从大都返回。回到江南，则各奔东西。〔八声甘州〕词云:

> 记玉关踏雪事清游，寒气脆貂裘。傍枯林古道，长河饮马，此意悠悠。短梦依然江表，老泪洒西州。一字无题处，落叶都愁。　载取白云归去，问谁留楚佩，弄影中洲？折芦花赠远，零落一身秋。向寻常、野桥流水，待招来不是旧沙鸥。空怀感，有斜阳处，却怕登楼。

写这首词时，张炎四十五岁，正值有为之年。北归，却使他感情负载沉重。怀念故国，是有张炎那样经历的人不能回避的；但个人前途何在，却使他分外感伤。

张炎（1248—?），字叔夏，号玉田，又号乐笑翁，以《春水》词出名，人称“张春水”。祖籍西秦（陕西凤翔），占籍钱塘（浙江杭州）。二十九岁时南宋亡，入元不仕，与王沂孙、周密等交游，潜心词学。他是宋元间词学的过渡人物，有《山中白云词》八卷、论词著述《词源》二卷。

宋遗民刘应龟仕于元，出任义乌教谕。

在遗民中，刘应龟是较迟出仕新朝的一人，而且仅任过儒学教职。

刘应龟（1244—1307），字元益，号山南。义乌（今属浙江）人。宋末太学生，宋亡，还归故乡，筑室南山之南，卖药以自晦。至元二十八年起为本县教谕，调月泉书院山长，官至杭州路学正。与宋遗民诗人方凤、谢翱等

为友，谢翱《晞发集》（卷八）有《韶卿往乌伤寄刘元益》诗；金华黄溍亦受其教。据黄溍《山南先生述》（《黄金华集》卷三）称，刘应龟著有《梦稿》六卷、《痴稿》六卷、《听雨留稿》八卷，“识与不识者皆称之曰‘山南先生’”。所著均不传，仅《月泉吟社》存其《春日田园杂兴》诗。

释文珦去世。享年八十二岁。

释文珦（1210—1291），字叔向，号潜山。於潜（浙江临安）人。早年在杭州出家为僧，南宋后期政局紊乱，曾受诋毁而下狱。此后出入江湖，云游挂单，以游方僧的身份数十年间足迹遍及两浙。在元代只生活了十几年，但今存的诗却有相当一部分写在元代，而且这部分诗是他成就的体现。他将江湖诗派风格引入自己诗卷，但他的生活态度与典型的江湖诗人迥然有别，形成了一种依附江湖派格调，表达释子生活情趣志向的诗风，对宋元之际与元代的僧诗，影响广泛，但后世诗论家论及宋元诗以及僧诗，几乎从没有提到过他[①]。由于他和他的诗的隐而不现，使宋元僧诗的衔接出现了缺环。文珦《潜山集》（或作《潜山稿》），原本未见流传，甚至罕见著录。清乾隆年间编《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文珦诗近900首，重编成《潜山集》十二卷。《全宋诗》（第六十三册）另据《诗渊》又辑出数百首佚诗。文珦是宋元存诗最多的释子。

至元二十九年壬辰（1292）

二月六日。叶李去世。

死前半年，叶李做了一个怪梦，梦见一个老人对他说：“汝前为文昌相，坐泄露天机遭谴。能悔过，当复职。”并让他作通明、大明二殿的“殿主”，他当场赋诗4首以谢，醒来又写了一首长篇的纪梦诗[②]，这件事流传颇广。在南宋，他没有突出作为，只是以太学生身份上书弹劾贾似道误国，被黥配漳州。至元十四年，起为浙西儒学提举。至元二十三年，为程钜夫举荐入京，任尚书左丞，进右丞。权臣桑哥柄政期间，无所作为。桑哥败，于至元二十八年谢病南归，一年后死在家乡。在宋元两代，他的时名都不小，但也都没

① 仅清人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卷九十六，对他有所论列。

② 《癸辛杂识》续集上“叶李纪梦诗”。

有值得一提的政绩。不知为什么，元世祖对叶李相当器重，程钜夫前往江南之前，元世祖就交代必置叶李于辇下。这些南人到大都陛见后，叶李仕至中书右丞，是南人最高职位者。凡有军国大事，元世祖必问："曾与蛮子秀才商量否?""蛮子秀才"，就是指叶李，元世祖甚至曾用自己的五龙车，召见因病足未能上朝的叶李。但从历史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说，叶李实际的影响微不足道。

二月。在集贤待制任上的冯子振因向桑哥献颂诗而受到朝臣攻击，由元世祖出面为他辩解，才未被牵连。

冯子振（1257—?），号海粟，又号怪怪道人。攸州（湖南攸县）人。博洽经史，知识广博，元世祖至元年间仕为承事郎、集贤待制。

桑哥（？—1291），畏兀人，国师胆巴弟子。以语言天赋受到重用，至元后期长期担任枢要之职。主要政绩是清理中书省亏欠库财，钩考诸路钱谷。

至元二十四年二月，用为中书平章政事，至元二十八年正月，受到不忽木弹劾，七月，处死。据《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二十九年二月御史月儿鲁、崔彧上言：冯子振、刘道元指桑哥同列罪恶，并要求追究翰林诸臣在此前为桑哥撰《桑哥辅政碑》①，具体的对象就是阎复。"五月丁未，中书省臣言：'妄人冯子振尝为诗誉桑哥，且涉大言。及桑哥败，即告词臣撰碑引喻失当。国史院编修陈孚发其奸状，乞免所坐遣还家。'帝曰：'词臣何罪？使以誉桑哥为罪，则在廷诸臣谁不誉之？朕亦尝誉之矣。'"② 于是再没有人敢于追究。冯子振是元代前期文坛相当活跃的人物，诗文词曲书画均有时名，文思敏捷，著述颇多。在文学史上更有名的是他与释明本以《梅花百咏》唱和。冯子振与陈孚的关系，如同仇远与方回，是文坛政界不能两立的高标。

福州路出现日全食。上天垂示罕见天象，使人们与亡国产生联想。

诗人陈普《壬辰日蚀》（《石堂集》卷十六）诗云：

忆昔度宗皇帝时，十年十三日食之。似道贝赑湖海曲，天子宫廷耽乐嬉。满朝翕翕皆妇人，祸来朝镜方画眉。北军顺流日食既，两国正尔争雄雌。兴亡岂必皆有数，百年以来士气索。文臣髀肉不识马，武士惊

---

① 《桑哥辅政碑》，即《王公辅政之碑》，是特命翰林制文，从至元二十五年年底撰文，到至元二十六年闰十月，制成《桑哥辅政碑》，树立于中书省前。至元二十八年二月，纠治桑哥之罪，扑《桑哥辅政碑》，下桑哥于狱。至七月，乃诛之。

② 这段对答，《元诗纪事》卷九据《投瓮随笔》作过引录。

魄怕见旗。

但这也说明，宋元兴替这一页已经翻了过去，成为历史往事。

三月十日（壬寅）。御史大夫建议分别从外地任所召回胡祗遹等十人，入京为翰林。

据《元史·世祖本纪》："壬寅。御史大夫月儿鲁等奏：'比监察御史商琥举昔任词垣风宪，时望所属而在外者，如胡祗遹、姚燧、王恽、雷膺、陈天祥、杨恭懿、高凝[1]、程文海、陈俨、赵居信十人，宜召置翰林，备顾问。'帝曰：'朕未深知，俟召至以闻。'"上述胡祗遹等十人，是至元后期的主要文臣。

较早融入江南社会的"北人"鲜于枢，出任两浙转运司经历。

本年，鲜于枢谢事居钱塘之西溪，并营一室名为"困学之斋"。笔记《困学斋杂录》应作于此后不久。他的《湖边曲》是"北人"对西湖生活的观感。

《湖边曲》咏酷使王某逼良为娼偿还欠款一事。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趁办官钱"节）记载道：

> 浙省广济库，岁差杭城殷实户若干名，充役库子，以司出纳。比一家中侵用官钱太多，无可为偿。府判王某，素号残忍，乃拘其妻妾子女于官，又无可为计，则命小舟载之，求食于西湖，以赀纳官。鬼妾鬼马，不肖辈群趋焉。鲜于伯机先生枢作《湖边曲》云："湖边荡桨谁家女，绿惨红愁羞不语。低徊忍泪傍郎船，贪得缠头强歌舞。玉壶美酒不须忧，鱼腹熊蹯弃如土。阳台梦短匆匆去，鸳锁生寒愁日暮。安得义士掷千金，遂令桑濮歌行路。"

显然，鲜于枢在西湖的生涯并不轻松。

张之翰出任松江知府[2]。

张之翰在任颇有政声，兴利除弊，敢作敢为。松江府的所谓荒租十万，

① 高凝，《元史》原文作"高道"，今据中华书局标点本校记改。

② 《西岩集》卷十五《爱菊堂记》："至元壬辰，余由翰林知松江。"

卷。”赵孟𫖯告归吴兴，时在延祐六年。日本保存有四卷本的释英《白云集》，存诗则有150首。

魏初去世。享年六十一岁。

魏初（1232—1292），字太初，号青崖。弘州顺圣（河北阳原）人。祖上仕金，魏初早年好读书，中统元年辟为中书省掾史，兼掌书记，不久，因祖母年老辞官，隐居乡里，教授子弟。后荐授国史院编修官，拜监察御史。在职多有建言，受到元世祖嘉纳。又举劝农副使刘宣自代，出任陕西四川按察司佥事，历陕西河东按察副使。入为治书侍御史，又以侍御史于扬州行南御史台事。升江西按察使。行御史台移建康，以魏初为中丞。卒于官。魏初长于《春秋》之学，为文简约有法，早年受教于元好问。明人著录有魏初《青崖集》十卷（或七册），但亡佚不存。今存《青崖集》五卷，是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辑出。

至元三十年癸巳（1293）

正月十五日。丘悌以《吴公桥记》为吴渭“树碑立传”。

《吴公桥记》[①]中说：“浦阳江水导源深袅，过县南，未可舟。有桥临其上，名之以其方曰‘南桥’。”后来桥为洪水冲决。吴渭字清翁，世居县城以西十二里，是“倜傥不群人也”，总想修桥济人。从至元二十三年开始，到至元二十五年，以个人财力修成一座200多尺的长桥，“人以为利而‘吴公桥’遂名于乡里”。“初，宋咸淳中，公与余纳交钱塘，归而馆余，授其子幼敏学。……后别出，闻公为义不已，乃竟归田园，与江湖树吟社甚适。今幼敏走介邀余重来，则桥成而公已逝矣。悲怆久之。幼敏请记于余，余问：公为此桥，用人之力与钱谷之数几何？幼敏泣且言曰：‘先人为此桥，志于成而已。其初未尝计，终亦口未尝言也。岂惟此桥，凡所营为，往往类是。’”

吴渭是“月泉吟社”的创办人，以“咏春日田园”徵诗之举曾轰动一时，他自己却没有诗篇流传至今，他的儿子吴幼敏也没有。为了这次诗社社集，所费不赀。“吴公桥”也正是如此。可知他的死是在至元二十五年以后，也就是说，在月泉吟社徵诗几年之后，他又建立了吴公桥，桥成便死去了。

① 见《浦江志稿》卷二。转引自《全元文》第22册。

看来他真是不计成本而只求对社会有益的人。

九月。陈孚随梁曾出使安南，经过整一年，终于回到大都，将一行所作诗结为《交州稿》。

这是元诗之中较早出现的纪行诗集。这一年陈孚三十五岁，已经从南到北，又从北到南，将中国纵横穿越几次。

陈孚的三部诗集，《观光稿》是至元二十一年献《大一统赋》入朝为官写于自家乡北上途中的作品。《交州稿》则是此行的产品。刚刚抵达安南，他便说，“老母越南垂白发，病妻燕北倚黄昏”（《江州》）。他的诗与当时江湖诗派末流的制作不同，视野开阔，独抒所感。五言长诗《安南即事》，以纪事体加注本事的写法，等于是一部“安南纪事诗”，对于后人写异域风光时用小注补充内容的做法有实际影响。

十二月。赵文作《长沙死事本末后序》，为十七八年前攻陷长沙之役时的死者（特别是李芾）致哀。

《长沙死事本末》，是长沙陷落的亲历者李元美所写的纪实文学。长沙一役，是元军攻占江南最酷烈的战事之一。李芾之死在当时有争议，而李元美作为李芾之婿，眼见仅仅时过一二十年，已经有人将死节者的事迹视为“臆说”了，写《长沙死事本末》是“为了忘却的纪念”。其实，对李芾之死不应有疑问，崔斌是李芾的对立面——元军主将阿里海涯的先锋，他的《吊李肯斋》诗就是明证。赵文曾受知于李芾，在读了《长沙死事本末》，特意写了这篇文字为其辩白。赵文的《长沙死事本末后序》（《天下同文》卷十三）没有收入《青山集》，颇耐人寻味。

江湖诗人汪济在前往金陵，道经宛水时，寻访先人遗迹——《瑞槐碑》，并写出《得先世瑞槐碑》诗及序[1]。

汪济其人其诗原属于被文学史“忽略”的内容：他是一个典型的江湖游士，元初他仍然坚持凭借前朝的眼光与心境看待社会。

汪济，字济叔，号饭牛翁。江东人。家世业儒，叔父于南宋咸淳中任宣城户曹。入元，汪济长期游吟江湖，本年前往金陵途中，路经宁国路，并访求先人遗迹。所作诗篇结为《饭牛稿》，戴表元《剡源集》卷三十《汪济秀才饭牛稿》诗云:“冰雪玲珑汪太中，吟诗十叶有家风。天寒日暮江东道，逢

① 《得先世瑞槐碑》，见《诗渊》第4259页。

此鞶伸牛口翁。”《饭牛稿》今无传本，佚诗保存在《诗渊》与《永乐大典》中。如同这样的诗人与诗，在至元、大德年间颇流行，除汪济还有陆厚、赵叔英、王炼师以及艾性夫等等，但大多经过岁月删汰，失去了色泽，只有《诗渊》或《永乐大典》中还保存着比较容易“辨认”的“残躯”。

王奕出任玉山县儒学教谕。

王奕，字伯敬，号斗山。玉山（今属江西）人。生于南宋，入元后曾任玉山县儒学教谕。与谢枋得等南宋遗民交往密切，诗文中不乏以遗民自居的文句，所以《宋诗纪事》将他列入书中。清乾隆年间编《四库全书》，因王奕《玉窗如庵记》末署“岁癸巳二月朔，前奉旨特补玉山儒学教谕王奕伯敬谨撰并书”，认为“癸巳为至元三十年，然则奕食元禄久矣，迹其出处，与仇远、白珽相类。”（《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六）改题元人。生平事迹所知很少，有《斗山文集》十二卷，《梅岩杂咏》七卷，都未见传本，仅存《玉斗山人集》（原名《东行斐稿》）三卷。《四库全书》编者云:“其诗稍失之粗，然磊落有气，胜宋季江湖一派。”《元诗选》未收他的诗，词一卷，已辑入《全宋词》。按：王奕，又作王弈。

江湖诗人艾性夫以诗知名于时。

艾性夫与甘泳，都是江西诗派与江湖诗派于元初合流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作品一度相当时兴，但在“四大家”兴起之后，自然被置于诗论家的视野之外。

艾性夫，字天谓，号弧山①。临川（江西抚州）人。与兄艾可叔、艾可翁都有诗名，互为诗友，被称为“抚州三艾”。南宋咸淳间中乡试。宋元易代之际，闭门教书，求学者盈门。入元，为江浙儒学提举，晚年与贯云石友善，曾寓居钱塘。有诗集《剩语》《弧山晚稿》等。以上两书原本已不存，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艾性夫诗二卷，统题为《剩语》。《诗渊》有艾性夫《弧山晚稿》诗 100 多首，多有《四库全书》辑本《剩语》所未载者。明人曹安《谰言长语》提到，在成化五年（1469）见到艾性夫诗集，卷首有贯云石叙。并认为艾性夫“歌行多关世教”，曾引称其中 3 首诗。《四库全书总目》评《剩语》说:“性夫虽讲学之家，而其诗气韵清拔，以妍雅为宗，绝不似宋末有韵之语录。五七言古体笔力排荡，尤为

---

① 弧山，常误作孤山，《弧山晚稿》也常误作《孤山晚稿》。艾性夫之兄号臞山，之弟号蕙山。这是以抚州山峦为别号，与西湖孤山无涉。

擅长。”

艾可叔，字无可，号臞山。临川（今属江西）人。与弟蕙山（艾可翁）、弧山（艾性夫）并称“三艾先生”。度宗咸淳四年（1268）进士，官至御史中丞。入元不仕。

艾可翁，字元宪，号蕙山。艾可叔之弟。以江万里荐入仕，贾似道逐万里，目为党人，遂弃官不复仕。著有《愁吟》，已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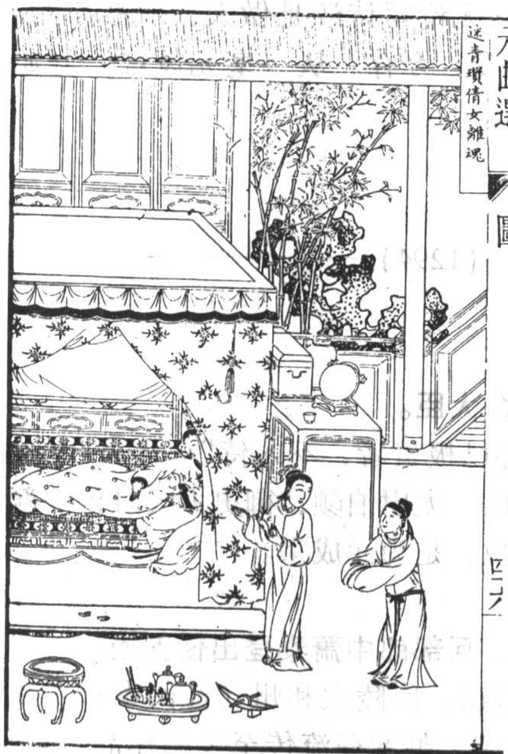
朱晞颜以会“国书”（蒙古族文字），选任平阳州蒙古掾。

其实在元代文坛，会蒙古语的南人并不少见，其中最著名的是虞集，另外例如俞俊，甚至《至正直记》的作者孔齐（孔克齐）也都是，元明善的蒙古语精通到可以随时译介儒家经典。“双语”在当时不只是说蒙古色目人通汉语，只不过极少有人特意指明这一点。

朱晞颜，字景渊。长兴（今属浙江）人。早年笃志于学，士大夫多从之游。家住闹市，在车马熙攘、里巷喧嚣的条件下，仍能终日挟册危坐，对红尘世态从不介意。由平阳州蒙古掾，又仕为长林丞，并在江西瑞州监税。终身屈居下僚，与杨载、揭傒斯、鲜于枢有唱和往还。早年求学时，牟巘称其为“廛隐”；进入官场后，吴澄目为“良吏”。著有《瓢泉集》四卷，不见传本。清乾隆时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朱晞颜诗词文章，重编为《瓢泉吟稿》五卷。为文不失规范，边幅稍狭，但条理清晰，思路周正，牟巘《瓢泉吟稿序》评其诗“读之愈出愈奇，拟古则不失古人作者之意；咏史则能得当时之情。至于他诗，各有思致。”

于此前后，郑光祖在杭州定居。

郑光祖，字德辉。平阳襄陵（山西襄汾）人。以儒补杭州路吏。他的元曲创作一时影响颇大，《录鬼簿》（曹寅刊本）卷下在郑光祖小传中说:“为人方直，不妄与人交，故诸公多鄙之。久则见其情厚，而他人莫之及也。病卒，火葬于西湖之灵芝寺，诸吊送各有诗文。公之所作不待备述，名香天下，声振闺阁，伶伦辈称‘郑老先生’，皆知其为德辉也。惜乎所作贪于俳谐，未免多于斧凿。——此又别论焉。”作杂剧 18 种，今存《放太甲伊尹扶汤》《虎牢关三战吕布》《迷青琐倩女离魂》《㑳梅香骗翰林风月》《辅成王周公摄政》《醉思乡王粲登楼》《丑齐后无盐破连环》，另有《崔怀宝月夜闻筝》仅存残曲。与关汉卿、白朴、马致远，并称为“元曲四大家”。《太和正音谱》评其词“如九天珠玉”，并进一步说:“其词出语不凡，若咳唾落乎九天，临风而生珠玉，诚杰作也。”



《倩女离魂》插图。出自明刊本《元曲选》。



《倩女离魂》插图。出自明刊本《顾曲斋元人杂剧选》。

俞德邻去世。享年六十二岁。

俞德邻（1232—1293），字宗大，号大玉山人。祖籍永嘉平阳（今属浙江），徙丹徒（江苏镇江）。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浙江转运司解试第一，南宋亡国之际，写长诗《京口遣怀一百韵》，与汪元量《湖州歌》被并称为“诗史”。入元，累受辟荐，皆不应。因性刚狷，以其居室名为“佩韦斋”。卒，遗著由其子俞庸辑为《佩韦斋文集》十六卷（诗七卷、文九卷），皇庆元年刊行。另有《佩韦斋辑闻》四卷。

刘因去世。享年四十五岁。

刘因（1249—1293），字梦吉，原名刘骃，字梦骥。保定容城（今属河北）人。早年丧父，家虽贫，不妄接交，在乡里授徒度日。爱诸葛亮“静以修身”之语，题居室为“静修”。由不忽木举荐于朝，至元十九年擢承德郎、右赞善大夫，以母病辞归。至元二十八年又再次徵召，仍不受职。延祐年间追封容城郡公，谥文靖。有诗文集《静修集》，今存二十二卷本、二十八卷本（或著录为三十卷）、十二卷本等。诗文受元好问影响，文章通畅明白，长于叙事，但成就不如诗。他并非南宋臣民，元世祖攻宋时，他写下《渡江

赋》，力陈宋不可伐。有《和陶诗》一卷，无论写诗还是做人，他都视陶渊明为楷模。另有《四书集义精要》二十八卷，今存。从《皇元风雅》开始，元诗选本即以刘因作为元诗第一家。

至元三十一年甲午（1294）

正月。不忽木在元世祖病重时成为顾命大臣。

世祖病重。按惯例，“非国人元勋子孙已极贵者，不入侍”。连宰相完泽要晋见，都受阻于宫门。不忽木和开国功臣、太尉伯颜，御史大夫月鲁那颜，三人留侍禁中，同受遗诏，立皇太孙继帝位，是为元成宗。

四月。元成宗即位，遣礼部郎中李衎、兵部郎中萧泰登出使安南。

萧泰登（1266—1303），字则平，号方厓。庐陵太和州（江西泰和）人。授永丰县丞，迁湖南提学副使，擢广东佥宪。萧泰登流传至今的作品，都与出使安南有关，就如同此后的聂古柏。历江西儒学提举、广西佥宪，大德七年拜南台御史，是年卒。元代前期频繁出使安南，与之有关的作品也屡见不鲜。

六月。元廷将羁押达十九年的原南宋使臣家铉翁召回大都，赐号处士，放其“自便”。

家铉翁离京南还时，在大都的江南籍人士（包括出游者、出仕者以及宋亡谪居者）纷纷以诗文送行，成为当年的一件大事。

家铉翁（1213—?），号则堂。眉山（今属四川）人。学问赅博，尤邃于《春秋》，累官端明殿学士，佥枢密院事。元军军次临安近郊，丞相檄告天下守令，以城降，家铉翁独不副署。派往元军中代表南宋议事，被拘押不放还。宋亡，元廷欲官之而不受。将其软禁长达 19 年。关于软禁地点，《元史·成宗本纪》说是“安置河间”；《宋史》卷四二一本传云：“改馆河间，乃以《春秋》教授弟子。”林景熙《闻家则堂大参归自北寄呈》诗序则说：国亡，家铉翁守志不仕，“贬河中府十九载，至元三十一年甲午召还，放自便，乃归江南。时年八十有二矣。”河间府，元属于中书省，《宋史》《元史》都提到河间，河间旧志也有家铉翁的形迹作品，宋亡之后他无疑在河间居住过。

据黄溍说，在家铉翁流放河间期间，南宋遗民孙潼发“数致书候安否”①。河中府，元代有两处，一在今山西西南部，属中书省管辖；另一则是中亚河中府——寻思干城，耶律楚材、丘处机曾在此唱和。河中府，林景熙所说的不大可能是指中书省的河中府。林景熙诗中写道：“濒死孤臣雪满颠，冰毡啮尽偶生全。衣冠万里风尘老，名节千年日月悬。”将家铉翁比做为匈奴长期拘押在西域的苏武。而家铉翁《题中州诗集后》② 明言：“余尝有见于此，自燕徙而河间，稍得与儒冠缙绅游。”这等于说从大都到河间，反而是回归“文明”。将家铉翁安置河间是众所周知，可这就与林景熙的感慨颇有距离。家铉翁有《则堂集》六卷，是清乾隆时从《永乐大典》辑出。他的《假馆诗》其中有“五迁来到诗书宅”之句，并说：“拟从诸君预乞石一方，他年埋之冢前三四尺。上书宋使姓某其名某，下书人是西州之西老逢掖。”另一首长题诗提及“西州旧俗”③ 如何。这些蛛丝马迹也似乎表明除河间他曾在中亚河中居住。

元成宗即位，家铉翁得以还乡时，已八十二岁，南宋亡国是一代人之前的事。当时正在大都观光的径山僧释英（字实存，号白云）有为其送行的七言律诗：“故国衣冠已变迁，灵光此际独依然。一身幽蓟三千里，两鬓风霜十九年。归去午桥非旧日，梦飞秋塞隔遥天。江南遗老如公少，青史名高万古传。”④ 回到江南，旧友孙潼发徒步前去看望家铉翁，两人“握手道旧故，辄相对唏嘘泣下”。

拘禁中，他写过一首诗《寄江南故人》：“曾向钱塘住，闻鹃忆故乡。不知今夕梦，到蜀到钱塘。”这首诗因收入《天地间集》广为人知。南还时，他拒绝了朝廷赠送的金帛，带着从江南就跟随他的小妾奚奴离京。他出任南宋参政时，娶了一个只会温酒别无他能的小妾，名叫奚奴。奚奴一直在家铉翁身边数十年，从江南到大都，再从大都返回江南。只要是温酒，从未让家铉翁不满意，而身在流放中，温酒的意蕴深不可测。家铉翁死后，一切家产都归她所有，成为巨富，人称“奚娘子”⑤。

---

① 黄溍《盘峰先生墓表》，见《黄金华集》卷三十。

② 《元文类》卷三十八。虞集《飞霞楼记》（《常郡八邑艺文志》卷二）则说：“昔宋垂亡，枢密家公铉翁以祈请使北，见世祖皇帝，请存社稷。世祖留于河间。”

③ 这里的“西州”颇费解。扬州刺史治所曾名为西州城，今地在江苏江宁西。但家铉翁与此了无关涉。唐有伊州、西州。如果从这个角度说，西州之西，倒是可能借指中亚河中府。

④ 《白云集》卷三。

⑤ 见《南村辍耕录》卷七“奚奴温酒”节。

十月。高克恭在吴山之巅观赏了月下景致，为友人李公略画《夜山图》[1]。陆续为《夜山图》题跋诗文的有三十人。

徐琰《夜山图跋》云：

> 彦敬郎中读书穷理外，留心绘事，所谓"吴装山水"者尤为得意焉。左右司秩满之后，闲居武林，不求仕宦，日从事于画，心愈好而技愈进，虽专门名家有弗逮也。行省照磨李君公略性冲淡，乐山水，寓居吴山之巅，向开小阁，俯瞰钱塘江与浙东诸山历历可数，如案几间物。彦敬每相过，未尝不留连徙倚以展清眺。公略谓夜起登此阁，月下看山，尤绝殊胜。彦敬闻之跃跃以喜，遂援笔而为是图。公略持以示余，且请著语。因赋《钱塘夜山图歌》一篇，书之左方，聊为道其梗概云。

除高克恭自己，为《夜山图》题跋诗文的有赵孟頫等人，不但人数众多，而且尽是知名文人。时间从至元末年到至正初，延续了五十多年。与为高克恭《山村图》题跋，同属元代"同题集咏"（为书画题跋）规模较大、影响较广、诗文成就较高的一次。

陕西行省参知政事程鹏举，在兴元尼庵中找到了分别三十年的妻子。这件事成了明清小说、戏曲的母题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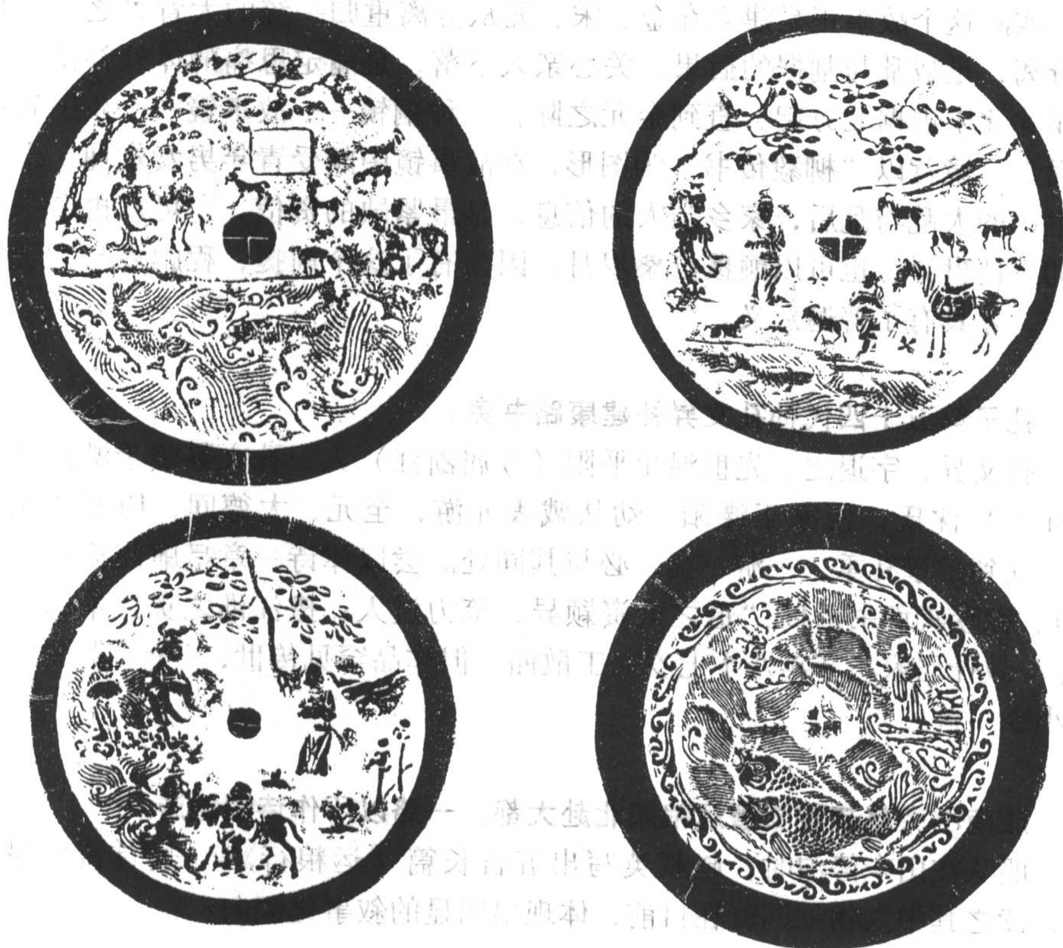
在《南村辍耕录》《尧山堂外纪》等文献中，记载有这段本事。《南村辍耕录》（卷四"贤妻致贵"节）在先，特引以为证：

> 程公鹏举，在宋季被掳，于兴元板桥张万户家为奴。张以掳到宦家女某妻之。既婚之三日，即窃谓其夫曰："观君之才貌，非久在人后者。何不为去计，而甘心于此乎？"夫疑其试己也，诉于张。张命箠之。越三日，复告曰："君若去，必可成大器。否则终为人奴耳。"夫愈疑之。又诉于张，张命出之，遂鬻于市人家。妻临行，以所穿绣鞋一易程一履，泣而曰："期执此相见矣。"程感悟，奔归宋。时年十七八，以荫补入官。迨国朝统一海宇，程为陕西行省参知政事。自与妻别已三十余年，义其为人，未尝再娶。至是，遣人携向之鞋履，往兴元访求之。市家云："此妇到吾家，持作甚勤，遇夜未尝解衣以寝，每纺绩达旦，毅然莫可犯。

---

① 高克恭《夜山图》未流传至今，由元人吴福生辑录的题跋，被整卷录入于明人赵琦美《铁网珊瑚》卷十三。《武林掌故丛编》二十二集有《夜山图题咏》一卷。内容与《铁网珊瑚》略有差异。

吾妻异之，视如己女，将半载，以所成布匹偿元鬻镪物，乞身为尼，吾妻施赀以成其志。见居城南某庵中。”所遣人即往寻。见，以曝衣为由，故遗鞋履在地。尼见之，询其所从来。曰：“吾主翁程参政使寻其偶耳。”尼出鞋履示之，合。亟拜曰：“主母也。”尼曰：“鞋履复全，吾之愿毕矣。归见程相公与夫人，为道致意。”竟不再出。告以参政未尝娶妻，终不出。旋报程，移文本省，遣使檄兴元路，路官为具礼，委幕属李克复防护其车舆至陕西。重为夫妇焉。



上图是“柳毅传书”铜镜画面最生动的一种。下图，出自内蒙古额济纳黑城（“喀喇浩特”）附近的古道。

金元时期的“故事镜”。以“柳毅传书”为主题的铜镜，至少有四种模式。

这个故事本身就具有传奇性，并蕴含丰富的感情色彩。除《南村辍耕录》，又见于《尧山堂外纪》《情史》等书以及《古今图书集成》。与《南村辍耕录》不同，《情史》等显然有另外的来源，一个区别就是，程鹏举被称为“彭城程万里，尚书程文业之子”；另一个是，其妻“统制白忠之女也，

名玉娘”。而且多了许多细节，比如程逃归江南，正值宋度宗方立[①]。这个故事原本是正史之外的“野史”，却又还归史册，收入《元书》卷九十四、《新元史》卷二四四、《元史类编》卷四十。它成了小说、戏曲极好的素材，冯梦龙将其题作《白玉娘忍苦成夫》，敷演为话本小说，编入《醒世恒言》卷十九。而《情史》卷二《程万里》，是此前这一故事细节最充实的文本，《情史》也成书于冯梦龙之手。明人陆采在嘉靖中，据其写作了传奇剧《分鞋记》，沈鲸则写有《易鞋记》[②]。

实际这个故事正是建立在金、宋、元从分离重归一统的大背景之上。骨肉分离，是战乱与割据的后果，关心亲人下落，是痛定思痛的体外补偿。从金驱除北宋占据北方起，直到金元之际，一种铜镜——故事镜——在民间不胫而走，镜背以“柳毅传书”为图形，在故事镜中颇受青年男女欢迎。十二三世纪的大乱与乱后，家乡亲人的信息，是最紧缺的资信。它可以再造一个人的感情世界，也可以颠覆沧桑岁月。因为有了这个前提，程鹏举与妻子的离合，才具有了普遍意义。

孔子第五十四代孙孔文昇补建康路书吏。

孔文昇，字退之。先世温州平阳（今属浙江）人，孔文昇赘于溧阳（今属江苏）沈氏，便家于溧阳。幼从戴表元游，至元、大德间，历浙西宪司掾。受到卢挚礼重，一游一宴，必与其同处。尝以律诗一章呈廉使徐琰（容斋），徐琰喜而书后曰:“退之天资颖异，笔力过人；擅江淮之英，本邹鲁之气。”致仕居家，卒年八十七岁。工散曲，但作品罕见传世，《全元散曲》有其小令一首。

江南小吏赵叔英随漕运粮船北赴大都，一路以所作诗词纪游。

船队在山东停泊时，赵叔英写出五言长篇《运粮行》[③]。这首诗实录见闻，读之其中人物如同就在目前，体现出明显的叙事化倾向。

去冬调漕卒，十月至胶右。编户有路平，齿迫期颐寿。龙钟双泪垂，殷勤酌予酒。举觞诉所怀，我苦君知否。今秋陷官粮，征督被捶杻。将

---

① 除了这个“度宗方立”的时间定位，又加上两人分别“已三十余年”，暂推定程鹏举出任陕西行省参政在至元三十一年前后。

② 据记载，明人董应翰也作有《易鞋记》。但流传至今的只有沈鲸《易鞋记》（见《古本戏曲丛刊初集》）。

③ 见《诗渊》第126页。赵叔英与其诗尚不能准确系年。暂附于此。

解子孙危，罄悬无所有。周思百计穷，拆屋卖田亩。才塞县衙责，役丁随见取。岁晏趋严程，何以装备糗。男女相视啼，聚谋举家走。彷徨无奈何，中心恸焚炙。向儿哀恳留，吾老岂能久。狐死犹首丘，忍弃坟垄旧。缓我藏土中，任尔逋岩薮。余闻长太息，沉思但低首。吁嗟绊冗职，时命亦不偶。何人积此弊，使我罹其咎。历观所部民，十中贫八九。黠者窜远荒，来者见忠厚。牛马皮骨存，黾勉尚驰负。细推疲瘵因，事理岂为苟。海漕三百万，与昔数非丑。物力耗于初，运数而限趣。侥幸因此生，刑辟日纷纠。且救眼前急，不虞身后疚。因而贪墨者，乘机肆渔狈。民瘼耸天听，漕政择良守。疾势已膏肓，须烦起死手。久旱渴云霓，新政仰星斗。弦急必更张，行当掣时肘。切虑少因循，苍生遂刍狗。虽有智者谋，不能善其后。王良古善御，驱策戒顿陡。调良性与力，至远而深鞣。不强人所难，治迹自可就。皋夔居庙廊，至言悉听受。启沃信非遥，下情通冕黈。精诚感天地，矧遇圣神后。民命庶少苏，天爵亦阴受。万家获义安，德勋传不朽。故书运粮行，非图会人口。

赵叔英，号松亭。生平字里均不详。除《诗渊》《永乐大典》之外，元诗文献从未见其人其诗。《诗渊》与《永乐大典》录有赵叔英《松亭诗集》诗 47 首，此外还有几阕词。据所作诗词，他是下层官吏，长期任职山右、河东等地，曾在六年间“久滞龙沙”（《寄诸乡友》）。在大都写的《京师寓居》[①] 诗云:“粝食不适口，僦屋仅伸肘。无术动三公，赋归希五柳。”是早期来到北方的南人的典型感受。值得注意的是，赵叔英写有不少咏物诗，与旧题谢宗可的《咏物诗》赋咏题目有重叠，然而所写不是七言律诗，却是七言绝句。

赵必瑑去世。享年五十岁。

赵必瑑（1245—1294），字玉渊，号秋晓。宋朝宗室、太宗十世孙，居于东莞（今属广东）。咸淳元年（1265）与其父同登进士，初任高要卫，摄四会令，再任南康丞，文天祥开府惠州，辟为摄州军事判官。入元后，隐居于温塘村，足迹不入市廛。有《覆瓿集》五卷，今存。

去世于至元年间的诗文家有萧立之、方逢振、顾逢、于石等人。

萧立之（1203—?），一名立等，字斯立，号冰崖。宁都（今属江西）

① 见《诗渊》第 3501 页。

人。淳祐十年（1250）进士，知南城县，历南昌推官、辰州判。宋亡，阖门归隐。今存《萧冰崖诗集拾遗》三卷。其子萧士赟编著有《李太白诗集注》。

方逢振，字君玉，号可斋。淳安（今属浙江）人。方逢辰之弟。南宋景定三年（1262）进士，历太府寺簿，宋亡，还归故里。元初起为淮西宪佥，不赴，讲学于石峡书院，学者称为“山房先生”。有《山房遗文》一卷、《山房外集》一卷，均附于方逢辰《蛟峰集》以行。

顾逢，字君际，号梅山。吴郡（江苏苏州）人。南宋末，举进士不第，宋元之际隐于杭州，以卖诗文为生。入元，辟为吴县儒学教谕。卒年七十四岁。工诗，人称“顾五言”，自署居室为“五字田家”，意指以替人作诗——卖诗（特别是五言诗）为谋生手段。在元初文坛比较活跃，与陈泷（号碧涧）、汤益（号西楼）、高常（号竹鹤），同学诗于周弼，里人以癯鹤、高楼、梅清、涧幽，“为四诗之趣”。同郡人陈永辑四人诗为一编，题作《苏台四妙集》，但未见传世。有《梅山集》十卷，已佚，《诗渊》等总集尚录存其诗数百首。

于石（1247—?），字介翁，号紫岩，晚号两溪。兰溪（今属浙江）人。宋亡，隐居不仕，生前辑刊诗文七卷，卒后散失，门人吴师道选录成《紫岩诗选》三卷。





【元成宗】



建元：元贞（二年）、大德（十一年）



元贞元年乙未（1295）

元旦。本日是改元元贞的第一天，张之翰作《和改元韵》。

当时，张之翰正在松江知府任上。《和改元韵》（《西岩集》卷九）诗云："隔年一雨不曾晴，要洗妖氛四海清。古有三元今又异，元朝元日改元贞。"《西岩集》中，类似题为"元旦""元夕"的诗篇颇多，是"以诗纪历"之意。

揭傒斯出游湘汉间，以文才受知于当时。

黄溍《揭文安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三十三）之中说，揭傒斯"年二十余，稍出游湘汉间"。湘汉与湖湘，都是指两湖（湖北湖南）。这个期间，程钜夫、卢挚先后出任湖北宪使，见到揭傒斯，程钜夫大奇其才，妻以表妹。湖南儒学教授赵淇曾以"他日翰苑名流也"相期许。出游湖湘时期，他初显才华，并引起文坛注意。一个著名的传说是：揭傒斯际遇湖湘仙女，由此而萌生，并对此后的小说、戏曲产生了影响。

揭傒斯出游湖湘时期的故事，曾流传在文人之间①：

揭曼硕先生未达时，多游湖湘间。一日，泊舟江涘，夜二鼓，揽衣

① 《南村辍耕录》卷四"奇遇"节。

露坐，仰视明月如昼，忽中流一棹，渐逼舟侧，中有素妆女子，敛衽而起，容仪甚清雅。先生问曰:“汝何人?”答曰:“妾商妇也，良人久不归，闻君远来，故相迓耳。”因与谈论，皆世外恍惚事。且云:“妾与君有夙缘，非同人间之淫奔者，幸勿见却。”先生深异之，迨晓，恋恋不忍去。临别，谓先生曰:“君大富贵人也，亦宜自重。”因留诗曰:“盘塘江上是奴家，郎若闲时来吃茶。黄土作墙茅盖屋，庭前一树紫荆花。”明日，舟阻风，上岸沽酒，问其地，即盘塘镇。行数步，见一水仙祠，墙垣皆黄土，中庭紫荆芬然。及登殿，所设像与夜中女子无异。

这则传说是揭傒斯的侄孙揭立礼告诉陶宗仪，再由陶宗仪写进《南村辍耕录》而流传开来。它与蒲松龄《聊斋志异》名篇《王桂庵》的承继关系是另一个题目，然而，《王桂庵》（以及它的续编《寄生》、评剧《花为媒》等小说戏剧）与它确实是太相像了，连那首诗都出现在蒲松龄的笔下，只是“庭前一树紫荆花”变为“门前一树马缨花”。这首诗，《聊斋志异》的注释者认为是虞集所作的《水仙神》，但这却是元人张雨的《湖州竹枝词》。张雨和揭傒斯有直接交往。当然，也不排除这本是一首民歌，由张雨略作改动，冠以《湖州竹枝词》之目，或者张雨竟是从揭傒斯口中听说了这个故事，而将其写入自己的诗中[1]。不管怎么说，这个故事打动人心的，是一个诗人对未知世界的企盼，是一个不甘于寂寞的青年对生活的憧憬。“元诗四大家”本是元代文学的主流群体，位居清显，名在史传。关于他们的事迹还没有比这更生动感人的。

三月。京师地震，御史滕安上上疏说“君失其道，责见于天”。

对于刚出任监察御史的滕安上的奏疏，有关部门不予上呈。滕安上便称病辞官。不久起为国子司业，未就职便去世了。享年五十四岁。

滕安上（1242—1295），字仲礼，号退斋。中山安喜（河北定县）人。元初以荐授中山府教授，迁禹城主簿，入为国子博士，升国子监丞，历太常院丞，元贞元年任监察御史。追谥文穆。滕安上为人束修自好，敏悟笃行，而博通经学。著《东庵类稿》十五卷，久无传本。清乾隆时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滕安上诗，重编为《东庵集》四卷。姚燧曾说滕安上“为文一本理义，辞旨畅达，不为险谲，非有裨世教者不言”（《牧庵集》卷

[1] 明人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二，有《水仙诗考》，是特意为这首诗作的考证。足见这个故事在民间的流传广泛持久。

二十六)。有《易解》《洗心管见》等著述，均未见传。

艺妓张怡云居住在京师海子之上，她的家成为文人沙龙，而且出入者档次颇高。

大都海子本是文人游赏之处所，张怡云的家则成了海子的“新人文景观”。赵孟頫、商衢、高克恭曾为张怡云的小像题赞，姚燧、阎复、卢挚等是她家的常客[1]，连词人张埜也特为其撰写歌词。这样的场所与场合，是元曲写作与鉴赏的推动力。

《青楼集》说：

> 张怡云能诗词，善谈笑，艺绝流辈，名重京师。赵松雪、商正叔、高房山，皆写《怡云图》以赠，诸公题诗殆遍。姚牧庵、阎静轩，每于其家小酌。一日，过钟楼街，遇史中丞，中丞下道笑而问曰：“二先生所往，可容侍行否?”姚云：“中丞上马。”史于是屏趋从，速其归携酒馔，因与造海子上之居。姚与阎呼曰：“怡云今日有佳客，此乃中丞史公子也！我辈当为尔作主人。”张便取酒，先寿史，且歌“云间贵公子，玉骨秀横秋”〔水调歌〕一阕。史甚喜。有顷，酒馔至，史取银二锭酬歌。席终，左右欲撤酒器——皆金玉者，史云：“休将去，留待二先生来此受用。”其赏音有如此者。又尝佐贵人樽俎，姚、阎二公在焉。姚偶言“暮秋时”三字，阎曰：“怡云续而歌之。”张应声作〔小妇孩儿〕，且歌且续曰：“暮秋时，菊残犹有傲霜枝，西风了却黄花事。”贵人曰：“且止。”遂不成章。张之才亦敏矣。

张埜《古山乐府》卷下，有“赠歌者怡云，和卢处道韵”的〔南乡子〕词。下片写道：“一笑为谁容，只许幽人出处同。却恐等闲为雨后，东风，吹过巫山第几峰。”

曾瑞作〔般涉调·哨遍〕《羊诉冤》套曲。

〔般涉调·哨遍〕《羊诉冤》借原生长于北方草原的羊之口，诉说了北人南来的窘况。在这一时期的元人散曲，一般都表现出“叙事化”的倾向，与诗文颇一致。除《羊诉冤》，还有《高祖还乡》《庄家不识勾栏》《借马》

---

[1] 据袁桷《阎公神道碑》，元成宗即位，召阎复为集贤学士，改翰林学士。而姚燧在至元二十四年至大德五年间，在朝中任职。故暂系此事于本年。

《远归》等等，《羊诉冤》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借动物之口针砭世事人情，在散曲中成为一个“门类”，除曾瑞《羊诉冤》，还有姚守中〔中吕·粉蝶儿〕《牛诉冤》、刘时中〔双调·新水令〕《代马诉冤》等。

胡祗遹去世。享年六十九岁。

胡祗遹（1227—1295）[①]，字绍开，号紫山。磁州武安（今属河北）人。早年好学，见知于名流。中统初，张文谦宣抚大名，任为员外郎。至元元年授应奉翰林文字，不久兼太常博士。权臣阿合马持国政，胡祗遹因建言忤其意，出为太原路治中。改河东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江南平，任荆湖北道宣慰副使。至元十九年任济宁路总管，上书建言八事，如役重、逃户、贫难等，受到世祖肯定，并以他的建议作为定法。升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使。召拜翰林学士，未赴职，改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不久因疾辞归，卒，谥文靖。胡祗遹历仕各地，所至以干练明察著闻。与王恽、侯克中、刘敏中交往密切，

在文坛影响颇大。有《紫山大全集》六十七卷，已佚。清乾隆时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辑出《紫山大全集》，重编为二十六卷。胡祗遹以曲家知名，列名于《录鬼簿》的“前辈名公”节，《太和正音谱》评其词“如秋潭孤月”。

胡祗遹是元前期与元曲表演、创制关系密切的人物，同时与元曲艺人交往广泛。他曾为著名艺妓朱帘秀作《朱氏诗卷序》，《黄氏诗卷序》《优伶赵文益诗序》也都是为元曲艺人所作。特别是《黄氏诗卷序》（《紫山大全集》卷八），对元曲演唱者的修养气质有生动描述：

> 女乐之百伎，惟唱说焉。一、资质浓粹，光彩动人。二、举止闲雅，无尘俗态。三、心思聪慧，洞达事物之情状。四、语言辨利，字真句明。五、歌喉清和圆转，累累然如贯珠。六、分付顾盼，使人人解悟。七、一唱一说，轻重疾徐，中节和度，虽记诵闲熟，非如老僧之诵经。八、发明古人喜怒哀乐、忧悲愉佚、言行功业，使观听者如在目前，谛听忘倦，惟恐不得闻。九、温故知新，关键词藻，时出新奇，使人不能测度、为之限量。九美既具，当独步同流。近世优于此者，李心心、赵真、秦玉莲，今黄氏始追踪前学，可喜可喜。持卷轴乞言，故论之如此。仍以七言四句歌之：“沥沥泠泠万斛珠，清和圆滑啭莺雏。阿娇生在开元日，

---

① 《元史》本传说他卒于至元三十年。他的表字，《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应作绍闻，《录鬼簿》（曹寅刊本）则在胡祗遹名下，注表字少凯。

未信传呼到念奴。”

胡祇遹虽未明言此黄氏的名字，但其中提到的李心心，则见于《青楼集》，说是“国初京师之小唱”，“擅一时之妙”。黄氏应与她大致相同，也是前期活动在大都的艺人。

以大都为中心的北方戏曲家，组成“元贞书会”。

“元贞书会”参与者，有马致远、李时中、花李郎、红字李二等人，参与者包括曲家、艺人等。

天一阁本《录鬼簿》中，贾仲明为李时中补写的〔凌波仙〕吊曲开篇即说:“元贞书会李时中、马致远、花李郎、红字公，四高贤合捻《黄粱梦》。”“四贤”中，李时中与马致远都是官员，花李郎与红字公（红字李二）则是比较典型的艺人。“书会”、“书会才人”等，成为元曲创作的推动力量。李时中，《录鬼簿》说是“大都人，中书省掾，除工部主事”。如同《黄粱梦》这样的四折杂剧，由四人一人撰写一折的做法，在元代曲坛是比较特殊的例外，这想必与“元贞书会”的创立有关。

道惠赴大都朝觐，称旨，赐号“通慧禅师”。

释道惠，字性空。庐山东林寺僧，活动在元代前期，与宋代遗民如汪元量及文坛名流冯子振、程钜夫、滕宾、吴澄、贯云石、卢挚等皆有往还。贯云石游庐山时曾与其唱和，并同游九华山。道惠比较关心社会现实，并且有正义感。他的诗以“唐体”为标榜，受晚唐诗影响明显。诗集名为《庐山外集》，是前期较重要的僧诗别集。

谢翱盼望友人邓牧而不得见，吟诗而逝。享年四十七岁。

谢翱因想念友人邓牧,轻吟“谢豹花开桑叶齐,戴胜芊生草药肥,九锁山人归未归”,咏绝而逝。由方凤、吴思齐等安葬于杭州钓台之南,以文稿相殉。

元贞二年丙申（1296）

元旦。张之翰又作《丙申元旦》诗。

不久张之翰就卒于任所。这首诗成了他的绝笔。《丙申元旦》（《西岩集》

卷八）诗中说“碌碌虽无治郡才，新正有诗也须裁”；“从今尽有东风便，为问归舟几日开”，显然急切想归隐。

四月八日“浴佛日”。管道昇画《紫竹庵图》，并题诗。

赵孟頫的夫人管道昇，以画竹知名。此画完成之后，管道昇两次为之题跋：“元贞二年，岁在丙申。浴佛日作。仲姬管道昇。”“色即空之对，林深竹数层。年来浴吾佛，捉笔为□□。道昇重题。”并邀柯贞白[1]题诗其上。是年管道昇三十五岁。

除管道昇、柯贞白，此后在流传过程中，又有五位女性共同为之题诗，即：曹妙清、释妙空（尼）、释了凡（尼）、赵鸾、梁园秀。曹妙清等的题诗，要晚于元贞二年。七位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女子为《紫竹庵图》题咏，是元代文学中惟一的纯属女子的“同题集咏”。

方回与牟巘都已七十岁。庆贺年届七十古稀期间，方回与仇远以诗文成隙，几乎酿成大祸。

这是元世祖之后（武力征服之后）江南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影响颇大的事件，对于解读已经安于新秩序的杭州文人心态颇有典型意义。

据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上“方回”），事件经过大致是：方回与牟巘同庚，本年两人同时作七十整寿。收到的祝寿诗颇多，其中仇远诗有“老尚留樊素，贫休比范丹”之句，犯了方回的忌讳，因为方回此前曾以范丹自喻其穷困，而“老尚留樊素”正是方回为人所诟病的隐私。方回又从仇远的寿诗中找出了“姓名不入六臣传，容貌堪传九老碑”之句，“于是方大怒”，以为仇远是“褒牟而贬己，遂摭‘六臣’之语，以此比今上为朱温，必欲告官杀之。诸友皆为谢过，不从”。时论在仇远一边，但官府显然离方回更近。仇远将此事告诉了寄居杭州的“北客”——盲诗人、元曲家侯克中，请他帮忙化解。见到方回，侯克中说：“仇亦止言‘六臣’，未尝云比上于朱温也。今比上为朱温者，执事也。告之官，则执事反得大罪矣。”方回想到这种可能（反坐首告），颜色大变。于是侯克中要来仇远诗的原稿，当场撕成碎片。这件事就此了结。这个记载出自周密手笔，他是同时人，而且涉及的是当时

[1] 柯贞白，元人传记资料无其人。但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七，在评论元代女书法家时，依次列出：管夫人（管道昇）、刘氏、曹氏（曹妙清）、柯氏。所谓柯氏，是柯九思之女；《书史会要补遗》又有赵夫人（赵鸾）、刘氏（梁园秀）。与参加题咏《紫竹庵图》的女子除两位尼姑完全吻合，显然她们在书法史上常相提并论。所以，这里的柯贞白，应该就是柯九思的女儿。

杭州文坛最有影响的人物，其真实性应该不成问题，尽管《癸辛杂识》对方回人品极力丑化。实际仇远、方回，以致牟巘，都成名于南宋，对南宋的罗织文字而成狱的惯例，记忆犹深。这样的“把柄”，竟使仇远那样的人物乱了方寸，而“北客”一句话，就将其化解于萌生阶段。与十几年前的梁栋“大茅山”诗案相比，它们都是发动于与南宋渊源颇深的文人，化解于“北人”或朝廷，其中的南北心理差别，都立足于各自的文化背景之上。

《癸辛杂识》中，极力渲染方回人品之低下。除了这件事，还写了方回种种贪财好色的行径，如见妓下跪、方回“十一可斩”之说等等。这与方回以严州降元并无直接关系。在当时，方回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元贞、大德年间，是北方杂剧的黄金年代，曲家辈出，影响广泛。钟嗣成对此的经典评价是“一时人物出元贞”。

见于《录鬼簿》的活跃于这一时期的曲家，除马致远等“元贞书会”中人，还有：

赵明道，大都（北京市）人。钟嗣成为其写的〔凌波仙〕云:“钟公鬼簿应清朝，范蠡归湖手段高。元贞年里，升平乐章歌汝曹。喜丰登，雨顺风调。茶坊中嗑，勾肆里嘲。明明德，道泰歌谣。”据《录鬼簿》著录，赵明道作杂剧两种《牡丹亭》《范蠡归湖》，均仅存佚曲。《太和正音谱》列名于俱是杰作一百五十人中，称其词“如太华晴云”。

赵公辅，平阳（山西临汾）人。曾任平阳儒学提举。钟嗣成为其写的〔凌波仙〕云:“儒学提举任平阳，公辅先生天水郎，元贞大德乾元象。宏文开，寰世广，阑玉京，燕赵坛场。寻新句，摘旧章，按谱依腔。”据《录鬼簿》，赵公辅著杂剧两种《东山高卧》《倩女离魂》，均未流传至今。

赵子祥，生平里贯不详①。钟嗣成为其写的〔凌波仙〕有云:“一时人物出元贞，击壤讴歌贺太平，传奇乐府时新令。”据《录鬼簿》，赵子祥作有杂剧三种《害夫人》《石守信》《崔和檐生》，今均不存。《太和正音谱》评其词如“马嘶芳草”。

狄君厚，平阳（山西临汾）人。钟嗣成为其写的〔凌波仙〕云:“元贞大德秀华夷，至大皇庆锦社稷，延祐至治承平世。养人才，编传奇，一时气候云集。有平阳狄君厚，捻火烧介子推，只落得，三尺何堆。”《录鬼簿》著录有杂剧一种《介子推》（全名《晋文公火烧介子推》），今存。《太和正音谱》

---

① 据孙楷第《元曲家考略》考证，赵子祥，名为赵熊，安徽宣城人。但《录鬼簿》将赵子祥作为前期曲家，其年辈与赵熊不一致。暂未从其说，待考。

列名于俱是杰作一百五十人中，狄君厚是元贞、大德曲家中较年轻的一人，钟嗣成以其为衔接至大、皇庆的人才。

顾仲清，东平（今属山东）人。曾任清泉场司令。钟嗣成为其写的〔凌波仙〕云:“唐虞之世庆元贞，高士东平顾仲清，泉场掌印为司令。”所作杂剧，《录鬼簿》著录有《火烧纪信》《陵母伏剑》，均不存。《太和正音谱》评其词如“雕鹗冲霄”。

张国宾，一作张国宝，大都（北京市）人。曾任喜时营教坊勾管。钟嗣成为其写的〔凌波仙〕云:“教坊总管喜时丰，斗米三钱大德中，饱食终日心无用。”《录鬼簿》著录有杂剧四种《七里滩》《高祖还乡》《汗衫记》《衣锦还乡》，今存《汗衫记》（全名《相国寺公孙汗衫记》）、《衣锦还乡》（全名《薛仁贵衣锦还乡》）两种。

玄教道士陈义高随晋王甘麻剌出塞，前往高昌。

陈义高曾入晋王府邸，并随晋王甘麻剌领降兵入京朝觐。在西域写《过交河作》诗，这是唐代边塞诗人骆宾王、岑参、李颀之后，五百年来仅有的回应。《过交河作》诗云:“黄昏饮马伴交河，吟著唐人出塞歌。后四百年来到此，夕阳衰草意如何。”

盲人文学家侯克中活动在江南。

侯克中，字正卿，号艮斋。真定（河北正定）人。《录鬼簿》列名于“前辈名公”节，《太和正音谱》列名于俱是杰作一百五十人中。侯克中曾寓居汴梁，元世祖至元年间，徙居浙中。自幼双目失明，靠听别人朗诵书籍，以耳代目，完成了学业。他精习《易经》，并著《大易通义》，原书虽然未见传本，但袁桷为《大易通义》写的序还保存在《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一。他与白朴是总角之交，成年后致力于写诗与散曲。去世时已达九十多岁高龄。所著杂剧一种，未传世。散曲作品现存两个套曲，另外还存有一则残曲。有《艮斋诗集》十四卷，今有传本。侯克中的套曲〔黄钟·醉花阴〕是颇有时名的作品，抒写妇女思念情人的复杂、细微的感情波澜，给读者留下了较深的印象。诗缺乏深警之作，《四库全书总目》评价说:“其诗颇近击壤一派，多涉理路，而抒情赋景之作，亦时有足资讽咏者。”作为盲人作家，侯克中比较活跃、比较有成就。

张之翰卒于松江知府任上。享年五十四岁。

张之翰（1243—1296），字周卿，号西岩。邯郸（今属河北）人。元世

祖中统初任洺磁知事，至元十三年除真定路知事，以行台监察御史按临福建，因病侨居高邮，把寓居名为“归舟斋”，专一读书、教授学生。后来任户部郎中，又任翰林侍讲学士。白珽《赠张知府周卿》诗赞誉他:“人品中原说此翁，雄文直气耿心胸。几年天上张公子，今日云间陆士龙。”有《西岩集》三十卷，原本已不传。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西岩集》二十卷。他写有《镜灯诗》，流传广泛，以致被称为“张镜灯”，是典型的咏物诗。

因为他由北到南的经历，张之翰曾对当时南北之诗作过如下评价[1]:“北诗气有余而料不足，南诗气不足而料有余。”“欲兼之者”，方是创新之举。可谓别具只眼。

活动于至元、大德年间的文学家真山民、陈杰、罗公升等都是南宋遗民，因为诗文别集保存到今天，才没有为岁月淹没。

真山民，宋亡，遁迹隐沦，所至好题咏，自称“山民”。同时李生乔叹其不愧乃祖文忠西山（真德秀），人们于是疑其姓真。或云名桂芳，括苍（浙江丽水）人。宋末进士。亦无确考。有《真山民集》。《四库全书总目》对其诗评价颇高，所作纯是江湖派风格。

陈杰，字焘父。洪州丰城（今属江西）人。宋理宗淳祐十年（1250）进士，授赣州簿。历知江陵县，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兼制置司参谋。宋亡,隐居东湖。有《自堂存稿》十三卷,已佚。清乾隆年间,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四卷。

罗公升，字时翁，一字沧洲。永丰（今属江西）人。宋末以军功授本县尉，大父罗开礼从文天祥勤王，兵败被执，不食死。宋亡，罗公升倾资北游燕、赵，与宋宗室赵孟荣等图谋恢复，不果，回乡隐居以终。有《无名集》《还山稿》《抗尘集》《痴业集》《北行卷》等，后人合编为《沧洲集》五卷。

邵桂子，字德芳，号玄同。淳安（今属浙江）人。本姓吴，因鞠于邵氏，从其姓。度宗咸淳七年（1271）进士，授处州教授。宋亡不仕，娶华亭曹泽之女，因家焉，凿池构屋，名雪舟。卒年八十二。有《雪舟脞录》《雪舟脞稿》等，已佚;《两宋名贤小集》（卷三五四）存其《慵庵小稿》一卷。

毛直方，字静可。建安(福建建瓯)人。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领乡荐。宋亡，授徒讲学，省府上其名，得教授致仕。有《聊复轩斐稿》，未刊行。

方一夔，名一作方夔，字时佐，号知非子。淳安（今属浙江）人。尝从何梦桂学，累举不第，后以荐为严州教授。宋亡，筑室富山之麓，授徒讲学，

---

[1] 《西岩集》卷十八《跋俞娱心小稿》。

原来为其题跋的人一定远不止此数。

仇远（1247—？），字仁近（或作仁父），号山村民（一作山村）。钱塘（浙江杭州）人。南宋咸淳年间就有诗名，元初隐居钱塘，与白珽并称“仇白”，是钱塘文坛代表性人物。后出为镇江路学正，大德八年任溧阳州儒学教授，以杭州路知事致仕。优游山水，多与方外之士踏访名山胜地，致和元年六月尚在世，卒年不详。仇远论诗，近体主于唐，古体主于汉魏六朝。张翥、张雨、莫维贤等人都出自其门。释弘道在赠他的诗中说：“吾爱山村友，诗工字亦工。波澜唐句法，潇洒晋贤风。”他所谓宗唐，其实是宗晚唐，诗风明显受到江湖派的影响。他是元代前期诗坛颇为活跃的人物，与周密、白珽、赵孟頫、吾衍、鲜于枢、方回、黄溍、马臻都有唱和之作。所著《金渊集》已佚，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六卷。另有《山村遗集》一卷，为清人项梦昶辑；仇远词集《无弦琴谱》二卷，清人朱祖谋曾编入《彊村丛书》。著《稗史》一卷，原本已不传，《说郛》之中录有佚文34条，分为志忠、志孝等11篇。

宋远与滕宾等人邂逅于南昌，并以〔意难忘〕词作别[①]。宋远小说《娇红记》应作于此前后。

宋远，号梅涧。涂川（江西清江）人。著有文言小说《娇红记》二卷，《皇元风雅》前集卷五有其诗二首[②]；与滕宾、周景、刘将孙、萧烈唱和的〔意难忘〕词，见《名儒草堂诗余》（《元草堂诗余》）卷中。这首词是他们“邂逅古洪，流连数月”，告别时以“重与细论文”各填一词的分韵唱和。

《娇红记》（又名《娇红传》，全称《申王奇遘拥炉娇红记》）二卷，全文约20000字，实际已经可以说是中长篇了，在今存元人文言小说中篇幅最长，是唐宋传奇与《剪灯新话》之间的“引桥”。故事大略是：宣和年间，才子申纯应试不第，在母舅家中见到表妹王娇娘，二人一见钟情，剪发为誓，私订终身，申生正式求亲却为母舅拒绝。后申纯中乡试，又有小人从中作梗，仍不允婚，并将娇娘许配与帅府公子。娇娘愤然辞世，申纯亦殉情，死后二人得以合葬。《娇红记》虽不出才子佳人格局，但情节起伏，文辞委婉，颇具感染力，对此后的戏曲影响较大。元人王实甫、金文质，元明之际人汤式，均有杂剧《娇红记》，但未见传。明初人刘兑（字东生）作的《金童玉女娇

① 〔意难忘〕词，未署写作年。但《名儒草堂诗余》收录的是至元大德间的作品，而滕宾在武宗至大年间就入朝出任翰林学士了，故暂系于本年。

② 这两首诗分题为《挽胡宣慰》《哭岳王》。《元诗选癸集》甲集据以收录，但第二首却误题为《哭嶽山》。

红记》今存。以其为本事的杂剧，还有郏经《死葬鸳鸯冢》；明传奇戏则有沈受先《娇红记》、孟称舜《鸳鸯冢》。

陈著去世。享年八十四岁。

陈著（1214—1297），字谦之，一字子微，号本堂，晚号嵩溪遗耄。鄞县（浙江宁波）人，占籍奉化。南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进士，监饶州商税。历白鹭书院山长、知安福县、著作郎，景定四年（1263）忤贾似道，出知嘉兴，此后历仕各地。宋亡，隐居四明山中。有《本堂集》九十四卷，但今本多残缺。

刘辰翁去世。享年六十六岁。

刘辰翁（1232—1297），字会孟，号须溪。庐陵（江西吉安）人。少补太学生，宋景定三年（1262）进士，贾似道当国，曾杀直言敢谏者以塞言路，对策时，辰翁明确表示反对杀言官，声言“忠良残害可伤，风节不竟可憾”，险为贾似道所构。以亲老为由，请为濂溪书院山长。朝臣江万里、陈宜中荐居史馆，又除太学博士，均固辞不就，知国事已不可为。宋亡，托身方外还归乡里，隐居教授以终。诗文均以不拘一格、独抒己意为特点。有《须溪集》《须溪四景诗》等集行世，今存辑本《须溪词》三卷。曾编选《放翁诗选》，并批点杜甫诗以及《世说新语》《班马异同》诸书，今均有传本，所作开明人批点派之先河。

刘辰翁是南宋文人在元初仍然存在的代表。他的《题苏李泣别图》[①] 全文是：“事已矣，泣何为？苏武节，李陵诗。噫！”——仅 13 个字。这究竟是诗歌呢，还是散文？不论是诗还是文，都是最短的，可它真是意味深长。

大德二年戊戌（1298）

正月十五日夜（元宵）。张埜客居京师，作〔青玉案〕词。

〔青玉案〕《戊戌元宵客京师赋》（《古山乐府》卷一）云：“千门夜色霏香雾，又春满、朝天路。回首旧游谁与语。金波影里，水晶帘下，总是关心处。征衫著破愁成缕，留滞京尘甚时去。旅馆萧条情最苦。灯无人点，酒无

---

① 明徐树丕《识小录》卷二“三先生题图”（《涵芬楼秘笈》第 1 册第 557 页）。

人举，睡也无人觑。”写尽辇下的失落。京师十里红尘，可没有自己的一席。他不是来自江南的游客，他是在归途中。

张埜，字埜夫，号古山。邯郸（今属河北）人。张之翰子，曾历官翰林修撰，至大、皇庆间寓居钱塘，延祐年间历官翰林修撰。有《古山乐府》二卷。元初，并非由南宋入元的词人，而又有词集行世者相当少见，张埜是其一，本就有“和寡”的寂寞感。

正月。元廷给予翰林、集贤两院成员奖励。

《元史·成宗本纪》:“以翰林王恽、阎复、王构、赵与票、王之纲、杨文郁、王德渊，集贤王颙、宋渤、卢挚、耶律有尚、李泰、郝采、杨麟，皆耆德旧臣，清贫守职，特赐钞二千一百余锭。”这是元朝罕见的对翰林、集贤全体成员作奖励。

徐琰入为翰林学士承旨。

徐琰（？—1301），字子方，号容斋，又号养斋、汶叟。东平（今属山东）人。早年受教于元好问。严实领东平行台，招诸生肄进士业，迎元好问试校其文，预选者四人，阎复为首，徐琰、李谦、孟祺次之，世称“四杰”，到至元、大德年间，这四人又并称“四大老”，其中徐琰“尤长于诗。初未尝雕刻藻绘以为工，而中原浑厚之意隐然可以概见”[①]。至元初由翰林承旨王磐推荐，任陕西行省郎中，后任中书左司郎中。至元二十三年，拜岭北湖南道提刑按察使。至元二十五年拜南台中丞，建台扬州，并与程钜夫、胡长孺等唱和往还，极一时之盛。至元三十一年迁江南浙西肃政廉访使。卒，谥文献（一作文贞）。徐琰人物伟岸，襟度宽洪，有文学重望，在江南十余年，文人学士翕然归。《录鬼簿》列其名于“前辈名公”节，《太和正音谱》列名于俱是杰作一百五十人中。散曲今存小令12首，套曲1套（据《全元散曲》)。贯云石以“滑雅”总括徐琰散曲的艺术风格（《阳春白雪》序)。其小令〔双调·蟾宫曲〕《青楼十咏》以十题咏妓女的日常生活，在同类题材中不同凡响。有《爱兰轩诗集》，今不存，诗散见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夜山图题咏》等书。

戴表元从诗歌发展角度，分别对两个对立人物方回、仇远作了批评。

戴表元与仇远相知较晚，在《仇仁近诗序》(《剡源集》卷八）中他说：

---

① 王祎《书徐文贞公诗后》(《金华丛书》本《王忠文集》卷十三)。

"景定、咸淳之间，余初客杭，见能诗人不一二数，不必皆杭产也。时余虽学诗，方从事进取，每每为人所厌薄，以为兹技乃天之所以畀于穷退之人，使其吟谣山林，以泄其无聊。非涉世者所得兼。余尝隘而非之：诸君子非失职，安得为此不祥之言。离去二十年复来。事有不可言。诸诗人皆尽，而余怳然独行独止，如羁禽越乡而无与群，如马行过其故枥裴回而悲鸣也。"这写得真让人意念难执，如同历览废墟，还顾旷野。

很多年以后，戴表元结识了屠约、白珽，并因之结识了仇远，得见仇远诗集，那种诗坛凄凉荒芜的感觉，才终于改变。

而方回是他早年的偶像，正因为如此而一直有距离感。《方使君诗序》（《剡源集》卷八）说："使君（紫阳方回）初为名进士时，表元以儿童窃从士大夫间。……然当是时，诸贤高谈性命，其次不过驰骛简牍俳谐、场屋破碎之文，以随时悦俗，无有肯以诗为事者。惟山林之退士，江湖之羁客，乃仅或能攻；而馆阁名成艺达者，亦往往以余力及之。"

方回与仇远，是由宋入元的文人的代表人物。通过具体的文字，可以感觉到戴表元更佩服方回，更亲近仇远。这大概就是当时江南诗坛的"公众感觉"。

在另一篇诗论《陈无逸诗序》（《剡源集》卷八）中，戴表元则对诗坛前景作了预期"盖虽科举学废，人人得纵意无所累"，这将促使诗学具有更大的应用范围。在这时，方回与仇远的同与不同，将不再重要。

江南籍的杂剧作家出现在文坛，杭州人鲍天祐以杂剧知名于时。

鲍天祐，字吉甫。杭州（今属浙江）人。初业儒，长事吏，这是元初文人的典型经历，《录鬼簿》（曹寅刊本）说："簿书之役，非其志也。跬步之间，惟务求搜奇索古而已。故其编撰，多使人感动咏叹。余与之谈论节要，至今得其良法。才高命薄，今犹古也，竟止昆山州吏而止。"作杂剧8种，仅《王妙妙死哭秦少游》《史鱼尸谏卫灵公》两种存有残曲。《太和正音谱》评其词"如山蛟泣珠"。《史鱼尸谏卫灵公》极负盛名，明周宪王朱有燉《元宫词》（其八）云："尸谏灵公演传奇，一朝传到九重知。奉宣赍于中书省，诸路都教唱此词。"可见曾传入宫禁。

舒岳祥去世。享年八十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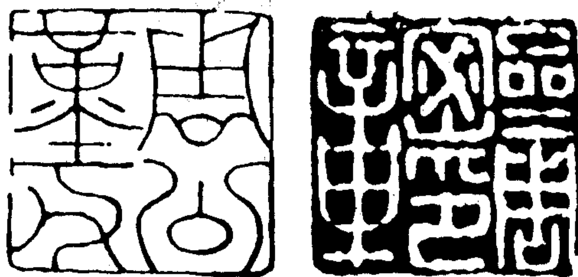
舒岳祥（1219—1298），字舜侯，一字景薛，学者称"阆风先生"。台州（今属浙江）人。少负才气，七岁能作古文，出语惊人。宋宝祐四年（1256）进士，授奉化尉，宋亡不仕，教授乡里，其门人戴表元、刘庄孙等均以诗文

著名。晚年诗益精妙，文益宏肆。著《阆风集》二十卷、《阆风家录》三卷、《篆畦集》九卷、《避地稿》十卷、《苏墅稿》三卷、《史述》十八卷、《汉砭》一卷以及《梧竹里稿》《三史纂言》《谈丛》《丛续》《丛残》《丛传》《丛肆》《昔游录》《深衣图说》等，共二百二十卷，多散佚无传。今存辑本《阆风集》十二卷（诗九卷、文三卷）。

周密去世。享年六十七岁。

周密（1232—1298），字公谨，号草窗，又号四水潜夫、弁阳老人、华不注山人。祖籍济南，南渡迁吴兴（江苏湖州）。早年入宋太学，景定二年（1261）入临安府幕，在义乌令任上，南宋亡。入元不仕，与谢翱、邓牧游，时名颇著。晚年因“兵火破家”，迁居杭州。一生著述颇丰，有笔记《武林旧事》《齐东野语》《癸辛杂识》《澄怀录》《浩然斋雅谈》等编，诗词特别是词，与王沂孙、张炎齐名，有诗集《草窗韵语》，词集《蘋洲渔笛谱》《草窗词》等，与吴文英（号梦窗）并称“二窗”。还编辑南宋词总集《绝妙好词》七卷，其中包括了自己的作品。此外，散佚的著述与作品尚多。

周密笔记中，除《齐东野语》较重要的有《癸辛杂识》。由于《癸辛杂识》的记事中提到大德元年，所以应是晚年所著，定稿时离他去世不远。全书分为前、后、续、别四集，共481节，是元初笔记篇幅较大，内容较丰富的一种。因写定于杭州的癸辛街，故名。关于《癸辛杂识》与《齐东野语》的异同，《四库全书总目》说是“《野语》多记朝廷大政，此则琐事杂言居十之九”，另外一个区别是，在取材方面，《齐东野语》多记南宋遗事，《癸辛杂识》则是直面元初社会百态。



周密用过的印章。印文是“周公瑾父”“齐周密印章”。

释圆至去世。享年四十三岁。

圆至（1256—1298），字天隐，号牧潜，又号筠溪老衲。高安（今属江西）人。俗姓姚。是元代诗僧“三隐”之一。父兄都以进士科目起家，他却在十九岁时出家为僧。南宋将亡之际，到袁州避于寺中，至元中自淮入浙，出入各地禅林。至元二十七年到庐山，四年后，郡守请他去主持建昌的能仁寺，又两年后，他又离开能仁寺回到庐山。圆至身处宋、元易代之际，是寄身佛门的高士。戴表元《圆至师诗文集序》说圆至不肯为人说诗文，“性似

厌聒。然退而出其所作，清驯峭削，殆以理胜。”（《剡源集》卷九）著有《牧潜集》七卷，今存。诗数量不多，但颇有秀逸之句，虽然少有言及亡国之痛的作品，但黍离之感却时见于字里行间。曾为宋人周弼《三体唐诗》作注，题为《唐诗说》。

大德三年己亥（1299）

王德渊出任翰林直学士[①]，在此后撰写了《薛昂夫诗集序》。

王德渊，广平（河北邯郸）人。至元二十四年在翰林院任翰林修撰，大德年间任翰林直学士。诗文均有时名，其文以《薛昂夫诗集序》（《天下同文》卷十五）影响较大；《元诗选癸集》乙集存其诗一首。文章散见于《天下同文》等书。

赵文作《送蒙古荆教授序》[②]。

《送蒙古荆教授序》（《天下同文》卷十五）说“真定荆飞卿精于国书”，在江西富州任蒙古字学教授。“飞卿教授于此，人人爱其和易可亲”，“吾极欲从君学奇字，恨老矣”。在这篇序文的开始，赵文特意介绍了蒙古文字的拼音方式，并说:“初，丰城既改富州，颁州印，用之且十七八岁。飞卿至，辨之曰此‘抚州’，非‘富州’也。然后，州请于朝，而改铸焉。”以拼音的蒙古文字区分“抚”与“富”，对于蒙古文字实际应用于写作，意义重大。

陈义高去世。享年四十五岁。

陈义高（1255—1299），字宜父（宜甫），号秋岩。闽（福建）人。元世祖至元年间，两次随驾北行，至元二十五年提点洪州玉隆宫。曾住龙虎山道院。其诗多有与卢挚、姚燧、赵孟頫、程钜夫等文坛名宿唱和之作，但诸人诗中却罕有提到他的。有《秋岩集》，已无传本，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陈义高诗，重编为《秋岩诗集》二卷。其诗大抵源出元稹、白居易，在元前期道教诗人中据有一席之地。

---

① 《元一统志》（中华书局1966年）卷一，大都崇元观有“大德三年翰林直学士王德渊撰”的碑记。

② 本文未注明写作时间。但文中说“丰城既改富州，颁州印，用之且十七八岁”。丰城升为富州，据《元史·地理志》时在至元二十三年。

陈岩去世。

陈岩（？—1299），字清隐。青阳（今属安徽）人。宋咸淳间屡举进士不第，入元，隐居不出，为避举荐，乃漫游江湖，及老始归青阳，筑室于高阳河，有楼名为“溪山第一楼”，有池名为“临清池”，有居室曰“观静”“燕居”，日啸咏其中。遍游九华山之胜，并将纪游之作结为《九华诗集》一卷。并集杜甫诗为《凤髓集》。

大德四年庚子（1300）

五月。朱晞颜《瓢泉吟稿》结集。

《瓢泉吟稿》卷首有元成宗大德四年牟巘序、郑僖序。牟巘说：“朱晞颜年甚少，笃志于学，士大夫多从之游……予谓晞颜，倘能于世务应酬之际，长存主静之心，不为外夺，则此理卓然随在，而见亦随在而有得。何莫非学？学则进，诗益进。他日又当求之于此轴之外。”这样真诚相勉的话，在集序中并不常见。

六月十七日[1]。元老重臣、康里人不忽木在病中因饮酒过量而去世。享年四十六岁。

不忽木是第一代华化的西域人，诗文不多见，但套曲〔仙吕·点绛唇〕《辞朝》是元曲名篇。他的两个儿子回回、巎巎在元中期文坛影响颇大。

第一部元曲总集《阳春白雪》，选录了不忽木的套曲〔仙吕·点绛唇〕《辞朝》，卷首曲家“古今姓氏”里，列入“不忽麻平章”。钟嗣成《录鬼簿》卷上“前辈名公乐章传于世者”节，也有“不忽木平章”。《太和正音谱》“古今群英乐府格势”节，称“不忽麻之词如闲云出岫”。但散曲流传至今仅有上述《辞朝》套曲。在元代曲坛，辞官归隐作品可以视为一大门类，几乎所有名家都写有这类作品。

这个套曲有个特点，即曲中作者始终以“臣”、“微臣”为代词，仿佛在向君主发牢骚。全曲从“宁可卧糟丘，赛强如命悬君手”开篇，铺叙了为官

① 《松雪斋集》卷七不忽木碑传，他去世的月份空缺，日期则注十七日，文献所载的后人几次为不忽木扫墓都在三月，当属清明祭献。《元史·成宗本年》在大德四年六月有纪事，说不忽木卒，家贫无以葬。所以他的去世应该在六月丁未之前不久。

仕途凶险，归隐山林最乐的情愫。曲中放言："明放着伏事君王不到头"；"游鱼儿见食不见钩，都只为半纸功名一笔勾，急回头两鬓秋"。第11支曲〔游四门〕云："世间闲事挂心头，惟酒可忘忧。非是微臣常恋酒，叹古今荣辱，看兴亡成败，则待一醉解千愁！"而终曲进一步说："既把世情疏，感谢君恩厚。臣怕饮的是黄封御酒"。《元史》本传则有如下记载："（大德）四年，病复作，帝遣医治之，不效。乃附奏曰：'臣孱庸无取，叨承眷渥。大限有终，永辞昭代。'引觞满饮而卒。"史传与《辞朝》曲相比，竟如此吻合，《辞朝》简直就像为其结局作索隐。

《元史·成宗本纪》在大德四年六月有纪事云："御史中丞不忽木卒，贫无以葬，赐钞五百锭。"有了这段文字，关于他的清廉，不需要再作别的注释。

盛如梓写笔记《庶斋老学丛谈》四卷[①]。

《庶斋老学丛谈》所记录的人物事件大都出自盛如梓见闻，与鲜于枢《困学斋杂录》均是元前期笔记中内涵丰富、影响较大者，这与一些专门抄撮文献而成书的笔记有明显区别。本书卷中下最后一则记事，就是著名的"北方士又传沙漠小词三阕"，即三首〔天净沙〕《秋思》，第一首"枯藤老树昏鸦"是有名的元人小令。

盛如梓，号庶斋。扬州（今属江苏）人。大德间出为嘉定州学教授，迁衢州路学教授，以崇明州判官致仕。除这部笔记，他的诗文等作品罕见传世，据方逢振《扬州盛庶斋吟稿序》（《蛟峰集》卷八），大德间盛如梓将所作诗篇结为《庶斋吟稿》，并到"万山深处"的石峡书院拜访方逢振，请他为《庶斋吟稿》作序。

袁桷作《书汤西楼诗后》。

汤仲友，初名汤益，以字行，更字端夫，号西楼。吴郡（江苏苏州）人。宋末浪迹江湖，元初诗名颇大。汤益自认为其诗近似李商隐，其实是宋元之际的典型江湖诗人。在《书汤西楼诗后》（《清容居士集》卷四十八）中，袁桷别具只眼，讨论了晚唐诗对宋元之际江湖诗派的影响，预言当代之诗风，将体现出"眉山、江西之宗亦绝"，"四灵"消泯的特点，而所谓"晚唐之音调"流行是以上演变的前提。

关于汤仲友与南宋江湖诗派的消亡，戴表元在《题汤仲友诗卷》（《剡源

---

① 《庶斋老学丛谈》分为上、中、下卷，但中卷又分上、下，故全书实际是四卷。

集》卷十九）中则说，在元初汤仲友已经年过七旬，足称遗老。“旧时江湖间诸公，以诗行不少，谓之‘诗客’。公倾折节交之，自华子山、敖器之、刘潜夫，前后诗祸作，士气稍稍摧沮。虽不绝，然不得如昔矣。”——是南宋的“诗祸”伴随江山易主，最终埋葬了江湖诗派。袁桷，再加上戴表元，就是一个完整的结论了。

邓牧为张炎《山中白云》作序。

张炎《山中白云词》八卷，是元初影响较大的词集，编定于此前后。

邓牧《山中白云词序》云：词家有二短，赋情或近俚，放意或近率，“玉田张君无二家所短，而兼所长。春水一词，绝唱千古，人以‘张春水’目之。盖其父寄闲先生善词名世，君又得之家庭所传者。中间落落不偶，北上燕南，留宿海上，憔悴见颜色。至酒酣浩歌，不改王孙公子蕴藉，身外穷达，诚不足动其心、馁其气与？岁庚子相遇东吴，示予词若干首，使为序云。”只有畏友，才写得出这样的序文。

李道坦寓居兰溪，与吴师道交往密切。

李道坦，字坦之。钱塘（浙江杭州）人。二十余即以《杜鹃行》获诗名，早年入道洞霄宫，学古文于隐者邓牧，邓牧去世，李道坦遂出山。大德中，能诗之名益著，以歌行最长，曾倡言：“言诗必以李杜为宗，唐律四十字、五十六字，成一片文章，岂可以闲冗语填之?”（吴师道《吴礼部诗话》）与张翥、成廷珪交往唱和。有《学道斋集》，未见传本，所作散见于元诗总集。清钱熙彦《元诗选补遗》编录其诗12首。

大德五年辛丑（1301）

二月十五日。房祺《河汾诸老诗集》编成并作序。

所谓“河汾诸老”，是金遗民诗人群体。金亡，元好问隐居不仕，“为河汾倡正学”。从那时起经历了六七十年，这是作出客观评价需要的时间距离。房祺同时为《河汾诸老诗集》作序，序中云：

> 往年吾友杨君仲德议成此集，不幸早世。仲德有云：“不观遗山之诗，无以知河汾之学。不观河汾之诗，无以知遗山之大。不观遗山、河

汾之作，不知唐人诸作者之妙。不观唐人之作，不知三百篇六义之深意。”

房祺，号横汾隐者。临汾（今属山西）人。至元、大德间，历河中、大同两府儒学教授，以潞州判官致仕。《河汾诸老诗集》即自署“横汾隐者”，大德五年时应已归老家山。他引称的杨仲德的一段话，以一连几个“不观”作为转折，读之如同步步登高，视野层层开阔，元好问对于元代文学（特别是北方文学）传承意味着什么，已经清楚得不能再清楚了。

管道昇年届四十，其夫赵孟頫四十八岁，同时遭遇“中年危机”。

管道昇（1262—1319），字仲姬。乌程（江苏湖州）人。赵孟頫妻，本人也是书画家、诗文家，以画竹著名。至元中与赵孟頫偕入京师，至大四年封吴兴郡夫人，延祐四年加封魏国夫人，曾为元仁宗书写《千字文》。延祐六年，以病南还，行至临清，卒于舟中。她的小令〔锁南枝〕是元曲史名篇。关于这篇小令，《尧山堂外纪》（卷七十）云：



管道昇用印，印文是“赵管”，这与今天一些华人妇女将夫姓列于姓名首位的做法不谋而合。

> 赵松雪欲置妾，以小词调管夫人云：“我为学士，你做夫人。岂不闻陶学士有桃叶桃根，苏学士有朝云暮云。我便多娶几个吴姬赵女何过分！你年纪已过四旬，只管占住玉堂春。”管夫人答云：“你侬我侬，忒煞情多，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俩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松雪得词，大笑而止。

这故事与那支小令都流传颇广。有人认为，〔锁南枝〕是元代民间的俗曲之一，或附会于赵孟頫、管道昇。但元人诗文与散曲面目迥异者亦颇常见。

吴弘道编集中州诸老书信，成《中州启札》四卷。

《中州启札》有许善胜序，其中说“江西检校掾史吴君仁卿，裒中州诸老往复书尺，类为一编，凡四卷，辄已待锓梓”。《中州启札》编录的都是金

元之际的北方闻人的书信，有的人素无别集行世，文字赖本编以传。吴仁卿是热心保存文献的人，他能为钟嗣成《录鬼簿》的“前辈名公”提供曲家、曲目资料，绝非无因。

吴弘道，字仁卿，号克斋；一说名吴仁卿，字弘道。蒲阴（河北易县）人。大德年间任江西行省检校掾史，后以府判致仕。留心元曲史，并收藏有丰富资料，《录鬼簿》列为“前辈名公”节的曲家与曲目，就是他提供给友人陆仲良，才得以为钟嗣成所用。贾仲明在吊吴弘道的〔凌波仙〕曲中说：“锦乡中过一生，老来也致仕心宁”，“锦乐府天下盛行”（明天一阁抄本《录鬼簿》）。所作散曲曾结为《金缕新声》一编，未见传本。今存小令34首，套曲4套（据《全元散曲》）。作杂剧5种，均无传本。除《中州启札》，曾辑散曲总集《曲海丛珠》，但未见传。《太和正音谱》将其误作两人，俱是杰作一百五十人中列有“吴克斋”，又于此前评“吴仁卿”曲作“如山间明月”。

五月十六日。赴上都观礼的道士马臻，在诗中写出了滦阳观感，特别是观看有教坊艺人演出杂剧的朝会的印象。

马臻是随天师张与材至大都，到大都之后又前往夏都滦阳觐见元成宗。此行本意是就行内醮，拟授以道秩，但马臻未受职，而辞归江南。

马臻（1254—？），字志道，号虚中。钱塘（浙江杭州）人。南宋亡，家境败落，出家为道士，受业于褚伯秀。这次前往大都，感受颇多，南归后据说“杜门择交，远迹声利”（黄石翁《霞外诗集序》）。所作诗结为《霞外诗集》十卷，今存。至大年间，天师任命他为佑圣观虚白斋高士，也没有到位。他的诗与画都有时名，主要与宋遗民，如龚开、陆文圭、仇远、吾衍、方回等人交往。写于大德六年以后的作品多已散佚[1]，在《霞外诗集序》中，龚开说：马臻的诗“驯雅如其人”；仇远则评其诗卷：“大抵以平夷恬淡为体，清新圆美为用。”“浑然天成，不止于烟云、花草、鱼鸟而已。”马臻所作实是比较典型的江湖诗风，是宋元之际江湖诗派“隐于释道”的例证。

在上都，马臻写有《大德辛丑五月十六日滦都棕殿朝见谨赋绝句三首》（《霞外诗集》卷三），其中的第二首与第三首分别是：“殿中锡宴列诸王，羽褐分班近御床。特旨向前观妓乐，满身雨露湿天香。”“清晓宣传入殿门，箫韶九奏进金樽。教坊齐扮群仙会，知是天使朝至尊。”在教坊演出杂剧时，为了让他们看得更清楚，特意安排了靠前的位置。

---

① 马臻的集外诗（今本《霞外诗集》十卷未收入的诗），主要保存在《诗渊》与《永乐大典》之中。

梅应发去世。享年七十八岁。

梅应发（1224—1301），字定夫，号艮岩。广德（今属安徽）人。宋宝祐元年（1253）进士，官至太府卿、中奉大夫、直宝章阁。宋亡，隐居以终。著有《艮岩余稿》（未分卷）。

冬。陈思济去世。享年七十岁。

陈思济（1232—1301），字济民，号秋冈。柘城（今属河南）人。幼年即以才气见称于时辈，元世祖忽必烈在潜邸，以为顾问，世祖即位，陈思济为廉希宪僚属，受到姚枢、许衡等人器重。至元六年累迁高唐知州，拜监察御史，与权臣阿合马不合，出为沁州知州。至元十四年来江南，以绍兴路同知、转两浙都转运司同知，历仕各地。离开江南后，拜陕西按察副使，以丁忧归。至元二十三年再次来江南，任浙东宣慰司同知，救饥赈灾，曾为民请命。病故，追封颍川郡侯，谥文肃。所著《秋冈诗集》，虞集为之作序，说：

“公（陈思济）文章之出，沛如泉源之发挥，而波澜之无津，譬如风云之变化，而舒卷之无迹。”（《道园学古录》卷三十三）据虞集序，可知《秋冈诗集》是陈思济之孙陈允文于至正元年辑刊，未见传本。《元诗选》二集选陈思济诗 10 首，题为《秋冈先生集》，应是顾嗣立所辑。

大德六年壬寅（1302）

虞集以荐授大都路儒学教授，从江南来京师任职。

自本年起四十多年间，虞集一步步走到文坛最前列；而且直到元顺帝初致仕，三十年来主要生活在大都。

虞集是元代最有影响的文臣之一、最负盛名的诗文家、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早年与弟虞槃把书房分成两间，墙壁分别写了陶渊明与邵雍的诗，左壁题名为“陶庵”，右壁题名为“邵庵”，成名之后人称“邵庵先生”，可见是从邵雍入道。在朝他不但执笔撰写了大量的朝廷典册、公卿碑铭，还以奖掖后进，倡导古学影响了一代文风。与杨载、范梈、揭傒斯并称为“元诗四大家”，但他确实比杨、范、揭高出许多。一生著述繁富，号称“平生为文万篇”（《元史》本传），但“稿存者十二三”；写诗也应有万篇。而这“十二三”的存稿，无论以数量还是质量而论，其他诗文家难于比肩。诗文结为《道园学古录》五十卷、《道园类稿》五十卷、《道园遗稿》六卷（别本八

卷）、《翰林珠玉》六卷、《虞伯生诗续编》三卷等多部专集，今均有传本。《元诗选》初集据《道园学古录》选入虞集诗383首，是全部三集《元诗选》除元好问选入诗作最多的一人。文章以应制、应酬之作最典范，数量也较多，与欧阳玄、马祖常等馆阁名士相比，他的文章比较讲究文辞，以博洽精微为特色。一般认为其文风体现出他作学问的特点，上承南北两宋，“蔼然庆历、乾（道）淳（熙）风烈”（《元史》本传）。论者曾把他对元代文坛的影响比之欧阳修之于北宋文坛。其诗历来受诗选家、诗论家重视，视为元诗的巅峰。他自称诗如“汉廷老吏”（或“汉法令师”），这显然是以章法讲究、格律工稳自许，所作往往能在深沉老练之余，体现出典雅、甚至相当清新的一面。《听雨》中的名句“京国多年情尽改，忽听春雨忆江南”便是一例。当然，虞集诗文也多应酬之作。在“四大家”中，仅虞集诗词兼长，同时还是元曲家，名列于《录鬼簿》“前辈名公乐章传于世者”节，但作品仅存小令1支（据《全元散曲》）。

秋。陈仁子《文选补遗》编成于此前后。

陈仁子，字同俌，号古迂。茶陵（今属湖南）人。南宋咸淳间应漕试第一，入元不仕，即便在遗民隐士中陈仁子亦颇低调。文章多作于元贞、大德间，对唐前文学颇关注，本年曾为刘向《说苑》写跋语。诗文结为《牧莱脞语》二十卷。

《文选补遗》四十卷，是“文选学”在唐宋与明清之间的衔接地段，直接纳入了明代唐前文学选本的视野。《文选》是公认的文学经典，但陈仁子以四十卷的篇幅，专门在挑《文选》的“岔子”，为《文选》拣“漏儿”：什么是该收未收，什么是实在不必收，什么是体例不当等等。这些问题确实有求疵的情况，但类似“渊明，诗家冠冕”，而《文选》中，陶渊明的作品“十不存三”这样的意见，则反映出不同时代对文学的选取标准有所不同。总之，这是一部专门“补”《文选》之“遗”的总集，这在《文选》问世以来尚未曾有过。

冯子振在上都借〔鹦鹉曲〕与艺妓御园秀讨论散曲韵律。

冯子振《鹦鹉曲序》（据《全元散曲》）说：

> 白无咎有〔鹦鹉曲〕:“侬家鹦鹉洲边住，是个不识字渔父。浪花中一叶扁舟，睡煞江南烟雨。觉来时满眼青山，抖擞绿蓑归去。算从前错怨天公，甚也有安排我处。”余壬寅岁留上京，有北京伶妇御园秀之属，

相从风雪中，恨此曲无续之者。且谓：前后多亲炙士大夫，拘于韵度，如第一个父字，便难下语。又“甚也有安排我处”，甚字必须去声字，我字必须上声字，音律始谐，不然不可歌，此一节又难下语。诸公举酒，索余和之；以汴、吴、上都、天京风景试续之。

以此可以看出在那时写作、演唱散曲是社会时尚。冯子振今存的44支小令中，〔鹦鹉曲〕就占42首。《朝野新声太平乐府》（卷一）收入冯子振〔鹦鹉曲〕36首，应作于此前后。它们的题目分别是：山亭逸兴，荣华短梦，愚翁放浪，农夫渴雨，燕南百五，故园归计，野渡新晴，渔父，市朝归兴，陆羽风流，顾渚紫笋，园父，野客，城南秋思，赤壁怀古，虚士虚名，洞庭钓客，黄阁清风，夷门怀古，都门感旧，磻溪故事，泣江妇，兰亭手卷，庞隐图，拔宅冲昇图，忆西湖，感事，赠园父，感事。——这些题目连缀起来就是他生活的缩影，他志趣的折射。



冯子振用过的印章。

范居中随其妹北赴大都。

范居中，字子正，号冰壶。杭州(今属浙江)人。其父范玉壶是前辈名儒，元初在杭州三元楼前以卖卜为生，每逢元夕，必以时事题于灯纸之上，杭人聚观，远近皆知父子之名。范居中学问广博，善操琴，能书法。据《录鬼簿》(曹寅刊本)说:“其妹亦有文名，大德年间被旨赴都，公亦北行。以才高不见遇，卒于家。有乐府及南北腔行于世。”曾与施惠、黄天泽、沈珙合作杂剧《鹔鹴裘》，今不存。《太和正音谱》列名于俱是杰作一百五十人中。

久在江南任职的鲜于枢，致仕回到大都。

本年，鲜于枢以太常寺典簿致仕返回京师。大都文坛因其加盟，增添了色彩。他的家宴上常有艺妓助兴，曹娥秀是颇受赏识者。《青楼集》云：

曹娥秀，京师名妓也。赋性聪慧，色艺俱全。一日鲜于伯机开宴，

座客皆名士。鲜于因事入内，命曹行酒。适遍，公出自内，客曰:"伯机未饮。"曹亦曰:"伯机未饮。"客笑曰:"汝以伯机相呼，可为亲爱之至。"鲜于佯怒曰:"小鬼头，敢如此无礼!"曹曰:"我呼伯机便不可，却只许尔叫王羲之也。"一座大笑。

曹娥秀色艺双绝，是大都艺妓中比较年轻的一辈。元代教坊艺妓未经许可不能随便离开居住地，否则要受到"拘刷"。无名氏的套曲〔般涉调·耍孩儿〕《拘刷行院》[①] 写在一次官方"拘刷"行动中，使在外演出的曹娥秀惊惶失措。这说明她在曲坛活动时期较长，而且活动范围较广泛。

宪使臧梦解等交章举荐词人蒋捷，卒不就。

蒋捷，字胜欲。宋亡后隐居于竹山，学者称"竹山先生"。阳羡（江苏宜兴）人。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进士，宋亡，隐迹不仕。平生著述，一以义理为主，其小学详断，发明旨趣尤多。工词，在宋代遗民词人中较有影响。《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其词"炼字精深，音词谐畅，为倚声家之矩矱"，近人刘熙载评为"长短句之长城"（《艺概》）。但晚清与近代词论家——如陈廷焯——则将其置而不论。有《竹山词》一卷。其词并无正面反映亡国离乱之作，但〔贺新郎〕《吴江》与《兵后寓吴》，沧桑之感颇真切。

臧梦解（？—1335），号鲁山。庆元（浙江宁波）人。宋末登进士第，入元荐授海宁知州，除桂阳路同知，擢广西廉访副使，大德元年改江西，大德六年移浙东。在浙东廉访副使任上举荐蒋捷。大德九年升广东廉访使，致仕居杭州。曾久在宪司任职，与文人交往密切。

十月。道士孟宗宝编录《洞霄诗集》成书。

洞霄，是道教圣地，原名天柱观。《洞霄诗集》（又名《大涤洞天诗》）十四卷，卷首有邓牧序，卷末有孟宗宝跋，是元代较早成编的一种以道教圣地为吟咏对象的诗总集，对以后成书的《金精风月》《四明丹山图咏集》等影响颇大。孟宗宝跋语说:"宗宝以介石沈公命，取旧集洎家藏诗，与本山叶君、牧心邓君，暇日讨论删定唐宋贤及今名公题咏，命工重刻，与好事者共之，非独为山中清事，亦足继前人志也。"这类诗总集的编辑，往往起着广告宣传的作用。

---

① 《全元散曲》第 1821～1823 页。这里的"曹娥秀"不一定是实指其人，那也等于她成了一类人的代称。

十二月。著作等身的儒士刘庄孙去世。享年六十九岁。

刘庄孙（1234—1302），字正仲，号樗园。天台宁海（今属浙江）人。出于舒岳祥之门，大概是元代著述最丰富的人，所作有数百卷之巨，见于记载的就有：《易志》十卷、《诗传音指补》二十卷、《书传上下篇》二十卷、《周官集传》二十卷、《春秋本义》二十卷，还有《论语章指》《老子发微》《楚辞补注音释》《深衣考》等著述，诗文集《芳润稿》五十卷、《和陶诗》一卷等。上述都有书名、有卷数，应该是已经成书者，未编定的更不知多出几倍。但是，所著未能传世，这就使他成了另类的“典型”。袁桷为其写的《刘隐君墓志铭》（《清容居士集》卷二十八）中，说刘庄孙“喜著书，能以词藻达幽隐”。然而，袁桷针对上述著述感慨道：“多矣哉！学患不博，博矣，其必不能有以精也！”刘庄孙以樗园为别号，樗材，是无用之材，常作为谦词。植樗（臭椿）为园，材多为患。这是自谦呢，还是自悲呢。

燕公楠去世。享年六十二岁。

燕公楠（1241—1302），字国材，号五峰。南康建昌（江西永修）人。至元十三年，江南刚刚平定，燕公楠即出任赣州同知，次年因功升任吉州同知，至元二十二年夏，应召至上都，奏对称旨，元世祖赐名“赛因囊加带”，授江浙行省佥事。至元二十五年任大司农，领八道劝农营田司事，政绩卓著。至元二十七年，拜江淮行省参政。赴阙陈事，受元世祖欣赏，以为平章政事，他一再辞谢，改授江浙行省参政。至元三十年，再次出任大司农。元贞元年，进河南行省右丞，入见元成宗，改任江浙行省右丞，明年又改湖广行省右丞。号称十岁能属文，诗文词曲均长，著《五峰集》十五卷，久已亡佚。燕公楠一生主要在江南任地方官吏，由同知直作到行省右丞，在南人当中，较有政绩，仕途亦颇顺遂。

鲜于枢去世。享年五十七岁。

鲜于枢（1246—1302），字伯机，号困学民，又号西溪子、虎林隐吏等。原籍渔阳（河北蓟县），后徙汴梁（河南开封）。少为路吏，南宋亡，到江南任职，至元二十四年累迁两浙转运司经历。与上司不合，闲居于杭州。至元二十九年后起为江浙行省都事，大德初改任浙东宣慰司都事，大德六年入朝，以太常寺典籍致仕，是年去世。鲜于枢仕途并不如意，但在元初以“北人”到江南做官，与高克恭、梁曾等都因长于吟咏，并喜书画，受到吴越之士的推重与倾慕，在文坛影响较广泛。有笔记《困学斋杂录》，今存。《元诗选》二集有《困学斋集》。《太和正音谱》列名于俱是杰作一百五十人中。其书法

是元代名家之一。

大德七年癸卯（1303）

二月二十五日。赵孟頫在姑苏为隐逸诗人袁易作《袁安卧雪图》。

自至元中期以来至大德年间，遗民作家已经纷纷出仕新朝，这个缺口是从儒学教官打开的。最具影响力的如仇远、戴表元也不例外，对此，社会舆论并没有特别的反弹。而陈孚、赵孟頫等新一代闻人的出仕，也逐渐成为气候。对于固守旧俗的人，“出，还是不出”，还是一个难题。这幅画，是赵孟頫对此的回应。

赵孟頫为《袁安卧雪图》写的跋语（《大观录》卷十六）说:“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阳人。严重有威，见敬于州里。时大雪，洛阳令自出案行，见人家皆除雪，有乞食者，至安门，无有行路，谓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户，见安僵卧，问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饥，不宜干人。’令以为贤，举安孝廉也。大德癸卯二月廿五日，姑苏寓舍制。孟頫。”其中既有敬佩，也有惋惜。一年后——大德八年四月七日，赵孟頫重题《袁安卧雪图》:“余为通甫作此图，正以通甫好修之士，使之景慕其高节耳。然予自谓颇尽其能事，此难与不知者道也。明年四月七日，子昂重题。”足见这幅画并非应酬之作。

袁安卧雪是汉代著名典故：在大雪中，贫士袁安僵卧在家，不愿出门去求助。袁易与袁安相似之处，不仅是姓氏，袁易可以说是最后的“隐士”。迈出门，就是迈过感情的障碍。《袁安卧雪图》是赵孟頫特别珍视的作品，也是他与社会舆论的一次较量。他“重题”的结句“此难与不知者道也”，这才是他作画的真实心态。

在赵孟頫之前，宋代画家马和之也有《袁安卧雪图》。赵孟頫的友人贯云石《题马和之袁安卧雪图》诗写道:“北风吹雪寒如水，路隔县令已百里。袁安如死不出门，雪拥入庭犹未起。昔年燕北曾经行，燕北路上行人憎。燕山席片小如雪，人行未得袁安情。”① 写的是“燕北”的“行路难”。这一点，南人不一定有思想准备。赵孟頫与贯云石存在身份的反差，而对“出与不出”，当然有不同的理解。

① 《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合编》第2册第971页。

六月。虞集在《田氏先友翰墨》中对金元之际的北方文坛作了概述。

《田氏先友翰墨》(《道园学古录》卷五)云:

女真入中州,是为金国,凡百年。国朝发迹大漠,取之,士大夫死以十百数。自古国亡,慷慨杀身之士,未有若此其多者也。於乎!中州礼乐文献所在,伏节死谊,固出于性情也哉!彼其人,固知天命所在,宁轻一死而不顾,吾知其感于中者深矣!及余来中州,追其哀愤之遗意,将次序其事以待来世。已七八十年,故老莫有存者,简册无所于徵,未尝不为之流涕而太息也。间从将相故家,窃问世祖皇帝初时事,云当时豪杰不死者,莫不起为世祖用,不起者竟老死,然其才皆足以用于世。於乎!此其不轻于一死者,固亦非浅丈夫也。盖以是知世祖之圣神无敌于天下矣!大德七年夏,兵部员外郎、彰德田君师孟,缉其先友手翰为一卷,使余为之序。余读其辞而悲之。盖其愤郁哀壮,称余所谓豪杰者多在是。杨弘道字淑能,淄莱人。王磐字文炳,东平人。姚枢字公茂,中书左丞,谥文献。徒单公履字云甫,女真人。高鸣字雄飞,太原人。张豸字义夫,彰德人。赵复字仁卿,楚人。杨云鹏字飞卿。阚举字彦举,关东人,不羁,诗有律。刘百熙字善甫,燕人。平玄字浩然,真定人。郭可畀字仲通,浑源人。杨果字正卿,中山人。薛玄字微之,洛阳人。曹居一字通甫,燕人。杜仁杰字善甫,济南人,善谑。赵著字光祖,燕人,大侠。张朴字孝纯。田文鼎字仲德,衍之先君子也。史匪者,其邻人。诗文总八十五。衍,师孟名。六月庚戌,西蜀虞某序。

作为由江南来日下出任大都路儒学教授的虞集,这篇文字等于“述职报告”。这是一幅统观全局的“文化地图”,一部文化遗产的“清册”。其中一些人已经“遗失”在流逝岁月中,但整体读之仍然有其由此及彼的关照感。

睢景臣从维扬到杭州,与钟嗣成相识①。

睢景臣,又作睢舜臣,字景贤,又作字嘉贤。扬州(今属江苏)人。自幼读书勤奋,致使视力受损而成近视。今存套曲3套(据《全元散曲》)。另作杂剧3种,均不传。他的套曲〔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由8个支曲组成,实际是一部微型戏曲。高祖还乡,是元曲中热门题材,白朴、张国宾都写过这一内容的杂剧。据《录鬼簿》卷下,“维扬诸公俱作高祖还乡套

---

① 据《全元散曲》睢景臣小传系年。

数"，只有睢景臣的"制作新奇"，以致在这次同题制曲的文会上，共推睢景臣制作为第一，其他的"皆出其下"。

台州大旱，陈孚举报负责赈灾的脱欢察儿不法蠹民事，并坐其罪。

江浙行省令浙东元帅脱欢察儿赈济饥民，脱欢察儿怙势渎职，置灾情于不顾。陈孚上书告脱欢察儿不法蠹民事十九条，上司坐其罪，台州灾民赖以得救，而陈孚却因此致疾。后卒于家。

陈孚（1259—1309），字刚中，号笏斋。台州临海（今属浙江）人。至元中，以布衣上《大一统赋》，江浙行省转闻于朝，署上蔡书院山长。考满，谒选京师。至元二十九年，以翰林编修为副使出使安南。使还，除翰林待制，在朝他与冯子振常发生意见分歧，为廷臣所嫉，出为建德路总管府治中。秩满，请为乡郡，特授台州路总管府治中，所任皆有善政。以疾归。陈孚为诗文，大抵任意即成，不事修饰。有《陈刚中诗集》三卷，即《观光稿》《交州稿》《玉堂稿》各一卷。《观光稿》为元世祖至元年间陈孚以布衣身份上《大一统赋》，江浙行省奏闻于朝，署上蔡书院山长，考满谒选京师时所写的诗。《交州稿》为至元二十九年陈孚以翰林编修摄礼部郎中，为梁曾的副使，出使安南的往返之作。《玉堂稿》为陈孚自安南使还，擢翰林待制之后所写的诗篇。诗多为纪行之作，是陈孚的特点。三卷存诗不多，然而眼界与心胸都不同凡俗，特别是与南宋游走江湖的游士所作，迥不相同。

金履祥去世。享年七十二岁。

金履祥（1232—1303），初名金祥，更名金开祥，后以开祥非学者名，又改履祥，字吉父，学者称"仁山先生"。婺州（浙江金华）人。初事同郡王柏，又入何基门，遂传朱熹之学，为一代名儒。宋德祐初授史馆编修，力辞不就。宋亡，屏居金华山中，晚年讲学于丽泽书院，在金华一郡学术传承上，居有承前启后的位置。著有《仁山集》四卷，附编一卷等。并选辑《濂洛风雅》。

邓剡去世。享年七十二岁。

邓剡（1232—1303），字光荐，号中斋；一作名光荐，字中甫。庐陵（江西吉安）人。南宋景定三年（1262）进士，历官礼部侍郎、权直学士，为赞募勤王，携家入闽广，一家十二口死于大火。曾随驾厓山，厓山兵溃，数次投海，辗转不死。元将张弘范致之，待之以礼，一再请求出家为僧道，均未如愿。与文天祥一同押送大都，途中许为黄冠，便出家于建康。在宋元

之际与文天祥唱和，时名颇大。有集，但未流传至今。

张伯淳去世。享年六十一岁。

张伯淳（1243—1303），字师道，号养蒙先生。嘉兴崇德（浙江桐乡）人。宋末应童子科，中选，不久又举进士，仕为太学录。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以荐授杭州路儒学教授，迁浙东道按察司知事，后擢福建廉访司知事。至元末元世祖召见，询问冗官、风宪等当时重大问题，所对称旨。本拟重用，但张伯淳固辞，遂授翰林直学士。大德五年扈从上都。卒，谥文穆。张伯淳与赵孟頫、邓文原交往密切，与程钜夫、鲜于枢亦为文友，是元代前期有一定影响的江南文士。有《养蒙集》十卷，系后人访求遗文编成。时人颇重视其文，虞集将其比做汉代贾谊，邓文原则比做唐代陆贽。对于他的诗，顾嗣立、王士禛均执批评态度。顾嗣立说："师道古诗，语意肤浅；近体率皆应酬之作，全篇殊不足观，而佳句颇多。"

大德八年甲辰（1304）

春。西域人辛文房编著的《唐才子传》十卷成书。

辛文房，字良史。西域人，入居中原后占籍豫章（江西南昌）。早年求学江南，到大都后与王伯益、杨载交往密切。皇庆、延祐间，为翰林编修。杨载有《元日早朝次韵辛良史》（《杨仲弘诗集》卷七）诗。又曾回豫章归省，贡奎赋诗送别（《云林集》卷二）。泰定元年前后任省郎。辛文房诗集名《披沙集》，马祖常《题辛良史披沙集》（《石田集》卷二）中说"悠悠古今意，落落短长歌"，"吟边变余发，萧飒是阴何"，直以南朝诗人阴铿、何逊相比拟。《披沙集》今已不存，《元文类》《永乐大典》中有佚诗。辛文房著《唐才子传》十卷，成于大德八年。《唐才子传》是元人重要的诗学著作，据辛文房《唐才子传引》，是书作于"端居多暇"之时，"传成凡二百七十八篇，因而附录不泯者，又一百二十家"，论列唐五代作家约四百人。原书自明初即已不传，清人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成八卷；清末在日本发现了元刻十卷本，又返传中国。

江浙具有影响力的文人戴表元出任信州儒学教授。

戴表元仅仅做了一届（三年）的教官。大德十年从信州任满而归，再调

婺州教授，以病辞不就。在元初的闻人中，他是比较低调的一人。

虞集与在翰林院任职的袁桷成为知交，以他们为核心，大都先后聚集了一群馆阁文人。

自赵孟頫等陆续入京，大德后期大都文坛已经成为接纳精英人物的场所。在接近四十年之后写的《为从子旦题所藏予昔年在京写冬窝赋手卷后》（《道园类稿》卷三十五）中，虞集回忆说："大德中，予始至京师，海宇混一之余，中外无事，中朝公卿大夫士，敦尚忠厚，雅好文学，四方名胜萃焉。四明袁公伯长在翰苑，最为相知。济南潘君仲德，同为国学博士。甲辰乙巳，回首几四十年，而二公修文地下，已二十载矣。"所谓"济南潘君仲德"，是指潘宗佑，当时在国子博士任上，皇庆元年就去世了。

仇远年近六旬，任溧阳州儒学教授，诗是他解脱自我的工具。



仇远用过的印章。印文是"山村仇远仁近""山村民""躬行斋"。

仇远于宋亡之后寓居杭州，后为生活计，出任镇江路学正，本年，迁任此职。在溧阳州儒学教授任上，他写的《自叹》诗道："休言五十九年非，本自无知底用疑。以往方来俱梦境，是非元不较毫厘。"无条件接受现实，使他略感轻松。《言怀》（九首七言绝句）则是为自己准备的解释之词，低调是必然的，但溧阳的任期对仇远至关紧要。他的文集就名为《金渊集》，金渊，是溧阳古称。

《言怀》九首（《金渊集》卷六），表述"身在溧阳，心在西湖"的隐衷。诗云：

辛苦移家向溧州，微官只为斗升谋。寻思终是西湖好，且与山僧野老游。

奉溪半日到杭城，溪外青山喜送迎。结屋临溪差易事，买山无计若为情。

湖光门外草连空，万壑千崖紫翠丛。纵使便能营隐墅，也须先画作

屏风。

白岭溪上野田平，黄陇山前竹树清。已许数椽容小住，余英爱我爱余英。

故家乔木尽丘墟，笋石犹存十数株。谁有挟山超海力，为分云片过西湖。

此地曾经李白游，湖山消得好诗留。两桥十里东西市，只欠春风一酒楼。

溧尉唐时本小官，诗人争笑孟酸寒。我来莫道儒官冷，今古酸寒只一般。

隔岸修筠拂细澜，风香雨色昼阴寒。遥知新买栖霞地，坡上应添竹数竿。

马蹄赤日走红尘，汗湿林宗折角巾。输于夷山班博士，深衣脱却作闲人。

在其中几首诗的末尾，各有自注，其八的自注说："去年新得西湖北山地，多有竹。"仇远曾执高克恭《山村图》，求人资助建山村隐居，但仍然未能解决生计问题。只有出任了溧阳学官，才了却夙愿，在栖霞买地筑宅。

元代较早编辑的当代诗文总集《天下同文》序刊。

诗文总集而名为《天下同文》，可见当时的舆论取向。《天下同文》，周南瑞辑。今本原题《天下同文前甲集》，可以想见原来的设计规模相当庞大，因仅有这一集传世，所以常省称《天下同文》。甲前集原共五十卷，但今存各种传本都有残缺，一般缺失六卷。卷首有大德八年刘将孙序，《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其序"潦倒浅陋，似乎依托"，但可以认定本书编成于本年。五十卷中包括诗文词等文体的作品，特别是收录了制诰、表笺、献书等文章。目录后，有"随有所传录"、"陆续刊行"两行文字，这是元人刊刻总集一般都要作的告示。《四库全书总目》说："其体例与今时庸陋坊本无异，可以概见也。"但本集是目前所见的编刊时间最早的元代文学总集，所收诗文多未见于他书。

《天下同文》辑刊者周南瑞，字敬修，庐陵（江西吉安）人。乡贡进士。《四库全书总目》评周南瑞说"其人盖好趋附高名者"。

王恽去世。享年七十八岁。

王恽（1227—1304），字仲谋，号秋涧。卫州汲县（今属河南）人。祖

上仕于金。王恽好学善属文，早年受知于元好问，与东鲁王博文、渤海王旭齐名，并称“三王”。史天泽一见即待以上宾礼，中统元年，左丞姚枢辟为详议官，上书论时政，擢中书省详定官。中统二年春，转翰林修撰，又兼中书省左右司都事。至元五年首拜监察御史，知无不言，不避权贵。至元十四年任翰林待制。至元十八年拜行台治书侍御史，未赴职。次年春，改山东诸道提刑按察副使，在任一年，以病还乡。至元二十六年授福建闽海道提刑按察使，有治绩。至元二十八年召至京师，次年春，见元世祖于柳林行宫，上万言书议时政，授翰林学士，元贞元年，奉旨修世祖实录，集《圣训》六卷。大德六年致仕。卒，追封太原郡公，谥文定。王恽以才干见称，尤好著述。有《秋涧集》一百卷，包括《中堂事纪》《乌台笔补》等及诗文，今存。是元初诗文大家，文章受到元好问影响，作诗笔力雄浑。顾嗣立说：“秋涧诗才气横溢，欲驰骋唐宋大家间。然所存过多，颇少持择，必痛加芟削，则精彩愈见。”（《元诗选》王恽小传）《秋涧集》中的《承华事略》二卷、《玉堂嘉话》八卷，均有单行本。内容庞杂是《秋涧集》缺点，也是特点，因之保存了丰富的元初史料。其词清人朱祖谋编入《彊村丛书》，题为《秋涧乐府》四卷。还著有《相鉴》五十卷，《汲郡志》十五卷，今均不传。

大德九年乙巳（1305）

五月三日（戊申）。徵陕西儒学提举萧𣂏赴阙。

据《元史·成宗本纪》：在下达诏书的同时，元廷“命有司给以安车”。此前，荐授萧𣂏陕西儒学提举，但一直未赴职。

七月八日。方回写《学诗吟十首》，提前为一生作总结。

这一年，方回年近八十。《学诗吟十首》[1] 是一组五言古诗。在诗中他自云“学诗六十载”，“平生万首诗”。与此同时，他又作《诗思十首》，这是一组五言律诗。《诗思十首》序云：“年甫弱冠而学吟诗，新春将八十矣。凡用六十年之工夫，仅至此地。俗人不识，晚近不知，自记厥事凡十。”在十首诗中，他倾吐出自己对杜甫等前贤的仰慕，与《瀛奎律髓》相比，《学诗吟十首》《诗思十首》并不多余。

① 《学诗吟十首》与《诗思十首》，均见《桐江续集》卷二十八。

大德十年丙午（1306）

春。王沂孙寓居赤城山中。

王沂孙，字圣与，号碧山，又号中仙、玉笥山人。会稽（浙江绍兴）人。宋元之际与周密、唐珏等人以诗词唱和，元初曾出任过庆元路儒学正，但一般仍把他视为宋代遗民词人。卒于张炎去世之前。有词集《花外集》（又名《碧山乐府》）行世。他的〔一萼红〕词，题目是《丙午春赤城山中题花光卷》，花光，是北宋释子，以画梅花著名。

十月三日。戴表元以《陈晦父诗序》一文，论述了南宋末年的科举与诗不可兼得的矛盾。

《陈晦父诗序》（《剡源集》卷九）实际是文人在新朝对前朝作的评判。诗序说："世多言唐人能攻诗。岂惟唐人，自刘项、二曹父子起兵间，皆能之，无问文士。至唐乃设此以备科目，人不能诗，自无以行其名，故不得不攻耳。近世汴梁、江浙（按：指北宋与南宋。）诸公即不以名取人，诗事几非。人不攻诗，不害为通儒。余犹记与陈晦父昆弟为儿童时，持笔橐出里门，所见名卿大夫，十有八九出于场屋科举，其得之之道，非明经则词赋，固无有以诗进者。间有一二以诗进，谓之杂流，人不齿录。惟天台阆风舒东野及余数人辈，而成进士早，得以闲暇习之。……久之，科举场屋之弊俱革，诗始大出。"

戴表元是在科举兴废问题上持现实态度的人。将元初诗歌未因南宋亡国衰落，反而意外普及，归结于文人无所用心，不得不将全部精神放在诗文写作上，这些话非戴表元不能言。

庐陵凤林书院辑刊《名儒草堂诗余》。

元词总集《名儒草堂诗余》三卷，又名《元草堂诗余》或《续草堂诗余》。是因南宋何士信有宋词总集《草堂诗余》四卷刊行在前，故名。本书卷首有版铭："唐宋名贤词行于世，尚矣。方今车书混一，名笔不少，而未见之刊本，是编辄欲求备不可，姑摭拾所得，才三百余首，不复次第，刊为前集。江湖宽大，俊杰何限。傥有佳作，毋惜缄示，陆续梓行，将见愈出而愈奇也。"比《天下同文》的"随有所传录"、"陆续刊行"要诚恳具体，口气已经与《皇元风雅》等书颇相近，看来是当时选本的通例。一般认为，书中

收录的都属于至元、大德之间诗人。

十二月。卢挚作《玩鞭亭》诗。

路经安徽芜湖玩鞭亭古迹，卢挚赋诗一首，并在当地刊刻上石。这是卢挚仕宦生涯中较晚的经历。

卢挚，字处道，号疏斋，又号嵩翁。登封颍阳（今属河南）人；一说涿州（河北涿县）人。博学工诗文，以诸生受元世祖赏识，任侍从之臣，出为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使，历江东道副使（寻改廉访使）、河南路总管，入为集贤学士，不久又改岭北湖南道廉访使。元成宗大德年间，召为翰林学士，进承旨。晚年寓居宣城。是元代前期影响颇大的散曲家、诗文家，《录鬼簿》列名于“前辈名公”节，《太和正音谱》列名于俱是杰作一百五十人中。贯云石《阳春白雪序》曾评其作：“近代疏斋妩媚，如仙女寻春，自然笑傲。”今存小令120首（据《全元散曲》），除张可久、乔吉，在元人中今存小令最多。作品不仅数量多，而且题材广泛，几乎涉及元曲家写过的所有领域。原有诗文集《疏斋集》，今佚。所作《文章宗旨》是元代重要的文论著作。

据卢挚散曲，可知他与艺妓交往颇多。仅见于小令题目的就有杨娇娇、江云、朱帘秀、刘蕙莲等，这些作品大都写于后期。

胡次焱去世。享年七十八岁。

胡次焱（1229—1306），字济鼎，号梅岩，晚号余学。婺源（今属江西）人。少孤贫，力学。南宋咸淳四年（1268）进士，授贵池县卫，元军南下，池州举城降，胡次焱间道微服还家。元初不仕，以《易》教授乡里，从学者常达百人。有《梅岩集》十卷。

邓牧去世。享年六十岁。

邓牧（1247—1306），字牧心，号三教外人，学者称“文行先生”。钱塘（浙江杭州）人。早悟，十余岁下笔即追古作者。宋亡，绝意仕进，历览名山。元贞二年，被延至山阴陶山书院，大德三年还钱塘，隐居洞霄宫。有《伯牙琴》一卷，《洞霄图志》六卷。

袁易去世。享年四十五岁。

袁易（1262—1306），字通甫。长洲（江苏苏州）人。父亲袁枢曾仕于宋。袁易不乐仕进，而有时名，部使者见到他，十分赏识，要把他举荐给朝廷，因他力辞而罢。江浙行省委任为徽州路石洞书院山长，任期一满，他就

辞归故里，再不出仕。在住宅中修了一间居室，名为静春堂；藏书万卷，都经过亲手校订。赵孟頫曾为他画《卧雪图》，以其比做汉代高士袁安，并称他与龚璛、郭麟孙为“吴中三君子”。有《静春堂诗集》四卷，结集于延祐至治间，是较常见的元人别集。



袁易用过的印章。

大德十一年丁未（1307）

夏。汪炎昶以《次韵竹米》诗，作为每逢丙午、丁未之际即出现饥荒的纪实。

是年，江西波阳大饥，民以竹实为食。父老相传，逢丙午、丁未必遇饥荒，也就是说，饥荒以六十年为一轮回。《次韵竹米》（《古逸民集》卷一）诗前有长序云：

> 父老相传，前丙午、丁未皆大饥。今大德丁未夏，仍丙午之饥，民用困甚。自里之南入穷山，处处皆有竹实，始或采以自给，卒转相告，无老稚毕往，日至数千百人，涉旬乃已。其竹甚细，野人呼为“苦油竹”。露苞攒绿，既实而槁，实圆大，色深紫，酷侔麦粒，凿则灿如，可淅可糜，气味宛类赤小豆，或屑为汤饼。自穷源迤逦而东北，逾修宁界，民得之尤多。通计户与丁日采不下三千石，民赖以安。而壤与衢接，彼数未预也。或云方麦熟时，其实正蕃，至是所得才十二三耳。聊因暇日，次石卿江先生韵，因并纪其事云。

饥荒如同传染，本年由江西波及浙江。在汪炎昶另一首《记蝗》（《古逸民集》卷一）的诗序中，则写出这次灾难的后遗症。三年后的夏天，异常蝗灾又置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至大己酉，江浙大饥，疫死者众。自徽衢以南，则稍安，然多艰食。明年夏六月，有蝗自东北蔽天而南，其稍迟回于此者，惟食野草及竹叶、粟苗而已，禾黍无大伤也。”《记蝗》诗则是天灾的记录：“饥疫灾方息，飞蝗又作群。搅空吹密雪，障日度轻云。濒死欣才脱，偷生骇乍闻。分官严捕瘗，吏卒日纷纷。”

在溧阳已经四个年头的仇远，倦仕思归，写出十四首五言古诗，并约请溧阳的文友同赋。

这一组诗的题目是《予久客思归以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归意浓为韵言志约金溧诸友共赋寄钱唐亲旧》（《金渊集》卷一）。第一首开篇即云“自我来溧阳，四见木叶秋”。此后不久他就交卸了职务，回到杭州，终于卸下思想负载。

王构作《修辞鉴衡》二卷。

本年王构在济南总管任上。《修辞鉴衡》卷首有元人王理至顺四年序。序中说，《修辞鉴衡》是王构在济南路总管任上，门人刘氏向他学习作文之法，王构“教之为文，出书一编，即此书也”。书中主要汇集宋人论诗之说，与王构至元十三年前往江南搜集保存典籍之行有关。其中有不少内容出自已经不存的论诗著作。

李直夫出任湖南宪使。

元明善《清河集》[①] 有《送湖南李直夫宪使》《寄直夫》二诗。李直夫的年辈应与元明善（1264—1322）差不多。他在世时，距金亡国已经有六七十年，是入元的第二代或第三代女真人。

《送湖南李直夫宪使》诗云：“君去湖南我上京，思君欲见又芜城。沧波留月能归海，江雁托云不到衡。一代豪华谁识远，百年惊畏护灵名。好来不做男儿事，有水有鱼山可耕。”

据此诗，李直夫出任湖南宪使（即肃政廉访使），时在大德末[②]。诗中含有归隐之意。

李直夫是元代多产的女真族杂剧作家，生平事迹所知不多，主要出自《录鬼簿》。关于李直夫，《录鬼簿》主要版本著录基本相同。卷上“前辈才人有所编传奇于世者五十六人”，列有李直夫，说明他年辈较早。同时指出：李直夫是“女直（女真别称）人。德兴府住。即‘蒲察李五’。”[③] 著有杂剧11种。就作品数量看，在元曲家中是中等的。天一阁本《录鬼簿》的贾仲明补写的〔凌波仙〕曲[④]吊李直夫云：

---

① 元明善《清河集》原本早佚，今本是近人缪荃孙所辑，诗见卷二。

② 此从孙楷第《元曲家考略》的考证。

③ 天一阁本《录鬼簿》的这段文字是“李直夫。德兴人。女直郎蒲察李五”。文意亦通。

④ 这些〔凌波仙〕吊曲的始作者是钟嗣成，贾仲明不过是补做了钟嗣成未写出的吊曲。

蒲察李五大金族，邓伯道，夕阳楼，劝丈夫。虎头牌，错立身，怕媳妇。谏庄公，颖考叔。俏郎君，谎郎君，各自乘除。淹蓝桥，尾生子，教天乐，黄念奴，是德兴秀气直夫。

除第一句和最后一句，全曲逐一列出李直夫所写的杂剧。据《录鬼簿》著录，李直夫所作杂剧是：《歹斗娘子劝丈夫》《邓伯道弃子留侄》《风月郎君怕媳妇》《俏郎君占断风月》①《颖考叔孝谏庄公》《尾生期女淹蓝桥》《便宜行事虎头牌》《谎郎君坏尽风光》《宦门子弟错立身》《念奴教乐府》《晏叔原风月夕阳楼》②。今存仅有《便宜行事虎头牌》（简称《虎头牌》），《邓伯道弃子留侄》则有残曲。



《虎头牌》插图。出自《元曲选》。

历代曲评家将《便宜行事虎头牌》视为元杂剧重要作品。它的内容是：女真人山寿马幼孤，由叔叔银住马抚养成人。后屡立奇功，钦赐虎头牌，得便宜行事。银住马贪酒误事，按法当诛。银住马立功抵罪，山寿马杖而释之。事后，山寿马亲叩叔门，负荆请罪。是比较少见的女真文化背景的剧本。杂剧第二折由17支单曲组成，叫做"十七换头"，这一折可以视为作者独特风格的范例。明人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三十七）提到："李直夫《虎头牌》杂剧十七换头，关汉卿散套二十换头，王实甫《歌舞丽春堂》十二换头，在双调中别是一调。排名如〔阿那忽〕、〔相公爱〕、〔也不罗〕、〔醉也摩挲〕、〔忽都白〕、〔唐兀歹〕之类，皆是胡语，此其证也。三套中惟十七换头，其调尤叶，盖李（直夫）是女直（即女真）人也。"

李直夫"十七换头"的〔风流体〕支曲写道：

① "风月"，庄一拂《古典戏剧存目汇考》作"风光"。

② 不同版本的《录鬼簿》所录李直夫所作杂剧均为11种，《太和正音谱》是12种，多出一种《火烧祆庙》。王季思主编《全元剧曲》李直夫小传说："《录鬼簿》录其所作杂剧十二种"，似不确。

我到那春来时春来时和气暄，若到那夏时节夏时节熏风变。我可便最怕的最怕的是秋暮天，更休提腊月里腊月里飞雪片。

谈到的是四季天气变化，但衣物缺乏，实则是在开导踌躇满志的弟弟银住马不要得意忘形。

石抹继祖代其父石抹良辅出任沿海上万户府副万户之职，石抹良辅退居台州。

石抹良辅，契丹述律氏，即萧氏。大宁（辽宁凌源）人。曾祖石抹也先率先归附蒙古，以奇计袭取金东京（辽宁辽阳），又随大军下北京，统率的精锐部队号称“黑军”，有一万二千人，石抹也先临敌中石而卒于军前。石抹良辅继统“黑军”南下攻宋，历蔡州弩军万户、黄州招讨使，迁沿海副都元帅，官终沿海上万户府副万户。以诗文知名于时。

石抹继祖（1281—1347），字伯善，号北野兀者。寓居台州（今属浙江）。与泰不华为邻，以长女嫁给泰不华。黄溍评述石抹继祖说：“乐台州山水之胜，买田筑室而居焉。扁宴休之所曰‘抱膝轩’，雅歌赋诗以自娱，家事付之诸子，一无所闻。更自号太平幸民。”“所著《抱膝轩吟》若干卷，清新高古，有作者风。”① 有《节斋集》《抱膝吟》《世美集》等数种别集行世，但罕见传本，《永乐大典》残帙之中存诗20首。这些诗《永乐大典》误归之其父石抹良辅。《永乐大典》卷二二六二有出自“石良辅节斋吟稿”的《东湖席上呈史药房》，而石抹继祖神道碑则说：“公初从昭毅公（按：指其父石抹良辅）在四明，师事前进士史先生蒙卿。先生殁，公为治葬，且割田以祭焉。”《永乐大典》卷一四三八三有出自“石抹世美集”的《寄兼善秘卿》，所谓兼善秘卿，即泰不华，而泰不华则是石抹继祖的长女之婿。所以，《永乐大典》中这些署“石抹良辅”的诗②，实是其子石抹继祖所作。

龚开去世。享年八十七岁。

龚开（1221—1307），字圣予（一作圣与），号翠岩，又号龟城叟。淮阴（今属江苏）人。早年与陆秀夫同居广陵幕府，景定间为两淮制置司监管官。

---

① 见黄溍《沿海上副万户石抹公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十七）。

② 据《永乐大典索引》，今存《永乐大典》之中，有石良辅《节斋集》、石良辅《节斋吟稿》、石抹良辅《抱膝吟》、石抹良辅《世美集》等几种诗集之名。石良辅，应即是石抹良辅，以其名的第一字为汉姓，是元人华化惯例。



元杂剧中的李逵戏特别多，仅高文秀就写过八部。但这也证实，元杂剧离《水浒传》的成书还有相当长的距离。

南宋亡，隐居吴中，以画自给，家益贫，至无几席。宾客造访，每令其子龚浚伏榻上，就背按纸作唐马图，一持出，辄以数十金易去。读书为文，能成一家，画马专师曹霸，尤工诗文及古隶。著有《龟城叟集》一卷。在元初，他的《宋江三十六赞》是《水浒传》从史传的片断文字演变为小说，使历史往事重回民间的中间站。可以说，整个元代都是《水浒传》的预热期，《宋江三十六赞》则为这一时期确实存在提供了证据。

《宋江三十六赞序》（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说：

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余年少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以未见信书载事实，不敢轻为。及异时，见《东都事略》中载侍郎侯蒙传有书一篇，陈制贼之计云："宋江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有过人，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此自赎，或可平东南之乱。"余然后知江辈真有闻于时者，于是即三十六人，人为一赞，而箴体在焉。盖其本拨矣，将使一归于正，义勇不相戾，此诗人忠厚之心也。余尝以江之所为虽不得自齿，然其识性超卓，有过人者。立号既不僭侈，名称俨然，犹循轨辙，虽托之记载可也。古称柳盗跖为盗贼之圣，以其守一至于极处，能出类而拔萃若江者，其殆庶几乎？虽然，彼跖与江，与之盗名而不辞，躬履盗迹而无讳者也。岂若世之乱臣贼子，畏影而自走，所为近在一身，而其祸未尝不流四海。呜呼！与其逢圣公之徒，孰若跖与江也！

在《朴通事谚解》中，曾提到《宣和遗事》[1]，并以其与《西游记平话》并列，可以说，《水浒》故事，与《三国》（魏晋）、《唐僧西游取经》（唐初）相比，是发生年代与元朝最接近的一种，又是成型相当漫长的一种。《宋江三十六赞》是宋江与其伙伴首次集体亮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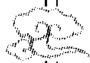
荣肇去世。享年八十二岁。

荣肇（1226—1307），字子兴。盐官（浙江海宁）人。宋末不求仕进，入元，隐居乡里，元成宗召至京师，补国子监助教，进祭酒。在任三年，以年老告归，卒于家。有《荣祭酒遗文》一卷。

方回去世。享年八十一岁。

方回（1227—1307），字万里，号虚谷，别号紫阳山人。徽州歙县（今属安徽）人。宋理宗景定三年（1262）登进士第，历官提领池阳郡茶盐。初媚贾似道，后贾似道兵败鲁港，方回又首先上书论其罪当斩，时论壮之。知严州。元兵至，不战而降，被元任命为建德路总管。不久罢官，徜徉于杭歙间。晚年崇尚道学，学宗朱熹。在元初诗文名颇大，论诗专主江西派，倡"一祖三宗"之说。著有《桐江集》四卷、《桐江续集》三十六卷、《文选颜鲍谢诗评》四卷、《虚谷闲钞》一卷、《续古今考》三十七卷以及《瀛奎律

[1] 《朴通事谚解》（韩国《奎章阁丛书》影印本）第353页引据说："《宣和遗事》云：宣和七年十二月，有神降坤宁殿修神，保观神。保观者乃二郎神也。都人素畏之。"



髓》四十九卷。

连文凤卒于大德年间。

连文凤，字百正，号应山。三山（福建福州）人。宋末经历不详，入元参与月泉吟社的“咏春日田园”徵诗，以“罗公福”为化名夺魁。作《庚子立春诗》，有云“又逢庚子岁，老景对韶华”，是大德四年庚子尚在世。其集久佚，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连文凤《百正集》三卷。



【元武宗】



建元：至大（四年）



至大元年戊申（1308）

元旦。贯云石作套曲〔新水令〕《皇都元日》。

大德末，贯云石放弃了世袭的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军职，来到家族聚居地——大都畏吾村。很快他就融入了皇都的生活，并受到元武宗、特别是他的“太子”（兄弟与谋主）元仁宗的赏识，元武宗登基并改元，他作《皇都元日》相庆。这套〔双调·新水令〕应是为元旦朝会定制的曲词。全套写道：

郁葱佳气蔼寰区，庆丰年太平时序。民有感，国无虞。瞻仰皇都，圣天子有百灵助。

〔搅筝琶〕江山富，天下总欣伏。忠孝宽仁，雄文壮武。功业振乾坤，军尽欢娱，民亦安居。军民都托赖着我天子福，同乐蓬壶。

〔殿前欢〕赛唐虞，大元至大古今无。架海梁对着擎天柱，玉带金符。庆风云会龙虎，万户侯千钟禄，播四海光千古。三阳交泰，五谷时熟。

〔鸳鸯煞〕梅花枝上春光露，椒盘杯里香风度。帐设鲛绡，帘卷虾须。唱道天赐长生，人皆赞祝。道德巍巍，众臣等蒙恩露。拜舞嵩呼，万万岁当今圣明主。

贯云石的经历颇典型：出世与入世，只在一念之差。

正月上元。胡琦为自己编著的《新编关王事迹》作序[①]。

胡琦《新编关王事迹》五卷，实际是关羽汇传。包括八图：神像图、世系图、年谱图、司马印图、寿亭侯印图、大王冢图、显烈庙图、追封爵号图。“又广览载记，采事摭实，析作四门：曰灵异，曰制命，曰碑记，曰题咏。”胡琦在序中追溯写作缘起，说：“予初读《三国志》，至《汉寿亭侯关壮缪传》，未尝不释卷而叹，想见其为人，而哀其志之不得伸也。后在当阳访求章乡侯死所，每过之尚凛凛如生，未尝不徘徊瞻顾，慨然感动，而嘉其大节之不可夺也。尝谓汉中平已后，天下大乱。曹操迁天子于许都，孙权擅土地于江表，二人用心可知矣。是时群材并出从而附之者，莫非汉臣。汉危不扶而佐魏吴倾覆之人，迹其所为，遗臭天下后世。孰若云长大勇愤发，心不忘义，事汉昭烈，誓同生死。守荆州九年，贼畏之如虎。讨樊之举，鼓忠义之气，破奸雄之胆，不可谓壮哉。惜乎事机垂成，祸生于所忽，乃守其志，终始不回。卓然为汉忠臣，独见称于后世。庙食玉泉，至今不绝。四方祈谒，灵应如响，不亦盛乎。及考其事迹，本末具存。国志所不载者，散在众籍。文字交错，难用检寻，览之者不无病焉。而世俗所传，道听途说，鄙俚怪诞，予窃笑之。故尝有刊正之志，而未能也。旧令尹孙君吉甫，燕山之彦也，好古而文。大德丙午过予漳滨，问三国所以兴亡，又问云长成败之由，及玉泉灵显之迹。予一一据实以对。吉甫甚喜，且曰：‘先生盍裒为一家之书？’予应之曰：‘此仆本心也，不敢以愚浅辞。’于是退而具草，以本传为主，旁搜前史，互阅故书，校其同异差次而推衍之，编为实录。其文则因于旧，其事则详于前。乃因而论之，以备遗亡。”“积年而后成，立名曰《关王事迹》，凡五卷。别为《玉泉志》三卷，以附于后。”

正是这一系列的“英雄崇拜”之积累，忠奸正统之辨驳，胡琦将“三国”故事，从史册剥离，汇集了民间“情绪”而走向小说。

二月。贯云石《孝经直解》问世[②]。

返回大都，贯云石将《孝经直解》进呈给当时的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元仁宗）。本书采用图文并茂方式，用元代口头语言解释儒家经典，对于普及经典，传播文化，便利母语非汉语的蒙古色目人研习汉语语体文，都有示

① 胡琦《新编关王事迹序》，见〔雍正〕《山西通志》卷二一二。

② 贯云石《孝经直解》的自序署：“时至大改元，孟春既望，宣武将军、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小云石海涯、北庭成斋自叙。”

范作用。

元代重视《孝经》。至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中书省设立大司农司的“条画”中说：“今后每社设立学校一所，择通晓经书者为学师，于农隙时月，各令子弟入学。先读《孝经》、小学，次及《大学》《论》《孟》经史。务要各知孝悌忠信，敦本抑末。”① 至大元年孟春，贯云石序刊自己所著《孝经直解》，并进呈东宫，“称旨，进为英宗潜邸说书秀才，宿卫御位下”（欧阳玄《贯公神道碑》②）。

除了贯云石《孝经直解》，此后不久，钱天祐也著有《孝经直解》，不过，流传至今的只有贯云石《孝经直解》。这是元代较早的一种上图下文的“连环画”式的“图文书”，说明文字，使用的是当时的白话文，这对于了解“图文书”的刻板、白话文在元代的流行，都有特殊价值。这一形式与内容，开始很重要的一点是为了便利当时的蒙古色目人，而创制《孝经直解》则是明证。

但元代重视孝道也有副作用。《孝经直解》是对儒家经典《孝经》的译解。作为一种提倡，上行下效，势所难免。早在至元三年，元廷为此就明令“诸为祖父母、父母、伯叔姑、舅姑割肝挖眼、割臂脔胸之类，并行禁止”③。就在《孝经直解》刊行几年后，延祐元年，竟出现了极端恶劣的一例：保定路清苑县安圣乡军户张驴儿，为父张伯坚患病，割股行孝。只有一子舍儿三岁，为侵父食，抱于祖茔内活埋。为此，中书礼部重申：“本部议得：割股毁体，已常禁约。张驴儿活埋其子，诚恐愚民仿效，拟合遍行禁约。都省准拟。”④ 这种畸形的孝，在元代的诗文与词曲中都不难见到。两性关系的“放松”，与孝道的宣扬力度加大，是鲜明的对照。孝成了元代文学的一个流行主题，一种推动力。关汉卿杂剧《窦娥冤》等以及其他许多作家的杂剧，都是由孝行作为故事进展的契机。

元代民间素有所谓“二十四孝”之说，并成为童蒙读物的主要内容之一。一种上图下文的“连环画”式的诗集，是郭居敬《全相二十四孝诗选》。《全相二十四孝诗选》除了是“图文书”，而且还是诗歌“题咏”的新式样。借助文学与艺术来推行教化，倒没有忽略民间。

郭居敬，字仪祖。延平路尤溪（今属福建）人。博学好吟咏，与其兄郭仲实俱以诗知名乡里。生性至孝，曾辑大舜以下古人孝行事迹，咏之以诗，

① 《通制条格》卷十六“农桑”节。

② 欧阳玄《圭斋集》卷九。

③ 《通制条格》卷二十七“非理行孝”节。

④ 《通制条格》卷二十七“非理行孝”节。

上图下文，编成《全相二十四孝诗选》，用为童蒙读物。又有100首七言绝句咏物诗，以“香”字为韵，题作《百香诗》，行于世。虞集、欧阳玄等欲荐之馆阁，终未果。所作不见于今天存世的元诗总集，这可能是因为他太“贴近”民间。但《百香诗》与《全相二十四孝诗选》均有传本。明人杨士奇《文渊阁书目》卷十，著录有郭居敬《百香诗》，并云“一部一册。阙。”但今存《永乐大典》残帙未见引称。龙谷大学藏有《百香诗》的日本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明洪武刊本《全相二十四孝诗选》，存诗仅有20首。《全相二十四孝图诗选》是仅见的用作童蒙读物的诗文图合璧的书籍，但当时这一定相当普及。

七月[①]**。李京以吏部侍郎衔奉使安南，程钜夫、姚燧、袁桷等人都撰文送行。**

李京，字景山，号鸠巢。河间（今属河北）人。早年为枢府小吏，几年后又为枢府幕僚，因事去职。大德五年春，奉命宣慰乌蛮，不久升任乌撒乌蒙道宣慰副使，佩虎符，兼管军万户，并据见闻撰《云南志》四卷，进呈朝廷。此后他因病归养乡里。至大元年出使安南，使归后病故于家。李京酷好《老子》，十分倾慕白居易的为人。早有诗名，袁桷见到他手校朱熹《诗集传》，非常景仰，并且知道他能诗，但又认为“非近世诗士也”。袁桷后来在为李京诗集《鸠巢编》作序时，评他的诗为“质而不倨，绮而不逾，袭众芳之英，融寄于穷崖绝域之地”（《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一）。但《鸠巢编》与他的另一部诗集《李景山诗集》都未见传本。

七月。江南灾荒蔓延，秋收无麦。救灾时，胡长孺干冒罪责，敛富人钱一百五十万，完全发放给灾民。

胡长孺（1249—1323），字汲仲，号石塘。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宋咸淳间授迪功郎、监重庆酒务，宋亡，隐于永康山中，与同隐者并称为“南中八士”。至元二十五年春，以荐授翰林修撰，入京陛见，元世祖于便殿召见，趋进张皇，不觉笠子欹侧。世祖问:“秀才何学?”对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学。”世祖笑曰:“自家一笠尚不端正，又能平天下耶?”怜其贫，改授扬州路儒学教授。大德、至大间，江南灾荒不断，死者枕籍于途。胡长孺正在台州宁海主簿任上，宣慰司同知脱欢察议行赈荒之令，从富户手

---

① 《元史·武宗本纪》：至大元年七月癸酉，诏谕安南王提到“今遣少中大夫、礼部尚书阿里灰，朝请大夫、礼部侍郎李京，朝列大夫、兵部侍郎高复礼谕旨”，故将出使安南系于本月。

中征集了150万钱，在路经海宁时，脱欢察从中取出25万，交给胡长孺，要他秘藏起来。胡长孺觉察出这笔钱可能被乾没（私吞），就全部发放给灾民。一个月后脱欢察再次来到海宁，问胡长孺：让他保存的钱何在？他抱着成案呈交给脱欢察，指着账本说：钱都在这上边写着。脱欢察怒斥："汝胆如山耶！何所受命，而敢无忌若此？"胡长孺回答："民一日不食，当有死者，诚不及以闻。然官书俱在，可徵也。"这件事就此不了了之①。他的一笠不正，失去了翰林之职，但他确实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律。晚年寓居杭州，与赵孟頫、贯云石等交游唱和。死后，门人私谥纯节先生。他一生著述繁富，有《石塘文稿》五十卷，但没有流传至今。

《元诗选》二集有胡长孺《石塘稿》，其中一首诗名为《大水》。诗云：

西昆水源出天河，一泻万里生惊波。烛浑到海更奔猛，溃决犹自吞陵阿。瓠子鱼龙横中野，至今空唱宣防歌。故迹九道复不得，南注安流少休息。痴冥阴云欺白日，不放扶桑光采出。连宵达旦雨如倾，绿野黄流混为一。河伯侈大未可厌，规取桑田广宫室。长鲸老蛟助声势，城郭波浪相沈没。神禹衣冠藏会稽，大叫不闻将安为。

在哀鸿遍野的灾荒之年"歌颂"大水冲决一切的爆发力，这是江湖诗人、或是以《击壤集》为楷模的"语录体"文人所写不出的。

八月二十五日。许有壬与贯云石一同出游大都城南的廉园。

许有壬〔木兰花慢〕词序说："至大戊申八月廿五日，同疏仙万户游城南廉园，园甲京师，主人野云左丞未老休致，指清露堂扁，命予二人分赋长短句，予得清字，皆即席成章，喜甚，榜之堂上。疏仙其甥也，后更号酸斋云。" "疏仙万户"，即贯云石。这首词是大都文人荟萃之区——"廉园"——游赏宴集较早的一例，也是许有壬在大都文坛活动的最初足迹，并为其主人"野云左丞"（贯云石的外祖父廉希闵）定妆。

九月。郭畀（字天锡）前往杭州，并写《客杭日记》。

这部日记记载了至大元年九月初一，到至大元年十一月初四，这两个月间的杭州见闻，成为元人散文的典范，开启了明人小品文的先河。

① 宋濂《宋文宪集》卷四十八《胡长孺传》。据宋濂所记，胡长孺在台州所为，确实不像一个纯粹的儒士作得出来的。与"铜岩恶少"的交锋，已经有小说化的倾向。

至大元年十月三十日的日记写道：

晴。冷。汤君白知予事不如意，呼舟过湖，闲行散闷。游南山惠因华严寺，次游开化院，次游石屋洞，深暗不可测，觉阴气逼人。壁上记姓名而回。入胜果尼寺，君白令亲惟德母子为尼，延坐设茗罢。次游水乐洞，扣寺门，久之乃得入。绕寺皆奇石。有亭扁曰“声在”。后泉滴洞中，相应铿然有声，故名亭。有石刻坡翁《东阳永乐亭诗》。观毕而下，踏石上黄叶，扳径边古松，山林间自有一种清气。借笔题云：至大元年十月卅日，京口郭天锡同汤君白来此听泉。寺僧具茶，饮之清甘——即此水也。更过一二僧寺，以心绪不佳，不及详记。泛湖而还，西北风起。同君白钱塘门小酌分路。

写出这样一部日记的郭天锡，是当时著名的诗文书画家、文物鉴赏家。他见寺必游，到处留名。但在字里行间，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意绪，使信步闲行也颇沉重。他的失意，是因为他找不着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

吴澄出任国子监丞。

吴澄是首任此职的南人，也是元代国子监丞、司业之中，较有成就的一人。他办学有方，作完一届之后，于皇庆元年升国子司业。

十二月八日。郭豫亨咏梅集句诗集《梅花字字香》成编。

本书对元代的百咏梅花诗，起了推动作用。

《梅花字字香》前集一卷，后集一卷，郭豫亨集句。书首有“至大辛亥腊八日”郭豫亨自序。前集共七律50首，后集共七律50首。这100首咏梅诗全是集自元以前的诗人的诗句。书名取自北宋晏殊词“唱得梅花字字香”。历来诗人词家就喜爱借咏梅寓意，北宋林逋以来，作者开始为咏梅别立品题；南宋遂以咏梅为诗家一大公案。江湖派诗人无不借梅以自重，别号斋馆多带梅字。入元以来，咏梅在诗坛仍十分盛行，文坛巨子刘因《观梅有感》更是深含寄托之作。郭豫亨亦承宋人积习，“凡见古今诗人梅花杰作，必随手抄录而歌咏之”（《自序》）。《四库全书总目》评述道：郭豫亨以集句咏梅，“又辟新境，且属对颇能工巧”，“存备诗家之小品，固亦无不可矣。”郭豫亨自言:“其间句锻意炼，璧合珠联，亦有天然之巧者，吾不知其为古作也。”

郭豫亨，号梅岩野人，生平不详，应是由宋入元的遗民。

至大二年己酉（1309）

姚燧出任翰林承旨。在一次宴会上与身为艺妓的宋儒真德秀的后人真真相逢，并为其解除乐籍。

这是一个广泛流传的悲欢离合的故事。见于《南村辍耕录》《尧山堂外纪》《情史》等书，文人以其为题材的诗文亦多，如高启《真氏女》（《高太史大全集》卷七），贝琼《真真曲》（《清江集》卷一），王逢《真氏女二首》（《梧溪集》卷五）等。王逢《真氏女二首》诗序云："牧庵姚承旨，一日玉堂宴集，诸姬奏伎。有真真者，或作南音。问之，泣曰：'女童建宁人，西山之后也。父尝管库济宁，坐偿官负，故鬻为娼家息。'公恻然，遣使白丞相三宝奴，命去教坊籍。公遂呼翰林小史曰：'汝未婚，以真女配汝，吾即其父也。'予友贝廷琚（按：贝廷琚即贝琼）赋长诗，意有未足，用补二绝。"据《贫谷笔记》，这"翰林小史"名叫王棣，后来任翰林待制。这件事对于了解元曲演艺者——艺妓的来源、入籍与出籍以及生活特别是婚配状况都有补益。

真真本人即席为姚燧作〔解三醒〕（《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二"玉堂嫁妓"节）云："奴本是明珠擎掌，怎生得流落平康。对人前乔作娇模样，背地里泪千行。三春南国怜飘荡，一事东风没主张。添悲怆，那里有珍珠十斛，来赎云娘。"南宋理学家真德秀的后人，除真真遭际不幸，行踪隐秘的诗人真山民也被认为是他的孙子。

与其叔叔姚枢在战俘之中"抢救"出赵复与砚坚相比，出真真于乐籍难度仍然不小，因为这有违当时的制度。作为翰林承旨，姚燧确实是一个特重感情的人，他的一首小令〔凭阑人〕《寄征衣》写道："欲寄征衣君不还，不寄征衣君又寒。寄与不寄间，妾身千万难。"在短短的篇幅中，将传统的"闺怨"写得丰富充实，心理波澜层次分明，寄了征衣，担心丈夫不想家了；不寄，又怕丈夫在寒风中瑟缩。此前，写这一题材的诗词多不胜举，但姚燧确实拓展了"闺怨"的感情空间。

滕宾出任翰林学士。

滕宾，又作滕斌，字玉霄。黄冈（今属湖北）人。此后，又出为江西儒学提举。在江南时曾弃家入天台山为道士。他是元代前期较活跃的作家，与文坛名流多有唱和，《录鬼簿》列其名于"前辈名公"节；《太和正音谱》评其词"如碧汉闲云"。为人风流笃厚，韵致可人。散曲今存小令15首（据

《全元散曲》)，主要表现超尘拔俗的出世心态。《全金元词》辑入词10首，他的词纯是苏辛余韵。《元诗选》三集选入其诗46首，题为《玉霄集》。

任士林去世。享年四十七岁。

任士林（1253—1309），字叔实。奉化（今属浙江）人。早慧，由祖父授古文，父死，建庐墓旁，读书其中，诸子百家无不周览，乡里子弟多从其学。廉访使让他筹建文公书院，书院落成，又授职上虞县教谕。其后讲学会稽，授徒钱塘。至大元年，中书左丞郝天挺因事至钱塘，举荐任士林为湖州安定书院山长，因其长子病重，未能赴职，不久病卒于杭州客舍。任士林早有文名，通晓经学，但一生困顿，被称为“山林一老儒”。有《松乡集》十卷（诗二卷，文八卷），今存。

释行海去世于本年之后。

释行海（1224—?），号雪岑。幼年出家，十五岁游方。后久住嘉兴先福寺，在宋元易代之后，诗多抒写激愤之辞，《庚午春》《丁未》《己酉作》等均写于元初。原有《雪岑诗集》（十二册），存诗3000多首，但未见传本。今存《雪岑诗续集》二卷。

至大三年庚戌（1310）

三月。戴表元去世。享年六十七岁。

戴表元（1244—1310），字帅初，一字曾伯，号剡源。庆元奉化（今属浙江）人。幼习诗文，南宋咸淳间入太学，试礼部中第十名，登乙科进士，授建康府教授。宋恭帝德祐元年（1275）告归故里，改授临安教授，辞不赴职。元兵南下攻临安，戴表元避兵邻郡，两年后才回到奉元。经过战乱，家无生计，戴表元反而专心读书授徒，以卖文养家糊口。元成宗大德八年，执政者荐于朝，拜信州教授。晚年翰林、集贤两院以修撰、博士二职论荐，但已老病不能起。半生所教学生很多，最著名的是袁桷。早年戴表元以振起宋末萎靡文风为己任，并就学于王应麟、舒岳祥。其文清深雅洁，被称为能化腐朽为神奇，至元、大德间，东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时的，惟戴表元而已。尽管入元曾任一届教官，但内心淡泊，安于贫贱。曾自号质野翁、充安老人，表示与新朝保持距离。由于身经宋、元易代的大动乱，诗作多伤时闵乱、悲

忧感愤之词。有《剡源集》三十卷，是今存较重要的元人文集。

宋元替代之际，戴表元首倡：科举只是取士的方式，没有文艺可言。文艺，不一定非通过科举获取。对取消科举采取了比较客观的态度。袁桷《戴先生墓志铭》说："（先生）尝曰：科举取士，弊不复可改。""……力言后宋（南宋）百五十余年，理学兴而文艺绝。"戴表元在著述中，一再表达对科举与文学的不同出路的感慨。对于戴表元的见解，他的高足袁桷概括为："功业可以致君，而名不得以润身；科举足以取士，而文不足以行世。"（《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三《祭戴先生》）

东宫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元仁宗）发表了对文天祥的看法，对社会舆论有较大影响。

元人周霆震载评论当时人王炎登所著《江南野史》一书中的"不录"文天祥，反以吕文焕降元为"不得已"的做法时，提到："江南自革命以来，学校碑刻，悉刊去宋年号。朝廷初不知其所为。仁宗在东宫，一日问左右文丞相如何，对者皆贬其不知天命。仁宗作色曰：如卿所言，则冯道却不是忠臣矣？众赧屏气，相视惕然。信公日见表彰，扬于内外。临御之日（元仁宗即位后），语廷臣曰：'儒者握纲常如拳。'盖为信公而发。"①

周驰出任南台御史。

周驰，字景远，号如是翁。聊城（今属山东）人。至元二十二年任秘书监校书郎，迁翰林应奉。至大三年升南台御史，到江南任职，官终燕南宪佥。他很受南方士大夫的欢迎，牟巘、赵孟頫、任士林、杨载都与他有交往。到职后，每天与文朋诗友往还，书吏不胜其烦，故意在墙上大书：御史某日访某人；某日某人访御史。周驰见了不但不生气，反而说：我还拜访过某某人，你怎么漏记了？并依次补写出来。杨载在赠周驰的诗中说："朔易回元气，人才起俊流。声华当翰苑，文采冠中州。"周驰《送李伯英二首》其二说："江南才子去游燕，为忆明时正礼贤。休向蓟门寻古迹，黄金台上草连天。"委婉提醒友人，由于元朝用人的局限，作为南人一般难于受到重用。

白珽的笔记《湛渊静语》二卷成书。

白珽住在西湖之滨，有泉自竺山汇流于他的家门之前，白珽将其命名为"湛渊"，并将自己的笔记叫做《湛渊静语》。《湛渊静语》是白珽友人周暕将

① 《石初集》卷十《阅晏彦文所论王生江南野史》。

其文稿编辑成书的。原书篇幅较大，流传不广，今存仅二卷。

王构去世。享年六十六岁。

王构（1245—1310），字肯堂，号安野。东平（今属山东）人。早年以词赋中选，为东平行台掌书记。至元十一年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至元十三年从江南返回，迁翰林应奉，升修撰。历任吏部、礼部郎中，审囚河南，多有平反。改太常卿。擢淮东提刑按察使，入为治书侍御史，迁翰林侍讲学士。元成宗即位，参修《世祖实录》，书成，参议中书省书。因病告归东平，起为济南路总管。元武宗即位，召拜翰林学士承旨。卒，谥文肃。王构历仕三朝，朝廷每有大议，必向他咨询。其子王士熙、王士点在元代中期都身居要职，并有文名。有《修辞鉴衡》二卷，今存。

高克恭去世。享年六十三岁。

高克恭（1248—1310），字彦敬，号房山。西域色目人，父祖随元朝军队进据中原，定居于大都房山。父高嘉甫潜心研读《周易》《诗经》等典籍，高克恭深受影响。至元十二年始任工部令史，历任中央及地方官员，数次到江南任职，在任颇有清誉。大德末，仕至刑部尚书，又任大名路总管。至大三年春天，入京朝觐，病故于城南客寓。高克恭是元代前期主要画家之一，也是有影响的诗人。有《房山集》（或《高文简公集》），已散佚。高克恭为人“性极坦易，然与世落落寡合。”遇知己则倾心相交，“终身亦不复疑贰。”（邓文原《高公行状》[①]）现存高克恭诗主要是五七言绝句，尤以七言绝句最佳。这是色目人作诗文的特点，而他是第一个可以称为诗人的用汉语写作的西域色目人。

至大四年辛亥（1311）

正月十日。卢挚作〔双调·蟾宫曲〕《辛亥正月十日游胡仲勉家园》[②]。

去年元旦，卢挚作〔双调·蟾宫曲〕《肃政黎公庚戌除夜得孙翌日见招作此以贺》，一年后他又以新的〔双调·蟾宫曲〕迎接新春。这时他应七十

① 见《巴西集》。

② 两首〔双调·蟾宫曲〕，均见《全元散曲》第130页。

上下，笔锋犹健，“玉绽梅梢，唱白雪新声阿姣，万两金一刻春宵”，春天到来仍然快意盈怀。

八月十八日。涉及民间婚娶时，元廷作出明文规定：今后乐人只许娶乐人。这对于元曲的演出与传播有明显影响。

在元代政令全书《通制条格》关于户籍的一卷（卷三）“户令”中，对婚姻做了许多具体规定，这些规定有不少内容细致而且颇显人情味。“乐人婚姻”节录出的两则圣旨是：

> 至元十五年，中书省宣徽院呈：官豪富势之家强将成名善歌舞妆扮堪以承应乐人妇女，暗地捏合媒证娶为妻妾，虑恐失误当番承应，於七月十八日闻奏过。奉圣旨：是承应乐人呵，一般骨头成亲乐人内匹配者，其余官人富户休强娶要。钦此。

> 至大四年八月十八日，中书省李平章特奉圣旨：辛哈思的为娶了乐人做媳妇的上头，他的性命落后了也。今后乐人只娶乐人者。咱每根底近行的人每，并官人每，其余人每，若娶乐人做媳妇呵，要了罪过，听离了者。么道圣旨了也。钦此。

前一个圣旨，要制止豪门“强娶”艺妓；后一个圣旨则规定：艺人只能与艺人婚配。其着眼点都是防止艺妓“减员”，影响“当番承应”。除《青楼集》，《录鬼簿》等文献也都记录了不少著名的艺人夫妇。这里的“李平章”，应该是李孟。显然当时“官豪富势之家强将成名善歌舞妆扮堪以承应乐人妇女，暗地捏合媒证娶为妻妾”的情况相当常见，在《青楼集》与其他的文献中，可以找到不少例证。贯云石的父亲贯只哥就在这前后娶了乐人“金兽头”为妾。有了“今后乐人只娶乐人”圣旨，实际扩大了私情存在的空间。艺妓对元曲创作的推动是多方面的，除了众所周知的“朱帘秀”“顺时秀”等，贯云石自己就与一个叫杨驹儿的乐人有一段私情。此前姚燧先要将真真“出籍”后，才能许配给翰林小史。

杨驹儿是著名艺妓，事见夏庭芝《青楼集》。据《录鬼簿》（曹寅刊本），杨驹儿不但是杂剧演员，还曾作有杂剧《东窗事犯》。贯云石显然对她相当钟情，〔醉高歌过喜春来〕和〔凭栏人〕等两组《题情》是专为杨驹儿作。这两组作品都是元曲名篇。杨驹儿去世，贯云石的密友张可久以“带过曲”〔骂玉郎过感皇恩采茶歌〕《杨驹儿墓园》为吊，并说明“题情犹是酸斋赠”。

其实，元曲家们笔下的情恋对象，大多是杨驹儿这类乐人。娶乐人为妻妾确实带来了不少社会问题，但是不娶的“禁令”又为元代文学作品添置了爱不能已的类型。

聂古柏以吏部侍郎身份出使安南，并写诗纪行。

聂古柏，色目人。具体族属不详。《皇元风雅》前集卷二辑录聂古柏诗18首，都是本年出使安南的纪行之作。

艺妓宋六嫂一家，以夫妻父女同台演出于梨园，为戏班组成提供了结构模式。

《青楼集》云:“宋六嫂，小字同寿。元遗山有《赠觱篥工张嘴儿》词，即其父也。宋与夫合乐，妙入神品；盖宋善讴，其夫能传其父之艺。滕玉霄待制，尝制〔念奴娇〕以赠云:‘柳颦花困，把人间恩爱，尊前倾尽。何处飞来双比翼，直是同声相应。寒玉嘶风，香云卷雪，一串骊珠引。元郎去后，有谁著意题品。谁料浊羽清商，繁弦急管，犹自余风韵。莫是紫鸾天上曲，两两玉童相并。白发梨园，青衫老傅，试与留连听。可人何处，满庭霜月清冷。’”宋六嫂的演唱，丈夫的觱篥伴奏，如同珠联璧合。

钱塘闻人吾衍（吾丘衍）因受屈辱而失踪。年仅四十四岁。

吾衍（1268—1311），字子行，号竹房、竹素、贞白。一说姓吾丘，名衍。钱塘（浙江杭州）人。为人清高简傲，常意气用事。多才多艺，不但工诗能文，而且长于书法，精通音律。甘于在陋巷中教授学生。性好讥侮文人士子，惟佩服仇远及胡长孺兄弟。四十岁还没有成家，买酒家女为妾。但这个女子在饥馑之年曾嫁过人，她原来的丈夫听说了就赶赴杭州上告于官府，称吾衍之妾为自己的妻子，使吾衍受到牵连和侮辱。于是官府就让其妾的父母到官府对质。父母来杭州，暂时寄居在吾衍家中，又牵连到使用伪钞的案件中，这两人竟将责任推给吾衍，其实吾衍并不知道这件事[①]。吾衍被拘牵

① 以上据王袆《吾丘子行传》（《竹素山房集》附录，又见《王忠文公集》卷十七）、宋濂《吾衍传》（《竹素山房集》附录，又见《宋文宪公全集》卷四十）。关于吾衍买妾一事，具体细节众说纷纭。明人王行《吾衍传》（《竹素山房集》附录，又见《半轩集》补遗）对这件事的叙述是:“初，衍年四十未娶，宛丘赵天锡为买酿工家孤女为妾。妾母嫁后夫，后夫以私造楮币事觉，避逮来衍所。”胡长孺《吾子行文冢铭》（《竹素山房集》附录）则说，赵天锡为吾衍买的妾“尝妻人，年饥弃归母”，“妾为子行产子，数日死”。但基本情况一致。

过市，虽然最终没有被收监看押，但他觉得自己颜面扫尽，了无生意，便前往仇远家诀别，正好仇远一大早出去散步，他留下一首诗而去。从此失去踪迹。因为他留给仇远的诗有“西泠西畔断桥边”之句，人们在寻找他的下落时，又在断桥上发现他的鞋，就认为他是投水自尽了。吾衍著述颇丰。诗集名为《竹素山房集》，今存。另著《续古篆韵》六卷、《周秦刻石释音》一卷、《学古编》一卷、《闲居录》一卷，均有传本。据记载[①]，他还有《尚书要略》《听玄集》《造玄集》《九歌谱》等许多种著述，失踪后便散失不存。吾衍的诗写得颇有灵气，被称为“善效李贺”（顾嗣立语），与仇远都是元初杭州有影响的诗人。《四库全书总目》评吾衍诗集说:“其诗颇效李贺体，不能尽脱元人窠臼。然胸次既高，神韵自别，往往于町畦之外逸致横生。”吾衍留给仇远的绝笔诗说:“刘伶一锸事徒然，蝴蝶飞来别有天。欲语太玄何处问，西泠西畔断桥边。”尽管他轻生而去，这首诗也可看作他对自己一生的反省。元人文献提到，他性好贬损文学士，但《竹素山房集》中的赠答之作，却时见对文人学友的关切之情。

刘埙著《隐居通义》[②]。

《隐居通义》共三十一卷，分为十一门：理学、古赋、诗歌、文章、骈俪、经史、礼乐、造化、地理、鬼神、杂录。其中古赋、诗歌、文章、骈俪等门共二十卷。可见全书侧重于对宋元之际的诗文作引称评论。刘埙倾个人之力而成此书。作为元人笔记，这是容量颇大又较少为人注意的一种。

至大中，尚书省因有人挟异书（传播异端之书）造势，遂起罗织之狱。

元世祖时任太史令的天文历算家王恂之子王宾将家里收藏的典籍，“凡涉天文、阴阳家者，悉焚之”[③]。至元十七年，王恂与郭守敬、许衡等厘定《授时历》，并颁行天下。王宾于至大元年累迁秘书少监，可见当时的“异书”很大成分是与天文、历数有关的。

牟巘去世。享年八十五岁。

牟巘（1227—1311），字献之，一字献夫。祖籍四川，早年徙居湖州（浙江吴兴）。南宋末举进士，官至大理寺少卿、浙东提刑。入元不仕，杜门

① 见《南村辍耕录》卷六“吾竹房先生”节。

② 《隐居通义》未见序跋。但其中提到至大四年为剑南州学官，时年已七十二岁，而本书名为《隐居通义》，当结集于其晚年。故暂系于此。

③ 苏天爵《滋溪文稿》卷十《秘书少监王公墓志铭》。

隐居三十六年，但对元初文坛颇有影响，与其子牟应龙、牟应复，号为“三牟”，以比“三苏”。有《陵阳集》二十四卷。

李谦去世。享年七十九岁。

李谦（1233—1311），字受益，号野斋。恽州东阿（今属山东）人。初任东平府学教授，召为翰林应奉，历翰林侍读，至元二十六年以足疾归。元成宗即位，召为翰林学士，再次引疾归。大德六年复以翰林承旨召，大德七年致仕。卒，谥文正。李谦生前在北方特别是山东影响颇大，文集不传，文章主要保存在地方志等文献中。

安熙去世。享年四十二岁。

安熙（1270—1311），字敬仲，号默庵。祖籍太原离石（今属山西），金亡，徙真定藁城（今属河北）。安熙祖、父皆有学行，本人承继家学，仰慕大儒刘因，为其私淑弟子，未及见面而刘因已故。安熙不屑仕进，家居教授弟子垂数十年，四方学子前来求学，多有所成就。门人著名者有赵郡苏天爵。刘因学承朱熹，所以安熙教书必尊朱氏，并被认为是得刘因真传。他曾说：“文以载道，词不胜不足以言理。”诗文很受重视。遗文由门人苏天爵辑为《默庵集》十卷（内集五卷，外集五卷），今传本仅五卷，应为内集。著有《诗传精要》《续皇极经世书》《四书精要考异》《丁亥诗注》等书，均未刊行。







【元仁宗】





建元：皇庆（二年），延祐（七年）



皇庆元年壬子（1312）

元仁宗即位，逐步调整翰林国史院人选，翰林国史院成为文学家集聚的地方。

元仁宗即位初期是元史的“皇庆之治”，程文海、李孟、刘敏中、贯云石、陈俨、畅师文、赵孟頫、尚野、元明善、张养浩、蒲道源等陆续进入翰林国史院。

初入翰林院，贯云石还不到三十岁，被称为“小翰林”。延祐初，贯云石离开大都，返回江南，并写了一首五言古诗《翰林寄友》[①]，逐一评论了自己在皇庆二年初入翰林院时与之朝夕相处的同僚们：

兴来何所倚，唯杖归而已。梦游白玉堂，神物撼青史。我师秋谷叟，秦楚可岂箠。中庵四海名，羸老久无齿。珍重白雪楼，涕唾若行水。北山已东山，高卧呼不起。泊然万卷怀，廉苦悉之比。诸孙赵子昂，挥遍长安纸。文郁老经学，阅义出明旨。复初执高节，须鬓备清美。希孟文气涩，道义沦于髓。垂雪公谅翁，字学贵穷理。诸公衮盛时，忝会总知己。浓头一杯外，相思各万里。

① 见《永乐大典》卷一四三八三。按：《永乐大典索引》将诗题误作《翰林寄发》。

这首诗中，涉及了大部分自皇庆元年先后进入翰林院的文臣。——这是大都文坛最高一级。

已在京师的虞集，与陆续来到的范梈、杨载、揭傒斯三人结识，并订交于大都。

“元诗四大家”这个诗文家群体，就是皇庆、延祐间最初出现在大都。本年，杨载四十二岁，虞集四十一岁，范梈四十一岁，揭傒斯三十九岁。这时，元诗“四大家”都已至（将至）不惑之年，正处在最佳的时期，这种创作交流，使得每人都受益不浅。

除虞集，其他三人刚刚来到大都。虞集大德六年出任大都路儒学教授，至大四年，除国子监博士。范梈年已三十六岁（大德十一年）始游京师，以荐出任翰林编修。皇庆初，杨载由户部贾国英举荐，从布衣擢入翰林，任翰林国史院编修，与修《武宗实录》。而揭傒斯则馆于翰林学士程钜夫之门，一般人并不知道他是程钜夫的表妹夫。实际上，从一开始，“四大家”就又可以分列为：杨载、范梈，虞集、揭傒斯。前两人大致同时入京，专一为诗，很少有文章传世；后两人诗文兼顾，翰苑名臣的色彩更浓。元仁宗初期，四人年纪相仿，齐聚京师，并奠定了今后文学交往的基础。

关于元仁宗即位之初的京师文坛，黄溍曾说：“方是时，东南文章钜工，若邓文肃公文原、袁文清公桷、蜀郡虞公集，咸萃于辇下。公（揭傒斯）与临江范梈、浦城杨载继至，以文墨议论与之相颉颃，而公名最为暴著。”[1]“暴著”于大都的，其实是“四大家”。在他们之上一个层次的，是姚燧、王约、元明善、程钜夫、赵孟頫、邓文原等人。廉希闵（廉野云）、全岳柱[2]等较早华化的色目世臣，则是文坛的超级“东道主”。

同在京师期间，杨载总说：“伯生（虞集）不能作诗。”而虞集每每带上酒登门拜访杨载，请教作诗之法。杨载酒酣耳热时，便倾倒出自己的心得。虞集“遂超悟其理”。一次，京师的翰苑文人纷纷写诗送袁桷扈从上都。虞集将自己作的诗通过别人送给杨载看，杨载一看就说：“此诗非虞伯生不能为也。”人们问道：“先生尝谓伯生不能作诗，何以有此?”杨载回答：“余曾授以作诗法，余莫能及。”后来，有人问虞集：“仲弘（杨载）诗如何?”虞集回答：“仲弘诗如百战健儿。”“德机（范梈）诗如何?”“德机诗如唐临晋帖。”

---

(1) 见“揭文安公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十六。

(2) 全岳柱（1281—1333），字止所，号兼山。畏吾人，阿鲁浑萨理之子。其祖父乞台萨理，法名“万全”，便以“全”为汉姓。家族原名均有“萨理”，应该是出自“撒里畏兀”。至正间的元曲家全普庵撒里（全子仁），即是其族人。

"曼硕（揭傒斯）诗如何?""曼硕诗如美女簪花。"又问:"先生诗如何?"虞集笑着说:"集盖汉廷老吏。"这是虞集在全盛时期说的话[1]。

正月。郭郁（文卿）由江浙行省都事赴任浮梁州知事，江浙文人集咏为其送行。

正月三日，邓文原作《文卿知州赴浮梁任序》。俞希圣、唐理、僧志胜、侯克中（艮斋）、汤炳龙、仇远等17人赋诗为其送行。这些诗保存在《郭公敏行录》（全名《类编运使复斋郭公敏行录》）之中。

郭郁，字文卿，号复斋。祖籍汴梁封丘（今属河南），迁居大名（今属河北）。早年学《易》于侯克中，事父至孝。由知浮梁州，历高邮知府、两浙运司都事，泰定元年擢江西宪佥，泰定二年，改庆元路总管，迁福建都转运盐使。在当时，官员到职或离任，文人以诗文相赠是惯例，但这类专题的诗文原始状况保存完整的相当少见。只是《郭公言行录》一卷、《郭公敏行录》二卷流传至今，所以郭郁在官员中显得颇特殊：保存有数百篇送迎诗文，而且编排首尾完整。这也为今天了解诗文的这种用途提供了罕见的例证。

大都高粱河畔，出现了一个名为畏吾村的村寨，畏吾村是以北庭为祖籍的西域人的聚落，并成为色目双语文学家的"摇篮"。

随蒙古宗主进入中原的高昌回鹘王国臣民在京师的聚居地，被称为"畏吾村"，畏吾村位于高粱河畔，位于城郊，贴近水源，平川空旷。畏吾村的村民中，出现了一代又一代用汉语写作的色目作家，几个著名的华化家族比如贯氏、廉氏，则是"荣誉村民"。

畏吾村，曾是相当有名的地方。这里的居民，有的以"别"为汉姓，表示祖籍是北庭（别失八里），甚至将"大都"作为自己的名字[2]，还出现了新的复姓——高昌。欧阳玄在元文宗至顺三年所作的分咏大都十二月的〔渔家傲〕鼓子词，以"高昌家赛羊头福"[3]，作为都人在十一月安排过冬的一景。

仁宗要李溥光蓄发还俗，授昭文馆大学士。

李溥光，字玄晖，号雪庵。大同（今属山西）人。自幼出家为头陀。一说其俗姓李，法名溥光，但其法弟叫李溥圆，此说似不确。李溥光能诗善书，

① 见《南村辍耕录》卷四"论诗"节。这是影响较大的记载，对四人的评价，在不同文献中也略有不同。但是大体一致。

② 《元诗选癸集》己集上，有畏吾人大都闾。

③ 《圭斋集》卷四。

尤工大字，与赵孟頫齐名，并为其举荐于朝。大德二年曾奉旨到江南阐扬教事。元仁宗初立，诏蓄发，授昭文殿大学士，玄悟大师。张雨《李雪庵学士写竹枝》（《句曲外史诗集》卷三）诗云："昔我入朝皇庆初，及识此老苍眉须。"有《雪庵外集》行世，清初尚存，今无传本。顾嗣立《元诗选》三集录入其诗21首。亦善画，山水宗关仝，墨竹法文同。另有《雪庵字要》一卷行世。

十月。包括诗集八十卷在内的"刘辰翁全集"刊刻成书。

从大德元年以来，刘将孙便在汇编其父刘辰翁诗文，直到刘辰翁去世十六年时才完成。这种版本的刘辰翁全集未能流传至今，据刘将孙《须溪先生集序》，可知其篇幅巨大。诗集即达八十卷，这个数字已是宋元诗人之最。

与畏吾村先后出现在大都城郊的，是著名的园林"廉园"。

廉希宪受到元世祖的特殊信任，"北庭廉氏"成为大都名族。由于主人的品位与爱好，廉氏园林"廉园"（万柳堂）成了大都文人的聚会地点之一。

廉希宪是畏吾人，曾任元世祖的宰相，其地位非常人可比。他的家族在畏吾村以南不远的地方，另建了居室和园林，此即廉园，又名万柳堂[①]。据北京旧志，廉园应在今北京西郊的钓鱼台附近，而畏吾村则在其北的魏公村。因为廉氏爱花成癖，附近的乡民多以养花为生，所以出现了"花园村"这个地名。《析津志辑佚》的"寺观"节记载："普安寺，在开远坊，……又云在旧城彰义门内。昔廉相花园。"[②] 所谓旧城，就是指金代的中都（燕京），彰义门是其西北城门，在今玉渊潭附近，这就与今钓鱼台比邻了。

至大至皇庆年间，廉园的主人廉希闵，号野云[③]。在他的热心主持下，"游赏廉园"成了大都文人们的一大关目。特别是刚从江南来到大都的人，廉园不单是一处景致极佳的游乐之处，也是结识京师文坛名流（特别是决定文坛舆论走向的翰苑名流）的难得机会。

《南村辍耕录》（卷九"万柳堂"节）写道：

---

① 在一些文献中，廉园（万柳堂）又称"南园"，而就地望而言，廉园正在高粱河畔畏吾村的南方。

② 《析津志辑佚》第77页。

③ 一般认为，廉园的东道主"野云"是廉希宪的别号。但是，"野云"的活动时期主要是在廉希宪去世之后。笔者认为，"野云"实际应该是廉希宪的兄弟、贯云石的外祖父廉希闵。有关考证，见《元西域诗人群体研究》第225～231页。

京师城外万柳堂，亦一游宴处也。野云廉公一日于中置酒，召疏斋卢公、松雪赵公同饮。时歌儿名解语花者，左手折荷花，右手执杯，歌〔小圣乐〕云："绿叶浓阴，遍池亭水阁，偏趁凉多。海榴初绽，朵朵簇红罗。乳燕刍莺弄对，对高柳鸣蝉相合。骤雨过，似琼珠散乱，打遍新荷。人生百年有几，念良辰美景，休放虚过。富贵前定，何用苦张罗。命友邀宾宴赏，饮芳醑，浅酌低歌。且酩酊，从教二轮，来往如梭。"而行酒，赵公喜，即席赋诗曰："万柳堂前数亩池，平铺云锦盖涟漪。主人自有沧洲趣，游女仍歌白雪词。手把荷花来劝酒，步随芳草去寻诗。谁知咫尺京城外，便有无穷万里思。"

"解语花"是京师著名的艺妓，姓刘，"尤长于慢词"。〔小圣乐〕是元好问创制的北曲，当时京师的著名歌妓常即席演唱。

这个故事在元代及后世相当有名，元人笔记《广客谈》有与其近似的记载，《广客谈》特意注明上述内容是"濠梁李升记"①。而《青楼集》的"解语花"一节文字，几乎与此全同，显然它们有相同的来源。

参与廉园宴饮赋诗的，除包括翰林、集贤两个学士院的成员，还有从全国各地来大都的文人学子。人们常常是刚到大都，就要慕名前往廉园，受到了廉园的接纳，通向其他文化"沙龙"的大门就敞开了。廉园不但有名人、美酒、名妓，还有意想不到的机遇。仅张养浩《张文忠集》与廉园宴集有关的诗篇，就有《廉园会饮》《廉园秋日即事》（卷六），《寒食游廉园》《题廉野云城南别墅》（卷七）。姚燧则有题为《廉野云左揆求赋南园》的〔满江红〕。这首词写了著名的廉园会集实况，其中包括"都城善讴者"庆云以刚刚谱就的"新声天乐"来助兴的情景。

阎复去世。享年七十七岁。

阎复（1236—1312），字子静，号静轩，又号静斋、静山。高唐（今属山东）人。弱冠入东平府学，师事名儒康晔。元好问来东平校文，选中四名学生，第一就是阎复。至元八年，王磐荐为翰林应奉，又任会同馆副使。扈驾上京，应制赋诗二首，寓意规讽。元世祖说："有才如此，何可不用。"至元十二年，升翰林修撰。历任翰林直学士、侍讲学士，至元二十三年升翰林学士。出任浙西道肃政廉访使，后因细故免官。元成宗即位，以元老旧臣召

① 李升，字子云，号紫箕生。是元代后期书画家、诗文家。至正年间曾长期在大都任职。

入朝，任集贤学士。元武宗即位，遥授平章政事。告老还乡，卒，谥文康。阎复长于文辞，并有诗名。所著《静轩集》五十卷，今不存。清人缪荃孙辑阎复佚文重编成五卷，题为《静轩集》，收入《藕香零拾》丛书。阎复在元初久居翰林，以文学自任，甚至不肯作执政官，他的文章被视为词林典范。

熊禾去世。享年六十岁。

熊禾（1253—1312），字位辛，一字去非，号勿轩，又号退斋。建阳（今属福建）人。宋咸淳十年（1274）登进士第，授宁武州司户参军。入元家居讲学，从游者甚众，曾入武夷，筑洪源书堂，讲授生徒，又回归故里，建鳌峰书堂。有《勿轩集》八卷，今存。按：熊禾，一作熊鉌。

皇庆二年癸丑（1313）

正月。程钜夫作《遗音堂记》。

《遗音堂记》提到“廉野云”其人其事，这不仅是有关高昌畏吾人华化的具体情节，与当时著名的“廉园”关系密切。《遗音堂记》云[①]：

> 皇庆二年春正月八日，余过左司畏兀公之庐。环堵萧然，有梅花一树，鸣琴在床，左图右书。余惊焉。（左司畏兀公）促席与余言曰：“古人之所以为古人者，何绝人远甚。遗言遗行具在，可效可师而卒莫之由，何哉？岂今不古若耶！吾行古人之道，亦古人。已而必曰‘古之人，古之人’乎哉！”余益惊焉。
>
> 他日，（左司畏兀公）出“遗音堂”三大字示余曰：“吾以此名左丞野云廉公之堂，且为书之，群贤见之歌咏。君其记诸。”余曰：“余何言哉。公前与余言而忘之耶？此遗音之说也。……廉公，吾闻其人矣，以勋伐世家致位疑丞[②]，政平恕，行公清；无贪墨，无苛刻，亲贤而下士，方盛而已辞归；而友木石，狎鱼鸟，玩天地之盈虚，阅寒暑之往来，泊然若无与于世，得古人之高。吾敬之！公宦学朔南，谨敏博达。由御史

---

① 见《雪楼集》卷十三。这篇文字或有讹错，笔者所据《雪楼集》是影印明洪武刊本，这是现存程集的祖本。《四库全书》本（即《湖北先正遗书》本）与此略有异同，一处关键的异文是，“左司畏兀公”，明洪武本作“左司唐兀公”，此从《四库全书》本。

② “疑丞”是个名词，代指专职供皇帝咨询的官员。

历吏部，佐省闼，受知天子。进则竭心陈力以赞其治，退则弹琴读书以乐吾天。盖与廉公齐心而拟迹，易地则皆然者。庶几能言古人之遗言，行古人之遗行矣。以'遗音'名廉公之堂，岂无意哉！非公不知名此名，非廉公不足称此名也。"音乎音乎，吾惧夫听者不识二公之趣，而求古人于弦上也。故次第其语，而详道之。

此时，大都文坛空前活跃，蒙古色目人的华化已经成为风气。

二月。王执谦去世。

至大、皇庆年间，大都形成南北逐渐合流的文坛，一些年轻人活跃其间，具有广泛影响。王执谦是其"结合点"。

王执谦（1266—1313），字伯益，以字行。大名（今属河北）人。虞集《王伯益墓表》[①] 通过王执谦的经历，对当时的大都文坛做了概括。陆友仁《研北杂志》卷下参照《王伯益墓表》中的记述，说：王执谦少颖异，及长其父资之游京师，因不忽木等荐得官，但并不如意。"伯益漠如也，日与彰德田衍师孟、河间李京景山、济南张养浩希孟，饮酒赋诗，为神交。时人皆以为古仙异人。阎承旨复时在翰林，谓人曰：吾闻伯益宜供奉翰林，苟有意，幸得见之。伯益不屑也。后十余年，始为翰林应奉文字。然伯益竟止是官，年才四十八。伯益身长不过数尺，不喜骑马。遇好友即提杖出门，竟日去不返，不语，妻子以为常。始来京师，用橐中金，不识记数，及赀尽益困，至终身亦不以介意。遇人，无贤不肖，皆欢然无间，而胸中了不可混。常年京师居，而为诗简淡萧远，如在山林不与人接者。尝谓人曰：吾知吴楚多瑰玮奇绝者，当委身往游，乃称吾意耳。"听他这样说，杨载感慨道："诚使伯益广之以山水之胜，视陈子昂、李太白未知何如！""同时，有辛文房良史，西域人；杨载仲弘，浦城人；卢亘彦威，大梁人，并称能诗。"《研北杂志》与《王伯益墓表》流传均比较广，王伯益成了文坛转型期的"领位员"，但自己却没有到位。

这个王执谦，是另一个层次的"京师大隐"何失，此前的员炎、阚举也与其有类似之处。在京师文坛，层次（年资与地位）比他们高的，是出入于廉园以至于宫廷的人群。王执谦的诗友们，包括上述记载的与他相知者，早年都属于怀才不遇，而后来都是文坛名人：田衍，字师孟，也在本年去世，

① 见《道园学古录》卷二十，《元文类》卷五十六。

享年五十六岁，官终河中知府[①]；李京，以出使安南知名，有《鸠巢漫稿》；张养浩是诗文家、元曲家，有《张文忠集》《云庄类稿》《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阎复，有《静轩集》；辛文房，有《披沙集》，是《唐才子传》的作者；杨载，"元诗四大家"之一，有《杨仲弘诗集》；卢亘，有《彦威集》。而他们是皇庆、延祐年间大都文坛的一个活跃而且有潜力的层位，顾嗣立将何失、李京、卢亘、高克恭、鲜于枢等人都归为《元诗选》二集的"丙集"，立足点就在于此。此外在《王伯益墓表》中提到，王执谦的挚友，还有介于隐士、游侠之间的奇人杜本。除王执谦，这些人几乎都有诗文集传世，他们活动的"社交圈"基本是来大都"闯天下"的汉人，没有家世可以凭借，王执谦友人中，只有杨载、虞集是南人。他们都希望能打破地域局限到江南一游，以完成"学业"，张养浩就因为到江南，写出了《江湖长短句》[②]。但王执谦留下的作品则屈指可数：元人選本有其诗3首，一首见《元文类》卷八（署名王执谦），二首见《元风雅》卷三十（署名王伯益）。王执谦以其特立独行的一生，知名于文坛。

虞集《王伯益墓表》还写到王执谦去世前后的情况："未卒前一夕，犹与客饮酒人家，暮归，坐阅案上书。夜且半，妻拏颇察其有异，召医，未至，伯益忽拊几却卧，不复言。禁钟不尽一声，趣唤杨载、杜本，来而复瞑。"为其遗憾不平的情愫，就潜藏于这字里行间。

三月。王祯《农书》问世，并将诗文图画并茂的形式引入农学书籍。

王祯，字伯善。东平（今属山东）人。曾任旌德县宰，在任六年，调永丰。小县政务清简，"山斋萧然，终日清坐。每岁教民种桑若干株，凡麻苎禾黍牟麦之类，所以莳艺芟获，皆授以方"（《元诗选》二集小传）。著《农书》二十二卷[③]，不仅图文并茂，而且是一部实用性相当强的著述。其中包含丰富诗篇，清初顾嗣立编选《元诗选》在二集中据以编录成《农务集》一卷[④]，存诗50首。其实，对于元代文学或文化来说，《农书》更重要的是将诗、文、赞、赋等作品，视为连环画的说明文字，并"进入"农学领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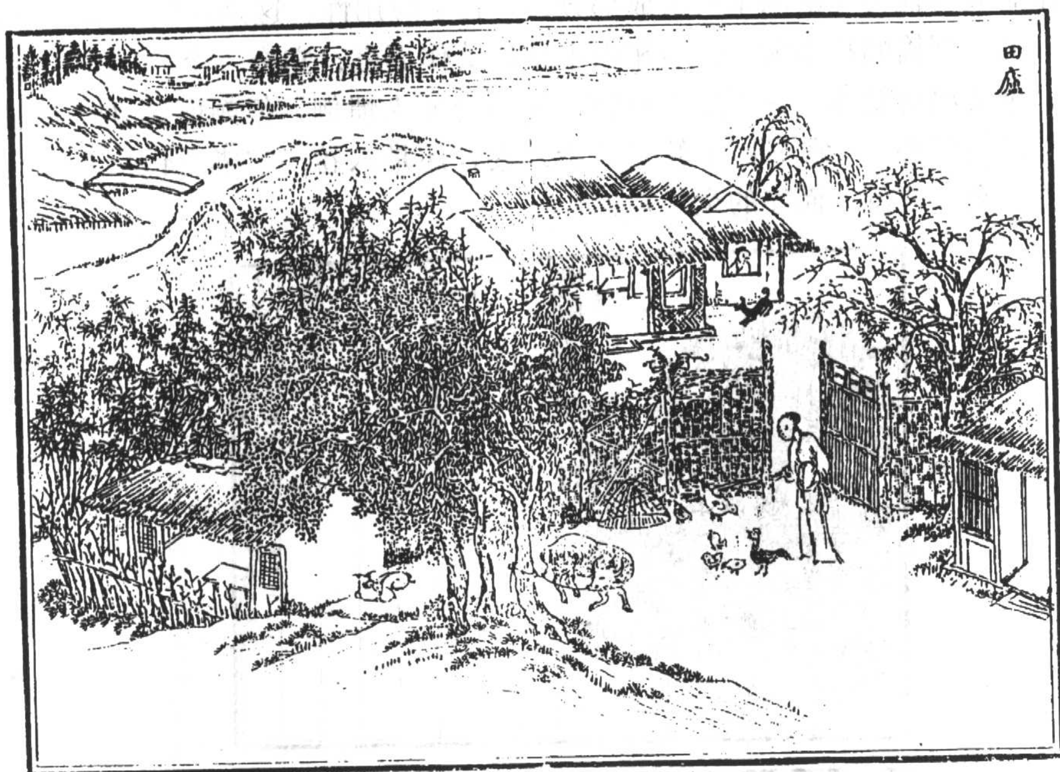
---

① 关于田衍，此前（大德七年六月）提到，虞集《田氏先友翰墨》（《道园学古录》卷五）一文曾就他的家藏文献，对金元之际的北方文坛作过综述。

② 原集未流传至今，但《江湖长短句引》保存在刘敏中的《中庵集》卷九。

③ 据四库馆臣云：《永乐大典》中收录的《农书》为八卷，由他们重编为二十二卷。据《元诗选》二集小传，《农书》又可以分题为《农器图谱》《农桑通诀》。

④ 在清朝，《元诗选》广为学界所知，但所谓《农务集》实际就是从《元诗选》中全文抄出别行。尽管如此，《农务集》仍然有多个单行本传世，足见《农书》的罕见。



田廬農書云古者制五畝之宅以二畝半在鄽詩云入此室處是也以二畝半在田詩云中田有廬是也此蓋古制自井田之變農人散居隨業所在其屋廬園圃遂成久處四時之内農事俱便管子所謂居四民各有攸處不使厖雜欲其業專不爲異端紛更其志今農家多居田野即其理也嘗讀陸龜蒙田廬賦狀其窄陋非久經其處不能曲盡若此使世之崇居華構猶未滿志者觀之可悟奢泰之失賦畧曰江上有田田中有廬屋以

欽定四庫全書　農書　卷十七　二十三

蒲將扉以蘧篨笆籬楗微方竇欂跂簷卑欹而立傴僂户傴側而行趑趄蝸涎隆頂龜折旁塗夕吹入面朝陽曝膚左有牛棲右有雞居將行瞪遮未起啼驅宜從野逆反若囚拘

这个《田庐》图，是《农书》的立意之本。它将元明时期的农夫生活画得如同一首诗篇。

学作品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了应用性，这是元代文学的特点。

就一部篇幅相当大、内容相当丰富的著作而言，它有一个“另类”的序文，全文出奇精炼，只不足一百字，这不合元人惯例，但颇能体现作者对自己著述的信心。《农书》不管是二十二卷，还是八卷，它毕竟包括了数百幅插图，数十首诗。而序的全文是：


去暑天埃今都城已有高車用水飛上樓閣散若霧雨瀬閣費力故有上句
欽定四庫全書
農書 卷十八
連筒


連筒以竹通水也凡所居相離水泉頗遠不便汲用乃取大竹內通其節令本末相續連延不斷閣之平地或架越澗谷引水而至又能激而高起數尺注之池沼及庖湢之間如藥畦蔬圃亦可供用杜詩所謂連筒灌小園詩云刳竹作連筒流泉一脉通勢雖由上下用不限西東遠借居人便常資沛澤功伊誰憑好手扶赴卧龍公
欽定四庫全書
農書 卷十八
架槽

王祯《农书》的插图，表现当时的引水工程。除了画图，还有一首诗。

农，天下之大命也。一夫不耕，或授之饥；一女不织，或授之寒。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农。其教民耕织、种植、畜养，至纤至悉。祯不揆愚陋，搜集旧闻为集三十有七，为目二百有七十。呜呼，备矣！躬任民事者，傥有取于斯与。皇庆癸丑三月望日，东鲁王祯书。

——就这么多内容。可以说一字浮文也没有。

这部《农书》入明流传不广，特别是其中那些无比珍贵的插图，坊间覆

刻本很难做到不走样。《四库全书》中的《农书》，是从《永乐大典》辑出再通过整编成书。那些插图从永乐年间的宫廷画家笔下描绘出来，再由乾隆时期的御用画师照《永乐大典》原图描摹，真是传神。这些画可以看成是元代社会生活的生动的实录，没有它们，没有经《农务集》才流传开来的那些诗篇，元代农村生活场景就缺少了应有的动态与立体感。

六月十五日。京师发生地震，为此，正在大都的范梈作《己未行》诗纪实。

元代，大都共发生地震十余次，较大的是皇庆二年六月、后至元三年八月这两次。在《己未行》（《范德机诗集》卷五）诗中，范梈写道："二年六月己未朔，京城五更大地作。卧者颠衣起若吹，起者环庭眩相愕。室宇无波上下摇，乾坤有位东西却。自我南来睹再震，依微初震不今若。昨朝展席坐堂上，耽玩图书坐无觉。堂下群儿又惊报，方馔饔人丧杯勺。栉者仓皇下床榻，门屋铿锵振铃铎。只今犹自腾妖讹，旦暮殊言共郛郭。大家夜卧张穹庐，小家露坐瞻星落。焉知怪变不可屡，安巢尽有南飞鹊。昔闻上帝忧瀛洲，亲敕巨鳌十二头。特为群臣举手戴，万古不与水东流。岂其九州亦类此，此事或诞或有由。上帝甚神吾甚愚，戴者勿动勿优游。"诗人将灾难归咎于上帝喜怒难测，但整夜在室外露宿、余震惊扰剧烈等感受，真实写出因地震的难以避免、难以预测而产生的心理压力。通过这首诗，可知地震最大的破坏性在于使人们信心动摇。

十月。中书省为恢复科举上奏，建议恢复后的科举"罢去词赋的言语"。

针对科举，中书省臣上的奏章是用当时的白话文写出，奏章对即将实行的科举讨论相当细致具体。其中说："学秀才的，经学、词赋是两等。经学的是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勾当，词赋的是吟诗、课赋、作文的勾当。自隋唐以来，取人专尚词赋，人都习学的浮华了。罢去词赋的言语，前贤也多曾说来。为这上头，翰林院、集贤院、礼部先拟德行明经为本，不用词赋来。"① 这就是开科举士的立意宗旨，实际上，元代的科举并未能"罢去辞赋"，中书省臣的上述建议，则反映出将科举取士与学习词赋彻底剥离开来的看法。

关于恢复科举的诏书宣布：明年八月"天下郡县举其贤者能者，充赋有司。次年（延祐二年）二月，会试京师。"科举章程是：每三年一科，凡年二十五岁以上"乡党称其孝悌、朋友服其信义、经明行修之士"，还要"结

① 见《通志条格》卷五"科举"节。

罪保举”。特别是规定“徇私滥举并应举而不举者，监察御史、肃政廉访司体察究治”。应举者，蒙古色目作一榜，汉人南人作一榜，“蒙古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①。上述内容，都是元代特有。至于科举的内容、题目，并无特别之处。

有关科举的具体规定，是程钜夫、元明善、贯云石等人参拟的②。

杨朝英将当代闻人所作的散曲结为《阳春白雪》。

《阳春白雪》（全名《乐府新编阳春白雪》）与以后问世的《太平乐府》（全名《朝野新声太平乐府》），都是杨朝英以个人之力而成书的元曲总集，被称为“杨氏二选”。《阳春白雪》的成书，对散曲创作有相当大的推动。这是元人选录当代单一体裁的作品（特别是散曲）的总集之冠，也是散曲升堂入室的标志。本年二月刚任翰林学士的贯云石为《阳春白雪》作序，首次就散曲风格作出评论。

贯云石《阳春白雪序》全文是：

> 盖士尝云：东坡之后，便到稼轩。兹评甚矣。然而，北来徐子芳滑雅，杨西庵平熟，已有知者。近代疏斋媚妩，如仙女寻春，自然笑傲；冯海粟豪辣灏烂，不断古今，心事天与。疏翁不可同舌共谈。关汉卿、庾吉甫造语妖娇，却如小女临杯，使人不忍对殢。仆幼学词，辄知深度如此。年来职史，稍稍遐顿。不能追前数士，愧已。澹斋杨朝英选百家词，谓《阳春白雪》，征仆为之一引。吁！阳春白雪，久无音响，评中数士之词，岂非阳春白雪也耶。客有审仆曰：“适先生所评，未尽中选，谓他士何？”仆曰：“西山朝来有爽气。”客笑，澹斋亦笑。酸斋贯云石序。

短短一篇文字中，涉及了元曲家徐琰、杨果、卢挚、冯子振、关汉卿、庾天锡等人。这是元人第一次对本朝曲家作出筛选，而《阳春白雪》则是元曲第一次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展示全貌。同时，还是元代曲坛第一次出现“酸斋”这个别号，此前，贯云石别号“成斋”。距此七十年后——明洪武十七年（1384），谢应芳综述元人别号的特点：“前辈以斋居之名著者多矣。其最著者

① 见《元婚礼贡举考》的“皇庆科举诏”节。

② 《贯公神道碑》（《圭斋集》卷九）：“会国家议行科举，姚公（姚燧）已去国，（贯云石）与承旨程文宪公（程钜夫）、侍讲元文敏公（元明善）数人定条格，赞助居多。今著于令。”

曰诚斋、简斋、容斋。又有以先正箴铭而传者，曰敬斋、求放心斋是也。其后一变，曰疏、曰酸、曰松雪者纷纷然，人争效之。斋之义远矣。”[①] 卢挚（疏斋）、贯云石（酸斋）、赵孟頫（松雪斋）先后出现在文坛，是元代文学成熟的标志。贯云石是因为好食醋，而以酸斋为别号的[②]。一次，贯云石以半开玩笑的语气对《阳春白雪》的编者杨朝英说：“我酸，则子当澹。”[③] 从此杨朝英便以“澹斋”为别号。谢应芳是以文人别号的转型，来反应文体的兴替。

杨朝英，号澹斋。青城（四川灌县）人。行年大致与贯云石相仿，活动于元代中期。“杨氏二选”先后出现，不但推动、推广了元曲创作，也是元散曲作品赖以保存至今的重要总集。杨朝英本人所作散曲亦有时名，《太和正音谱》评其艺术风格说其词“如碧海珊瑚”。杨维桢甚至认为，元散曲“奇巧莫如关汉卿、庾吉甫、杨澹斋、卢疏斋”（《东维子集》卷十）。

在此前后活跃在文坛的“非主流”文人，有陆厚、王炼师、汪济、赵叔英等。

这些人与他们的诗，从未见载于《元文类》《皇元风雅》《元风雅》等总集，也从未在元代单行的诗文别集里看到与他们有关的文字。他们都是“影子诗人”。如果没有改朝换代，他们的位置应该在《江湖集》中。陆厚与王炼师竟异口同声自称“我本儒家流”，是为表示科举中断才是他们游走江湖的原因。

陆厚，字里不详。家世业儒，自称“我本儒家流”（《火后寓居有叹之作》），“吾家宗儒道”（《寿之以诗谢我因复用韵谢之》），曾在官府作吏目，又以授徒、卖文为生。工诗文，善书画，有别集《幼壮俚语》，未见传本，其人其诗仅见《诗渊》与《永乐大典》。据其诗篇，一生足迹不出两浙、吴中，写作时期从大德九年到后至元三年，长达三十多年。前期与贯云石游，后期则是钱霖（即元曲家钱抱素，字子云，号素庵）的诗友，并以诗与散曲唱和。《诗渊》录有陆厚诗多达227首。至治三年所写《癸亥良月二十八日偶书》[④]：“景物大荒凉，人情易感伤。论诗扶酒兴，强酒沃诗肠。日夕千山紫，霜风万木黄。堪嗟南向雁，侵暮两三行。”其诗作是元代“江湖派”的

---

① 《持敬斋记》，《龟巢集》卷十五。

② 见《元西域诗人群体研究》第157～158页。

③ 邓子晋《朝野新声太平乐府序》。写这篇序的时候，已经是至正十一年，贯云石早已作古。

④ 见《诗渊》3939页。

典型风格。

王炼师，名不详。金华（今属浙江）人。早年出家为道士，长期住持金华赤松山冲和道院，以诗鸣于方外，有诗集《竹林清风集》，为此在道院中建高楼名为“清风楼[1]”。但除《永乐大典》与《诗渊》，王炼师与其《竹林清风集》未见著录。《永乐大典》《诗渊》等书有《竹林清风集》佚诗109首。据存诗，可知活动于元代前期，以诗投赠于石、阎复、张仲寿、胡长孺、贯云石、冯子振等名人。自称“我本儒家流”，“早从赤松子”（《效杜陵翁体奉赠韦左丞丈韵上李叔固大丞相》），广事干谒以求名利，并曾北游上都。以纪行诗为特色，写有《上都》《大都》《雄州》《峄州》《涿州》《河间府》《兖州》《茌平》等诗。延祐、至治年间又出游大江南北，在京口、扬州、淮阴、桃源、吴江、杭州等地作过逗留。

姚燧去世。享年七十六岁。

作为元代前期文坛的关键人物之一，关于姚燧，有不少故事在民间流传，与其他翰苑名臣有区别，说明对他人们有不同的解读。一阕小词〔菩萨蛮〕成了他的“绝唱”。

姚燧（1238－1313），字端甫，号牧庵。祖籍营州柳城（辽宁朝阳）。他是金元之际的理学家姚枢的侄子，姚枢迁居河南洛阳，又在河南辉县的苏门山栖隐讲学，而姚燧三岁时丧父，自幼随姚枢居住，受到姚枢照顾与教诲。元初北方学术界，以“苏门”为姚枢代称。姚燧早年又师从许衡，24岁开始研读韩愈古文，并学写古文。至元十二年授秦王府文学，曾三次出使四川，至元十七年授陕西汉中道提刑按察副使。从此仕途顺利，至元二十四年任翰林直学士，至元二十七年改大司农丞。元贞元年参修《世祖实录》。大德五年出为江东廉访使，大德九年任江西行省参政。元武宗至大元年为太子宾客，不久又拜太子少傅，所谓“太子”，就是元仁宗。明年，授翰林学士承旨。至大四年告老南归，卒，谥文。姚燧是元代有名的大儒，当朝三十年间，名臣勋戚的碑传多出自其手。他生前得享时名，并以“慎许可”著称。时人往往以他为当朝最好的古文家，并比之唐代韩愈，宋代欧阳修。诗文集《牧庵集》，原本已不存，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据《永乐大典》及元代文献重辑成《牧庵集》三十六卷。

姚燧〔菩萨蛮〕词有小序:“皇庆癸丑春赏花词。”他就是在这一年去世的。词写道:

---

① 胡翰有《清风楼记》（《胡仲子集》卷七）是为王炼师的弟子倪天申、赵子安作。

两闲日月同悠久，算来无比东郡寿。一岁一归来，光风吹九垓。花枝依旧好，只自伤垂老。七十六年人，看花能几春。

这果然是他最后一次得见春光。

作为〔菩萨蛮〕词的参照，有一个关于姚燧的故事：

姚牧庵学士致仕于家。年八十时，夏日沐浴，有侍妾在其侧，公因私焉。公起，妾前拜曰：主公年老，贱妾倘有娠，家人必见疑。愿赐识验。公因捉其围肚，题诗于上曰：八十年来遇此春，此春遇后更无春。纵然不得扶持力，也作坟前拜扫人。公薨后，此妾果有子。家人疑其外通，妾出此诗遂解①。

除了将姚燧、姚镛扯在一起，此外姚燧享年七十六岁，并无八十寿数，所以故事的真实性亦颇可疑②。而且这里记述的，是古代文学常见的故事素，读了它，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二拍”“三言”中的话本小说，比如《滕大尹鬼断官司》。

可是，通过上述故事，对姚燧，特别是他的〔菩萨蛮〕词，却能够体会出言外之意。对于认识姚燧，这阕小词比得过连篇累牍的志传文字。区区几十个字，姚燧就写尽了一个功成名就的文人的迟暮之感，并且传递出由于迟暮带来的失落。正是这些微妙难言的情感，打动人心。

郝天挺去世。享年六十七岁。

郝天挺（1247—1313），字继先，号新斋。自金朝定居于安肃州（河北徐水）。郝天挺是将门之后，早年师从元好问。受到元世祖赏识，任为云南行省参政，又擢陕西汉中道廉访使，不久入朝任吏部尚书，拜中书左丞。元成宗去世，元武宗入继大统，郝天挺曾参与谋划大计。元仁宗即位，又召故老郝天挺、张闾等十人议政，革尚书省，遂成皇庆之治。出任江西、河南二省右丞，召拜御史中丞，曾上书陈七事，都得到肯定。不久，拜河南行省平

---

① 见元明之际人叶子奇《草木子》卷四上。这条记载有一定问题，在最后，叶子奇说：“姚公名镛，字希声。”元人姚燧号牧庵，别集就叫做《牧庵集》。姚镛是宋人，一字敬庵，而且姚镛从未作过学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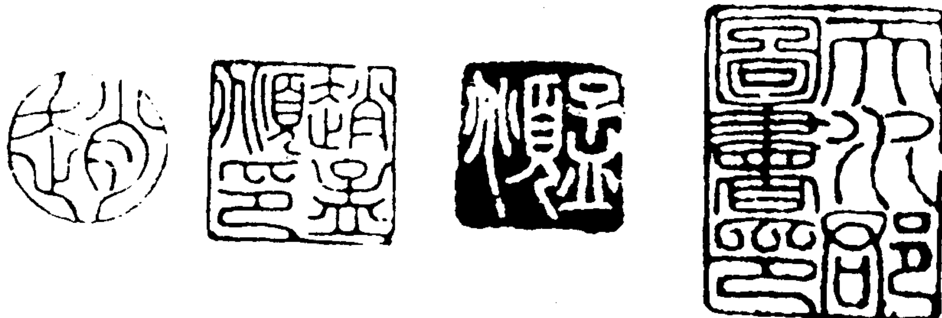
② 与此类似的事，不止一次见于元人记载。孔齐《至正直记》卷三“老儒遗文”节，提到作者的父亲于延祐五年在嘉兴幕府听说的一件事，就与此大同小异。那首诗云：“七十余年一点真，此真之外更无亲。虽然不得供温清，也是坟前拜扫人。”

章政事。卒，追封冀国公，谥文定。曾为元好问所编《唐诗鼓吹》作注。赵孟頫在序中说：郝天挺“当遗山先生无恙时，尝学于其门，其亲得于指授者，盖非止于诗而已”。“遗山之意深矣，非公不能发比兴之蕴。”（《松雪斋集》卷六）郝天挺是元曲家，《录鬼簿》列名于“方今名公”节，《太和正音谱》列名于俱是杰作一百五十人中，但散曲作品今已不存。还著有《云南实录》五卷，亦不传。按：金代另有一郝天挺，是郝经的祖父，曾为元好问的老师。

延祐元年甲寅（1314）

元旦。赵孟頫作〔中吕·万年欢〕曲，庆祝新春佳节。

这首散曲注明是为“元日朝会”作。几年前，至大元年朝会的贺曲是贯云石所作。元仁宗对赵孟頫的宠信，使他由衷写出了“万象生辉，帝德光昭四表”的词句。



赵孟頫用过的印章。

正月十五日（上元）。赵居信为自己的著述《蜀汉本末》失而复得，写了一篇跋语。

《蜀汉本末》三卷，是《三国志》—《资治通鉴纲目》—《三国志平话》之间的阙失环节。为中国古典小说第一书《三国志演义》在宋元的过渡，提供了研究标本。

赵居信，信都（河北冀县）人。至治年间仕至翰林学士承旨[①]。一生著述

① 据《元史·世祖本纪》，在至元二十九年三月，御史大夫建议从外地招回京师出任翰林的十人当中，就有赵居信。

颇丰，除《蜀汉本末》，据记载还有《经说》《理学正宗》《礼经葬训》《宴谈家训》等[1]。宋亡之后的至元二十五年戊子，通过友人提供，他才读到朱熹《通鉴纲目》，完全接受了“以蜀汉为正统”的观点，并用三年时间写了《蜀汉本末》三卷，此后，手稿竟然遗失。到本年，赵居信乡人出示了一部其父当年手抄的《蜀汉本末》书稿，于是赵居信对旧稿作了重编修订，并写下一篇跋。至正九年，赵居信的儿子出任建宁路总管，建宁路建安书院的山长黄君复读了本书，就在建安刊刻了《蜀汉本末》，希望“后之览者，知正统之有在”。等到刊刻出版时，已经是至正十一年，类似汉末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局面即将重演。黄君复在跋中特意指明，他希望赵居信的著述“其于世道岂小补哉”。就在《蜀汉本末》失而复得，重新编定不久，福建建安出版了《全相平话五种》，《三国志平话》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一种。《蜀汉本末》也是始刻于建安。《蜀汉本末》的写作与缘起，对了解《三国志平话》的成书，或有启示。《四库全书总目》认为：《蜀汉本末》只不过是将“《资治通鉴纲目》中断取数卷，略为点窜字句耳，不足当著书之目也”，所以仅将其列入“存目”。这是以史学的标准作出的评判，对于文学发展史来说，它自有其价值。

正月十五日（上元）。朱德润写《上元夜闻有司括勘田粮并禁金玉》诗。

《上元夜闻有司括勘田粮并禁金玉》（《存复斋集》卷十）诗云：

> 东风凝寒寒欲谢，凤历初临三五夜。闲门寂寂暗尘生，闻道喧吟在官舍。吾闻终岁食在农，耕桑处处随春风。东南疆界有程限，何须括勘劳农工。古来礼制缘人情，骄奢逾越有常刑。世间金玉众所贵，讴歌乐土民怀生。普天之下皆王土，日中为市通商贾。四民衣食在勤生，以法急之何所措。弘羊一来人意殊，愁者已多欢者疏。大人不问逃亡屋，世事悠悠争可图。

这首诗是较早出现的写时事的作品，而且直接引入了一个夜晚的见闻与感触。

二月四日（立春）。元怀为所著笔记《拊掌录》作自序。

元怀，号醳然子。《拊掌录自序》中说：“东莱吕居仁先生作《轩渠录》，皆记一时可笑之事。余观诸家杂谈中亦多有类是者，暇日裒成一集，目之曰《拊掌录》，以补《轩渠》之遗。”所谓《拊掌录》，是笑话集，作者主要是

---

[1] 见〔万历〕《开封府志》卷二十六“艺文”。

就宋代文献剪裁成书，元人这类笔记颇多，但纯是集中笑料的并不多见。

二月。赵世延由侍御史拜中书参知政事。

在廷议参知政事人选时，中书省臣居然这样上书："比奉诏汉人参政用儒者，赵世延其人也。"元仁宗马上更正："世延诚可用，然雍古氏非汉人，其署宜居右。"[①] 作为雍古氏也里可温，赵世延当然是色目人，将他比为汉人任用，是降了一格。也可见蒙古色目权贵心目中对他的观感了。一个月后，又命赵世延纲领国子学，足见仁宗对他的信任。

三月。中书平章察罕致仕。

察罕，即所谓"白云平章"，西域班勒纥城（即今巴勒斯坦）人。原名益德，察罕，蒙古语"白"之意，别号即为白云，元仁宗赐姓白[②]。至元二十四年，从镇南王征安南，元仁宗即位，历中书参政、平章政事，晚年寓居德安白云山。著有《帝王纪年纂要》[③]。

大德、延祐间一个著名的典故是：滕宾（滕斌）到京西西山拜访平章察罕，未见，在他家墙壁戏题一首诗，有"后夜月明骑鹤来"之句，未留名字，被察罕诡称吕洞宾所题，一时耸动，传为有仙人显灵，"朝野辐辏，宠赉山积"。当察罕知道这是一个误会之后，竟贿赂滕宾，要求他不要说明实情，使之继续作为"神迹"。

三月二十五日。王振鹏出任秘书监典簿[④]。

王振鹏，字朋梅，号孤云处士。永嘉（浙江温州）人。官至漕运千户。秘书监典簿只是从七品的小官，但也算"天子近臣"。王振鹏受知于元仁宗，"孤云处士"别号就是元仁宗所赐。作为元代最有名的界画画家，王振鹏传世作品有一种相当特殊，即《唐僧取经图册》[⑤]，这实际是一种早期《西游

---

① 据《元史》本传。《元史·仁宗纪》系此事于延祐元年二月甲戌。元代的政治格局是，同样的职务，蒙古色目人为长（居于右）。

② 徐明善《芳谷集》卷二有《白云平章察罕赐姓白氏序》。

③ 见《金声玉振集》，程钜夫作序。

④ 元王士点《秘书监志》卷九"提名·典簿"：王振鹏，延祐元年三月二十五日上。虞集《王知州墓志铭》（《道园类稿》卷四十六）说："永嘉王振鹏之学，妙在界画。……延祐中得官，稍迁秘书监典簿，得遍观古图书，其识更进，盖仁宗意也。"

⑤ 日本平成十三年（2001）影印出版了《唐僧取经图册》，并附录了矶部彰的《元代〈唐僧取经图册〉研究要旨》与板仓圣哲的《传王振鹏〈唐僧取经图册〉在元代画史中的位置》两篇论文。首次全面介绍了这个资料。

记》故事的连环画。包括《唐僧取经图册》在内的许多事实都显示出对通俗小说的酝酿期——元代，关注尚不够充分。

王振鹏《唐僧取经图册》是罕见的元人制作的连环画，目前保存在日本。全图装裱为上下两册，32幅大都有题签。上册是：一，（凉州城内）；二，张守信谋唐僧财；三，（烽官赶唐僧）；四，石盘陀盗马；五，遇观音得火龙马；六，流沙河降沙和尚；七，毗沙门李天王与索行者；八，八风山收猪八戒；九，唐僧过女人国；十，佛赐法水救唐僧；十一，飞虎国降大班；十二，飞虎国降小班；十三，五方伞盖经度白蛇；十四，佛影国降瞿波罗龙；十五，玉肌夫人；十六，旃檀大仙说野狐精。下册是：一，释迦林龟子夫人；二，金葫芦寺过火炎山；三，过魔女国；四，东同国捉狮子精；五，六通尊者降树生囊行者；六，金顶国长爪大仙斗法；七，中印度寻法伽寺；八，哑女镇逢哑女大仙；九，明显国降大罗真人；十，悬空寺遇阿罗律师；十一，过截天关见香因尊者；十二，毗篮园见摩耶夫人；十三，白莲公主听唐僧说法；十四，万程河降大威显胜龙；十五，唐僧随五百罗汉赴天斋；十六，唐僧取经回国①。与《西游记》比较，这些“西游”故事，或似是而非，或完全陌生。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相比，内容、人物都要丰富，而且也不是出自同一个故事系统。

《唐僧取经图册》的早期流传情况不详，而且未见著录，这是确认为王振鹏所画的“空门”，但这32幅画无疑是元人风格。而且就从上述内容来说，也可以肯定它远早于“西游”故事定型的明中期。目前的画幅顺序不一定就是原来的顺序。它可以证实：在元代存在与“西域记”“慈恩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这两个系统之外的西游记故事。它与《朴通事谚解》中提到的《西游记》应该是并行的。在《全相平话五种》《新编五代史平话》之外，应有《西游记平话》存在。可以推断，“三国”“水浒”“西游”等杰出的长篇小说，在正式成书前很长的时期，确实有一个酝酿、聚合、淘汰、精炼过程，而这个过程主要发生在元朝。

五月。元廷再次重申，禁止民间广泛流传的“妖书”“妖言”。

民间秘密宗教延绵是元代的特殊社会现象。在元末长期战乱之前，就已经屡见端倪，而元末起事者，背后都有秘密宗教隐现。针对这个情况，延祐元年中书省御史台发出呈文：由沔阳府居民陈兴祖首告，傅万一的妻子阿李

① 在第十六幅左下角，有“孤云处士”的竖行款识。款识的左侧被有意识刮毛了一小条，大小与款识相等。按书画收藏惯例，这大约是曾经有人想改题作者——比如唐人尉迟乙僧——而动的手术。

请人抄录了一份“天降经文”，“经文”预言今年有巨大灾难，“山崩地裂，人死九分”，并由此追究到印刻经文的人李行余等人。本拟治罪，但最终“钦遇释免”。这一现象与元代的优待释道和别的宗教、不大在乎舆论等政策关系至巨。早在元世祖至元年间，中书省就多次就传播“禁书”作出裁决，但比之其他朝代，这些禁令不足以产生威慑作用。本年禁妖书妖言的背景是：

至元三年十一月十七日，中书省奉圣旨，缴纳“天文图书”“太乙雷公式”“七曜历”“推背图”等，“如限外收藏禁书并习天文之人，或因事发露，及有人首告到官，追究得实，并行断罪”。

至元十年二月，中书省大司农孛罗上奏，重申上缴的“阴阳禁书”，“都叫分付与秘书监者”。

至元十八年三月，再行禁止“五公符”“推背图”“血盆（经）”以及“天文图书”等以白莲会名义传播的“一切左道乱正之术”。

至元二十一年五月，中书省又为“苗太监”“伪造图谶文书”一事请旨。

至元三十一年十月，中书省御史台禁止《博文录》一书的传播。

以上出自《通制条格》卷二十八“妖书妖言”与“禁书”两节，是政府档案。

议决恢复科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邓文原《试院瑞梅诗序》（《巴西集》）说：延祐元年恢复科举，江浙行省以南宋原来的三省为“校士之所”，有“梅开二度”之寓。宋元相比，科举对诗学的负作用有所不同。欧阳玄《李宏谟诗序》（《圭斋集》卷八）中特意说:“宋讫，科举废，士多学诗。而前五十年所传士大夫诗，多未脱时文故习。圣元科诏颁，时亦未尝废诗学，而诗皆趋于雅正。旧谓：举子诗易似时文，正未然也。”

邓文原是江浙行省首届科举的乡试阅卷官，欧阳玄本人则是首届进士之一。

宋元之际，文人传统的出路被堵死，取消了科举是影响广被的事件。宋元之际诗人顾逢所谓“五字田家”，是表示笔耕自给。刘岳申写了《纸田赋》[1]，与其相呼应。“今吾是田也，所耕者道，所种者德。以笔墨为耒耜，文籍为稼穑。……未几，科举诏兴，宾贤取士。东皋子复见先生，曰‘吾田已秋，先生赐之。’”文人参加科举，是一生学业（耕耘纸田）的“收获”期。

---

[1] 赋见《青云梯》卷下；又见《全元文》第21册，第391～392页。

八月。延祐首科乡试，福建建安人才济济，且多出于毛直方门下。

毛直方，字静可。建安（福建建瓯）人。勤于著述，工诗能文。南宋咸淳九年（1273）以《周礼》领乡荐。南宋亡，当权者想举荐他，他说："使我得贫室如宪，穷巷如颜，是得天之厚者，安敢求于分之外耶?" 直以孔门弟子原宪、颜渊为标榜。他隐居乡里，靠教学生为生，元仁宗复行科举时，本郡以明经擢进士的多出于其门下，行省又向上推荐了他，准许他以儒学教授身份致仕，并终身享有半俸。在诗文方面，他本人的成就并不大，但对于福建一省的文化传承作用却不容忽略。

八月。江西乡试以《石鼓赋》为题，共取22位乡贡进士。

科举恢复，是社会生活的一件大事，并调动起文人的积极性。乡试之后，各行省纷纷出版传录了"范文"，以供学习。《延祐甲寅科江西乡试录》[1] 是今存的一种，其中录存了8篇"命题作文"的《石鼓赋》，显然这八位作者都是乡试的中举人。他们是：李丙奎、徐汝士、王与玉、陈祖义、李路、罗曾、吴舜凯、苏弘道。那一年江西中举者共22人，上述八人之作则是最优秀者。

刘岳申《送叶审言归浙东序》（《申斋集》卷二）就江西一省科举总结说："江南内附三十有八年而科举兴，科举又十有七年矣而江西为盛，江西莫盛庐陵，庐陵莫盛吉水。"

几位一生期望恢复科举的文人，参加首科乡试之后，纷纷退出。

其中包括陈栎、陆文圭等人。他们的退却，是顺应潮流的艰难之举。延祐元年，复行科举，主管部门强使陈栎参加省试，中选，他再未进京赴试礼部，而是回到乡里，在家中教授学生，数十年足迹不出门户。由他在泰定年间组织"小桃园诗盟"，显然是力图对科举失利作出补充。同样，科举乡试，主管部门强使陆文圭就试，他几届中乡试，但以老疾不应徵召，泰定、天历间应聘设教于容山。

特殊的还有郭畀。在当时郭畀已有时名，"以经明行修，宾兴于乡"，本来乡试是势在必得。江浙乡试的第二场，试题为《太极赋》，天方正午，他在考场散步，监试的宪使佟伯起看到，让人将他叫来，问过乡贯姓名后，说："汝赋已就乎?" 郭畀说："已纳卷矣。" 佟伯起又问："汝能背诵乎?" 郭畀应口

---

[1] 《延祐甲寅科江西乡试录》，附见于《宋元科举题名录》的清抄本之后，有清人钱大昕的跋语。

朗诵了自己作的《太极赋》。佟伯起让他再当场作一篇《秋旸赋》，也挥笔立就。佟伯起大奇之，说："取士得如此，足矣。"但等到揭榜，郭畀却榜上无名。据说是"考官避嫌也"。从此以后，郭畀文誉益进，但再不应举[1]。

另外，一些宿儒在科举恢复后却屡试不第，比如刘诜。

秋。返回江南途中贯云石路经梁山泊，用一首诗换取了渔夫的以芦花为芯的被子。这首诗与这件事"天下喧传"。

正在仕途得意的贯云石，因向皇帝上"万言书""不报"，便辞官返回江南。途中路经梁山泊时的一段经历，使他写出《芦花被》（《皇元风雅》前集卷一）诗。《芦花被》序及诗云：

> 仆过梁山泊，有渔父以芦花为被。仆尚其清，欲易之以紬者。渔父曰："君尚其清，愿以诗输之。"
>
> 采得芦花不涴尘，绿莎聊复藉为裀。西风刮梦秋无际，夜月生香雪满身。毛骨已随天地老，声名不让古今贫。青绫莫为鸳鸯妒，欸乃声中别有春。

从此，贯云石又以"芦花道人"为别号，他的换芦花被诗"天下喧传"，一时和者众多，还画成图画，并出现了咏物诗的新题目——咏芦花被[2]。芦花被诗与本事，实际是在四种不同种群、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北人与南人等等这些通行标准之外，以"清""浊"来判断好坏、是非的不同价值取向。正因为如此，它一出现，便在文人中风行草偃，提领舆论。

九月。胡长孺作《送欣都朱卢饶诸生会试京师序》[3]。

江浙行省乡试时，共有1200位士子试于钱塘。乡试合格，并得以参加会试的，共有蒙古色目5人，江浙闽籍28人，取录取比例竟然是三四十比一。其中，蒙古色目第一人欣都，江浙闽籍第九人朱嵘、第二十一人卢可继以及江西行省的第七人饶抃都是胡长孺的门生，从其授经。为此，胡长孺写了一首五言古诗相送，并在诗前冠以序文。钱塘，是南宋故都。士子再次云集于省会，距南宋亡国已经有三四十年。胡长孺的诗写道："五湖草绿净，北固风光遒。大江荆扬会，长淮日夜流。""勉哉二三子，毋为昔贤羞。"

---

① 俞希鲁《郭天锡文集序》，《快雪斋集》卷首。
② 谢宗可《咏物诗》，有《芦花被》一题。
③ 见明叶盛《水东日记》卷十二"胡石塘送诸生诗序"。

刘埙于一次宴会之后，写《义犬传》，为至元年间上演的永嘉杂剧“祖杰”在流行期间的演变提供了新的关注点。

元人刘埙有一篇散文，叫《义犬传》（《水云村泯稿》卷四）。作者于延祐元年到延平，作延平路总管儿子的塾师。时年已七十五岁。在总管府一次聚餐时，他听到总管韩国宝与泉州路儒学教授、永嘉人林南谷在席间讲祖杰的事，很感兴趣，就请他们作了详细介绍。他将主要情节写在了《义犬传》之中。刘埙《义犬传》情节与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上“祖杰”节）所云经过，颇有异同：

永嘉有个姓陈的士人，家住城中，薄有资产，因为他是儒户却颇富有，州县官府常摊派差役。他受不了，就采取捐田入寺的方式依附于祖杰，并且放弃了原来的里居，搬到江心寺附近。祖杰也常到他的家里做客，看见他的妻子相当漂亮就起了歹心。一开始是在他家出入，时间久了索性将其妻子用轿子抬至寺中，停留一整天才回家。妻子常怒骂：“初为避官府，谋庇身，今反失身如此。汝为人夫，甘忍辱耶！”他开始密谋，想逃出祖杰的势力范围。他在一个离岸不远的海岛得到一处房屋，那里是大聚落，设有巡检司，还有一座佛阁。准备好了，就举家宵遁，逃离江心寺。祖杰为此十分恼恨，一旦查出他的下落，便以重金收买了14个恶少作杀手，要杀陈氏一家，并说：“截取妇人双乳来为证。”恶少们衔命前往岛屿，乘夜杀了陈家七口，将陈妻双乳揣于怀中。在纷攘中，天亮了，恶少们害怕被巡检司发现，赶忙趋舟鼓棹而去，匆忙中却将其中一人遗留在岛上。天大亮了，这人仓皇失措，潜登佛阁，藏在壁间。巡检听说辖区出了凶案，立即率士卒追捕凶手，但已经人影全无。他在佛阁休息，里社为他们做了饭。这时被灭门的陈家的一只狗在附近跳跃狂吠，轰走了马上又回来，而且叫得更厉害了。巡检举箸，狗如同发了疯，甚至冲翻了杯盘，怎么轰赶，它也不走。巡检走到哪儿，它就追随到哪儿，直至咬着巡检的衣襟，将其引到佛阁，然后仰面长嗷。巡检感到不同寻常，就带士卒登阁巡视，发现壁角露出了衣襟。再仔细看，有一个人胸怀利器正躲在壁间。抓获了这个人后，在他衣襟里搜出一对乳房，他只得如实招供。巡检马上将祖杰的党羽一一捕获，先在县，后在府，两审得到实情。温州路有不少人为祖杰收买，但祖杰曾得罪过一个同知。获悉案情，同知马上上报万户府，派遣重兵将江心寺团团围住。祖杰自己来到寺外，说：“吾既能做事，岂不能当事？官姑稍宽我，容入房收衣钵行矣。”回到寺内，他马上将自己聚敛的珍宝装在四个包袱里，交给门徒，叫他赴大都求援。收押中，他爽快地承认了罪行，总管则采取了拖延战术，专门等待京城消息。不久，

就传说皇上要召见祖杰，那个同知交代狱卒说:“僧奸良人妇，又谋杀七人，可恕乎！汝速‘处置’，明当赏汝。”狱卒等祖杰酒足饭饱，马上变脸，让他站起来，戴上枷吊在梁上，借沙袋之力将头扼向后，活活将其憋死。祖杰刚死，圣旨到了也没有用了。同知由此广受好评，得到台省交荐。

通过《癸辛杂识》与《义犬传》两个文本的异同，一是可以辨认出，一出戏剧是怎样“诞生”的脉络；二是可以看出，它对社会生活有着怎样的影响。周密的《癸辛杂识》写于至元大德间，消息得自处理此案的直接关系人。可以认为：周密所记，就是事情的基本经过；刘埙写下的，实则是在民间广泛流传了二十多年的戏文内容，这个戏文，或许就叫《义犬记》。通过二三十年间的流传，它对江南（特别是两浙、温州一带）的影响相当广。与江山鼎革、皇陵被掘不同，它只是江南社会生活的一个特定段落，这样的事件如果不是经文人之手揭出，而被“淹没”的多不胜数。但经过了民间感情的“修理”，同样成了标志性事件。从发生真实案件到写入戏文，这个过程中走的“路程”就是文学家对生活素材的处理过程：人物更精炼集中，情节更曲折跌宕但枝蔓全归并到主干，是非更分明，同时，“犬”的形象更突出，事实上一个丧家之犬成为社会良心所系。《义犬传》里，除了那只狗，再没有更感人的正面形象，搜捕罪犯的巡检是尽职的官吏；杀祖杰的同知虽是官府化身，但他不是为伸张正义，而是衔恨报复。江山换代初期，人们还没有真正认识到从“宋”到“元”，自己失去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但通过这个案例以及人们通过文学作品对它的“改造”，体现出民众对统治者的基本要求，只是是非分明即可。

异族用超级武力，违背民心，强行占据了广袤国土，作为一个普通民众，他仍然可以指望在此后获得公平与正义。尽管与以前同样需要耐心。

刘埙是南丰人，席间老提到祖杰的两个人，其一是当时的延平总管韩国宝，河南信阳人；其二是当时的泉州儒学教授林南谷，则是平阳人。元代，温州路属江浙行省，永嘉是其倚郭县，平阳是温州路最南边的州；延平路(即今福建南平)，与温州路之间，还隔着一个处州路。其时在延祐元年，离开此事的发生年代已经至少二十年了。这都足以说明：不管是谁想到用编写一部戏文来暴祖杰之恶，扬义犬之名，为民伸张正义，他都达到了目的。

发生在延祐初的一件错综复杂的连环凶杀案，受到文学家的关注。

宋本《工狱》是纪实散文的范例。宋本有《至治集》四十卷，但未能流传至今。《工狱》靠选录进《元文类》卷四十五，而得以保存。元代散文出现的叙事化倾向，在这篇紧张得使人几乎喘不过气来的文章中，有典型的体现。

……京师有个官方的“小木局”，管理着为官家做事的木匠数百人。小木局中有个工人与工长有过节，半年不相往来。工友们为他们调解，让工人携带酒肉上门和解，尽醉而归。工人的老婆有外遇，并且早就想谋害亲夫，于是就钻这个空子当晚杀死丈夫，将尸体分割为四五份封埋在家中的土炕里。第二天老婆却到工长家去哭闹讨要丈夫，说丈夫一夜未归，并向巡院告状，说工长杀死了丈夫。工长受刑不过而诬服……

在短短的文字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案扣一案，而且冤冤相衔，系成了一个几乎解不开的死扣。宋本从本案的办案官员文谦甫口中获悉案情，并写出了《工狱》一文。因为延祐初年宋本并不在大都，宋本、宋褧结伴于延祐六年才返回京师。所以，这篇文章一定是此后有了一个传播、酝酿过程，再写定的。从发生真实案件到出现在书面上，正是行走在公案小说从生活剥离再影响生活的路径上。

卢亘去世。享年四十一岁。

卢亘（1274—1314），字彦威。濮阳（今属河南）人。其父卢克柔曾任河南行省参政。自幼颖悟，元贞年间，曾拟著《滕王阁记》受到姚燧赏识，举为国史院编修官，迁翰林应奉。辞职回河南省亲，因父亲去世家居服阕。后出任翰林修撰，升翰林待制。文集未见，少量文章保存在《元文类》等书中。诗名大于文名，据说一时名流都纷纷学习他的诗风。其诗不多见，《元诗选》二集选入23首，题为《彦威集》，当系顾嗣立所辑。

延祐二年乙卯（1315）

潘昂霄在翰林侍读学士任上，作《金石例》十卷，专门探讨碑铭等文体的格式作法。

潘昂霄，字景梁，号苍崖。济南（今属山东）人。至元二十六年除南台御史，迁闽海宪佥，大德六年转南台都事，累官翰林侍讲学士。卒，谥文僖。他是《河源志》的作者，《金石例》编订于本年，到至正五年始由潘昂霄之子刊行。全书以金石（碑铭）文字的撰写格式为讨论对象，是同类著述的第一部，元代碑传文字相当受重视。《四库全书》馆臣对《金石例》的编撰体例颇有微词，但又说:“明以来，金石之文往往不考古法，漫无矩度。得是书以为依据，亦可谓尚有典型。”

三月七日。元首次会试于大都举行。廷试录取的两榜状元，是护都沓儿、张起岩。

从皇庆二年十一月甲辰诏行科举以来，恢复科举成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件大事。本年二月己卯，在京师会试；三月乙卯，廷试。以李孟、元明善为廷试监试官。本届共录取进士56人。左榜进士有许有壬、欧阳玄、黄溍、杨载、陈泰、干文传、王士元；右榜进士有偰哲笃、丁文苑（哈八石）、张翔等，是元代文人集中的一届，也是进士个人成就颇高的一届。至正五年，苏天爵这样评论首科进士："延祐乙卯，仁皇初册进士，登第者五十六人。今三十二年，以文词政术知名者十余人；不幸才弗满用而殁者又十余人。官之崇卑则在所不论也。"①

张起岩是元代第一个左榜状元。首科进士中，对元代文学有重大影响的是欧阳玄、马祖常、黄溍、许有壬、杨载。关于欧阳玄，有这样一个传说②：幼年他梦见一匹纯黑色的天马，比普通马大数倍，从天空横扫而过。醒来，他写了一篇《天马赋》。延祐二年，科举的试题，赋就是《天马赋》，欧阳玄得以高中，而他的《天马赋》正是当年写出的那篇。

此外本届两榜进士中有影响的诗文家，还有：

王沂，字师鲁（一作思鲁）。祖籍云中，徙居真定（河北正定）。其父由金仕元，南宋亡后，又到江南任职。延祐二年进士，历临淮县尹、嵩州同知；至顺间为翰林编修，后历国子博士、翰林待制，元顺帝至正初，任礼部尚书。曾主持元统元年科举，并以"总裁官"身份编定辽、金、宋三朝史。卒于至正二十二年以后。有文名，并能诗，曾筑石田山房以居。诗文集《伊滨集》早佚，论元代文学者很少涉及王沂。清初顾嗣立编《元诗选》即未见王沂诗。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王沂《伊滨集》二十四卷（诗文各十二卷）。

干文传，字寿道，号仁里，晚号止斋。祖籍汴梁（河南开封），宋南渡后占籍平江（江苏苏州）。十岁能属文。荐为吴县及金坛县教谕，迁慈湖书院山长。延祐二年进士，延祐四年授昌国州同知，累迁长洲、乌程两县县尹，升婺源知州及吴江知州。干文传长于治剧，所至俱有善政。江浙廉访司佥事韩镛曾作《乌程谣》，以纪干文传在婺源的政绩。至正三年预修《宋史》，书成，擢集贤待制。以礼部尚书致仕，享年七十八岁。所著《仁里漫稿》，今佚。

---

① 《滋溪文稿》卷三十《跋延祐二年廷对拟用贴黄后》。

② 见《至正直记》卷一"欧阳梦马"节。

梁宜，字彦中，号颐斋。茌平（今属山东）人。由国子监伴读，教授上都路。延祐首科进士，授邳州同知。入为国子监助教，出判大名路，寻知峄州，有政绩，移顺州。至正中累官礼部尚书。能诗，善书法。

王士元，字善甫，号拙庵，又号具川道人。临汾（今属山西）人。延祐首科进士，知吉州。历官风宪，迁国子司业。以崇文少监致仕。《元诗选》三集，据《山西通志》等辑录其诗8首，题为《拙庵集》。

张翔，字雄飞。河西唐兀氏。早年有诗文名，元仁宗延祐二年右榜进士。历西台御史，后至元元年，改南台御史，后至元二年，进南台都事，次年，迁浙东肃政廉访司佥事，又改岭北湖南道肃政廉访司佥事，与同年许有壬交往密切。所作结为《张雄飞诗集》，已佚，许有壬《张雄飞诗集序》（《圭塘小稿》卷五）说："唐兀氏张君雄飞，首科右榜有闻者也。不以一得为足，益砺其学，尤工于诗，往往脍炙人口。佳章奇句，不可悉举。"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四有论列①。

丁文苑（1284—1330），本名哈八石，字文苑。于阗（新疆和田）人，入中原定居大都宛平（北京市）。出身回回世家，父名勘马剌丁，取其末字为姓氏，并以字行。延祐首科进士，历仕左司掾、礼部主事，至治二年任秘书监著作郎，拜监察御史，改户部员外郎、浙西佥宪，在前往山北道廉访司赴职时，死于途中。丁文苑及其子慕禼都能使用汉语写作诗文，并与马祖常、宋褧、王沂等诗文家唱和往还。

此外，作品流传至今的，则有偰哲笃、杨宗瑞、焦鼎、赵贽翁等。

这56位进士，右榜16人，左榜40人②。人数并不多，但它无疑是人才最集中的一届。为安抚落第举子，本年四月辛丑，元廷决定"赐会试下第举人年七十以上从七流官致仕，六十以上府州教授，余并授山长、学正。"同时特别注明"后勿援例"（《元史·仁宗本纪》）。

会试时，人望颇高的陈泰、汪泽民、范梈等纷纷落第。

陈泰，字志同，号所安。茶陵（今属湖南）人。延祐元年与欧阳玄同举于乡，考官在其《天马赋》上批道："气骨苍古，音节悠然"。延祐二年会试下第，授龙泉县主簿，栖迟薄宦以终。陈泰以吟咏自怡，并不热衷做官，有《所安遗集》一卷，首列《天马赋》，并附考官批语，集中都是诗歌。《邯郸

① 《元诗选癸集》中，张翔诗分属张翔（丁集）、张雄飞（丙集）二人；丁集还另有张翱，存诗仅一首《洛阳怀古》，但这首诗即是张翔雄飞《洛阳怀古四首》其四，所以，张翱亦即是张翔雄飞之误。

② 见许有壬《张雄飞诗集序》，《至正集》卷三十三。

道上书所见》写路经邯郸的西北民族商旅："丁丁零零西番经，轧轧剌剌单于曲。西番经，无人听。单于马上琵琶声，乌纱辫发双娉婷。不知是河西，不知是女真？"这是他初次北上的见闻。

同时落第的还有汪泽民、范椁等人。在准备会试期间，范椁与马祖常为邻居。

右榜马祖常会试为第一，廷试降为第二，蒙古人护都沓儿取为状元。但马祖常以后在政界文坛均相当知名，护都沓儿之名则仅此一见。专程到京师参加会试的举子，除南人、汉人（包括高丽）等士人，还有祖籍于阗、大食、康居、西夏等地的人，在代表性广泛这一点上无疑是历史之最。

张珪拜中书平章政事之后，廷议时制止了以教坊使曹咬住为礼部尚书的成议。

《元史》卷一七五《张珪传》说："延祐二年，拜中书平章政事，请减烦冗还有司，以清政务，得专宰相之职，帝从之，著为令。教坊使曹咬住拜礼部尚书，珪曰：'伶人为宗伯，何以示后世？'力谏正之。"这个事件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出伶人对元代政治的影响。但教坊使等官员得以参加朝会，确实是元代的特例。

六月二十四日。赵孟頫为道士祝丹阳作《天冠山二十八咏》，对于咏道教名胜的"同题集咏"① 影响颇大。

天冠山道士祝丹阳见到赵孟頫，并以《天冠山图》相示，请赵孟頫以山中的二十八个景点为题题诗，他计划将手迹在山中刻石。赵孟頫为之各咏五言绝句一首。此后，陆续为《天冠山图》题写"二十八咏"的，有袁桷、虞集、王士熙、王奎、林传、祝尧、马祖常、杜本。时间从延祐二年延续到元统二年。在天历二年，请道教宗师吴全节为《天冠山图》题诗时，吴全节说"子昂诸贤赋天冠山五言诗二十八首，模写已尽矣"，他只写了一首"唐律"。集咏天冠山二十八景，不但时间跨度长，而且参与者地位颇高。

白贲由省郎出知忻州，以忤监郡而去职。

白贲，字无咎，号素轩。祖籍太原文水（今属山西），南渡后居钱塘（浙江杭州）。白珽之子。至治间起为平阳州教授，历常州路知事，终南安路经历。是知名元曲家，《太和正音谱》以其曲为上品，称为"如太华孤峰"，

① 见明人汪砢玉《珊瑚网》卷九"赵子昂诸贤天冠山题咏"。

据《全元散曲》，今存小令2首，套曲4套（其一残），所作〔鹦鹉曲〕相当有名，和者颇多，大德六年时冯子振在上都，即以白贲（白无咎）所作作为讨论〔鹦鹉曲〕曲律的出发点。亦善画，并能诗。

阴时夫、阴中夫兄弟于延祐中编著《韵府群玉》二十卷。

《韵府群玉》二十卷，是元代较早出现的写诗工具书——诗韵。《四库全书总目》针对《韵府群玉》的编撰说："押韵之书，盛于宋末元初。"阴时夫，字劲弦；阴中夫，字复春。新吴人。宋濂曾作《韵府群玉题后》（《宋文宪集》卷十八）。

赵文去世。享年七十七岁。

赵文（1239—1315），字仪可（一字惟恭），号青山。庐陵（江西吉安）人。南宋景定、咸淳年间，曾冒宋姓，名宋永，三贡于乡，入国学为上舍。南宋亡，入闽，与王炎午、谢翱同入文天祥幕府。元军破汀州，与文天祥失散，遁归故里。元初隐居，后出为东湖书院山长，又选授南雄路儒学教授。诗文脱略涯岸，独抒所欲言。有《青山稿》三十一卷，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已不见传本，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青山集》八卷。

陈普去世。享年七十二岁。

陈普（1244—1315），字尚德，号惧斋。福州宁德（今属福建）人。宋亡，元行省三次辟为本省教授，均不起，隐居授徒，四方及门者岁数百人，学者称"石堂先生"。元成宗大德元年，应刘纯父聘，主云庄书院，熊禾留讲鳌峰。有《石堂先生遗集》二十二卷等。

延祐三年丙辰（1316）

三月下旬。刘敏中为张养浩《江湖长短句》作序。

张养浩出使江南仅半年，"得乐府百有余首，辑为一编，目之曰《江湖长短句》"[①]。张养浩主要活动在北方，出使江南，是难得的经历。他的南行之作中"三湘五湖，阴晴明晦之态"以及"羁旅之情，观游之兴，怀贤吊古

① 《江湖长短句引》，《中庵集》卷十六。

之感，隐然动人”。

七月。赵孟頫进翰林学士承旨，并赠封三代。

赵孟頫一直受到朝臣的侧目。“有不悦公者，间言公乃赵太祖子孙。上初若不闻，其人游词不已。上作色以视之曰：‘汝言赵子昂乃赵太祖子孙，岂家世不若汝耶？’其人惶惧趋出。又有上书称：国史所载，多兵谋战策，不宜使公与闻。上大怒曰：‘赵子昂世祖皇帝所简拔，以为帷幄之臣。朕悯其年老，特优以礼貌，置之于馆阁之间，使之讨论古义，典司著述，传之后世，亦足以增重国家。此属呶呶者何也！非加罪一二，无以戒来者。’于是，谤者始息。”[1] 在元仁宗朝，赵孟頫处境较好，据说仁宗曾以李白喻之。

浮梁儒士姚畴，借“民间歌谣”之名为离任的郭郁送行。

《郭公敏行录》（全名《类编复斋郭公敏行录》）是专门为郭郁编辑的“赞颂之词”。大梁人郭郁（字文卿），于皇庆元年赴浮梁州知州之任，五年代去。当地士绅耆宿按惯例为其送行，其中居然有人献上了一组多达数十首的七言绝句，名为《昌江百咏》，说是搜集的当地赞颂其人的“民谣”，并在诗下具体注出“德政”内容，“以俟观民风者得焉”，是将《诗经》以来的“观风”“诗教”传统发挥到了极致，等于一个民间版的离任官员“考核”评级。这种“曲意奉承”的形式，虽然不能说是姚畴“发明”，但目前只有《昌江百咏》流传至今。

《昌江百咏》其中一首说：

千古浮梁锁要津，名存实废几经春。济川小试为霖手，从此应无病涉人。

诗下原注：“浮梁，古以浮桥得名，归附后桥废。皇庆壬子，有以竞渡致杀人者。公悉拘管属龙舟六十余只，横江为桥，名以‘济众’，既革竞渡之扰，因成济川之功。”

另一首则说：

走税飞粮役不均，混淆玉石伪成真。设非挨究更前弊，豪猾皆为漏网人。

---

[1] 见杨载为赵孟頫撰行状（《松雪斋集》附录）。

诗下原注："飞走税粮，官司屡尝拘并，而弊愈甚。奸豪进产而税日减，善良退产而粮日增，故公欲挨究也。"

这些诗虽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民谣"，但确实专门是写给"观风者"阅读的作品。

在文献中，为地方官员歌功颂德的同题材的诗文不时可见，但以数十上百首汇为组诗而联咏之，并归之于民谣（特别是后者），在元代诗歌中仅此一见，恐怕也是整个文学史上所罕见，成了幸存的"文学活化石"，非但是"同题集咏"的特例，也为"百咏诗"设立了新的门径。想必在当时这并不罕见，只不过此类应景的诗文，除《昌江百咏》之外均为历史淘汰，未能流传至今。在今存的文献中，单篇别行的"送行序""德政碑""赠别诗""颂词"之类文字颇常见，但除了《编类复斋郭公敏行录》一书，从未见到这类作品的一个完整的模式。元代有严格的官员考核检查制度，然而，力图以《编类复斋郭公敏行录》一类的总集作某个官员政绩评定的参照，有其特殊意义。在为这部"自来藏书家所未经著录"的秘笈没有因岁月流逝而淹没感到惊异的同时，有人说："然非郭公实有善行感通其间，将虚誉之词能传留五六百年之久耶?"[1]

郭守敬去世后，齐履谦为其写出"行状"。

郭守敬(1231—1316)，字若思。邢台(今属河北)人。从刘秉忠学，精通水利、历数之学，后长期担任河渠提举、都水监、太史令等职，是元代最主要的水利工程家，并对历法的修订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齐履谦《知太史院郭公行状》(《元文类》卷五十)是元代著名的碑传文，全文约6000字，内容丰富，文笔生动，将郭守敬富于传奇色彩、充满成就感的生涯写得有声有色。

释希陵移住杭州径山寺。

释希陵（1247—1322），字西白。义乌（今属浙江）人。俗姓何。十九岁出家于东阳资寿院，后住持袁州仰山太平兴国寺，延祐三年移杭州径山寺。卒后，元文宗天历二年赐号大辨禅师。有诗名，所著《瀑岩集》及语录、偈颂行于世，均无传本。《元诗选癸集》辑其诗仅7首。

揭祐民在此前后曾三次出游京师。

揭祐民，字希韦，因寓居盱水上，号盱里子。广昌（今属江西）人。生

---

①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第2册第363页。

性抗直，曾北游燕赵，东至辽东，遍览故都遗迹，而且三次到京师，拜访公卿名流，曾受到程钜夫礼遇。在渡过黄河时，作《河上赋》，到达海口时，作《河口赋》，而且写有许多纪游之作。泰定年间曾任邵武路经历，敢于直言抗上，晚年自病狷介，又以“希韦子”自称。诗散见《元音》等书，《元诗选》二集选入40首，题为《盱里子集》。

姚式去世于本年前后。

姚式，字子敬，号筠庵。归安（浙江吴兴）人。从敖继翁学，以荐为绍兴路儒学教授，卒于延祐年间。早年优游乡里，以书画知名，与高克恭、赵孟頫为诗文书画之交。其诗散见于总集与书画题跋中。

延祐四年丁巳（1317）

正月。张炎论词著作《词源》成书，钱良右为《词源》写跋语。

《词源》二卷，是宋元重要的词学著作。作者自云：“今老矣，嗟古音之寥寥，虑雅词之落落，僭述管见，类列于后，与同志者商榷之。”这一年张炎六十九岁，在《词源》中他参照了毕生写作实践，力图为词学作阶段性的总结。上卷详论五音十二律、律吕相生以及宫调管色等；下卷专论制曲法。据此，可以考见宋代乐府之制。钱良右为此书作的跋语说：“乙卯岁，余以公事留杭数月，而玉田张君来寓钱塘县之学舍。时主席方子仁始与余交，道玉田来所自，且怜其才，而不知余与玉田交且旧也。因相从欢甚。玉田为况落寞似余，其故友张伯雨，方为西湖福真费修主，闻之遂挽去。子仁与余买小舟并湖，同为道客，伯雨为设茗具馔盘，旋日入而归。玉田尝赋〔台城路〕咏归杭一词，录此卷后。……丁巳正月，江村民钱良祐[1]书。”元人陆文圭《玉田词源稿序》（《墙东类稿》卷五）提到，张炎“自称得声律之学于守斋杨公、南溪徐公。淳祐、景定间，王侯邸馆，歌舞升平。君生处乐郊，不知老之将至。梨园白发，吴宫娥眉，余情哀思，听者泪落。君亦因是弃家，客游无方三十年矣。”这些经历与感受为张炎词作与对词的感受注入了沧桑意蕴。

---

① 钱良祐，又作钱良右，或作钱良佑。

三月。贯云石与鲁山、干文传同游昌国州（浙江定海）补陀山，赋《观日行》诗。

《观日行》（《皇元风雅》前集卷一）诗序云：

丁巳春三月，余之所谓宝陀山。颠有石曰“盘陀”，可观之。初疑其大不可量。既归宿，作方夜半之余诗。僧鲁山同赋。

六龙受鞭海水热，夜半金乌变颜色。天河蘸电断鳌膊，刀击珊瑚碎流雪。朔方野客随云闲，乘风来游海上山。飞骧拖空渡香水，地避中原杂圣凡。壮鳌九尺解霜鼓，瘦纹巨犬自掀舞。惊看月下墨花鲜，欲作新诗授龙女。人生行此丈夫国，天吴立涛欺地窄。乾坤空际落春帆，身在东南忆西北。

这首诗是“铁崖体”出现之前较早学唐人李贺诗风的作品。鲁山，祖籍高昌王国。早年出家为僧，至大三年与黄溍一同去龙翔寺拜会黄石翁，并与邓文原、黄溍、黄石翁会集赋诗，一时传为佳话。据贯云石《道隆观记》（《延祐四明志》卷十八），同游者还有干文传。干文传，是延祐首科进士，本年在昌国州任同知。

郑禧作文言小说《春梦录》。

郑禧馆于永嘉城洪氏，与素未谋面的吴氏之女以诗词定情。由于郑禧已经有了妻室，吴母不愿女儿做二房，坚决反对他们的恋情，以致吴氏女忧郁成疾，一病不起。郑禧将这件事与他们之间的情诗，一并录入《春梦录》[①]。从写作情况看，郑禧虽实有其人，其恋情也并非虚构，但《春梦录》应属传奇小说。

郑禧，字宗鲁，号天趣。永嘉（浙江温州）人。泰定元年登进士第，授黄岩州同知。以他的这段感情经历为内容的《春梦录》，是明清众多才子佳人小说的“出发点”，特别是明人瞿佑《剪灯新话》以及几种续书，实际都是脱胎于《春梦录》。作为一部小说，它基本情节有：郎才女貌、诗文相通、非彼不嫁、受到阻挠、殉情而死。这一情缘发生在延祐四年，终结（吴氏之女死）于延祐五年。《春梦录》前有“延祐戊午永嘉郑禧天趣”自序；后有署名“嘉子述”的后序，所谓“嘉子述”是“不欲知其姓氏，故作此名”。后序是对《春梦录》的评点，但“嘉子述”不能排除就是郑禧自己。《春梦

① 见陶宗仪《说郛》卷四十二。

录》的写作受《会真记》影响明显。

春。张养浩以“公粜”住在兴和（河北张家口）两个月，北方草原沙漠的环境使他对身边事物分外敏感。

在兴和期间，张养浩与馆驿的驿卒佟锁住熟悉后，听佟锁住讲了自己的身世经历，并以其为素材写出《驿卒佟锁住传》（《张文忠集》卷二十四）。

作为纪实文学，《驿卒佟锁住传》写的是元代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掠卖人口。通过这篇传表明，对人的关爱始终是张养浩的着眼点，也等于为他的《三事忠告》张本。《驿卒佟锁住传》开篇即云：“间岁京师编民男女之未成年者因事而出，多为奸民所攘匿，或女胁为婢，子压为奴。不然，则载之遐徼殊域：若辽海，若朔漠，易羊马牛驼以规赢人。”结果，出现了“人市”。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地广人稀的漠北解决劳动力不足的做法，但对于社会安定、对于保护生产力都是明显的倒退。

佟锁住亲口讲述的经历是：

本江西泰和人，七岁时，与群儿戏里中，为过骑掠之而北。凡渡水三，逾岭不知其几，而至兴和。骑者因饮于市，遂命我给事其家。酤者一目眇，刘姓。时固知货我于彼，以幸见留，即不辨。居数月，眇者令我随驼驱者数人徵所负。行二日，无所得，第云：“所居尚远，至则畀汝还。”意眇者又阴货我。闻土俗，奴亡而获者，必钳而黥之。用是，佯以去故事新为喜。所过皆赪山，无城郭居民，少阴即风雪不可前。人以孳畜多寡为富贫，所衣皆皮毳，所食唯酮及胾，无菽粟币帛，以毡为屋状而居。主人以“察罕”名我，且授皮衣一袭，羊二千余头，命服而牧之，且戒曰：“羊有瘠者、伤者、逸者、无故物故者，必汝挞。”距刍地二十里，每出必负糇约他牧偕行，不然，则迷不能返。羊合万余，他畜称是。升高而望，弥川亘野，若云霞四敷，群皆淆焉不能别。甚忧且恐。他牧曰：“汝勿怖，归则自相友矣。”及暮果然，乃复喜。闻同牧者十数辈，皆中国良家子，为奸民所贩至此。因自思违乡井，去父母亲戚，陆沉殊域，奴庸于人，非我独也，自是始少安焉。一日，吾羊寝山麓，有牛百余，自绝顶奔饮于溪，羊不及避，而蹒死十数，意其不免，遂委裘于山，以疑追者，决意亡去。时年十有六矣，颇健于行，始日百里，惟南其向。饥则啮野葱水饮，夜则视穹庐有灯火者往宿焉。有问则以蕃言答之，故无所疑讶者。会值使者，具诘所从来，遂踞语其故，意若见怜，乃辍一骑乘我，始复至此。因走白官，即论眇者以法，而隶我于驿中，

今年余于此矣。

听了佟锁住讲述，张养浩利用手中的职权，令有司移文所路经的关隘一路放行，发给衣粮并护送“陆沉殊域”、放羊漠北的佟锁住还归故乡。

佟锁住的经历，使张养浩惊惧不已。张养浩写《驿卒佟锁住传》目的，是希望“使当路者得以上闻”，以便解决这一社会问题。

九月。刘埙作《诗说》。

作为一篇诗论，《诗说》（《水云村泯稿》卷三）追述了刘埙自己学诗、探讨诗学精义的经过。“至元辛卯秋，予与故友易雪崖闲游南城乡，至欧桥，访小溪周文郁，因过坡下，访彩墅黄卫道。就往金溪县之曾坊，访平山曾仲材。三先生者，皆予旧识也。前修雅望，绰有典型。从容说诗，各得一论，足以补后学之阙漏。今二十有七年矣，雪崖翁壬辰岁先逝；三先生亦相继仙去，宰木俱拱。惟予仅存，而亦年近钓璜，惧来日之有限，前闻之易亡也，因摭其说，载家集，以示吾孙。……予以诸老前后言语参玩，乃知前辈作诗，俱有节度。如今人率尔五七字凑砌成章，遽名曰诗，宜其不足传矣。学不广，闻不多，其何能淑。予窃愧夫造诣之不深，而又虑夫前世之不传，故纂其所闻，以为诗说也。日或嗣有见教者，顾虽老惫，犹愿读书。延祐丁巳重阳口记于东轩。”

刘埙提到的几位前贤，在诗史已经失去声息。刘埙《诗说》则特意记述了元初诗学的众说纷纭的局面，纷纭众说重归于寂，元诗变得更加普及。

雍古诗文家马祖常，以监察御史出使河西。

为马祖常送行的，几乎包括所有大都馆阁之士与知名文人。借此行马祖常回到家族的发祥之地河湟，写出《河湟书事》《庆阳》等诗。前者是元诗名篇。

马祖常（1279—1338），字伯庸，号石田。西域雍古族人。雍古[①]是来历久远的西北古族。辽道宗耶律洪基咸雍年间（1065—1073），马氏所在的这一支雍古族人归附于辽，“自西域人居临洮狄道”。金崛起于北方，雍古成为女真的附庸，为金防守净州以北的边墙，马氏也“徙家净州天山”[②]。马祖常先世最著名的是其四世祖习礼吉思[③]，习礼吉思精通诸国文字，曾为金使出

① 雍古，在中文文献里又译为汪古、旺古、瓮古等。

② 《金史》卷一二四《马庆祥传》。

③ 习礼吉思，又译作锡礼吉思、昔里吉思、习里吉思等。

使刚刚崛起的蒙古。后任凤翔兵马都统管判官，就取官称中的一字“马”为其汉姓，改名为马庆祥，字瑞宁，此后这个雍古家族成为马氏①。入元，马祖常的父亲马润于大德五年出守光州。皇庆二年马润临终嘱咐家人：死后就安葬于光州。马氏便以光州（即今河南潢川）为自己的籍贯②。马祖常是延祐二年进士，文集《石田集》十五卷是元人文集中较有影响的一种。

马祖常以监察御史出使河西，馆阁诗友袁桷有《送马伯庸御史出使河西》③，诗中说：“君行河之西，春雪深五尺”“天山谅非远”“雪山在其西”。而柳贯《送马伯庸御史出使河陇》④则云“河湟陇坻天西壁，御史严行八十驿”；“君行万里从此始，人生百年俱有役”。马祖常风致极佳的小诗《庆阳》和《河湟书事》（二首）便是纪行之作。庆阳与河湟都在出使河西的沿途。《庆阳》（《石田集》卷四）诗云：“苜蓿春原塞马肥，庆原三月柳依依。行人来上临川阁，读尽碑词野鸟飞。”《河湟书事》（《石田集》卷四）则更具特殊情韵：

> 阴山铁骑角弓长，闲日原头射白狼。青海无波春雁下，草生碛里见牛羊。
>
> 波斯老贾度流沙，夜听驼铃识路赊。采玉河边青石子，收来东国易桑麻。

“河湟”，一般是指黄河、湟水之间，“举世谓西戎地曰河湟”⑤。具体说，就是湟州与河州附近地区。而马祖常祖上曾定居的狄道（即今甘肃临洮），就在河湟。《河湟书事》其二，将丝绸之路的商贸生涯写得令人神往。

徐瑞以“经明行修”推为本邑书院山长。

徐瑞（1254—1324），字山玉。鄱阳（江西波阳）人。宋度宗咸淳间举

---

① 另一些文献提到，习礼吉思的祖父铁穆尔越哥曾任辽的马步军指挥使，部下直呼为“马元帅”，后代便以马为姓。但这个因习礼吉思之官而取汉姓马，是出自马祖常本人笔下（见《石田集》卷十三《故礼部尚书马公神道碑》），所以暂以其为准。不管怎么说，马氏是因官为姓的。这也说明，华化的内容之一另起汉姓出现相当早。

② 有的文献称马氏为浚仪（河南开封古称）人，如杨维桢《西湖竹枝集》云，马祖常“浚仪可温人”。

③ 诗共八首，见《清容居士集》卷四。

④ 见《柳待制集》卷三。

⑤ 引自《新唐书》卷一四一《吐蕃传下》。

进士，不第，为本邑书院山长，未几，便归隐于家，巢居松下，字号“松巢”。卒年七十一岁。有《松巢漫稿》三卷，保存在《鄱阳五家集》中。

贯云石回到江南，定居在杭州。

他常以卖药人身份出没杭州市廛。一则记载说：他打出旗号“货卖第一人间快活丸”，有人前来问津，他就摊开双手一笑。

友人叶颙写有七言歌行《第一人间快活丸歌》（《樵云独唱》卷二），就是真实写照：

> 芙蓉仙人冰玉质，貌粹骨刚长八尺。阅遍尘寰扰扰人，玄鬓朱唇双眼碧。利名场里寡交游，势要途中绝踪迹。世夸豪富尚荣辱，信手拈来笑轻掷。留得人间快活丸，行住之间常服食。平生颠沛藉扶持，什袭珍藏深护惜。吞不得，吐不得，快活满怀言不及。十分莹洁灭瑕疵，一味无求甚奇特。香通九窍达四肢，净若明珠赤如日。解歇驰求嗜欲狂，能除奔竞贪婪疾。非辛非辣复非酸，不苦不甜还不涩。天然风韵妙无伦，不让醍醐宁数蜜。服之气定百脉宁，肌肉丰腴美颜色。融和春色动须眉，体健身强百斤力。等闲愈嚼味愈嘉，肪白肤黄炙逾出。时时拈弄与人看，惊起凡愚耀今昔。拟将斯药寿斯民，低价无人肯酬直。

离开大都归隐江南，贯云石率先成为“另类”的色目世臣之后。

释觉恩住云门寺。

释觉恩，字以仁，号断江，又号四明樵者。鄞县（浙江宁波）人。曾历住云门寺、天平白云寺、平江开元寺。道士马臻在延祐四年称其为“云门寺里断江老”（《霞外诗集》卷十），可见其时年辈已高，张雨《句曲外史诗集》卷一有其悼诗。诗名颇著，但诗传世不多见。

畅师文去世。享年七十一岁。

畅师文（1247—1317），字纯甫，号泊然。南阳（今属河南）人，徙襄阳（今属湖北）。从伯颜平宋，授东川行院都事，至元二十八年累迁陕西宪佥，移山南、山东二道，入为国子司业。大德七年除陕西行省理问，历太常少卿、翰林侍读。至大三年出为太平路总管，皇庆二年复召为翰林侍读，进翰林学士。卒，追谥文肃。江南平定后，畅师文较早在原南宋治下任职，又久在翰林院，南北文坛均知名。元人陆友《研北杂志》卷上有《畅师文》，

将他比做宋人米芾。

延祐五年戊午（1318）

虞集出任翰林待制。

虞集一直是文坛的“召集人”。在这前后，通过实际演出，虞集在大都文坛对散曲写作、用韵与演唱的关系，探讨颇多。虞集任翰林待制期间，一次宴集翰林学士散散家。京师歌妓顺时秀为与会者演唱散曲，其中一支〔折桂令〕，是一句两韵，这种句法名为“短柱”，号称“极不易作”，是新奇的创制。虞集当场也写了一支〔折桂令〕，是两字一韵，这要比一句两韵更难①。

御史马祖常执币礼聘隐士丘葵。

对于礼聘，丘葵却而不受，并作诗明志。丘葵可以算是宋元典型的隐逸诗人。“却聘诗”在当时颇有名。

丘葵（1244—1333），字吉甫，号钓矶翁。泉州同安（今属福建）人。笃修朱子性理之学，而终生隐居，不求人知。长期避居于海岛，宋元间人蒲寿宬《心泉学诗稿》卷一有《寄丘钓矶》诗。所作《钓矶诗集》四卷，传本罕见。除那首“却聘诗”，元诗史从无其名。《元诗选》《元诗选癸集》《四库全书》编者均未见其集。另著《周礼补亡》（又名《周礼全书》）六卷。

三月七日（戊辰）。御试进士，以忽都达儿、霍希贤为两榜状元。

本届共录取进士50人，两榜状元，及第后都没有特殊作为。在文学上有成就的进士有：偰玉立、汪泽民、祝尧、盖苗、岑良卿、谢端、韩准、刘复亨等人。另外，本届有了第一个葛逻禄籍进士，即塔海。塔海，字仲良，是廼贤的兄长。他的中举，影响了廼贤的人生追求。

在重新开科举士的大背景下，社会积极性被调动起来，特别是西域人，他们的参与是前朝所未有，也是前辈所未闻。

其中于阗人李公敏成为范例。马祖常《送李公敏之官序》（《石田集》卷九）说：“天子有意乎礼乐之事，则人人皆慕义向化矣。延祐初，诏举进士三

① 见《南村辍耕录》卷四“广寒秋”节。

百人，会试春官五十人。或朔方、于阗、大食、康居诸土之士，咸囊书橐笔，联裳造庭而待问于有司，于时可谓盛矣。然其进之道虽则曰应诏对策，皆不过文艺细碎，矫诬情实，求合乎有司，而觊得一官于天子也，未闻其不为利禄而不干世用，特立而独行，违今而趋古，孟轲所谓'虽无文王犹兴'者也。余在河南，即闻于阗人李君公敏能尊孔子之教而变其俗，涉其学肆以衍，浸渍乎六经，汪濊乎百家，蔚然而为儒者。流离困苦，益自刻厉，教授于青齐之间，赖公卿大夫知其贤名，荐牍交上，用是乃起家而入官焉。且公敏始有志乎古道也，岂必欲公卿大夫之知哉？公卿大夫之知而不可必也，又岂为利禄世资，舍其所有而要其所无者哉？如此，则孟轲谓'虽无文王犹兴'者，吾公敏是已。余今盖知愧焉，于其行，故为序以别。"

李公敏是于阗人，然而在"青齐之间""尊孔子之教而变其俗"，以教授生徒为生。西域古国于阗，其王统延续了一千多年，皇室曾以李为姓，五代时著名的君主叫李圣天。元初，于阗已早不在李氏王朝统治之下，但入居中原的遗民以李为汉姓，颇耐人寻味。元人王旭有两阕〔满江红〕题为《次李公敏韵》[①]，王结则有〔木兰花慢〕《送李公敏》[②]，其中说"长安两年行客，更登山临水送将归"。王旭还有《李公敏》[③] 诗："吾观李公诗，气骨何老苍。如有渥洼龙，千里思腾骧。又如南山松，独立凌风霜。不驾屋下屋，不叠床上床。言志与纪实，句句出肺肠。用事无牵制，吐词多铿锵。养源自昆仑，可见东流长。六经博其趣，诸子发其光。他时再相见，吾敢轻论量。"明言诗人李公敏"养源自昆仑，可见东流长"——是西域于阗人。昆仑山即在于阗境内，而且长期被认为是东流入海的黄河的源头。

李源道由翰林直学士，除云南肃政廉访使。

李源道，字仲渊，号行斋（一作冲斋）。陕西关中人。游宦于四川，历任眉州同知、四川行省员外郎，在成都买田建万竹亭，和弟弟吟诗其中。入为监察御史，延祐五年由翰林直学士除云南肃政廉访使。累迁翰林侍讲学士、集贤学士，官终云南行省参政。李源道有诗名，诗曾结集为《行斋谩稿》，由程钜夫作序。他又自录所作五言诗为一集，名为《宗雅》，并请虞集作序。

---

① 见《全金元词》下册第 885 页。

② 见《全金元词》下册第 874 页。

③ 见《永乐大典》卷九〇〇引"王景初《兰轩集》"。"六经博其趣"，原作"六轻博其趣"，据文意径改。《兰轩集》卷十六《赵节妇传》提到，"大德庚子秋，余友李公敏袖书一通，过高氏中和书院示余"，是为河南人李仁甫请王旭作《赵节妇传》。如是，李公敏"教授于青齐之间"时在大德四年前后。

据虞集序，李源道对卢挚的五言诗十分推崇，而他也以五言诗自许。

萧㪺去世。享年七十八岁。

萧㪺（1241—1318），字维斗（又作惟斗），号勤斋。奉元（陕西西安）人。早年为府史，与上级言语不合，便引退还乡。在南山读书三十年，博极群书，学者纷纷及门受业。忽必烈召萧㪺侍潜邸，以疾辞，授陕西儒学提举，亦不赴。后累授集贤直学士、国子司业、集贤侍读学士，皆辞而不受。至大元年拜太子右谕德，扶病至京师。朝廷尚酒，萧㪺书《酒诰》为献，以病力求去职，但又授集贤学士、国子祭酒，固辞而归。卒，赐谥贞敏。被称为一代醇儒，为文立意精深，言近而旨远。有《勤斋集》，至正四年苏天爵辑为十五卷，刊于淮东，入明已亡佚。清乾隆时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勤斋集》八卷（诗文各四卷）。《四库全书总目》评云："诗非所长，而陶冶性灵，绝去纤秾流派，亦足觇其志趣之高焉。"另有《三礼说》《小学标题驳论》《九州志》等著述。

刘敏中去世。享年七十六岁。

刘敏中（1243—1318），字端甫，号中庵。章丘（今属山东）人。早年受知于乡先生杜仁杰。至元十一年由中书省掾史擢兵部主事，拜监察御史，权臣桑哥秉政，辞归家乡。后起为燕南肃政廉访副使，累迁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大德七年以宣抚使巡行辽东、山北诸郡，除东北路总管，擢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大德九年召为集贤学士，商议中书省事。元武宗即位，召刘敏中至上京，庶政多所更定，不久，拜河南行省参知政事，很快又改授治书侍御史，出任淮西肃政廉访使，转山东宣慰使。后在翰林学士承旨任上以疾还乡。刘敏中平生身不怀币，口不论钱，曾历任要职，每以时事为忧。卒，追封齐国公，谥文简。有《中庵集》二十五卷，今存。词集《中庵乐府》，有近人赵万里校本。《录鬼簿》列名于"前辈名公"节，但无散曲作品传世。另著《平宋录》三卷。

程钜夫去世。享年七十岁。

程钜夫（1249—1318），原名程文海，字钜夫，因避元武宗海山讳，以字行。号雪楼，又号远斋。建昌路南城（今属江西）人。叔父以建昌城降元，他作为质子授宣武将军、管军千户。元世祖很赏识，改任翰林应奉，又进翰林修撰，迁集贤直学士兼秘书少监。至元二十三年拜侍御史，行御史台事，奉诏求贤江南，荐赵孟頫等22人。至元三十年，出为闽海道肃政廉访

使，大德四年迁江南湖北道肃政廉访使，所在均有政绩。大德八年拜翰林学士，至大元年，修《成宗实录》，至大三年拜山南江北道肃政廉访使。皇庆元年，修《武宗实录》，并议行贡举，延祐元年以老病致仕还乡，元仁宗命廷臣在大都齐化门为他饯行。居家三年去世，追封楚国公，谥文宪。程钜夫为四朝元老，出入显要，朝廷典册多出其手，是元代前期主要的文臣之一。有文集四十五卷，为其子程世京所编，至正末年，由揭汯重编为三十卷，刊刻行世，即今存之《雪楼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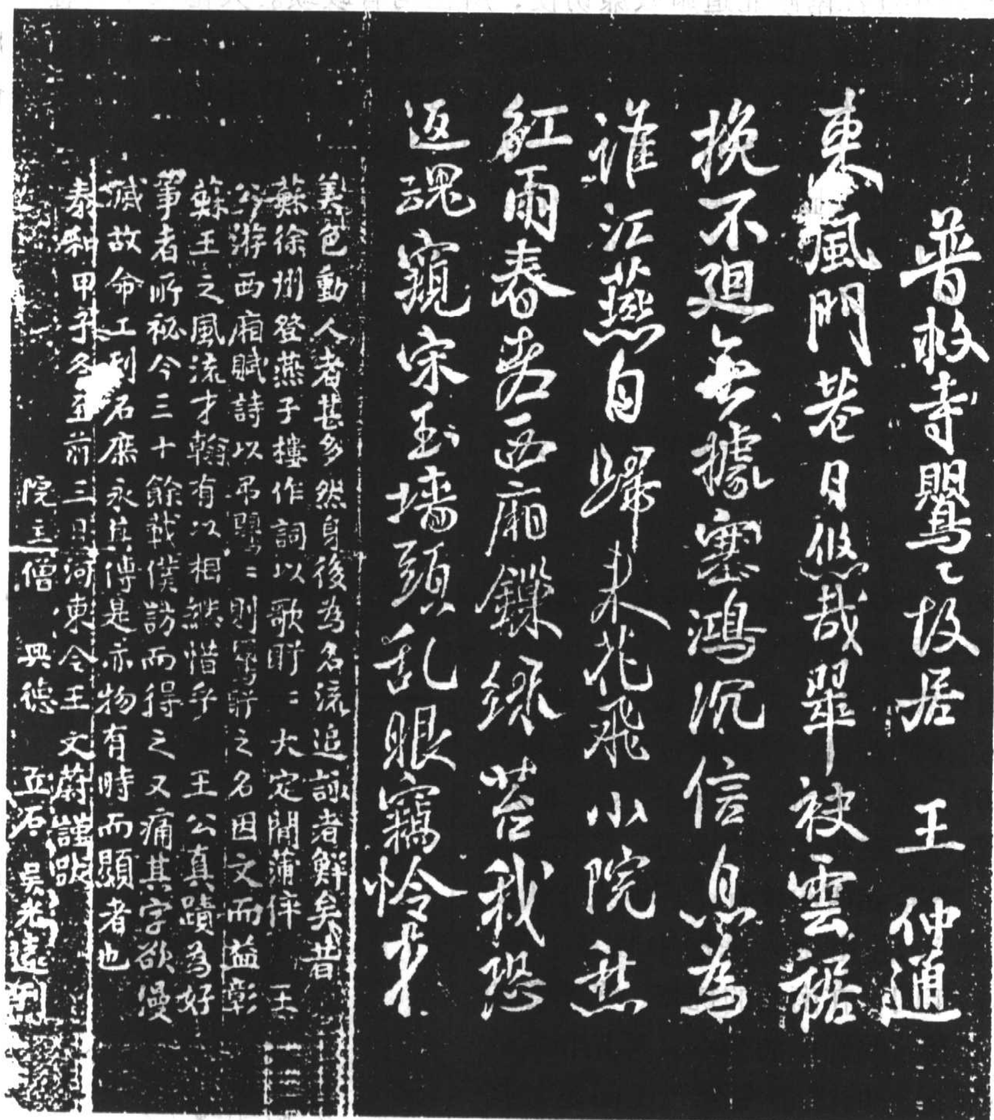
延祐六年己未（1319）

二月。于钦见到金人所作崔莺莺画像及题跋，并写出长篇跋语，介绍了莺莺画像在民间的流传情况。

《南村辍耕录》（卷十七“崔丽人”节）通过两则跋语，披露出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金人赵元、元延祐六年于钦，这两次路经河东普救寺的见闻。早在泰和七年时，普救寺西厢就有“唐丽人崔氏女遗照在焉”，并由金人陈居中临摹下来；到元延祐年间，在南北的杭州、东平等的市肆，都有这幅画像的摹本。可见崔莺莺与《西厢记》的故事在金元民间是如何盛行，又引起过文人怎样丰富的遐想。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两则跨金元两代的跋语，都未署作者之名——画师是署了名的。泰和跋署“泰和丁卯，林钟吉日，十洲种玉大志宜之题”，延祐跋语的作者判定这是金人赵元（字宜之）题。延祐跋未署名，仅在末尾书“壁水见士思容题”，“壁水见士思容”，应该就是元人于钦。在这两篇长篇跋语之后，是一则未署年月的短跋，只说不知“壁水见士思容”为何许人，并请嘉禾画工盛懋为自己也临



这幅崔莺莺画像，据说是唐寅手笔。出自明万历刊刻《元本出相北西厢记》。拿今天的眼光，这个崔莺莺根本算不上是美人，倒是符合唐人的“丰满”标准。



普救寺的诗刻拓片。

写一本，因为“舅氏赵公待制雍见而爱之，就为录文于其上”，这则跋也许是王蒙所写。在金元两代士大夫对元稹的风流韵事爱不能制，对崔莺莺“心向往之”，但又不能不使自己的言论处在“潜台词”（“内心独白”与“私密絮语”之间）的地位。而赵元、于钦正是典型。

于钦（1284—1333），字思容，号壁水见士。益都（今属山东）人，家于吴中。早年受郭贯、高昉等赏识，由淮西宪司书吏，入为国子监助教，擢山东宪司照磨。居母丧，服阕，历官翰林国史院编修、监察御史、兵部侍郎。出为益都般阳田赋总管，到任未逾月而卒。在山东任职时，他关注地方史志，并周览山川、询诸乡老，编撰《齐乘》六卷，被认为是元代地方志中最有“古法”的一种。

从金以来，通过《会真记》，通过《董解元西厢记》，特别是通过王实甫

《西厢记》，大家闺秀崔莺莺已经成为文人心目中的“大众情人”。她的画像，当然是想象的结晶，但寄寓着许多不能对人言的向往之情。

据金人王仲通《普救寺莺莺故居》[①] 诗，说明在大定年间，当地就出现了为崔莺莺特设的“景点”，金人王文蔚为此诗写了一篇跋语：“美色动人者甚多，然身后为名流追咏者鲜矣。昔苏徐州登燕子楼，作词以歌盼盼。大定间，蒲倅王公游西厢，赋诗以吊莺莺。则莺盼之名因文而益彰。苏王之风流才翰，有以相继。惜乎王公真迹为好笔者所秘，今三十余载，仆访而得之，又痛其字欲漫灭，故命工刊石，庶永其传。是亦物有时而显者也。泰和甲子（1204）冬至前三日，河东令王文蔚谨跋。”从泰和四年开始，则是《董解元西厢记》向王实甫《西厢记》的过渡。通过这两则题记可以推知，与前期杂剧相比，更成熟、更完美的《西厢记》不会是金元之际的作品。

王实甫活动于此前后。

王实甫，一云名德信，字实甫。大都（北京市）人。或以为是金元之际人[②]。作杂剧 14 种（据《古典戏曲存目汇考》）：《才子佳人多月亭》《四丞相歌舞丽春堂》《作宾客陆绩怀桔》《吕蒙正风雪破窑记》《厚阴德于公高门》《红拂记》《曹子建七步成章》《崔莺莺待月西厢记》《诗酒丽春园》《赵光普进梅谏》《贤孝士明达卖子》《娇红记》《韩彩云丝竹芙蓉亭》《双蕖怨》《苏小卿月夜贩茶船》，今存《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四丞相歌舞丽春堂》《吕蒙正风雪破窑记》3 种。作为重要元曲家，《太和正音谱》评其词“如花间美人”。“元曲四大家”没有王实甫，一直是其受非议处[③]。

《崔莺莺待月西厢记》[④] 简称《西厢记》，四本二十折，在元杂剧中是特例。全剧纯用北曲。写张生、崔莺莺的爱情故事，出自唐人元稹《会真记》。从艺术成就而言，可以说是元杂剧的范例，也是最具影响力的元杂剧。

春。贯云石为张可久的散曲集《今乐府》作序。

贯云石不但是散曲家，也是颇有见地和影响的曲论家，今天见到的最早一篇元人专论散曲的文字，当推贯云石皇庆二年写的《阳春白雪序》；其次，

---

① 诗与跋，俱见《全辽金诗》卷首所载石刻拓片。

② 王国维曾认为王实甫的杂剧《丽春堂》作于金。但元人在杂剧中写金时之事颇常见，比如《拜月亭》《虎头牌》等即是。

③ 明人王骥德《曲律》说：“世称曲手，必曰关、郑、白、马，顾不及王。要非定论。”

④ 《西厢记》作者，尚有关汉卿作、关作王续等说法。

要数贯云石在延祐六年春为张可久散曲集《今乐府》所写的序（天一阁旧藏《小山乐府》卷首）。在《今乐府序》中，贯云石说：

余寓武林，小山以乐府示余。临风清玩，击节而不自知。何其神也！择矢弩于断枪朽戟之中，拣奇璧于破物乱石之场。抽青配白，奴苏隶黄。文丽而醇，音和而平，治世之音也。谓之《今乐府》，宜哉。

除对张可久散曲作了形象的描述，重要之处在于指明序为张可久《今乐府》而作。天一阁旧藏《小山乐府》所录的为张可久散曲集作题跋的人还有：大食惟寅、冯子振、曹鉴、刘致、高拭，另外，张可久自己在至正丁亥良月也写了一则跋语。

周权携诗稿北游京师。

周权，字衡之，号此山。松阳（今属浙江）人。平生著意于诗，被目为“磊落湖海之士”（袁桷语）。北游京师，受到袁桷赏识，拟荐任馆职，未果。回到江南，专一写诗，当代名流如赵孟頫、谢端、揭傒斯、欧阳玄、陈旅都很推许他的诗才。揭傒斯为他的居室此山堂题诗云“君家括苍下，自爱括苍山”，“高风已莫攀”。赵孟頫应他之请，书赠“此山”二字。有《此山集》十卷，今存。周权一生未仕，其形迹近于南宋的江湖游士，但他的诗风与王炼师、陆厚、汪济等人有别。

陆行直论词著作《词旨》成书。

陆行直《词旨》与张炎《词源》，是元代前期两种词学著作，两书先后成书于元仁宗时期，元取代宋已有四十年左右，它们表述的主要都是对宋词学的总结与发挥。

陆行直（1275—?），字辅之；或说名陆韶，字辅之，一字季道；号壶天居士。吴江（今属江苏）人。出身世家，仕为翰林典籍，至治元年致仕归。诗词文章均工，但所作传世不多。他也是著名的书画家。在致仕前，作《词旨》，据其《词旨自叙》，他与张炎游，得张炎论词要义，并深知其作词法度。《词旨》所申，实是《词源》之旨，对于《词源》，或是撮其要，或是畅其说。这便是时人心目中的作词之旨。

施惠活动于此前后①。

施惠，字君美。杭州（今属浙江）人。居吴山城隍庙前，以坐贾为业，《录鬼簿》（曹寅刊本）“施惠小传”说:“公巨目美髯，好谈笑。余尝与赵君卿、陈彦实、颜君常至其家，每承接款，多有高论。诗酒之暇，惟以填词和曲为事。有《古今砌话》，亦成一集。其好事也如此。”但钟嗣成未提及施惠的主要成就，即写出“四大传奇”之一的《拜月亭》。

陈柏与艺妓王巧儿相恋，并以皆大欢喜作结。

《青楼集》云②:

> 王巧儿，歌舞颜色，称于京师。陈云峤与之狎。王欲嫁之，其母密遣其流辈开喻曰:“陈公之妻，乃铁太师女，妒悍不可言，尔若归其家，必遭凌辱矣。”王曰:“巧儿一贱倡，蒙陈公厚眷，待侍巾栉，虽死无撼。”母知其志不可夺，潜挈家僻所，陈不知也。旬日后，王密遣人谓陈曰:“母氏设计，置我某所。有富商约某日来，君当图之，不然恐无及矣!”至期，商果至，王辞以疾，悲啼宛转。饮至夜分，商欲就寝，王掐其肌肤皆损，遂不及乱。即五鼓，陈宿构忽剌罕赤排闼，缚商欲赴刑部处置。商大惧，告陈公曰:“某初不知，幸寝其事，愿献钱二百缗，以助财礼之费。”陈笑曰:“不须也。”遂厚遣其母，携王归江南。陈卒，王与正室铁氏，皆能守其家业，人多所称述云。

铁太师，即权臣铁木迭儿。陈云峤，即陈柏。文人、官员与艺妓的恋情、婚配，是元代一大社会问题，也是文学家的灵感来源。

滞留京师的南人胡助，作组诗《京华杂兴》二十首。

在此期间，胡助是在大都向吏部述职，等待上级评判并分配新的工作。“居不易”的京师、寂寞无着的过客，除了排遣乡思，他也在一步步进入角色。这长达20首的组诗，是作者逐渐溶入京师生活的过程的体现。《京华杂兴》(《纯白斋类稿》卷二）诗序说:

① 有的论著认为，施惠于元贞年间在世，但以钟嗣成能与其相交推断，他的年辈似不应太早。而且，他应该与关汉卿写《拜月亭》有一定的距离。暂系于此，待考。

② 《青楼集》本则记事未系年。铁木迭儿死于至治二年，死后受到普遍非议。故暂系于此前。

余待选吏部，贫不能归，尘衣垢面，憧憧往来，盖亦莫自知也。于是，以日所闻所见，感触于中者，辄形为五言五韵，分二十章，题之曰《京华杂兴》。诗率然而作，曾无律吕之次，譬如候虫之鸣，不能自已。姑亦偶寓其一二微意焉。他日南归，将以夸示田夫野老，俾知京华之风景。

也许是等待的时间太长了，也许是他的信心已经消磨殆尽，他显然认为此行的结局必将是毫无收获地回归乡里了。当然，结局比这好得多。幸运的是他没有忘记将自己的情绪波动记录在组诗中，因而这一组诗则留在了诗史上。

谭景星将诗文结为《西翁近稿》。

谭景星（1267—?）[①]，字明望，号村西、西翁。茶陵（今属湖南）人。早年丧父，庐其父墓十年，以孝行闻名。后曾任永明县儒学教谕，平生足迹不出乡里，皇庆元年，将所作诗文结为《村西集》十六卷（诗六卷、文十卷），延祐六年，又编成《西翁近稿》十一卷（诗三卷、文八卷）。刘将孙曾为《村西集》作序[②]，说："茶陵村西谭明望寄予以其文若诗。其书记序志，浩荡奇伟之中有节制严密之意，杂著诸赋在古雅磅礴之外，得优游含蓄之思。诗文精整磊落，属对巧而寄兴远。"

召陕西儒士同恕赴京，拜太子左赞善，并献书东宫。

但一年之后，英宗（太子）即位，同恕却以疾辞归。仁宗与英宗的不同，以此也可以略见一斑。

同恕（1254—1331），字宽甫，号榘庵。奉元（陕西西安）人。家世业儒，同居200多口而无闲言。十三岁以《书经》为乡校之魁，延祐年间拜国子司业，屡召而不赴。陕西行台侍御史赵世延请于奉元建鲁斋书院，以同恕为山长，先后来学者近千人。延祐六年为太子赞善。元英宗继位，以疾辞归。致和元年拜集贤侍读学士，以老疾辞。同恕家无余财，而聚书数万卷，时萧𣂏居南山下，入城必至同恕家，士论并称之为"萧同"。自京还乡，家居十三年，卒年七十八，追封京兆郡侯，谥文贞。有《榘庵集》二十卷，原本久佚，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自《永乐大典》中辑出《榘庵集》十五卷。

---

① 生年，据《初心堂记》（《村西集》卷七）"延祐丙辰，吾年五衮"推知。

② 这篇序，未见载于今存的《村西集》。仅见《养吾斋集》卷十。

他以写祈禳的青词见长，这类文章在元代较少见，因此受到论者批评，以为“其非文章正体，恕素以明道兴教自任，更不宜稍涉异端，乃率尔操觚，殊为失检”（《四库全书总目》）。

刘埙去世。享年八十岁。

刘埙（1240—1319），字起潜，号水云村（或作水村）。南丰（今属江西）人。刘埙学问广博，研经究史，网罗百家，为文思如涌泉。宋末以诗文知名乡里，但落落不偶，宋亡，隐居乡里近二十年。荐任建昌路学正，七十高龄，又任延平路儒学教授。刘埙在宋亡之初以遗民自居，又以古稀之年转食元禄，颇受讥议。刘埙长于骈文，是元初四六体名家。著《隐居通议》三十一卷，《水云村稿》十五卷，《水云村吟稿》十二卷，都有传本。还有《哀鉴》《经说讲义》《英华录》等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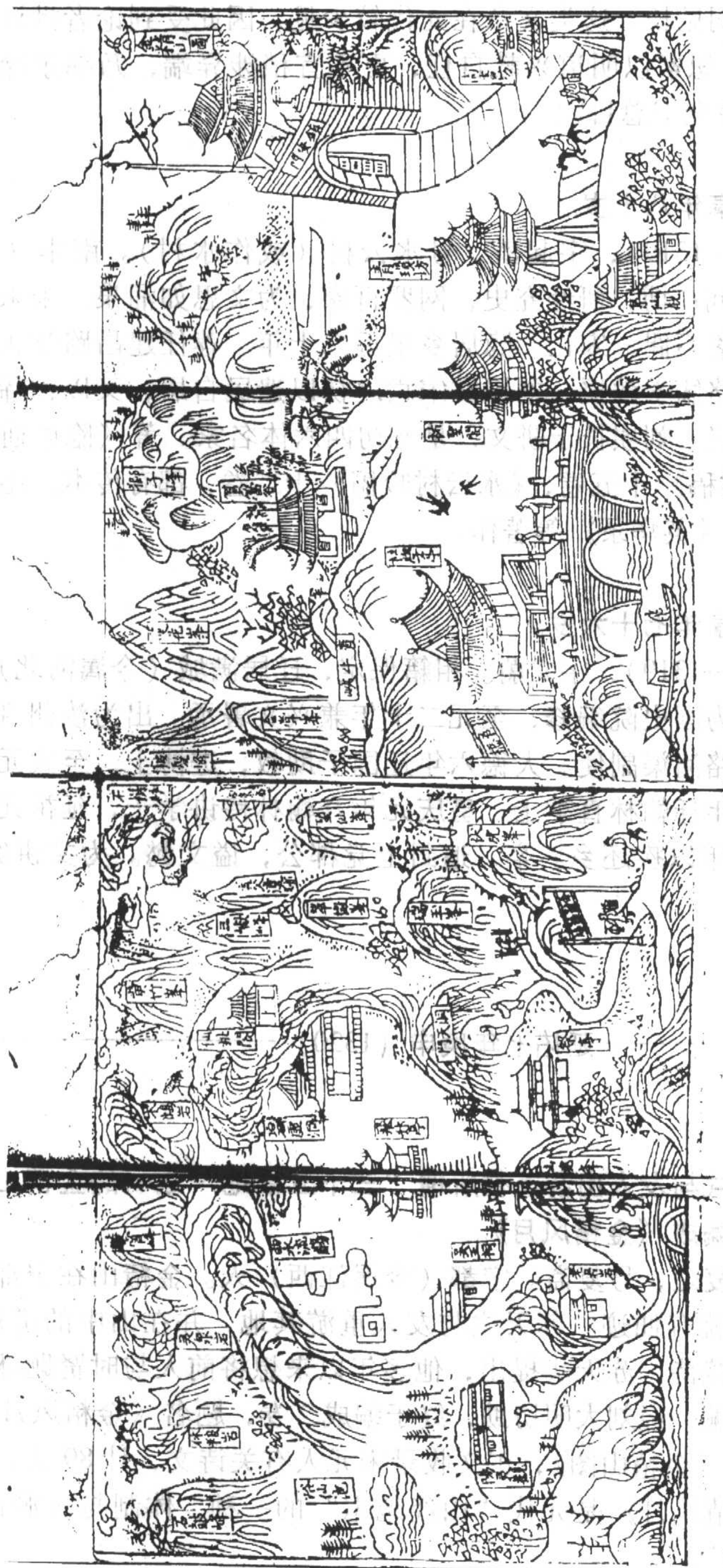
尚野去世。享年七十六岁。

尚野（1244—1319），字文蔚。祖籍保定，迁居满城（今属河北）。至元十八年以处士徵为国史院编修，至元二十年兼兴文署丞。出为汝州判官，历南阳县尹、怀孟路河渠副使。大德六年迁国子助教，进博士，至大元年除国子司业，至大四年迁翰林直学士，皇庆元年升翰林侍讲学士，延祐元年改集贤侍讲学士，次年以疾还乡。卒，追封上党郡公，谥文懿。为文讲究章法，与姚燧齐名。

延祐七年庚申（1320）

二月。苏天弌与友人出游道教所谓“三十五福地”之一的金精山，并汇录宋元纪游之作编成《金精风月》。

苏天弌，字复之，号复斋。宁都（今属江西）人。金精山在宁都城西十五里，据说汉初就有仙迹。苏天弌与友人重游其地，并在山中的道观留宿，受到道士刘大明接待。苏天弌提出，他多年以来想将前人与时贤题咏金精山的诗文收集为一编，经刘大明协助，终于编成二卷，题名《金精风月》。《金精风月》卷首有《金精山图》，正文收录宋元人有关诗文，计89人，诗文一百数十篇。《金精风月》是元代“山经地志”的一种，体制与《洞霄诗集》相近，但流传不广。



《金精风月》卷首的《金精山图》。看起来，这个道教圣地与『水泊梁山』有相似之处，入山的那道大门名为『镇安门』，再加上一个『忠义堂』，就可以占山为王了。

六月一日。何中为其《知非堂稿》作自序。

何中《知非堂稿自序》:“……咸淳壬申，甫髫，随先君仕广东曲江。乙亥，先君与伯父时会文信公同举义旗，分据要害，与虏屡死战，弗克。既而信公被执，……麾下兵数千，一时亡散，先伯、先君茕茕独立，怅然无所归。先伯愤恨，遂削其发，变其姓曰邓，名守约，号坚白道人，流落汀赣间，卖卜自给。先君侨居宁都，隐避浮屠者三年。……中之所著，固不足以传，然每思先君、先伯之教，及间关困苦，竭忠于宋，未尝不痛切于怀。……延祐庚申六月朔，何中太虚自序。”《知非堂稿》六卷，是比较重要的元人文集。在自序中，他有些离题地写了父亲一辈人与元军的不共戴天。这篇文字也是元人不避讳“虏”字之例①。元人有167个明确避讳字，但是其中没有“胡”“虏”两字②。不避“胡”字的例子，是贯云石《筚篥乐》③。

八月。一场罕见的灾荒中，作为“检田吏”——观察灾情以便上报的人，袁介写出了叙事诗《踏灾行》。

袁介，字可潜。其先蜀人，占籍松江华亭（今属上海）。至正年间曾任松江府掾史，他是著名的“袁白燕”——以写《白燕诗》知名的袁凯——之父。作为一个诗人，他只留下了一首诗，即《踏灾行》（又名《踏车行》或《检田吏》)，但这也足够了。这是元代也是中国古典诗歌史不多见的优秀叙事性作品。

《踏灾行》(《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三“检田吏”节）全篇是：

有一老翁如病起，破衲鑑毵瘦如鬼。晓来扶向官道傍，哀告行人乞钱米。时予奉檄离江城，邂逅一见怜其贫。倒囊赠与五升米，试问何故为穷民。老翁答言听我语，我是东乡李福五。我家无本为经商，只种官田三十亩。延祐七年三月初，卖衣买得犁与锄。朝耕暮耘受辛苦，要还私债输官租。谁知六月至七月，雨水绝无湖又竭。欲求一点半点水，却比农夫眼中血。滔滔黄浦如沟渠，农家争水如争珠。数车相接接不到，稻田一旦成沙涂。官司八月受灾状，我恐征粮吃官棒。相随邻里去告灾，十石官粮望全放。当年隔岸分吉凶，高田尽荒低田丰。县官不见高田旱，

① 这里所举的《知非堂稿自序》，是据丁丙旧藏抄本。在《四库全书》之中的《知非堂稿》卷首所载自序，已经作过“手术”，删去了从“先君与伯父”到“卖卜自给”一大段文字。

② 参见清人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二“苏伯衡”节。

③ 参见笔者所著《元诗史》第11～12页。

将谓亦与低田同。文字下乡如火速，逼我将田都首伏。只因嗔我不肯首，却把我田批作熟。太平九月开旱仓，主首贫乏无可偿。男名阿孙女阿惜，逼我嫁卖陪官粮。阿孙卖与运粮户，即目不知在何处。可怜阿惜犹未笄，嫁向湖州山里去。我今年已七十奇，饥无口食寒无衣。东求西乞度残喘，无因早向黄泉归。旋言旋拭腮边泪，我忽惊惭汗沾背。老翁老翁无复言，我是今年检田吏。

这首诗被赞誉为，读之“彼苛吏者不恻然，可谓无人心矣”[①]；“可以为民牧不恤民瘼者之劝”[②]；“此诗真可以泣鬼神”[③]。诗的感染力除了直面现实——不论多残酷，还在于结尾：听完老翁诉说的灾情，敢于宣称这正是自己的职责所在，“我是今年检田吏”。

十一月二十二日。龚璛为友人袁易的诗集作序。

袁易著有《静春堂诗集》四卷。龚璛《静春堂诗集序》说:“予读今人诗，而不知其为今人，惟于吾通甫为然。……一自去科举之业，例无不为诗。北音伤于壮，南音失之浮。诗文不同，宜极于古，故今人于宋诗少所许可，仅取王半山，以其逼唐也。”宗唐，是当时诗坛时尚。龚璛等论者，是期望以唐音协调“北音伤于壮，南音失之浮”的困扰。

柳贯以国子助教赴上都，教授生员。

这个时期的馆阁文人中，柳贯在朝中时间不算长。本年赴上京，他一路出居庸、逾长城，临滦水之阳，从夏至秋，经历了五个月份。同时，写出了32首五言诗，总题为《上京纪行》。他还有《同杨仲礼和袁集贤上都诗》10首。在元人的“上京纪行诗”中，柳贯之作与胡助比较接近。

陈绎曾北游大都，并受时贤举荐。

陈绎曾，字伯敷。祖籍处州（浙江丽水），客居吴兴（江苏湖州）。陈祖康之子。从学于戴表元，自幼口吃，但为文汪洋浩博。延祐年间在大都，许有壬《荐吴炳陈绎曾》（《至正集》卷七十五）说:“江南陈绎曾，博学能文，

---

① 《蓬窗日录》语。

② 《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三“检田吏”。除此诗，在《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八“如梦令”节，还录有袁介的一阕词。

③ 何景明语（据《松风余韵》卷四转引）。何景明还说，这首诗“质直似《木兰诗》，其有关时事，则少陵《石壕吏》、白太傅讽喻之类”。

怀才抱艺。挺身自拔乎俗流，立志尚友乎古人，放志山林，浮云富贵。”至顺间，仕至国子监助教。有《文说》一卷、《文筌》八卷（附《诗小谱》二卷）。

《文说》是因复兴科举，而特为“程试之式而作”，写作就在延祐间。据说，陈绎曾还作有《科举天阶》《古今文矜式》，目的都是委“使学者知所方向，人争传录”。《四库全书总目》以为《科举天阶》就是《文说》的异名。《文说》原本已不存，今本是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文筌》则是至顺间在国子助教任上所作。他的文论可以说都是准备“应试”的产物。

杨瑀《山居新话》有一则记载说：“《因话录》云，昔有德音，搜访怀才抱器不求闻达者，有人逢一诸生，奔驰入京。问求何事，答曰：将应‘不求闻达科’。因念延祐间陈伯敷绎曾到都，每见晦迹丘园者数多奔竞，遂有‘处士近来恩例别，麻鞋一对当蒲轮’之讥。”

延祐末年，由于科举复兴，日下人才腾涌，大都成了文化荟萃之区。太学有六馆，经常留驻并得到造就的人群中，有大量的文学人才。“才子”成了文学新秀的代称。宋褧《张才子传》（《燕石集》卷十五）说：“延祐末，京师太学生，六馆生不下四五百。才子每预月试，赋有铮铮声。时文治日熙，海内学士大夫云集辇下，才子缔交愈不苟，笃契谊者仅数人。执政王公继学、仪曹马公伯庸名鉴裁当世，新制一出，啧啧不置口。”文人的正常生活追求完全恢复。

刘致在江南宦游，为张可久《小山乐府》写的跋语就书于延祐年间。

刘致，字时中。石州宁乡（山西中阳）人。因宁乡在元太宗、定宗、宪宗时曾隶属于太原府，所以自称“太原人”。其父刘彦文，历官广州怀集令，死后，权殡长沙，他便寄寓长沙，所以又自称“湘中”人。大德二年，姚燧赞赏他的作品“为辞清拔宏艳，为之不已，可进乎古人之域”（姚燧《广州怀集令刘君墓志铭》），并为他父亲撰了墓志铭。由于姚燧、卢挚的赏识，后来得以由吏入官，初为湖南宪府吏，历任永新州判，翰林待制，太常博士，江浙行省都事。《录鬼簿》把他列入“方今名公”，属于“前辈公卿居要路者”。死后，家贫无力安葬，由王寿衍真人，周济遗孤，安葬于浙江德清。散曲诗文都有作品流传，今存散曲小令70余支，套曲2套（据《全元散曲》）。散曲作品中多为姚燧、卢挚而作[1]，风格雅洁典丽，也与姚燧、卢挚

[1] 刘致时中与作《上高监司》套曲的刘时中，是一人还是两人，有不同意见。从籍贯与活动时期等方面判断，他们似非同一人。

相近，内容多倡和酬答，歌咏山水风月。与张可久也有唱和之作。《元诗选》三集收刘致诗9首，名为《时中集》，系顾嗣立自辑。

李衎去世。享年七十六岁。

李衎（1245—1320），字仲宾，号息斋道人。大都人。少孤贫，二十多岁在太常寺任小吏，寻又任翰林检讨。由淮东道宣慰司都事，转江浙行省左右司员外郎，至元二十八年，迁功德使司经历，元贞元年以礼部侍郎出使安南，元贞二年除嘉兴路总管府同知，大德年间，在嘉兴、婺州任职，年谷丰稔，法制宽简，民以为便。元仁宗即位，入为吏部尚书。以疾辞官，卒于维扬，追封蓟国公，谥文简。诗文书画均有时名，画竹师法文同，著有《竹谱详录》七卷，今存。





【元英宗】



建元：至治（三年）



至治元年辛酉（1260）

正月一日。至治改元，马致远作〔中吕·粉蝶儿〕《至治华夷》套曲。

马致远，号东篱。大都人。生卒年不详，年辈应晚于白朴、关汉卿。元贞年间，他是元贞书会中人，与梨园艺人花李郎、红字李二等人合作撰写了杂剧《黄粱梦》。他长期宦游南北，度过了"二十年漂泊生涯"（马致远〔大石调·青杏子〕《悟迷》）。在江南，曾任江浙行省务官，后退隐于杭州。他写过〔中吕·粉蝶儿〕《至治华夷》套曲，一般认为"至治"是指元英宗年号，此曲当为至治改元而作；而周德清《中原音韵自序》有"自关、郑、白、马一新制作"，"诸公已矣，后学莫及"之语，如是，马致远和"四大家"在泰定元年（即周氏作序之年）均已不在世，而马致远是其中去世最晚的一人。他是历来公认的"元曲四大家"或"元曲六大家"之一，《太和正音谱》的《古今群英乐府格势》，将其列为开卷第一人，以为"典雅清丽"是其风格特征，并明言"宜列群英之上"。今人任讷辑其散曲题名为《东篱乐府》，收入小令104首，套曲17套，残套曲5套；《全元散曲》则收入马致远小令115首，套曲15套，残套曲7套。所作杂剧今存7种：《半夜雷轰荐福碑》《江州司马青衫泪》《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破幽梦孤雁汉宫秋》《泰华山陈抟高卧》《马丹阳三度任风子》《开坛阐教黄粱梦》（与他人合作），另有《刘阮误入桃源洞》，存有残曲。《汉宫秋》与《青衫泪》是元杂剧代表作。

正月七日。针对即将在正月十五举行的“内廷灯山之戏”，张养浩以《谏灯山疏》进谏。

在《谏灯山疏》（《张文忠集》卷二十六）中，时任参议中书省事的张养浩说：“外人皆曰：今岁正月十五夜，圣上欲于宫中结绮为山，树灯其上，盛陈诸戏，以为娱乐。臣养浩初闻其事，意谓妄传，岂有万乘英明仁孝之君，临御之初，而肯为此浮华无益之事？既而质诸近侍，颇以为然。臣养浩不敢远引古昔，钦惟我世祖皇帝在位三十余年，每值元夕，虽市井之间，灯火亦禁。……臣养浩于今月初六日密言此意于左丞相拜住，丞相第曰‘已知’，臣养浩不胜惓惓蝼蚁之诚，尘渎天颜，僭陈所见，伏愿皇帝陛下以世祖皇帝崇俭虑远为法，以曲律皇帝（按：即元武宗）喜奢乐近为戒，寝其灯宴，止其所为之山。”此前，张养浩于至大三年曾上万言《时政书》（《张文忠集》卷十一），针对的就是元武宗（曲律皇帝）的“喜奢乐近”，但没有任何结果。《谏灯山疏》一上，元英宗表示：“有臣若此，朕复何忧？”立即罢止。而

张养浩在年内则以父老归养为由，辞官还乡了。

时人律赋集《至治之音》编刊。

经延祐年间两次科举，特别是一批早有文名、众望所归的人物中举，应试，在士人中间人气正旺。《至治之音》[①] 应时而生。它选录了延祐首科进士欧阳玄、黄溍等数十篇律赋，一方面作为程式，可见楷模，另一方面作为蓝本供士子学习。本书与至正年间编刊的《青云梯》是元赋不多见的总集。

元英宗本人对歌舞杂剧颇喜好，并与艺妓艺人有直接接触。

《青楼集》提到：“玉莲儿，端丽巧慧，歌舞谈谐，悉造其妙；尤善文楸握槊之戏。尝得侍于英庙，由是名冠京师。”

关于英宗与歌舞艺人，另一个例子则是史骒儿。王逢《梧溪集》（卷四上），有《史骒儿》，诗序云：“骒，燕人，善琵琶。至治间蒙上爱幸。上使酒纵威福，无敢谏者。一日，御紫檀殿饮，命骒弦而歌之。骒以〔殿前欢〕曲应制，有‘酒神仙’之句，怒叱左右杀之。后问骒不在，悔曰：‘骒以酒讽我也。’前和州同知李澄言于逢，欲传其事，逢为赋一解。澄，字仲深，开州人，翰林承旨惟中先生从子也。”

---

① 《至治之音》，仅存丁丙八千卷楼旧藏明洪武抄本，一册，不分卷。

宋褧听淮东府史洪涛讲述河南王氏父子在海外的经历，写出《王猩子传》。

《王猩子传》（《燕石集》卷十五）已经是文言小说。几百年后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夜叉国》的雏形即见于此。《王猩子传》反映出在海运开通，社会上对海外情况的关注与悬想。

《王猩子传》写道：至元年间，河南人王某与乡人经商海表。在海外跋涉途中得了重病，无药可医，海上的习俗是不许病人上船。同伴只得将王留在荒山野岭，给他留下了一点粮食，并说："万幸一愈，即晨夜倍道，尚冀追及。吾辈故逗留以俟若，若无忧。五日不至，期七日，计已登舟，勿来追。"说完就走了。王某几乎不能起身做饭，同时他也找不到火种。在他就要饿死时，一群猩猩来到这里。一个母猩猩掇拾野果给他，早晚来与他相伴，就像是亲人。其他猩猩不久纷纷离开了，只有这母猩猩对他始终如一。一个月后，他体力恢复了，但他知道同乡早已经返乡了，追也追不及。就与猩猩生活在一起，并生了一个儿子。三年后，乡人又来海外经商，并路经这一带，他们约定一定要再经过遗弃王某的那条深山小路，他们认为王某早已死去，只是打算收集他的遗骨带回家乡，交给他的妻子安葬，以减轻他们心中的负疚感。到了那儿却发现王某还活着，而且神气有加，还有了儿子。王某终于避开母猩猩，带着儿子同乡人一起返回家乡。王某回到家乡不久就死了，但猩猩为他生的儿子（猩子）后在家乡娶妻生子，像普通人一样生活。

宋褧写《王猩子》比蒲松龄《夜叉国》要早三四百年，然而说蒲松龄是直接从宋褧《燕石集》取材，也未必是。《燕石集》毕竟是不常见的元人文集。当然，这说明类似的故事一直在民间流传，它的源头是元代。它反映的也是元代对海外的探索与困惑，元代海运繁荣是与元世祖对海外的征服同步，可真正繁荣兴盛却在此后近半个世纪的江南出现战乱的时期。只不过没有远洋船队，元人没有走得更远而已。这个故事（传奇小说）是海外异闻的发端之作。特别是关于人与"野人"结合，还能生出后代的传说长期流传在江南民间，《王猩子传》则是较早、较具体描写这个内容的小说。

仇远写了十首七言律诗[①]，以期解脱精神负载。

仇远曾特意将这一组诗抄赠给一位高僧评判。作为江浙文人的领袖人物，仇远反省了入元四十多年来的生活追求。步入迟暮之年，仇远已经失去了绝大部分对头与朋友，在这个时候写"忏悔录"，就少了许多顾忌。这组诗以

① 这组诗原无题目。见清人高士奇《江村销夏录》卷二"仇山邨诗卷"。

"我本迂疏落拓人，满头霜雪满怀春"开始，最后一首诗云："豪气年来渐扫除，箪瓢自乐守臞儒。江头尽醉唐朝士，泽畔行吟楚大夫。万里鲲鹏何必羡，一官虮虱不如无。葛巾草履从人笑，莫问青山落叶枯。"①

"满头霜雪满怀春"正是七十五岁的诗人的自画像。

三月七日。殿试录取右榜状元泰不华，左榜状元宋本。

两位状元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被低估的作家。他们的诗文集没有流传至今，使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受到影响。

泰不华中状元时年方十八岁，宋本则是已过不惑之年。泰不华是色目人，但已经几代定居在江浙台州；宋本虽是大都籍，但一直生活在江南，会试前才与弟弟宋褧结伴回到大都。宋褧所作"行状"中，说宋本"尤嗜骈俪乐府"。这里的乐府指词曲，也指乐府诗。由于宋本《至治集》散佚，这个特点已经不能作为评论其诗的依据。现存宋本诗，较重要的是几个组诗：《大都杂诗》4首、《舶上谣送伯庸以番货事奉使闽浙》10首、《绝句》14首、《上京杂诗》17首②。前者写的就是游子还乡时的兴奋、彷徨、犹豫、企盼，等人们读过了这一组"杂诗"诗，指顾之间他已经是状元第一了。

《大都杂诗》写在殿试之前，实际上在江南游学二十年的还乡学子对期待已久的会试已经志在必得了。其全文是：

> 抛却渔竿沧海边，拂衣来看九重天。画阑九陌桥如月，绿影千门树似烟。南国佳人王幼玉，中朝才子杜樊川。紫云楼上如渑酒，孤负东风二十年。
>
> 绣错繁华遍九衢，上林辞赋汉西都。朱门细婢金条脱，紫禁材官玉鹿卢。万里星辰关上界，四朝冠盖翊皇图。东邻白面生纨绔，笑杀扬雄卧一区。
>
> 卢沟晓月堕苍烟，十二门开日色鲜。海上神仙非弱水，人间平地有钧天。宝幢珠珞瞿昙寺，豪竹哀丝玳瑁筵。春雨如膏三万里，尽将嵩呼祝舜年。
>
> 形势全燕拥地灵，梯航万国走王城。狗屠已仕明天子，牛相宁知别太平。玄武钩陈腾王气，白麟赤雁入新声。近来朝报多如雨，不见河南召贾生。

① 最后一句，原缺"落"字。据《元诗纪事》卷七《书与士瞻上人十首》补。

② 前两组，见《元诗选》二集《至治集》；《绝句》十四首见《永乐大典》卷九〇〇、《上京杂诗》十七首见《永乐大典》卷七七〇二。

《大都杂诗》是诗选家关注之作，在当时就比较流行，被视为元人咏大都诗的代表作。他写的是一个立体的都市，他写的是一个对大都熟悉又陌生的人对这个都市的复杂感受。它以元朝的国运兴衰作为背景，它关照的中心始终是那个意气风发的诗人。作为一个努力将自己融入时代潮流的举子回到久违的家乡，他却不知道怎样把握新的生活。

三月。本届录取进士64人，在右榜进士中，双语作家成就颇高。

蒙古色目人榜进士三宝柱、廉惠山海牙、铁间、伯笃鲁丁等，特别是进士第一（状元）泰不华，都是元中后期活跃的色目作家。

三宝柱，字廷珪，高昌畏吾人。至治元年进士，以才学知名，练达吏事，刚正有守。累迁江浙行省郎中，改瑞安知州。曾为方国珍所执，后放还，除江西廉访佥事。死在元末战乱中。诗名颇大，戴良《鹤年诗集序》（《丁鹤年集》卷首），论列了十二个著名的“成一家言”的西域诗人，其中包括“三公廷珪”。

廉惠山海牙，字公亮。高昌畏吾人。廉希宪从子。至治元年进士，授顺州同知，入为监察御史，迁都水监。致和元年除秘书监丞，后至元三年为南台经历，至正中，历河南、湖广、江西、福建等行省右丞，迁江浙行宣政院使，入为翰林学士承旨。与李孝光、萨都剌等唱和于南北文坛。享年七十一岁。

铁间，字充之。色目合鲁氏（即葛逻禄氏），定居鄞县（浙江宁波）。至治元年进士，授余姚州同知。

汉人、南人中进士的，有吴师道、王思诚、林以顺、林兴祖等人在榜。

八月。离京还乡的赵孟頫在经历了丧妻之痛后，为明本画《墨竹图》。经赵孟頫介绍，明本与冯子振以《梅花百咏》定交。

冯子振、明本唱和《梅花百咏》的经过是：赵孟頫与明本友善，冯子振则很轻视明本。一次赵孟頫与明本一同去拜访冯子振，冯子振出示所作《梅花诗》100首七言绝句，明本阅毕，立即和诗100首，当场另外写了100首咏梅七言律诗，又拿出自己所作《九字梅花歌》给冯子振看，使其折服。冯子振《梅花诗》，每首都另有标题，如《庭梅》《江梅》《未开梅》《乍开梅》等。明本所和，也是同题七绝，但本集只有99首，缺《东阁梅》。冯子振、明本唱和《梅花百咏》虽是展览学识的游戏之作，但影响较大。元人韦珪也有《梅花百咏》，明人周履靖有和冯子振的《梅花百咏》，并将冯作与己作合刊，题为《千片雪》行于世。明清人题为《梅花百咏》的咏梅之作颇多。冯

子振、明本《梅花百咏》没有明确的写作时间，但赵孟頫在延祐六年才离京还乡，当年丧妻。与明本交往主要在延祐七年与本年。

明本（1263—1323），号中峰。杭州（今属浙江）人。俗姓孙。出家于吴山圣水寺，后往天目山，依高峰禅师，在师子院精研佛理。元贞、大德间，遍游大江南北，结庵于庐州弁山及雁荡山。后回天目山师子院。朝廷闻其名，进号“佛慈圆照广慧禅师”，召入朝，力辞而不赴。元英宗至治三年八月去世，享年六十一岁。谥智觉。著有《中峰广录》三十卷，元统二年下诏收入佛藏。

朱思本主玉隆万寿宫。

朱思本（1273—?），字本初，号贞一。临川（江西抚州）人。龙虎山道士，出家于上清宫三华院，曾从道教宗师吴全节居住在大都。朱思本不但是元代中期诗文家，交际广泛，而且精于舆地之学。由于他的诗文集《贞一斋稿》流传极少，所以明清人论及元诗，几乎从未涉及其人。除诗文集《贞一斋稿》（又名《贞一斋杂著》，诗文各一卷），另有《广舆图》二卷，是今存的元代重要地理学著作。《元诗选》与《四库全书》都未收入朱思本集，《元诗选癸集》壬集辑有其诗一首。

十一月。刘麟瑞《昭忠逸咏》成书，并写自序。

刘麟瑞，号如村。南丰（今属江西）人。刘埙次子。刘埙曾写《补史十忠诗》，至治初，为追思南宋末年仗义死节之士，刘麟瑞写了50首七言律诗，题为《昭忠逸咏》。乡人赵景良把刘埙、刘麟瑞两组诗合为一编，再附以汪元量、方回等人的伤时悼丧之作若干首，总题为《忠义集》行世。《元诗选》二集收入《昭忠逸咏》，并补入采自地方志的《史贞女祠》诗。《昭忠逸咏》以人物群像的方式反映南宋为元朝取代的历史过程，较有特点。由于所咏都是死于国事之士，内容比较单一，诗句也时有重复感。《昭忠逸咏》写于元代政权已巩固的时期，诗中仍然表达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受到普遍称许。元人王介夫《题刘如村昭忠逸咏》中说：“林下董狐坚直节，山中杜甫老忠肝。后来多少偷生者，掩面西风不敢看。”刘麟瑞及其《昭忠逸咏》表达了遗民的价值取向。

方凤去世。享年八十二岁。

方凤（1240—1321）[1]，一名方景山，字韶卿；又作字韶父，号岩南。浦

① 方凤生卒年，或作1241—1322。

江（今属浙江）人。早年试太学，举礼部不第，特恩授容州文学。宋亡不仕，同里原义乌令吴渭请主家塾，敬事之，时称“岩南先生”。有诗文集《存雅堂遗稿》五卷，另著《野服考》《夷俗考》《物异考》等。黄溍《方先生诗集序》（《黄金华集》卷十六）提到：“异时，龚公圣予见先生于钱塘，览所赋诗，识以二十二言曰：由本论之，在人伦不在人事；等而上之，在天地不在古今。”“龚公圣予”，即龚开。同时黄溍强调，论及方凤之诗“无以易此矣”。

张仲寿去世。享年七十岁。

张仲寿（1252－1321）[①]，字希静，号畴斋，晚号自怡叟。钱塘（浙江杭州）人。官至翰林学士。书法行草宗二王，亦工大字。诗文均有时名，今存其自书《畴斋文稿》。另著《墨谱》《琴谱》，并称“畴斋二谱”。

李孟去世。享年六十七岁。

李孟（1255—1321），字道复，号秋谷。潞州上党（山西长治）人，徙居汉中。李孟幼年有大志，博学强记，通贯经史，善论古今治乱。至元十四年随父入川，行省累荐不就。元成宗即位，李孟受到举荐，乘驿入京。有人对皇后说：“布衣李孟有宰相才，宜令为太子师傅。”当时的皇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元仁宗）将其留于宫中，多有进益。爱育黎拔力八达降居怀州，李孟诚节如一，常单骑以从。元成宗去世，爱育黎拔力八达迎其兄海山（元武宗）入都，即由李孟主其事。武宗即位，李孟逃离京师，隐于许昌陉山，几年后召回朝中。元仁宗即位，拜中书平章，赐爵秦国公。延祐二年为廷试监试官，改封韩国公，又任翰林承旨。卒，谥文忠。李孟曾三入中书，但退居一室，萧然如布衣。为文长于说理，但常自毁底稿，死后未能结集，诗文传世不多。

至治二年壬戌（1322）

二月十六日（既望）。朱德润向正在柳林畋猎的元英宗献《雪猎赋》。

《雪猎赋》序说：“至治二年春二月既望，时雪初霁，天子大蒐于柳林。

① 生年，据《畴斋文稿跋》；卒年，据虞集为张仲寿所书《归去来辞》写的跋语中说张仲寿“年几八十而终”（《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合编》第11册第2702页）。

还辛寿安山。……召小臣朱德润图而赋之。”这是元赋中力图接近汉赋的一篇，具体说是接近司马相如的大赋。只不过元英宗不是汉武帝，朱德润的特长也在于绘画而已。

三月。吴师道与友人出游金华北山，七日之内，遍历山中名胜。

吴师道一年后将感受写成《金华北山游记》与《北山后游记》。这两篇文章是元代著名的写景散文。从至大三年到至顺三年这二十多年间，吴师道与金华名人叶谨翁、黄溍、张枢、释元等五人，多次出游北山，“五人者虽不必偕，而游必有作”[①]，借诗文写下观感，成了北山出游的组成部分。金华的北山，与金华文人群体关系至巨，在这之前是如此，在这之后对于宋濂等人也是如此。

阿里西瑛的居室懒云窝成了散曲家、诗人在杭州聚会的地点。

阿里西瑛，西域回回。他的父亲阿里耀卿就是散曲家。阿里西瑛将在钱塘的其居室命名为“懒云窝”，他擅长吹奏筚篥，写有咏懒云窝的小令〔殿前欢〕，以筚篥伴奏演唱。贯云石为其作《筚篥乐》诗，并以〔殿前欢〕作和。一时间乔吉、卫中立、吴西逸等都写有和曲，以〔殿前欢〕集咏懒云窝，是散曲和诗歌制作的著名典故，参与者身份迥异，除色目人、汉人、南人，还有释子。释惟则《懒云窝》诗即为阿里西瑛作，惟则《筚篥引》（均见《师子林别录》卷五）诗序说：“西瑛懒云窝距余禅室半里许[②]，时相过从，吹筚篥以为供。复于余言有所需，乃赋长歌以为赠。”

吴全节授玄教大宗师、崇文弘道玄德真人，总摄江淮荆襄道教、知集贤院道教事。

吴全节（1269—1346）[③]，字成季，号闲闲，又号看云道人。饶州安仁（江西贵溪）人。十三岁时学道于龙虎山，至元二十四年随玄教宗师张留孙北至大都，入觐元世祖忽必烈。大德十一年，授玄教嗣师。玄教宗师张留孙于至治元年去世，吴全节接替其职位。卒，享年七十八岁。吴全节历事六朝，

---

① 陶宗仪《游志续编》卷下《北山后游记》跋语。

② 因为这里说懒云窝与惟则禅室相近，而至正初惟则门人在吴郡郡城为他营建“师子林”禅室，或以为懒云窝在吴中。但仁宗、英宗期间，曲家诗人聚会的懒云窝应该在杭州。《筚篥引》中明言“西瑛为我吹筚篥，发我十年梦想忆。钱唐月夜凤凰山，曾听酸斋吹铁笛”。这里惟则所说的“禅室”，也应在钱塘，不是吴城的师子林。

③ 吴全节享年，《元史》本传作八十二岁。

出入宫掖，眷渥如一。早年与江南名士戴表元、仇远、任士林交往密切，入朝后遍识名流、权贵，几乎所有文坛巨子都曾与他往还。著有《瓢稿》《代祠稿》等，总名为《看云集》，共二十六卷，未见传本。《元诗选》二集选入其诗 37 首，题为《看云集》，应是辑自他书。

释希陵去世。享年七十六岁。

释希陵（1247—1322），字西白。义乌（今属浙江）人。俗姓何，十九岁出家于东阳资寿院。后住持袁州仰山太平兴国寺，延祐三年移杭州径山。卒后，于天历二年赐号大辨禅师。诗文均有时名，有《瀑岩集》以及语录、偈颂行于世，均无传本。《元风雅》（十卷本）卷七、《天下同文》卷四十六、《御选元诗》等均选录有其诗，《元诗选癸集》壬集选其诗 7 首。

六月。赵孟頫去世。享年六十九岁。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湖州（浙江吴兴）人。宋宗室之后，南宋时以父荫补官，任真州司户参军，宋亡闭居于家。至元二



赵孟頫《人马图》。画面的人与马都有异域特征。

十三年，程钜夫到江南搜访遗才，将赵孟頫举荐于朝，次年授兵部郎中。至元二十七年授集贤学士。至元二十九年，任济南路同知。元成宗即位，诏赵孟頫修《世祖实录》，曾奉旨书写金字《大藏经》。授江浙等处儒学提举，至大三年，召至京师，任翰林侍读学士。元仁宗即位，授集贤侍讲学士，延祐元年改任翰林侍讲学士，延祐三年拜翰林学士承旨。元仁宗曾把他比做唐代的李白、宋代的苏轼。延祐六年辞官南还。卒，追封魏国公，谥文敏。著有

《松雪斋集》十卷。赵孟頫是元代最主要的书法家之一，真草隶篆各体皆精；又是元代四大画家之首，山水、花鸟、人物，无所不能，尤长于画马。他的诗文颇为书画所掩，戴表元说，赵孟頫古诗沈涵鲍谢，清邃奇逸，在元代文坛独树一帜。他写有不少应酬文字，比如碑铭序跋，一般均能写得具有文采又较恰如其分。以南宋宗室之后的身分仕于元，“荣际五朝，名满四海”（夏文彦《图绘宝鉴》卷五），曾一再受到时论批评，为此常流露出无所适从的心态。一些诗文，如《罪出》《赵村道中》《和姚子敬韵》等，都不加修饰地写出自己的矛盾与犹疑。《岳鄂王墓》是元诗名篇，这首诗之所以历来受到诗选家重视，其中当然含有作者身份特殊这一因素。赵孟頫妻管仲姬，子赵雍，外孙王蒙，都是元代知名画家，赵雍、王蒙并有诗名。

元明善去世。享年五十四岁。

元明善（1269—1322），字复初。大名清河（今属河北）人。系北魏拓跋氏后裔。弱冠游吴中，即以文章名于时。在江南曾作过几任省掾一类的下级官吏。元仁宗为元武宗太子时，擢元明善为太子文学。仁宗即位，改翰林待制，参与修纂《成宗实录》，升翰林直学士。为仁宗译《尚书》节要，每讲一篇，仁宗必称善，又与修《武宗实录》，升翰林侍讲学士，预议施行科举的条款。延祐二年始行科举，元明善出任进士考试官，录取者后多为名臣。元英宗即位，又与修《仁宗实录》，颇受宠信。卒于翰林学士任上，追封清河郡公，谥文敏。元明善早年以文章自负，晚年愈益精进，古文与姚燧并称，被目为一代文宗。马祖常评论元明善之文为“刻而不见其迹，新而必自己出”（《元文类》卷六十七）。元明善有文集行于世，已亡佚，今存《清河集》七卷，是近人缪荃孙所辑。另撰有《龙虎山志》三卷。

至治三年癸亥（1323）

五月。郭居敬《百香诗》成书并序刊。

《百香诗》有署“至治癸亥夏五，文川令尤恪慎叔行书”的序。这是较早成集的元人咏物诗集，收有100首七言绝句咏物诗，以“香”字为韵，所以题作《百香诗》，行于世。但流传不广，实际元人的咏物诗主要是七言律诗。《百香诗》今存有日本钞本。

廉惇请画家商琦为其画《读书岩图》，元明善与刘岳申分别作《读书岩记》[①]。

廉惇，字公迈。高昌畏吾人。廉希宪第六子（幼子），贯云石的舅舅。延祐七年，任西属四川道肃政廉访使。至治元年任秘书监卿。不久又出任江西行省参政。泰定二年在陕西行省左丞任上。长期退居林下，卒，谥文靖。有《廉文靖公集》，久无传本，论元代文学几乎从未涉及其人。仅《诗渊》与《永乐大典》保存佚诗273首，此外还有几篇文与词，是今存诗最多的回鹘（畏吾）人。

所谓“读书岩”，原是廉希宪的藏书室，廉希宪出镇陕西时，在长安樊川杜陵原构筑藏书之室，藏书万卷，名为“读书堂”，廉惇自幼曾在那儿读书习文。为纪念此事，廉惇又充实了万册藏书，并将藏书室命名“读书岩”。为此，廉惇写有〔水调歌头〕《读书岩》，《卧病读书岩闻蝉》[②] 以及《村居诗》34首、《城南书院诗》40首[③]等组诗。这两组诗都是廉惇在读书岩休居时所写。通过这些诗词以及图记，使得“读书岩”抬升为归隐山林的一种标志性境界。

商琦迁秘书卿，以病归，不久即去世。

商琦，字德符，号寿岩。曹州济阴（山东菏泽）人。商挺之子，商琥之弟。大德八年（1304），元成宗召备宿卫。元仁宗在东宫，奏授集贤直学士，调大名路治中，未赴职。皇庆元年，授集贤学士，延祐四年，升侍读官，赐钞二万五千贯。是元代著名画家、诗文家。

至治年间，福建建安书商虞氏刊刻出版了通俗小说《全相平话五种》。

所谓“全相”，是指上图下文（图约占三分之一版面）的图书。元人的“全相”书籍，是这种著述比较流行、比较普及的标志。“全相平话”是早期通俗小说的范本，也是小说发展史达到一个阶段的标志。与诗歌、散文相比，小说、戏曲有插图更利于流传。

所谓《全相平话五种》是《至治新刊全相平话》（共五种）的简称，包括《武王伐纣书》《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秦并六国平话》《前汉书续集》

---

① 元明善记，见《永乐大典》卷九七六五；刘岳申记，见《申斋集》卷六。

② 前者见《永乐大典》卷九七六五；后者见《诗渊》2864页。

③ 前者见《诗渊》第3155～3157页；后者见《诗渊》第3398～3399页。《诗渊》所录出的这两个组诗的诗题都不完整（有误截文字的情况），《村居诗》，《诗渊》原题为《敬臣以村居诗》。





《三国志平话》中的两页。“全相平话”就是这种模式。

《三国志》。当初所刻应该不止这五种，至少在《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与《前汉书续集》之前，还应该有“前集”或“正集”，不过仅这五种保存至今。这几种平话是元代通俗小说的范例，通过它，才能知道“全相”是什么格局，刚刚“走出”史传的平话小说是什么样子，距离章回小说还有多远。以它与至大元年的贯云石《新刊全相孝经直解》比较，可以确认14世纪前期，由于社会生活的特殊需求，确实有一个“读图时代”，“连环画”（“图文书”）成了受到雅俗共赏的出版物。鲁迅对《全相平话五种》的评价是：“观其简率之处，颇足疑为说话人所用之话本，由此推广，大加波澜，即可以愉悦听者，然页必有图，则仍亦供人阅览之书也。”（《中国小说史略》）“仍亦供人阅览之书”是正确的判断——问题是供谁“阅览”。阅览者的范围包括汉语文程度不高的汉族人，特别是蒙古色目人。事实上它们的内容并不简单，作为文字的“延展”部分是精彩的图像。

这五种平话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三国志》（《三国志平话》）。它是史传与《三国志演义》之间的引桥。《三国志平话》与另一种平话版本《三分事略》的关系，则是有争议的话题。其实元人的关于三国的“史著”（比如《续后汉书》《蜀汉本末》等）已经加入了比较多的主观成分，在启程“走向”小说，到了《三国志平话》（《三分事略》）则越过了区分的界栏。可以肯定的是，《三分事略》与《三国志平话》是同一部书的不同版本。但孰先孰后，则有异说。相比之下，《三分事略》比《三国志平话》粗糙简略（都是相对而言的），一般来说，粗糙简略者在先也是常识。但就这两者作比勘对读，则给人正相反的印象：《三分事略》是在条件相对恶劣情况下“再版”（或说盗版）的书籍。同时，通过元代如此重视《三国志平话》（初版数十年还有人盗版，说明还有读者，还没有替代品）这个事实，也证明14世纪距离长篇白话小说比如《三国志演义》还有较长的距离。——元代还没有如此纯熟的白话小说存在的文化氛围。

八月。夏溥领乡荐，授安定书院山长。

夏溥，字大之（一作大志），号虎怕道人。淳安（今属浙江）人。明《易》《春秋》之学，为文雄深简古。至治三年领乡荐，授安定书院山长，转龙兴路儒学教授。一时学者多从其游，赵汸、伯颜子中等均出其门。有诗名，与虞集、李孝光、杨维桢唱和，所作被称为“夏体”。

艺名“顺时秀”的女艺人郭芳卿，以杂剧表演技艺精湛受到世人瞩目。

《青楼集》云：

顺时秀，姓郭氏，字顺卿，行第二，人称之曰“郭二姐”。姿态闲雅。杂剧为闺怨最高，驾头、诸旦本亦得体。刘时中待制，尝以“金簧玉管，凤吟鸾鸣”拟其声韵。平生与王元鼎密。偶疾，思得马板肠，王即杀所骑骏马以啖之。阿鲁温参政在中书，欲瞩意于郭，一日戏曰：“我何如王元鼎？”郭曰：“参政，宰臣也；元鼎，文士也。经纶朝政，致君泽民，则元鼎不及参政；嘲风弄月，惜玉怜香，则参政不敢望元鼎。”阿鲁温一笑而罢。

据《录鬼簿》的贾仲明为杨显之所补吊词，王元鼎曾将杨显之敬为“师叔”，顺时秀则称杨显之为“伯父”。可见他们是下一代的人物。张昱的“宫词”——《辇下曲》第八十首（《张光弼诗集》卷三）写道：

教坊女乐顺时秀，岂独歌传天下名。意态由来看不足，揭帘半面已倾城。

“顺时秀”已经取代“珠帘秀”等，成为元曲当行演唱家的代名词。顺时秀的弟子“宜时秀”、陈氏，在元末以艺技知名于时，高启《听教坊旧妓郭芳卿弟子陈氏歌》、杨基《听老京妓宜时秀歌慢曲》等都是明证。而金元素的儿子金文石“幼年从名妓顺时秀歌唱，其音律调清巧，无毫厘之差，节奏抑扬或过之”（《录鬼簿续编》），证明她的影响不但持久，而且及于蒙古色目人。作为拂林人、也里可温，金文石已经是元明之际人了，可见顺时秀的艺术生命相当长。

活动于至治中的诗文家，有倪道原与黄石翁。

倪道原，字太初。安仁（江西贵溪）人。主要活动于元代中期，曾以明经应试，但未录取。工诗文，好游览名山大川，所到之处吟咏不辍。去世于京师，朝廷为表示尊重，由官方主持葬仪，并在墓碑题云“江南吟士之墓”。他与道教大师吴全节、张真人都有往还。《元诗选》三集选入诗 12 首，题为《太初集》。

黄石翁，字可玉，号狷叟，又号松瀑。南康（今属江西）人。出身书香门第，家住庐山之下，自幼多病，父母强使出家为道士。与文坛名流多有交往，邓文原、赵孟頫、袁桷、黄溍都有唱和。诗文很受重视，袁桷曾说：他的诗文“静而不驰，溢于哀怨”（《清容居士集》卷二《黄可玉哀辞》）。一生疾病缠身，每发病时不知自止，发病之后，就“危坐若思”，几次为自己

亲撰墓铭，死时年近六十。所著《清权斋内稿》，刘将孙、赵孟頫都写过序，未见传本。《元诗选》二集选诗13首，题为《松瀑稿》。他是元代道教诗人中较有影响者。

胡长孺去世。享年七十五岁。

胡长孺（1249—1323），字汲仲，号石塘。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宋咸淳中入蜀，铨试第一，授迪功郎，监重庆酒务，与高彭、李湜等号"南中八士"。宋亡，隐于永康山中，至元二十五年强起为集贤修撰，改扬州教授，元贞元年移建昌。至大元年转台州宁海县主簿，延祐元年以病辞，隐杭州虎林山，不复出。屡主乡闱取士，贵实贱华，文风为之一变。胡长孺是元代前期颇为活跃的文人，交游较广，影响较大。死后门人私谥纯节先生。与其表兄胡之纲、胡之纯皆以经术文学知名，并称"三胡"。所著《瓦缶编》《南昌集》《宁海漫钞》《颜乐斋稿》行于世，今未见。

杨载去世。享年五十三岁。

杨载（1271—1323），字仲弘。祖籍浦城（今属福建），后迁居杭州（今属浙江）。与虞集、范梈、揭傒斯齐名，并称元诗"四大家"。少孤，博览群书，为文跌宕可观，四十岁尚未出仕，由贾国英举荐于朝，以布衣召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与修《武宗实录》。延祐初恢复科举，杨载重新应举，延祐二年登首科进士第，授承务郎、浮梁州同知，迁儒林郎、宁国路总管府推官，未到任而卒。早年由于受赵孟頫推重，为京师文坛接受。他的文章以气韵为主，自成一家，其诗一洗宋代风习。他曾对学诗者说："诗当取材于汉魏，而音节则以唐为宗。"（《元史》本传）[1] 当时论诗法诸家，首推杨载。有《杨仲弘诗集》八卷。《四库全书总目》评其诗："清思不及范梈，秀韵不及揭傒斯，权奇飞动尤不及虞集。而四家并称，终无怍色。"旧题为杨载著《诗法家数》是影响较大的元代诗学著作，但论者或以为是他人伪题的托名之作。杨载文章传世很少，较著名的是为赵孟頫写的墓志铭。

八月二十二日。文矩去世。

文矩（？—1323），字子方。长沙（今属湖南）人。卢挚在湖南肃政廉访使任上，辟署宪司书吏，受到礼遇。大德十一年，授荆湖北道宣慰司照磨，兼承发架阁。朝中公卿闻其名，留补刑部宗正曹属，转秘书监校书郎、著作

[1] 《元史》本传的这句话相当知名，它出于元人蒋易《清江碧嶂集序》。

郎，延祐六年改翰林修撰兼国史院编修官。至治元年以奉议大夫、礼部郎中身份出使安南。使还，进太常礼仪院判官，卒于官。生前与赵孟頫、袁桷、虞集、程钜夫、马祖常等来往较密切，赵孟頫《送文子方调选云南》诗说："我友文子方，其人美如玉"；"文章多古意，清切绿水曲"。出使安南，不到十天就完成使命，还朝后著有《安南行记》一卷。吴澄《故太常礼仪院判官文君墓志铭》（《吴文正集》卷八十）中说："其文章歌诗，虽流宕尚气，有陈事风赋之志焉，惜其未传而遽止也。"未见别集行世，《元诗选》二集选其诗9首，题为《子方集》。



【泰定帝】



建元：泰定（四年），致和（八个月）



泰定元年甲子（1324）

三月七日。本年殿试，取八剌、张益为两榜状元。①

本届共录取进士 84 人，落第者授以教官。进士中的文学家有雅琥、王守诚、吕思诚、宋褧、段天祐、完泽溥化（沙德润）、程端学等。元明易代之际完泽溥化（沙德润）流落在吴中，与邵亨贞等遗老游。两榜状元，在文学史上则全无踪迹。

四月。山西洪洞县明应王殿为著名演员忠都秀在此演出作了预告。

“忠都秀”显然是杂剧演员的艺名，因为他所在的戏班即将在当地演出，演出的组织者绘制了这幅巨幅壁画，以招徕观众。这壁画为元代戏曲表演实况，留下珍贵记录。洪洞县明应王殿，俗称水神庙。这幅壁画保存在正殿，面积约 3×4 米，画面有 11 个演出人员：演员与伴奏，一出杂剧正进行到高潮。画面的中心是名角——作正末扮相的“忠都秀”。壁画上，有三行题记：“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尧都见爱。”“泰定元年四月日。”通过画面，使杂剧戏班的组成、人物的扮相、伴奏乐器、道具等内容得以为后人所知。

---

① 致和元年九月，改元天顺。





山西洪洞县明应王庙的元代壁画。就此可以了解到元杂剧的演出形式，与元代的『角色』当行的号召作用。

五月八日。贯云石去世于钱塘寓所，享年仅三十九岁。

贯云石（1286—1324），号成斋、疏仙、酸斋。高昌畏吾人，以北庭为郡望。本名小云石海涯，因父亲名为贯只哥，即以贯为姓氏，阿里海涯之孙。早年袭父爵为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至大元年让职位与其弟，北反大都。皇庆二年拜翰林学士，延祐初弃官离京，游历江南，定居于钱塘。是知名度颇高的元曲家，曾为散曲集《阳春白雪》作序，在当时文坛交游广泛，后人曾将元散曲称为“马贯音学”①。马，指马致远；贯，即贯云石。死后作品散失，有任讷辑本《酸甜乐府》（与甜斋徐再思合集），顾嗣立《元诗选》二集《酸斋集》存诗27首。今存诗50首，文数篇，散曲小令79首、套曲9套（据《全元散曲》）。

临终前，贯云石写了一首《辞世诗》：“洞花幽草结良缘，被我瞒他四十年。今日不留生死相，海天秋月一般圆。”这首诗在元明人的笔记中颇常见，陶宗仪甚至说：“洞花、幽草，乃先生二妾名。”② 贯云石密友张可久为此写了一首流传颇广的散曲《为酸斋解嘲》③。欧阳玄的贯云石墓志铭（《圭斋集》卷九）中这样描写他的死：“泰定改元，五月八日薨于钱塘寓舍，年三十有九。自士大夫至儿童贱隶，莫不悼惜。”

正是他的突然夭折，总给人不大真实的感觉。这便是他死去之后，关于他的传说不胫而走的原因之一。以至杨维桢竟然在梦境中与他较量诗义，萨都剌在鲁港驿舍与他“相逢”，钱塘女子曹妙清将见到他的记忆一直保留到至正初年，入明李昌祺将他写进了自己的小说《贾云华还魂记》（《剪灯馀话》卷五）。

徐再思以“甜斋”为号，与贯云石同时享誉于曲坛。

徐再思，字德可，号甜斋。嘉兴（今属浙江）人。曾任嘉兴路吏，其子徐善长亦有才思，能继家声。明人贾仲明所作凭吊徐再思〔凌波仙〕写道：“甘饴良好咂甜时，自号甜斋名再思。交游高上文章士，习经书，看鉴史，青出蓝，善长文词。名下无虚士，高门出贵子，根基牢，发旺宗枝。”（天一阁抄本《录鬼簿》）所作散曲与贯云石（酸斋）齐名，时人称作“酸甜乐府”。《录鬼簿》列名“方今才人相知者”节，《太和正音谱》评其作“如桂林秋月”。近人任讷将徐再思与贯云石散曲合编成《酸甜乐府》二卷，《全元

① 见清人邹祗谟《远志斋词衷》。

② 《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六“酸斋辞世诗”。

③ 见吕薇芬、杨镰《张可久集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97页，这是一首“带过曲”：〔南吕·骂玉郎过感皇恩采茶歌〕。

散曲》编录徐再思小令104首，《全金元词》有其词一阕。

龙仁夫为庐山东林寺僧释道惠的诗集《庐山外集》作序。

释道惠（约1266—1330），字性空。元代庐山东林寺僧，早有诗名，与文坛名流冯子振、程钜夫、滕斌、吴澄、贯云石、卢挚，诗僧大訢等皆有往还。贯云石游庐山时曾与其唱和，并同游九华山。道惠并非仅仅沉潜于释典的释子，他比较关心社会现实，诗作很少学究气，清新朴实。诗集《庐山外集》四卷，罕见传本，道惠及其诗从不为元诗选家所知，已知任何一种元诗总集都没有选入他的诗，元人文集也没有见到涉及他的文字。道惠生平，只能依据《庐山外集》的两篇序以及集中的诗篇大略考知。

作为诗僧，道惠是将江湖派诗风引入僧诗的第一人。他的诗主要是近体，其中七言律绝比例之高，在元代诗人中实不多见。他的诗少有深致，但并不缺乏灵气。总之，虽然长期隐而不显，但元诗史不能没有他的一席位置，不然元诗（特别是元僧诗）就失去了一部分内容，因之难于理解。龙仁夫在《庐山外集序》中说，他读过道惠之诗，“矍曰：是何善学唐体，甚肖许浑。彼俗间乱蜩噪，饥蚕吟，殆天壤绝。或曰：黄鲁直、陈无已诸公，往往嘲许诗平淡何如？予曰：客非知言者。今人学诗，开口谈唐律，李杜天马神龙，勿论唐初宋之问、沈佺期辈体尚踈，后来姚、贾诸人似太费铲锄，浸入纤薄，非大音。许诗雄浑而不粗犷，秀丽而近自然。盖盛唐铮铮，世无黄陈，客非知言矣。且师律度严而天机熟，材力裕而神宇完，得心应手全处天成，不待规规学浑，真丁卯桥法嗣耳。”这里渲染的正是江湖派诗风。

六月。吴莱出游昌国名胜，写出《游甬东山水古迹记》。

《游甬东山水古迹记》（宛委山堂本《说郛》卷六十七）与《海南山水人物古迹记》（《渊颖集》卷九）是吴莱最著名的散文。在游历之中灌注历史人文内容是这两篇游记的特点。本年，吴莱仅二十八岁。在《游甬东山水古迹记》开篇，吴莱说:“泰定元年夏六月，自庆元桃叶渡觅舟而东，”开始了这次出游，直到“是年秋八月”，他才离开昌国，返回姑孰（安徽当涂）。历时两月的观感，结成一篇游记。

冬。李孝光与友人陈德永等出游雁荡山的天然景观——石梁，作《始入雁山观石梁记》。

李孝光陆续写出10篇雁荡山游记，合称《雁山十记》（《永嘉诗人祠堂丛刻》本《五峰集》卷一）。《雁山十记》包括：《始入雁山观石梁记》《游



《雁山十记》就萌生于『大龙湫』之下。李孝光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很难再适应大都的官场。

灵峰洞记》《暮入灵岩记》《灵岩二奇记》《访钦禅师过马鞍岭记》《大龙湫记》《宿能仁寺东庵记》《游惠上人开西谷记》《雁名山记》《秋游雁荡记》。其中《大龙湫记》与《雁名山记》《秋游雁荡记》成就比较突出。《始入雁山观石梁记》开篇即云："予家距雁山五里近，四方游客者，或舍止吾家。吾岁率三四至山中。每一至，常如遇故人万里外。"正是这种切近在身边的"距离"感，使李孝光产生了"常游常新"的感受，持续写出"十记"。李孝光的"十记"与吴莱的"二记"，是这一时期散文的代表作。

王举之活动于此前后。

王举之，字里不详。长期生活在江南，曾一度离钱塘入京，钱惟善《送王举之入京就柬樵谷》（《江月松风集》卷九）诗以“短衣匹马佩吴钩，欲写关河万里愁”赠别。以所作散曲知名于时，《太和正音谱》列名于俱是杰作一百五十人当中。今存小令23支（据《全元散曲》）。

释英住阳山福岩精舍。

释英，字实存，号白云，俗姓厉。钱塘（浙江杭州）人。是唐代诗人厉玄后人，自父亲石田居士开始定居钱塘。自幼好学不倦，稍长以能诗为文坛士流赏识，曾出游江湖，自闽、浙、江、淮直达大都，在大都与赵孟頫结识。一次攀登径山时，在深山听到钟鸣，有所感悟，遂写下《径山夜坐闻钟》诗:“凉气生毛骨，天高露满空。二十三年事，一百八声钟。绝顶人不到，此心谁与同。凭栏发孤啸，宿鸟起长松。”于是出家于天目山中，遍访丛林高僧。享年八十七岁。

周仁荣于本年召拜国子博士。

周仁荣，字本心，号月岩。临海（今属浙江）人。以荐署处州美化书院山长，辟江浙行省掾，泰定初召拜国子博士，迁翰林修撰，升集贤待制。卒年六十一岁。工诗善书，在乡里颇受尊重，泰不华等均出其门。

《中原音韵》成书，周德清为《中原音韵》作自序。

周德清，号挺斋。高安（今属江西）人。一生致力于散曲创作研究，所著《中原音韵》二卷（别本一卷）是其主要成就。《中原音韵》卷首除泰定元年周德清自序，还有虞集、欧阳玄、罗宗信、琐非复初等人作的序。本书是以元代北方语音（中原音韵）为准则，而归纳成的一部专门供写作元曲（散曲与杂剧）的韵谱。内容还包括对具体作品的分析评价。作为第一部曲谱，被称为“德清之韵，不独中原，乃天下之正音也；德清之词，不惟江南，实当时之独步也”（琐非复初《中原音韵序》）。书中的“作词十法”，是作者根据个人创作实践拟定的十条写作散曲的规则。

释云岫去世。享年八十三岁。

释云岫（1242—1324），字云外，号方岩。昌国（浙江舟山）人。俗姓李。历住慈溪石门、象山智门、明州天宁，升住天童。有《语录》一卷，收入《续藏经》，其中存诗近百首。

牟应龙去世。享年七十八岁。

牟应龙（1247—1324），字伯成（一作成甫），号隆山。其先蜀（四川）人，徙居湖州（浙江吴兴）。宋咸淳七年（1271）进士，调光州定城尉，沿海制置司辟为属吏，辞不就。入元，他“以贫，强起为儒学官”[①]，晚年任溧阳教授，以上元主簿致仕。延祐初，恢复科举时，“异时科第中人物，存者无几”，于是特聘牟应龙“出持江浙文衡”。为文长于叙事，时人求文者盈门，以文章大家称于东南。人以他与其父牟巘、其弟牟应复为“三牟”比做“三苏”。有《隆山集》。黄溍著《隆山牟先生文集序》（《黄金华集》卷十六）。

王炎午去世。享年七十三岁。

王炎午（1252—1324），初名王应梅，字鼎翁，号梅边。安福（今属江西）人。南宋入太学，德祐间入文天祥幕府，以母老辞归，入元隐居于南昌。诗受江西派影响，但传世不多；其文亦有时名。宋元之际，所著《生祭文丞相》《望祭文丞相》两文，在遗民之中颇有影响。有文集《吾汶稿》十卷（卷十为附录），今存。

九月。薛汉去世。

薛汉（？—1324），字宗海。永嘉（浙江温州）人。自幼好学，受到时人推重。曾任青田县教谕，迁诸暨州学正，延祐五年，待诠京师，辟为功德使，授休宁县主簿，将离京赴任之际，国子祭酒邓文原向朝廷推荐了他，便又留在京师。泰定元年选授国子助教，并随车驾北赴上都。八月从上都回到大都，九月三日去世于京师居贤坊寓舍。薛汉不但是诗人、书法家，还长于古器物、书画的鉴定。赵孟頫号称学问鸿博，精于鉴赏，但每得古物书画，必定要先听取薛汉的意见。薛汉与虞集、柳贯等友善，他去世时，虞集、柳贯十分痛惜。

泰定二年乙丑（1325）

二月。开始建造吴江长桥，并成为苏杭著名的景观。从落成后，文学作

① 《隆山牟先生文集序》，《黄金华集》卷十六。

品一再将吴江长桥置于视野中。

《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六“吴江长桥”节）说:“吴江长桥七十二间，作桥者，僧徒雅师立总其役，崇敬率众以给其费，居士姚行独任劳以终事。经始于泰定乙丑（二年）二月，期年而成。后九年，州守的斤海牙作巨阁，奉观音像于上。”建造长桥的佛教文化背景明显。

揭祐民任邵武路经历，为官敢于直言抗上。

揭祐民，字希韦。广昌（今属江西）人。生性抗直，仕闽海间二十余年，泰定中历官邵武路经历，上司刚愎自用，但揭祐民待之不卑不亢。曾三至京师，程钜夫等公卿多乐与之游。在北游期间，经历燕赵，东至辽海，泛黄河，作《河上赋》，过海口，又有《海口赋》。曾为元曲家童童献诗 3 首（《河南王孙南谷平章诗三章》）以表敬佩之意。后寓居盱水之上，自号盱里子。晚年自病狷介，又称“希韦子”。《元诗选》二集有其《盱里子集》，存诗 40 首。顾嗣立评他的为人“豪荡激昂”，从其诗“可想见其人”。

张楧去世。享年六十六岁。

张楧（1260—1325），字仲实，号菊存。钱塘（浙江杭州）人。南宋名将张俊之后，张俊为成纪人，所以往往又称“西秦张楧”。生于南宋末年，入元以荐授杭州路学录，历任江阴州学正，宜兴州儒学教授，迁平江路儒学教授；除广德主簿，终于两浙盐运司知事。早年他和南宋遗老连文凤、戴表元等人过从密切，遗老相继谢世，他又与赵孟頫、邓文原、冯子振、贯云石、马臻等人唱酬，是元代江浙文坛承前启后的人物。诗文都曾结集，戴表元有《张仲实文编序》及《张仲实诗序》（均见《剡源集》卷八），但未见传本。

泰定三年丙寅（1326）

春。钟嗣成与廖毅相会，互相观赏曲作，一见如故。

钟嗣成《录鬼簿》云:“廖毅，字弘道。建康人。泰定三年丙寅春，因余友周仲彬与之会，即叙平生欢。时出一二旧作，皆不凡俗。如〔越调〕《一点灵光》借灯为喻，〔仙吕·赚煞〕曰‘因王魁浅情，将桂英薄幸。致令得泼烟花，不重俺俏书生’，发越新鲜，皆非蹈袭。”

刘将孙《养吾斋集》序刊。

刘将孙（1257—?），字尚友，号养吾。庐陵（江西吉安）人。刘辰翁之子。幼年质鲁无文，成年颖悟过人，皇庆二年荐授光泽主簿，历任延平教官、临汀书院山长等职。自幼承继家学，颇习父风，刘辰翁号须溪，刘将孙被称为“小须”。有《养吾斋集》四十卷，传本少见，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据《永乐大典》辑出《养吾斋集》三十二卷。诗文受刘辰翁影响颇深，其文被称为淹贯古今。诗如《感遇》等古体仿效陈子昂、张九龄，有较深远的寄托。

泰定四年丁卯（1327）

春。吴澄应段辅之邀，为《二妙集》作序，段辅则写有跋语。

段辅是段氏“二妙”——段克己、段成己——的后裔，段辅本人在泰定年间曾出任吏部侍郎，但他所作的最重要的事就是编刊了《二妙集》。吴澄《二妙集序》没有收入《吴文正集》，仅见《二妙集》卷首。他对二妙诗的评价是“陶之达，杜之忧盖兼有之”。段辅在跋语中说：“显祖遁庵君与从祖菊轩君，才名道业推重一世。值金季乱亡，辟地龙门山中。遁庵君既殁，菊轩君徙晋宁北郭，闭门读书，余四十年，优游以终。凛然清风，视古无愧。其遗文惜多散逸，所幸存者，古、律诗、乐府三数百篇，皆先侍郎手自纪录，屡欲传梓不克。小子不肖，痛先志之未遂，惧微言之或泯，谨用录梓藏之家塾，俾后之子孙毋忘先业云。泰定四年丁卯春，别嗣辅拜手谨志。”

三月七日。本年两榜状元是阿察赤、李黻。

本届录取进士共 85 人，其中文学家有赵期颐、黄清老、张以宁、刘尚质、王士元、燮理溥化（燮元溥）、蒲理翰、观音奴（至能）、杨维桢、萨都剌等。特别是本年进士中有天竺（印度）人——蒲理翰。

元代最主要的三个诗人：虞集、杨维桢、萨都剌，就有两人是本届同年。这一年的监试官是王士熙，读卷官是马祖常。可谓得人。二十年后，苏天爵（泰定四年时负责收掌试卷）回顾这一科进士时说：“是举得人凡八十有五。国子员阿察赤、李黻名冠第一”，“同榜之士扬历省台，蔚有令闻。则贡举得贤之效，成均养士之隆，益可徵焉。”①

① 《滋溪文稿》卷三十《书泰定廷试策题稿后》。



进士中的以下几人，一般很少受到论者注意，但他们都有作品流传至今。

索元岱，字士元。大名（今属河北）人。泰定四年进士，历翰林编修、御史台掾兼经筵检讨，外任燕南宪司经历。至正二年为南台御史。他以两篇序闻名：一是《南台备要序》，二是《至正金陵新志序》。

沙班，字子中。西域人，家族居杭州（今属浙江）。泰定四年登进士第，历官建康、建宁二路经历，二子善才、善庆俱登进士第，因之以“联桂”为堂名，由张以宁作记①，成廷珪赋诗称颂②。至正十一年，在杭州兴建义学，刘基为之写序（《诚意伯集》卷五）。死于元明易代期间。凌云翰《挽沙子中进士》（《柘轩集》卷二）说：“功名梦断邯郸枕，乡国心随博望槎。”

卜友曾，湖州（浙江吴兴）人。泰定四年登进士第，与西域人沙班（字子中）同年。诗文集已散失，佚诗首见《文翰类选大成》，并录入《元诗选癸集》丁集。

336 **本届进士赵期颐师从父亲赵祐早年救助的一个南宋战俘，终生获益匪浅。郑元祐《遂昌杂录》记录了这样一件事：**

今河南行省参知政事宛丘赵公，名（期）颐，字子期。其先府君宛丘公讳祐，字天锡，为江浙行省照磨时，余客于其家。宛丘公尝言其家在陈州，有瓦屋一横，人称“赵把总家”。国家每岁秋，统兵官将兵哨江南，比至县，民间竟歇泊。初至极严毅，再岁、三四岁，情契如故。一日，哨马南归，睹一累囚两足冻垂堕，呻吟饥冻马足间。宛丘之父问囚为谁，囚颦蹙曰：“我南宋官人，庐州通判胡某，城破为所掳。”公父复问：“如此，汝则是秀才。”囚复曰：“我春秋登科。”公父曰：“汝如此则能教学否？”囚曰：“岂有秀才而不能教学者乎？”公父请于统兵官，用两马易得之。浣濯以汤液，包裹以毡毳，温糜酒以饮食之，绝而复苏，苏则两足堕矣。因问其姓名、籍贯，遂延致其家，以教迪诸子。方是时，淮以北举不知有全书，胡通判以其所忆记授诸生。更六年而后殂，因葬之后屋。临殂谢宛丘公之家曰：“我分死六年前矣，重为汝家所延，汝之家后必有斯文显者。”逮子期登丁卯科，用文儒登政府，而其二代皆封二品，信乎斯文之可报可徵云。

① 《联桂堂记》，《翠屏集》卷四。

② 《沙班子中二子善才善庆俱登第……诗以贺之》，《居竹轩诗集》卷三。

在《遂昌杂录》中，关于赵祐（赵天锡）的记载颇详，他给人印象至深的是仁者之心。或以为此赵祐天锡，即元曲家赵天锡。赵期颐，是元史名臣，娶乃蛮答禄氏为妻[①]。诗文均有时名，精书法，与吴叡（孟思）均出自吾衍之门。关于赵祐师从南宋战俘学习儒家经典，与姚枢自战俘中救出赵复，始将儒家学说传至北方一事，都对打破南北壁垒的过程提供了生动例证。与赵复、砚坚相比，这个用两匹马换下的“庐州通判胡某”几乎全不为人所知。

四月。天台籍诗人黄庚为自己的诗集《月屋漫稿》写自序。

黄庚，字星甫，号月屋。天台（今属浙江）人，一云临海人。黄庚在宋末刻意学习举子业，曾为太学生。宋亡，放浪湖海，自称把平生豪放之气尽发而为诗。客居山阴，参加宋代遗民组织的越中诗社，在以《枕易》为题的考试中，黄庚曾获第一名。有诗集《月屋漫稿》一卷，别本题为《月屋樵吟》，析作四卷。

黄庚诗是典型的江湖风格。他之所以知名主要是因为《月屋漫稿》是元人别集中的特例。首先，它与黄庚的另一部诗集《月屋樵吟》大同小异，《月屋樵吟》四卷，是从近体到古体类编的，但如果把两书同类诗相比较，就会发现不但诗题基本一致，连在本类的顺序也是一样的，两书所收诗互有些微出入，但总的看来，《月屋樵吟》比《月屋漫稿》存诗略多，但它们无疑是黄庚的同一诗集。其次，与旧题张观光的诗集《屏岩小稿》关系微妙：《月屋漫稿》与《屏岩小稿》内容完全一样，不但所收入的诗相同，编排顺序也并无二致。可以肯定，所谓张观光的《屏岩小稿》是一部伪书，全据《月屋漫稿》伪题而成。《四库全书总目》虽指出《月屋漫稿》中的《枕易》诗又见于《屏岩小稿》，但只认为是个别现象（诗篇目互见是古人诗集中较常见的），又同时误将《屏岩小稿》收入别集类。这说明，在明清时期，黄庚与其《月屋漫稿》不大为人所知，所以才成了作伪的材料[②]。

元代京师的“大隐”诗人何失去世。

何失（约 1247—1327）[③]，字得之。昌平（今属北京）人。早年曾与鲜

---

① 《黄金华集》卷二十八《答禄乃蛮先茔碑》。

② 参见《中国文学大辞典》（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1 年八卷本）中，笔者所写的“月屋漫稿”“月屋樵吟”“屏岩小稿”等辞条。

③ 何失生年是据鲜于枢（1246—1302）、高克恭（1248—1310）生年，取其中拟定的。卒年，据柳贯《题赵明仲所藏姚子敬书高彦敬尚书绝句诗后》说，何失“年近八十而终”推出。

于枢、高克恭同学作诗，以才气自负，而他的诗也确实思致不凡。也许是身世不同，更可能是志趣所限，他没有走鲜于枢或高克恭的道路，而是坚持做“隐于市朝”的“大隐”，在大都（北京）自食其力地度过了一生。一个时期，他以织纱帽为业，由于质量优秀，号称“售不二价”。往往天一亮就骑驴出门买纱备料，一路歌吟，穿街过市，所吟大都是自己的诗篇。因别具一格的生活志趣，时名颇大，当朝公卿一再举荐，都以亲老为由，辞不就。他的同窗鲜于枢、高克恭都走上了另一条路，而且处境总的说来并不坏。去世时，已近八十岁。在元代诗人中，何失确实是特立独行者，确实是“售不二价”之人。

何失大约从来没有编辑过诗集，也就没有诗集流传。《元诗选》二集有何失《得之集》，选诗23首，但完全出自《元风雅》卷二十，只不过略微编次而已。而《元风雅》卷二十所录何失诗就是这23首。在《元风雅》本卷之后，附录了虞集的一则跋语和揭傒斯《过何得之先生故居》（五首）[①]。跋语中，虞集说：

> 国初，太原元裕之作《中州集》，言中州文献尽矣，故录其可传者，而粗记之其人行事本末。集尝悲其志而读之终卷，叹曰：“中原人物一至此乎！”及来朝廷，见诸君子益自浮其言之不妄。京师中，乃有隐人何得之之诗如此。京兆杜君稍忆其所口授者，叙而传之。嗟夫！后之作者，抑亦知世有斯哉。

所谓“京兆杜君”，是指隐士诗人杜本。也就是说，上述23首何失作品，都是因当年何失念给杜本听，杜本据记忆笔录才流传下来。而虞集本人曾由杜本引见，拜访过何失，杜本《清江碧嶂集》有《和虞太常寄谢何得之》诗。目前所能见到的何失之诗，基本出于《元风雅》。在大都，与何失齐名的隐士是张进中。张进中（1241—1320），字子正。大都（北京）人。是隐于市朝的制笔匠。王士熙《张进中墓表》（《元文类》卷五十六）明言，“今张君（张进中）何君（何失）相继以殒，求似者未之见”。元人陆友《研北杂志》卷下，记录了一则何失轶事：何失与李孟、黄约、吴珪等名公为布衣之交。而李孟、吴珪等，都是元史名臣；何失是百姓，名在册籍，每年应该服一定时间的劳役。但他年老时才有一女，只有三岁，为照顾女儿他得另外雇人去

---

① 虞集跋语，不见于《道园学古录》与《道园类稿》；揭傒斯诗又见《揭文安集》卷二。

替他服劳役。人们很同情他。他为此给吴珪写了一首诗:“白首犹当戍塞云，无儿谁替未亡身。木兰三岁方学语，须得弓腰知几春。”吴珪当时是枢密副使，拿这首诗给同僚传看，并设法解除了何失的册籍之名。从这个轶事可知何失的日常境况。总之，何失的诗是都市市井生活实录。

在元代，何失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甚至可以在宋濂《王冕传》看到何失的影子。何失与张进中，一个织帽匠，一个制笔匠，不但容易使人联想起《王冕传》——宋濂无疑听到过何失、张进中的故事，而且这简直就可以纳入《儒林外史》终篇的“四奇人”之中①。关于王冕的著名典故“燕市骑牛”，如果主人公换成何失那就更贴切了。一个像何失这样以织纱帽为业的匠人居然能够名动公卿，说明公卿自知在内心是缺少了一点什么。在《张进中墓表》里，王士熙说:“余识京师耆老多矣，所敬者惟君及何失。失家善织纱縠，最能为诗，充然有得，如宋陆务观，可传也。日出买丝，骑驴歌吟道中，旨意良远。”在其生前揭傒斯就与何失交往密切。揭傒斯将“达人在城府，不异山中栖”的“大隐”比做“心同巢与夷”。他认为何失是介于逸民与遗民之间的人物。

何失的《感兴》四首是大隐之诗的代表作：

大宝隐于石，哲匠莫核真。
猛虎走四野，尺草岂蔽身。
昧者虎不见，投石安足珍。
所以卞和泣，千载共沾巾。

饮酒莫啜醨，结交当求知。
论人先论行，相马不相皮。
一谄余何敢，三谗亲亦疑。
投身入屠钓，犹胜坐书痴。

人皆欲富贵，我岂愿贫贱。
青云一差池，如药弗瞑眩。
幼学苦不多，夜思曾得半。
今也发尽白，梳头雪满面。

① 《儒林外史》最后一回（第五十五回）“添四客述往思来，弹一曲高山流水”，写了四个隐于市朝的奇人（无业的书法家，卖火纸筒子的棋手，开茶馆的画家，以裁缝为生的琴师），作为全书的终结。

长恐愧乡间，一朝死愚懦。

渥洼骐骥儿，自有绝尘足。
锦张过都门，飞采射众目。
叹彼辕下姿，亦非驽骀物。
世乏伯乐俦，谁识千金骨。
所以荷蓑士，烟水日沦没。

正是这些格调高古的诗，使揭傒斯对何失作出“心事巢由以上，文章陶阮之间”的评价。

冬。元曲家杨梓去世①。杨梓对于海盐腔的创制流行有特殊作用。

杨梓（？—1327），海盐（今属浙江）人。先世居浦城（今属福建），移居海盐澉浦，是宋元间海运世家。至元三十年元军远征爪哇，杨梓任招谕爪哇等处安抚总使，延祐初，迁浙东宣慰副使。以杭州路总管致仕，卒，谥康惠。作杂剧3种：《下高丽敬德不伏老》《忠义士豫让吞炭》《承明殿霍光鬼谏》，今均存，此外还有诗篇传世。

杨梓与贯云石交谊深笃，据姚桐寿《乐郊私语》：“当康惠公存时，节侠风流，善音律。”“（贯）云石翩翩公子，无论所制乐府、散套，骏逸为当行之冠，即歌高引，上彻云汉，而康惠独得其传。”“（海盐）州少年多善乐府，其传多出于澉川杨氏。”杨氏家童千指，无有不善南北歌调者。一般认为四大声腔之一的海盐腔传自杨氏。“由是州人往往得其家法，以能歌名于浙右”。

徽州路休宁文人成立地方诗社——“小桃园诗盟”，并以《大有年》为题徵诗。

小桃园诗盟主持者是陈栎，本次徵诗的“评委会主任”是胡初翁。以陈栎、胡初翁的影响力，居然也在徽州一府之地收集到337卷应征的诗篇，经胡初翁评定名次，加以评语，以前三十名为“中选”。第一名叫“都魁”，是朱仲明；第二名叫“亚魁”，是“康衢遗民”（未署真名）。——这是月泉吟社“咏春日田园”徵诗的翻版。只不过在泰定年间，已经有了科举考试，诗社设擂徵诗，不再是文人惟一竞技途径，但仍然是一个补充。然而，月泉吟

① 关于杨梓的卒年，元曲论著与元人传记资料均未注明。《乐郊私语》中则说，“泰定丁卯，康惠薨逝”，所以他应卒于泰定四年。

社的集咏活动成了元代诗社活动的范例，可这个“小桃园诗盟”却几乎为人忘记。直到清中期编辑《元诗选癸集》时，休宁徵集到一部《明经书院考评》，是陈栎所著，记载了这次诗社活动情况，才留下了有关的记录。

陈栎参加过延祐首科乡试，此后便转移了兴致。胡初翁，字敬存，号存庵。婺源（今属安徽）人。他的一生成就，主要就是为“小桃园诗盟”的《大有年》徵诗作评判。

隐居诗人严士贞的《桃溪杂咏》成编。

《桃溪杂咏》是元代专咏一地风光的别集。严士贞，字正卿，号寄庵。武昌崇阳（今属湖北）人。元前期隐居乡里，以能诗鸣，为士林推重；淹贯经史，旁通仙释。经常往来于江西庐山，有《桃溪百咏》及《崇阳邑志》。《桃溪百咏》编录100百首七言律诗，有泰定四年宋民望序，流传不广。

元曲家陈以仁活动于这一时期。

陈以仁，字存甫，号复斋。福州（今属福建）人，寓居杭州（今属浙江）。《录鬼簿》列入“方今已亡名公”节，《太和正音谱》称其词“如湘江雪竹”。由于家境宽裕，不求闻达，常与南北士大夫交游，与钟嗣成有交往，钟嗣成称许:“钱塘风物尽飘零，赖有斯人尚老成。”晚年居婺州，为道士。陈以仁博学好古，有诗文名，长于词曲。作杂剧二种：《十八骑误入长安》《锦堂风月》，前者有残曲传世。

袁桷去世。享年六十二岁。

袁桷（1266—1327），字伯长，号清容居士。鄞县（浙江宁波）人。父亲袁洪仕于宋。家富藏书，袁桷博学多才，少年时就有文名，被举荐为茂才异等，任丽泽书院山长。大德初，由阎复、程钜夫、王构荐为翰林国史院检阅官，以博闻知礼著称。升翰林应奉文字，兼国史院编修官，请购求辽、金、宋三代遗书，为编三史打下了基础。迁翰林待制，又任集贤直学士，在翰林、集贤两院任职二十多年。至治元年，任翰林侍讲学士。泰定初，辞官归老于家。卒，追封陈留郡公，谥文清。诗文集《清容居士集》五十卷，今存。所著《延祐四明志》十七卷，《澄怀录》一卷，今亦存，《易说》《春秋说》等，则未见传。袁桷早年师事戴表元，受知于宋代遗老王应麟、舒岳祥等，承继家学渊源，入翰林院后又亲见中原文献，被认为学问最有所本，与贡奎并称为仅次于邓文原的江南文人。朝廷制册、勋臣碑铭多出于其手。在延祐、泰定间，与马祖常、王士熙唱和于翰苑，被目为一时之盛。文章长于考据，

是比较典型的馆臣之笔。诗一般工稳平实，造语准确，也不失文臣本色。《四库全书总目》这样评价他在元代文坛的地位："盖桷本旧家文献之遗，又当大德、延祐间为元治极盛之际，故其著作宏富，气象光昌，蔚为承平雅颂之声。文采风流，遂为虞、杨、范、揭等先路之导，其承前启后，称一代文章之巨公，良无愧矣。"

致和元年戊辰（1328）

三月二十六日（己丑）。以赵世延知经筵事。

《元史·泰定帝本纪》云：三月"戊子，车驾幸上都。己丑，以赵世延知经筵事，赵简预经筵事，阿鲁威同知经筵事。曹元用、吴秉道、虞集、段辅、马祖常、燕赤、孛术鲁翀并兼经筵官。"汉人、南人参与经筵，一般都是通蒙古语者，虞集即通蒙古语。这是文学家相对集中的一届经筵官。

孛术鲁翀兼经筵官后与皇帝讨论儒、道、释之间的差别。

孛术鲁翀素有"独立无朋"（吴澄语）之誉。一次，进讲罢，皇帝问孛术鲁翀："三教何者为贵？"他回答："释如黄金；道如白璧；儒如五谷。"皇帝说："若然，则儒贱耶。"他却说："黄金、白璧，无亦何妨？五谷于世，其可一日阙哉？"皇帝接受了他的比喻①。这是不同价值观的一次考量。

四月二十二日（甲寅）。封唐人柳宗元为文惠昭灵公。

据《元史·泰定帝本纪》，"改封蒙山神曰嘉惠昭灵王，盐池神曰灵富公，洞庭庙神曰忠惠顺利灵济昭佑王，唐柳州刺史柳宗元曰文惠昭灵公"，显然是将柳宗元视为保佑一方之神了。

六月。范梈写《翰林杨仲弘诗集序》。

隐士杜本意欲刊刻"元诗四家"之一的杨载诗集，专门请杨载至交范梈作集序。范梈的《翰林杨仲弘诗集序》在元人集序中有些另类，但对于杨载，以致"元诗四家"，都是首选的评论之作。

《翰林杨仲弘诗集序》（《杨仲弘集》卷首）全文是：

---

① 见《南村辍耕录》卷五"三教"节。

大德间，余始得浦城杨君仲弘诗，读之恨不识其为人。及至京师与余定交，商论雅道，则未尝不相与挺掌说也。皇庆初，仲弘与余同为史官，会时有纂述事，每同舍。下直，已而犹相与回翔留署，或至见月，月尽，继烛相语。刻苦澹泊，寒暑不易者，惟余一二人耳。故其后余以御史府用管南宪架阁适海上，仲弘复登乙卯（延祐二年）进士第，为浮梁别驾；余迁江西，仲弘亦改宣城理官，相违十数年，相距数千里，迹虽如是，而心固犹数晨夕也。而仲弘竟未任宣城以卒。呜呼恸哉！

余尝观于风骚以降汉魏，下至六朝，弊矣。唐初陈子昂辈，乘一时元气之会，卓然起而振之。开元大历之音，由是不变。至晚宋又极矣。今天下同文而治平，盛大之音称者绝少。于斯际也，方有望于仲弘也，天又不年假之，岂非命耶。盖仲弘之天禀旷达，气象宏朗。开口议论，直视千古。每大众广席，占纸命词，傲睨横放，尽意所止。众方拘拘，己独坦坦；众方纡馀，己独驰骏马之长坂，而无留行。故当时好之者虽多，而知之者绝少。要一代之杰作也！仲弘有子尚幼，其残稿流落，未有能为辑次者。友人杜君伯原（杜本）自武夷命仆曰：将就其平生所得，刻诸山中。此诚知仲弘者。而杜君猥谓，罄仲弘海内之相交、相好，又莫余若也。俾为序之，用掇其梗概，著于篇端。

致和元年六月一日，临江范梈序。

范梈自己写的《诗学禁脔》《木天禁语》是元代重要的诗学著作，但真伪历来有不同看法。不管《诗学禁脔》与《木天禁语》是否是范梈亲笔，仅凭《翰林杨仲弘诗集序》，范梈在元代诗学的地位已不可动摇。

八月。傅若金的新婚妻子孙淑去世[①]，年仅二十三岁，可谓红颜薄命，但遗留了一部诗集《绿窗遗稿》。

本年傅若金年仅二十六岁，出游湖南，受到湖南宣慰使阿荣的礼遇，在湘中刚刚成家。

孙淑（1306—1328），字蕙兰。祖籍汴梁（河南开封），随父流寓湘中。

---

① 《南村辍耕录》卷十三“绿窗遗稿”节，说孙淑是泰定五年八月去世，傅若金《绿窗遗稿序》署“泰定五年九月既望”。但泰定无五年，《元人传记资料索引》判断或为泰定三年之误。除《绿窗遗稿序》，在《故妻孙硕人殡志》也具体提到孙淑去世于“泰定五年八月廿有一日”。泰定四年之后，是致和元年，致和元年九月，改元天顺。但元人文献证实，民间确实在泰定四年后使用过泰定五年年号，如国家图书馆藏的石刻拓片，就有“泰定五年十一月”的纪年。暂将孙淑去世系于本年八月。

父亲孙周卿是元曲家（此从孙楷第《元曲家考略》说）。六岁母亲去世。父亲亲自教她读《孝经》《论语》等书，未教她学写诗，早年与其弟[①]同学唐诗。年二十三嫁给诗人傅若金，成亲仅五个月就去世了。她留下了一部存诗18首（还有一些断句）的诗集《绿窗遗稿》。陶宗仪将孙淑诗及傅若金《绿窗遗稿序》与《故妻孙硕人殡志》收入《南村辍耕录》卷十三，此后流传较广。《元诗选》把《绿窗遗稿》全部编入初集，傅若金《绿窗遗稿序》说，孙淑是娴雅孝顺的女子，平时很少写诗，写了也往往不留底稿，“家人或窃收之，令勿毁，则曰：‘偶适情耳，……辞翰非所事也。’”

在元代的女诗人中，孙淑存诗不多，与郑允端等相比经历也比较单纯。但她的诗是女性青春期的典型反映。诗的境界不高，可她的境界本就是那个样子；诗的内容不出闺房，可她本人正是在如此局促的方圆里憧憬未来，并为未来编织想象的空间。

① 傅若金《南征稿序》（《傅与砺文集》卷四）提到“内弟孙宗玉”，应即是其人。





【元文宗】



建元：天历（二年），至顺（三年）



天历元年戊辰（1328）

八月。怀王（即元文宗）图帖睦尔即将登基，由建康赶往大都，途中写诗纪行。他年仅二十五岁。①

这首诗颇有名："穿了毯衫便著鞭，一钩残月柳梢边。二三点露滴如雨，六七个星犹在天。犬吠竹篱人过语，鸡鸣茅店客惊眠。须臾捧出扶桑日，七十二峰都在前。"图帖睦尔无心观景，匆匆赶路，但前景美不胜收。它曾经被误编入明太祖文集，只不过改动了个别文句。较早见载于明初人叶子奇的笔记《草木子》（卷四上），叶子奇说是"梁王登宝位时，自建康之京都途中，尝作一诗云"。"梁王"是怀王之误，《草木子》作于洪武十一年，那时《明太祖文集》尚未编定。

元文宗（1304—1332），本名图帖睦尔。元武宗次子，元明宗弟。早年出居海南琼州，泰定帝即位，封怀王，泰定二年出居建康（江苏南京），又徙江陵（今属湖北）。致和元年，泰定帝死，权臣燕帖木儿迎至大都，即皇帝位，改元天历。天历二年又让位于其兄（即元明宗），但不久在途中毒死

① 元文宗纪年较混乱。其顺序大致是：致和元年七月，泰定帝死，八月，怀王（即元文宗）图帖睦尔在大都即位，改元天历，但九月权臣拥立皇太子阿速吉八，改元天顺。十月，又为文宗击败，仍然用天历年号。天历共二年，期间文宗一度让位于其兄（即元明宗），但仍用天历年号。七个月后，明宗被燕帖木儿毒死，文宗复帝位。天历元年，与致和元年同是公元1328年。为便于表述，略去天顺帝、明宗的帝位、年号的反复。




左图是元武宗。右图是他的儿子元文宗。原来武宗与仁宗说好，仁宗之后，由武宗的儿子继位，但仁宗食言了。元文宗是元代对汉文化最感兴趣的君主。这两幅画都出自故宫收藏的《历代帝后像》。

明宗，复帝位，改元至顺。前后在位五年，病死于上都，庙号文宗。在位期间皇室斗争激烈，但文宗本人精通汉语汉文，并通过创建奎章阁学士院，延揽名儒，讲授儒学，纂修《经世大典》等。是元代诸帝最倾向汉文化者。

也里可温女子赵鸾、艺妓梁园秀、钱塘女子曹妙清等一同为管道昇《紫竹庵图》题诗。

管道昇于元贞二年作《紫竹庵图》。当时，管道昇与柯贞白即在画幅上各题诗一首。管道昇去世，《紫竹庵图》在流传过程中，另外五位女子：赵鸾、梁园秀、曹妙清、了凡、妙空又各题诗一首①。

赵鸾（1308—1341），字应善。色目雍古氏，赵世延之女。许有壬妻赵定在天历二年去世，她嫁给许有壬作继室。年仅三十四岁赵鸾即去世。她不但是色目也里可温女子，而且名列《书史会要》。《书史会要·补遗》说赵鸾“朗惠厚静，能琴书，善笔札”。为管道昇《紫竹庵图》的题诗，是仅见的赵鸾手迹，也是仅存的西域女子的书法与诗篇。

梁园秀，姓刘氏。是元代著名的艺妓。《青楼集》以其为开卷第一人，

---

① 这五首诗未署写作时间。但赵鸾于天历二年嫁给许有壬作继室，出嫁后，许有壬甚至不知道她“能琴”，“又善笔札”（陈旅《安雅堂集》卷十一《故鲁郡夫人赵氏墓志铭》），所以这次笔会应作于赵鸾出嫁前。曹妙清曾与贯云石有过交往，贯云石卒于泰定元年。故暂定她们的题诗均作于本年。

并云："行第四。歌舞谈谑，为当代称首。喜亲文墨，作字楷媚，间吟小诗亦佳。所制乐府如〔小梁州〕〔青歌儿〕〔红衫儿〕〔侧砖儿〕〔寨儿令〕等，世所共唱之，又善隐语。其夫从小乔，乐艺亦超绝云。"《书史会要·补遗》则说她"材艺精妙，喜文墨，能作乐府，时吟小诗亦佳。字画楷正"。梁园秀《题管道昇紫竹庵图》成了这段描述的明证。她的散曲作品已全部散失，但这首诗为她在元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印迹。

与唐宋相比，元代女性文学（特指诗文）在社会生活中并不活跃，此外惟一的有女子参与的文学活动是杨维桢倡导的集咏《西湖竹枝词》，但在100多位参与者之中，仅两位女子：曹妙清、张妙净。曹妙清，字比玉，号雪斋。钱塘人。年三十不嫁，事母孝谨，工诗，善鼓琴，精于行书，早年受知于贯云石，并受到杨维桢推许。诗篇结为《弦歌集》，亦由杨维桢作序(《东维子集》卷七)，未见传本。所作《西湖竹枝词》，选录于《诗女史》《御选元诗》《宋元诗会》《元诗选癸集》《元诗纪事》等总集，是元代著名的女子诗作。除《西湖竹枝词》，曹妙清仅见诗篇就是《题管道昇紫竹庵图》。

了凡、妙空是两位尼姑。她们的诗作均仅见于此。

冬。金仁杰出任建康崇宁务官。

金仁杰（？—1329），字志甫。杭州（今属浙江）人。《录鬼簿》（曹寅刊本）金仁杰小传说："余自幼时闻公之名，未得与之见也。公小试钱谷，给由江浙，遂一见如平生欢。交往二十年如一日。天历元年戊辰冬，授建康崇宁务官。明年正月叙别。三月，其二子护柩来杭，知公气中而卒。呜呼惜哉！所述虽不骈俪，而其大概多有可取焉。"据《录鬼簿》著录，作有杂剧7种：《蔡琰还朝》《秦太师东窗事犯》《周公旦抱子摄朝》《长孙皇后鼎镬谏》《玉津园智斩韩太师》《苏东坡夜宴西湖梦》《萧何月下追韩信》，今存最后一种。《太和正音谱》评其词如"西山爽气"。

白珽去世。享年八十一岁。

白珽（1248—1328），字廷玉，号湛渊。钱塘（浙江杭州）人。早慧，八岁能赋诗，习为科举业，未中举而南宋亡。入元文名颇著，丞相伯颜及程钜夫前后举荐，都辞而不受。以李衎荐，为太平路儒学正，不久摄行儒学教授，又转常州路儒学教授，升江浙行省儒学副提举。任职期满，署淮东盐仓大使，曾养病海陵。官终兰溪州判官，致仕后结庐西湖金滩，门前有泉，名为"湛渊"，并以为别号，晚年归隐栖霞山，又号栖霞山人。白珽早年曾以"唐楚友"之名，中月泉吟社"咏春日田园"的第18名。宋末与仇远同以诗

知名，入元后二人皆应举荐出任教职，仕途坎坷。有《湛渊集》，诗、文各二十卷，已佚。今存《湛渊遗稿》二卷，是清人沈景梁辑。另著《湛渊静语》二卷。

邓文原去世。享年七十岁。

邓文原（1259—1328），字善之，又字匪石，或说号匪石。祖籍绵州（今属四川），迁居钱塘（浙江杭州）。宋末参加浙西转运司考试，中四川籍士子第一。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举为杭州路儒学正，大德二年，调崇德州教授，大德五年，擢翰林应奉，大德九年升翰林修撰。至大元年与修《成宗实录》，至大三年授江浙儒学提举。皇庆元年召为国子司业，因与主管者办学方针不一致，便以病辞职。延祐初恢复科举，任江浙行省考试官，延祐四年入为翰林待制。次年出为江南浙西道廉访司佥事，又任江东道佥事，在任以决狱廉明著称。至治二年任集贤直学士，次年兼国子祭酒。泰定元年兼经筵官。此后数次迁升，都以有病辞而不赴。卒。谥文肃。是元代较早的应制文臣，起草过朝廷典册。诗文集《内制集》《素履斋稿》，均未见传本，今存《巴西集》，有文无诗，《元诗选》二集据《素履斋稿》选录其诗 115 首。另著《读易类编》等，亦未见。在元代文坛影响颇大，大德至延祐年间，独以耆宿主持词林风气，在袁桷、贡奎等的附和追随之下，“操觚之士，响附景从，元之文章于是时为极盛，文原实有独导之功”（《四库全书总目》）。顾嗣立《元诗选》小传也说:“当大德、延祐之世，承平日久，善之与袁伯长、贡仲章辈振兴文教，四海之士，望风景附。王士熙、冯思温名位最为显赫，亦皆出善之之门。文章之柄悉归焉。”元代的馆阁诗文风格，正是肇源于邓文原。他也是元代书法名家。

十二月。张珪去世。享年六十五岁。

张珪（1264—1329）[①]，字公瑞，号澹庵。易州定兴（今属河北）人。张弘范之子。至元十六年张弘范平广海，宋礼部侍郎邓光荐将赴水死，张弘范救了他并给予礼遇，命张珪从其学。十六岁摄管军万户，张弘范死，元世祖召见张珪，赏赐丰厚。大德三年曾出使川、陕，问民疾苦，赈恤孤贫。还朝，擢江南行台侍御史，迁浙西肃政廉访使，拜江南行台御史中丞。元武宗即位，召拜中丞。皇庆元年任枢密副使，延祐二年拜中书平章。泰定初，封蔡国公；泰定二年夏，得旨暂归。张珪与其父张弘范都是武将而关注文事，并有诗才。

---

① 张珪卒于天历元年十二月，公历已在 1329 年。

《元诗选》二集选张珪诗7首，附于张弘范《淮阳集》后。

赵良弼去世①。

赵良弼（？—1328），字君卿，一作君祥。东平（今属山东）人。总角时与钟嗣成同里，共同师从邓文原、曹鉴、刘濩，又在省府同笔砚。经史问难、诗文酬唱以及乐章小曲、隐语传奇，无不精通，书画均长。后补嘉兴路吏，迁调杭州路吏。卒于家。作杂剧《春夜梨花雨》，已不存。

天历二年己巳（1329）

二月。张养浩受命前往陕西灾区救灾。此前，张养浩"凡七徵而不起"②，一旦闻知灾情严重，夕闻命而朝就道。

张养浩（1270—1329），字希孟，号云庄。济南历城（今属山东）人。早年读书不辍，山东按察使焦遂荐为东平学正。游京师，上书于平章不忽木，辟礼部令史。选授堂邑县尹，有政声，去官十年当地犹为其立碑颂德。元武宗时，受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赏识，拜监察御史。上书评议时政，受权臣排斥，改任翰林待制，复被罗织罪名而罢官。为避祸，张养浩变姓名遁去。元武宗死，元仁宗即位，召张养浩为左司都事，累迁礼部尚书。元英宗即位，命参议中书省事，曾谏止内廷灯山之戏。后以父亲年老，辞官归养。屡徵不起。天历二年，关中大旱，饥民相食，特拜张养浩为陕西行台中丞。既闻命，散其家之所有与乡里，义无反顾登车就道。作为文学家，为人为文在他是一致的。作为政治家，他体现出应有的人文道义情感。

二月。元文宗设立奎章阁学士院于京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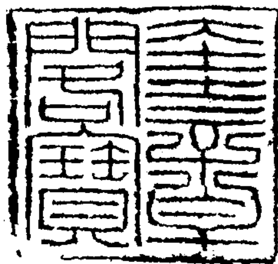
创建奎章阁时，元明宗仍在上都，文宗派专人携人员名单请明宗认可。奎章阁学士院设立在兴圣殿西，由大学士统领，下设侍书学士、承制学士、供奉学士。成员有蒙古、色目、汉人、南人，职责是为皇帝讲述经史以及元朝的"祖宗明训"。此外还有授经郎，专门负责为蒙古贵戚子弟讲授经书。先后在奎章阁任职的文人有：赵世延、康里巎巎、斳荣、沙剌班（刘伯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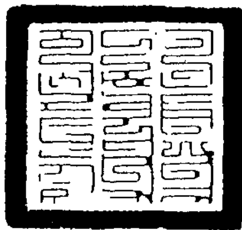
① 赵良弼君卿，与赵良弼辅之，是同名的两个人。

② 见《张文忠集》卷二十四《写真自赞》。

许有壬、尚师简、李泂、宋本、揭傒斯、雅琥、柯九思、泰不华、斡玉伦徒、杜德常、王守诚、王沂、周伯琦、归旸、李黻、苏天爵、毕申达儿、林希颜、甘立等数十人，文学家相当集中。其中赵世延、康里巎巎、雅琥、泰不华、斡玉伦徒、甘立等，是有作品流传至今的色目人。

甘立，字允从。西夏人，占籍陈留（河南开封）。早年有时誉，至顺年间由内掾改奎章阁照磨。与修《经世大典》，仕至中书检校。与柯九思、虞集、倪瓒、陈旅交往唱和，其诗风格与倪瓒相近，长于书法。因服食丹砂而卒。《元诗选》二集有甘立《允从集》，录诗25首，是顾嗣立自辑而成，其中24首出于《元风雅》卷十七。







几方印章的印文依次是“奎章阁宝”“奎章阁参书”（八思巴文）“经筵讲官”。它们也许是赵世延、李术鲁翀们使用过的。

斡玉伦徒，字克庄，号海樵（或海樵子）。河西唐兀氏，世居西夏宁州（甘肃宁县）。家族世代执掌西夏国史，祖父年十五通《论语》等经书古注。斡玉伦徒以《礼》举进士，历奎章阁典签、淮西廉访司佥事；后至元六年除南台经历，至正元年擢福建廉访副使；入为工部侍郎。预修《宋史》。累迁山南廉访使，拜侍御史，在元顺帝前期颇有影响力。有诗文名，长于书法。按：在元诗文献之中，斡玉伦徒名字有不同写法。《元诗选癸集》将斡玉伦徒诗分属于三人：斡玉伦徒（丁集）、王伦徒（戊集下）、斡玉麟图（戊集下）。《元诗纪事》则以斡玉伦都称之。但在他的题跋手迹中，总自称斡玉伦徒。

春。廖毅抱病死于友人江汉卿家。

廖毅，字弘道。建康（江苏南京）人。钟嗣成的文友。死后，由江汉卿与黄焕章两人买棺具殓，等他的亲人来到之后，火葬于城外的寺院。他以能书，善行文，不草率著称。咏伍王庙的〔折桂令〕与五言绝句都相当知名。

四月。为酷旱灾区的一场大雨，张养浩陆续写出几首散曲表述自己的情愫。

张养浩的套曲〔南吕·一枝花〕《咏喜雨》是元曲名篇①：

① 张养浩散曲，均见《全元散曲》。

用尽我为民为国心，祈下些值玉值金雨。数年空盼望，一旦遂沾濡，唤省焦枯。喜万象春如故，恨流民尚在途，留不住都弃业抛家，当不的也离乡背土。

〔梁州〕恨不的把野草翻腾做菽粟，澄河沙都变化做金珠。直使千门万户家豪富，我也不枉了受天禄。眼觑着灾伤教我没是处，只落的雪满头颅。

〔尾声〕青天多谢相扶助，赤子从今罢叹吁。只愿的三日霖霪不停住，便下当街上似五湖，都淹了九衢，犹自洗不尽从前受过的苦。

除〔南吕·一枝花〕《咏喜雨》，今存张养浩散曲尚有〔双调·得胜令〕《四月一日喜雨》，这两套套曲都是为旱情得以缓解而作。

六月。张养浩助手宣使李生，身染恶疾不幸死在救灾现场。张养浩以《祭李宣使文》为祭。

《祭李宣使文》（《张文忠集》卷二十四）写道："……今年二月，余自历下之官西台，而生乘传来逆，且拜且言：驰至长清，闻公由水而西，所以追及于此，乃获瞻拜。余见其端确卑慎，劳慰久之。时访西事，应对甚悉。凡所经过，传送供帐，辄先告集，余第受鞭而驰，舍策而憩，宴然不知身为客而道路之为修阻也。路出河南，流民寖遇，抵新安、硖石，则纵横山谷，鹄形菜色，殊不类人。死者枕藉，臭闻数里。余即命生躬督主者坎而瘗之。余年六十，生长齐鲁富庶之乡，饿莩流民，雅未尝见，一旦遇之，心酸鼻辛，不觉泪之交颐。生见余哀，往往先路而行，挥使避之，民不循途，多致颠沛。自后余虽悲不使生见之，而生亦不知余心之为益哀也。……每出阁，生必骑随，见流民与曩过无异，于是余又悲，欲命有司为粥食之，皆曰：'粥诚一设，饥民必四远而至，后或不给，奈彼众何?'余曰：'若然，则将听其死欤?'余随出私镪若干，令有司诡为鬻粥者，凡三处食之，命生往来覆视，民稍宁息。后又患库钱细民艰于交易，又命生监莅，几其为奸不时给者，库各一启，病民云簇。生资禀素薄，其毒恶之气乘之而入，遂感成疾，凡更数医，迄不能起。"仅一个月后，张养浩自己也死在同一景况下。

其实张养浩的文章，艺术成就并不比散曲差。他不但长于叙述，有强烈的使命感，而且颇具感染力。《驿卒佟锁住传》《祭李宣使文》都是元文佳作。

六月。张养浩作《为民病疫告斗文》，将瘟疫肆虐，上告于天。

在《为民病疫告斗文》（《张文忠集》卷二十四）中，张养浩写道："今

三辅之民，自春徂夏，由病疫而死者，殆数万计。巷哭里哀，月无虚日。使彼有罪，已盈其罚。伏望明神自今咸加宽宥，杜其祸源，开以生路，涤之以甘雨，荡之以祥飚，使人蒙休嘉，物遂生息，某等虽备员西台，亦或少纾厥责。”他是将自己放在了祭坛上。

前往灾区途中与救灾过程，张养浩写了一系列“怀古”的〔中吕·山坡羊〕，都是元曲名篇。

这些〔中吕·山坡羊〕包括：《骊山怀古》《沔池怀古》《北邙山怀古》《洛阳怀古》《潼关怀古》《未央怀古》《咸阳怀古》。特别是《潼关怀古》，历来元曲选家都予以高度评价。

《洛阳怀古》写道：

天津桥上，凭阑遥望，舂陵王气都凋丧。树苍苍，水茫茫，云台不见中兴将，千古转头归灭亡。功，也不久长；名，也不久长。

《潼关怀古》写道：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在张养浩笔下，怀古，实是伤今。

在救灾过程中积劳成疾，张养浩去世。终年六十岁。

到职四个月，张养浩未尝家居，止宿公署。夜则祷于公署，昼则出赈饥民，终日劳碌无少怠，遂一病不起。

从离家到病逝的短短几个月间，张养浩将一生“独善”“兼济”理想都落到了实处。这一点，还没有哪个曲家能与之并立。张养浩勤于著述，有《张文忠集》二十八卷。除诗文，又是元曲大家，天一阁抄本《录鬼簿》列名于“前辈名家”节，《太和正音谱》评其词“如玉树临风”。有散曲集《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传世，今存。所收作品多为归隐后所作。他的《三事忠告》（一题《为政忠告》）四卷，包括《牧民忠告》二卷，《风宪忠告》《庙堂忠告》各一卷，是元代重要的政书。

救灾时，张养浩“悯民饥死，作诗白于朝”[1]：“西风匹马过长安，饿殍盈途不忍看。十里路埋千家冢，一家人哭两三般。犬衔枯骨筋犹在，鸦啄新尸血未干。寄语庙堂贤宰相，铁人闻此也心酸。”他是心力交瘁而死，他自己就是他的最后一部作品的主人公。

秋。陕西灾区情况仍然未获缓解，同恕《西亭记》对救灾的紧迫性提出警告。

出任西台治书侍御史的宋崇禄到任，仅两个月也旧疾复发而去职，为此同恕写了《西亭记》（《榘庵集》卷三）。据《西亭记》，宋崇禄刚刚到任，“时适丁气候之变，饥馑疾疫，民之流离死伤者，十以七八。公居不安，食不饱，凛凛焉如救焚拯溺。凡可以迓续民命者，虑无不周。”文章归结到“乐吾之乐而忘与人同忧其忧”不可为训，委婉批评“荷担者思息肩，行远者思税驾”会使灾情死灰复燃。对于陕西这场天灾，《西亭记》等于是一剂清热解毒之药。

萨都剌以七律《纪事》直接反映明宗、文宗兄弟纠葛，这些事件涉及皇室核心机密，不但相当敏感，而且极其隐秘。

萨都剌诗比较关注时事，贴近生活，这便是萨都剌诗名颇大、较受民间欢迎的原因。实际“宫词”一类的作品在元代特定情况下也能归于时事诗。在元代诗坛，萨都剌本以《宫词》知名，他的“宫词”与“上京杂咏”等题材的组诗，一时广泛流传，时人甚至将其比做唐人王建[2]。即便不是写《宫词》，他也敢于关涉宫禁，甚至直接描写当代的宫廷政变，这在中国诗史上并非常见。萨都剌《纪事》诗写道：

> 当年铁马游沙漠，万里归来会二龙。周氏君臣空守信，汉家兄弟不相容。只知奉玺传三让，岂料游魂隔九重。天上武皇亦洒泪，世间骨肉可相逢。

明初人瞿佑《归田诗话》（卷中）说这首诗是“直言时事不讳”。瞿佑言必有据。他进一步解释说：

---

① 见明人靳颢《庙堂忠告序》（洪武二十三年六月）。见《三事忠告》卷首。

② 杨维桢《西湖竹枝集》。

盖泰定帝崩于上都，文宗自江陵入据大都，而兄周王远在沙漠，乃权摄位，而遣使迎之。下诏四方云："谨俟大兄之至，以遂固让之心。"及周王至，迎见于上都，欢宴一夕，暴卒。复下诏曰："夫何相见之倾？宫车弗驾，加谥明宗。"文宗遂即真，（文宗、明宗）皆武宗子也。故天锡末句云然。

元明宗是天历二年正月于漠北即位，当年八月，至上都，元文宗宣布逊位。在元明宗前往大都途中，被燕帖木儿毒死，元文宗再次登基。这首诗写在这件事发生之后不久。除元代之外的任何王朝，诗人如果敢于如此措词，必然酿成大狱。所以清人顾嗣立说萨都剌的《纪事》和《鼎湖哀》《漫兴》等诗"得古人诗史之意"[①]，并称许道："独有萨经历，讽刺中肯綮。"[②]

达溥化将自己所作"新乐府"数十首结为《笙鹤清音》[③]。

达溥化，字仲囦（或作仲渊），号鳌海。蒙古族，以茏城为籍贯。按当时习惯，又称溥仲渊（或傅仲渊）。进士出身[④]，任省郎，后在御史台以及江浙行省任职。有诗集《笙鹤清音》，但未见传本，虞集《笙鹤清音序》（《道园类稿》卷十九）说："溥君仲渊，国人进士。适雅量于江海。其在宪府，吟咏高致，常人不足以知之。予得见其新乐府数十篇，清而善怨，丽而不矜，因其地之所遇，感于事而有发，才情之所长，悉以记之。数年前有萨君天锡，仕于东南，与仲渊雅相好，咏歌之士，盖并称焉。"并指出，达溥化诗"方为时所雅重"。今存《鳌海诗人集》，录诗14首。

梁有在河南北寻访金石碑刻，并以自己所得上呈元文宗。

梁有，号九思。大都（北京）南城人。祖父梁曾，《元史》卷一七八有传。梁氏世居幽州，梁有奉母至孝，不求闻达，教授生徒百余人。天历间他在北方采录金石碑刻三万余通，并将其副本进呈文宗，将正本编为二百卷，题作《文海英澜》。还作《续列仙传》十卷。访碑过程，他曾在济州得汉碑九通于泗水之中。迺贤《金台集》有《寄城南梁九思先生》，诗云："徵君奉诏出京时，访古关河岁月迟。泗水中流寻汉刻，泰山绝顶得秦碑。仙人久致

---

① 《元诗选》初集（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187页。

② 《读元史八首》，其一，顾嗣立《秀野草堂诗集》卷五。

③ 虞集《笙鹤清音序》未署年月。从文义判断，应是元文宗时所作。在《道园类稿》卷十九，《笙鹤清音序》的下一篇《国子监题名序》是天历二年作，故暂系于此。

④ 元人说某人为进士，但不注科第，往往是指乡贡进士。达溥化或即是乡贡进士。

青牛约，弟子能修白鹿规。昨夜少微星象动，朝来兄恐史官知。”梁有撰写的燕京地方人物小传，至正间编入《析津志》。其中包括关汉卿的传略。

陆景龙中乡试，授庆元路学正。

陆景龙，字德阳，号湖峰。嘉兴（今属浙江）人。中乡试后，除庆元学正，还曾任饶州路余干州儒学教授。在诗坛较有影响。别集《湖峰稿》，未见传世，诗散见于《元音》《敦交集》《槜李诗系》《文翰类选大成》等总集。

洪焱祖去世。享年六十三岁。

洪焱祖（1267—1329），字潜夫，号杏庭。歙县（今属安徽）人。至元二十九年为平江路儒学录，调浮梁州长芗书院山长，再调绍兴路儒学正，改衢州路儒学教授，擢处州路遂昌县主簿。天历元年致仕，次年卒于家。洪焱祖历任学官，所到之处兴修学舍不遗余力。客居杭州时，曾以方回为师；旅于上饶，又与戴表元结识，成为忘年交，大德八年戴表元曾为他的诗稿作序。洪焱祖早年即有诗名，死后其子编订遗作，并由宋濂选辑为一书，即《杏庭摘稿》一卷。还著有《续新安志》十卷、《尔雅翼音注》三十二卷等。

十月。贡奎去世。享年六十一岁。

贡奎（1269—1329），字仲章，号云林。宣城（今属安徽）人。十岁能属文，及冠博贯群史，被省檄为池州路齐山书院山长，在池州暇日游览山水胜概，寄情于诗篇，一时传诵。秩满，大德六年谒选赴京师，授太常奉礼郎。大德九年十一月除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至大元年转翰林应奉，延祐元年授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曾在公署屏风上大书：“读书之中日有其益，饮水之外他无所求。”延祐五年迁翰林待制，至治元年辞归故里，奉养老母。至治三年复出，主持江浙贡举，泰定四年拜集贤直学士，天历元年代祀北岳等地，次年还自会稽，以疾归卧于家。卒，谥文靖，追封广陵郡侯。宣城贡氏是世家大族，其子贡师泰、侄贡师文俱有文名。有《云林小稿》《听雪斋集》《青山漫吟》《倦游集》《豫章稿》《上元新录》《南游纪行》共一百二十卷。明永乐年间徵入秘府，家无副本，均失传。只有《云林小稿》，后经贡氏后裔重编为《云林集》六卷。

查居广去世。享年四十六岁。

查居广（1284—1329），字广居。临川（江西抚州）人。自幼入金溪望仙观为道士，又到上饶龙虎山学道，曾从道士黄石翁学诗。东游到四明，还

憩虎林山，得到杨载七言今体诗，捧读后叹服其雄浩；又得到范椁的各体诗作，为其清峻所折服。于是把杨载、范椁的诗都手抄成帙，不时吟诵，自认为心领神会，受益很大。于是带上诗稿，到清江百丈山就学于范椁，得范椁诗法。范椁曾亲自从他的诗稿中择选佳作50多首，题作《学诗初稿》，并为之作序。

曹元用去世。

曹元用（？—1329），字子贞，号超然。世居阿城（今属山东），徙居汶上（今属山东）。初任镇江路儒学正，秩满北游京师，受到翰林承旨阎复赏识，荐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御史台辟为掾史，转中书省右司掾。改任尚书省右司都事，尚书省撤消，便退居任城，齐鲁士子从其学者甚众。延祐六年授太常礼仪院经历。英宗即位，任为翰林待制，又升翰林直学士。泰定二年任礼部尚书，兼经筵官，预修仁宗、英宗两朝实录。天历二年，代祀曲阜孔庙。还朝后，卒于任，追封东平郡公，谥文献。与元明善、张养浩并称为“三俊”。诗文集《超然集》，共四十卷，今不存。《录鬼簿》列其名于“方今名公”节，《太和正音谱》列其名于俱是杰作一百五十人中。作南戏《百花亭》，仅存残曲。

三月。陈无妄去世。

陈无妄（？—1329），字彦实。东平（今属山东）人。早年与钟嗣成、赵良弼同舍。补衢州路吏，后迁婺州，升浙东宪吏，调福建道，以忧卒于家。于乐府隐语，无不用心，作乐府颇多，但未能流传至今。钟嗣成对他的死相当惋惜，在《录鬼簿》中以〔凌波仙〕曲表示悼念。

至顺元年庚午（1330）

三月。本年两榜状元是笃烈图、王文烨。

本届录取进士共97人，有林泉生、李裕、许有孚、金元素（哈剌）、黄昭、归旸等。

金元素是西域拂林人，也里可温，原名哈剌，由元文宗御赐姓金。他是元代（也是整个科举史）的进士中，祖籍距离中原最远的一人。归旸，则因为此后的河南范孟之乱，成为在民间知名度极高的人物。

五月。时为翰林的胡助，扈从大驾避暑上都。

胡助于八月将此行往返过程写的50首纪行之作，结为《上京纪行诗》一卷。胡助《上京纪行诗》50首与黄溍《上京道中杂诗》12首是中期上京纪行的典范之作。

当时名流为胡助上京纪行之作题跋尽卷，使“上京纪行诗”这一题目，重新成为翰苑文人的关注点。《纯白斋类稿》（卷二十）有《上京纪行诗序》。这是上京纪行之作成熟定型、并对社会产生比较广泛的影响的标志。

《上京纪行诗序》说：

> 至顺元年夏五月，大驾清暑滦阳。翰林析僚佐扈从，而助亦在行中，会微疾差后。至六月下浣，始与检阅官吕仲实偕行，仲实权从游于升学者也，今又同在史馆，故乐与之偕。沿途马上，览观山水之盛也，日以吟诗为事。比至上都官署，寓于视草堂之西偏。文翰闲暇，吟哦亦不废。是时，学士虞先生乘传赴召。先生至于堂上，留数十日，日侍诲言。先生属以目疾惮书，凡有所作，往往口占，而助辄从旁执笔书焉；或一诗成，必正于先生。而先生亦为之忻然。其所以启迪者多矣，兹非幸欤。南还之日，又与翰林经历张秦山、应奉孟道源、及仲实同行，亦日有所赋。若睹夫巨丽，虽不能形容其万一，而羁旅之思，鞍马之劳，山川之胜，风土之异，亦略见焉。至京辄录为一卷，凡得诗总五十首，以俟夫同志删云。其年八月吉日自序。

仅保存在《纯白斋类稿》附录中的为《上京纪行诗》作题跋的闻人，就有王守诚、王士熙、苏天爵、王理、黄溍、孛术鲁翀、吕思诚、陈旅、曹鉴、吴师道、王沂、揭傒斯等十余人。

前往上都途中，马祖常以应制之作受到元文宗嘉赏，翰苑文臣应制赋诗，此为第一次。

对于出自雍古族的马祖常，元文宗本就相当赏识，曾推许：“中原硕儒惟祖常。”本年自大都随驾前往上都途中，元文宗驻跸龙虎台，马祖常“奏事幄殿，敕近侍给笔札，命公榻前赋诗”，“因诗以寓规谏，上览之，甚悦，适太官进食，乃辍尚食以赐”①。这是元代首次出现翰苑文臣应制赋诗。

① 见苏天爵撰马祖常墓志铭（《滋溪文稿》卷九）。在其他记载之中，这件事略有差异，一般将元文宗的那句话记成是对马祖常应制诗的褒扬。据《元诗选》小传，元文宗的这句话是“孰谓中原无硕儒乎”。

五月。元文宗要虞集为已经去世多年的姚天福作《姚忠肃公神道碑》。

虞集《姚忠肃公神道碑》（《山右石刻丛编》卷三十四），是其重要文章。为写与不写此碑，他思想一再反复，颇费踌躇。同时，这也是虞集所作碑传文，甚至是元代碑传文叙事意味浓厚的一篇。

姚天福（1230—1302），字君祥。稷山（今属山西）人。至元十一年迁监察御史，为元世祖器重，并赐名“巴儿思”（蒙古语“老虎”）。至元十六年任淮西按察使，二十年任山北辽东道按察使，二十二年召为刑部尚书。大德三年拜江西参政，大德四年以参知政事行大都路总管。是元初执掌刑律的重臣。享年七十三岁。他的女婿就是著名的书画家、文物鉴赏家柯九思。

据《姚忠肃公神道碑》，至顺元年五月丁卯，元文宗“有诏，命国史臣集撰《姚忠肃公神道碑》。又诏臣集曰：鉴书博士柯九思，其婿也。可徵其家世行事岁月。”在此之前的天历二年，姚天福的儿子姚侃曾亲自请求虞集为姚天福撰写神道碑，但虞集没有答应，姚侃只得转请孛术鲁翀，孛术鲁翀也已经写出了一篇姚天福为“传主”的《大都路总管姚公神道碑》，时在天历二年。仅时过一年，皇帝又出面要虞集执笔，应该是出于柯九思的“运作”。有了钦命，虞集写出了自己写作生涯中最有争议的一篇文章。这时，姚天福去世已经近三十年，他一生最著名的“勘钉”一案发生在至元二十年，过去也近半个世纪了。

虞集是写作碑传文的高手，但这篇“神道碑”从一开始就不大合乎体例。他竟然记录了一大段“君臣答问”。在文章里，虞集仍然注重案例，这是由传主的特殊身份所致。除了在山北辽东按察使任上的那两件事，他还写了“男子伪扮女巫”“判姐弟之间财产之争”等一些著名的案例。

所谓“男子伪扮女巫”是：

（至元廿八年）丞相桑哥诛，其党人多在平阳者。移公尹平阳。时有男子伪为女巫，言祸福，民为惊惑。公曰：“乱常而污俗者。”立命扑死于市。

所谓“判姐弟之间财产之争”说：

民有寡妇朱，属其弟以钱为商者。弟因以富，而姊日贫，弟弗与更苦之。姊告诸官，率以无券不为理。公得状，令其姊还家以待，而召其弟曰：“尔昔贫，今富何也？今某盗言，尔实与偕，信乎？”弟惶惧言：

“某因姊钱经营，粗有余，有簿书可徵。”公即召其姊，按簿分其半与姊，皆感悦而去。

这两则案例，与“勘钉”相比没有曲折复杂的戏曲性情节，特别是“勘钉”的“两案相衔”的“搭桥”确实使人惊悸。但这两个简化的段落仍然有叙事化所需要的结构与脉络。

有些奇怪的是，《元文类》编入了孛术鲁翀《大都路总管姚公神道碑》（在卷六十八），而没有收录虞集如此重要的《姚忠肃公神道碑》。两碑相比，内容出入不大，但是孛术鲁翀所作要简略平直得多，特别是“勘钉”一节，读起来已经失去了阅读“过山车”的感受。

两碑写作相差一年，而且都在《元文类》编定（元统二年）之前。当然，这是苏天爵的取舍。可虞集本人同样没有将其编入自己的文集，不论是《道园学古录》五十卷还是《道园类稿》五十卷。这两种书也都编订在至正初年，显然是虞集自己将其屏置于文集之外的。如果不是姚天福的儿子姚侃在元统元年三月将其刊刻，立石于山西稷山县南阳村姚氏墓园，它早已经不存于世。是涉及了元文宗？元人从来对这类问题不那么敏感，而且《元文类》中涉及文宗者实不在少数。是作者对文章感到不满？它的写法（取材、角度）与虞集其他的碑传文章不大一样。以“勘钉”为例，近半个世纪以来，作为一个“另类”的碑传，它确实处在满足人们对小说戏曲需求的一个中间位置。

秋。揭傒斯出任艺文监丞，为其仆人邹福作《题邹福诗后》。

《题邹福诗后》（《揭文安集》卷九）云：“右邹福诗七首。邹福者，吾乡田夫之子也。粗读《孝经》《论语》。家贫，与人佣耕。泰定元年，余居忧于家，其父遣从余，给薪水之劳，然暇即密自观书。居五年，余携至京师。会新天子入正大统，以文德治天下。明年春，开奎章阁，详延儒雅，讲论道德，置授经郎以教勋旧大臣子弟之在左右者，以国子教授庐陵林希颜及余为之。寅入而酉出，令福守舍，乃尽日闭门读书习字，间为小诗，及暮则请可否于余。余或方倦欲休，或方读书有会意处，或执笔为文章思方属，必辍而告之，不使几微见余懈怠意。遂以为常。今年秋，迁丞艺文，日简静无事，请问之时益富矣。余适坠马在告，日卧斋阁中，福连有所作，皆可观，余因取其法度音节尤近者得七首，为书之，仍题其后，以志余喜，且以为世之世臣大家学士大夫之子弟不知学者之劝。余在阁中时，福又从林希颜学国书（按：即蒙古语文），希颜极称其可教，其所得浅深，余不能知也。要亦好上者云尔。

余数年于文事使令，盖深得其助焉。因并识于此。"

揭傒斯的同僚陈旅《勤耕亭铭序》（《陈众仲集》卷十三）说："富州民邹福，少时与人佣耕。及事文监揭先生，始知学。在京师，久学益力，能为诗。又从奎章阁授经郎林希颜学国字，业成，将受校官去，乃来言曰：吾本黎塘里田舍子也，虽窃有志四方，然还里日，不敢舍吾耒以嬉。太常博士赵公为篆'勤耕'二字扁吾草亭，愿得一言识之。余善福之能不遗其本也，为铭曰（略）。"

这个"能诗"又"不敢舍吾耒"的"田舍子"邹福，与阚举、何失有相近之处。他们的存在是元诗对社会生活影响广泛的例证。在元诗史上，邹福不是一个特例，与其类似的能诗"仆从"还有所谓"跛奚"等。跛奚，是杨维桢的家奴，名字不传，以跛一足被称为"跛奚"，据说"恪善记诵"，唐肃《跋跛奚诗》（《丹崖集》卷八）说，因此"一时与先生游者，悉宠以诗"，并归纳为"揭文安（按：指揭傒斯）有邹福，陈莆田（按：指陈旅）传之；贡文靖（按：指贡奎）有朱老，程新安（按：指程文）传之"，可见时人是将邹福作为能诗的奴仆的代称。

九月。钟嗣成《录鬼簿》初步编成，钟嗣成与朱凯写了序文。

钟嗣成的序，署"至顺元年龙集庚午，廿又二日，古汴钟继先自序"，重点是交代了将一部元曲文献称为《录鬼簿》的缘由。在殚精竭虑完成了一部著作之后，对青春易逝、命运无常，感受真切。

朱凯的序写道："文以纪传，曲以吊古，使往者复生，来者力学，《鬼簿》之作，非无用之事也。大梁钟君继先，号丑斋，乃善之邓祭酒、克明曹尚书高弟也。累试于有司，命不克遇，从吏则有司不能辟，亦不屑就，故其胸中耿耿者，借此为喻，实为己而发之。乐府小曲，大篇长诗，传之于人，每不遗稿，故未能就编焉。如《冯驩焚券》《伪游云梦》《斩陈馀》《蟠桃会》等词，皆在他处按行，故近者不知，人皆易之。君之德业辉光，文行温润，后辈奚能及焉。噫，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日居月诸，不可免旃。至顺元年九月吉日，朱凯士凯序。"在这篇序中将钟嗣成本人也纳入《录鬼簿》。

钟嗣成，字继先，号丑斋。祖籍大梁（河南开封），定居杭州（今属浙江）。以明经累试不中，为江浙行省掾史。主要成就是著《录鬼簿》二卷。钟嗣成作杂剧7种，今均不传。《太和正音谱》评其词"如腾空宝气"。此后，《录鬼簿》曾经多次修订补正，《录鬼簿》的版本问题，是元曲史的重要内容。

黄镇成出游楚汉名山，经历燕、赵、齐、鲁之墟。浮海南还后，又登补陀落迦山，观看日出，以扩大眼界胸襟。

黄镇成（约1261—1334），字元镇，号存斋。邵武（今属福建）人。一生隐居，不应荐举，笃志力学，不慕荣利，筑“南田耕舍”，读书著述其中。奏授江西儒学副提举，但朝命下时，他已经去世，卒年七十五岁。是元代典型的隐士，集贤院定号为“贞文处士”。有诗名，诗受到南宋江湖派影响。诗集《秋声集》四卷（别本九卷或十卷），今存。另著《尚书通考》十卷等。

至顺二年辛未（1331）

三月九日（甲申）。雅琥受到御史弹劾，并被斥逐出京师。

据《元史·文宗本纪》：御史台直指雅琥为“阿媚奸臣，所为不法，宜罢其职”。文宗“从之”。于是雅琥从奎章阁参书外贬为广西静江路同知。大都馆阁之士与文人纷纷为其送行，以表示对其受到贬谪的同情。

雅琥，字正卿。本名雅古。雅古（Yakut）是典型的基督教教徒的名字。族属和先世无考，仅雍古诗人马祖常《送雅琥参书之官静江诗序》（《石田集》卷九）提到“正卿尝家衡鄂”，此说又为清人顾嗣立《元诗选》二集（雅琥小传）采用。同时，马祖常序称，“他日正卿以亲老乞高邮便养”，可知雅琥的父母家人在元文宗时居住在高邮（今属江苏）。此外，对雅琥早年生活所知不多。雅琥《送吴子高还江夏》诗序说：“庚申春，余在江夏，尝赋诗送子高之沅。庚午，复来会京师，因求偶而还。复作此以饯。”据此，延祐七年庚申，雅琥居住在江夏（湖北武昌），并与诗人吴元德[1]唱和。泰定元年与宋褧、王守诚等是同榜进士；他的年龄在同年中最小；元文宗亲自为他选取“雅琥”两字为汉语名字。在奎章阁参书任上，他受到元文宗宠信。御史台臣弹奏雅琥[2]，使他从得以接近皇帝的位置，外贬静江路同知，“馆阁僚友及京师声明之士”纷纷为雅琥送行，“各欣然为文章，以美其行而劝其无久于外，以致其去处之情”。仅存的雅虎文章主要写于广西，自静江路同知，

---

① 吴元德，字子高。江夏（湖北武昌）人。元代诗人，有《性情诗》。《中国文学大词典》（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册第2906页，有笔者所撰词条。

② 《元西域人华化考》卷四对此有专门的辨析，以为台臣对他的攻击，“不足为雅琥病”。

雅琥又迁福建盐运司同知[1]。此后的事迹就不见载于典籍了。

雅琥工书能诗，他的诗诸元诗选本选录者颇普遍。清人顾嗣立《元诗选》二集收入雅琥《正卿集》，存诗39首。但《正卿集》，是顾嗣立据《乾坤清气》《元音》《文翰类选大成》等书自辑而成。他的《上执政四十韵》是对时政的评议。

作为华化的色目诗人，雅琥曾提出了对元诗发展有一定影响的诗论。许有壬《跋雅琥所藏鲜于伯机词翰》（《至正集》卷七十三）写道：

> 鲜于伯机诗予知之已四十年。吉甫段君慨言：人知其书，诗则知否相半。予方自幸在知者之中。而夷陵监郡雅琥正卿知之虽晚，爱之甚笃。正卿素言：晋后虽有书，终不能如晋；唐后虽有诗，终不能如唐。予谓"诗发于人心，天地无穷，人心无穷。不当主世代计也。书视诗，又艺之艺耳"。正卿不屈也。及观伯机书，则谓"真十七帖"；观其诗，又谓"轶苏州，入彭泽矣"！若然，则晋唐而后，书复有晋，诗复有唐矣！予非好胜，窃喜因正卿之言，使不知伯机之半，行皆左袒，且以释吉甫之慨焉。

陈垣称雅琥与鲜于伯机论诗为"艺林佳话"[2]。不管所论正确与否，都可以证明雅琥于诗确有自己的艺境追求。

三月十八日（癸巳）。继雅琥之后，江浙行省平章童童受到监察御史弹劾。

童童是蒙古贵戚，以善度曲、能书画知名。据《元史·文宗本纪》，在御史笔下，他的罪名是"荒泆宴安，才非辅佐"，诏免其官。

六月十一日（癸巳）。御史台的"清君侧"三部曲发展到高潮：弹劾柯九思，并请罢黜之。

《元史·文宗本纪》说：六月癸巳，御史台臣指劾："奎章阁鉴书博士柯九思，性非纯良，性极矫谲，挟其末技，趋附权门。请罢黜之。"

本年由监察御史发动的弹劾已经进行了三个波次：三月，是色目也里可温雅琥；此后是蒙古贵戚童童；六月则是南人柯九思。如果说对色目人雅琥

---

① 陈旅《安雅堂集》卷二，吴师道《吴正传集》卷八，都有送雅琥赴福建盐运司同知诗。

② 《元西域人华化考》卷四。

还没有赶尽杀绝，对蒙古贵戚童童还心存顾忌，御史对柯九思则是深恶痛绝，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柯九思（1290—1343），字敬仲，号丹丘生，又号五云阁吏。台州仙居（今属浙江）人。以父荫补华亭县尉，但未赴职。元文宗在潜邸，柯九思得侍左右，对其影响颇大。元文宗即位，授典瑞院都事。文宗建奎章阁，以其为鉴书博士，凡内府所藏书画，咸命鉴定。受弹劾南还后，流寓于东吴。他的书画都享有盛名，特别是画竹，并撰有《墨竹谱》所作传世颇多。此外，他是书画文物的鉴赏家，不仅眼力过人，而且修养颇高。诗文均有时名，顾瑛编辑《草堂雅集》，把他作为开卷第一人，录存其诗190首。他的诗主要是七言律绝，尤其以七言绝句著称。死后，家世陵替，文稿散失。顾嗣立《元诗选》三集《丹丘生稿》，编录其诗262首，清光绪年间缪荃孙等辑《丹丘生集》五卷，但编辑颇草率。

几年前——天历元年十月——元文宗刚即位，柯九思以一介布衣初授典瑞院都事。不到一年，就从七品升至五品的奎章阁鉴书博士，受到元文宗特殊宠信。雅琥、童童、柯九思这三个迫于权贵压力被斥逐的人，共同点都是精通诗文，能书善画，精于文物鉴赏，并因此受到皇帝赏识。所以，这一年的御史台实际上是在努力“匡正”元文宗。这是蒙古权贵针对改变祖宗旧制的元文宗的一次全面“清算”，通过雅琥、童童、柯九思等有代表性的人物作的“清君侧”式的政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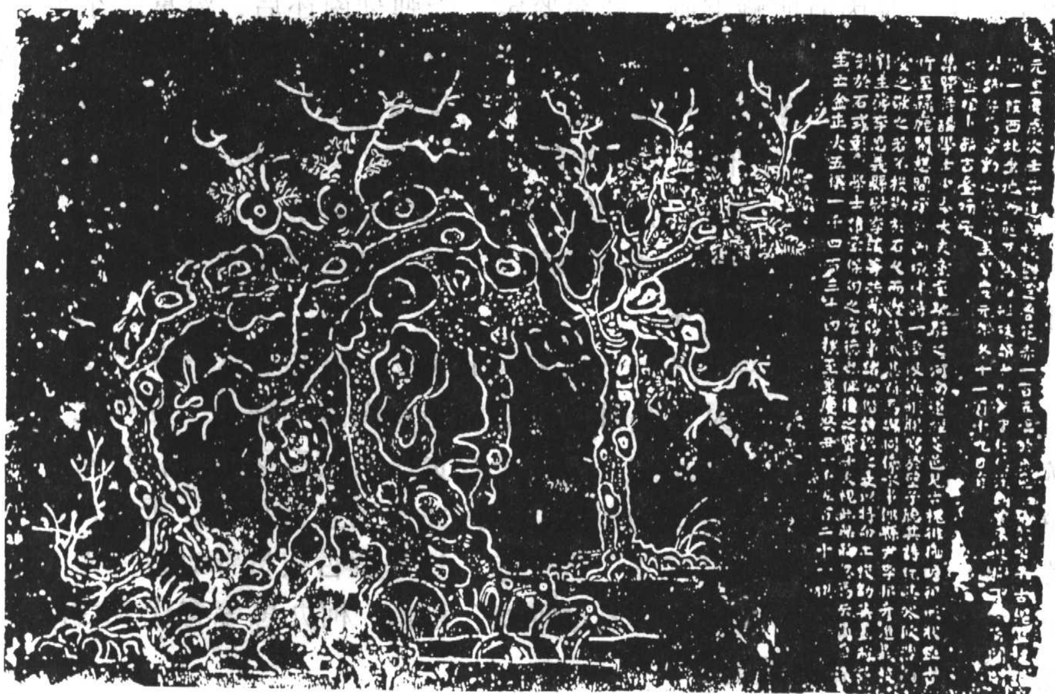
八月。杨梓之子杨枢去世。黄溍为其撰写了墓志铭。

杨枢（1283—1331），字伯机。杨梓次子。《松江嘉定等处海运千户杨君墓志铭》（《黄金华集》卷三十五）中说：“大德五年，君年甫十九，致用院俾以官本船浮海至西洋，遇亲王合赞所遣使臣那怀等如京师，遂载之以来。那怀等朝贡事毕，请仍以君护送西还。丞相哈剌哈孙答剌罕如其请，奏授君忠显校尉、海运副千户，佩金符，与俱行。以八年发京师，十一年乃至其登陆处，曰忽鲁模思云。是役也，君往来长风巨浪中，历五星霜。凡舟楫糗粮物器之须，一出于君，不以烦有司。既又用私钱市其土物白马、黑犬、琥珀、葡萄酒、蕃盐之属以进，平章政事察那等引见宸庆殿而退。方议旌擢，以酬其劳，而君以前在海上感瘴毒，疾作而归，至大二年也。阅七寒暑，疾乃间。”这种航海经历，极大地开阔了元人的眼界。

忽鲁模思，又译为“忽鲁谟斯”。《元史·西北地附录》作“忽里模子”。今属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以北的滨海城市，至17世纪仍然是重要的海港。

关于杨梓及其两个儿子，《乐郊私语》说他们都喜好乐舞，受到贯云石影响，对戏曲的海盐腔的创制，有特殊作用。

九月。改任太禧宗禋使的童童继续受弹劾，御史称其“淫侈不洁”，与几个月前的罪名“荒泆宴安”相比，升了一级。



《汉槐图》是童童仅存的绘画作品，皇庆二年刻石于河南荥阳。这是乾隆年间的拓本。图右侧，是一百五写并正书的《汉槐记》。“一百五”是蒙古色目人的名字。

童童[①]，号南谷，蒙古兀良合台氏。母亲胡氏是汉人，祖父阿术是蒙古开国功臣速不台之子，曾在伯颜麾下平定南宋，立有战功，父不怜吉歹以胄子入国子学，受业于许衡。延祐元年不怜吉歹封为河南王。家族累世出镇河南。童童在泰定年间历任河南行省平章，任满移江浙行省，至顺二年入为太禧宗禋院使。因曾任集贤院侍讲学士，又称为“童童学士”（或简作“童学士”）。“善度曲，每以不及见董解元为恨”，《太和正音谱》列名于俱是杰作一百五十人，第九人即“童童学士”。今存散曲有两个套曲：〔斗鹌鹑〕《开宴》、〔新水令〕《念远》（据《全元散曲》）。童童还擅长绘画，他曾为河南荥阳的古槐画《汉槐图》，于皇庆二年据以刻石。据《元史》本纪，童童分

① 童童，也作童仝。童童是蒙古人中常见的名字，如元统元年进士同同（字同初），就是同名异译。

别在泰定四年八月，以及至顺二年三月、九月，多次受到御史弹劾。

秋。黄溍扈从至开平，作《上京道中杂诗十二首》。

黄溍组诗《上京道中杂诗十二首》（《黄文献集》卷一），是“上京杂咏”的名作，虞集特意为《上京道中杂诗》题诗：“少陵入蜀路崎岖，故有凄凉五字诗。应奉为官随翠辇，固应同调不同辞。”实际是提出了委婉的批评匡正。黄溍在其《上京道中杂诗》之中体现出的正是苍茫、凄凉。这与以往的上京纪行诗有所不同。

萧国宝之子萧子英，将萧国宝诗结为《萧辉山存稿》，由东鲁孔涛作序以传。

萧国宝，字君玉，号辉山。山阴（浙江绍兴）人。以乡举，官于吴江（江苏苏州），遂家焉。有诗名，所作受江湖诗派影响。至顺二年《萧辉山存稿》结集时，萧国宝已经去世。今本《萧辉山存稿》存诗仅 24 首，顾嗣立据以选录 12 首，编入《元诗选》初集。

秦简夫在此前后，从大都返回杭州。

秦简夫，大都（北京市）人，后居杭州。在大都相当知名，于本年前后由大都回杭州。作杂剧 5 种，今存《孝义士赵礼让肥》《东堂老劝破家子弟》《晋陶母剪发待宾》。《太和正音谱》评其词“如峭壁孤松”。论者以为《东堂老劝破家子弟》有也里可温（基督教）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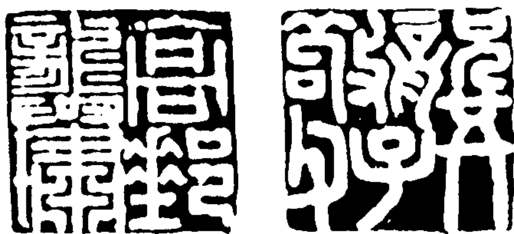
《经世大典》修成。

《经世大典》是元代官修政书，由赵世延、虞集等主持修撰。共八百八十卷，对社会文化涉及颇广泛。原书已不存，但部分内容还保存在《永乐大典》《元文类》等书中，前人曾据以辑出《大元马政记》《元代画塑记》等。

龚璛去世。享年六十六岁。

龚璛（1266—1331），字子敬。镇江（今属江苏）人，寓居平江（江苏苏州）。南宋亡，父绝食而死，使他悲痛异常。他感叹说：“国亡家破，吾兄弟不能力振门户，独不可为儒以自奋邪！”于是笃志于学，名宿戴表元、仇远、胡长孺等都很器重他，并成为忘年交。他弟弟龚理也有文名，并称“两龚”。曾为廉访使徐琰的幕僚，历任和靖、学道两书院山长，调宁国路儒学教授，迁上饶主簿，改宜春县丞，以江浙儒学副提举致仕。著有《江东小

稿》，未见传。今存诗集《存悔斋稿》一卷（附补遗一卷）。诗格伉爽，颇能自出清新，在元代诗坛较为有个人特色。



龚璛用过的印章。

李泂去世。享年五十九岁。

李泂（1273—1331），字溉之。滕州（山东滕县）人。姚燧见其文，力荐于朝，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不久因亲老，就养江南，后又授中书省掾。拜住为丞相，擢监修国史长史。泰定元年为秘书监著作郎、太常仪礼院经历，除翰林待制，以亲丧辞而归葬。天历初，复起为翰林待制，超迁翰林直学士，特授奎章阁承制学士。李泂为报元文宗知遇之恩，著《辅治篇》进呈。诏修《经世大典》，李泂正在病中，即强起而与修，说："此大制作也，吾其可以不预！"书成告归。复除翰林直学士，竟以病不能起。李泂少负文名，文章纵横奇变，若纷错而有条理。他每以李白自拟，时人往往也将他比做李白。长于书法，真、草、隶、篆诸体皆为世人珍爱。有文集四十卷，已佚。

至顺三年壬申（1332）

二月。在京师参修《经世大典》的欧阳玄，因事毕闲暇，写出十二首〔渔家傲〕，这就是著名的"大都十二月乐词"。

这12首〔渔家傲〕，作者注明是"南词"。词序（《圭斋集》卷四）云："余读欧阳公李太尉席上作十二月〔渔家傲〕鼓子词，王荆公亟称赏之，心服其盛丽，生平思仿佛一言不可得。近年窃官于朝，久客辇下，每欲仿此，作十二阕，以道京师两城人物之盛，四时节令之华，他日归农，或可资闲暇也。至顺壬申二月，玄修大典即毕，经营南归，属春雪连日，无事出门，晚寒附火，私念及此，夜漏数刻，腹稿具成，枕上不寐，稍谐叶之。明日，笔之于简，虽乏工致，然数岁之中，耳目之所闻见，性情之所感发者，无不隐括概见于斯。至于国家之典故，乘舆之兴居，与夫盛代之服食器用，神京之风俗方言，以及四方宾客宦游之况味，山林之士未尝至京师者，欲有所考焉，此意可见其大略矣。"这篇序与12首小令，写尽了"过客"对京师繁华盛况的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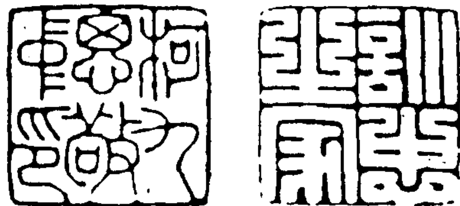
八月。元文宗薨于上京。柯九思得信，呜咽流涕，治装南归。

在五月，元文宗即将避暑上京时，已经就柯九思的去留做过安排。有的论者曾将柯九思比做“奎章阁的象征人物”，并认为文宗设立奎章阁与柯九思有直接关系[①]。元文宗一死，一再受到当朝贵戚弹劾的柯九思在大都已经无法立足。但这个结局，实非所料。

柯九思南还后，虞集赋〔风入松〕词以寄：

> 画堂红袖倚清酣，华发不胜簪。几回晚值金銮殿，东风软，花里停骖。书诏许传宫烛，香罗初剪朝衫。　御沟冰泮水挼蓝，飞燕又呢喃。重重帘幕寒犹在，凭谁寄、锦字泥缄。报道先生归也，杏花春雨江南。

这是元词名篇。“词翰兼美，一时争相传刻。而此曲遂遍海内矣。”[②] 这首词以结句“杏花春雨江南”知名。虞集实际是在重复自己的绝句《听雨》诗意，《听雨》结句是“京国多年情尽改，忽听春雨忆江南”。将一个迟暮之年的文人的寂寞感，化解在江南春雨中。词与诗，都因此而打动人心。



柯九思用过的印章。

柯九思最有影响的作品是《宫词》系列。由于他受到元文宗特殊宠信，对宫廷生活相当熟悉，所作非道听途说、渲染宫闱秘事之作可比。顾瑛说他的宫词“议者以为不在王建下”[③]。柯九思的《宫词》是他对际遇文宗的特殊怀念。元人宫词，是元诗一道特殊风景线。作者多，影响面广，内容也与前朝大不相同。柯九思的《宫词》，著名的有《宫词十五首》《宫词十首》等几组。顾嗣立《元诗选》三集《丹丘生稿》，正是以这两组宫词开篇。前者在诗下还附有小注，写明本事。第二首诗云：

> 黑河万里连沙漠，世祖深思创业艰。数尺栏杆护春草，丹墀留与子孙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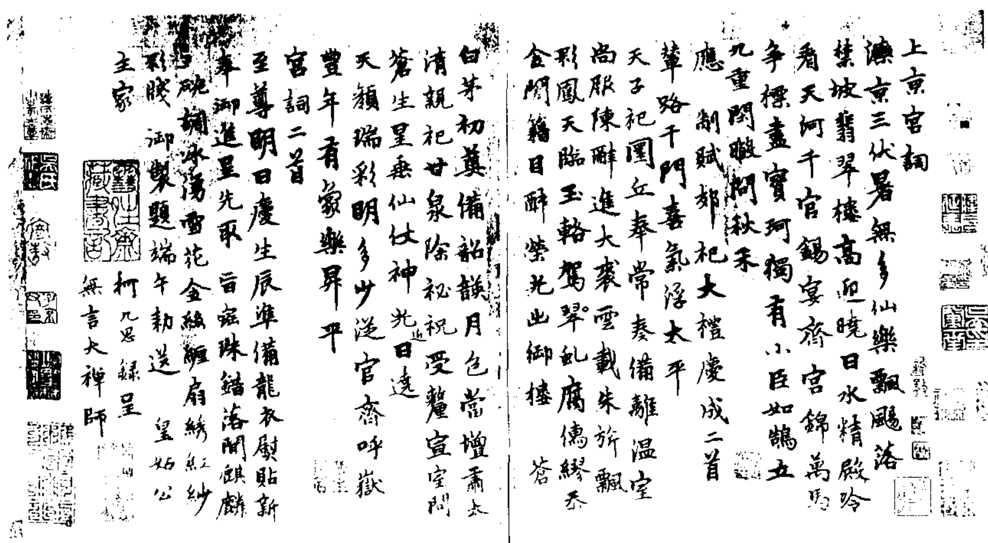
诗下小注说：“世祖建大内，命移沙漠莎草于丹墀，示子孙无忘草地也。”这

---

① 参见姜一涵《元代奎章阁与奎章人物》（台湾省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6 年）第 26 ~ 27 页。

② 《南村辍耕录》卷十四“风入松”节。

③ 陶湘涉园刻本《草堂雅集》卷一，柯九思小传。



柯九思以《宫词》著称。这是他手书的几首《宫词》。

首诗与注流传都相当广，甚至被认为是“大司农达不花”所作[①]，并由此引申出一段故事，载入《析津志》。在柯九思来说，《宫词》就是际遇君王的实录。在大都期间，除了《宫词》，与之有关联的还有《城南杂诗》10首（全名《酬陆友仁城南杂诗》），这是诗人为金中都（大都南城是旧金中都遗址）写的另一组宫词。陆友，字友仁。是当时著名的文物鉴赏家，柯九思狼狈南归，就是与陆友结伴。这10首七言绝句，都是以“尺五城南”起兴，最著名的一首是：

> 尺五城南可垦田，势随高下接平川。十年沃野连千里，能减东吴漕运船。

元人徐显在《稗史集传》中说：“予尝读其《城南诗》，有尺五城南垦田，能减漕运海船之语。当时出，盖尝言之，而不以为信。后二十余年，天子用大臣议，募江南农师，开燕蓟田数百万顷。比中原多故，海漕不继，而公之言足验。”除柯九思的《南城杂诗》，关于金中都，另一组咏古诗则是至正初年葛逻禄诗人廼贤的《南城咏古》。

文物鉴赏家陆友[②]，与柯九思一同被斥逐，离京南还。

---

① 《元诗纪事》卷二十引《草木子》（卷四上）。

② 元代吴郡另有一陆友仁，字辅之，著有《吴中旧事》一卷、《词旨》一卷，与陆友（字友仁），不是同一人。

陆友，字友仁，号砚北生。吴郡（江苏苏州）人。父亲经商，陆友曾因刻苦读书受到邻居讥笑。学问广博，精于古器物鉴定，凡上古以来的钟鼎铭刻、书法绘画，一经他过目，真伪立辨，只要有他的品题，价值倍增。至顺年间，他北游京师，并到过上都。柯九思、虞集都先后向朝廷举荐过他，但直到柯九思离职，陆友也未被留用。他和柯九思一同回归乡里，题所居斗室为“志雅斋”，一心著述。死时年仅四十八岁。诗文集《杞菊轩稿》未见传世，《元诗选》三集据《草堂雅集》收入其诗15首，也题作《杞菊轩稿》。顾瑛评陆友诗，说他“作诗必拟古人，不苟下笔。故其诗皆有法度。”（《草堂雅集》卷十二）另有《砚史》《印史》《墨史》等著述，仅存《墨史》二卷以及《研北杂志》（《砚北杂志》）二卷。他有一首《题宋江三十六人画赞》诗，是有关《水浒》成书的资料。

《题宋江三十六人画赞》（《草堂雅集》卷十二）诗云：

> 忆昔熙宁全盛日，百年曾未识干戈。江南丞相变法度，不恤人言新进多。蔡家京卞出门下，首乱中原倾大厦。睦州盗起賨连城，谁挽长江洗兵马。京东宋江三十六，白日横行大河北。官军追捕不敢前，悬赏招之使擒贼。后来报国权战功，捷书夜奏甘泉宫。楚龚好古在画赞，不敢区区逢圣公。我尝舟过梁山泊，春水方生何眇漠。或云此是碣石村，至今闻之犹虩魄。①

“楚龚”，指作《宋江三十六赞》的龚开。这首诗是《水浒》故事演变过程的一个里程标志：至少在元后期，《水浒传》仍然离正式成书比较遥远。在文宗、顺帝之际，世人了解到的《水浒》故事，仍然没有摆脱《大宋宣和遗事》的影响。一个参证是：《朴通事谚解》中提到“二郎神”时，在《西游记》故事之后，还提到了《宣和遗事》。另一个参证是，元代杂剧的“黑旋风戏”与“水浒戏”，离开《水浒传》情节太远。这不像一部伟大的作品诞生前后应有的情况。

冬。薛昂夫（马昂夫）由池州路总管，改任衢州路总管，在衢州期间与文人优游山水，唱和酬答，成一时之盛。

在衢州路任上，薛昂夫曾出游烂柯山，并作《咏烂柯山石桥》诗与散曲，和者颇多，影响较大。和诗者有萨都剌、释大訢等，和曲之中，仅路吏

① 《元诗选》三集引此诗，“睦州盗起賨连城”作“睦州盗起□连城”。

曹德（字明善）之作流传至今。薛昂夫自己的诗，也没有完整流传下来，只在烂柯山的岩石上留有残句“千寻老石桥难度，一曲残棋路不平”。到后至元元年卸任，在衢州期间，薛昂夫与虞集、李孝光等均有唱和之作。虞集《寄三衢守马九皋》、李孝光的《次三衢守马昂书垒韵》都是元诗名篇。

宋无、石岩为钞本《续夷坚志》写跋语。

《续夷坚志》四卷，元好问著。宋无跋语说：元好问此书“恶善惩劝，纤细必录，可以知风俗而见人心。岂南北之有间哉?”同时他又指出，在金元之际“北方书籍，率金所刻，罕至江南”。在一个时期内，南北之间的文化存在隔膜。石岩跋语则说:“《续夷坚志》乃遗山先生当中原陆沉之时，皆耳闻目见之事。”正是经过本次钞录，元好问《续夷坚志》才得以流传至今。

陈绎曾《文筌》八卷成书。

《文筌》分为古文小谱、四六附说、楚赋小谱、汉赋小谱、唐赋附说五类，《四库全书总目》说本书“体例繁碎，大抵妄生分别，强立名目，殊无精理”。据陈绎曾自序，书后附录的《诗小谱》二卷，是亡友石桓彦所撰。除《文筌》八卷，陈绎曾还著《文说》一卷，应是此前为科举复兴而作。

韩信同去世。享年八十一岁。

韩信同（1252—1332），字伯循，号中村。宁德（今属福建）人。早年从陈普游，精研性理之学。延祐四年应乡试未中，居家讲授，四方来学者颇众，学者称“古遗先生”。所作七言古诗《岳王墓》当时颇有影响。有《韩氏遗书》二卷、《三礼图说》二卷。

六月。何中去世。享年六十八岁。

何中（1265—1332），字太虚，一字养正。抚州乐安（今属江西）人。少颖拔，以古学自任。家中藏书多达万卷，亲手一一校订，学识广博。曾受到程钜夫、元明善、姚燧、王构及同郡揭傒斯等推重。江西行省平章全岳柱聘任龙兴郡学教师，讲学东湖、宗濂两书院，因病去世。何中是吴澄的姻兄弟。所著别集《知非堂稿》六卷、《通鉴纲目测海》三卷、《通书问》一卷，今均存。





【元顺帝】



建元：元统（二年）、后至元（六年）、至正（二十八年）



元统元年癸酉（1333）

① 闰三月二十九日。元文宗时期的权臣——右丞燕帖木儿[②]去世，为此，宋本写了一组（十四首）绝句。

这组诗是元人咏时事而且是重大敏感事件的作品。宋本《至治集》过早散失，才不为后人所知。燕帖木儿死，是元文宗时期的终结。14 首诗题为《绝句》，这样命题，等于《无题》。诗序说："至顺四年[③]，闰三月二十九日赋。是日太平王燕帖木儿卒。""燕帖木儿卒"五个字是诗眼[④]。

楼头红粉哭千场，楼下仓头酹百觞。却怪满城春相杵，歌声更比夜来长。

颜回盗跖自彭殇，举世无人问彼苍。为国横身终遇贼，千年同是靖恭坊。

十年甲第合污潴，又作元勋上相居。玉碗金杯同一死，吞舟刚漏网

① "顺帝"，是明朝为妥懽帖睦尔安排的谥号，"惠宗"则是北元的谥号。在正史之中，常使用顺帝。

② 在《元史》等文献中，燕帖木儿又作"燕铁木儿"。据《元史》等书记载，元明宗就是燕帖木儿（或是在元文宗首肯下）毒死的。

③ 至顺四年，即元统元年。本年十一月改元元统。在此之前，称为至顺四年。

④ 见《永乐大典》卷九〇〇，第 14～15 页。

中鱼。

弯弓射月是心期，捶碎天东若木枝。空尽朝堂亡国老，五龙行可濯咸池。

不畏中天九庙神，倒悬谁解万方民。陈平未是安刘者，冯道[1]真成妄语人。

熏风避暑借明光，丝络传餐出上方。列第房帷半妃主，门阑部曲亦丞郎。

刑部鞭笞困凤鸾，宣徽鸡肋厌尊拳。庙堂木偶韩忠献，正笏垂绅只俨然。

南城北城千官谒，十日九日大燕开。六诏干戈非我事，四方水旱是天灾。

积金至斗不然脐，一旦星辰动紫微。日午酒楼瓶尽倒，家家扶得醉人归。

道途相目两眉攒，带剑垂绅汉百官。从此长宵背贴席，夜来鬼录载曹瞒。

明年多稼满王畿，壮士耕耘妇子嬉。更有余波沾动植，驾鹅春淀饱凫茨。

半岁无君四海忙，尚谈功业叙旗常。玺书未下桓温死，辜负中朝一字王。

五年相业自多多，擢发其如未了何。欲使文章少遗憾，南山增竹海增波。

云台勋业绝郡伦，就第封侯老此身。政事枢机付台阁，向来光武爱功臣。

元中期与后期过渡过程，蒙古钦察氏贵戚燕帖木儿有重要影响。从元武宗开始，他是五朝元老，泰定帝薨，迎立元文宗，拜中书右丞，封太平王。元文宗其实一直受制于他。至顺三年八月元文宗死，立宁宗仅三个月又死，迎顺帝于广西静江。妥懽帖睦尔（顺帝）虽然来到京师，是否继承帝位仍迁延不定。“国事皆决于燕铁木儿，奏文宗后而行之。俄而燕铁木儿死，后乃与大臣定议立帝。”[2] 可见“燕帖木儿卒”有多大分量。燕帖木儿为后来的伯颜树立

---

[1] 冯道，原文作凭道。

[2] 引自《元史》卷三十八第3册第816页。

了“榜样”[1]。这14首绝句，就是时人对这个权倾朝野的人物的褒贬与感受。

“六诏干戈非我事，四方水旱是天灾”；“半岁无君四海忙”，“辜负中朝一字王”；“欲使文章少遗憾，南山增竹海增波”……诗中既有燕帖木儿其人，又有诗人自己。

四月五日。妥懽帖睦尔（元顺帝）在延春阁披阅盛熙明所著《法书考》。

是时，燕帖木儿死了才6天，地位未定的妥懽帖睦尔（元顺帝）已经充满放松感。本年他才十四岁。奎章阁学士沙剌班（西夏人刘伯温）以龟兹人盛熙明以所著《法书考》八卷进呈，元顺帝览之彻卷，特命收藏于禁中。次年十月，揭傒斯为《法书考》作序。

盛熙明，字熙明，号玄一山人。祖籍曲先，即西域龟兹（新疆库车）；家族入中原后占籍豫章（江西南昌）。为人清修谨饬，博学多才，特别是有语言天赋，精通“六国书”。元文宗时辟奎章阁书史。元末战乱期间，寄居于四明（浙江宁波），读书海上。与刘仁本交往密切，以善诵佛书，深达梵语著称。去世于至正二十三年以后。诗文集未见传本，著《图画考》七卷、《补陀洛迦山传》一卷与《法书考》八卷，今均存。书画均长，并精于医药之学。他是元代仅见的祖籍龟兹的文人学者。

九月三日。初御皇极的元顺帝廷试录取进士，两榜状元为同同、李齐。

元代廷试，一般安排在三月七日。因元顺帝在本年六月即位，才改在九月。元统元年的进士，是元代时停时续的科举影响颇大的一届，除首科（延祐二年），就数本届，许多后期文学家都是本届进士出身。

由于《元统元年进士录》——仅存的元人“进士录”——保存至今，所以这一届进士的资料最完整。本届共录取右榜（蒙古色目人）、左榜（汉人南人）进士各50名。两榜进士中，诗文等作品流传至今的有右榜的同同、余阙、慕卨、亦速歹、买住、别罗沙、也先溥化、察伋、塔不歹、月鲁不花；左榜的李祁、李毅、韩玙、宇文公谅、张桢、鞠志元、成尊、刘基、许广大等。右榜的余阙、月鲁不花和左榜的刘基（即刘伯温）、宇文公谅都是政坛、文坛关注度颇高的人物。《元统元年进士录》则成了文学家的家世资料的

---

① 李材《解酲语》中，对燕帖木儿的奢侈做了描述：燕帖木儿奢侈无度，尝屠百羊以会僚吏，又于第中起水晶亭，四壁皆水晶镂空，贮水养五色鱼，其中剪彩为白苹、红蓼等花置水上，壁内置琥珀栏杆镶以八宝奇石，红白掩映，光彩玲珑，前代无有也。洞房设楼床广褥，择美姬温软少骨者，枕籍而睡。谓之“香肌席”。脂红粉白之娇，罗列左右，随其所取，以为花嬉玉乐也。

"档案库"。左榜（汉人南人榜）进士李穀，是高丽人。随华化普及，双语写作成为风气，右榜进士中诗文家远多于以往历届。

李穀（1298—1351），字中父，号稼亭。至顺三年，中征东行省乡试第一名。本年中进士，授翰林国史院检阅官。在"汉人"中，不但包括契丹、女真，还包括高丽。此后他多次往返于大都、高丽之间，至正十年任征东行省左右司郎中。有《稼亭集》二十卷①，其中保存有大量元与高丽的文史资料。

宇文公谅（1292—?），字子贞。湖州归安（浙江吴兴）人。本年中进士，授徽州路婺源州同知。丁内艰，改任余姚州同知。夏天无雨，宇文公谅出祷辄应，被称为"别驾雨"。曾摄会稽县事，迁高邮府推官，不久改任国子助教，调翰林应奉文字兼国史院编修官。以疾告归。后召为国子监丞，授江浙行省儒学提举，改山南廉访司佥事，以老病辞官。宇文公谅为人拘谨，泥于礼法。死后，门人私谥纯节先生。诗文典雅，著作颇丰，有《折桂集》《观光集》《辟水集》《以斋诗稿》《玉堂漫稿》《越中行稿》等，均不传。

《元诗选》三集，选录其诗 18 首，题为《纯洁先生集》。

察伋（1305—?），字士安，号海东樵者。色目塔塔儿氏，居莱州掖县（今属山东）。元统元年进士，授翰林编修。历任南台御史、经历，至正二十年为江西廉访佥事，余阙有《送普原理之南台御史兼简察士安》诗。

刘基（1311—1375），字伯温，晚号犁眉公。青田（今属浙江）人。元统元年汉人南人榜三甲二十名进士，《元统元年进士录》，有刘基的户籍档案："贯处州路青田县。儒户。《春秋》。字伯温，行七，年廿六。六月十五日。曾祖濠，宋翰林掌书。祖槐，宋太学生。父爚，儒学教谕。母富氏。具庆下。娶富氏。乡试江浙第十四名。会试第廿六名。授瑞州路高安县丞。"当时一定是按照表格填写的，所以一些文字之前，省略了子目。

色目人海鲁丁(海东之)下第，虞集以《三凤行赠海东之还江南》相送。

海鲁丁（? —1358），字东之。西域回回。居丽水（今属浙江）。兄弟三人陆续以科第显，时称"三凤"。黄清老《送海东之》诗云"海东之，兄弟三人如凤凰"（《元诗选》二集《樵水集》）。海鲁丁本人第三次举进士不第时，虞集赋《三凤行赠海东之下第南归》相勉②。此后果然由进士出身，除

① 笔者所据《稼亭集》，是韩国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影印本。

② 诗见《道园遗稿》卷二。《三凤行》未纪年。但诗的开篇即云："海东之，兄弟三人如凤凰。胸臆羽翮皆文章，九年三人天门翔。"在至正四年时，海鲁丁已经是吴县主簿。在元统元年前，泰定四年、至顺元年均开科。元统元年以后，到至正二年才恢复科举。故暂系于本年。

兰溪州同知。

虞集谢病南归，离开元廷。

回到江南，虞集定居于豫章。除诗文，他对词曲的兴致不减当年，在《叶宋英自度曲谱序》（《道园学古录》卷三十二）中，他说："临川叶宋英，予少年时识之。观其所自度曲，皆有传授。音节谐婉，而其词华，则有周邦彦、姜夔之风流余韵，心甚爱之，盖未及与之讲也。及忝在朝列，与闻制作之事，思得宋英其人，本雅以训俗，而去世久矣，不可复得。老归临川之上，因其子得见遗书十数篇，皆有可观者焉。俯仰畴昔，为之增慨，序其故而归之。"可见虞集早年对词曲颇为关注。

任赞善之职的高丽人权汉功，前往大都途中在德清驿站题诗两首。

这两首诗不仅是高丽人题中原驿站壁之作，而且有助于了解当时特殊的驿站文化环境。特别是，它们依靠偶然流传至今的《十二家赠朱泽民诗文卷》才得以保存。在担任征东行省儒学提举时，朱德润（字泽民）就与权汉功有交往。《存复斋续集》中有《别后怀权赞善》诗。这次权汉功来中原，特意将自己写在德清驿站墙壁的题诗，抄赠朱德润。这两首诗的题目分别是：《德清舣舟亭壁上有燕山史明诗次韵》《德清驿壁画弄玉与萧史乘鸾奔月有纥石烈伯玉诗次韵》[①]。

吴澄去世。享年八十五岁。

吴澄（1249—1333），字幼清，晚年又字伯清。抚州崇仁（今属江西）人。南宋咸淳六年（1270）领乡荐，举进士，不中，在家乡建草屋，著书讲学，人称"草庐先生"。至元二十三年，程钜夫奉诏到江南求贤，举吴澄，次年就以母亲年老辞归乡里。元贞初，游学龙兴，与元明善结识，元明善以弟子自居。大德末年，任江西儒学副提举，居官三个月因病辞职。至大元年出任国子监丞。元英宗即位，任命为翰林学士，泰定元年任经筵讲官，修《英宗实录》。书成，再次称病还乡。卒，追封临川郡公，谥文正。吴澄著述颇丰，退居乡里时，四方学子前往求学者经常多达千人，与许衡并称为南北两位大儒。有《吴文正集》四十九卷（别本一百卷），是其孙吴当所编。另著《易纂言》十卷、《书纂言》四卷、《礼记纂言》三十六卷、《春秋纂言》

---

① 见张珩《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书法四"。这是元代书法手迹《十二家赠朱泽民诗文卷》的一部分。原无写作时间，但元统二年在大都为李穀返回高丽送行时，权汉功在场，故暂系于此。

十二卷等著述，今均存。

胡炳文去世。享年八十四岁。

胡炳文（1250—1333），字仲虎，号云峰。婺源（今属江西）人。其父胡斗元习朱子之学，胡炳文秉承家学，著《四书通》等，往往能阐发朱熹未尽意蕴。至元二十五年任江宁教谕，大德五年历任信州路儒学录、授道一书院山长，调兰溪州学正，未赴职。至大年间，族子胡淀于家乡婺源建明经书院，接待四方来访学者，儒风之盛，甲于东南，知州聘胡炳文为明经书院山长，门下弟子成材者颇多。卒，集贤院札谥文通先生。胡炳文面山而居，尝作诗："举头山苍然，一峰立云表"，因自号"云峰"。有文集二十卷，经元明易代，诗文仅存数十篇，后人重辑为《云峰集》十卷，今存，另著《周易本义通释》十二卷、《四书通》二十六卷、《纯正蒙求》三卷，今亦存。其诗如《北寺昏钟》《西湖水榭》诸篇不失雅韵，在理学家中别具一格，其文也较有文采。

曹伯启去世。享年七十九岁。

曹伯启（1255—1333），字士开。济宁砀山（山东单县）人。早年从东平李谦游，至元中，为兰溪主簿，迁常州路推官，再迁河南行省都事、台州路治中。御史潘昂霄等举荐，擢西台御史，延祐元年升内台都事，迁刑部郎中。出为真定路总管，治尚宽简，百姓安之。延祐五年迁司农丞，置六仓于浙东、浙西，设运盐官，赏罚严明，输运有期。不久拜南台治书侍御史，曾倡言："扬清激浊，属在台宪。……今讼冤一切不问，岂风纪定制乎？"不久被解职。元英宗即位，召拜山北廉访使。泰定初，告老北归，优游乡社，所居被称为"曹公里"。天历中，起为淮东廉访使、陕西诸道行御史台中丞，以老辞，卒，追封鲁郡公，谥文贞。有《曹文贞诗集》（别本作《汉泉漫稿》）十卷。

元统二年甲戌（1334）

正月。智熙善以礼部郎中，作为吏部尚书帖住的副使出使安南，赐《授时历》。

智熙善，字子元。镇阳人。大德年间，宿卫春宫，后为南台行人，转掾

史，又任中书省掾。此行在安南滞留一年，从安南还朝，编辑其往返与滞留间所作而成《越南行稿》一卷，许有壬作《智子元越南行稿序》（《至正集》卷三十），但《越南行稿》未流传至今。黎崱《安南志略》卷十七有其诗数首以及与其唱和之作。

二月。从京师还归江南才几个月的陆友，在寂寞索居中写出随笔《研北杂志》二卷。

作为文物鉴赏家，陆友的《研北杂志》内容庞杂，但《研北杂志序》出奇简练，全文是：

> 余生好游，足迹所至，喜从长老问前言往行，必谨识之。元统元年冬，还自京师，索居吴下。终日无与晤语。因追记所欲言者，命小子录藏焉。取段成式之语，名曰《研北杂志》，庶几贤于博弈尔。明年二月丁卯，平原陆友仁序。

这本随笔成了他排遣失意的工具。

六月。钟嗣成从吴江赴杭州，与抱病的周文质相见。

周文质（？—1334），字仲彬。祖籍建德（今属浙江），迁居杭州。家世业儒，屈居路吏之职。生性豪爽尚义，交友真诚，与钟嗣成交往20年，未尝有跬步离。这次相见正在酷暑中，周文质病痈毒，医生踵门，也不大在意。五个月后，本年十一月五日，周文质病逝，钟嗣成为其中年去世叹息不已。平生善丹青，能歌舞，明曲调，学问赅博，文笔新奇，惟生不逢时。《录鬼簿》列名于“已亡名公”节，并有传略。《太和正音谱》评其词“如平原孤隼”。今存小令43首，套曲5套(据《全元散曲》)。撰《持汉节苏武还朝》《春风杜韦娘》《孙武子教女兵》《敬新磨戏谏唐庄宗》杂剧4种，仅第一种存有残曲。

八月。萨都剌与友人出游瓜洲。

此行，萨都剌写了5首诗（即《寄朱舜咨王伯循了即休》[①]）纪游，并分别寄给三个同游的友人。

《寄朱舜咨王伯循了即休》诗序说：“元统二年秋八月，仆与淮东宪副朱

---

① 《永乐大典》卷一四三八二引《萨天锡诗》。《雁门集》卷八亦有此诗，但序及诗文字颇有异同。

舜咨、广东宪佥王伯循，会于瓜洲江风山月亭上。过金山，登妙高台，饮酒赋诗。京口鹤林寺僧即休，风起渡江，赠别〔少年游〕词。即休既去，舜咨、伯循留广陵，仆独涉淮过河北。人生聚散，信如云萍。倒指岁月，旧游如梦。向时舜咨有'雨过江色净'五字，天趣妙发，未克竟篇。兹以一字为一韵，赋诗寄上舜咨、伯循二先辈，鹤林主者了上人。"感慨人生聚散不易，潜藏着对岁月如流的困惑。

苏天爵编辑的元代文学总集《国朝文类》(《元文类》)[1] 序刊。

作为第一部有广泛影响的、由元人编选的本朝诗文作品总集，《元文类》七十卷不但体现出当时的编辑眼光，也是价值取向的标本。

《元文类》卷首有元统二年王理序，陈旅序。卷一为赋、骚；卷二至八为诗；卷九至七十为文章。卷末有王守诚跋。王理序，曾仿《史记·太史公自序》及《汉书·叙传》体例，将上述各卷内容类编为十五类。对于全书的编纂宗旨，王理在序中作了阐述："国初学士大夫，祖述金人、江左余风，车书大同，风气为一。至元、大德之间，庠序兴，礼乐成，迄于延祐以来极盛矣。大凡《国朝文类》，合金人、江左，以考国初之作；述至元、大德，以观其成；定延祐以来，以彰其盛。斯著矣！网罗放失，采拾名家，最以载事为首，文章次之，华习又次之，表事称辞者，则读而知之者存焉。伯修于是亦勤矣哉，固忠厚之道也。文章之体备矣。"《元文类》选录的各类作品，一般都写于元初至元到延祐年间，那是元全盛时期，也是元代文坛最繁荣的时期，不仅人才辈出，而且佳作迭见，这就为苏天爵选编本集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苏天爵本人不但具有相当精湛的文史修养，而且曾三为史官，见闻较广，所以本集无论从编选体例与编选标准而言，都相当精审并且具有权威性，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文坛对文人与作品的次第标准。论者曾把它与姚铉编《唐文粹》、吕祖谦编《宋文鉴》并称，作为唐、宋、元三代总集的代表。《四库全书总目》甚至指出："然铉选唐文，因宋白《文苑英华》，祖谦选北宋文，因江钿《文海》，稍稍以诸集附益之耳。天爵是编，无所凭籍，而蔚然媲美，其用力可云勤挚。"终元一代，再未有人能以个人之力续编本集，可见难度之大，更可见苏天爵此编具有稳定性。

元顺帝诏天下兴学校。李穀奉制书东还高丽（征东行省）。

在京的馆阁之士与同年们，纷纷以所作为李穀送行。这些诗文，都编入

[1] 本集原名为《国朝文类》，但一般著录为《元文类》。

李榖《稼亭集》的“杂集”，作者包括：宋本、欧阳玄、谢端、焦鼎、岳至、王士点、王沂、潘迪、揭傒斯、宋褧、程益、程谦、郭嘉以及在大都的高丽士人李齐贤、权汉功、安震、安轴、闽子夷、郑天濡、李达尊、白文宝、郑誧、安辅等人。

陈栎去世。享年八十三岁。

陈栎（1252—1334），字寿翁。休宁（今属安徽）人。七岁通举子业，南宋亡，科举废除，慨然发愤精习朱熹之学。吴澄对他十分尊重，凡江东士人想就学于吴澄的，吴澄都介绍到陈栎门下，学者称为“定宇先生”。著有《定宇集》十六卷（十五卷文，一卷诗词）。一生著述颇多，今传者如《尚书集传纂疏》六卷、《历代通略》四卷，均有影响。还编有《新安大族志》二卷、《新安名族志》二卷，陈栎是宋元休宁一郡文化传承的关键人物之一。

程端学去世。享年五十七岁。

程端学（1278—1334），字时叔，号积斋。鄞县（浙江宁波）人。程端礼之弟。通《春秋》，泰定元年进士，授仙居县丞，改国子助教，执教刚严方正，学者敬畏。迁翰林编修，出为瑞州路经历，授太常博士，未受命而卒。有《积斋集》，已不存。清乾隆时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积斋集》五卷（诗赋一卷，文四卷）。据明人曹安《谰言长语》，至治三年欧阳玄为江浙贡举考官，十分称赏程端学所作《四灵赋》，以为其赋如此，经义必高，但《四灵赋》集中未载。程端学与其兄程端礼都是博学硕儒，诗文非其所长，《四库全书总目》评《积斋集》说，程端学“人品端谨，学术亦醇，故其文结构缜密，颇有闳深肃括之风”。另著《春秋本义》三十卷、《春秋或问》十卷、《春秋三传辨疑》二十卷，今均存。

宋本去世。享年五十四岁。

宋本（1281—1334），字诚夫。大都（北京市）人。父宋祯在江陵做官，早年就学于理学家王奎文，善为古文。四十岁才回到大都，至治元年廷试录取为左榜状元，授翰林修撰。泰定元年除监察御史，调国子监丞，直言政事之失，泰定二年转中书左司都事。天历元年升吏部侍郎，次年改礼部侍郎。至顺元年进奎章阁学士，次年擢礼部尚书。元统二年转集贤学士兼国子祭酒。卒，追封范阳郡侯，谥正献。宋本为官清正，性格高亢不屈，历仕通显，在京师仍租房而居。为文辞必己出，峻洁刻厉，每以为近世文气骫骳不足尚，务为高古以胜之。初以诗歌擅名江南，延祐初恢复贡举，才研习经义策问，

为应试，其弟宋褧与其同时还京，先后登第入馆阁，时人称之为“大小宋”。有《至治集》四十卷，今佚。

释德净去世于本年之后。

释德净（1261—?），字如镜。钱塘（浙江杭州）人。泰定、天历间，与仇远、冯子振、顾逢等交游唱和于苏杭，并受到王都中等推重。有诗集《山林清气集》一卷、《山林清气续集》一卷，但流传不广，元诗总集未见其人其诗，《四库全书》列入存目类。《山林清气集》正续两卷存诗200首，全是五七言近体，五律与七绝风格近于南宋江湖派，在元代僧诗之中与释道惠《庐山外集》颇接近，而《山林清气集》与《庐山外集》长期隐而不显，几乎不为论者所知。

七月。在西台御史任上的张翔巡部路经洛阳，写《洛阳怀古四首》[①]，并刊诸石。

张翔是河西人，延祐首科进士。这四首怀古诗云：

金谷繁华空绿苔，上阳罗绮暗尘埃。风连砥柱河声壮，云驾扶桑海气来。秦树夕阳归鸟尽，汉陵秋草老狐哀。独怜一片邙山月，曾照当时御辇回。

深谷高陵劫火空，离离禾黍又西风。断霞落日低秦树，衰草含烟锁汉宫。缑岭云深鸣夜鹤，禹河天远下秋鸿。伤心欲问兴亡事，洛水悠悠昼夜东。

虎走中原百战余，尘生沧海竟遗珠。天王北狩虚周鼎，伊阙西来莫禹图。上苑平芜秋射雉，女墙老树夜栖乌。绿珠楼上西风起，惭愧王敦击唾壶。

自古中原壮九州，昔人城此会诸侯。汉兴党锢三纲坠，晋尚清谈九鼎休。洛浦寒波无昼夜，玉川破屋几春秋。惟余缑氏山头月，伴我乘槎泛斗牛。

① 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49册。

元统三年岁次乙亥孟秋朔，备员御史张翔雄飞留题。

《洛阳怀古四首》是张翔代表作。明人杨慎《升庵诗话》卷六评论历代岳阳楼的题诗时说："余昔过岳阳楼，见一诗云：'楼上元龙气不除，湖中范蠡意何如。西风万里一黄鹄，秋水半江双鲤鱼。鼓瑟至今悲二女，沉沙何处吊三闾。朗吟仙子无人识，骑鹤吹箫上碧虚。'乃视其姓名，则元人张翔字雄飞，不知何地人也。雄飞在元不著诗名，然此诗实可传。同时虞伯生、范德机皆有岳阳楼诗，远不及也。故特表出之。"作为一个色目人张翔《张雄飞诗集》，虽有同年许有壬作序，但仍然为岁月流逝而淹没。他作品中的佳篇，却依靠刻石、题壁而流传下来。

曹鉴出任礼部尚书，但到职不久就去世了。

曹鉴（1271—1335），字克明，号以斋。宛平（北京）人，寓居镇江（今属江苏）。大德五年，以翰林侍讲学士郝彬荐，出任镇江淮海书院山长。大德十一年由南台御史中丞廉恒辟为掾史。至治二年授江浙行省左右司员外郎，泰定年间迁湖广行省左右司员外郎。天历元年调江浙财赋府副总管，淮、浙发生水灾，曹鉴减其赋十之六七。元统二年升同佥太常仪礼院。后至元元年升任礼部尚书，不久病故。享年六十五岁，追封谯郡侯，谥文穆。曹鉴历官三十余年，主要在江南任职，与南方文人交往较广泛。在任租屋而居，不起宅邸，家无余财，仅有经过亲手批校的数千卷书而已，颇具清誉。作诗赋，崇尚骚、雅，为文宗法西汉，诗文词曲均有时名，但诗文集未见传。《录鬼簿》列名"方今名公"节，《太和正音谱》列名于俱是杰作一百五十人中。

陈廷言迁庆元路儒学教授，寻以丁忧去职。

陈廷言，字君从。台州宁海（今属浙江）人。至治三年中乡试，授上蔡书院山长。至正中累官顺昌县尹，谢病归。有诗集，由贡师泰作序（《玩斋集》卷六），但未见传本。《元诗体要》《元音》《文翰类选大成》等总集，均选录有其诗。

何儒行于本年领浙江乡荐，但科举暂停，他未能参加会试。

何儒行，字仲景。宣城（今属安徽）人。别集不传，诗散见《诗渊》《宛陵群英集》《宛雅初编》等编。生平事迹略见《宛陵群英集》卷二、《宛雅初编》卷六。

祝尧作《天冠山二十八咏》。他的《古赋辨体》是元代辞赋学重要著作。

祝尧，字君泽。上饶（今属江西）人。延祐五年进士，授江山县尹，升无锡州同知、萍乡州同知。与同年相比，他的宦迹不足为道，但编撰《古赋辨体》八卷、外集二卷，取《楚辞》以下，凡两汉、三国、六朝、唐、宋诸代之赋，卖点在于“辨其体格”，不但内容赅备，而且议论颇中肯，是古代文体论的承前启后之作。此外，所作诗文流传不广，《天冠山二十八咏》① 是在南昌主持江西行省乡试事毕，应天冠山道士祝丹阳所请而作。

龙仁夫去世。享年八十三岁。

龙仁夫（1253—1335），字观复，号麟洲。永新（今属江西）人。早年博究经史，以道义自任。宋亡，负海内重名，举为江浙行省儒学副提举，未赴任。曾主持江浙行省贡举，后任陕西儒学提举，晚年寓居黄州。文集不传，诗文以《陈平章席上题琵琶亭》最有名。

郭畀去世。享年五十六岁。

郭畀（1280—1335），字天锡，号云山。丹徒（江苏镇江）人。郭景星之子。历镇江路学录、饶州鄱江书院山长、青田腊源巡检，辟江浙行省掾史。不但有诗文名，而且工书善画，擅长书画鉴赏，在江浙文坛影响颇大。著有《客杭日记》二卷，后人将其诗文结为《快雪斋集》一卷②。

臧梦解去世。

臧梦解（？—1335），号鲁山。庆元（浙江宁波）人。宋末登进士第，元初以荐授海宁知州，除桂阳路同知，擢广西廉访副使，大德元年改江西，大德六年移浙东，大德九年升广东廉访使，致仕居杭州。博学洽闻，诗文均有时名。

后至元二年丙子（1336）

丞相伯颜当国，不但禁止江南农家使用铁器，特别是又禁止戏文、杂剧、

① 祝尧《天冠山二十八咏》，见明人汪砢玉《珊瑚网》卷九。为天冠山题咏的不止祝尧，还有赵孟頫等名流，也不是写于同一时间。

② 以《快雪斋集》名集，是误以郭天锡祐之为郭畀天锡，原集名应为《郭天锡文集》。

评话等通俗文学在民间流行。

《农田馀话》卷上说：

> 后至元丙子，丞相伯颜当国。禁江南农家用铁禾叉（即叉枪），犯者杖一百七十，以防南人造反之意，民间只用木叉挑取禾稻。古人所谓“肉食者”，其智如此。又禁戏文、杂剧、评话等项。

铁器和戏曲、小说，竟并列为违禁的“战略物资”，从无先例。这不是伯颜的一次“异想天开”。这个“禁铁令”确实可笑，但不能不承认，对江南伯颜具有特殊的畏惧感。禁止戏曲、小说，即便是附带的，也能说明在当时戏曲、小说是如何普及，而且涉及的地域如何广泛。与其相关的是《元史》一〇五《刑法四》的一则文字：“诸民间子弟不务生业，辄于城市坊镇演唱词话，教习杂剧，聚众淫谑，并禁治之。诸弄禽蛇、傀儡，藏擫撇钹、倒花钱、击鱼鼓，惑人集众，以卖伪药者，禁之，违者重罪之。诸弃本逐末，习用角抵之戏，学攻刺之术者，师弟子并杖七十七。诸乱制词曲为讥议者，流。”实际这个法规的关键词是“聚众”“惑人集众”。

乔吉出游会稽，以小令〔折桂令〕怀念南宋亡国六十周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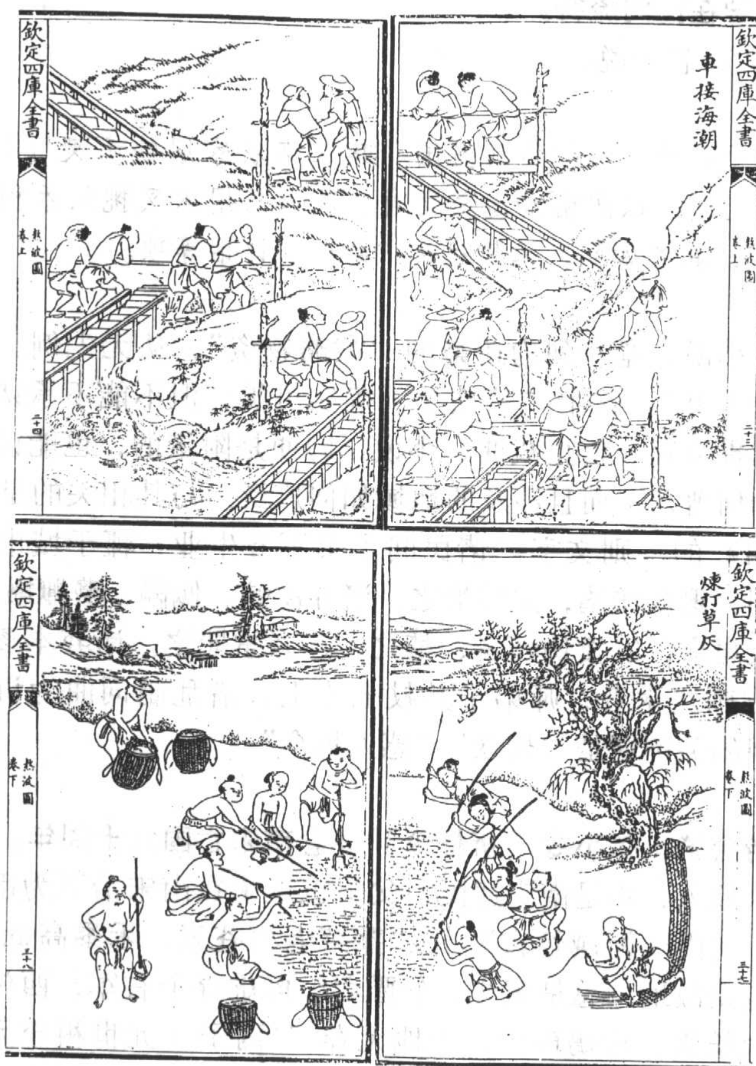
乔吉是太原人，不是南宋遗民，父祖也从未在南宋治下为臣。他的〔双调·折桂令〕《丙子游越怀古》云：“蓬莱老树苍云，禾黍高低，狐兔纷纭。半折残碑，空余故址，总是黄尘。东晋亡也再难寻个右军，西施去也绝不见甚佳人。海气长昏，啼鴂声干，天地无春。”丙子（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宋恭帝德祐二年）重纪时刻，六十年前的南宋亡国过程已经淡漠。乔吉写的就是“忘记”。“天地无春”是因“总是黄尘”。

三月。图文并茂的《熬波图》二卷，由天台人陈椿序刊。

《熬波图》上卷二十一节，下卷二十六节。每节先是图，再是工作方法的解说，最后系以诗。这是继王桢《农书》之后的又一种利用图画、解说，并配以诗歌的农工书籍。这部书是陈椿依据下砂场盐司原有的图增补而成书的。原书久已不存，清乾隆间修《四库全书》，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

《熬波图》第一图《各团灶座》的诗写道：

> 东海有大利，斯民不敢争。并海立官舍，兵卫森军营。私鬻官有禁，私鬻官有刑。团厅严且肃，立法无弊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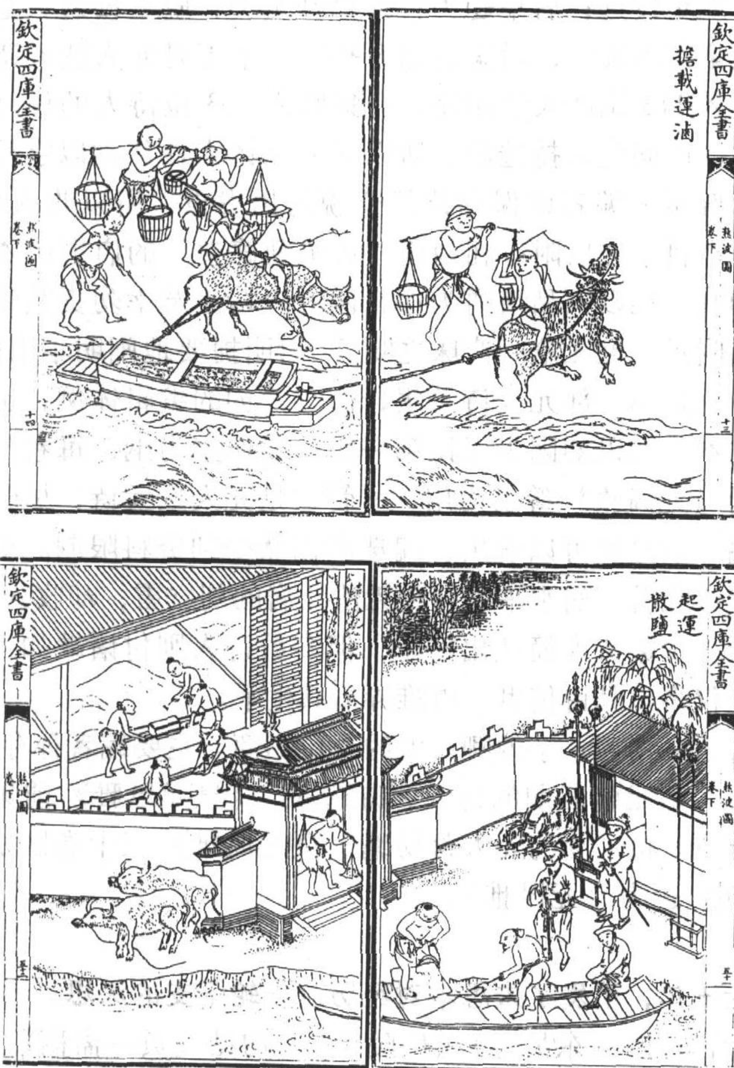
从《熬波图》的诗文与图画中，可以感受到劳作的辛苦。

《筑垒围墙》节的文字则是：

团围四向，墙堵上置乳头，仿佛城池，以绝奸伪。或遇坍摧，随时筑垒。其土皆用荡内生田土，堑盖傍海，不时风潮大作，非坚实不足以御之。

那首诗相应写道：

立团定界址，分团围短墙。垒土为之限，开沟为之防。版筑已完固，厥土燥且刚。团门慎出入，北军守其旁。



《熬波图》是元代社会生活的写实。

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句用了“北军”一词，原来看守盐场的，是特意从北方调配的劲旅，而不是当地的军人。盐政是元代的命脉。

诗，配以文字，再加上图画。这种形式在元代的应用有多广泛，可以达到怎样的完美程度，本书可见一斑。

元代第一部本朝诗选集《皇元风雅》序刊。

《皇元风雅》共十二卷（前集六卷，后集六卷①）。前集题为：傅习采集，

① 《皇元风雅》或分为二十四卷，前集十二卷，后集十二卷。两种版本卷帙虽不同，内容基本一致。

孙存吾编类，虞集校选；后集题为：孙存吾编类，虞集校选。全书编成于后至元二年，前集有虞集序，后集有谢升孙序。本书是元人选元诗最有影响的一种，前集收入113位诗人的作品，后集收入163位诗人的作品。前后两集有些诗人重出。由同代人持选政，所以对入选诗人往往称以字号或官阶，不称本名，以示尊重。编者以保存诗坛全貌为出发点，所以收入范围比较宽。后集问世时，在目录之后附有刊刻者“古杭勤德堂”的启事：“本堂今求名公诗篇，随得即刊，难以人品齿爵为序，四方吟坛士友幸勿责其错综之编。倘有佳章，毋惜附示，庶无沧海遗珠之叹。”简明扼要地阐明本书的编刊宗旨。据谢升孙序，这是第一部元人诗总集，而它开创的编辑体例，也确实影响到以后的元诗选本。如以刘因为元诗第一家，以作家为纲，每卷次序不据年齿爵里等，都为《元风雅》等书沿用。尽管这是元人选元诗，尽管编者刻意向四方搜求诗稿，但显然可以看出，编选者仍然受到资料限制。如刘辰翁、刘将孙父子各存诗几首，而水平、声望无法比肩的刘立雪，却收入11首，超过刘氏父子总和。少数诗人简注出字里，但多数诗人则付诸缺如，这使得一些江湖草野之士仅得以其诗传世，再难弄清其生平。

前集编者之一傅习，字说卿，大约是位书商。主要编者孙存吾，号如山，曾任儒学学正，是元朝后期的诗人、诗选家。《皇元风雅》前集卷五收入了他自己的3首诗。按：为与元人蒋易编《皇元风雅》三十卷区别，一般将蒋易《皇元风雅》题为《元风雅》。

元一统六十年，引发了朱思本对经历这一轮干支的深思。

朱思本七言古诗《东吴行》《广陵行》（均见《贞一斋稿》）是对六十年来元由盛及衰的反思。《东吴行》诗云：

> 君不见浙右良田千万顷，陈陈积粟深于井。又不见东南漕运输上京，舳舻千里浮沧溟。去岁江淮丁旱暵，黎民饿死殆将半。米舟来者皆东吴，处处延颈争欢呼。今岁东吴遭海溢，太湖涌波高百尺。秋夏之间阴气凝，十旬风雨蹈阳精。吴江浙水不复辨，仿佛蓬莱眼中见。稽天巨浸十六州，良田漭漭蟠蛟虬。豪家发粟赈贫乏，室如垂罄无余留。饥民即死不能舍，聚为盗贼横戈矛。此邦赋税半天下，安得不贻黄屋忧。明年海运何自出，必藉邻境交相求，江闽湖广迭兵旱，比岁疮痍殊未瘳。救荒有术在青史，河东河内非良谋。太平天子至神圣，亿万苍生仰司命。一念通天天必从，普天愿见年年丰。

《广陵行》诗云：

广陵城外秋草肥，广陵城中车马稀。斗鸡蹴踘不复见，朱箔青楼尘掩扉。圣世承平六十载，何事繁华一朝改。长老未说泪先垂，听我长歌尔应骇。去年春旱天无雷，种不入土心已摧。夏秋日色烈如火，万里良田俱草莱。三冬杀气更严酷，运河冻合光如玉。十室八九无炊烟，父兄愁叹妻孥哭。今春雨滑动犁锄，忍饥力作交相呼。奈何螟蟘蔽天起，所至草木无遗余。捕蝗作食已云恶，疫疠无端扇余虐。死亡枕籍无人收，赖有王官为掩胳。广陵城中十二门，抱关老卒记甚勤。舆尸一门日百数，两月渐见无行人。庙堂赈济颁良策，宣阃爱民心甚力。县胥里正肆奸欺，远者那能沾帝泽。十人今有几人留，况值秋田又半收。至今痛定更思痛，转觉涕泗纵横流。人生有情须怆恻，惆怅龚黄难再得。大书传作广陵行，持斧何人应动色。

作为“丙子”干支重纪的开始，朱思本为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特别是繁荣带来的贫富不均与腐败感到惶惑，但也只能寄希望于天子圣明。

松江亢旱，释祖柏作诗讥讽“求雨”失败的方士。

《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七“讥方士”）云：“丙子岁，松江亢旱，闻方士沈雷伯道术高妙，府官遣吏赍香币过嘉兴，迎请以来。骄傲之甚，以为雨可立致，结坛仙鹤观，行月孛法，下铁简于湖泖潭井，日取蛇燕焚之，了无应验。羞赧宵遁。僧柏子庭有诗，其一联云：‘谁呼蓬岛青头鸭，来杀松江赤练蛇。’闻者绝倒。”作为一个释子祖柏颇能体察民心，也颇能反映民意。

祖柏（1284—?），字子庭（或作号子庭）。四明（浙江宁波）人，寓居吴中。自幼出家，能言善辩，举止滑稽。有诗名。居室名为“不系舟”，常浪迹云游，乞食于村落。善画枯木竹石，又善画兰。他是顾瑛玉山草堂的座上客。他和他的诗，特点是直接涉及社会关注点，在当时别具一格。他还写有《可憎诗》：“世间何物最堪憎？蚤虱蚊蝇鼠贼僧。船脚车夫并晚母，湿柴暴炭水油灯。”[①] 居然连自己的背景“僧”也列在其中，这倒有点不同一般。

王懋德擢中书左丞，此后卒于官。

王懋德，字仁父。高唐（今属山东）人。由中书省掾史授户部主事，至

① 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七十六。

治元年任南台御史，迁内台御史、左司都事。曾出为河南、燕南两廉访司副使，淮西肃政廉访使。天历初，召为中政院佥事，拜左司郎中，升参议，又拜治书侍御史。此后再次出为淮南廉访使，转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召为御史中丞，于后至元二年升左丞。与虞集、吴澄、马祖常、许有壬等交往密切。《元诗选》三集集录其诗12首，题为《仁父集》，他的诗最有名的一首就是《直沽海口》：

极目苍溟浸碧天，蓬莱楼阁远相连。东吴转海输秔稻，一汐潮来集万船。

陆文圭去世。卒年八十五岁。

陆文圭（1252—1336），字子方。江阴（今属江苏）人。幼而颖悟，读书过目成诵，宋咸淳年间，以《春秋》中乡选。入元，隐居于江阴城东，学者称为“墙东先生”。延祐初，朝廷数次礼聘，均以老疾辞。陆文圭博通经史百家，为文融会贯通，尤精于地理考核。有《墙东类稿》二十卷，已亡佚，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自《永乐大典》辑出诗文数百篇，仍按原书编为《墙东类稿》二十卷。

雍古人赵世延去世。享年七十七岁。

赵世延（1260—1336），字子敬，号迂轩。是雍古人，也里可温[①]。虽然同是雍古，赵世延与马祖常的家世并不一样。他的祖父幼孤，就养于外家，外家是金朝显族术要甲氏，而术要甲又转音而讹，被称为“赵家”，便以赵为汉姓。入中原后，先居礼店，后徙成都（今属四川）。大德年间入仕，历仕各地，日见显要。延祐元年，拜中书参政，迁御史中丞，升翰林承旨，成为朝廷最主要的文臣。仁宗去世，他正在四川行省平章任上，受到政敌帖木迭儿的陷害，欲逼令自裁，但赵世延终于熬过此劫。泰定元年起为集贤大学士。元文宗即位，更受到重视，除奎章阁大学士，拜中书平章，封凉国公。至顺元年致仕，卒，谥文忠。

赵世延是华化程度颇高的元史名臣，他还是为数极少收入《宋元学案》（卷九十五）的西域人。他的文章传世尚多，由他主持编纂的重要典籍《经世大典》还有片断内容保存在《永乐大典》等书之中。赵世延有诗名，但存诗不多，《元诗选癸集》丙集辑赵世延诗7首。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

① 也里可温，一般指基督教教徒，但也指出自有基督教背景的家族。

三“基督教世家由儒入道”节、卷四“西域之中国文家”节，对赵世延做了比较充分的考述，还专门对赵世延的文章作了勾稽。

蒲道源去世。享年七十七岁。

蒲道源（1260—1336），字得之，号顺斋。南郑（陕西汉中）人。以博学强记知名乡里，通晓性理之学，曾为兴元郡儒学正，罢归还乡后绝口不言仕进。皇庆二年为翰林编修，又进为翰林应奉，延祐六年迁国子博士，到职仅年余，便辞官归隐。平生恬于仕宦，辞去国子博士后，在家乡优游林泉，曾荐为陕西儒学提举，但未赴职。病重临终之时，不愿就医，饮酒赋诗而逝。究其一生，属于比较典型的儒士。他去世后，其子蒲机编辑遗作，汇刊行世，题为《闲居丛稿》，共二十六卷。

王结去世。享年六十二岁。

王结（1275—1336），字仪伯。祖籍易州定兴（今属河北），祖父以质子军从成吉思汗西征，在西域娶阿鲁浑氏女，又自西域徙戍秦陇，后定居中山。王结早年尝从董朴学习经书。二十多岁来京师，曾上书执政，陈时政八事。元仁宗在潜邸，王结被举荐入充宿卫。仁宗即位，迁集贤学士。后历任顺德、扬州、东昌诸路总管。至治二年参议中书省事，天历元年拜陕西行省参知政事，天历二年拜中书参政，以得罪近侍罢免。元统年间拜中书左丞，后至元元年诏复入翰林，因病未能赴职。卒，追封太原郡公，谥文忠。王结立言制行皆法古人，晚年精于《易》。有文集十五卷，已佚，清乾隆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王结诗文，重编为《王文忠集》六卷。另撰《易说》一卷，吴澄读后曾表示称许，今未见传。

后至元三年丁丑（1337）

三月七日。在京的泰定四年李黼榜进士们，在大都城南集会。

从元统元年以来，科举又中断了。已经金榜题名的士人，对其进士名分更加珍视。十年前的这一天是阿赤察、李黼榜的前进士们“金榜题名”的日子。这次十周年聚会，参加者有在京城的十个同年。泰定四年进士在文坛最

有名望的两位：杨维桢、萨都剌缺席。会上每人写诗二首。黄清老的诗写道[①]：

曾记南城尺五天，重来携手宴同年。春风远塞葡萄酒，明月佳人玳瑁宴。苔上药阑红染露，莺啼柳径碧生烟。琼林十载多离别，欲扶金徽思渺然。

川凫浴日金粼粼，垂杨马嘶三月春。游蜂舞蝶总爱客，飞絮落花时近人。东风吹水入银瓮，芳草为我铺绿茵。更催朝露染魏紫，舞袖一拂南山尘。

赴宴者，有汉人南人榜状元李黻，也有蒙古色目人榜的进士观音奴。

夏。许有壬分省上都，将自己关于上都风物的诗篇结为《上京十咏》。

许有壬《上京十咏》（《元诗选》初集《圭塘小稿》），是“上京纪行诗”中的一个特例，用十首诗集中咏滦阳以及漠北的物产。十首题目分别是《马酒》《糁面》《沙菌》《秋羊》《黄羊》《黄鼠》《芦菔》《白菜》《地椒》《韭花》。在连篇累牍的“纪行”之作以外，读这样的“塞外咏物诗”，别有风致。《上京十咏序》说:“元统甲戌，分台上京，饮马酒而甘，尝为作诗。丁丑分省，日长多暇，因数土产可记者尚多，又赋九题，并旧作为《上京十咏》云。”在十首诗中，有一首《马酒》诗作于元统二年，其他则写于本年。

六月。一则无根浮言在两浙民间不胫而走，使社会的不同阶层都受到影响。

夏季将终，民间谣言四起，说是朝廷将以童男童女授漠北鞑靼为奴婢，而且还要由父母护送到地方交割。从中原到江南（特别是江南），府县村落，官庶人家，只要有十二三岁以上的子女，便设法匹配成亲。六礼既无，片言即和，社会为之扰动。这事件，来得急去得快，十几日后平息。整个事件前后影响近一个月，致使“男女常年久无匹配者，虽贫陋，婚娶无遗”[②]。“谣言”事件，则成了“抢新郎”“拉郎配”一类文学作品的母题。

《南村辍耕录》（卷九“谣言”节）甚至说：受到波及的居然包括社会上

---

① 见《元诗选》二集《樵水集》。诗的题目是《丁丑三月七日会同年于城南子期工部仲礼省郎世文编修文远照磨学升县尹子威主事克成秘书至能照磨子通编修凡十人二首》。

② 长谷真逸《农田馀话》卷上。

层，“虽守土官吏，与夫韃靼色目之人，亦如之。竟莫能晓。”它的后遗症明显而且影响面广泛，“自后有贵贱、贫富、长幼、妍丑，匹配之不齐者，各生悔怨。——或夫弃其妻，或妻憎其夫；或讼于官，或死于夭。此亦天下之大变，从古未知闻也。”一时间，社会上流行着吴僧祖柏口占的一首诗：

一封丹诏未为真，三杯淡酒便成亲。夜来明月楼头望，惟有姮娥不嫁人。

当时还有人集古人诗句为一首绝句，也不胫而走：

翡翠屏风烛影深，良宵一刻值千金。共君今夜不须睡，明日池塘是绿阴。

这样，一个未经证实的传闻，竟然带来了如此之强烈的后遗症，而且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波及面是整个社会，连蒙古色目的官员们也未能幸免。可谣言传说是要将童男女交漠北的蒙古人为奴呀。《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四“十二生子”节），还记录了一则实例：“至元丁丑，民间谣传拘刷童男女，以故婚嫁不问长幼，而乱伦者多矣。平江苏达卿，时为上海吏，有女年十二，赘里人浦仲明之子为婿。明年生一子。”在此之前，也曾有过这类谣言。据《元史·成宗本纪》，大德六年九月有纪事云：“己酉，龙兴民讹言括童男女，至有杀其子者。命诛其为首者三人。”看来这次产生的恐慌相当厉害，但措施也相应的严厉。在后至元三年，官府似乎没有介入，事后，没人追查这个“谎信”的来源。它来了，又走了，对社会的影响则留在了历史的年轮中。它对文学的影响，却从未消减。不只是诗文，甚至不止是在元代，此后诗文、小说、戏曲、笔记，都有了它的影子。

祖柏的另一首诗，是有名的《游虎丘》：“家家恕斋字，户户雪窗兰。春来行乐处，只说虎丘山。”“恕斋”，是元曲家、书法家班惟志（字彦功）；“雪窗”，是元代另一位善画兰花的诗僧普明（号雪窗，即明雪窗[1]）。这首小诗也像是“口占”，但它确实是元中期以后吴中民间风俗的形象写照[2]。

八月十五日（中秋）。邵元长与钟嗣成重逢，钟嗣成以成书的《录鬼簿》

① 元代还有一位诗僧别号雪窗，即悟光（光雪窗），但善画兰花的叫做“明雪窗”。

② 祖柏的这两首诗，均见《元诗选》三集《不系舟集》。

稿本相示，邵元长为其作序，并以〔湘妃曲〕赠别。

邵元长《录鬼簿序》云："余僻居慈溪山县，每叹孤陋，侧听继先钟先生大名久矣，莫遂识荆。丁丑孟秋，邂逅于东皋精舍，匆匆东之鄮城，中秋复回溪上，示余以新编《录鬼簿》，皆当今显宦名公词章行于世者，恐后湮没姓名，故编次成集，纪其出处才能于其前，度以音律乐章于其后，千万载之下，知其为何如人，直欲俾其为不死之鬼也。先生之用心，诚可嘉尚。于其行，遂歌〔湘妃曲〕以别：高山流水少人知，几拟黄金铸子期。继先贤，既解其中意。恨相逢，何太迟。示佳编，古怪新奇。想达士，无他事，录名公，半是鬼。叹人生，不死何归？慈溪邵元长序。"邵元长与钟嗣成相识不久，但他确实是其知音。

"元人选元诗"的重要总集《元风雅》（《国朝风雅》）序刊。

元人蒋易编集的《元风雅》（《国朝风雅》）三十卷，书首有后至元三年蒋易自序①、后至元四年黄清老序、后至元五年虞集序。蒋易自序中说，他选录元诗的标准是"择其温柔敦厚，雄深典丽，足以歌太平之盛；或意思闲适，辞旨冲淡，足以消融贪鄙之心；或风刺怨谤而不过于谲；或清新俊逸而不流于靡，可以兴，可以戒者，然后存之。"全书收入元代诗人 155 家（一本为 160 家），其中包括文天祥及宋代遗民谢枋得等人。据虞集序介绍，前十卷所收的是"诸贤皆已去世，而全集尚有可考"。卷十一以下，为"诸君子布在中外"。后三卷为杂编。但此书的编辑缺乏严格的体例，并受到资料限制，正如蒋易自云："第恨穷乡寡闻，采辑未广。"但其以一己之力，积数十年之功，编成此书，确属难得。本书选赵孟頫、杨载、范椁诗最多，各为一卷，其他如袁桷、黄清老、柳贯等人，也辑入若干首诗。有些诗人的作品流传不广，长期借本书得见其诗，如卷十有郭昂诗，郭昂《野斋集》早已不存，《元诗选》二集所收《野斋集》仅存诗 10 首，其中 7 首是从此书辑出；今存何失的诗，几乎全部出于卷二十。本书入选诗人，基本上以字号相称，并以刘因为开卷第一人，这或许是受到傅习、孙存吾编《皇元风雅》影响。《元风雅》三十卷，与《皇元风雅》十二卷（别本二十四卷）历来是最受重视的元诗总集。

蒋易，字师文，号鹤田。建阳（今属福建）人。早年从杜本游，遍交知名士，为人笃信好学，工诗善属文，诗文被认为"直追古作"。左丞阮德柔

---

① 在目录之后，是蒋易的一则跋语，其中说："信乎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人才。"这就是他的编选宗旨。

分省建阳，待以上宾之礼，并入阮德柔幕府。著《鹤田集》十四卷，仅见文二卷传世（收入的是序）。

叶衡出任兴化县尹，有治迹。

叶衡，字仲舆，号芝阳山人。德兴（今属江西）人。延祐间领乡荐，仕至婺州知州。诗文名颇著，早年尝从姚燧游，与黄溍、欧阳玄、宋褧为文字之交。他的《上京杂咏十首》，咏上都风光物态，流传较广。所作散见于《文翰类选大成》等诗文总集。

许谦去世。享年六十八岁。

许谦（1270—1337），字益之，号白云山人。金华（今属浙江）人。早孤，受业于金履祥之门，尽得所传之奥。延祐初，居东阳八华山，开门讲学，学者欣然从之，有远自幽、冀、齐、鲁专程前来受业者。许谦处世不泥于古，不流于俗，不出里闾者四十年。廉访使曾荐于朝，但他始终讲学乡里，未出仕，四方学者以他是否健在，作为道运兴衰的标志。卒，赐谥文懿。许谦安贫乐道，笃志于学，大德年间江南大饥，许谦身形消瘦。有人问他："岂食不足邪？"许谦回答："今公私匮竭，道殣相望，吾能独饱邪。"（《元史》本传）有《读书丛说》六卷，《诗传名物钞》八卷，《读四书丛说》四卷，《读论语丛说》三卷，《读中庸丛说》二卷等。诗文集《白云集》四卷，系明人李伸所编。

后至元四年戊寅（1338）

十月。在盱眙县达鲁花赤任上，畏吾人纳璘不花于“第一山”创建淮山书院，并与同游者赋诗以纪。作品编为《第一山唱和诗》。

纳璘不花，字文灿（一作文粲），号絅斋。北庭畏吾人。泰定四年登进士第，授湘阴州判官、同知，历阳县达鲁花赤。后至元三年迁盱眙县达鲁花赤，历江浙行省都事、员外郎，四川行省理问。有诗名，许有壬为写《跋纳璘文灿诗》（《至正集》卷七十一），但所作大多散失不传。纳璘不花游第一

山的诗题为《题第一山答余廷心》①，余廷心，即色目人余阙。

元人陈奎《第一山唱和诗序》② 云："至元戊寅之孟冬，山阳马仲良、汝南陈天章、大梁谢景阳同游。适监邑高昌纳公鼎建淮山书院于上，以为斯道倡。观览之余，非徒得山水之乐，抑又喜夫监邑化民之德教也，遂各书所述，以记此山之胜。"

汪炎昶去世。享年七十八岁。

汪炎昶（1261—1338），字懋远。婺源（今属江西）人。于书无所不读，学问渊源于六经，精通程朱性理之学。早年师从宋代遗民孙嵩，不求仕进，以宋代遗民自居，衣冠、动作、语言、礼度如同宋代之人，并自号古逸民，学者称"古逸先生"。与另一位宋代遗民江凯隐于乡里，优游林泉。年已古稀，仍好学不倦。汪炎昶在南宋亡国时年仅十几岁，在元朝生活了一个花甲，但始终自认胜国逸民。今存《古逸民集》二卷（诗、文各一卷）。

孛术鲁翀去世。享年七十岁。

孛术鲁翀（1279—1338），字子翚。女真人。郡望广平（今属河北），祖父随元宪宗南征，家于邓州顺阳（河南内乡）。其父任江西掾，以家自随，孛术鲁翀生于赣江舟中。父死，家事陵替，他仍不顾家务学习更专心。曾从新喻萧克翁学，孛术鲁翀原名思温，字伯和，萧克翁为改易名与字。受到姚燧赏识，并推许说："燧见人多矣，学问文章无足与子翚比伦者。"大德十一年以荐授襄阳县儒学教谕，升汴梁路儒学正。姚燧荐修实录，至大四年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延祐二年擢河东道廉访司经历，迁陕西行台监察御史，延祐五年拜监察御史。后擢翰林修撰，又改左司都事。预修《大元通制》，并撰序言。泰定二年曾出为河南行省左右司郎中等职，参修《太常集礼》，兼经筵官。文宗即位，尝呼"子翚"而不名。迁集贤学士，兼国子祭酒，升礼部尚书，元统二年除江浙行省参政。逾年以迁葬归故里。卒，追封南阳郡公，谥文靖。孛术鲁翀以师道自任，是许衡的后继者。文章简奥典雅，深合古法。

---

① 这首《题第一山答余廷心》，《元诗选癸集》庚集上归于元史名臣、河西人高智耀之孙纳麟作，并注明"纳璘，字文灿"。但史传中未见高纳麟有表字。而纳璘（纳麟）即蒙古语"太阳"之意，名纳璘，表字文灿亦颇切和。第一山即在盱眙县境，特别是陈奎《第一山唱和诗序》已经明言，作诗者为"监邑高昌纳公"，而纳璘不花文灿于后至元三年出任盱眙县达鲁花赤。高纳麟是河西人，纳璘不花是北庭人，北庭为高昌人的郡望。以上情况均与高纳麟不合。《元诗选癸集》断为高纳麟作必误。

② 见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重校本《盱眙县志稿》卷三。

有文集六十卷，久佚，近人缪荃孙辑佚成四卷，名《菊潭集》。

项炯去世。享年六十一岁。

项炯（1278—1338），字可立。台州临海（今属浙江）人。为人倜傥尚气，有志于古学。曾带自己的诗卷去见陈孚，陈孚曾说他善学李贺。二十岁时，师从翁森、陈天瑞。回到乡里，读书深山，并接待四方士友及慕名而来的里中子弟，山中隐居读书达十年。延祐初恢复科举，屡试未中。素为吴越学者器重，曾寓居吴中甫里书院。有人拟向朝廷推荐，他以母老不可远游为辞，婉言谢绝。中年后，回到家乡，杜门不出，纵情于山水。诗传世不多，《元诗选》三集选入22首，题为《可立集》。

马祖常去世。享年六十岁。

马祖常（1279—1338），字伯庸。色目雍古人，占籍光州（今属河南）。延祐二年进士，授翰林应奉，擢监察御史。至治间，累迁翰林待制。泰定元年除典宝少监，历翰林直学士，拜礼部尚书。至顺元年参议中书省事，累迁南台中丞。元顺帝即位，知经筵事，改御史中丞。卒，谥文贞。有《石田集》十五卷，是流传较广的元人别集。

马祖常时名颇大。《元史》本传说："祖常工于文章，宏赡而精核，务去陈言，专以先秦两汉为法，而自成一家之言。尤致力于诗，圆密清丽，大篇短章无不可传者。"苏天爵编《元文类》时，马祖常正享誉文坛。《元文类》选录了马祖常文20篇，诗赋33首，是该书的高规格。马祖常在元代诗文中的地位，可见一斑。对马祖常创作有影响的是唐人李贺与李商隐，这一点在七绝中表现并不明显，而他的七律《无题》四首更具时名，一时翰苑人物纷纷作和，《河西歌》在诗题下就明确点出"效长吉体"。

李裕去世。享年四十五岁。

李裕（1294—1338），字公饶。东阳（今属浙江）人。早年曾师从许谦，至治年间，北游京师，上《圣德颂》，元英宗在玉德殿召见了他，补国子生。至顺元年登进士，授陈州同知，又转任道州同知，未赴任而卒。有《中行斋稿》，未见传。《元诗选》三集选入其诗35首，题为《中行斋稿》。诗秀丽飘逸，尤其以七言乐府见长，被认为出入李贺、李商隐之间。与陈樵（鹿皮子）、宋褧、虞集均有唱和。宋濂与李裕是忘年交，李裕去世，宋濂执笔撰写了墓铭（《宋文宪集》卷五），并评价他的诗风"恣态闲婉，复类其为人"。

后至元五年己卯（1339）

七月（“菊月”）。杭州褒忠寺住山僧可观，将泰定三年以来各界人士歌咏岳飞之作结集，题为《岳庙名贤诗》。

岳飞含冤死去，得到平反，并安葬在杭州栖霞岭之下，建庙祭祀。宋元替代，岳飞的墓地与庙宇日渐倾颓。虽然经过努力修复，仍是危机百出。特别是岳飞的后裔有人出家为僧，居住在坟墓的西侧，可他却使得“庙与寺靡有孑余”。泰定三年，天台僧人可观为了恢复寺庙坟园旧观，动用了一切社会关系，经过名人郑元祐、柯九思等协助，得到湖州推官何贞颐以及杭州郡吏李全初的鼎力相助，“于是，葺荒丘，树松槚，归祊田，起废祠，新其寺而大之。概十有三年，而故物始完”①。重兴庙宇的工作进行了十三年，十三年后，释可观将其间时人所作的诗篇文章结为一卷，题作《岳庙名贤诗》，其中收录了72位元人所作的92首诗以及少量的文章，此外还收录了一些宋人的诗、文、词。这是岳飞去世三百年间，规模、影响最大以其为题的文学创作活动。通过《岳庙名贤诗》，以诗歌的集咏方式，使民间对岳飞的崇拜达到新高。这些诗文的作者，有胜国王孙赵孟頫以及赵氏家族的其他人物。赵孟頫所作是元诗名篇。

曾受到元文宗特殊信任的书画家柯九思写了四首七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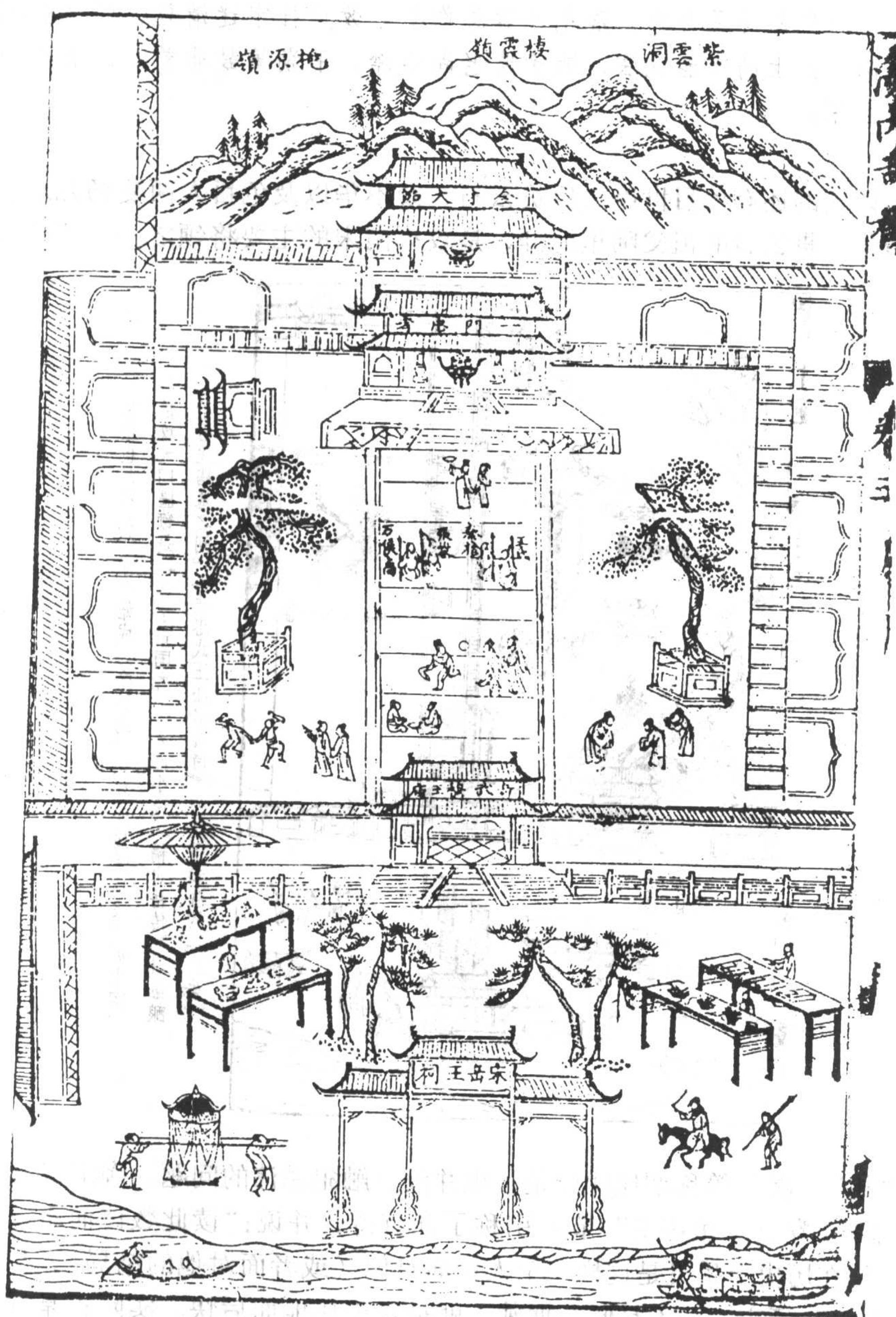
建炎谁为致中兴，武穆由来志可凭。传檄燕云惊四海，出师河洛慰诸陵。长驱铁马知无敌，欲扫黄龙竟不能。禹穴松楸无麦饭，钱湖香火有山僧。

结发行间见此公，两河忠义倏元戎。勋成伊吕终方驾，算胜孙吴亦下风。拂剑未酬千古辱，赐环空坏十年功。奸邪卖国堪流涕，独立西风看去鸿。

英雄已矣更何论，思沛空飞汉地魂。区脱几年悲紫塞，琵琶万里泣黄昏。西湖花木明春苑，南极星辰动海门。谁念前朝轻社稷，怨歌惟有旧王孙。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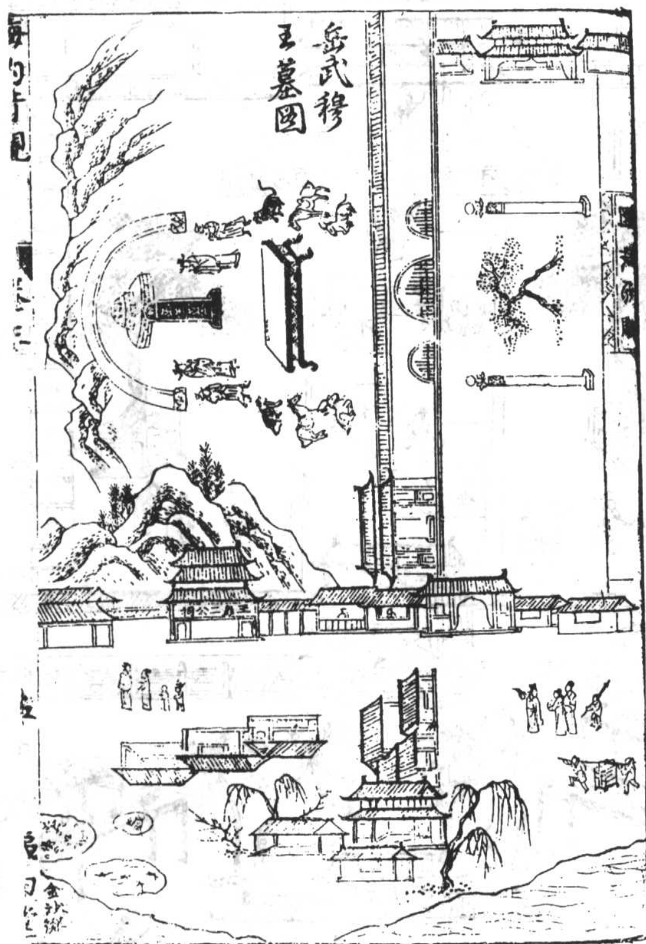
① 宇文公谅《岳庙重兴庙宇作》诗序（见《岳庙名贤诗》）。



从元代开始，西湖的岳庙成了名胜。请注意大门、二门中间那个通道，第一组人物是评说往事或推敲诗句的，第二组在“蹴鞠”，第三组则是以秦桧为代表的几个“千古罪人”（也许是泥塑的人像），第四组在表演戏曲，表演内容当然与忠臣孝子有关。出自《海内奇观》。

行尽西泠见墓林，落花飞絮总伤心。数声杜宇迷清昼，两个麒麟卧绿阴。坐上高僧能说法，道傍遗老尚沾襟。平湖箫鼓非前日，隔岸楼台暮霭深。

写诗文的还有色目世臣之后贯云石、泰不华以及色目人西夏杨九思、高昌铁穆尔。贯云石的祖父阿里海涯，是攻灭南宋的主要将领之一。这些诗篇



岳坟也是从元代才开始成为名胜的。元廷能接受岳飞。据本图，岳坟大门匾额是『尽忠报国』。一大部小说《精忠岳传》就酝酿于岳飞庙墓之间。《岳忠武王庙名贤诗》想必是参观的『广告』。

中，“胡”“虏”等称谓比比皆是，也并没有触犯忌讳的问题。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三“岳鄂王”节）引称了几首诗，并说:“读此数诗而不堕泪者几希。”在历史上岳飞是这样一个人：面对他（或者面对他的结局），从来没有“中立”可言——不是倾心拥戴，就是置于死地而后快。实际正是异族统治的元朝，民间对岳飞的态度才形成了一面倒，而这部《岳庙名贤诗》就是民众对岳飞态度的“体温计”。

至正三年，元廷编撰前朝史，《辽史》《金史》《宋史》书成，并立即刊刻行世。至正六年，岳庙寺僧高会出资专门刊印了“官修”《宋史》的卷三

六五，即《岳飞传》，同时，将寺僧收集到的歌咏岳飞的诗文（主体部分仍题为《岳庙名贤诗》）重新汇为一编，刻版行世。元明人提及歌咏岳飞与岳庙都是依据《岳庙名贤诗》。

十一月。河南行省台掾范孟作乱。

这个独立的事件使元后期的社会问题得到充分展示，并牵涉到在河南的许多文坛人物。同时，这个事件与一部“平话”——《忠传》——的问世，有特殊关系。

范孟以一个地位低微的下层小吏，竟在一时间控制了河南行省的政局，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以至在明初编撰《元史》时，史官们竟然不知应该怎样表述这一事件。这只是中原一省的局部问题，却是权臣伯颜败亡的征兆。

范孟，字孟端。杞县（今属河南）人。以内台知班发身，后至元年间为河南省台掾。家贫无资，寡交游，人皆谓其“不办事”，意思是“说空话”“成不了事”。有了这样的恶评，范孟郁郁不得志，又久不升调。曾题诗于省台壁云:“人皆谓我不办事，天下办事有几人。袖里屠龙斩蛟手，埋没青锋二十春。”诗中杀气冲人。这就是以后通俗小说中典型的“反诗”了。有御史来省，与其有旧，为之力言，乃得补官，但又不帮俸。范孟发狠说:“我必杀若辈!”后至元五年十一月，在冬至日以当值的身份，与几个死党密谋，先由四个人，以黄蜡为丸佩带在身上，诈称圣旨到，乘夜进入河南行省，叫当值掾史（即自己）来传圣旨，以遮人耳目。他们先矫诏传来致仕闲居的原河南廉访使段惟德（即段辅），让他据省中主事，然后一个一个将河南平章、左丞、理问、郎中、都事、总管、监司、万户等人传至，逐一在脑后以铁骨朵扑杀，弃尸省府后园。然后又假传圣旨，以自己为河南都元帅，收缴大小衙门印信，以虎符调兵守城，白日戒严，封闭黄河大渡船，截断了南北交通命脉。他陆续以圣旨之名，将各衙门的正官处死。几乎把河南官员一茬杀光，竟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他新任命的行省宣使冯二舍，要求亲自面见朝廷钦差。这时范孟喝得醉醺醺，就啐了一口，说:“何为朝廷官！我便是也。”冯二舍看出端倪，将范孟杀死，砍下他的头颅，叫开省府大门，将其死党追杀干净。除掉一个人，很容易就平定了这闹剧一样的谋反。

以上是元明之际人权衡《庚申外史》对这件事作的记载（略做隐括）。初读这段文字，会以为是小说家言，不敢相信其为真。权衡将范孟叫做范孟端，一时查不到这个范孟端的其他情况。《元史》顺帝本纪相关时段，仅有简略的记事：十一月，戊辰。“开封杞县人范孟反，伪传帝旨，杀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月禄帖木儿、左丞劫烈、廉访使完者不花等。已而捕诛之。”《元

史》的《张桢传》《归旸传》等处有一些文字也涉及了这次由小吏范孟发动的惊天大事。据记载，当时“大丞相亲王伯颜仓卒莫知其故，奏遣知枢密院事探马赤军总大兵以出，京师震恐”①。苏天爵《论河南胁从诖误》② 提供的佐证说:“近因至元五年，盗起河南之境，造谋起意，不过范孟等十余辈。胁从诖误，连及赵文铎等七百人。”这些多达七百人的受到“诖误”者拟议未决，竟成了一个影响颇大的积案。这次谋反，可以说是典型的政变。——它提供了一种政变的类型。范孟一直作掾史一类的小吏，官虽不大，但熟悉整套官场运作程序。他仅以“圣旨”之名，就将一个大省原本咬合得相当紧密的政权机器整个拆散颠覆，况且“圣旨”谁也没有亲眼看到，都用不着费事伪造一个，仅说一句假话而已。以那样大的动作：几乎一茬杀光了原河南行省的主管官员，白天在省会戒严，封锁黄河渡口，截断南北交通命脉，重新任命了新的行省各级班子。他的办法是：杀光正官，以离职闲居者以及原来的下属顶替各级官员。河南那么多有识之士，没有谁怀疑这个“圣旨”，没有人敢于（或愿意）责问：那些人犯了什么罪，而他范孟又有何德何能可以一步登天，主宰一省死生？

在短命的范孟政变期间，将河南文人牵连进来不少，除归旸外一省文坛竟是“水淹七军”。

受这一事件牵连的知名度较高的文人有：

吴炳，字彦辉，又作字彦晖、颜辉。汴梁（河南开封）人。以文学知名，朝廷三聘方起，至顺二年为艺文监典簿，工诗善书，尤精篆书。范孟作乱，杀河南省官，正值吴炳家居，作乱者命其为范孟专司卯酉历，吴炳不敢辞。事后以“附逆”受到时论贬抑。实际如果真的追究责任，吴炳是连边也挨不上的——作为一个位居交通要冲的大省，根本轮不上他来制止或抗争这次意外事件。实际苏天爵的《论河南胁从诖误》就是为吴炳等受到牵连的人正名。诗存《元音》《元风雅》《文翰类选大成》《御选元诗》《宋元诗会》《石仓历代诗选》等总集，文章今存十余篇，不算少，特别是考虑到他的“失节”，这些文章居然主要是为河南各地作的碑志记序，而且大多写于范孟之乱以后。

张桢（1305—1368），字约中。汴梁（河南开封）人。元统元年进士，授彰德路录事。范孟作乱，杀了从行省平章起的要员，省会城中人心惶惶，

---

① 危素《危太朴文集》卷八《送归完使赴河西诗序》。

② 《滋溪文稿》卷二十七“章疏”。至元六年三月，才颁诏天下，“赦免”了实际并不知内情的“胁从”，但直到几年后，具体仍然有“议拟犹或未决”的问题存在。

以为大难将至。张桢时任行省掾，觉出范孟等人不大对路，连夜缒城出逃，幸免于难，因为杀了各级正官第二个梯次，就该杀他那样的人了。因此，事后也未受追究。至正元年，自河南省掾迁秘书监校书郎。历高邮县尹、中政院判，除监察御史。至正二十一年出为山南宪佥，未几，弹劾权臣误国不报，遂辞去，结茅河中安邑山区。

归旸（1305—1367），字彦温。汴梁（河南开封）人。至顺元年进士，授颍州同知。后至元五年，他刚卸颍州同知任，需次于家，正赶上范孟谋反，杀光河南行省主要官员，范孟以段辅为左丞，使归旸守黄河口，截断南北交通，归旸力拒不从，系于狱。已经决定在第二天天明时分杀之。就在这晚上，范孟败亡。范孟以吴炳司历，吴炳不敢辞。事后，附逆者均获罪，归旸独免。时人为之语曰："归旸出角，吴炳无光。"自此名誉赫然，中书平章阿乞剌甚至说："儒者亦有斯人耶？汉人亦有斯人耶？"[①] 至正五年，为河南廉访佥事。至正七年累官中书右司都事。历枢密院参议、判官，至正九年除河西廉访使，未上，改礼部尚书，迁翰林直学士兼太子赞善。此后屡次升迁，均以疾辞。倦仕之意明显。在元末战乱之中，辗转于中原各地，晚寓夏县。

段辅，字德辅。绛州稷山（今属山西）人。段思温之子，段克己之孙。由翰林应奉，出为西台御史，延祐三年由南台入为监察御史，历燕南佥宪、国子司业、太常院判，泰定间为吏部侍郎。范孟作乱时，段辅在河南廉访使任上，范孟杀原河南主政者，以段辅为河南左丞，马上又升为平章。未几事败，受到追究，权臣伯颜因此风言台臣"汉人不可为廉访使"。经历了这个跌宕，本来仕途得意的段辅再无作为。段克己与其弟成己是金遗民，人称"二妙"，并在"河汾诸老"之列，泰定年间段辅将二人作品结为《二妙集》，请吴澄作序，自己写跋语。对于段辅一生来说，除了范孟事件，就是《二妙集》了。

"风生于青萍之末"，可见当时政局的诡谲无序，官场实际上是人人自危，圣命难测，使人无所适从。在官场，任何不正常的事情随时都会发生，对此没人感到奇怪。

经历范孟事变，有人因此名誉扫地，有人因此天下扬名。与归旸有关的故事开始流行，其中一个是[②]：

河南名士归旸，行廉介，多有阴德在乡里。他亲自为园中新建的亭子打地基，无意挖出一满窖的银锭，而且每个银锭上都有原铸的四个字"天赐归

---

① 危素《危太朴文集》卷八《送归宪使赴河西诗序》。

② 《至正直记》卷四"天赐归旸"节。

旸”。他却笑而掩之，说:“焉有是理?”这时正好发生了范孟的叛乱，他只能举家逃亡。等事件平息，回到家中，发现那个窖藏被人掘挖过，但只失去了十二锭银子。复笑而掩之。后因游宦过荆阳湖，一个竹箱一直尾随他的船，舟人想打捞，重得捞不起来。归旸怕是来历不明之物，不让再捞，并用竹篙将它推走。三天后，他的船停泊在城下，那个箱子又漂流到船旁。打开箱子，还是有“天赐归旸”四字的银锭。他仍然不为所动，谁捞上来的，就算是谁的。官府将这些银锭判归归旸，他还是力辞不受。朝廷得知此事，以公库的同等数量的银子赏给归旸。


楊萬里。表字廷秀。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宋高宗朝進士。做贛音甘去聲
州司戶。到寧宗皇帝朝陞做寶謨閣學士。那時韓侂音託胄弄權。要把天
下有名人都妝在他身邊。扶同他做的事。韓侂胄曾築南園。要著楊萬里
作一篇記。許陞他官職。楊萬里說。官可退了。記不可作。韓侂胄怒。別著人
作了記。韓侂胄專權的事。日日多了。楊萬里憂怒成了病。家人知道他常
有憂國的心。吏人來報朝廷的政事。都不肯著他知道。忽有房族的一箇
兒子從外來。說韓侂胄用兵的事。楊萬里聽得啼哭。便叫家人取紙來。書
寫著道。韓侂胄姦臣專權不遵皇帝。動兵害民。要壞了社稷。我老了。要報
國無緣由。又書寫十四字別妻子。放下筆
就沒了。朝廷知道他忠。賜謚文節公。

《忠传》的“文臣”部分，仅有一则是元代故事，即范孟作乱。图中惟一的坐者，是范孟，归旸是左二那个官员。

这已经是话本小说了。古代小说的“掘藏”“寻宝”，有自己的发展过程，“天赐归旸”却如同一枝林外之树，既与树林相辉映，也将林带引向天边。元代一些社会生活的内容正是这样进入了文学家选择的视野。

可能是因为归旸的经历富有传奇色彩，元代无名氏的《忠传》（即《国朝忠传》）即以其压卷。《忠传》原本不存，今本据《永乐大典》辑出[①]。这

① 《永乐大典》卷四八五下半卷以及卷四八六，都是《忠传》的“文臣”部分。原文没有署作者名，因为保存在《永乐大典》中，又以元人归旸作为最后一篇（也是全书仅有的元人），书名又作《国朝忠传》，所以应是元人所写。其中有“元顺帝至元五年”字样，似经元明之际人修饰。通过归旸这节文字可以推测，这部书的撰写与元末战乱期间的正统取向有关。

是一种“连环画”式的通俗读物，内容“自子产至归旸止”，因为只有“文臣”，没有“武臣”，大约是一部书的半帙。“其书以流俗本马融《忠经》为主，仿宋人平话体，引史事以阐演之。每事皆有画像。前辈每谓大典录宋元平话小说甚多，馆臣抄辑遗书，以非朝旨所及，皆为录进。仅见此耳。”①

《忠传》使用的是流利的元代白话文，其“归旸”节说道：

归旸，汴梁人。元顺帝至元五年，做颍州同知。那时有杞县人范孟，做河南省掾史，好生不得志，假作朝廷使臣，黑夜里到省，将省里大官人并大衙门里的官人，都杀了。别用人管着各衙门事。那时人都不曾识得破。要着归旸守黄河，归旸不从他。贼怒，将归旸禁在牢狱中。归旸绝无怕惧的颜色。不多日，贼败了。到朝廷加做监察御史，又受赏赐。

就元代文学发展而言，从史传到评话小说，距离并不像原来预期的那样遥远。从评话到章回小说，才是真正的跨越。

黄溍作《苏御史治狱记》，可以视为史家苏天爵的“公案”。

《苏御史治狱记》（《黄金华集》卷十五）以苏天爵比做汉代决狱专家于定国，专门记述苏天爵在南台御史任上审决疑狱的事件。“治狱记”开篇即云：“至顺二年冬十有一月，赵郡苏天爵为御史南台。时方用中书奏，遣官审覆论报天下狱囚。三年，春正月，公甫就职，即分莅湖北。湖北所统地大以远，……狱事为最繁。”此后便是具体的案例。其中一个是：

州人刘文贵死，妻弟同郡朱德来省其姊，文贵养子饮以酒，数日而患腹胀。文贵次子与养子争家财，有隙，因谓德曰：“得非中虾蟆毒乎？”捣乌桕根，和酒饮之，得暴下。视之，无它毒，而病愈剧。德归，具以养子言告其母，其母以闻于官。未及逮问，而德死。录事及武陵县官来验其尸，皆以银钗探口中，色不变，定为病死。卫推官者，先以他事怒录事，欲假定验不实为其罪，更命龙阳知州聚检作中毒死，辞连三十余人，养子已诬服。公疑有冤，为访诸路人，且谕使吐实。众皆曰：“狱辞尽卫推官教我云然。”公既反其狱，并按卫推官罢之。凡此皆死狱，公所平决，未有不得其情者也。

① 见《涵芬楼秘籍》第一册《忠传跋》，孙毓修撰。

对于苏天爵，不言其《滋溪文稿》，不涉及《元文类》，专门谈他的谳狱断案，是黄溍此文的特殊之处。这些案例是当地文人周某所记录，由黄溍润色成文。除情节对公案小说有影响，行文则在细微处体现了对人的爱重。

释鲁山主持龙翔寺的祀典。

释鲁山，高昌畏吾人，以北庭（新疆吉木萨尔）为郡望。以"岳"或"儒"为汉姓。人称"岳鲁山"或"儒鲁山"（岳、儒为同音异译）。早年出家为僧，延祐四年春，与贯云石同游昌国州（浙江定海），同赋《观日行》诗，诗咏南海日出景象。元朝为祀祖考，设太禧院，又设隆祥使司，置僧官领其事。鲁山被委为其下属的平江善农提举司提举，掌承天、龙翔、崇禧三寺田赋。鲁山有诗名，与黄溍、马臻、柳贯、潘明之均有唱和。马臻曾以"鹤性负高洁，松色融古今"称誉其为人（《松鹤吟寄儒鲁山》）。有《鲁山诗集》行世，明初亡佚不存，任何元诗总集都没有选入其人其诗。

观音奴出任南台御史，与萨都剌等的唱和，主要在这一时期。

观音奴，字志能，号刚斋。色目唐兀氏；寓新州（广东新兴）。泰定四年进士，与萨都剌同年。由户部主事，出为广西宪司经历。以南台御史转知归德府，断狱有声，升都水监。卒年六十九岁。有诗名，与张翥、萨都剌、李孝光、傅若金、许有壬、黄清老等交往唱和，但作品传世不多。虞集《跋陈君章所藏观志能新乐府引》（《道园类稿》卷三十五）说："前右榜进士翰林应奉观志能，前在宪府，以刚见称，执笔史馆，以不佞为直，岂复有沈沦幽郁之逸志哉?""门人陈君章，得志能古今体乐府绝句等数十篇相示。绝句在唐时，亦乐府之流，盖从事桂宪，将委而去之之时者，是以然也。"观音奴的《新乐府》未能流传至今，在诗坛他应是萨都剌、杨维桢的呼应者。

九月。陈柏去世。

陈柏（约1279—1339），字新甫，号云峤。泗州（江苏盱眙）人。性格豪宕不羁，人称"陈颠"。他与艺妓王巧儿的恋情，颇为人知。曾任侍仪舍人、太常院太祝，受命在杭州监铸祭器，对杭州风俗人情十分喜爱。据说一次倪瓒宴请他，宴毕赠米百石，他对倪瓒说："吾在京师即熟尔名，云南士之清者，他无与比。其所以章章者，盖以米沾之也。请从今日绝交。"[1] 以此可见他的性格。陶宗仪认为他"好古有余，而治才不足"，但他又不愿居于下

[1] 《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四"陈公子"节。

僚，曾怒骂宰相。后至元五年为余姚州同知，因病就医于杭州，九月病故，死时已六十余岁。有能诗之名，认为世上没有知音。一次雪中骑牛拜宋代画家米芾墓，竟作诗说“地下有知音”。未见别集传世。《元诗选》二集录其诗8首。题为《云峤集》，应是顾嗣立辑自他书。

贾策去世。享年五十八岁。

贾策（1282—1339），字治安。钱塘（浙江杭州）人。美丰姿，学识广博，早年辟宗正府幕，至治元年，累迁绍兴西兴场盐司，至顺二年除余姚州同知，后至元四年改仁和县尹，卒于官。侨居西兴，当地有贾公墩，尝纶巾鹤氅吟啸其上。诗学唐人，并长于书画。

后至元六年庚辰（1340）

一月五日。揭傒斯作《范先生诗序》。

与范梈《杨仲弘诗序》一样，这是“四家”对自己作出的评价。《范先生诗序》（《揭文安集》卷八）说：

> 范先生者，讳梈，字德机，临江清江人也。少家贫，力学，有文章，工诗，尤好为歌行。年三十余，辞家北游，卖卜燕市，见者皆敬异之，相语曰:“此必非卖卜者也。”已而为董中丞所知，召置馆下，命诸子弟皆受学焉。由是名动京师，遂荐为左卫教授，迁翰林国史院编修官。与浦城杨载仲弘、蜀郡虞集伯生齐名，而余亦与之游。伯生尝评之曰：杨仲弘诗如百战健儿，范德机诗如唐临晋帖。以余为三日新妇，而自比汉廷老吏也。闻者皆大笑。余独谓范德机诗，以为唐临晋帖终未逼真，今故改评之曰：范德机诗如秋空行云，晴雷卷雨，纵横变化，出入无朕。又如空山道者，辟谷学仙，瘦骨崚嶒，神气自若。又如豪鹰掠野，独鹤叫群，四顾无人，一碧万里，差可仿佛耳。晚尤工篆、隶，吴兴赵文敏公曰:“范德机汉隶，我固当避之。”若其楷法，人亦罕及。其居官廉直，门下不受私谒。历佐海北、江西、闽海三宪府，三弃官养母，天下称之。尝一拜应奉翰林文字，而有闽海之命，不果行。至顺元年，年五十九卒。其诗道之传，庐陵杨中得其骨，郡人傅若金得其神，皆有盛名。其平生交友之善终始不变者，郡人熊钠也。杨中将刻其诗，命其子继文请序，

为书其始末如此。呜呼，若德机者，可谓千载士矣！杨中字伯允，傅若金字与砺，熊钠字敬舆。诗凡若干卷。

看来，揭傒斯确实如同传闻所说，对虞集就“四大家”之诗作的比定颇有微词。作为“四大家”之一，范梈是低调的一人。而《范先生诗序》《杨仲弘诗序》，都是“四家”权威的批评。

二月四日（己亥）。权臣脱脱取代伯颜，伯颜专权时代结束，其人其事并立即成为文学作品反映的内容。

秦王伯颜气焰熏天，是七朝元老。伯颜的“不倒翁”似的政治生涯与其土崩瓦解般的败亡，一再出现在诗文等作品中。流放途中，伯颜行至江西豫章驿，饮药自杀。死后，伯颜停柩在上蓝寺（一说是北塔寺或荐福寺），尸液流出户外，人皆掩鼻而过。在抄他的家时，几个月都完不了事，其中居然有数房米糠，满满一屋子的烧饼。出事之前，他曾问他家豢养的“西番师婆”畀畀自己的后事如何？畀畀回答说“当死于南人手”。所以他就要求杀尽张王李赵刘五大姓的汉人，提出了禁汉人有军器马匹，蒙古色目人殴打汉人不得还手等举措。

据《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七“讥伯颜太师”节），伯颜死后，有人题诗于馆驿之壁：

百千万锭犹嫌少，垛积金银北斗边。可惜太师无智运，不将些子到黄泉。

联系到他家中竟然有数间房子的烧饼干粮，这个讥讽真是入木三分。

在另一种文献《草木子》卷四上记载，当伯颜死后，有人以诗吊之，其中说“人臣位极更称王，欲逞聪明乱旧章”；“虎视南人如草芥，天教遗臭在南荒”。与前者相比，这首诗更具政治色彩。

在伯颜的罪状之中，枉杀郯王彻彻都、高昌王帖木儿不花是属于内部之争。当时，元曲家曹明善正在大都。他写了两首小令〔清江引〕，并大书于五门之上①：

长门柳丝千万缕，总是伤心处。行人折柔条，燕子衔芳絮，都不由

① 见《南村辍耕录》卷八“岷江绿”节。

凤城春作主。

长门柳条千万结，风起花如雪。离别重离别，攀折复攀折，苦无多旧时枝叶也。

小令写的“怨而不怒”，本来很难由此定罪，更何况在文字上，元代一向是比较不在意的。但也许就是“苦无多旧时枝叶也”犯了伯颜的忌讳[1]，伯颜竟然大怒，要左右秘密查访这是谁写的，一旦得知作者，居然下了海捕文书，“肖形捕之”。曹明善原来在山东宪吏任上，不得不潜往吴中避难，在一间僧舍藏匿了几年，直到伯颜死了才重入京师。这也许是元代最曲折的追究文字案例。

儿年后，替代伯颜的脱脱也是同一下场。实际上，脱脱还是伯颜的外甥，正是他直接导致了炙手可热的七朝元老伯颜的倒台。

伯颜败亡后，接任者想做出大的举措，标新立异，但带来的只是更大的社会问题。

据《庚申外史》：接替伯颜秉政的右丞相亦都护、左丞相脱脱奏称：“京师人烟百万，薪刍负担不便。今西山有煤炭，若都城开池河上，受金口灌注，通舟楫往来，西山之煤可坐致于城中矣。”遂起夫役，大开运河五六十里，时方炎暑，民甚苦之。其河上接金口水，西山地势高，落差太大，才流出不远，就冲坏了数里之地的河道。当地人纷纷逃离，脱脱马上又叫人将河口堵死。京师的百姓都说：“脱脱丞相开干河。”这成了十年之后贾鲁开河的预演。

刘岳申借为张翥别集作序，抒发“不遇”的寂寞。

这种情绪则反衬出“独善其身”实际是一种失败。到了七八十岁，张翥仍然愿意为朝廷所用，是来自文人的参与意识。

刘岳申《张仲举集序》（《申斋集》卷二）说：“张翥仲举，北方学者。始来江东，江东才俊皆称之。余始相见豫章，爱其疏荡有奇气，磊落多豪举，急义如饮食男女。闻上有贤者，辄以身下之。常恐其人不先己而早达，未尝见其有所不臧于人。人或有短之者，终不以为恶声，必终誉之。有不幸厄于时命，必多方拯拔之而后已。不然，如己负之。馀事为诗赋之章，极才情所至，无不输写倾竭其意欲者，使人望而知其为非仲举不能，而仲举未尝以自

---

① 实际，这个伯颜的许多作法并不像一个典型的蒙古贵戚，他的身上有着“双重”的特点。比如，有关文献证明他特别计较“文字”，此前《农田馀话》所说的与铁器一同禁止小说、戏曲，就是一例。这与马上得天下的胜利者的心态就不一致。

多。至顺壬申，余再见之江浙校艺后，仲举亦且老矣，其气充然，其中心诚好义愈益汲汲然。余方恨主文而竟失士，愧见仲举，而仲举如未尝试者，岂徒不知有得失者。日与余买船下湖，长歌痛饮，尽兴而后别。今又八年矣。书来庐陵，留滞维扬，犹江浙也。独求余序其集端。……感仲举行谊甚高，殆非今世人。故为私论其人品大概。若其诗文，故不待余而传。顾仲举自有必传者，东坡所谓'非斯文亦莫之传'也。"

六月。虞集为傅若金《使还新稿》作序。

傅若金佐尚书铁柱于元统三年（后至元元年）到安南颁历，使还，此行作品结为《使还新稿》。这是傅若金生前最后一次将作品结集。虞集作序一年后，傅若金就去世了。

虞集序作于"至正辛巳六月朔"。这篇序之前，范梈、揭傒斯都曾为傅若金的别集作过序。揭傒斯的序（"元统三年九月辛巳朔"）开篇就说："自至元建极，大德承化，天下文士，乘兴运迪往哲，稍知复古。至于诗，去故常，绝模拟，高风远韵，纯而不杂，朔南所共推而无异论者，盖得江西范德机（范梈）焉。德机没后，又得其乡傅与砺焉。德机盛矣，余每读与砺诗，风格不殊，神情俱诣，如复见德机也。"实际，范梈与"元诗四大家"都是将傅若金视为传人。而在范梈为傅若金别集作序时（天历二年），傅若金还不到三十岁。在"元诗四大家"中，三家先后为同一人的诗集写序，而且都是有极强针对性的精心之作，在文坛仅此一见。特别是虞集本年所写的序，可以视为元代诗歌流派发展过程的导言，这样高屋建瓴、言简意赅的文字，也就虞集能写得出：

> 国初，中州袭赵礼部（赵秉文）、元裕之（元好问）之遗风，宗尚眉山（苏轼）之体。至涿郡卢公（卢挚），稍变其法，始以诗名东南。宋季衰陋之气，亦已销尽。大德中文章辈出，赫然鸣其治平。集所与游者亦众，而贫寒相望。发明斯事者，则浦城杨仲弘（杨载）、江右范德机（范梈）其人也。杨之合作，吴兴赵公（赵孟頫）最先知之。而德机之高古神妙，诸君子未有不许之者。其后，马伯庸（马祖常）中丞用意深刻，思至高远，亦自成一家，观者无闲言。而进士萨天锡（萨都剌）者，最长于情，流丽清婉，作者皆爱之。而与前之诸公先后沦逝，识者然后知其不可复得也。

傅若金方及"不惑"，英年早逝。与其相仿的，是三十九岁故去的色目

曲家贯云石。

陈天锡致仕回家乡，与王荐等十人共同组织“耆英会”，优游诗酒。

陈天锡，字载之，号晋斋。福宁州（福建霞浦）人。曾任本州学正，历泉州路儒学教授、盐运提举大使。天历二年迁定海县尹，至顺初，改建阳县尹。任满，因向朝廷条陈六事，加奉议大夫，擢福清州知州。年近六旬便致仕还乡，去世时八十岁。有《鸣琴集》，未传。早年有诗名，《元诗选》三集选入其诗10首，题为《鸣琴集》。他的五个儿子陈阳至、陈阳盈、陈阳复、陈阳纯、陈阳极并有才名，都能写诗，五人有合集《棣萼诗》五卷。

年已八十一岁的宋无撰《吴逸士宋无自志》，略述生平志趣。

宋无的自叙传《吴逸士宋无自志》作于本年。

宋无（1260—?），字子虚，号翠寒道人。吴郡（江苏苏州）人。本字晞颜，南宋鼎革，自晋陵迁吴，冒朱姓，以晞颜字行。至元十八年，宋无代生病的父亲领征东万户案牍，从征日本，在征途中历尽艰难险阻，仍然不废吟咏。回到家乡后，家居奉亲不复出仕。晚年曾出为馆师。《吴逸士宋无自志》中，自称“乙亥世变，旧业俱废”，“以微吟自怡”。卒年不详。有诗集《翠寒集》《啽呓集》各一卷（明刊本《翠寒集》析作三卷）。另外《鲸背吟》署朱晞颜作，此朱晞颜是否是宋无，论者意见不一。宋无是元代诗坛力主宗晚唐的诗人，他的古诗显然受到李贺影响，历来受诗选家及诗评家重视，并被视为元代文坛有代表性的诗人之一。

民间普及读物《增修诗学集成押韵渊海》序刊。

《增修诗学集成押韵渊海》二十卷，卷帙少于至正九年编刊《联新事备诗学大成》（三十卷），篇幅则倍之，是今存容量最大的诗学书籍，署“建安后学严毅子仁编辑”，卷首有“至元庚辰张复序”。今存后至元六年蔡氏梅轩刊本。全书按韵部分类，以单字为题，每字之下，分有〔事类〕〔诗料〕两部分内容，此外还包括〔活套〕〔体字〕两门。其内容的细密周详，足以反映出当时做诗在社会生活之中已经无所不至。这本书的另一个版本叫做《新编诗学集成押韵渊海》，可见印刷过不止一次。编撰者与序作者，均无时名。严毅，事迹不详；张复，仅在《清溪诗集》中有几首诗。

两浙（特别是金华）学术与文学传承过程中有特殊地位的吴莱去世。享年四十四岁。

吴莱（1297—1340），字立夫，号深裒山道人。浦江（今属浙江）人。自幼由母亲亲授经书。稍长从学于方凤，方凤妻以孙女。其表兄弟的父亲吴幼敏家富藏书，吴莱尽读之。延祐七年以《春秋》领乡荐，但因“论议不合于礼官”未中举，退归田里，出游昌国，登南海补陀山的盘陀石，著《观日赋》以明志。后寓居于同县陈士贞家，潜心著述，四方学子多慕名前往就教。监察御史许克学行部浙东，以茂才荐署饶州路张芗书院山长，未赴任，病故于家。吴莱终生未仕，死后由门人私谥渊颖先生，后更谥贞文。吴莱与黄溍、柳贯皆出于方凤之门，又再传于宋濂，是承前启后的大儒。其诗受诗评家重视，清人王士禛《论诗绝句》说：“铁崖乐府气淋漓，渊颖歌行格尽奇。耳食纷纷说开宝，几人眼见宋元诗。”（第十六首）王士禛还提到“吴立夫长句瑰玮有奇气”（《选古诗凡例》）。有《渊颖集》十二卷，系门人宋濂编，今存。另有《三朝野史》一卷、《南海古迹记》一卷、《游甬东山水古迹记》一卷。著有多种阐述经义的著作，如《尚书标说》《春秋世变图》《春秋传授谱》等，均未传。

至正元年辛巳（1341）

五月二十四日。陆行直为怀念友人张炎，作《碧梧苍石图》，并写〔清平乐〕一阕[1]。

延祐六年，陆行直特为阐发张炎论词要旨，作《词旨》一文。本年，他已经六十多岁，为怀念故去的友人，他在自己二十一年前画的《碧梧苍石图》上题〔清平乐〕词志感。题记中，引称张炎当年赠给自己的〔清平乐〕：“候虫凄断，人语西风岸。月落沙平流水慢，惊见芦花来雁。　可怜瘦损兰成，多情因为卿卿。只有一枝梧叶，不知多少秋声。”然后说：“此友人张叔夏赠余之作也。余不能记忆。于至治元年仲夏二十四日，戏作《碧梧苍石》，与冶仙西窗夜坐，因语及此。转瞬二十一载，今卿卿、叔夏皆成故人，恍然如隔世。遂书于卷首，以记一时之感慨云。”

八月。江浙行省乡试，钱惟善因作《罗刹江赋》而出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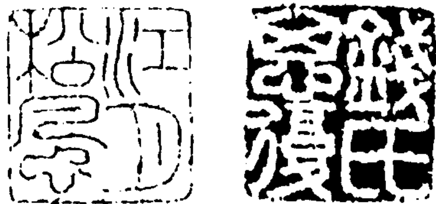
这是元统元年中止科举以来首次恢复乡试，与试者竟然多达3000人，可

---

[1] 明汪砢玉《珊瑚网》卷八。

见竞争之激烈。至正年间江浙乡试总是出现问题，也与录取比例太小有关。

钱惟善，字思复，号曲江居士，又号白心道人。钱塘（浙江杭州）人。早年有诗名，元世祖至元年间，年仅十几岁，就挟诗卷请见正在江浙行省任职的李衎，受到礼遇。成年后，刻意为诗，至治、泰定年间活跃于江南文坛，曾与贯云石、曹鉴、刘致等人唱和往还。元代后期，与杨维桢交往密切。至正元年省试，试题为《罗刹江赋》，与试者仅钱惟善据枚乘《七发》考出钱塘之曲江，即罗刹江，考官得卷大喜，置名于前列。因此，钱惟善就建了曲江草堂，晚年以其为号。此后，任江浙行省儒学副提举。张士诚占据吴江，退隐于江笥川，又移居华亭。明洪武十二年（1379）尚在世。有《江月松风集》十二卷，今存。



钱惟善用过的印章。

汪泽民与张师愚合编宋元徽州一郡之诗，成《宛陵群英集》。

《宛陵群英集》是元代郡邑总集之中篇幅较大的一种，共二十八卷，存诗1393首。但原本没有流传至今，今本是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辑出，只有129人的746首诗，编为十二卷，大致相当原本的二分之一。

张师愚，字仲愚，一字仲渊。宣城宁国（今属安徽）人。与其弟张师鲁并称“二张”，皆好学工诗，尝从汪泽民游，汪泽民视为平生畏友。延祐、天历两次领乡荐。

归老家山的虞集见到旧友杨景行，两人又谈起当年的往事以及所作的诗篇，颇为欢洽，虞集为其作《杨贤可诗序》[1]。

杨景行（1277—1347），字贤可。太和（今属江西）人。延祐二年首科进士。与虞集重逢时刚卸任宜黄县尹，在《抚州路总管府推官庭壁题名记》（《道园类稿》卷二十六）中，虞集说杨景行在宜黄“戢强暴，锄奸黠，抑兼并，以佑善良”。赴任抚州路推官之后，行县稍有闲暇时，必过虞集家。与虞集位居清要截然不同，杨景行进入仕途一直沉抑下僚，处理日常政务占据了他太多的时间与精力。相见时，杨景行给虞集的印象是：“苍颜映照，有忧

---

[1] 见《道园学古录》卷三十三。本文未署年月，但虞集《抚州路总管府推官庭壁题名记》是作于至正元年闰五月。

深思远之意。”原来杨景行也以诗文知名，一次，杨景行特意携带自己的诗稿，请虞集品评。虞集提到当年听近臣说过，首科时元仁宗曾表示：“进士中，得一范仲淹，亦足副吾意。”以安慰杨景行。虞集又说：“首科最为得人。御史中丞马伯庸、侍御史张梦臣、侍讲欧阳原功，与诸君子皆赫然有称于当世。吾贤可所居位虽差若未及，然治县佐郡，实有以及人所至未易及也。追踪数贤，岂晚乎哉？”

虞集毕竟非同常人，他也许是有了预感：除这篇《杨贤可诗序》，杨景行在文学史上就没有留下轨迹。他一首诗也没有流传至今。

刘贞编辑《新刊类编三场文选》成书。

《新刊类编三场文选》是一部篇幅多达数十卷，分为若干集的范文选本。凡科举用得上的文体：诗、赋、论、表章等都包含在内。由福建建安余氏勤德堂刊刻。这是科举停顿八年，开始恢复运作的直接产物。从元统元年以来，科举停顿了三科，想必在文人中间波及面相当广泛。后至元六年下诏，改元至正，并恢复科举，立即调动起全国文人的注意力。同时《新刊类编三场文选》立即抢占了图书市场。

通过为刘诜《桂隐存稿》写序，虞集对元文与元代士风作了精辟概述。

虞集通过《庐陵刘桂隐存稿序》（《道园学古录》卷三十三）说：“国朝广大，旷古未有。起而乘其雄浑之气以为文者，则有姚文公其人。其为言不尽同于古人，而伉健雄伟，何可及也。继而作者，岂不瞠然其后矣乎？当是时，南方新附，江乡之间，逢掖缙绅之士，以其抱负之非常，幽远而未见知，则折其奇杰之气，以为高深危险之语。视彼靡靡混混，则有间矣。然不平之鸣，能不感愤于学者乎？而一二十年，向之闻风而仿效，亦渐休息。延祐科举之兴，表表应时而出者，岂乏其人，然亦循习成弊。至于骤废骤复者，则亦有以致之者然与？于是执笔者，肤浅则无所明于理，蹇涩则无所昌其辞，徇流俗者而不知去其陈腐，强自高者惟旁窃于异端。斯文斯道，所以可为长太息者，尝在于此也。”作为一篇集序，这里所说的有些跑题，但虞集正是在借题发挥，寄语学子不要为时兴时废的科举所制约。

李显卿以父荫任钱谷官，由台州经庆元与钟嗣成相会。

李显卿，东平（今属山东）人[1]。父为江浙掾史，因居杭州。自幼粗涉

---

[1] 钟嗣成早年的友人（玩伴）多是山东东平人。除李显卿，还有陈无妄、赵良弼等。

书史，酷嗜隐语，作〔赚煞〕多达400篇，为乐林称是。

兀颜思忠出任南台御史。

兀颜思忠，字子中。女真族，居东平（今属山东）。历官总管、湖南宪佥、淮西廉访副使、浙西廉访使。在吴中，曾预玉山草堂觞咏之会，与王逢、朱德润游。诗文均有时名。

李齐贤任集庆路学官。

李齐贤，青州（山东益都）人。《录鬼簿》列名于“已死才人不相知者”节。李齐贤寓居钱塘（浙江杭州）时，与钟嗣成是同窗学友。与张雨、陈樵等交往唱和。《皇元风雅》后集卷一录李齐贤诗一首，钟嗣成说李齐贤有乐府传播，但今未传。按：元代另有一李齐贤，高丽人，有《益斋乱稿》十卷。

瞿智荐任青龙镇学教谕。

瞿智，名又作瞿荣智，字睿夫（或作慧夫）。祖籍嘉定（今属上海），迁居昆山（江苏太仓）。与其兄瞿信齐名，时称“二瞿”。瞿智好学能诗，通《易经》，至正初，授青龙镇学教谕，迁镇江路学录。后摄绍兴府录判，不久就弃职而去。他以书法笔锋勾勒兰花，成为文人画一体。寓居华亭时，在宅邸中建通波阁。与黄溍、张雨、成廷珪、顾瑛等时有唱和。《草堂雅集》有其诗11首，顾瑛在其小传中指出：自已虽与瞿智交游，“而得其诗不多”。《元诗选》三集选入瞿智诗19首，题为《睿夫集》，系顾嗣立所辑。

释行端去世。享年八十七岁。

释行端（1255—1341），字景元，又字元叟。临海（今属浙江）人。俗姓何。出身书香门第，十一岁于杭州化城院出家。大德四年住持湖州资福寺，历主杭州中天竺、灵隐诸寺院。至大年间，特旨赐号“慧文正辩”。延祐间，奉旨设水陆大会于金山，并升坐说法，会后入觐，加赐“佛日普照”之号。泰定间，降旨命主径山，作大护持长达二十年。行端为文精绝古雅，曾作《拟寒山子》诗，四方僧众多传诵之，自视为寒山、拾得后继者，并以“寒拾里人”为号。《元诗选》二集选录其诗27首，题为《寒拾里人稿》。

孔学诗去世。享年八十二岁。

孔学诗（1260—1341），字文卿，号性斋。溧阳（今属江苏）人。南宋德祐元年（1275），元兵至溧阳，孔学诗年仅十六岁，乃赞其父率众诣元军

门，乡井赖之以完。元将欲官之，辞归，家居行善，勤于赈施。著杂剧《地藏王证东窗事犯》，今存。《太和正音谱》列名于俱是杰作一百五十人中。

韩性去世。享年七十六岁。

韩性（1266—1341），字明善。祖籍安阳（今属河南），后徙绍兴（今属浙江）。宋名臣韩琦后裔。博览群籍，尤长性理之说，在家乡享有清誉，连童稚仆役都称他“韩先生”。受业其门的四方学子接踵而至，前辈遗老如王应麟、戴表元折辈行与其交往。与同道优游乡里，不求仕进。延祐中曾荐为慈湖书院山长，他接受聘请，却不赴职。天历年间，赵世延曾举荐韩性。十年后，门人李齐出任南台御史，再次举荐，但韩性已经去世。赐谥“庄节先生”。他的弟子如王本中（西台御史中丞）、月鲁不花（南台御史中丞）等在元代后期颇有影响。所著《礼记说》四卷、《诗释音》一卷、《书辨疑》一卷、《绍兴府志》八卷，均佚。别集《五云漫稿》十二卷，清初尚在，今无传本。

王都中去世。享年六十四岁。

王都中（1278—1341），字元俞，号本斋。祖籍福宁州（福建霞浦），寓于吴县（江苏苏州）。父亲降元后出使日本，遇害于海上，元世祖念其功，十七岁时授王都中平江路总管府治中。秩满，除浙东道宣慰副使，为政清明。元武宗行铜钱，以王都中有通才，除江浙泉货监。改郴州路总管，在任大治学舍，变易风俗。迁饶州路总管，擢海北海南道肃政廉访使，迁福建道宣慰使都元帅，又改浙东道都元帅。天历初，被省檄整点七路军马，迁广东道都元帅。元统初，任两淮都转运盐使，又拜河南行省参政，赴任道中以疾南归，即其家拜江浙行省参政。卒。谥清献。王都中历仕要职四十余年，三次易镇，皆有政声。幼年曾执弟子礼于许衡之门，中年后致力于学。有诗集三卷，今佚。《元诗选》三集收王都中诗23首，题为《本斋集》，主要是纪游之作。其子王畛、王畦均能诗，《元诗选》三集附二人诗于《本斋集》之后。

至正二年壬午（1342）

正月。黄溍为去年去世的王都中撰写了墓志铭。

《正奉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王公墓志铭》（《黄金华集》卷三十一），长达五六千字，是碑传中的“长篇”，不仅篇幅较长，内容详实具

体，文字严谨，极具感染力。传主"勤政爱民"的形象相当鲜明。

三月七日。廷试录取两榜状元为拜住、陈祖仁。

本届录取进士共78人。其中有胡天游、答禄与权、傅亨、卢琦等。这是自元统元年之后，停止又恢复的第一届科举。

胡天游，原名胡乘龙，字天游，以字行，号傲轩，又号松竹主人。岳州平江（今属湖南）人。七岁能吟诗，逢元末乱世，隐居不出。至正十二年战乱波及乡里，村舍皆成丘墟，只有他的住宅岿然无恙，因此自号傲轩氏。死于至正年间，死后诗稿散乱，后人补辑残丛，编为《傲轩吟稿》一卷，流传至今。

答禄与权，字道夫。色目乃蛮氏。"答禄"，是乃蛮首部，家族出自与成吉思汗对立的太阳汗。答禄与权是华化西域人在元明之间的桥梁。

韦珪《梅花百咏》成编。

咏梅风行是南宋江湖诗派的特点。"梅花百咏"在元朝成为诗坛集咏的重要题材。韦珪之作，是已知的最后一种元人"百咏"梅花诗。

韦珪，字德圭。号梅庭主人。山阴（浙江绍兴）人。早年以诗鸣其乡，有嗜梅之癖，自署读书处"梅雪窝"。至正二年宪使李仲山按治姑苏，命韦珪赋咏梅诗26首，又补充成100首，名为《梅花百咏》（即《梅吟百题》）。又以梅花未入《楚辞》，并作《补骚》一篇，附于《梅花百咏》后。曾参与杨维桢的集咏"西湖竹枝词"，韦珪所作，被杨维桢称为"语意俱新，可称作者"（《西湖竹枝集》）。顾瑛有《韦德圭携诗见访次韵以复》（《玉山璞稿》卷二），可知至正十五年尚在世。

夏。许有壬为苏天爵作《送苏伯修赴湖广参政序》。

在序中，许有壬对当时盛行的"分题赠行"诗作了概括。许有壬认为，送行分题赋诗，可以归属于《诗》的"六艺"的"兴"。在元代，特别是后期，诗歌成了社会活动的"黏合剂"，举凡送往迎来、婚丧嫁娶，几乎一切会集都可以归结到诗。

《送苏伯修赴湖广参政序》（《至正集》卷三十四）说："至元庚辰冬，赵郡苏君伯修由吏部尚书，擢西台治书侍御史，士大夫分题赋诗以饯，俄参议中书，乃汇其诗属余序而未暇。至正壬午夏，拜湖广行省参知政事，士大夫又分题赋诗以饯。……后世分题之作，其'兴'之支流余裔乎？唐以来，是体昉见。我元诗气近岁号盛，是体大行，每见于赠别。凡历涉封部、山川楼阁、略著闻见者，靡不搜举。兴未有尽，又从而旁罗泛及，以致其极焉。

……则分题托兴之作，其亦不可少者欤。”

七月一日（朔）。江浙大地震，杨维桢写《地震谣》以其纪实。

除《地震谣》，杨维桢的同类作品还有《苦雨谣》《沙堤行》《大风谣》《白雪辞》《箕斗歌》《盐车重》《盐商行》等，都是“新乐府”。——在至正初，以《地震谣》为标志杨维桢的风格出现了明显转变。

《地震谣》（《铁崖古乐府》卷五）诗云：

壬午七月朔，地震如雷，民屋杌陧。土出毛如白丝。纪诗一章，章十三句。

四月一日南省火，七月一日南地震。地积大块作方载，岂有坏崩如杞人。如何一震白毛茁，泰山动摇海水泄。便恐昆仑八柱折，赤子啾啾忧地裂。唐尧天子居上头，贤相柱天如不周。保国如瓯驭民如舟，吁嗟赤子汝何忧。

在这之前，杨维桢的“强项”是“乐府古题”《将进酒》《公无渡河》等，这些作品往往成了足以乱真的“高仿”“假古董”。然后，便是《西湖竹枝词》一类的“小乐府”，直到以“新乐府”行世。这几个阶段都经历过后，他就是当之无愧的文坛泰斗了——用什么方式写已经无关紧要。

七月。西域拂郎国献“天马”，耸动朝野，并成为文坛大事。

拂林，又译为拂郎、佛郎、拂林、苐林。有的文献中说，“进贡”的天马有五匹[①]，但更多的文献则说是一匹纯黑的马。时人为其所作诗、赋、文章不计其数，特别是当时的馆阁文臣几乎都有作品，“咏天马”成了至正初期文坛的一件大事。

吴师道《天马赞》序（《吴礼部集》卷十一）说：

至正二年秋七月，上在滦京。拂郎国来献马，长丈一尺有三寸，昂首复增三之一焉。身纯黑，后二蹄白，食刍粟倍常，间以肉湩。奇伟骁骏，真神物也。拂郎在西海之西，去京师数万里，凡七度巨洋，历四年乃至。上御慈仁殿受之，后月乘以归燕。既敕画工为图，仍命词臣赞之。

① 杨维桢《铁崖诗集》辛集《盛子昭五马图》云：“五马新来佛郎国”，“只今五匹传画师”。

欧阳玄为之作《天马颂》（《圭斋集》卷一），《天马颂》诗序具体说，元顺帝接受天马的时间是“至正二年壬子七月十八日丁亥”。二十一日，敕周郎[1]“貌以为图”，两天后，天马图进呈御览。翰林学士㚻㚻传旨，命揭傒斯作赞。当时“待诏上方”的画家张彦辅等也都设法到“天厩”（天子的御马圈）观摩“天马”并为其作画。张彦辅是“国人”（蒙古人），他画的《拂郎马图》后来由玉山草堂主人顾瑛收藏[2]。周伯琦则“应制”作有《天马行》（《近光集》卷二）。

朱德润写过一篇题为《异域说》[3]的散文。那是因为他在至正七年见到了曾出任宿卫近侍的岳忽难等人，听说了关于西域拂郎国的情况：延祐年间拂郎国就曾遣使来朝，他们的国家远在日没之处，土地广袤，有七十二位酋长……。同时，岳忽难也谈起至正二年献“天马”的经过：来使跨越了四个年头才到达乞失密地方，从乞失密七次渡过江海，终于抵达京师……。江南民间对拂郎等极远的异域，充满好奇。

以咏天马知名的，还有陆仁。

陆仁，字良贵，号樵雪生。河南人，寓居昆山（江苏太仓）。为人沉静简默，明经好古，诗文不苟作。与郭翼、吕诚唱和，并受到馆阁名公推重，称他为“陆河南”，是顾瑛玉山草堂常客，不求仕进，优游诗酒，似乎家境丰饶。居室题为“乾乾之斋”，并自号“乾乾居士”。杨维桢很器重陆仁，认为他诗学有祖法，清俊奇伟。他的《天马歌》咏至正二年秋拂郎“贡”马之事，是当时较有影响的作品。

杨维桢《丽则遗音》四卷序刊。

《丽则遗音》副标题为“古赋程序”，收入赋32篇，都是杨维桢自己在早年应举时“私拟程序之作”。

这些赋不是杨维桢的得意之作，但影响颇大。元代科举在至正初年又再次恢复，科举的内容之一——作“命题”赋，成了文人普遍关注的文体。这部《丽则遗音》是杨维桢的门人陈存礼编集，并请杨维桢的同年黄清老作的评语。杨维桢自己说这“不过应场屋一日之敌”。但这类作品在当时不胫而走，只不过罕见流传至今而已[4]。仅存的《丽则遗音》是附刊在《荆山璞稿》之后。而《荆山璞稿》的全名是《乙亥科湖广乡试荆山璞稿》，其内容只有

---

[1] 原文是“周郎”，应指周朗。周朗，字伯高，号冰壶。

[2] 陈基《夷白斋稿》外集《跋张彦辅画拂郎马图》。

[3] 《存复斋集》卷五。

[4] 今天能见的，除《荆山璞稿》，还有《延祐甲寅科江西乡试录》。

5 篇赋，不到《丽则遗音》五分之一。乙亥，是后至元元年。在乡试过后，殿试就暂停了，一直到至正二年才恢复。

门人为释惟则①于吴城东北隅买地，修建名为“师子林”的居室。

师子林落成后，成了至正年间玉山草堂之外的吴中文人聚会之所，活动一直延续到明初，倪瓒、徐贲等人都画有《师子林图》。





《师子林八景》中的二景：师子峰、含晖峰。这「八景」依据的底图，应该就是徐贲画的。所谓「师子峰」是一具假山；「含晖峰」则是远眺。

释惟则（约 1280—1350），字天如。永新（今属江西）人。俗姓谭。得法于明本（中峰）。延祐、至治年间，他与西域人、元曲家贯云石、阿里西瑛优游唱和于杭州。至正二年，门人于吴城东北隅买地为他修建方丈，种竹万株，并广求怪石，以轩堂亭阁冠绝一时。因为明本倡道于天目山师子岩，惟则把这一园林名为“师子林”，以示不忘恩师。至正间又与倪瓒、高启等名士聚会于师子林。诗文结集为《师子林别录》九卷，由李祁与翰林学士远

① 惟则，一些文献称为维则。

者图作序以传。明代释子道恂编集《师子林纪胜集》二卷[①]，收入元明人对师子林与惟则的投赠题咏之作。

王士熙出任南台中丞。与维扬名妓李芝仪交往在此期间。

《青楼集》云：

> 李芝仪，维扬名妓也。工小唱，尤善慢词。王继学中丞甚爱之，赠以诗序。余记其一联云："善和坊里，骅骝诐出绣鞍来；钱塘江边，燕子衔将春色去。"又有〔塞鸿秋〕四阕，至今歌馆尤传之。乔梦符亦赠以诗词甚富。女童童，兼杂剧。间来松江，后归维扬。次女多娇，尤聪慧，今留京口。

李芝仪与乔吉于也有交往。乔吉至正五年卒于太原。

刘闻在丁忧后起复为翰林编修。

刘闻，字文廷（或作文霆）。安福（今属江西）人。早年通《春秋》，受知于欧阳玄。至顺元年登进士第，调任临江录事，有政绩。入为国子助教，迁太常博士。至正元年，母亲去世，就任吉安州儒学提举。至正二年起复，参修《宋史》，《宋史》告成，进翰林修撰，出为沔阳知府。有《容窗集》十卷以及《春秋通旨》等，未见传本。

杨益出任江西抚州路总管。

杨益，字友直，号随翁。洛阳（今属河南）人。早年辟江西宪司掾，历南台御史、广西宪司经历，入为刑部主事，迁护圣营缮司大使，除户部员外郎。至正初出守临川，虞集正归隐林下，为目疾困扰。两人交往密切，官至南雄路总管。书法以汉隶知名。至正前后与薛昂夫、胡助、欧阳玄等唱和。

柳贯去世。享年七十三岁。

柳贯（1270—1342），字道传，号乌蜀山人。浦江（今属浙江）人。早年受经于同郡金履祥，学文于同里方凤。又出游杭州，遍访宿儒遗老，与方回、仇远、戴表元、胡长孺等游。荐为江山县学教谕，又任昌国州学正。赴

---

① 清咸丰七年活字印本《师子林纪胜集》二卷，并附补遗一卷，图一卷，续集三卷等，是本集较好的版本。元人朱德润、倪瓒等都绘制过《师子林图》，元明之际人徐贲则画有"师子林十二景"的图册。

京候选，达官贵人皆奇其才，特授湖广等处儒学副提举，未上任改国子助教，由助教迁博士，前后受业弟子千余人。延祐三年以文林郎出任江西等处儒学提举，兴办郡学，规复为僧道寺观所侵占学田，颇有作为于当地。秩满告归，隐居于浦江乌蜀山，以山人自号。至正元年起为翰林待制，次年病故于任。门人私谥文肃。柳贯博学多识，作文沉郁从容，人多传诵。与黄溍、虞集、揭傒斯齐名，人称为“儒林四杰”。今存《柳待制文集》二十卷，为门人宋濂、戴良编辑；所著《打枣谱》一卷、《王魁传》一卷、《金凤钗记》一卷，亦存，后两种系小说。另有《字系》二卷、《近思录广辑》三卷、《金石竹帛遗文》十卷，今均未见。

陈旅去世。享年五十六岁。

陈旅（1287—1342），字众仲。兴化莆田（今属福建）人。先世素以儒学见称，幼孤，笃志于学。早年负笈至温陵，从乡先生傅古直游。荐为闽海儒学官，御史中丞马祖常一见以“子，馆阁器也”相期许，勉励陈旅北游京师。虞集见到陈旅的文章，“慨然叹曰：‘此所谓我老将休，付子斯文者矣。’即延至馆中，朝夕以道义学问相讲习，自谓得旅之助为多。”（《元史》本传）士林交口称誉。中书平章赵世延力荐，除国子助教。三年任满，学生不忍其去，请于朝，得连任。元统二年出为江浙儒学副提举，后至元四年入为翰林应奉，至正元年迁国子监丞。陈旅为文，典雅峻洁，必期合于古作。平生相当重视师友情谊，深以虞集为知己，虞集告老还乡，曾冲冒炎暑，不远千里访虞集于临川。陈旅是元中期活跃的诗文家，苏天爵编《元文类》(《国朝文类》)，即请陈旅写序。有《安雅堂集》（别本题《陈众仲文集》）十三卷，今存。

傅若金去世。年仅四十岁。

傅若金（1303—1342），字与砺，初字汝砺。新喻（江西新余）人。自幼工诗，常出语惊人。二十岁出游湖南，宣慰使阿荣请他住到家中，待如上宾，宾主吟咏不辍。荐为岳麓书院直学，不久弃职而去。至顺三年携诗篇北游京师，数月间公卿大夫皆知其名，虞集、宋褧以异材推荐给朝廷。元顺帝即位，以傅若金为参佐出使安南，出使归来，授广州路儒学教授。正在兴办学校，恢复学田，却暴病而死。傅若金精通《毛诗》，学诗喜读汉魏盛唐之作。早年家贫，织席为生。受知于同郡范梈，曾向他学习作诗之法。他的文章，由其弟傅若川编为《傅与砺文集》十一卷，今存。他的诗，曾有《初稿》《南征稿》《使还新稿》《牛铎音》等集，死后也由傅若川重编刊印，并总名《清江集》（即《傅与砺诗集》）八卷。他的妻子孙淑（字惠兰）也有

诗名，有遗作《绿窗遗稿》，附刊于《傅与砺诗集》之末。清人王士禛《居易录》评傅若金诗，说歌行得老杜（杜甫）一鳞片甲，七律亦有格调。

虞集为其《使还新稿》写的序不足六百字，是情文并茂的元人诗论。最后一段虞集回顾道："傅君与砺始以布衣至京师，数日之间，词章传诵，名胜之士无不倒屣而迎，以为上客，台省馆阁以文名者，称之无异辞。……与砺自交趾使还，以家贫亲老，授南海文学以归。嗟夫！上林千树，岂无一枝以栖朝阳之羽哉！而一官岭海之不厌何也？"

至正三年癸未（1343）

三月。诏修辽、金、宋三朝史。

据《元史·顺帝本纪》："是月，诏修辽、金、宋三史，以中书右丞相脱脱为都总裁官，中书平章政事铁木儿塔识、中书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张起岩、翰林学士欧阳玄、侍御史吕思诚、翰林侍讲学士揭傒斯为总裁官。"诏书一下，新一轮"正统之辨"又开始了。其高潮是杨维桢上《正统辨》。从金元之际的杨奂《正统八例总序》（《元文类》三十二卷）到修端《辨辽宋金正统》（《元文类》卷四十五），再到集大成的杨维桢《正统辨》，所谓的"正统"问题一直在元人心目中占据超大的空间。而《三国志》留下的后遗症——魏是否具有正统地位，始终徘徊在其间，直到《三国志演义》问世。

元廷徵召隐士时，潘音也在其中，但他坚辞不赴。

在隐士之中潘音颇具代表性：他并无反元的举止言论，但坚决不接受宋元替代的现实，直到元至正初。

潘音（1270—1355），字声甫。新昌（今属浙江）人。十岁时，听到宋将张世杰在厓山全军覆灭，宋帝投海，曾数日昏迷绝食。入元，绝意仕进，衣服礼制，仍从南宋之规，以胜国遗民自视。早年曾以野菜为食，后来躬耕世田十余亩，自食其力。筑室南洲山中，题居室为"待清轩"。或劝他居家著述，他说：四书五经"先儒所言备矣，吾何以注脚为"？闲居时，常以诗歌表达悲愤慷慨之志。至正三年，诏徵天下遗逸，廉访使曾敦促他应征，固辞不行。死于至正十五年，享年八十六岁。经元末战乱，遗作大多散佚。明嘉靖年间，七世孙潘日升搜辑其遗稿及《读书录》，一并刊行，名为《待清轩遗稿》。清康熙年间，顾嗣立依《待清轩遗稿》二卷，在《元诗选》初集

选潘音诗16首。但乾隆时修《四库全书》，《待清轩遗稿》已不见传本。

松江人俞俊因一篇旧作〔清平乐〕词的手稿，几乎兴起大狱①。

俞俊的“词案”与至元年间梁栋“诗案”，可以并称元代前期、后期文坛两大重要事件。这件事过程复杂且又相当情绪化，对于认识元代社会心态与元代的文化政策，都有典型意义。

俞俊，字子俊，号云东。华亭（上海市）人。俞庸之子，历镇江路蒙古字学正，丽水巡检，调平江路判官。大约因为他通蒙古文，所以取了蒙古族妻子。如果说在至正初年他只是一介书生，又为朋友告发，还有人为他不平，到张士诚占据吴中后他整个成了无行文人，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八“醋钵儿”节），在张士诚时期，俞俊以贿赂得署华亭县尹，为政酷苛，使得邑民恨之。早年从顾瑮游，负气傲物，在秦王伯颜当政时，也就是在后至元六年之前，他写了一首〔清平乐〕，这首词云：

> 君恩如草，秋至还枯槁。落落残星犹弄晓，豪杰消磨尽了。　放开湖海襟怀，休教鸥鹭惊猜。我是江南倦客，等闲容易安排。

手稿保存在友人叶起之处，后来两人交恶，却被叶起之以词稿为证据向当局告发，说俞俊指斥君王，必欲置俞俊死地。可如果这样的作品都犯了忌讳，那文人除了《上梁文》一类就没有东西可写。与梁栋诗相比，这首词更雅化。通过俞俊的诗词作品，总觉得他是比较真诚的人，但时论对他则相当不利。想必他与梁栋都是待人刻薄而不得人心的人，这两件事可以类比处还有：关心它的（或说拿它当作问题的），都是曾和他们关系密切的汉族文人。俞俊竟得以幸免，据说是以大代价打通关节才没有锻炼成狱。俞俊有诗文名，明人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六，论列了五十首元人七律，以为“皆全篇整丽，首尾匀和。第深造难言，大观未极”，其中就有俞俊《楚州夜泊》。赖良《大雅集》收录俞俊诗六首，这些诗一再选入元诗总集。《叹息》（《大雅集》卷五）诗道：“百年同转烛，五十始知非。老病侵腰膂，浮名苦羁羁。闲门罗可设，今雨客还稀。空羡茅堂燕，翩翩傍母飞。”亦颇凄凉，难道这是他对〔清平乐〕词案的反省或腹诽。

至正年间，文人荟萃的苏松杭地区两个为时论不齿的文人，是吴克恭与

① 俞俊〔清平乐〕词案，未见发生的准确年月。但因为说是在伯颜当权时写的词，以后为友人拿做把柄，应该是至正元年至五年的事，暂系于此。为叶起之告发，可以肯定是发生在江南动乱（至正十一年）之前，否则也就构不成问题了。

"出贵胄而贫，贫而有操。不妄请谒于人"[1]。对访客，杜本曾危言耸听地说："天下不久当筑城，筑城后自此多事。南人多得大官，但恐得官时'五更鸡叫天将明'——无多时光也。"

世人心目之中，杜本是得朝野大名的隐士，但他的为人与隐士身份并不相符。关于他，总是伴随有争议，而争议却总能使他得到更大的名声。当时见过杜本的孔齐在《至正直记》(卷四"平江筑城"节)中附带论及杜本说："杜公，临江人，寓武夷。善阴阳术数之学，长于天文地理，但心术未正，弄黄白左道，识者鄙之。尤好博古，能篆隶。予尝从其问地理法。"作为诗人，他的一卷《清江碧嶂集》，甚至那部著名的《谷音》，无一不是有争议的。

张翥为陈镒《午溪集》作序。

陈镒，字伯铢。丽水（今属浙江）人。他生逢元代盛世，但不拘牵于仕禄，游学乡里，以能诗知名于时。曾将居室题为"绿猗堂"。师从张翥，又受学于外舅周权。后任松阳教授，因曾建宅邸于午溪之上，于是就将自己的诗集题名《午溪集》。《午溪集》十卷，传本较少见。

冯思温出任南台侍御史。

冯思温，字公厉（一作公励），号东麓。阳曲（山西太原）人。由监察御史出守彰德，入为刑部侍郎，历右司郎中、中书参议，拜江浙行省参政，至正五年从南台任上入为御史中丞，加集贤学士，封晋国公。致仕，归太原，卒。诗文均有时名，但罕见流传。按：冯思温之名，《元诗选癸集》丁集误作马思温，《元人传记资料索引》沿其误；〔成化〕《山西通志》卷九、〔万历〕《太原府志》卷二十等又误作冯温。

李好文累官太常院同知。

李好文，字惟中。大名东明（今属山东）人。至治元年进士，以治书侍御史与修辽、金、宋三朝史，史成，出为西台治书。至正六年除翰林侍讲，迁太常院使。元顺帝开端本堂，以李好文兼太子谕德。升翰林学士承旨，致仕。在西台御史任上，著《长安图志》三卷。

王士熙升南台中丞。不久死在任上。

王士熙，字继学。东平（今属山东）人。王构长子。至治初，为翰林待

---

[1] 《西湖竹枝集》燕不花小传语。

制，至治三年为右司员外郎，曾奉旨到国子监勉励学生。泰定间，为治书侍御史，泰定四年任中书参政。泰定帝死后，在皇位继承权的斗争中失败，系于狱，元文宗即位，被抄家并流放到边远州郡。天历二年十月，自贬所被放还乡里，至顺三年六月，免罪录用。元顺帝即位，起用王士熙为江东廉访使，后至元二年，迁南台侍御史。至正二年升南台中丞。卒于任，追封赵国公。他师从邓文原，博学工文，文坛名声颇大。诗以乐府歌行见长，至治、泰定年间，与袁桷、马祖常、虞集、揭傒斯等人唱和于馆阁，被认为"如杜、王、岑、贾之在唐，杨、刘、钱、李之在宋，论者以为有元盛世之音也"（《元诗选》小传）。《元诗选》二集选入其诗117首，题为《江亭集》①。

至正四年甲申（1344）

四月。元廷徵召的处士李孝光抵达京师。

元顺帝御明仁殿召见李孝光，授著作郎②。元廷在至正三年十二月徵召"处士"（遗逸士），一共四名。除李孝光，还有杜本。

李孝光（1285—1350），字季和，号五峰狂客。温州乐清（今属浙江）人。少博学，隐居雁荡山五峰下，学子自四方前来受教。泰不华曾师事之；与薛昂夫交往密切，并为薛昂夫藏书室书垒作长歌。南台御史屡举于朝。至正十年，请求致仕，死于还乡途中。李孝光以文章负名当世，为文主张取法古人，不趋时尚。《四库全书总目》评论他的诗，说："元诗绮靡者多，孝光独风骨遒上，力欲排突古人。乐府古体皆刻意奋厉，不作庸音；近体五言，疏秀有唐调，七言颇出入江西派中，而俊伟之气自不可遏。"有文集二十卷，今已不存，现存其《五峰集》有几种不同版本，都是明清人编集的。《永嘉诗人祠堂丛刻》本《五峰集》十卷（附补遗一卷），是李孝光集的通行本，但其中掺杂有他人的作品。清人王鹏运将李孝光词辑入《四印斋汇刻宋元三

---

① 王士熙别集，未见原本。有单行本《王鲁公诗抄》一卷，《四库全书》列入存目，因为此集存诗与《元诗选》所收完全相同，《四库全书》编者指出："疑即书贾从《元诗选》抄出，伪为旧本射利耳。"

② 此从元人陈德永《李五峰行状》（《永嘉诗人祠堂丛刻》本《五峰集》附录）。《元史》"本传"说，李孝光入京时在至正七年。至正七年诏求隐士，以秘书监著作郎召李孝光入京，在宣文阁向元顺帝进呈《孝经图说》，受到赏识。《李五峰行状》将至正三年召其进京，与至正七年在宣文阁面见元顺帝，作为两件事。《元史》的资料来源尚不清楚，暂从"行状"。

十一家词》中，题为《五峰词》。他的《雁荡十记》是元代散文名篇。元至正前期“铁崖体”风行时，李孝光受到异乎寻常的推重，但他与杨维桢诗风并不一致。他的诗文没有明显的主观色彩，才使文坛不同门户都可以接受。

八月。杨士弘历时十年，编选唐一代之诗为《唐音》。

《唐音》是唐诗选本。杨士弘在选诗时对唐诗的分期，在唐诗学中影响深远。同时，本集以“去取不苟”著称。高棅《唐诗品汇》即“因其例而稍变之”，使初、盛、中、晚的分期成为诗学共识。丹阳人颜润卿用六年时间，专门就《唐音》作出校笺考释，于至正十四年编成《唐音缉释》[1]，使杨士弘《唐音》流传更广。为时人所编选的总集作笺释，在元是罕见之例。

杨士弘，字伯谦。襄城（今属河南）人，寓居清江（今属江西）。好学善属文，曾任涟水教官，调广东宪幕。一生尤好唐诗，编选唐人之作成《唐音》十四卷，由虞集作序以行。他是元代诗论家、诗选家之中较有成就的一人。本人工诗，亦工乐府，著《鉴池春草集》，未见传。据杨士弘《唐音自序》，他以个人之力搜集唐诗，并“审其音律之正变，而择其精粹，分为始音、正音、遗响，总名曰《唐音》，凡十五卷，共诗一千三百四十一首。始于乙亥，成于甲申。”全书分为“始音”一卷、“正音”六卷、“遗响”七卷（另加一子卷），共十四卷（或计入子卷为十五卷）。实际是将唐诗分为初盛唐（始音）、中唐（正音）、晚唐（遗响）三个时期，始启唐诗的初、盛、中、晚分期之例。虞集《唐音序》说，杨士弘编选唐诗“以盛唐、中唐、晚唐别”，既是指此。除分期，《唐音》还对选入诗篇作了笺释。可是《唐音》中不包括李白、杜甫、韩愈三人的作品，因为三人别集颇常见。

石岩已八十五岁，仍然健在。

石岩（1260—1344以后），字民瞻，号汾亭。镇江（今属江苏）人。工诗词，善书画。曾任彭泽县尹，元初活跃于文坛。萨都剌在镇江任职，作《寄石民瞻》云:“京口石彭泽，诗怀似鹤形。苍天容老健，白发照江清。”石岩是书画鉴赏家，许多流传有绪的名作都留有他的题记或题诗。

八月。在乡试结束后，一篇来历不明的“四六”长文《非程文语》，使江浙行省乡试引起广泛关注。

---

[1] 宋讷《西隐集》卷六，有《唐音缉释序》。在这篇序文中，宋讷特别注意到杨士弘对唐诗“盛、中、晚”的分期。

在本年中举的乡贡进士中，诗文家空前之多；可落第者也如是。从延祐首科以来，每次殿试前一年的乡试，由于在家乡的首府举行，所以受到乡里更多的关注。乡试之后，也会仿照进士的"登科记"，刊印中举者的姓名、名次与其他档案资料。这种做法主要是为了卖钱图利。至正四年的江浙乡试是最有争议的一届，放榜后，立即有人写了一篇"四六长篇"，以《非程文语》为题，与"登科记"同时发行。一时间，江浙各路府州县盛传。《非程文语》开篇即云:"开科取士，深感圣世之恩。倚公挟私，无奈吏胥之敝。"这是针对性相当鲜明的檄文。而且一切非难，全部点出真名实姓。其中涉及在文学史上有名者如：海鲁丁、林彬祖、鲍恂、林泉生、江晃、赵友蘭等数十人。文中还具体写道:"赵俶、蒋堂仰天而叹息；江乎、沈幹徒踏地以咨嗟。潘伯修、蔡余庆两举奚为；闻梦吉、陆居仁再来告免。呜呼！文运已矣，吾道安之。何等主司，污坏今年之选举。"[①] 其中的是非，一时难于清理。谁是真才实学，谁是绣花枕头，也没有更权威的评判。这次乡试由于牵涉面太广，反而不了了之。正是由于这篇指名道姓的"公开信""小字报"，使它在历史上留下了印记。

这篇《非程文语》是抨击科举弊端的发难之作。作者也许不是哪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其中甚至包括已中举者在内。究其实，科举的弊端，有一个就是权钱交易。这在江浙富庶之区表现得更为突出。至正四年的江浙乡试与至正二十二年一样：一样的问题，一样的反弹方式。

九月。隐士诗人黄河清写出《至正四年秋疫疾大作书所见》[②]。

黄河清亲见在瘟疫肆虐时，广昌一县管事官员竟全部死光，使一个县级建制被排除出行政管理的运行体系，灾情无从上报，救灾措施无从下达。这确实是骇人听闻的灾难。

> 吾州之人疫大作，八月九月死如麻。野田多稼昼不获，山县无官晨废衙。林光黯黯青烟断，日气昏昏黄雾遮。老翁苦贫病更苦，病后健来贫莫嗟。

黄河清，字叔美。南城（今属江西）人。元后期隐居盱南山中，有诗名，后至元、至正年间与杜本、揭傒斯、危素、吴志淳等唱和。《千顷堂书

---

① 《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八"非程文"节。

② 《永乐大典》卷二〇三一〇。

目》卷二十九有黄河清《黄叔美诗》一卷，并云“盱江（南城别名）人”，但诗集未见传。《永乐大典》与《诗渊》等书保存黄河清诗150多首，约符一卷之数。

彭庭坚出任沂州同知，他与山东艺妓真凤歌的交往广为艺林所知。

《青楼集》云：“真凤歌，山东名妓也。善小唱。彭庭坚为沂州同知，确守不乱。真恃以机辨圆转，欲求好于彭。一日，大雪，彭会客，深夜方散。真托以天寒不回，直造彭室。彭竟不辞，后意甚密。”

薛昂夫以秘书监卿致仕，寓居豫章，并请虞集作《马清献公墓亭记》[1]。

虞集《马清献公墓亭记》是关于薛昂夫生平家世最重要的文献。

薛昂夫（约1273—约1350），本名薛超吾，畏吾人。汉姓马，字昂夫，号九皋。祖上随蒙古入据中原，先驻守怀孟（河南沁阳），后定居江西南昌。

早年师从南宋遗民刘辰翁，大德间，以父荫为江西行省令史。延祐初，入朝先为礼部属员，后任典瑞院佥院。至治元年，任太平路总管。至顺间，任池州路总管。至顺三年冬，由池州移衢州。后至元间，任建德路总管。至正五年以前，以秘书监卿致仕。三十一岁时，将诗作结为《薛昂夫诗集》，并请赵孟頫等名人作序。《薛昂夫诗集》今已不存，诗文传世不多。《灵鬼簿》列其名于“方今名公”节；《太和正音谱》将其误作三人，分论“马九皋之词，如松阴鸣鹤”“薛昂夫之词，如雪窗翠竹”“马昂夫之词，如秋兰独茂”。现存小令65首，套曲3套，残小令1则（据《全元散曲》）。散曲风格通脱豪爽，与张可久、虞集、萨都剌等交往密切，并长于书法。其弟唐古德，字立夫，号九霄，也有诗名，且精书法。

陈深去世。享年八十五岁。

陈深（1260—1344），字子微，号清全。吴县（江苏苏州）人。陈植之父。笃志古学，闭门读书。天历间奎章阁臣以能书荐，不出。有《宁极斋稿》一卷，《读春秋编》十二卷。

揭傒斯去世。享年七十一岁。

此时揭傒斯一直在修订辽、金、宋三朝史。《辽史》成稿，《金史》垂

---

[1] 《马清献公墓亭记》未纪年。但虞集《新修东湖书院记》（《道园类稿》卷二十四）作于至正四年十二月以后，文中已经提到“寓公致仕之有文学者、秘书卿覃怀薛超吾”，故暂系于本年。

成，因雨季湿热，在宅邸中得寒疾，归家仅七天即去世。揭傒斯死前，虞集已经归老家山，而且几乎失明。杨载、范椁死去均已十几年。“元诗四大家”时代终结于至正初。就元代文学发展来说，“四大家”之后，就是杨维桢“铁崖体”的时代了。

揭傒斯（1274—1344），字曼硕。龙兴富州（江西丰城）揭源人。与虞集、范椁、杨载齐名。出身书香门第，大德初年出游两湖，程钜夫时为湖北宪使，一见奇其才，并以表妹许配。皇庆初年，程钜夫入朝，揭傒斯随行，受到朝中士大夫器重，延祐元年荐为翰林编修。天历二年，元文宗开奎章阁，置授经郎，揭傒斯首获其选。至顺元年预修《经世大典》，此后数任集贤、翰林学士，并委派为《辽史》与《金史》总裁官之一。揭傒斯是文坛颇有影响的人物，久在翰林、集贤两院任职，朝廷典册多经其手。元文宗很赏识他的文才，每逢中书省奏用儒臣，必问:“其才何如揭曼硕?”追封豫章郡公，谥文安。有《揭文安集》五十卷，明代已无全书。现存《揭文安集》有十四卷本（即《四库全书》本），系其门人燮理溥化编；十八卷本（即《豫章丛书》本）等不同版本。

虞集、杨载、范椁、揭傒斯并称“元诗四大家”。皇庆、延祐年间，籍贯东南的文人在京师形成一个文化圈，如袁桷、虞集、柳贯、黄溍、贡奎、范椁、杨载、揭傒斯等人，都任职于集贤、翰林两院，驰骋清要，翰墨往复，更为倡酬。虞、杨、范、揭更是交往密切而且齐名当世，他们都宗法唐诗，所以时人以四人并称“四家”。四人的诗风，虞集曾作过这样的概括:“杨仲弘诗如百战健儿，范德机诗如唐临晋帖。”揭傒斯为“三日新妇”，而自比“汉廷老吏也”（揭傒斯《范先生诗序》）。“汉廷老吏”，一作“汉法令师”。明人胡应麟则把它们具体化为:“‘百战健儿’，悍而苍也。‘三日新妇’，鲜而丽也。‘唐临晋帖’，近而肖也。‘汉法令师’，刻而深也。”（《诗薮》外编卷六）这是经典性的批评。但也异议颇多。对这个品评，揭傒斯本人就曾表示异议，据说虞集这样回复揭傒斯的责问:“此非集言，乃天下公论也。”实际这些花絮都源自揭傒斯《范先生诗序》。还有过这样的故事：据说揭傒斯听说之后，很不高兴，“尝中夜过伯生问及兹事，一言不合，挥袂遽去。后以‘天历年间秘阁开’诗寄公，中有‘奎章分署隔窗纱，学士诗成每自夸’之句。公得诗谓门人曰:‘揭公才力竭矣。’就答以诗云:‘故人不肯宿山家，夜半驱车踏月华。寄语旁人休大笑，诗成端的向谁夸。’并题其后云:‘今日新妇老矣。’揭召至都，果疾卒。”[1] 而“四大家”正是当行于文坛的主流派。

[1] 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七十三。

四家中，虞集成就、影响均比较大，一般认为，杨载才具不及虞集，范梈、揭傒斯又次之。四家均以古诗、歌行见长，杨载五言律诗、排律较见功力，范梈以七言绝句见长，揭傒斯工于七言律诗，虞集可以看作众体兼备的诗人。除虞集之外，其余三人均不长词曲。

“四大家”之后的文坛，元诗更加普及，诗坛并未因为失去“泰斗”而寂寞哪怕片刻。杨维桢的“时代”是元诗的全盛期，也是元诗向明过渡的踏板。

钱良右去世。享年六十七岁。

钱良右（1278—1344），字翼之，号江村民。平江（江苏苏州）人。以博学工书知名，言谈举止，济济有儒者意。赵孟頫、邓文原十分赏识，一再举荐，但钱良右一直无意仕进。至大年间，任吴县儒学教谕，任期刚满，就离职而去。在家闲居三十年，客常满座，咏歌无虚日，但一室萧然，家境清苦。有人再次向朝廷推荐，认为他宜在馆阁，但未果。当时有圣旨命选择长于书法的人写《农桑辑要》《大学衍义》，有司委钱良右充任。写完两书，又受到推荐，但仍无下文。病故于家。有诗文杂著若干卷，由虞集作序，但未流传至今。《元诗选》三集选钱良右诗10首，题为《江村先生集》，当为顾嗣立所辑。钱良右之子钱逵也有诗名，至正十六年任江浙分省管勾，历任淮南行省员外郎，明洪武十七年（1384）去世，享年七十二岁。《元诗选》三集有钱逵诗8首，附于钱良右《江村先生集》后。按：钱良右，或作钱良祐、钱良佑。



钱良右用过的印章。

吴师道去世。享年六十二岁。

吴师道（1283—1344），字正传。婺州兰溪（今属浙江）人。早年读宋儒真德秀遗书，深受影响。至治元年登进士第，授高邮县丞。调宁国录事，乱兵过境，惟吴师道敢弹压之。会大旱，共筹得赈灾粮七万七千多石，三十余万饥民赖以存活。廉访使荐于朝，以疾辞归。后至元元年迁池州路建德县尹，有惠政。以中书左丞吕思诚、侍御史孔思立荐授国子助教，升国子博士。执教一本朱熹之旨，而遵许衡成法。至正三年以丁忧南还，次年江浙行省请主持省试，因病未成行，并上书请致仕。朝廷准以礼部郎中致仕，命未至而卒于家。吴师道工词章，才思横溢，诗歌清丽俊逸，在元代的儒学家中，比较有文采。与柳贯、黄溍、吴澄友善而且屡以诗篇往返。有《吴正传文集》二十卷（又题为《吴礼部集》或简为《礼部集》）、《吴礼部诗话》一卷（附

词话数则)，今均存。另有《敬乡录》十四卷、《战国策校注》十卷等著述。

释大訢去世。享年六十一岁。

大訢（1284—1344），字笑隐。祖籍南昌（今属江西），寓居杭州（今属浙江）。俗姓陈。是元代诗僧中著名的“三隐”（笑隐、觉隐、天隐）之一。九岁出家，十七岁到庐山谒见名僧了方，留掌书记，后从百丈山释元熙学佛理。最初住持湖州乌回寺，迁杭州报国寺，再移中天竺。天历元年，诏以元文宗金陵潜邸为大龙翔集庆寺，特选大訢住持，卒于龙翔寺。大訢去世后，丛林为之耸动。著《蒲室集》十五卷，今存。大訢虽是释子，但颇谙朝廷掌故，集中多有与文坛名流柯九思、萨都剌、虞集、马臻、张翥、薛昂夫、李孝光等往还唱和之作，甚至还曾为赵孟頫代笔撰写文章。与虞集相知二十余年，天历、至顺间一再邂逅于京师，并由虞集为《蒲室集》作序。其时，虞集双目已近失明，不能读书，而是听别人为他朗诵大訢诗文，他这样描述听后的感受：“如洞庭之野，众乐并作，铿宏轩昂；蛟龙起跃，物怪屏走，沉冥发兴。至于名教节义，则感厉激奋，老于文学者不能过也。何其快哉！何其快哉！”《四库全书总目》评大訢诗说：“五言古诗实足揖让于士大夫间，余体亦不含蔬笋之气，在僧诗中犹属雅音。”

至正五年乙酉（1345）

二月。乔吉病逝。

乔吉（？—1345），字梦符，号笙鹤翁，又号惺惺道人。太原（今属山西）人，后期寓居杭州太乙宫前。散曲杂剧均工，《太和正音谱》称其词“如神鳌鼓浪”。散曲与张可久齐名，他的《乔梦符小令》，与张可久《小山乐府》，是不多见的元散曲别集。所作杂剧11种：《玉箫女两世姻缘》《杜牧之诗酒扬州梦》《李太白匹配金钱记》《九龙庙》《死生交托妻寄子》《怨风月娇云认玉钗》《马光祖勘风情》《荆公遣妾》《贤孝妇》《节妇牌》《燕乐毅黄金台》，今存前三种。据《录鬼簿》，曾作《题西湖》〔梧叶儿〕100首，名公为之序，在江湖间四十年欲刊所作，竟无成事者。明人李开先《词谑》评乔吉云：“元以词名代，而梦符其翘楚。蕴藉包含，风流调笑，种种出奇，而不失之怪，多多益善，而不失之烦，句句用俗，而不失其为文。自可谓之传神。”乔吉是“元曲六大家”之一。



《金钱记》插图。出自明刊本《顾曲斋元人杂剧选》。

三月初三（上巳）。偰玉立等出游晋祠。

偰玉立《春日游晋祠诗序》[①] 云："冀宁古并州也，距西南之山五十里有晋祠。至正五年上巳，河东监宪铁伯刚率同寅往谒。临流酌酒，登高咏歌。众宾赋诗，各述乃志，以纪岁月。徵言于予，是为诗序。"

同游除铁伯刚，还有五人，偰玉立、张执中各写诗一首，李岂作〔木兰花慢〕词，一并刊刻上石。

① 见《金石萃编补证》卷四。

三月七日。本年廷试，两榜状元是普颜不花、张士坚。

普颜不花，中举后历仕各地，为拦截住以大都为目标的明“北伐军”，至正二十七年战死在山东益都失陷时。张士坚，字师允，大名（今属河北）人。状元及第，由翰林修撰拜监察御史，累官福建闽海道肃政廉访副使，大都最后陷落时死于乱兵中。

本届进士共 78 人。有高明、偰逊（偰伯僚）、笃烈图等。

高明，字则诚，号菜根道人。瑞安（今属浙江）人。出生于书香世家，祖父、伯父均能诗。高明曾师事黄溍，受家庭、老师以及儒家学说的影响颇深。青年时有用世之心，曾说：“人不专一经取第，虽博奚为？”（《宋元学案》卷七十）历处州录事、江浙行省丞相掾、浙东阃幕都事、绍兴府判官、江南行台掾、福建行省都事等职。有《柔克斋诗辑》。高明最重要的业绩是写了南戏《琵琶记》。

偰逊（1318—1360），字公远，原名偰伯僚。高昌畏吾人，入中原后，家族定居溧阳（今属江苏）。偰哲笃长子，中进士后，任翰林应奉，迁宣政院断事官经历，选为端本堂正字。曾出守单州，至正中以尚宾出使高丽，便留高丽不还，被封为高昌郡公。诗集《近思斋逸稿》国内已无传本。

笃烈图（约 1310—?），字彦诚，号敬斋。蒙古逊都思氏，以燕山（北京市）为籍贯，世居会稽（浙江绍兴）。成吉思汗大将赤老温后裔，属于蒙古贵族“四大根脚”之一，月鲁不花之弟，早年兄弟一同受教于韩性。至正五年进士，由太常仪礼院太祝，累官至南台照磨、监察御史，江浙行省员外郎，宣政院判官。诗存《元诗选癸集》《澹游集》等总集。按：笃烈图是常见的蒙古名字，有同名者笃烈图（1312—1348），字敬夫，蒙古捏古氏，至顺元年右榜进士第一，官终内台御史，是马祖常妹夫。以往文献常将笃烈图彦诚，与笃烈图敬夫混淆。《元诗选癸集》丙集，收录笃烈图敬夫诗二首，分别题为《题董太初长江伟观图》《题范文正公书伯夷颂并札卷》，但这两首诗都不是笃烈图敬夫所能作：董旭（太初）《长江伟观图》绘于至正十六年丙申；《伯夷颂》题诗署“至正甲申六月辛未，燕山笃烈图再拜”。而至正十六年，笃烈图敬夫已经去世。《澹游集》卷上小传，即称笃烈图彦诚为“燕郡人”。

汪元亨与钟嗣成在此前后相交于吴门。

汪元亨，字协贞，号云林，又号临川佚老。饶州（江西上饶）人，徙居常熟（今属江苏）。至正间曾任江浙行省掾史，以长于散曲、杂剧为时人所重。有散曲集《小隐馀音》《云林清赏》等（据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均不传。今存小令一百首（据《全元散曲》），另作杂剧 3 种：《仁宗认母》

《娥皇女英斑竹记》《刘晨阮肇桃源洞》，今均不存；作南戏一种《秋夜栾城驿》，仅存残曲。

郑守仁主吴郡白鹤观，与顾瑛交往密切。

郑守仁，号蒙泉。黄岩（今属浙江）人。自幼为道士，成年后北游京师，寓居蓬莱坊的崇真宫，不事干谒，斋居万松间。一天傍晚大雪纷飞，而他读书僵卧自若，号“独冷先生”。至正年间，历主吴郡白鹤观、鄞县天坛道院，出入于顾瑛玉山草堂，与张雨、危素、贡师泰等人友善，并有唱和之作，是元代较有影响的道教徒。《草堂雅集》有其诗16首。

艺妓张玉莲再占乐籍，与班惟志交往密切。

《青楼集》云:“张玉莲，人多呼为张四妈。旧曲其音不传者，皆能寻腔依韵唱之。丝竹咸精，蒱博尽解，笑谈亹亹，文雅彬彬。南北令词，即席成赋；审音知律，时无比焉。往来其门，率多贵公子。积家封厚，喜延款士夫，复挥金如土，无少靳惜爱。林经历曾以侧室置之，后再占乐籍，班彦功与之甚狎。班司儒秩满北上，张作小词〔折桂令〕赠之，末句云‘朝夕思君，泪点成斑’，亦自可喜。又有一联云:‘侧耳听门前过马，和泪看帘外飞花。’尤为脍炙人口。有女倩娇、粉儿，数人皆艺殊绝；后以从良散去。余近年见之昆山，年逾六十矣，两鬓如黧，容色尚润，风流谈谑，不减少年时也。”

班惟志，字彦功。“司儒”，应指出任儒学提举。班惟志后至元三年知常州，秩满，至正二年升江浙儒学提举。据《黄金华集》卷十《杭州路儒学兴造记》，至正四年夏，班惟志仍在儒学提举任上。三年任满，应在本年。

年近七十的胡助告老致仕。

胡助（1278—1354以后）[①]，字履信，一字古愚，号纯白道人。东阳（今属浙江）人。早年读书乡里，年过三十，荐为茂才，授建康路儒学学录，治学有方，弟子中有刘伯温（沙剌班）、廉惠山海牙等西域人。受到吴澄推重，名振一时。延祐初，举进士不第，调美化书院山长。秩满赴京师，与翰苑名公王士熙、袁桷、虞集等交游唱和。授温州路儒学教授，由王士熙等人举荐，改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至顺元年，从虞集分院上京。秩满调任教官，再入翰林院，任编修，参修辽、金、宋三史。有文集《纯白斋类稿》三十卷

---

① 胡助未见碑传。《纯白斋类稿》卷十六《庚寅元旦》诗云“新年七十又三岁”。庚寅，是至正十年。故推出他应生于1278年。

（今本二十卷）。一生虽未致显宦，但文名甚大。多次出任乡试考官，余阙等人都出于门下。诗文平易近人，以《京华杂兴》二十首及《上京纪行诗》最有影响。

自去年大河南北饥荒蔓延，灾情愈演愈烈，访学旅行的葛逻禄人廼贤据见闻写出七言长篇《颍州老翁歌》。

《颍州老翁歌》（《金台集》卷一）诗云：

颍州老翁病且羸，萧萧短发秋霜垂。手扶枯筇行复却，操瓢乞食河之湄。我哀其贫为顾问，欲语哽咽吞声悲。自言城东昔大户，腴田十倾桑阴围。阖门老稚三百指，衣食尽足常熙熙。河南年来数亢旱，赤地千里黄尘飞。麦禾槁死粟不熟，长铲挂壁犁生衣。黄堂太守足宴寝，鞭扑百姓穷膏脂。聒天丝竹夜酣饮，阳阳不问民啼饥。市中斗粟价十千，饥人煮蕨供晨炊。木皮剥尽草根死，妻子相对愁双眉。鹄形累累口生焰，脔割饿莩无完肌。奸民乘隙作大盗，腰弓跨马纷驱驰。啸呼深林聚凶恶，狎弄剑槊摇旌旗。去年三月入州治，踞坐堂上如熊罴。长官邀迎吏再拜，馈送牛酒罗阶墀。城中豪家尽剽掠，况在村落人烟稀。裂囊割筐取金帛，煮杀鸡狗施鞭笞。今年灾虐及陈颍，疫害四起民流离。连村比屋相枕藉，纵有药石难扶治。一家十口不三日，槁束席卷埋荒陂。死生谁复顾骨肉，性命喘息悬毫厘。大孙十岁卖五千，小孙三岁投清漪。至今平政桥下水，髑髅白骨如山崖。绣衣使者肃风纪，下车访察民疮痍。绿章陈辞达九陛，撤乐减膳心忧危。朝堂杂议会元老，恤荒讨贼劳深机。山东建节开大府，便宜斩础扬天威。亲军四出贼奔溃，渠魁枭首乾坤夷。拜官纳粟循旧典，义士踊跃皆欢怡。淮南私廪久红腐，转输岂惜千金资。遣官巡行勤抚慰，赈粟给币苏民疲。获存衰朽见今日，病骨尚尔难撑持。向非圣人念赤子，填委沟壑应无疑。老翁仰天泪如雨，我亦感激愁嘘欷。安得四海康且阜，五风十雨斯应期。长官廉平县令好，生民击壤歌清时。愿言观风采诗者，慎勿废我颍州老翁哀苦辞。

在诗后有三则跋语：

状物写景之功，固诗家之极致。而系于风化，补于政治，尤作者之至言。易之此诗兼得之矣。礼部侍郎汝阴李黻子威书。

易之此诗，格调则宗韩吏部，性情则同元道州。世必有能知之者。

监察御史危素书。

至正四年，河南北大饥。明年，又疫，民之死者过半。朝廷尝议鬻爵以赈之，江淮富人应命者甚众。凡得钞十余万锭，粟称是。会夏小稔，赈事遂已。然民罹大困，田莱尽芜，蒿蓬没人，狐兔之迹满道。时余为御史，行河（北）河南，请以富人所入钱粟贷民，具牛种以耕，丰年则收其本。不报。览易之之诗，追忆往事，为之恻然。八年三月，翰林待制武威余阙志。

为之作跋的李黻、余阙，在此后的战乱中先后死节。这个结局并非偶然。

北方连年饥荒，并逐渐向江南蔓延。

灾荒与以后的战乱一样，难以南北拘限。灾民子女往往“渡江转卖与人为奴为婢”，溧阳“乡中置者颇多”①，成为社会问题。

黄玠《弁山小隐吟录》成集，并自撰序言。

黄玠是元代比较典型的独吟诗人，他的作品被称为“要于俗音嘈囋之中读之，如听古钟磬矣”②。

黄玠，字伯成，或作字孟成。慈溪（今属浙江）人。父黄正孙是宋遗民之后，他自幼聪敏善记，成年后隐居授徒，孝养双亲，而不求仕进。因爱吴兴山水佳胜，便卜居弁山，以“弁山小隐”为号。富家宦族闻其名，相争为筑馆舍，迎于家中。后期与钱惟善、邵亨贞、吴镇等人交游唱和，声名益著。元顺帝至正年间卒，享年八十岁，从祀嘉湖贤寓祠。《弁山小隐吟录》自序中他表示：晚年思归故乡慈溪，所以自编诗稿以示子孙。

七月。偰玉立作《绛守居园池》诗。

《绛守居园池》（《元诗选》三集《世玉集》）诗序云：“乙酉之秋，七月既望，余自河中谳狱还司，过绛，登守居园池。昔日亭墅悉已埋没，独洄涟亭、花萼堂复构，以还旧观，流泉莲沼犹仍故焉。堤柳荫翳，径花鲜艳，庭竹数竿，清风泠然，有尘外之思。即事赋诗。”在这首五言古诗中，偰玉立表述了对汉唐盛世的流连向往。诗云：“绛邑旧名藩，牧守优鸿儒。逶迤山水中，旷达园池居。雄并历晋魏，揖让隆唐虞。世远民俗漓，讼剧古道疏。环

① 见《至正直记》卷三“乞丐不置婢仆”节。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七《弁山小隐吟录》提要。

列多馆墅，莽苍变丘墟。惨恻岁年深，牢落兵烬余。洄涟复构亭，花萼悬堂虚。祓禊引流觞，宾筵闻鼓竽。锦香缀径溪，琅玕绕庭除。公暇寡接交，游观足清娱。缅怀前哲人，冠盖秉钧枢。遗爱勒琬琰，清风生坐隅。卉木均雨露，数泽乐禽鱼。端来濯尘缨，咏歌登舞雩。夕阳明翠巘，秋色淡红蕖。乡关动离思，云烟隔荒芜。绣斧倦行羁，霜日烈修途。故园有松菊，盍用还灾畬。"

宋沂改任两淮屯田府知事，宋褧为此撰写了《送宋子与赴官淮南序》。

宋沂，字子与。清江（今属江西）人。泰定元年入太学为国子监生，元文宗时任艺文监令史，授赣州路照磨。出为两淮屯田府知事，累迁常山县尹。有诗集《春咏亭稿》，未见传本。他的诗主要保存在顾瑛《草堂雅集》，顾瑛自述，曾在白鹤观见到宋沂，宋沂出示了《春咏亭稿》，顾瑛便从其中选录了12首，编入《草堂雅集》。

九月。周伯琦诗集《近光集》开始结集，并作自序。

由于周伯琦在至正十二年以后的作品已经散失，所以《近光集》成了周伯琦的代表作。周伯琦的两种诗集《近光集》三卷、《扈从诗》一卷，总是合在一起流传。《近光集》全名为《周翰林近光集》。卷首有虞集序，至正五年自序。序中自谓，"身虽江湖，举头见日，天子之光咫尺也"，所以名集为《近光集》。卷一至卷二，收入作者出任崇文监丞以来，在朝中所作之诗；卷三收入作者于至正十年出为海北广东道肃政廉访使、代祀北岳、南镇的诗篇。仅据《近光集》《扈从诗》。

程端礼去世。享年七十五岁。

程端礼（1271—1345），字敬叔，号畏斋。鄞县（浙江宁波）人。十五岁能记诵六经，从史蒙卿游，治朱子之学，学者及门甚众。被举荐为建平、建德两县儒学教谕，历任信州稼轩书院及建康江东书院山长。授铅山州儒学教授，秩满，以台州路儒学教授致仕。在各地任教职时，经营学田，添置图书，恢复校址，建树颇多。程端礼有《畏斋集》，久已不存。清乾隆时修《四库全书》，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畏斋集》六卷。程端礼还撰有《读书分年日程》三卷、纲领一卷，《集庆路江东书院讲义》一卷，今均存。

道教宗师薛玄卿去世。享年五十七岁。

薛玄曦（1289—1345），字玄卿，号上清外史。贵溪（今属江西）人。

十二岁辞家入道，师事张留孙、吴全节于龙虎山。延祐四年制授大都崇真万寿宫提举，升提点上都崇真万寿宫，泰定元年奉诏徵嗣天师。泰定三年扈从上都，还大都路途中经龙虎台，喟然感叹说："楚云江树，遐阻万里，引领亲舍，宁无惕然于中乎！"便辞归龙虎山。至正三年，制授弘文裕德崇仁真人，任佑圣观住持，并兼领杭州诸宫观。有《上清集》，未见传本。《元诗选》二集选薛玄曦诗28首，题为《上清集》，当为顾嗣立所辑。

至正六年丙戌（1346）

七月。王晔《优戏录》成书。

杨维桢《优戏录序》（《东维子集》卷十一）云："钱唐王晔，集历代之优辞有关于世道者，自楚国优孟而下，至金人玳瑁头，凡若干条。太史公之旨，其有概于中者乎？予闻仲尼论谏之义有五：始曰谲谏，终曰讽谏，且曰吾从者讽乎。盖一讽之效，从容一言之中，而龙逢、比干不获称良臣者之所不及也。"

王晔，字日华，或作字日新，号南斋。杭州人。与朱凯合制《题双渐小卿问答》16首，今存。作杂剧3种，仅存《破阴阳八卦桃花女》。

秋。江右儒士黄如徵"邀驾"上书，借流传在江西的民歌民谣，指斥权臣散散、王士宏等罪状，直及国家利害[①]。

这是元代罕见的告御状（在皇帝外出时拦住车驾告状）并成功的范例。顺帝亲自阅览了黄如徵的上书。前一年冬，朝廷遣官奉使宣抚诸道，并问民间疾苦。此行对地方官的基本评估是：政绩昭著者，十不二三。见了黄如徵的上书，顺帝喜形于色，又担心他会因此受到权臣的迫害，要近臣将他安排在馆驿之中待命。几天后，任命黄如徵为江西儒学提举，命侍卫专门护送出京。黄如徵受命而不领职。在上书中，黄如徵引证了若干民谣，证实官吏不法已经到了危及国体的地步，如：

九重丹诏颁恩至，万两黄金奉使回。

① 《南村辍耕录》卷十九"阑驾上书"节。《农田馀话》卷下，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农田馀话》在记录了以下民谣之前，说是"小民作歌"。

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

官吏黑漆皮灯笼，奉使来时添一重。

……

为民请命，以民谣为徵，是元代的特点。除了掌权者多为蒙古色目人，也有借“诗教”言时事的时风。

左克明编定《古乐府》十卷，将乐府诗分为八类。

本编是在杨维桢“乐府诗”创作风靡一时成书。左克明《古乐府》自序说：他是因为“风化日移，繁音日滋。惧乎此声之不作，故不自量度”而编成《古乐府》十卷。同时，他特别注意到“冠以古歌谣词者，贵其发乎自然。终以杂曲者，著其渐流于新声”。至正六年间，正是杨维桢称霸于诗坛，其新乐府风靡一时的时期。这个时候编刊一部乐府诗集，其针对性不言自明。当然，与杨维桢“铁崖体”相比，左克明其人与其《古乐府》几乎被时代潮流“淹没”。但这毕竟是元代诗学的重要内容。忽略了《古乐府》的存在，对杨维桢在元明之间的位置就不容易看得清楚。

左克明，字德昭。南昌铁柱观道士。除《古乐府》，他自己并没有作品流传。

叶谨翁去世。享年七十五岁。

叶谨翁（1272—1346），字审言，号赘翁，又号曲全道人。金华（今属浙江）人。荐举教官，历浦江、义乌两县教谕，升衢州明正书院山长，累迁吉水州学教授，调晋江县主簿，改婺州路司狱。致仕归。将其居室名为“四勿”，有《四勿斋稿》《曲全集》等，均未传。在元代后期他处在江浙文学与文化传承的关键位置，黄溍说，叶谨翁“里居之日，最所友善者，许文懿公谦、翰林待制柳公贯、太常博士胡君助、礼部郎中吴君师道、翰林修撰张君枢，而溍亦幸获陪诸公之末。”[①] 上述六人，都是重要的文人，有文集行世，著述流传颇广。但叶谨翁自己则只有数首诗流传至今。

宋褧去世。享年五十三岁。

宋褧（1294—1346），字显夫。大都人。宋本之弟。早年因父亲在江陵

---

① 《黄金华集》卷三十三《叶审言墓志铭》。

任职，就学江南。延祐中，与兄宋本挟其所作诗歌还京师，张养浩、元明善、王士熙等人争相举荐。泰定元年进士，除秘书监校书郎，改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建詹事院，任照磨，迁翰林修撰。后至元初，擢监察御史，遇事直言无讳。曾出佥山南廉访司事，入朝，拜翰林待制，迁国子司业，与修辽、金、宋诸史，拜翰林直学士，又兼经筵讲官。追封范阳郡侯，谥文清。宋褧是元代中期以后文坛比较活跃的诗文家，唱和酬答面比较广泛。他的文学成就与宋本齐名，人称“二宋”或“大小宋”。欧阳玄评宋褧的诗，说他的宗旨是务去陈言。有文集《燕石集》十五卷（诗十卷，文五卷）。《四库全书总目》说他的诗大体足为一家，“其文为作诗之余事，然温润而洁净，亦不失体裁焉。”

至正七年丁亥（1347）

温州路连年旱涝相兼。平阳深究朱子之学的隐士史伯璿，写出盼望解救黎民于倒悬的长篇组诗《代颂常平》。

《代颂常平》（《青华集》）共11首诗，诗序则是一篇微型的救灾实录：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古者国有凶荒，民不至捐瘠者，蓄积多而备先具故也。切见常平之法，创自汉制，至隋朝行之独为尽善，唐宋以来皆莫能及。国朝常平之制，官给其本，谷贱则增价，而籴贵则减价，而粜良法美，意又当非隋氏所及。絜诸古，而无愧矣。平阳为州，介山濒海，土狭人稠。丰年民食仅足，歉岁必至不敷，全赖苏湖广米舡接济。近岁水旱相仍，民贫已甚，虽米无钱可籴矣。今秋收虽云小稔，然冬收尤为民食所赖。近者八月十九，风雨大作，晚禾已出而未实者，并皆损坏。白�櫗弥望，全无可收者有之。是月二十一日，本州管下二都、三都，农民百有余人，割刈白穗晚禾四十余担，到州告诉，本州欲与申闻上司，又恐差官体覆，重为民困，以此之故不与受理。今蒙本路发下常平官钞钱本若干锭，欲令本州增价收籴，但本州境内晚禾损失之故，谷价涌贵倍常，若又增价收籴，则所籴之谷为价甚贵，将来若遇岁歉，出粜虽照原价量减，亦不为贱。以是言之，恐无益于民，徒有损于官，深为未便。今来本州贤侯，公同讲究，商确时事，莫若依时价收籴，既不为厉民，将来谷倘腾贵，则减价出粜，庶得官民两利，实为至便至当，千古救荒

良法也。故作歌以纪之。

同在《青华集》中，有一篇《上河堤记》，是读之如同身临其境的“纪实文学”。将这篇记与那一组11首《代颂常平》对照来读，对元后期江南的实况，特别是民心向背可以有比较真切的认识。

与文人交往颇广的艺妓李当当出家入道。

《南村辍耕录》（卷十五“妓出家节”节）记载：“李当当者，教坊名妓也，姿艺超出辈流。忽翻然若有所悟，遂著道士服。江浙儒学提举段吉甫先生天祐赠之以诗：‘歌舞当年第一流，洗妆今日别青楼。便从南岳夫人去，肯为苏州刺史留。琳馆月明箫凤下，琐窗花老镜鸾收。却怜愁绝浔阳妇，嫁得商人已白头。’”

段天祐，字吉甫。汴梁（河南开封）人。泰定元年进士，授静海县丞，历江浙照磨，至正间出任常熟州判官，入为国子助教，迁应奉翰林文字，除江浙行省儒学提举，卒于官。段天祐富文学，善书法，尤工于诗，至正中，宋褧、张翥、贡师泰等交往唱和，但死后诗文散失。《皇元风雅》《乾坤清气》《元音》《元诗体要》均各选其诗一首，清钱熙彦《元诗选补遗》编录20首。

本年广东乡试改为武铨，儒生罗蒙正在省会应举，因此罢试而归。

罗蒙正，字希吕。祖籍庐陵（江西吉安），徙居新会（今属广东）。罗蒙正博闻强记，富于才资，早年从肇庆罗斗明学诗，尽得其传。成年后以能诗知名于时。县尹沈寿创建古冈书院，请他出任教席，来学习的人很多。不久，行省派他为高州学正，任期满后，便回到家乡。元末兵乱，避居省城，又被授为南恩州儒学教授、州判。吴元良据有广东部分地区，想以罗蒙正为幕僚，罗蒙正力辞不就，不久就去世了。

十月。张可久为《小山乐府》写跋语。

此前，张可久曾监税松源。《小山乐府跋》云：“荆公答东坡书有云：公奇少游，口之而不置；我得其诗，手之而不释。其爱之可谓至矣！任光大逢人话小山词，且手自抄录济成帙，其澹好有若此。予何敢望秦太虚，而监处州酒与歙州监税，凄楚萧条，大略似之。至正丁亥良月，张久可书。”该跋写尽一代曲家老境已至尚且沉沦下僚的失落。

张雨编辑友朋投赠之作为《师友集》，黄溍为《师友集》作序。

《师友集序》（《黄金华集》卷十八）说：

《师友集》者，张君伯雨所得名公赠言及倡酬之作也。……逮伯雨倦游而归，入山益深，入林益密。并游之英俊多已零落，而伯雨亦老矣。后生晚出，如春华夕秀，奇采递发。欲一经伯雨之品题者，无不挟所长以为贽。而伯雨皆莫之拒，虽细弗遣。宜其所积之富如此。……诗文总若干篇，其次第不系乎齿爵位望，而一以岁月为后先。方外一二士既编辑而校雠之，复俾其为之序，而刻置伯雨所居灵石山之登善庵。

释道在元末的处境大致相近，张雨对释道诗人都有广泛影响。由受赠者将“他人投赠”作品结为一集，在至正年间较常见，可以提升受赠者的社会影响，《师友集》是较早出现的一种。它的编订基本与《草堂雅集》同时，无论立意，还是拟设集名，《师友集》对后来释子的《澹游集》《金玉编》，

都有启示。由于张雨个人“四十年间运气有升降”，所以，《师友集》涉及面颇广，后来的释来复与克新，远不能与之相比，但《师友集》确实是为他们拟设追求目标。入明，这类总集流传都不广，如今，《澹游集》《金玉编》已经见不到最后编定之本①，《师友集》则久已不见诸家书目。但是，《诗渊》有《师友集》之作，而且《诗渊》中的《师友集》与“题《水云集》”之诗一样，几乎都是整卷钞入，所以原貌虽然已失，许多篇什连作者也节略了，但其中作品大致仍在。

十一月。杨维桢借为周月湖散曲集作序，讨论元曲流变。

杨维桢《周月湖今乐府序》（《东维子集》卷十一）说：“士大夫以今乐府鸣者，奇巧莫如关汉卿、庾吉甫、杨澹斋、卢疏斋；豪爽则有如冯海粟、滕玉霄；酝藉则有如贯酸斋、马昂父。其体材各异，而宫商相宣，皆可被于弦竹者也。继起者不可枚举，往往泥文采者失音节，谐音节者亏文采，兼之者实难也。夫词曲本古诗之流，既以乐府名编，则宜有风雅余韵在焉。苟专逐时变，竞俗饯，不自知其流于街谈市谚之陋，而不见夫锦脏绣腑之为懿也，则亦何取于今之乐府，可被于弦竹者哉?”杨维桢随口举出的元曲大家有关汉卿、庾吉甫、杨朝英、卢挚、冯子振、滕宾、贯云石、薛昂夫（马昂夫），可见元人对散曲家的评价，具有相当的稳定性。

① 《金玉编》，国内无传本。《澹游集》国内、日本各有一部，但都不是定本。

祝蕃去世。享年六十二岁。

祝蕃（1286—1347）[1]，字蕃远，一字直清。贵溪（今属江西）人。以茂才授高节书院山长。曾以《易经》领乡荐，延祐四年乡试，与邑人邵宪祖名列高等，受到主考嘉奖，并抄下他写的《明堂赋》供传阅。会试未被录取。历任饶州南溪书院山长、集庆路学正、饶州路儒学教授，辟湖广行省掾史。至正初，任浔州路经历。去世后，余阙等写有挽诗。一生主要任教职，但与诗友交流广泛，在诗坛颇有影响。有诗文集若干卷，未见传。才思敏捷，论事激切，无所顾忌，以“质直而气刚，信道而明义”著称。其《即席和贯学士月氏王头饮器歌》较有名，这个题目（指《月氏王头饮器歌》）是元代著名的“咏物”对象，应该与宋理宗头颅被制成饮具有关，和者较多，杨维桢曾一和再和，但祝蕃和诗受到元诗选家瞩目，是有代表性的一首。

与祝蕃大致同时，有隐逸诗人张立仁。

张立仁，字伯远，号楚闲。鄱阳（江西波阳）人。世为鄱阳诗书家，入元未仕，以讲习为业，知名乡里。有《张伯远诗集》，未见传，《皇元风雅》后集卷一录张伯远诗《饯祝直清》《象山山长岳仲远美任归浙》。祝蕃是张立仁诗友，《饯祝直清》是元诗名篇，亦收入《元风雅》卷三十、《元音》卷三、《石仓历代诗选》元诗卷五十等。元人李存有《张伯远诗集序》（《李仲公集》卷二十），序中说：“仆儿时闻诸父间言伯远能诗，其后侍叔父贵池公诵其《古意》，卒章云：‘万里有征人，九泉无战国。’《钱塘观潮》诗卒章云：‘死不作子胥，生当随范蠡。’” “惜乎老死于丘壑而无所遇。”佚诗保存在《文翰类选大成》《光岳英华》等文献中。

至正八年戊子（1248）

三月七日。本年会试录取两榜状元，是阿鲁辉帖木儿、王宗哲。

王宗哲，字元举。中山无极（广东香山）人。至正七年乡试，以第一名应进士举；至正八年二月会试，再次取得第一；廷试为左榜状元。他是元科举考试中惟一的“连中三元”者。授翰林修撰，历官湖广宪佥。无论政绩、官声还是文学、学术，他却都无足称道。在湖广战乱中，表现不佳，时人有

[1] 祝蕃生卒年，此从李存墓志铭（《俟庵集》卷二十五）。危素所撰《上饶祝先生行录》（《危太朴文续集》卷七）作1286—1346。

"咏四状元诗"，将其作为负面典型。

本届录取进士78人。进士中，西域人昂吉、马元德以及葛元喆、辜中等较有名气。

昂吉（1317—1366）[①]，字启文，一作起文。西夏唐兀氏，迁居太平（安徽当涂）。以高为汉姓，名高起文。登进士第，授翰林编修，改绍兴录事司达鲁花赤，迁池州录事。杨维桢送昂吉赴京会试诗说："西凉家世东瓯学，公子才名久擅场"。至正后期在福建任行省检校官，卒于任所。《元诗选》三集录其诗15首，题为《启文集》。

马元德，本名吉雅谟丁，以马为汉姓，字元德（或原德）。西域回回，入中原家族居大都（北京市），郡望燕山。因父亲在镇江路任职，举家侨寓京口。诗人丁鹤年的表兄，至正八年进士[②]，任南御史台掾史。元末战乱时历仕江浙，至正末去世。

葛元喆，字元哲[③]。抚州路金溪（江西金溪）人。幼颖异，至正八年进士，累迁江西廉访司经历，江西行省都事。至正十四年荐授本县县尹，陆续在临江、江东宪府、福建行省任职。元末战乱中侨寓南闽。后浮海北上，抵达大都，竟忧愤以卒。门人私谥文贞先生。在江南时名颇大，去世后，诗文结集为十卷，但罕见流传。

辜中，字德中，号易窗。江西人。至正八年进士，授永丰县尹，有政绩。后曾任知州。梁寅有《送辜德中会试》（《石门集》卷四），张翥有《题辜德中瑞竹亭》（《蜕庵集》卷五）。作品罕见流传，《文翰类选大成》编录诗9首。

刘廷信与艺名"般般丑"的艺妓马素卿一见钟情，频以乐章互通情愫。

《青楼集》云："般般丑，姓马，字素卿。善词翰，达音律，驰名江湘间。时有刘廷信者，南台御史刘廷幹之族弟，俗呼曰'黑刘五'，落魄不羁，工于谈笑，天性聪慧，至于词章，信口成句，而街市俚近之谈，变用新奇，能道人所不能道者。与马氏各相闻而未识，一日，相遇于道，偕行者曰：'二人请相见。'曰：'此刘五舍也；此即马般般丑也。'见毕，刘熟视之，曰：'名不虚得！'马氏含笑而去。自是往来甚密，所赋乐章极多，至今为人传诵。"

刘廷信族兄刘廷幹，至正八年出任南台御史。刘廷信与"般般丑"两人

---

① 生年，据唐肃《故福建等处行中书省检校官高君墓志铭》（《丹崖集》卷八）"至正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七日，福建行省检校官卒于官所"；生年，据墓志铭铭文"起身以儒，五十而殁"推定。

② 马元德中进士的时间，另一说是至正十七年。但其说不确。

③ 或以为他的名字是：葛元哲，字廷哲，疑不确。

在现实生活中，将“才子佳人”一见钟情，诗文传情的际遇演示一番，为世人欣羡。

天竺人蒲理翰出任云南宪佥。

蒲理翰诗仅存几首，但他是整部文学史上惟一一个用汉语写作的祖籍天竺的诗人。

明人傅梅《嵩书》卷十四，有署名“蒲理翰”的3首诗。其中一首编入《元诗选癸集》癸集上，但没有小传。根据名字，可以认为蒲理翰是色目人，关于蒲理翰，地方志中的资料有：其先祖鲁尼，于宋末流寓广东。泰定四年进士，累迁郑州同知。至正四年由漕运副使授溧阳知州，在任三年，升云南廉访司佥事。清人王昶曾编录了多达一百六十卷的《金石萃编》；此后，罗振玉将王昶遗留有待整理的、未编入《金石萃编》的散乱资料，汇为《金石萃编未刻稿》出版，“未刻稿”著录了一篇来自云南的石刻拓片，即《万春觉寺留题》，文字阙失较多，但题署完整：“云南佥宪、天竺西人蒲理翰和南。”这是诗人自己的题名，它不但证明蒲理翰是小乘佛教徒，而且是天竺（即印度）人。这是自《大唐西域记》以来仅见的入籍中国的天竺诗人，他的存在为文学史增添了新内容。如是，关于蒲理翰祖上为何“寓居广东”，便有了合乎情理的解释。

中书省派专人来江浙行省，考核从事、掾史中的贤能者，得三人举荐于朝：高明、沙可学、葛元喆①。

高明在行省为官清正，不屈权势。葛元喆，是本年进士。

沙可学，永嘉（浙江温州）人。至正中任江浙行省掾，杨维桢特作《送沙可学序》（《东维子集》卷五），并说：“三人用者而浙称治。盖三人者，天府登其乡书，大廷崇其高等，而拜进士出身，赐任州理佐理之职者也。”《东瓯诗集》有沙可学《咏怀》二首，《元诗选癸集》编入辛集上，朱彝尊《明诗综》卷十六仅存其一，《静志居诗话》卷五论列说：“可学仅存《咏怀》诗……盖忆庚申君（元顺帝）北狩而作，首句指贾鲁挑河而言。”杨维桢《送沙可学序》，以沙可学与高则诚（高明）、葛元哲（葛元喆）并列，可学应是表字。释来复《澹游集》卷上有西域诗人哈珊沙小传云：字可学，至正二年进士，曾任江浙行枢密院都事。以西域人起汉姓，通用汉名惯例，此哈珊沙可学，与沙可学是同一个人。

---

① 杨维桢《东维子集》卷五《送沙可学序》。

屡应进士举不第，王冕出游大江南北，在大都、上都均作停留[1]。

宋濂《王冕传》（《宋文宪集》卷二十七）云：（王冕）北游大都，馆秘书卿泰不华家中。泰不华欲荐以馆职，王冕公然说："公诚愚人哉。不满十年，此中狐兔游矣。何以仕禄为？"正好他的友人武林卢生客死滦阳，还留一童与两个女儿在燕京，无所依执。王冕不远千里前往滦阳，取卢生遗骨，与他的两个女儿一同还归故乡。还家之后，"复言天下将乱。时海内无事，或斥冕为妄。冕曰'妄人非我。谁当为妄哉？'乃携妻孥隐于九里山。"——这就是他北上的具体收获。

据说在大都，"燕京贵人争求画，乃以一幅张壁间"，并在上面题了那首著名的梅花诗"疏花个个团冰玉，羌笛吹他不下来"。这成了他以诗"刺事"的案底，为避祸王冕不得不尽快地返回江南。顾嗣立的《元诗选》小传，就取此说。这都说明，王冕前往大都和返回家乡，都与他对时局的特殊敏感有关。仅就这段经历，可以证明王冕绝不是一个单纯的画家，一个苦吟诗人。他一直有用世之心，只不过生不逢时罢了。

杨维桢发起唱和"西湖竹枝词"，是元代后期一次规模空前的"同题集咏"。

"竹枝词"因唐人刘禹锡出名。在元代，这种体裁短小精练的七言绝句，受到蒙古、色目等汉语不是母语的诗人们的喜爱。南宋诗人们，特别是贴近社会下层的江湖诗人，惯用"竹枝体"来咏唱西湖湖光山色。"山外青山楼外楼"其实就是"西湖竹枝词"。宋元之际人董嗣杲《西湖百咏》虽然是100首七言律诗，但他在每首诗之下分别注释了始末本事，对于以后的咏西湖诗起了引桥的过渡作用。宋元之际人咏西湖往往寄予沧桑之感，今昔之思。而在元朝，曲家张可久、贯云石、薛昂夫等人写于西湖的散曲，则成为"西湖竹枝词"的在另一种乐器上的"调音"。

杨维桢在《西湖竹枝集序》（"至正八年秋七月，会稽杨维桢书于玉山草堂"）所说的集咏"西湖"的缘起是：

> 余闲居西湖者七八年，与茅山外史张贞居（张雨）、苕溪郑九成（郑韶）辈为唱和交。水光山色，浸沉胸次，洗一时樽俎粉黛之习，于是乎有"竹枝"之声。好事者流布南北，名人韵士属和者无虑百家。道

[1] 《竹斋集》卷上《己丑二月三日大风雨雪》诗，其一云"却思前载燕山北，骑马踏冰看打围"。己丑是至正九年。故他北上燕京当在至正七八年间。

扬讽喻，古人之教广矣。是风一变，贤妃贞妇，兴国显家，而《烈女传》作矣。采风谣者，其可忽诸？至正八年秋七月，会稽杨维桢书于玉山草堂。

至正八年时，杨维桢应邀到昆山顾瑛家，名义上主持顾氏家塾。而开始写《西湖竹枝歌》（一名《小临海曲》），则在他为辽、金、元三朝史成书而上《正统辩》的前后几年间。至正八年秋，则是他将“同题集咏”的《西湖竹枝词》汇编成《西湖竹枝集》的时间。



杨维桢用过的印章

集咏“西湖竹枝”是元代后期规模颇大、影响颇广的一次“同题集咏”活动。有的文献说，参与者有数百人①，仅仅编入《西湖竹枝集》的，就有120人的同题作品②。其中，杨维桢的首倡之作9首，其他119人的和诗，多者5首（徐哲），少者一首。和诗者，不但有诗坛泰斗，比如“元诗四大家”（除范梈）、顾瑛父子，而且有蒙古和色目诗人同同、甘立、边鲁、掌机沙、不花帖木儿、完泽、燕不花、别里沙等等；有释子羽士，还有曹妙清、张妙净等西湖女子，当时广泛流传但已经弄不清作者究竟是谁的“无名氏”之作也有数篇。其代表性相当广泛。这些属和者大都是“南北名士”③，其中吴郡人26名，来自昆山的有11名④。在将这些和诗结集时，杨维桢为这119个诗人写了小传，评述他们的成就，介绍他们的作品。

杨维桢的《西湖竹枝歌》被上百人一和再和，就成了经典之作。他一共写了9首“竹枝词”，其中第一首与第七首分别写道：

---

① 明人和维在《西湖竹枝词序》说：“前元杨维桢氏寓居湖上，日与郯韶辈流连诗酒，乃舍泛语为清唱，赋《西湖竹枝词》。一时从而和者数百家。虽妇人女子之作亦为收录。”

② 《西湖竹枝集》最后，一般还有元人丁复的诗，但这应该是后来补人的。原本则是杨维桢首倡，119人齐和，一共有120位诗人。

③ 其中一些人与他们的诗，比如杨载、马祖常、王士熙等，不是在杨维桢之后的唱和者，而是杨维桢引据的前贤之作。杨维桢自己的9首也不一定写于同一时间。

④ 据明人陆容《菽园杂记》统计的数字。

苏小门前花满株，苏公堤上女当垆。南官北使须到此，江南西湖天下无。

劝郎莫上南高峰，劝侬莫上北高峰。南高峰云北高雨，云雨相催愁杀侬。

第一首是为西湖风光张本，也是为西湖作“竹枝词”的开场白。“江南西湖天下无”，在那时，西湖早已经是南人、北人（包括蒙古、色目和汉人）共同拥有的西湖。第七首诗写每个人都有只属于自己的西湖，西湖始终只在诗人的心目中——长达数年甚至十数年、广被大江南北的一场“同题集咏”，就这样开篇了。

在众多的和诗之中，除达官显宦、著名文人外，参与者还有：

终身事母未嫁的钱塘女子曹妙清写道：“美人绝似董娇娆，家住南山第一桥。不肯随人过湖去，月明夜夜自吹箫。”

曹妙清，字比玉，号雪斋。年三十而未嫁，工诗善鼓琴。杨维桢为曹妙清写有《曹氏雪斋弦歌集序》（《东维子集》卷七）：“予居钱塘，闻女士有曹雪斋氏，以才称于人，尝执所著诗文若干篇介为其师者丘公以见。自陈幼获胥于酸斋贯公（贯云石）、恕斋班公（班惟志），而犹未及见先生也。”这篇序写于至正五年十一月，正是《西湖竹枝词》风靡江南诗坛的时期。

元曲家高克礼写道：“第四桥头第一湾，看鱼直上玉泉山。大鱼已逐龙飞去，留得当年旧赐环。”

高克礼，字敬臣，号秋泉。河间（今属河北）人。《录鬼簿》在“方今才人相知者”节作有小传；《太和正音谱》列名于俱是杰作一百五十人中。以门荫官至庆元理官，治政清简，不为苛刻，以简澹自处。天一阁本《录鬼簿》有贾仲明所补吊高克礼〔凌波仙〕曲：“碧桃红杏说高蟾，黄阁风流夸士谦，铨衡权准宗行俭。文章习子瞻，任县宰才胜江淹。生子学双渐，娶妻如蔡琰。秋泉公，归去陶潜。”不但概括出他一生行迹，也给予较高评价。高克礼与乔吉友善，以写作散曲知名于时，其散曲以工巧为特点。散曲作品，今存小令 4 首（据《全元散曲》），全是带过曲。

陆继善写道：“手种宜男寄去时，花开灼灼叶离离。芳心不似靡芜草，一任春风烂漫吹。”

陆继善，字继之，号甫里道人。吴江（今属江苏）人。居家读书，乡里称为善人。工诗文，善书画。与倪瓒交往密切。

任昱写道：“侬住湖边二十年，花开花落任春妍。门前有个垂杨柳，不著

游人系画船。”

任昱，字则明。四明（浙江宁波）人。与张可久、曹德等为同时人，互相唱和。少年时出入妓馆歌楼，号称“以小乐章流布裙钗”(《西湖竹枝集》)。晚年折节读书，足迹不出吴越间。散曲风格近于张可久，今存小令 59 首，套曲 1 套（据《全元散曲》）。《太和正音谱》列名于俱是杰作一百五十人中。

“居延王孙”不花帖木儿写道：“湖上春归人未归，桃红柳绿黄莺飞。桃花落时多结子，杨花落处只沾衣。”

不花帖木儿，字悳新（一作德新）。是祖籍高昌的畏吾人，高昌回鹘王后裔。倪瓒有《赋居延王孙德新小隐轩》（《草堂雅集》卷九）。他自署“北庭不花帖木儿”，杨维桢说，不花帖木儿以世胄出入贵游间，而无裘马声色之习，所为诗落笔有奇语。

明人和维针对《西湖竹枝集》说：“（钱塘西湖）山水之胜，人物之庶，风俗之富，时代之殊，一寓于词，各见其意。……‘竹枝’之音过于瞿塘、东吴远矣！”明人冯梦祯进一步说[1]：“吴越音妖冶浮艳，故其歌皆饶轻浅之味，而于情独深。如俗所传嘉兴歌出于妇人、儿子、船家、贩竖之口，而正使学士大夫深思苦索或不能就，乃知情之所肖即为诗。西湖竹枝词，所谓肖之者也。”“情之所肖即为诗”是集咏“西湖竹枝”的出发点，也是它存在并流行的基础。

顾瑛开始在新建的“玉山佳处”（“玉山草堂”）定期举办觞咏之会，此后，“草堂雅集”成为吴中诗坛的象征。

昆山豪富顾瑛在“玉山佳处”各景点轮番举办的会集，即吴中有名的诗人沙龙“草堂雅集”，是至正年间江南坚持最久、影响面最广的诗人会集。通过“草堂雅集”与“集咏西湖”，诗坛盟主顾瑛、杨维桢分别展示出号召力，纠集了追随者。这两次大致同时发起的活动，成为至正年间诗坛繁荣的推动力。

顾瑛（1310—1369），又名顾德辉、顾阿英；字仲英，号金粟道人。昆山（江苏太仓）人。家富资财，风流文雅，尤好于诗。与李孝光、张翥、张雨、杨维桢等交往密切。年近四十，将旧业尽付子侄，于宅邸之西重建馆阁，名为“玉山佳处”（即“玉山草堂”），并在此招待诗友，定期举行觞咏之会，一直延续到江南陷入战乱。元代后期，顾瑛的玉山佳处与倪瓒的“云林隐居”（“清閟阁”）、杨维桢的“草玄阁”等成为江南著名的诗人聚会之所。

[1] 这两段话都是出于《西湖竹枝集》的序。

而顾瑛本人是公认的吴中诗坛盟主。“玉山佳处”之会参加的人多，而且有比较固定的核心，在战乱之中仍然活动频繁。元至正八年以后的江南诗坛，流传至今的诗篇有几乎十分之一与顾瑛或玉山草堂有关。他儿子顾元臣曾任海军副万户，这是元朝对江南保持实际领有的相当关键的位置。明初，顾瑛因此阖家流放中都临濠，不久死于流放地。

顾瑛一生痴迷于诗歌，所作极富，但死后所作散失，诗集《玉山璞稿》原本二十卷（每年一卷），在他死于流放地临濠后已散失，仅有二卷存世。另有毛晋汲古阁所刊《玉山草堂集》二卷、集外诗一卷。清人鲍廷博辑《玉山逸稿》四卷，实际是《玉山草堂集》的重编增补本。顾瑛除了是当时诗坛最热心的东道主，还曾将朋友唱和之作编为《草堂雅集》《玉山名胜集》《玉山名胜外集》《玉山纪游》等总集。顾瑛《草堂雅集》与释来复《澹游集》是两种重要的元诗总集，对于元末诗坛关系至巨。玉山佳处的景点一开始有二十四处，后来有所扩建。具体有：玉山草堂、玉山佳处、种玉亭、小蓬莱、碧梧翠竹堂、湖光山色楼、读书舍、可诗斋、听雪斋、白云海、来龟轩、雪巢、春草池、绿波亭、绛雪亭、浣花馆、柳堂春、渔庄、书画舫、春晖楼、秋华亭、澹香亭、君子亭、钓月轩、拜石坛、翠寒所、芝云堂、金粟影等。玉山草堂与玉山佳处，是主景观。

据《草堂雅集》，顾瑛家中的诗酒之会，并非始自至正八年。但玉山佳处落成之后，从至正八年开始，才模式化，并具有了不同凡响的规模。这些会集，与会者有大致固定的人群。至正八年二月十九日会集，是会集中特别隆重的一次。张渥为其画了一幅“实况”，名为《桃源雅集图》。杨维桢的《桃源雅集图志》写道[①]：

……桃源主人，为昆丘顾德辉氏。其人青年好学，通文史及音律、钟鼎、古器物、书、名画品格之辨，性尤轻财喜客。海内名士未尝不造桃源所。其风采出于流辈者，尤为倾倒。故至正戊子二月十有九日之会为诸集之冠。主客凡十人，从者十三人，妓奴四人。冠鹿皮，衣紫绮，坐案而探卷者，铁笛道人、会稽杨维桢也。持铁笛而侍者，“翡翠屏”也。岸香几而雄辩者，野航道人姚文奂也。沉吟而痴坐搜句于景象外者，苕溪渔隐郯韶也。琴书左右，执玉麈，从容而谈笑者，即桃源主人也。

① 见陶宗仪《游志续编》卷下，具体文字，据《玉山名胜集》卷二所载作了校勘。这篇图志，不同的出处文字有异，但最主要的不同就是，在《玉山名胜集》等处，“桃源”一律改为“玉山”。这正好可以证明，“玉山佳处”原名是叫做“桃源”（或“小桃源”）的。

舒卷而作画者，吴门李云也，旁视而指画者，即张渥也。席皋比（虎皮）曲肱而枕石者，桃源之仲晋也（顾瑛的兄弟顾晋）。冠黄冠坐蟠根之上，皤然如矮瓠者，匡庐山人于立也。美衣巾，束冠带而立，颐指奴仆治酒者，桃源之子元臣也。捧肴核者，"丁香秀"。持觞而听令者，"小琼英"也。一时人品，疏通俊朗，侍姬执伎皆妍整，奔走童隶亦皆驯雅，安于矩矱之内。觞政流行，乐部谐畅。碧梧翠竹与青杨争秀，落花芳草与才情俱飞。登口成句，落毫成文。花月不妖，湖山有发。是宜斯图一出，为一时名流所慕用也。时期而不至者，句曲外史张雨、永嘉徵君李孝光、东海吴克恭、毗陵倪瓒、天台陈基也。

通过这篇序可知，最初"玉山佳处"，叫做"桃源"。"玉山"这个名字，对于顾瑛与其会集意义重大，特别是对于以后——至正十一年后——更是如此。但聚会"桃源"而不是玉山，使整个吴中诗坛（特别是至正十二年以后）无疑进入梦魇。

能够出席顾瑛家玉山草堂的觞咏之会，成了具有诗人身份的标志。

此后仅有几年间，长期战乱就波及江南。有不少诗人，就是因参与吴中的"玉山草堂"会集，才得以留名文学史。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甲前集，特别列出了"玉山草堂饯别寄赠诸诗人"，其中包括：柯九思、张翥、黄公望、倪瓒、熊梦祥、杨维桢、顾瑛、于立、张天英、张田、刘西村、郯韶、张简、沈明远、俞明德、周砥、瞿荣智、殷奎、卢昭、金翼、陈裂、陈基、张师贤、顾敬、郭翼、秦约、陆仁、王巽、卫仁近、吕恒、吴克恭、文质、聂镛、张渥、李廷臣、袁华、释良琦，共37人。这个名单中的一些人并不知名，如张田、刘西村。名单之外也有经常出席觞咏之会，但没有诗作流传至今的人，比如朱珪等，另外，仅《草堂雅集》就收入80人。实际至正年间与顾瑛唱和的不止百人，除杨维桢、柯九思、张翥等人，从至正八年开始实际参与"玉山草堂"唱和的主要有：

聂镛，字茂先（一作茂宣），号太拙生。蒙古族，占籍蓟丘（北京市）。幼颖悟，游历江南，从南士问学，通经术，善诗歌，尤工小乐章。被认为音节刻意学萨都刺。

于立（？—1365），字彦成，号虚白子、会稽外史、匡庐山人。南康庐山（今属江西）人。宋代将门之后，学道会稽山中，得石室藏书，以诗酒放浪江湖间。久在吴中，与顾瑛友善。通古今，善谈笑，是顾瑛玉山草堂的固定宾客，顾瑛甚至为他在家中设置了专门的客房——"行窝"，作为道士已

经与清客无异。至正中期的昆山玉山草堂诗酒觞咏之会，于立是出席次数最多、唱和最用力的人之一，几乎成了顾瑛的“影子诗人”。常为顾瑛品题法书名画。杨维桢曾说于立诗有二李风，人如行云流水，无所凝滞（《西湖竹枝集》）；顾瑛也说他“长吟短咏，有二李风”（《草堂雅集》卷十三），其实这就是典型的“铁崖体”风格。

熊梦祥，字自得，号松云道人。南昌进贤（今属江西）人。生于元初，是顾瑛的忘年交。在草堂觞咏参与者中年龄最大。曾以茂才异等荐为白鹿书院山长，并任大都路儒学提举、崇文监丞。以年老辞还江南，优游淮浙，晚年卜居娄江。明初尚在世，去世时已九十岁。熊梦祥博览群书，旁通音律，山水画尤其清古。杨维桢称熊梦祥“作诗为文，思若涌泉”（《西湖竹枝集》）。有《释乐书》，未流传至今；还写有《析津志》。按：熊梦祥籍贯或作富州（江西丰城）；一说，他名自得，字梦祥。

文质，字学古，号海屋，晚号雁门叟。甬东（浙江宁波）人，寓居娄江（江苏苏州）。隐于乡里，每过玉山草堂，必定谈笑终日。顾瑛说他“有诗名，好为长吉体。酒酣长歌，声若金石”（《草堂雅集》卷二）。曾与杨维桢一起夜行，遇到有同行人挑梅花灯，杨维桢让他赋诗，他立即就写了一首，为杨维桢称赏。在家乡以宿儒身份，与其他五人每月都受到地方政府的固定资助。享年九十六岁。

郯韶，字九成，号云台散史、苕溪渔者。湖州（浙江吴兴）人。至正年间，曾任试漕府掾史，并不热衷职事。好读书，澹然以诗酒自乐。经常出入玉山草堂，与张雨、杨维桢、倪瓒、危素等人唱和酬答，是西浙文坛相当活跃的人物。所作曾结集，但久无传本，仅杨维桢《郯韶诗序》保留在《东维子集》卷七，杨维桢说:“韶诗情丽而温重，无穷愁险苦之态”。这与他对郭翼诗歌的评价十分相近。顾瑛则说：郯韶“作赋不习近世体，欲追唐人之盛”（《草堂雅集》卷十）。这都是“铁崖体”的典型风格。

姚文奂，字子章，号娄东生。昆山（今属江苏）人。聪敏好学，有过目成诵之才，博涉经史。荐为浙东宣慰司令史。公事冗杂，仍不废吟咏。常把酒论诗，十分潇洒超脱。家中有野航亭，人称“姚野航”。与郯韶、顾瑛等酬唱于玉山草堂，诗主要保存在《草堂雅集》中，顾瑛说：姚文奂“每过予草堂，必有新作，多为录出”。

张天英，字羲上，号石渠，又号南渠（或作楠渠）。温州（今属浙江）人。酷志读书二十年，徵为国子助教。不善趋谒，任满再不愿就任其他官职。出游浙西，常寓居吴郡。与顾瑛友善，只要写出新诗，必定要寄给顾瑛。

李元珪，字廷璧。河东（山西永济）人。一生未仕，酷爱读书，不随便

与人接交。晚年滞留吴中，无子，所以诗篇多叹老悲穷之作。经常往来于倪瓒的云林隐居与顾瑛的玉山草堂之间，并在两地结识了许多文朋诗友，时相唱和。杨维桢曾称他是“中州之善学者”。

卞思义，字宜之。山阳（江苏淮安）人。气宇疏旷，浙西宪府辟为属掾，改都水庸田司吏。虽在职为官，仍不废吟咏。写诗长于咏物，《汗酒》《铁笛》等受到时人称颂。出入于顾瑛玉山草堂，并参与杨维桢《西湖竹枝词》唱和。

张舜咨，字师夔，号栎山，又号辄醉翁。钱塘（浙江杭州）人。由江浙行省宣使，调休宁主簿。工诗善画，尤工山水。出入于吴中顾瑛玉山草堂，年八十犹健在。

岳榆，字季坚。宜兴（今属江苏）人。出自名门，其父岳浚是岳飞六世孙。工诗，曾入计筹山学道，至正中预顾瑛玉山草堂诗酒觞咏之会。

释良琦，字元璞。吴郡（江苏苏州）人。幼年出家，深究佛理，并通儒学。历住吴郡龙门寺、嘉兴兴圣寺，足迹不出浙东，是顾瑛玉山草堂的座上客，常预草堂诗酒觞咏之会。诗多题咏之作。与成廷珪、倪瓒等过从密切。

释元本，字立中，号琼台山人。临海（今属浙江）人。原来久住松江，后遍访浙东名山古刹，并至吴门，至正间与顾瑛、陈基等唱和于吴中，较有诗名。被陈基称为“肆笔为诗章，奕奕有奇气”（《夷白斋稿》卷十八）。

释自恢，字初元（一作复元）。南昌（今属江西）人。住海盐之法喜寺，至正间亦曾参与顾瑛玉山草堂的会集，是比较活跃的诗僧。明初，改住庐山，卒于洪武年间。

释文信，字道元。永嘉（浙江温州）人。住石湖宝华寺。至正年间与张雨、杨维桢交游，曾作《西湖竹枝词》三首。顾瑛重建玉山草堂后，文信亦时相过从，卒于元明替代之际。

从以上参与者可以看出，所谓“铁崖体”得以风靡于至正年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草玄阁”“清閟阁”（“云林隐居”）等处，特别是“玉山草堂”的觞咏会集，这就是参与者的请柬与门票。

四月。元廷据御史台二月二十二日的建言批复，提出“风宪不用乐人”。

刘孟琛编辑的《南台备要》（《永乐大典》卷二六一〇）第五十六节记载:“准御史台咨：至正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御史台奏:‘风宪里委付来的官吏人等，休教唤唱歌的者。’么道，禁的圣旨有来。近来衙门里不用，却于私家或别处，指以宴会为由，却用。么道，就里玷污风宪有。今后，除天寿节、正旦、迎接诏书呵，用者，其余不拣那里，毋得呼唤做杂剧并弹唱的妇人每

者。若别了的人每根底，要了罪过。风宪里不用呵，怎生？奏呵，‘似这般歹行止的每根底，纠言者。’么道。圣旨了也。”据此可知，原来官场普遍存在风宪用乐人的情况。因此，不得不明令除节庆，官方活动不许演出杂剧或清唱散曲。从中也可以看出杂剧与散曲在当时普及到何种程度。

五月。虞集去世。享年七十七岁。

虞集（1272—1348），字伯生，号道园，又号邵庵。抚州崇仁（今属江西）人。南宋丞相虞允文五世孙。早年曾以契家子身份师从吴澄，大德六

大元故奉國上将軍
行中書省叅知政事
廣東道宣慰使都元
帥劉公神道碑銘
翰林待制儒林
郎兼國史院編
脩官虞集撰并書
元帥諱垓字仲寬河
南鄧州穰縣人故驃
騎衛上将軍中書左

这是虞集全盛时期的书法作品，与失明时所写判若两人。

年，荐授大都路儒学教授，后任国子助教，升国子博士，在职以师道自任。元仁宗即位，除太常博士，迁集贤修撰。延祐六年改翰林待制。丁忧还江南。泰定初授国子司业，迁秘书少监。曾与集贤侍读学士王结讲经上都。拜翰林直学士，不久兼任国子祭酒。元文宗即位，命虞集仍兼经筵，除奎章阁侍书学士，与中书平章赵世延同任《经世大典》总裁。书成，虞集以目疾请求解职归里，未获准许。元文宗去世，称病辞还临川。病故于家，谥文靖，追封仁寿郡公。一生最后十余年间，虞集一直受眼疾折磨，几近失明。借《为从子旦题所藏予昔年在京写冬窝赋手卷后》（《道园类稿》卷三十五），虞集自言："予晚归江上，旋得目疾。""摩挲残楮，不能复见，况复能书此邪？"明

飲中八僊歌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
井水底眠汝陽三斗始朝
天道逢麴車口流涎恨不
移封向酒泉左相日興費
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
盃樂聖稱世賢宗之蕭灑
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
皎如玉樹臨風前蘇晉長
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
禪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
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
上船自稱臣是酒中僊張
旭三盃草聖傳脫帽露頂
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
辯驚四筵
泰定乙丑七月暇日展卷
因書于後蜀郡虞集

目疾深坐聽讀金臺
稿喜而偶作寫奉
易之孝廉良友
集頓首
力疾坐雲館移床近
竹坡卷簾新雨過
歌挽晚涼多病覺
喜省誠詩極好寄歌
因君懷郭隗千古
意都行

金臺集　　　　汲古閣

虞集是书法家。这两幅作品是他一生不同时期所写。上图，《饮中八仙歌》写于泰定二年七月，当时虞集五十四岁。下图，是他在至正五年前后应邀为廼贤《金台集》写的题跋："目疾深坐，听读《金台稿》，喜而偶作。写奉易之孝廉良友。集顿首。"这些字是他几乎完全失明时写的，全凭感觉了。但这时的书法更有个性。

人李日华曾说："余尝见虞伯生晚年丧明后书，糊涂潦倒，而真态溢出，弥复可贵。良由法度意趣，熟烂胸中，废目，而一以神行之，故有意外之奇耳。"①

虞集是元代最重要的诗文家，这是当时与后世公论。而虞集曾综论有元一代之文学说②：

> 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者。汉之文章，唐之律诗，宋之道学，国朝之今乐府，亦关于气数音律之盛。其所谓杂剧者，虽曰本于梨园之戏，中间多以古史编成，包含讽谏，无中生有，有深意焉。是亦不失为美刺之一端也。

这段话是元人孔齐作的概括，不一定是原文。但以虞集所处的地位，与原文相距不会太远。虞集虽然有词曲之长，但不以散曲著称；也不作杂剧，他是诗文大家，却认定"民间"的、非传统的元曲（散曲、杂剧）是本朝足称于后代的"绝艺"。除了说明当时社会舆论所向，也可知虞集其人绝非浪得虚名。

王艮去世。享年七十一岁。

王艮（1278—1348），字止善，号止斋，又号鵝游子。诸暨（今属浙江）人。为人尚气节，读书讲求明理以致用。淮东廉访司辟为书吏，历任庐州录事判官、淮西宣慰司令史、峡州总管府知事、江浙行省掾史。在两浙都转运盐使司经历任上，为民请命并有成效。任江浙行省检校官、江西行省左右司员外郎等职时，政绩卓著。以中宪大夫，淮东道宣慰副使致仕。二十岁时曾出游钱塘，与杨载交谊较深；入仕后，仍然著意诗文，并执作品谒见文坛名流，受赵孟頫、邓文原等赏识。拂衣归田后，家居五年，居室称为"止止斋"以明志。论诗务取法古人之雄浑，而脱去近世萎弱之习。柯九思被贬归故里，他赠诗说："与子浮沉三十载，归来文采更风流。虚名聊尔或见录，尤物移人何足留。"既见真情，又含劝慰。《元诗选》三集选录其诗24首。

曹文炳去世。享年七十岁。

曹文炳（1279—1348），字君焕，号霞间。台州（浙江临海）人。笃学隐居，知名乡里，与其弟曹文晦并称"二曹"。延祐间，邑令佟复以儒学训导荐，辞不就。一生著述颇多，是台州诗文传承的重要人物，但别集散佚，

① 《味水轩日记》卷三。

② 见孔齐《至正直记》卷三"虞邵庵论"节。

元诗总集从无曹文炳其人其诗。清宣统元年（1909）裔孙曹希璨辑刊天台曹氏遗文为《曹氏传芳录》，其中有曹文炳《霞间稿》，仅存诗3首、文2篇。

黄清老去世。享年五十九岁。

黄清老（1290—1348），字子肃，号樵水。邵武（今属福建）人。少治《春秋》，泰定三年江浙乡试第一，明年登进士。由曹元用、马祖常等人出面举荐，留在馆阁任职，授翰林典籍。不久，升翰林检阅，又任翰林应奉文字、兼国史院编修。至正元年出任湖广省儒学提举。著有《樵水集》《春秋经旨》《四书一贯》等。《樵水集》是诗集，清初尚存，但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已不见传本。顾嗣立编《元诗选》，二集曾自《樵水集》选黄清老诗85首，并摘录张以宁为《樵水集》所作的序。

至正九年己丑（1349）

夏。李祁与远者图分别为释惟则别集《师子林别录》作序。

释惟则（天如禅师）在“语录”之外，将诗文结为六卷，名为《师子林别录》。李祁在《师子林别录》序中说：“天如禅师世居庐陵之永新，为名族。予家湘之茶陵，去师所居，仅二十余里，且以婚媾相往来，故早得闻师名。”远者图，时为翰林待制，蒙古族。

夏。色目人迺贤首次赴上都滦阳观礼，并将此行的诗篇结为《上京纪行》。

《上京纪行》包括31首诗。其中有纪行之作，也有纯属个人抒写感受的篇什。自至正三年离家乡四明北上，几年间，迺贤积极入世可又一无所获。这次赴上都观礼，使在江南长大的西域人大开眼界。迺贤在上都住了一两个月，七月十六日在上京旅舍遇到了塞外也罕见的大雪。在上京期间，皇室的辉煌豪华，使诗人产生了隔岸观火的局外人的感觉，使他颇为落寞。《上京纪行》[①] 编入《金台集》卷二，第一首是《发大都》，末一首是《还京道

① 《上京纪行》未纪年。但《失剌斡耳朵观诈马宴奉次贡泰甫授经先生韵》诗注“时太傅脱公再入相”。据《元史·顺帝本纪》，至正九年闰七月“辛酉，诏脱脱为中书右丞相”。《上京纪行》的《行路难》诗序也说“至正己丑夏，右相朵儿只公拜国王”。故应作于至正九年夏秋间。

中》。以《塞上曲》五首较有名，其三是：

双环小女玉娟娟，自卷毡帘出帐前。忽见一枝长十八[1]，折来簪在帽檐边。

这就是大方豪爽的塞北少女给江南儒士的第一印象。

八月。福建宪使僧家奴与申屠駉、奥鲁赤、赫德尔等在乌石山联句赋诗，并将所作《道山亭联句》刊于摩岩。

僧家奴[2]，字元卿，号崞山野人。蒙古术里歹氏。曾祖杰烈从成吉思汗攻略江山，此后三世皆镇山西。僧家奴早年为元武宗宿卫，至正初任广东宣慰使都元帅、江浙行省参政，历福建宪使。政事之余经史不离于手，并不辍吟咏。有《崞山诗集》，由虞集作序（《道园类稿》卷十九），但未见传本。

奥鲁赤，子文卿，时与赫德尔、申屠駉均任福建廉访佥事。赫德尔，字本初，进士出身，至顺二年任奉化知州。以上三人都是蒙古族。申屠駉，字子迪，寿张（今属山东）人。进士出身，诗文均有时名。

道山亭是福建侯官乌石山的名胜。《道山亭联句》诗及后序云[3]：

追陪偶上道山亭，迭嶂层峦绕郡青。（子迪）万井人家铺地锦，九衢楼阁画帏屏。（元卿）波摇海月添诗兴，坐引天风吹酒醒。（本初）久立危栏频北望，无边秋色杳冥冥。（文卿）

右宪使崞山僧家奴元卿公，佥宪奥鲁赤文卿公，申屠駉子迪公，赫德尔本初公，暇日燕集联句也。谭忝备宪幕，重惟诸公皆文章名士，南北隔数千里，同仕于闽，以道义相处，文字为娱，诚一时之佳会。因勒岩石以纪我元文物之盛云。至正九年八月望日，经历赵谭识。知事任允书。宪副朵儿只班善卿公，继登斯亭，览山川之胜概，睹群公之赋咏，曰：此盛事也。遂题于后。

这是元诗史上仅见的以蒙古族为主的联句活动，堪称一时之盛。这也是元代蒙古色目双语作家达到全盛时期的标志。

---

① 作者自注："长十八，花草名。"另有琵琶古曲名为《花十八》。
② 僧家奴，又作僧家讷、僧嘉讷。
③ 沈瑜庆等《福建通志》金石志卷十三（石十二）。

九月。色目人定位与魏观等人登滕王阁，饮酒赋诗。

《滕王阁全集》卷五有魏观诗，题为《至正己丑九月定子静李从义诸公邀予登阁饮酒各赋一首不惭续貂》，诗中有“伤心宇宙成漂泊，倚目江山送别离”之句[①]。此后江南陷入全面战乱，定位死于与朱元璋的决战中。朱元璋建立明朝，魏观出任苏州知府，为建新府衙被处死，并牵连到高启、王彝等人。

全普庵撒里出守赣州，与艺妓刘婆惜产生一段恋情。

元曲家全普庵撒里（全子仁），高昌畏吾人，汉语名全晋。《青楼集》云:“刘婆惜，乐人李四之妻也。江右与杨春秀同时。颇通文墨，滑稽歌舞，迥出其流，时贵多重之。先与抚州常推官之子三舍者交好，苦其夫间阻，一日偕宵遁，事觉，决杖。刘负愧，将之广海居焉。道经赣州时，有全普庵撒里，字子仁，由礼部尚书[②]值天下多故，选用除赣州监郡，平昔守官清廉，文章政事，扬历台省，但未免耽于花酒。每日公余，即与士夫酣歌赋诗，帽上常喜簪花，否则或果或叶，亦簪一枝。一日，刘之广海过赣，谒全公。全曰:‘刑余之妇，无足与也。’刘谓阍者曰:‘妾欲之广海，誓不复还，久闻尚书清誉，获一见而逝，死无撼也。’全哀其志，而与进焉。时宾朋满座，全帽上簪青梅一枝行酒，全口占〔清江引〕曲云:‘青青子儿枝上结’，令宾朋续之。众未有对者，刘敛袂进前曰:‘能容妾一辞乎?’全曰可。刘应声曰:‘青青子儿枝上结，引惹人攀折。其中全子仁，就里滋味别，只为你酸留意儿难弃舍。’全大称赞，由是顾宠无间，纳为侧室。后兵兴，全死节，刘恪守妇道，善终于家。”[③] 在元末文献记载中，全普庵撒里有两个面目，一个是怜香惜玉的风流才子；另一个是残暴的为元廷尽忠的守臣。

畅销于民间的诗学启蒙读物《联新事备诗学大成》，序刊于建宁。

几种元代诗学著作，比如杨载《诗法家数》、范椁《木天禁语》等，真伪存有疑问。但元代诗学确实相当发达。宋代诗学的关注点是诗话，元代社会普遍需求的则是写诗方法、速成学诗课本等类著作。元人林桢编撰《联新

---

① 见清人蔡士英辑《滕王阁全集》卷五。

② “礼部尚书”，据《元史》卷一九五本传:“出为广东廉访使，寻除兵部尚书。未几，授赣州路达鲁花赤。”故应是“兵部尚书”之误。本传将其出守赣州，纪于“至正十一年，颍州盗起”之前。故暂将刘婆惜与全普庵撒里的相会暂定在至正九年。

③ 这段记载相当有名，在不同的文献中，情节略有不同。参阅孙崇涛、徐宏图《青楼集笺注》第214页。明人汪廷讷曾将这个故事演为杂剧《青梅佳句》。

事备诗学大成》三十卷，是其中分量较重、编写较专业的一种。这是与诗话（诗评）不同的诗学著作，它从写诗的实际出发，类编成写诗便检（或叫《学诗手册》），供入门者写作时参考。这种书籍的容量一般都较大，以类书方式编辑，实用便检。

与此前的《增修诗学集成押韵渊海》（后至元六年序刊）、《新编增广事联诗学大成》（皇庆元年序刊，至正二年重刊）等同类书籍相比，《联新事备诗学大成》篇幅虽然不是最大的，但更便于阅读利用。本书作者署名“林桢”；卷首有“至正己丑朱文霆叙”，今存至正九年建宁路书市刘衡甫刻本。全书仿《艺文类聚》，分为三十二门，每则有〔事类〕〔散对〕两类，后者以“起”“联”“结”别录诗句等内容，实用性颇强。说它更流行的例证是：本书有明代的覆刻本，只是名字修饰成《新刊京本增广联新事备诗学大成》——书的名字就是它的广告。编撰者林桢事迹不详，作序者朱文霆（1295—1363），字原道，莆田人，元统元年进士。久在福建做官，在《元诗选癸集》辛集上存诗仅一首。通过这几部书足以说明：元诗学远比已知的要发达普及；当时人们的关注点其实并不在《诗法家数》或《木天禁语》这类书上。

这类诗学“普及读物”，社会的需求量相当可观。早在皇庆元年，就出版了《新编增广事联诗学大成》三十卷，本书未署编撰者之名。卷首是皇庆元年中秋建安毛直方序[1]。毛直方是元初人，在诗坛影响较大，《元诗选》三集有其《聊复轩斐集》，存诗 26 首。至正二年，《新编增广事联诗学大成》三十卷出了新一版，仍然没有注明撰写者姓名，书牌仅云“至正壬午仲春，日新书院重刊”。同类诗学著作，还有《新编增广事联诗苑丛珠》三十卷（祝明撰、潘瑛续撰）、《声律发蒙》五卷等，不仅篇幅颇大，而且越来越趋于实用。以此可见元代诗学在民间是何等发达。此外，还有专门的便携诗韵。《四库全书总目》说：“押韵之书，盛于宋末元初。”[2] 实际上，是兴起于宋，集大成于元。大德年间阴劲弦、阴复春编集的《韵府群玉》二十卷，是篇幅颇大的一种，其字数多达百万，甚至一直到清朝还在实际使用中。而这两个编者是由宋入元的隐士，《韵府群玉》对元初诗学勃兴起了催化剂作用。

许有壬致仕，回归家乡相州。“圭塘唱和”即在此后。

在此之前，许有壬曾数次辞归。但这是他在家乡休致时间最长的一次。

---

[1] 《元诗选》小传，以为毛直方就是《新编增广事联诗学大成》三十卷的作者。以毛直方那样的文人，恐怕没有时间作如此繁琐具体的事。

[2] 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六《韵府群玉》“提要”。

他在相州府第附近买了一处旧宅，经重建名为“圭塘别墅”，与家人、朋友觞咏唱和其中，并将所作结为《圭塘欸乃集》二卷。这个会集虽不如草堂雅集影响大、持续久，但与草堂雅集不同之处是一家人唱和，“自相师友”，仍然是北方重要的文学活动。周伯琦应邀为《圭塘欸乃集》作序，写明圭塘别墅的来历与圭塘唱和的经过：

> 中丞安阳许公……谢事归相城，于其第之西二里，得康氏废园。薙灌莽，芟菑翳，廓然一新，既又凿池其中，袤广以步计者千余，深八尺，形如桓圭。双洲右枕，孤岛左峙，夷堤缘焉，回垣缭焉。导渠西北，时其泄闭。直坤有崇台，西山在肘腋间。……芙蕖杨柳，枣栗桑榆，梅榴桃杏，苍松翠竹，繁花丰草，周于池之中外，盖培植逾年而后成。……惟二古桧岿然，乃康氏故物。公既甚爱之，时杖屦携弟若子，会宾友觞咏其间，以池之占胜居多，故以“圭塘”名。而此唱彼和，宫商递宣，少长同欢，主宾相忘，一草一木，品题不遗。故名其篇集曰“欸乃”，若渔歌互答，然亦谦辞也。

参加“圭塘唱和”的，除许有壬，还有其弟许有孚、其子许桢、门客马熙。《圭塘欸乃集》存唱和诗219首，词66阕。“一门之中，父子兄弟自相师友，其风流文雅之盛，犹可以想见”①。

许有孚，字可行，许有壬之弟。由国学上舍，登至顺元年进士第，授湖广儒学副提举，后改任湖广行省检校。至正元年任南台御史，迁太常院同佥。许桢，字元幹，许有壬之子。以门功补太祝，至正间任秘书郎，入明仍在世。马熙，字明初。衡州安仁（今属湖南）人。历官右卫率府教授。他的唱和主要是“补和”。

至正前期，诗的普及超过其他文体，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至正直记》（卷四“诗联对句”节）记述了一件事：一个读书人喜欢对句，他为自己的一联诗句非常得意：“舍弟江南死，家兄塞北亡。”人们纷纷对他的不幸表示同情，可一问，他竟是“孤独一枝”，原本无兄无弟。于是，有人为他续写了下两句：“只求诗对好，不怕两重丧”。这成了当时讥讽“妄作诗求切对”的典故。

---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八《圭塘欸乃集》提要。

赵期颐累迁中书参议。

赵期颐，字子期。汴梁（河南开封）人。泰定四年进士，至顺三年，以礼部郎中副使安南。由中书参议，历国子祭酒、工部尚书，出为河南行省参政，终西台治书侍御史。天历、至正间，知名于南北文坛，诗文书法均有成就。

偰玉立任泉州路达鲁花赤。

偰玉立（约1294—?），字世玉，号止堂（或作止庵）。高昌畏吾人，因世居偰辇河，便以偰为姓。偰氏应为信奉摩尼教的世家[1]。随蒙古大军进入中原后，祖父、父亲历仕各地。偰玉立兄弟五人均以儒业起家，先后登进士第。偰玉立是延祐五年进士，授秘书监著作佐郎，历翰林待制、河东肃政廉访司佥事、泉州路达鲁花赤。后迁湖广佥事、海北海南道肃政廉访使。偰氏是高昌王国世家，欧阳玄撰有《高昌偰氏家传》（《圭斋集》卷十一），是有关偰氏及高昌回鹘王国的重要史料。偰玉立有诗名，在泉州路达鲁花赤任上，考求图志，搜访逸闻，请人撰写了《清源续志》二十卷。《元诗选》三集录其诗13首，题《世玉集》，系顾嗣立所辑。

祝诚撰写《莲堂诗话》二卷[2]。

祝诚，海昌（广东电白）人。生平不详。与宋相比，元人的论诗著作不多见，《莲堂诗话》是其中比较接近宋人诗话的一种。书中涉及的历代诗人，以闽籍为多。

唐元去世。享年八十一岁。

唐元（1269—1349），字长孺，号筠轩。歙县（今属安徽）人。早年以诗谒见方回，受到称赏。泰定四年以文学授平江路学录，迁分水县教谕，又任集庆路南轩书院山长，以徽州儒学教授致仕。一生主要在江南各地出任教职，早期受知于卢挚、刘致。其子唐桂芳曾把唐元诗文著述近七千篇编为文集五十卷，未见传本，明人程敏政编《唐氏三先生集》三十卷，收入唐元及其子唐桂芳、其孙唐文凤祖孙三代诗文，其中有唐元《筠轩诗稿》八卷、《筠轩文稿》五卷。今存唐元《筠轩集》就出自《唐氏三先生集》。另著《易大义》《见闻录》，但都未见传。

---

① 此从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二）说。

② 对祝诚与《莲堂诗话》，目前均所知不多。在《莲堂诗话》正文中有“至元丁丑以来，十数年间”之语，而至元应是后至元。故暂系于此。

王守诚去世。享年五十四岁。

王守诚（1296—1349），字君实。太原阳曲（今属山西）人。泰定元年进士，授秘书郎。迁太常博士，转艺林库使。出为西台御史，除奎章阁鉴书博士，拜监察御史，山东廉访司佥事，累官礼部尚书，擢中书参议，调燕南廉访使。至正五年除河南行省参政，进河南左丞，未上，以丁忧归。卒，谥文昭。曾与修《经世大典》与辽、金、宋三朝史。

至正十年庚寅（1350）

五月十一日。曹知白为阿里西瑛作《群山雪霁图》[1]。

在图上，曹知白自题“洼盈轩为懒云窝作”。从延祐至至正近四十年间，阿里西瑛的懒云窝长期是文坛的聚会地点。画上还有黄公望为其题识，开篇即云：“云翁为西瑛作此，时年七十有九。”可见当时阿里西瑛仍然在世，年辈应与曹知白（1272—1355）大致相仿。而黄公望也是元曲家，名在《录鬼簿》卷下，他也应是懒云窝的常客。

十月十六日（既望）。李孝光去世[2]。

李孝光是在获准以秘书监丞致仕之后，死在还乡途中。陈德永为李孝光写的“行状”（《五峰集》附录）说：李孝光以秘书监丞致仕，“泛舟南归，行次同州，以病终。享年六十有六。时至正十年冬十月既望也。”

十二月。危素作《云林图记》，表达了对故乡特别是云林山景物的怀念。

作《云林图记》（《说学斋稿》卷二）几个月后，与家乡联系就因战乱

① 见《中国绘画史图录》（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上册第358页。

② 李孝光生卒年，有异说。《元史》本传说他在至正八年之后“卒于官。年五十三”。陈德永的“行状”则说死在至正十年。陈德永的“行状”中，有一些地方尚有疑问，比如说李孝光死时其妻徐氏“年垂七十，康强无恙”；但到至正二十五年，才安葬李孝光灵柩，那时“徐恭人年登九十”。至正十年与二十五年，其间有十五六年的间隔。故关于李孝光生卒年，笔者原从《元史》之说。但是在《雁荡十记》中，李孝光曾说“大德七年秋八月，予尝从老先生来观大龙湫”。如按《元史》，大德七年则还不到十岁。故暂从“行状”。

梗阻而不再畅通，对云林山的记忆更为珍贵了。云林山在金溪县东，是大庾岭余脉。至元二十一年，危素祖父由县城梯云坊移居云林山下，危素本人即以“云林”为别号。在京师，危素是江南籍特别是江西籍文人的“联系人”。本年十二月，危素寄居的城南头陀寺附近下雪盈尺，道无行人。深夜展示友人画的《云林图》，使危素难以排遣乡思。在此前，他曾请新科进士、乃蛮人答禄与权为《云林图》题诗，并答应写一篇记述云林山景物与自己早年生活的文章。当提笔写时，才知道家山影响无时不在，“忽忆去家十有四年，左亲戚，弃坟墓，竟何为哉?”全文的结尾是:“予明年四十有九，距纳禄之年固非远矣。幸而清朝从其早退，归与樵夫野叟嬉游山间，上下云月，歌诸公之诗，亦足以自乐也。”——然而此后他在大都官场又滞留了十七八年，直到元朝灭亡。

顾瑛为扩大玉山草堂觞咏之会的影响，编辑了诗总集《草堂雅集》[①]。

《草堂雅集》（全名《玉山草堂雅集》）不但选录了3000多首诗，同时对元至正间的诗歌繁荣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元明之际的总集，如《澹游集》《金玉编》《金兰集》等，从内容到方式都受到《草堂雅集》影响。

《草堂雅集》编于元顺帝至正年间，顾瑛在家乡建玉山草堂，广延四方名士，以文坛盟主自视，并编辑了本集及《玉山名胜集》。据《四库全书总目》说，顾瑛是“仿段成式《汉上题襟集》例，编唱和之作为此集”，但集中所收入的诗人，有顾氏未曾识面的；集中所收入的诗篇，也不止于唱和之作。在收入唱和之作时，尽量附出原诗以供参阅。在每个诗人名下，顾瑛都撰有小传，小传或简或繁，繁者除字里事迹之外，还评述了其人的文学成就。本集的特点是所收入元后期诗人较广泛，录存诗歌数量较多，清人顾嗣立编《元诗选》时，曾据以丰富了收录的范围。由于是选录时人诗作，所以无论小传还是诗篇，都比较可靠，这也是历来诗选家、诗评家重视它的原因。《草堂雅集》各种版本不但卷数不同，收入诗人、诗篇数量不同，各卷所收的范围也很不一致，说明它也是经过多次修订。《四库全书》本十三卷，所收诗人起自陈基，止于释自恢，凡70人。元刊本十三卷，卷一有后集二卷，卷二、卷九、卷十二各有后集一卷，实为十八卷。所收诗人起自柯九思，止于释自恢，凡74人。清徐渭仁旧藏钞本十六卷本，卷一卷二各有后集一卷，也是十八卷，起自柯九思，收入80人，存诗3369首，是各种版本中收入诗

① 今本《草堂雅集》没有原序跋。但是，这部总集的主要特点应是，一，编在至正八年玉山草堂开始会集后，二，是必然与杨维桢关系密切。而书中的诗有作于至正十年的，它肯定始编于至正十二年战乱波及江南之前。所以暂系在本年。

人与诗篇最多者，想必也应是最后的定本。

危素为西域诗人答失蛮作《云松隐者图序》。

《云松隐者图序》（《说学斋稿》卷四）为西域阿鲁浑氏的答失蛮作。答失蛮，是元代特有名词，本义是伊斯兰教教徒或家族有伊斯兰教背景的人。作为人名也是元代独有。答失蛮，字彦修。出自显宦家族，时任秘书少监，“然襟度夷雅，恬淡自将。居京师修文坊，恒杜门却扫，留情诗书文艺之间”，是人居中原的第四代西域阿鲁浑人。李士瞻《经济集》卷六有《甲午岁题江汉王粲楼和答石蛮彦修》诗，可知至正十四年尚在世。答失蛮以“云松隐者”为别号，存诗5首：《近律一首奉致师子林》《夜宿武夷宫》《宿武夷宫三首》，其一是与释子往还，后四首是出游道教圣地时作。对中原文化具有亲和力，正是答失蛮与也里可温作家们的特点。

天台籍诗人曹文晦作《新山别馆十景》。

曹文晦，字辉伯（或作伯辉），号新山道人。天台（今属浙江）人。少年时，受到兄长曹文炳影响，颖悟多识，而雅尚萧散，不求仕进。喜好吟咏诗歌，而且所作大有情致。鄞县县令许广大曾聘任县儒学教谕，但辞不就职。自己建宅读书，名为“新山别馆”，并于至正十年作《新山别馆十景》诗。元代天台籍诗人当中，以曹文晦成就最大。有诗集《新山稿》，清初尚存，今未见传本。顾嗣立于康熙年间编《元诗选》，曾自《新山稿》中选录曹文晦诗100首，编入二集。如今评价曹文晦的诗作，只能依据《元诗选》。

八十一岁的黄公望，历经四个年头——从至正七年构思下笔——创制的《富春山居图》基本成型。

《富春山居图》是元代著名的山水画，以全景式的“广角”视野，展示出以富春山为背景的山居生涯。黄公望出生于宋亡前，借《富春山居图》将八十年来从元人主江南，直到全盛的丰富感受，用一幅山水长卷表现出来。他心目之中的“富春山居”，就是“桃源胜景”在现实生活的再现，因之对身处仕隐之间的文人等于精神归宿，深刻影响了元明之际的文学与文人生活取向。

黄公望（1269—1354），字子久，号大痴，又号一峰。常熟（今属江苏）人。元代四大画家之一。天姿孤高，徐琰任为浙西廉访司书吏，后到大都任御史台书吏。一度受平章张闾贪酷案牵连而入狱，延祐年间出狱后，返回江南，并出家入道。黄公望享年八十六岁，几乎和元朝共终始，他对后世的影

响，主要在绘画方面，但在元朝，却是知名度颇高的曲家，钟嗣成与其是好友，《录鬼簿》将其列入“方今才人”节，并说“公望之学问，不待文饰。至天下之事无所不知，下至薄技小艺，无所不能；长词短曲，落笔即成，人皆师尊之。”散曲仅存小令一首。诗宗晚唐，《元诗选》二集有《大痴道人集》，主要是题画之作，这也是黄公望诗的特点。

十月。朝廷议决更改钞法，元曲名篇《上高监司》是其得失的镜鉴。

钞法变更是元末长期战乱的前奏，也是元廷在长治久安与分崩离析之间的一次选择：为了长治久安，却导致了分崩离析。这个重大事件，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所谓“改钞法”的具体举措是：废除已经行用的中统钞，发行新的中统交钞，每贯值铜钱一千文，与至元钞并行，中统钞每贯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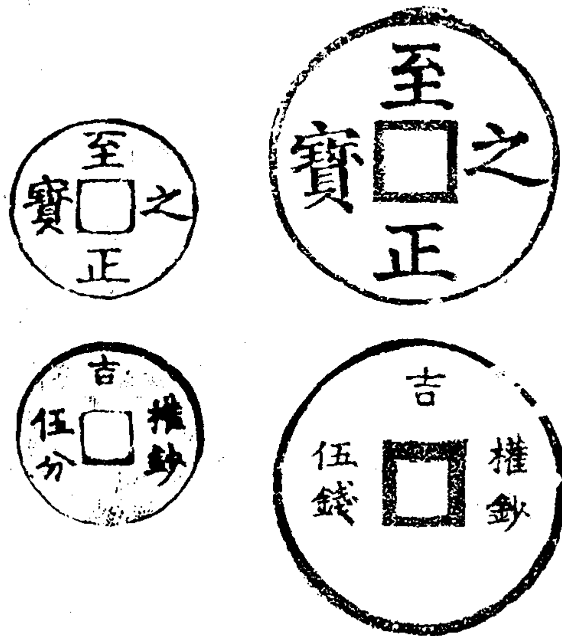


至元宝钞。与之比较的是大明宝钞（大明宝钞不是纸币，而是印钞的钞板）。凡宝钞，正中总是“伪造者处死”，同时声明凡首告者，一律发给犯人的家产，这对伪造者造成的心理压力颇大。伪造宝钞，关键是刻制钞板。这使我们不禁联想到关于吾衍之死的一个细节：吾衍之妾的父母参与造假钞，牵连吾衍。也许这并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吾衍与吴叡，是元代仅有的两个刻印高手。吾衍被他们蒙蔽利用过也未可知。

至元钞二贯。同时，铸造至元通宝铜钱，分为折一、折二、折三几个不同的档次，和过去的历朝铜钱并用。钞法是元朝“说不尽”的话题。这样重大的决策，在廷议时出现争议实属必然。事实上，是吏部尚书偰哲笃，而不是户

部尚书提出的更改钞法之议。其核心是：交钞为母钱，铜钱为子钱，以一比一千兑换。出面反对的是（居然是）国子监祭酒吕思诚。偰哲笃等是因为至元钞的假币太多，致使市场紊乱，而出此策的。吕思诚则说："至元钞非伪，人为伪尔。交钞若出，亦为伪者矣。且至元钞犹故戚也，家之童奴且识之；交钞，犹新戚也，遂不敢不亲，人未识也，其伪反兹多。况祖宗之成宪，其可轻改哉！"[①] 其实，在如何对付伪钞上，辩论双方都无善策，同时，面对经济运作上的问题，都拿不出对症下药的方子。以吏部尚书与国子监祭酒为正反双方的代表，显然这里讨论的是国家大政，而不是经济政策问题。最后，以吕思诚外放为湖广行省左丞作结。结论是"钱钞兼行"，伪钞问题不但没有解决，最后终于导致市场崩溃。新钞法施行不久，物价腾涌，一般上涨十倍。不多几年，就出现了以物易物的交易，社会经济极大倒退。

江西南昌人刘时中的套曲《上高监司》，直接反映出更改钞法的后遗症。《上高监司》分前后两套，曲牌是〔正宫·端正好〕，是元代散曲中篇幅最大



这就是著名的钱币珍品『至正权钞』钱，从『权钞五分』到『权钞五钱』，共分为五等，始铸于江西吉安。就是它们的出现，才有这《上高监司》。

的套曲，显然，针对这个题材篇幅仍然不嫌弃其大。一开篇，刘时中就说："生灵遭魔障，正值着岁时饥荒。谢恩光拯济皆无恙，编作本词儿唱。"曲中所写的江西饥荒年成，使人几乎不忍卒读。他写道："一日日物价涨。十分料钞加三倒，一斗粗粮折四量，煞是凄凉。"显然，更新钞法是为了改革弊端，但实行了它无异于雪上加霜。有了这样形象的描述，对于江西在至正后期经历的战乱煎熬，就有了深刻的理解。〔叨叨令〕支曲写道：

① 《元史》卷一八五《吕思诚传》。

有钱的贩米谷置田庄，无钱的少过活分骨肉无承望；有钱的纳宠妾卖人口偏兴旺，无钱的受饥馁填沟壑遭灾障。小民好苦也么哥，小民好苦也么哥，便秋收鬻妻卖子家私丧。

套曲落实在对“高监司”的颂扬。“高监司”是谁？有人推测，就是河西人高纳麟。高纳麟是元史名臣高智耀的后人，有诗文传世，但对于他的政绩则有争议。

至正十年这场钞法之争，开启了“潘多拉的盒子”。不过，这已经不是一个具体的政策问题了。当偰哲笃在朝堂之上自觉在大道理上说不过吕思诚这个曾三次出任国子监祭酒的宿儒时，愤愤不平地反问：“我等策既不可行，公有何策？”吕思诚的回答则是：“我有三字策：行不得！行不得！”这种对答，等于给丞相脱脱出难题。——对于病入膏肓的人，何药可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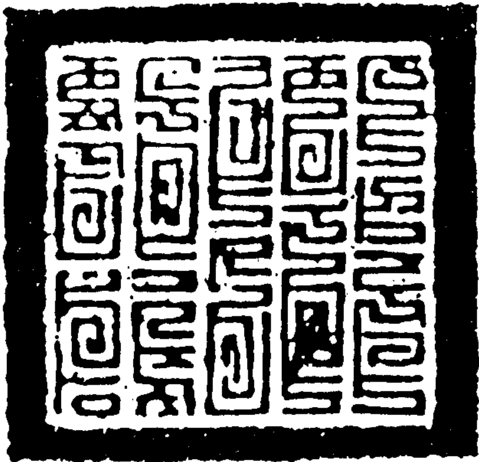
偰哲笃，是高昌畏吾人，出身于世家巨族。偰氏从唐朝开始，世代为回鹘丞相，入居中原，华化程度相当深。偰哲笃家族已经几代聚居江西，江西是钞法紊乱的典型区域，刘时中也是江西人，他们对钞法弊端感触一定比别人深，惟其未能找到症结。在元明之际的战乱中，江西是波及面最广、最酷烈的地区之一，也正肇因于此。那种钱币史上的珍品：至正权钞大铜钱，就仅见于江西的吉安。偰哲笃本人是延祐二年首科进士，而且有“一门五进士”之美誉，家族的居室叫做“三节六桂堂”。其兄偰玉立，在《元诗选》三集中有《世玉集》。偰哲笃也有诗篇传世。特别是他的十个儿子，其中的偰伯僚（偰逊）与偰吉斯（偰斯）兄弟在元明之际的经历颇具传奇性。

偰哲笃的对立面吕思诚也是诗文家，《元诗选》三集有其《仲实集》。至正十七年，在湖广的战乱中积劳成疾而卒。吕思诚是元史的正面人物。几年前，参政孔思立受到时为御史的高纳麟诬陷时，当有人给高纳麟出主意，想顺便将时任左丞的吕思诚一起“解决”，高纳麟也不得不说：“吕左丞素有廉声，难以及之。”

可以说，变钞法与开黄河，是元代后期影响最大的两个举措，从一出现就备受舆论攻击。当时有一支小令〔醉太平〕写道：

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作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

录出这支小令后，陶宗仪评论说:“右〔醉太平〕小令一阕，不知谁所造，自京师以致江南，人人能道之。古人多取里巷之歌谣者，以其有关于世教也。今此数语，切中时病。”（《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三“醉太平”节）



这是元代的一个官印『江西等处行中书省烧钞库印』（八思巴文）。这个印章对于说明钞法在江西的弊端，颇有意义。元代的做法是，当纸币烂断时，由官方收回，加盖『烧钞库』印之后，当地销毁。但弊端却往往从此而出：将已经作废预备销毁的纸币私下拿走，仍然让其进入流通领域，这样就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使市场紊乱，影响了宝钞的信誉。特别有意思的是，也许是巧合，元代仅见的『权钞钱』出自江西吉安；元代仅存的『烧钞库印』，是江西行省的。

元人孔齐的《至正直记》（卷一“楮币之患”节）说：至正十二年，天下大乱，钞法颇艰；十三年，又艰涩；至十五年，将绝于用。当时对宝钞有“观音钞，画钞，折腰钞、波钞，熝不烂”的区分。“观音钞，描不成，画不就，如观音美貌也。画者，如画也。折腰者，折半用也。波者，俗言急走，谓不乐受，即走去也。熝不烂者，如碎絮筋查也。”到至正十六年，官府决定不再使用，“交易惟用铜钱”。

李存的七言长篇《伪钞谣》（《元诗选》初集《俟菴集》）开篇写道:“国朝钞法古所无，绝胜钱贯如青蚨。试令童子置怀袖，千里万里忘羁孤。岂期俗下有奸弊，往往造伪潜隈隅。设科定律非不重，奈此趋利甘捐躯。”钞本利于通流，但伪钞的出现伪是利驱之。在《草木子》等书记载，为酬劳朱清、张瑄主持海运之功，朝廷将钞版发给他们，允许他们自行印制，不过在墨色、印色上与朝廷的略作区别。这等于开启了钞法紊乱之门。

钞币交替，直接受害者仍然是民众。众口相传的流言蜚语，已经成为大众“公共财产”。元末的动乱从变更钞法始。

杜本去世。享年七十五岁。

杜本是元代“成功”的隐士之一，可他也一直处在社会舆论的十字路口。他的一生已经习惯于为文坛复制奇迹，他的死留下若干疑谜。

杜本（1276—1350），字伯原，号清碧。祖籍京兆（陕西西安），徙居清江（今属江西）。博学多识，有文才，曾上《救荒策》于行省，被力荐于元武宗。召至京师不久，又归隐武夷山中，再徵，辞不就。至正三年召为翰林

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行至杭州称病婉辞。杜本隐居终生，平日作诗不留底稿，有人问为什么。他笑着回答："亦尝念之。然观《艺文志》所载古人文集，何翅千百，今其存者，百无一二，又有幸与不幸焉。故不必存也。"死后门人程嗣祖录存遗诗，编为《清江碧嶂集》一卷。还著有《四经表义》等书，今均未见。他善于书法，精通医术，曾增订《伤寒金镜录》一卷，今存。《元诗选》初集选入其诗25首，顾嗣立指出杜本集中存诗"应酬俚率，殊不称其名。又安知伯原之不欲存稿者，非自为藏拙地耶?"（《元诗选》小传）这个疑问——杜本也许是为"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而藏拙——曾被《四库全书》馆臣再次提出。杜本选录宋金逸民诗，辑为《谷音》二卷。关于杜本的第一个疑问，是《清江碧嶂集》的水平与其诗人名气不符。第二个则是《谷音》真的是宋金逸民总集呢？还是根本就没有《谷音》所收录的那些人，那些人实际是杜本的化身？

《谷音》二卷，收录宋金遗民三十人的101首诗。以诗人而论，每人选诗多则六七首，少则一二首，都是知名度不高的隐逸之士。每位诗人名下，均写有小传，但往往很简略。上卷共收入十位诗人的50首诗，下卷共收入十五位诗人、五位无名氏（包括所谓"古碑文"）的51首诗。《四库全书总目》这样评价本集："是集所录，乃皆古直悲凉，风格遒上，无宋末江湖龌龊之习。其人又皆仗节守义之士，足为诗重。"本集卷末有明初人张矩跋及都睦题记。张矩跋中说：本书所录"乃宋亡元初，节士悲愤，幽人清咏之辞"，系杜本"早游江湖，得于见闻"，并对书名作了解释："题曰《谷音》，若曰山谷之音，如野史之类也。"《谷音》最初由元代平川怀友轩刊行，书版毁于元末的战乱。尽管本书篇幅不大，但历来颇受重视。清人王士禛在《论诗绝句》中曾说："谁嗣箧中冰雪句，谷音一卷独铮铮。"但是，初读《谷音》也有一个疑惑：集中数十人的诗篇简直若出一人之口。同时，这些如此高超的诗人与诗篇，为什么除了杜本，几乎从未有人予以关注？王士禛就曾有"常疑（《谷音》）清碧自撰，托名于人"的合理想象①，只是再读《清江碧嶂集》才解除了怀疑，因为与《谷音》相比，《清江碧嶂集》的作品"殊庸肤无足取，与所辑迥不类"。也就是说，王士禛认为凭《清江碧嶂集》所体现出的杜本水准，他根本就做不出《谷音》中的诗篇。也正因为如此，有人进一步猜测：杜本将其一生的杰作，都编入了《谷音》（也许还有何失的《得之集》），《清江碧嶂集》实际是他自己的"删除"。大都隐士诗人何失也是一个平生不留诗稿的人，传世的何失诗几乎全部是由杜本据记忆传录。

---

① 《池北偶谈》卷十九"谷音"节。

不管怎么说，杜本不是用心极深的人，就是运气极好的人。孔齐在《至正直记》中对杜本的腹诽，不能说不尖刻，却没有真正说明问题症结何在。

元代几种诗学著作比如《诗法家数》等，历来有“作伪之说”。它们的一个特点就是：作者都是诗坛最优秀的诗人，但内容肤浅，殊不相称。这个问题，也是元代文学的一大疑难。同时，它也与杜本有牵连①。

释大圭于此前后在世。

大圭，字恒白，号梦观道人。晋江（今属福建）人。俗姓廖。从妙恩学佛理，博览群书，经史百家无所不读，曾说：“不读东鲁论，不知西来意。”至正间居泉州紫云寺。文章简洁古雅，但拘于佛理。诗颇受时人推重，一时广为传诵。《四库全书总目》评为“石湖、剑南之余风，犹存于方外”，“气骨磊落，无元代纤秾之习，亦无宋末江湖蔬笋之气”。著有《梦观集》二十四卷，清乾隆时修《四库全书》仅删除诗五卷。

丁复《桧亭集》九卷刊行。

丁复，字仲容。天台（今属浙江）人。早年有诗名，延祐初北游京师，公卿大夫奇其才，与杨载、范梈一同被荐授馆阁之职。丁复不等正式批复，离京而去，于是绝黄河，憩梁楚，过云梦，窥沅湘，陟庐阜，浮大江而下，寓居于金陵，终生不仕。后至元年间，丁复女婿饶介把丁复诗作汇辑成帙，由于丁复寓居金陵的宅院有两株古桧，所以名为《桧亭集》（又名《双桧亭诗》）。丁复门人李谨之陆续搜集丁复诗作，编为《桧亭续集》（或称《桧亭后集》）。至正十年南台御史张惟远据以上两集编成九卷本，刊于集庆学舍。今存《桧亭集》都是出自九卷本。据李桓《桧亭集序》，丁复前期的诗“酷类太白，杂而置之集中，见者不复能辨”，而晚年“其体稍变，将自为一家”。杨翮《桧亭集序》进一步说：“其诗必因酒而作。引觞挥毫，若不经意，而语率高绝。饮至半酣，诗愈益奇。一饮或诗累数章，诗成，而先生亦颓然醉矣。”可见不论为人还是写诗，丁复都有与李白相近之处。

刘诜去世。享年八十三岁。

刘诜（1268—1350），字桂翁，号桂隐。吉安庐陵（江西吉安）人。两岁失母，七岁失父，九岁宋亡。十二岁作科场律赋策论，宋代遗老一见即以斯文之任期许，南台屡以教职举，均未赴职。延祐初恢复科举，益致力于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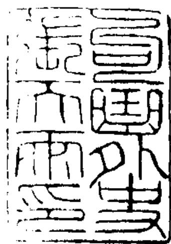
① 参见《元诗史》第442～445页。

诂笺注之学。十年不第，乃刻意于诗、古文，终生未仕。至正间，门人编其作品为《桂隐存稿》十四卷。明人重编为《桂隐文集》四卷、《桂隐诗集》四卷。刘诜少年时经受了丧亲亡国之痛，成年后尽管文名颇大，却自甘贫贱，淡泊一生。

张雨去世。享年六十八岁。

张雨（1283—1350），字伯雨，号贞居子，又号句曲外史。钱塘（浙江








张雨用印

杭州）人。原名张泽之，又名张嗣真。他二十岁遍游天台、括苍诸名山，在茅山出家为道士。陪开元宫王真人入京时，曾准备让他做官，但他不愿还俗。收藏古代图书十分丰富、博学多才，以诗与赵孟頫、范梈、袁桷、马祖常、揭傒斯、黄溍等人唱和往还，在当时影响颇大。他曾住持西湖福真观，延祐七年居开元宫，历主茅山崇寿观、元符宫。后至元二年到杭州，至正二年仍提点开元宫。张雨是元代有成就的方外诗人之一，有《句曲外史集》（别本题为《贞居集》），今存。诗文词曲均长，诗词应酬之作涵盖面相当大，这是由于他从事创作活动的时间跨度近半世纪。又辑友朋投赠之作为《师友集》。书画均为所长。另著《玄品录》五卷，今存。按：张雨，一作张天雨。

凯烈（即克烈）拔实去世。享年四十三岁。

凯烈拔实（1308—1350），字彦卿。系色目（一说蒙古）凯烈氏，大都（北京市）人。年仅十一岁，以近臣之子入侍元仁宗，元文宗时拜监察御史，后以病屏居三年。元统元年授燕南肃政廉访司佥事，迁翰林学士，拜吏部尚书。曾任大都路达鲁花赤，拜集贤学士，出为燕南、河西等地廉访使。颖敏

博学，善为文章，家中富于藏书，长于书法，曾名列《书史会要》（卷七）。

至正十一年辛卯（1351）

春。在京师的江浙闻人与江浙行省赴京师参加会试的乡贡进士们，在大都西门内咸宜里的荣春堂聚会，并编成《江浙进士乡会小录》。

据程端礼《江浙进士乡会小录序》（《畏斋集》卷三），江浙行省参加会试者，共有43人。这43人是在全省三四千举子之中选拔出来的，比例高达约百分之一。能与此会，相当难得。在会试之前，“江浙之仕于朝及客于京师者，相率持金钱，具牢醴，张国西门内咸宜里荣春堂以燕劳之。喜国家之得贤，乐乡郡之多士，敦契好昭斯文也。”这也是最后一次未受战乱波及的科举。

三月七日。本年廷试，两榜状元是朵列图、文允中。

这两个状元在历史与文学史上几乎全无影响。也许是马上就进入了全面的战乱，留给他们的发展空间太局促。本届录取进士83人。本届进士中，鲁渊、盛景年在文学上较有成就。

鲁渊，字道原（一作道源），号本斋。淳安（今属浙江）人。早年刻苦攻读，至正十一年进士，授松江华亭县丞。战乱初，曾为起事者所执，逾年始得脱，往依门生迈里古思于越中。至正十四年，任江浙儒学副提举，又进正提举。张士诚据吴中，除国子博士，因疾不受命。明初，徵修礼乐书，书成，以衰病辞还，终老于家。所居在岐山之下，人称“岐山先生”。诗多忧时之语，但流传不广。有《征行集》，未见传本，今存《青溪鲁道原先生诗集》（简称《青溪集》）一卷。另有《春秋节传图例》《策府枢要》等著作。

盛景年，字修龄。新昌（今属浙江）人。至正十一年进士[1]，调奉化州判官，辟江浙行省掾。历福建管勾、检校，除儒学提举，不赴。元末隐居于龙泉山中。王祎为其作《盛修龄诗集序》（《王忠文集》卷四），但诗集未流传至今。

四月。诏开黄河故道。具体工程由贾鲁实施，“开河”使他成为至正间

[1] 见清王昶《金石萃编未刻稿》收录的《元辛卯会试题名记》。

知名人物之一。

《元史·顺帝本纪》说：这个工程是“命贾鲁以工部尚书为总治河防使，发汴梁、大名十三路民十五万，庐州等戍十八翼军二万，自黄陵冈南达白茅，放于黄固、哈只等口，又自黄陵西至阳青村，合于故道。凡二百八十里有奇。仍命中书右丞玉枢虎儿吐华、同知枢密院事黑斯以兵镇之。”作为水利工程，从一开始竟派中书右丞和枢密院同知“以兵镇之”。“贾鲁开河”成为元走向败亡的起点。

贾鲁是有争议的人物。元代至正后期的长达一二十年的全国性动乱，就是因他而起。在水利史与治国方略上谈论他开河的功过，却往往被忽略不计。

对此，广为人知的过程是：至正十一年间，参议贾鲁，以当承平时无所垂名，欲立事功于世。首劝脱脱开河北水田，又劝造至正交钞。及河决南行，又劝追求夏禹故道，开使北流，身专其任，濒河起集丁夫二十六万多人。朝廷所拨食钱，官吏多不尽支。河夫多怨，韩山童等因挟诈，凿石人止开一眼，镌其背曰：“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预当开河道埋之，使掘者得之，遂相为惊诧而谋乱。山童自称宋徽宗九世孙，伪诏略曰：“蕴玉玺于海东，取精兵于日本。贫极江南，富夸塞北。”盖以宋广王走厓山，丞相陈宜中走倭为托，以动摇天下。当时贫者从乱如归。朝廷发师诛之，虽即擒获，而乱阶成矣[①]。有无名子为诗曰：“丞相造假钞，舍人做强盗。贾鲁要开河，搅得天下闹。”[②] 开河的直接后果是：本年五月“己酉朔，日有食之。辛亥，颍州‘妖人’刘福通为乱，以红巾为号，陷颍州。”（《元史·顺帝本纪》）

关于贾鲁开河，在当时就有不止一个“版本”流传，于上述说法大同小异的一个是：开河工程中挖出来一个石像，是个僧人，背后刻着一句话是“莫笑石姑一只眼，开了黄河天下反。”据说“果以人夫扰攘，遂至大乱。——以时讹言关系非小。”[③]

贾鲁（1297—1353），字友恒。河东高平（今属山西）人。原是文臣，曾参与《宋史》的编纂。至正四年黄河决口，奉命行都水监事。他遍行黄河河道，往返考察数千里，上《治河二策》。至正九年，河患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大事，丞相脱脱力举贾鲁主持治河。至正十一年以贾鲁为工部尚书，兼总治河使，开始治河工程。他的决策是堵塞决口，开新河疏导河水，使黄河复归故道。在水利史上这是元代最重要的举措，他主持开的那段新河就叫做“贾鲁河”。但他的“功绩”成了元朝进入长期动乱时期的契机。开河直

① 《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
② 《草木子》卷四上“谈薮篇”。
③ 《农田馀话》卷上。

接引发了动乱，贾鲁又投入另一个意义上的“堵塞决口”：他跟随脱脱进入中原的枢纽徐州平叛。脱脱被罢免后，他留在中原。与濠州起事者的战事中，死在军前。他一死，开河已无功可言。

实际贾鲁开河，是上一年钞制“变法”的延续。这个变法已经动摇了元廷在民间的基础，只是需要一个爆发点就是了。贾鲁“制造”了这个爆发点。由此也可见黄河与中华民族关系至巨，与民生国计关系至巨。不是那条命名为“贾鲁河”的河道，而是那一只眼的石人，使贾鲁名垂史册。在文学史上，他留下了不多的几篇诗文。与那条河、那件事有关的众多民谣、传说，也可以看成是他的“作品”。

八月。葛逻禄诗人迺贤与危素等七人出游大都南城，并写出组诗《南城咏古十六首》。

大都“南城”，是金朝的旧京——中都。天下大乱已露端倪，寓居大都的迺贤，仍然寄希望元廷能重振雄风，自己也能不虚此生。这组诗颇受重视，迺贤手书《南城咏古十六首》被刻入《三希堂法帖》。《南城咏古十六首》（《金台集》卷二）诗题分别是：《黄金台》《悯忠阁》《寿安殿》《圣安寺》《大悲阁》《铁牛庙》《云仙台》《长春宫》《竹林寺》《龙头观》《妆台》《双塔》《西华潭》《白马庙》《万寿寺》《玉虚宫》。这都是金朝遗迹。在诗序中迺贤说:“至正十一年秋，八月既望，太史宇文公、太常危公，偕燕人梁处士九思、临川黄君殷士、四明道士王虚斋、新进士朱梦炎与余，凡七人，联辔出游燕城，览故宫之遗迹。凡其城中塔庙楼观、台榭园亭，莫不徘徊瞻眺，拭其残碑断柱，为之一读，指其兴废而论之。余七人者，以为人生出处聚散不可常也，邂逅一日之乐，有足惜者，岂独感慨陈迹而已哉！各赋诗十有六首，以纪其事，庶来者有所征焉。河朔外史迺贤序。”上述七人是：宇文公谅、危素、梁有、黄哻、王虚斋（名不详）、朱梦炎、迺贤。

迺贤《南城咏古十六首》其中两首诗分别写道：

黄金台（大悲阁东南，隗台坊内。）

落日燕城下，高台草树秋。千金何足惜，一士固难求。沧海谁青眼，空山尽白头。还怜易河水，今古只东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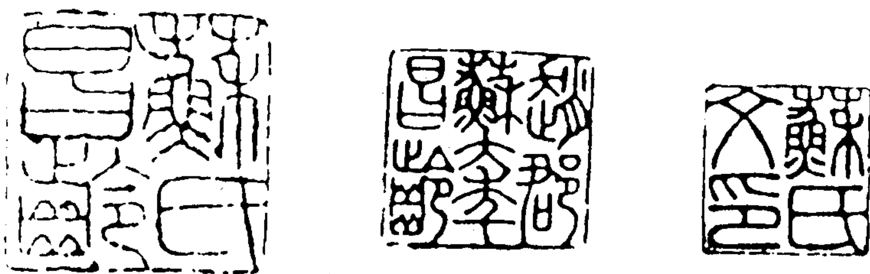
妆台（李妃所筑，今在昭明观后。妃尝与章宗露坐，上曰:“二人台上坐。”妃应声曰:“一月日边明。”上大悦。）

废苑莺花尽，荒台燕麦生。韶华如逝水，粉黛忆倾城。野菊金钿小，秋潭玉镜清。谁怜旧时月，曾向日边明。

这本不是廼贤最好的诗。写这些诗的至正十一年秋却是大都给世人留下美妙记忆的季节，是陷入一二十年战乱之前的最后“怀古”。

苏大年等为倪宏所画《林屋佳城图》题诗。

《林屋佳城图》没有流传至今。关于这幅画与其本事，苏大年的这首七古长篇是极好的表述。敏感的文人提前感受到“无家可归”“无处藏身”的惶惑。



苏大年用过的印章

倪宏，字原道。是不大知名的画家，曾出入于顾瑛的玉山草堂。他有两幅传世杰作，一幅是为顾瑛画《金粟冢燕集图》；另一幅是《林屋佳城图》。《林屋佳城图》是为黄云卿（景云）画的以具区林屋山为背景的山水长卷，其实是为黄氏先茔作图。题跋主要写于至正八年至十二年之间。画卷之后，由郑东作《林屋山图记》，并有当时名人题诗，苏大年的题诗是“借题发挥”，写出敏感文人对战乱将至的预感，并为自己“定制”避秦桃源。

苏大年（1297—1365），字昌龄，号西坡、愚公。广陵（江苏扬州）人。祖籍赵郡真定（河北正定）。至正十三年上书于朝，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明年，隐于吴中，往来笠泽松陵间，以林屋洞主、西磵老樵等为别号。张士诚用为参谋，人称“苏学士”。诗文均有时名，为文尚气，不喜衰飒之音，被视为有“江海襟怀”的“人中之豪”（《听雨楼诸贤记》），并工书善画。

《题倪宏林屋佳城图》（又作《题黄氏林屋山图》）① 诗云：

太湖三万六千顷，盘根错节钩连地轴两山东西联结名洞庭。七十二峰巑岏突兀倒影照寒碧，翠剑峭拔冷插芙蓉青。鳞堂贝阙直下开水府，霞车雾辇直上来仙灵。洞天林屋古仙境，九品地位题山经。我尝泛舟揽奇胜，胸次空阔吞沧溟。鸱夷甫里千载呼不起，俯视乾坤浩荡浮秋萍。

① 见明赵琦美《铁网珊瑚》卷十五、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五十二。

黄坞佳城在山北，石上松根生茯苓。春园野花散飞蝶，夜台宿草栖寒萤。人生归欤可为乐，返此真宅安清宁。盖棺事定万事足，谁复强辨谁醉谁复醒。嗟君思亲报罔极，模写家山开画屏。松楸丘陇朝夕宛在目，凄怆焄蒿霜露零。思亲一念万万古，哀哉孝子心茕茕。我家家山隔南北，干戈澒洞兵尘腥。登高北望魂欲断，落日惨淡风泠泠。为君题诗泪如雨，白头江海嗟吾生。

诗人表达出天下虽大，可是已经没有属于诗人自己的一方清静之地的隐忧。诗写得如同末世盛宴，非请莫至，名贤云集，人头攒动。席上觥筹交错，但无人不是心事重重。

半个世纪前的大德年间，仇远执《山村图》化缘，要仿图筑屋隐居，一是自放，二是开始新的生活。宋元之际的山水画中，人们往往将山林视为“园林”的一部分，以避免面对朝代兴替的尴尬，罗列其间的房舍精整壮观。到至正年间，山水画真正从风景中独立出来，人们品味出的只是深山密林的不可侵犯，山谷幽邃，林木密布，进入山林的人是失败者、避难者，寻找新的桃花源，是人们向往山林的动机——村镇丘墟已经不适于人们安居。

十一月。元廷立《河平碑》。

《河平碑》由欧阳玄撰文，即《至正河防记》[1]。元后期的治理水患，不但启动了元朝亡国的“程序”，也是文学家们关注的焦点。贾鲁个人的成败，则成了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河平碑》中，欧阳玄对贾鲁治理黄河做了正面的评价。在这五千字的文章中，欧阳玄写出了贾鲁对黄河的整治，并通过如同身临其境的描写，使人不由得认同贾鲁的举措。贾鲁治河是元末长期动乱的起因，这是从政治格局作的关照。但是欧阳玄换了一个角度，从黄河水患本身来考察，将贾鲁列为古今最有全局眼光的水利家之一。

巴西邓子晋为杨朝英编选的《朝野新声太平乐府》作序。

继《阳春白雪》之后，杨朝英又编定了《朝野新声太平乐府》（简称《太平乐府》）九卷（别本八卷），所以它可以看成是《阳春白雪》的续集，这两种“元人选元曲”被称为“杨氏二选”，包括八十五位元曲家的1062支小令，141套套曲。今存元散曲，见于“杨氏二选”的就占据了一半左右。

---

① 本文未收入《圭斋集》，见《湖南文徵》卷三十九。



至正年间，在江浙的“北人”间流行的散曲，与元初有所不同，〔香罗带〕〔酷相思〕等悲切之音盛行。

元明之际人长谷真逸《农田馀话》说：

> 宋祚将终，不独文气衰弱，民间歌曲皆靡靡亡国之音。至今临安府瓦子，印行小令人家尚存，于此可见。至正间，北人歌词破碎，声调哀促，号通街市，无复昔时文物豪雄之气，而人多制〔香罗带〕〔酷相思〕之类悲怨迫切之声，若不能一朝夕者。听之使人凄怆不自已，关系元气韵亦不小者。

这个评论相当耐人寻味。就“民间歌曲”而言，情况与元初确实不同。但这更可能是受到江南本地的影响所致。

江浙行省在上一年乡试之后，又自行举办了一次考试，试题竟是题为《鉴湖风月》的一首七言律诗①。

这实际是对科举落第者的一种安慰或补偿。一省官方居然用一首诗来区分文人学业高下，则不多见。应试者有百余人，其中分水人方子京的《鉴湖风月》名列前茅，除嘉兴路儒学教授。《元诗选癸集》已集上说，方子京原来隐居山林，以《鉴湖风月》“擢居前列，除嘉兴路教授，致仕而归，卒于家。”

释宗衍去世。享年四十三岁。

释宗衍（1309—1351），字道原。吴（江苏苏州）人。至正初年，住石湖楞伽寺，江南名士多与游，后主嘉禾德藏寺，才辩闻望，倾于一时。善书法，遍读内外书，独长于诗。其诗博采汉魏，而以杜甫为宗，诗中少有蔬笋气。清人顾嗣立评其诗：“取喻托兴，得风人之旨。”有《碧山堂集》行世，元末，危素就与宗衍相知，而未及相见宗衍就去世了。明初大乱已定，危素返回江南，特意为《碧山堂集》作序以行。宗衍生卒年，据释妙声《东皋录》卷中《衍道原送行诗后序》推知②。宗衍生于至大二年，卒于至正十一

---

① 《元诗纪事》卷十九“方子京”。

② 《衍道原送行诗后序》，又名《德藏送行诗后序》。妙声在后序中说，他比宗衍大一岁，而且宗衍享年四十三。妙声生于元武宗至大元年。这样就推出了宗衍的生卒年。如是，宗衍实未入明，以前不少文献都将他作为明人，这也许是因为危素在明初为宗衍的《碧山堂集》作序以行因而致误。

年，实未入明。《列朝诗集小传》闰集、《明史·艺文志》与《千顷堂书目》（列入明释子）均系误收。

张可久约去世于本年。

张可久（1280—1350以后），原名张久可，字可久，以字行，号小山。庆元（浙江宁波）人。家世业儒，读书广博，早年客居吴江，即以散曲知名。至大、延祐时，与贯云石、刘致等倡和于西湖。后任绍兴路路吏，历衢州、婺州路吏，后至元年间，任桐庐典史。至正初，在徽州松源监税，至正九年以后，在昆山州任僚佐之职，出入于顾瑛玉山草堂。当卒于至正十二年前。他是元代传世作品最多的散曲作家，据《全元散曲》，今存小令855首，套曲9套，所作占今存全部元代散曲的约五分之一。由于创作时期长达四五十年，所以与曲坛人物交往广泛。《太和正音谱》评其作品特征“如瑶天笙鹤”，而且认为“其词清而且丽，华而不艳”，在《太和正音谱》中，张可久是仅次于马致远的第二位散曲家，并推为“词林之宗匠”。除散曲，还有数十阕词，词曲雅洁清丽。诗传世不多，纯是“铁崖体”余韵。散曲结为《今乐府》《苏堤渔唱》《吴盐》《新乐府》等集，后统编成《张小山北曲联乐府》四卷，今存元抄本。明人李开先辑刊《张小山小令》二卷，是流传颇广的张可久曲集。此外，天一阁旧藏明初抄本《小山乐府》保存有相当多的仅见词曲作品。

至正十二年壬辰（1352）

正月。亲历战乱，程从龙作《石壁山》《马洲》《河泊矶》《赤壁山》《双洲》等诗[1]，写出自己震惊又无所适从的感受。

这些诗记录出红巾军初起即势如破竹，席卷湖广的印象。《双洲》诗云：“涉水逾山窜草莱，乱离怀抱几时开。元家运变黄河徙，汉土兵兴赤帜来。夜寂堠亭烽火盛，月明江舰角声哀。风沙满目乡关异，日暮愁登江上台。”自注说：“元壬辰正月十一日，红巾攻破汉阳。十三日，破湖广。鄂汉官民，拥舟南遁。余家近江，室庐煨烬，里人相率命归。稍复故居，而号令不一。所拔庵舍，随成随爇。所蓄粮食，随瘗随启，遂遁于野。艰苦万状，幸免锋

[1] 依次见《元诗选癸集》庚集下。

镝，岂非天相与？因纪其事于此。”面对蜂拥而来的红巾军，不难判断出，这场战乱已经不是局部问题，也不是短期可以解决的。“所拔庵舍，随成随爇。所蓄粮食，随瘗随启”，看似随手记录，非亲历者则写不出来。

程从龙，字登云，号汉章。嘉鱼（今属湖北）人。经历元末战乱，入明隐居不出。有《程梅轩集》四卷。

二月十一日（乙酉）。元江州路总管李黼死守孤城，城陷被执死。

面对由彭和尚统帅的红巾军，李黼颇感困惑，并对秘密宗教影响力感到不可理解。李黼，字子威。泰定四年状元，杨维桢、萨都剌的同年。江淮兵起，他抗言于朝，愿得一残破州郡守以自效，江州是得其所。江州城陷落前夕，他巡视城垣，见起事者如同潮水涌现，便写了一首诗[1]：

弥勒何神孕祸胎，黦瘂随处起氛埃。烟迷郡邑人民苦，雪满江湖鬼物哀。人世百年遭此厄，天戈万里几时来。捐生力尽徒为尔，可惜都成一炬灰。

江州陷落，李黼与其侄子一同殉难。这是较早明确写出秘密宗教在元末战乱中的作用的诗篇。除去偏见，诗颇有特色。因为时在至正十二年，到以后，这样的见闻就无足为奇了。有人将起事者“由湖广破饶信，入钱塘，犯湖常，无一郡能邀截之”的原因，归结为“元自得江南之后，一概尽毁城壁”，以为“四海一家”的象征，以致于“无城池以为备”[2]。蒙古大军以骑兵为中坚，毁弃城墙是必然。

为李黼死，周霆震作《李浔阳死节歌》（《石初集》卷二），在战乱期间他写出了一系列“死节”诗：《普颜副使政绩歌》（《石初集》卷二）、《古金城谣》（《石初集》卷一）等等。每首诗的诗序，除了记载死节者的业绩，也表达出作者的情感。

在战乱如同水波纹一样扩展时，杨维桢对诗坛的影响力达到了极致。以致个人的畸形爱好也成了时尚。

杨维桢对诗坛的影响，除了“铁崖体”诗歌本身，还包括他对生活的某

---

[1] 见《李江州遗墨》。《李江州遗墨》是明初人为李黼一首手书七言律诗的题跋，有清康熙十二年王乃昭钞本，是《陆右丞蹈海录》的附录（上海图书馆藏）。在《草木子》卷四上，有与此相同的记载，这首诗略有异文。

[2] 《农田馀话》卷上。

些畸形“热爱”。一则有名的传说是：杨铁崖耽好声色，每于筵间见歌儿舞女，有缠足小者，则脱其鞋载盏以行酒，谓之“金莲杯”[①]。而这金莲杯，竟然成了元代后期咏物诗新增的诗题。元代著名的女诗人郑允端写有“可笑狂生杨铁笛，风流何用饮鞋杯”诗句[②]。明初人瞿佑的《归田诗话》卷下，还记载了一个相关的事：杨维桢晚年居松江，有竹枝、柳枝、桃花、杏花四妾，皆能声乐，常乘大画舫，恣意所之。他在瞿佑叔祖家做客时，以《香奁八题》见示，都是艳诗。在酒席间，杨维桢以“鞋杯”命题，当时随侍在座的瞿佑写了〔沁园春〕词，咏鞋杯，杨维桢相当赏识，“袖其稿以去”。而明人沈德符则说[③]：杨维桢好以妓鞋纤小者行酒，“而倪元镇（倪瓒）以为秽，每见之，辄大怒，避席而去。”

杨维桢的行为被视为“秽行”。而倪瓒的“洁癖”同样是病态。另一则传说则是[④]:“毗陵倪元镇有洁病。一日眷歌姬赵买儿，留宿别业中。心疑其不洁，俾之浴。即登榻，以手自顶至踵，且扪且嗅。扪至阴，有秽气，复俾浴。凡再三。东方既白，不复作巫山之梦，徒赠以金。”而这则传说，竟然是出自歌姬赵买儿之口。她常常说起这件事，每次提及，都令听者绝倒。她并不避讳，显然，倪瓒也不。

三月。占籍台州的西域人泰不华，死于“海寇”方国珍之手。享年四十九岁。

从方国珍起事，他的“同乡”泰不华就与其结下“死疙瘩”。方国珍时降时叛，泰不华也为之吃尽苦头。本年初，方国珍入海复叛，泰不华集部属追随不放。方国珍的亲戚陈仲达往返于方国珍、泰不华之间，希望再次“招降”。于是泰不华率部高张“受降旗”，乘海潮之势直扑方国珍的据点。泰不华的战舰搁浅，被沙子淤死在滩涂，方国珍却乘机将其团团围住，泰不华手刃了前来诈降的陈仲达，但方国珍部蜂拥过船，泰不华手刃数人，终于寡不敌众，被敌人死死抱住，要擒去方国珍的船上。泰不华极力挣脱，在搏杀中战死，投尸大海，他的仆从及部将都一同殉难。闰三月辛巳，元廷擢泰不华为江浙行省参政，行台州路事，授予他更大的处置权，但命下才知道泰不华已经战死。

泰不华（1304—1352），本名达普化，字兼善。伯牙吾氏，原籍西域白

① 《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三“金莲杯”节。
② 诗见《肃雝集》中的《碧筩》。《四库全书》馆臣因此曾怀疑《肃雝集》真伪。
③ 见《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三“妓鞋行酒”节。
④ 《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七“病洁”节。



这幅画表现的是泰不华除暴安良的业绩。图见《瑞世良英》，文字出自《集海》。看来泰不华在民间确实比较有威信。

野山①，居台州（浙江临海）。十七岁时领江浙乡试首荐，至治元年赐右榜进士第一，年仅十八岁。授集贤修撰，累转监察御史。受到元文宗赏识，并亲自将“达普化”改译为“泰不华”。与修宋、辽、金三史，擢礼部尚书。至正十一年迁浙东宣慰司使，与孛罗帖木儿夹击方国珍，方国珍降元，改任泰不华为台州路达鲁花赤。战死后，追封魏国公，谥忠介。他好读书，以文章知名。元末政局腐败，不可收拾，他与另一个色目人余阙独立支持局面，而且两人均长于诗文，后人往往相提并论。他曾师从李孝光，明代诗评家胡应麟曾说:“泰兼善绝句，温靓和平，殊和唐调。”（《诗薮》外编卷六）并推许

① 白野山，今地难于确指。

他与余阙都是才藻气节兼备的诗人。《元诗选》初集选入他的诗24首，题为《顾北集》。

关于泰不华，有一则轶事[①]：泰不华为台州守，以廉洁著名。一夜因出访夜宿村家，隔壁有两个妇女在夜绩。他听到年长者说：夜寒如此，我有酒在床下，汝可分其清者，留以奉姑，下浊者吾与尔饮之。年轻者按她说的，起身注清者于另外一个器皿中，并且说："此达元帅（按：泰不华，原名达普化）也，吾等不得尝矣。"年长者说："到底清邪！"遂笑而罢。泰不华听说，未曙即去。这就是"部民呼为到底清"的来源。

四月十四日。杨维桢作《沈氏今乐府序》，并为"铁崖体"作宣传。

《沈氏今乐府序》（《东维子集》卷十一）[②] 云："今乐府者，文墨之士之游也。然而媟邪正豪俊鄙野，则亦随其人品而得之。……吴兴沈子厚氏，通文史，善为古诗歌，间亦游于乐府。记余数年前客太湖上，赋《铁龙引》一章，子厚速和余四章，皆效铁龙体。飘飘然有变云气，心已异之。今年，余以海漕事往吴兴者阅月，子厚时时持酒肴与今乐府至，至必命吴娃度腔，引酒为吾寿。论其格力，有杨卢滕李冯贯马白诸词伯之风，而其句字，与小叶俳辈街谈市谚之陋，关庾氏而有传，子厚氏其无传，吾不信也已。书成帙，求一言以引重，因而论次乐府之有古今，为《沈氏今乐府序》。"沈生，名沈子厚，吴兴人。这篇序文涉及至正年间散曲在松江的兴盛情况。

五月。周伯琦开始撰写《扈从集》。

为此，周伯琦特意写了《扈从集前序》。在前序中，周伯琦申明此行缘起：自己于至正十二年四月"由翰林直学士、兵部侍郎，官拜监察御史。视事之第三日，实四月二十六日，大驾北巡上京，例当扈从……所至赋诗以纪风物，得二十四首。"这24首诗之后，又有五言古诗10首，以纪此行见闻。这是刚由翰林直学士、兵部侍郎，拜监察御史的诗人，扈从大驾从大都前往上都避暑的纪行诗集。

八月。周伯琦又为《扈从集》（《扈从诗》）写了一篇"后序"。

所谓后序，是为从上都返回大都途中写的10首"纪行诗"作序。这两篇序本身就是洗练的散文诗。在写诗与写序时，谁也不会想到，这大约就是"最后的""上京纪行诗"了。至正十二年春秋之间，江南已经如同鼎沸。几

① 明人曹安《谰言长语》。

② 在《东维子集》卷十一，另有《沈生乐府序》，是为同一人作。笔者所据《东维子集》为《四部丛刊》本，具体文字与《四库全书》等本略有不同。

年之后，上京也为红巾军焚毁，成为瓦砾垃圾之场，狐兔出没之区。

周伯琦（1298—1369），字伯温，号玉雪坡真逸、坚白先生。鄱阳（江西波阳）人。父周应极于至大年间为翰林待制，自幼随父游京师，入国学。以荫授海南县主簿，三转为翰林修撰。至正元年，任宣文阁授经郎，此后屡次转官，皆在宣文、崇文之间，顺帝尝呼其字“伯温”而不名。特命为广东廉访司佥事，至正八年召入为翰林待制，累升直学士。至正十二年，与贡师泰同擢监察御史，两人皆为南士之望。后因劾御史刘希曾，受到时论非议。在江东肃政廉访使任上，因失陷宁国，受到南台御史余观纠劾。至正十七年，奉命招谕张士诚，张士诚降元。周伯琦滞留在为张士诚占据的平江，十余年不得归。张士诚被朱元璋攻破，才还归鄱阳，不久去世于故里。周伯琦工书法，并曾撰《六书正讹》五卷、《说文字原》一卷，今均存。有诗文稿若干卷，除《近光集》三卷、《扈从诗》一卷，此后所作都已散失。

七月。来自安徽的起事军强攻江浙行省首府杭州，江浙行省参政樊执敬以死相殉。

西域人伯笃鲁丁写了两首诗，咏杭州失陷时的两位统帅樊执敬（时中）与色目人宝哥。以时事入诗，是元末诗坛的特点，这两首诗成为咏战乱的典范之作。

这一事件，元人杨瑀记载于《山居新话》[1]：

> 至正十二年壬辰七月初十日，徽贼入寇杭城。时樊时中（执敬）为浙省参政，亟出御贼，北行至岁寒桥，遇害。先浙省以杭州路总管宝哥（惟贤）摄参政，调守御昆山之太仓，领军而往，驻于昆山旧州山寺，离太仓州治三十余里，终于不往。闻寇至，遁匿于杭之寓舍。适贼破杭，乃挈家潜于西湖舟中，越三日，邻居无赖之徒利其所将，恐之。遂与次妻□氏连结其衣，溺水而死。时潭州路总管鲁至道作二诗挽之，以寓褒贬之意，谩书于后。
>
> 《挽樊时中参政》：
>
> 主将无谋怫众情，贤参有志惜言轻。狐群冲突成妖孽，黔首惊惶望太平。奋志从军全节义，杀身殉国显忠诚。岁寒桥下清泠水，夜夜空闻哽咽声。

---

[1] 《山居新话》这个记载，关于发生的时间尚有疑问。《元人传记资料索引》第4册第2263页，说宝哥“十二年摄江浙行省参政，十六年城陷，自沉水死”。如是，这两件事就不是发生在同一年。

《挽宝哥参政》：

香魂俊骨堕深渊，无智无谋亦可怜。妖寇猖狂如有祟，生民凋瘵似无天。芳名苟得千年在，死节应当二日先。欲向西湖酹尊酒，凄风冷雨浪无边。

伯笃鲁丁①，字至道。西域答失蛮。以鲁为汉姓，又名鲁至道。至治元年进士，后至元二年累迁浙东廉访副使，改广西廉访副使，至正元年由礼部侍郎除秘书大监，至正元十六年历潭州路总管。柳贯《新修石门洞书院记》说伯笃鲁丁“有学有政，需用于时”（《柳待制集》卷十五）。《南村辍耕录》卷十五，有一则鲁至道轶事：

鲁至道以廉洁著名，家甚贫，朋友们常常为他集资以补家用。在赣州路任满，等候新的任命时，临江路总管木八剌木要丘某替他送给鲁至道50锭钞，丘某是鲁至道旧部属，他没有将钱交给鲁至道，反而私吞。木八剌木发现了，并立即追究。鲁至道明知是丘某所为，不但在木八剌木处为丘某遮掩，表示自己已经收到了钱；当丘某为此无地自容，叫他儿子将钞奉还时，鲁至道始终不肯接受。而且还一再为丘某遮掩罪行。在元末，社会上往往认为回回贪财，但鲁至道不但清贫自守，而且度量恢宏。他在诗中针对樊执敬与宝哥作的针砭，代表了时论所归。

红巾军攻陷常州。吴克恭未能及时逃离，元军收复该城后，以“从逆”罪名处死。

吴克恭（？—1352），字寅夫。毗陵（江苏常州）人。性好读书，认为从事举子业无益于增长学问，便著意古文，不求仕进。经常出入顾瑛的玉山草堂及倪瓒的云林隐居。其诗被认为兴喻不如倪瓒，但顾瑛却评云“体格古淡，为时所称”（《草堂雅集》卷五）。虽是布衣之士，与翰苑名流多有交往，泰不华、柯九思、陈旅、虞集都有应酬唱和，与泰不华交往尤为密切。至正十二年红巾军攻陷常州，吴克恭留在城中没有逃走。不久，元军又收复了该城，并以“从逆”的罪名杀了他。他的诗主要保存在顾瑛所编的《草堂雅集》卷五，计收入各体诗69首。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七“忠倡”节）记载了常州城陷，以附逆杀吴克恭一事，并说：“吴尝室其少妹，且与生子，名教中所不齿者，一死固有余辜。”同时以“从逆”被杀的文人还有赵君谟。

① 伯笃鲁丁，《元诗选癸集》丁集作伯笃曾丁，是伯笃鲁丁之误，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四作过辩证。《御选元诗》作别笃鲁丁。《南村辍耕录》卷十五“度量宏深”节，作古笃鲁丁。

赵君谟存诗仅有一首，即《碧筒饮》，见《元音》卷十一。在文学史上名位不显，但这首诗不容忽视，因为它又见于谢宗可《咏物诗》，同时还出现在萨都剌《萨天锡逸诗》。对于探讨《咏物诗》的真正作者，提供了罕见的线索。

俞远家乡发生战乱，他构筑土屋，啸歌其中，一切世事绝口不言。

俞远，字之近，号空谷。江阴（今属江苏）人。隐居乡里，以教书为生。酷爱作诗，不轻易脱稿，成篇语必惊人。如《龙门桐歌》《小石湾行》《澄江八景》等都曾传诵人口，被认为“不下二李，而理思过之”（孙大雅《沧螺集》卷三）。虽身处战事纷扰之中，不废吟咏，村舍多被毁为丘墟，仍然无视生死劫难。有《豆亭集》《学诗管见》等，都未见传。世称“绍堂先生”。死于至正后期，卒年七十三岁。王逢在挽诗中称他“襄阳一耆旧，东鲁古君子”（《梧溪集》卷三）。《元诗选》三集选入其诗11首，题为《豆亭集》，是顾嗣立辑自他书。

元代诗选家陈世隆死于兵燹之中。

陈世隆，字彦高，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南宋著名书商陈思是其从祖，承继家学，富于藏书，一生从事文献辑刊。至正中兄弟一同馆于嘉兴陶氏，战乱中遇害。有随笔《北轩笔记》一卷。陈思编刊《两宋名贤小集》《圣宋高僧诗选》等，影响颇大；陈世隆据前者增辑修订，成为三百八十卷之巨帙，又续补后者，成《宋僧诗选补》三卷。

潘纯避难越中，反而受到诬陷，死于押送途中。

潘纯（1292—1252），字子素。合肥（今属安徽）人。流寓吴中（江苏苏州）。家世业儒，博通古今，善于谈笑，才气横溢。壮年曾北游京师，公卿名流争与结交，每逢宴集，谈笑倾座，只要他不在场，辄云“潘君不在，令人无欢”。曾著《辊卦》以讽讥当世。有人向元文宗进言，把他目为滑稽之士，并准备逮捕法办。于是他便亡走江湖。晚年寄居淮浙之间，名重一时，日与达官贵人觞咏为乐。因战乱移家绍兴，行台御史大夫纳麟之子安安诬陷以罪，械送吴郡，在半路将其杀害，说是暴病而卒，其子窃其尸藏之，杭州僧可观葬于西湖岳王墓之侧①。潘纯有文名，预顾瑛的觞咏之会。两首七律

① 《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三“讥省台”节说，安安在出任行枢密院判官时，行台御史大夫“一听决于院判”，有人做诗予以嘲讽，并且在行台的大门上写了另一首诗，指责行台“贿赂公行”。潘纯被杀，应与此事有关。

《题岳武穆王坟》最为知名，几乎凡选元诗必录[1]。

战乱波及乡里，黄复圭被乱兵捉住，竟写诗大骂，被剖腹挖心而死。

黄复圭，字君瑞。祖籍山东，寓居饶州安仁（今属江西）。早年有诗名，曾与张翥、危素齐名于江右。《元诗选》三集选入其诗37首，题为《君瑞集》。顾嗣立举其《题詹双崖》《题唐氏游子远归图》《题古崖上人》等诗警句，评论说："铁石心肠人，偏解吐婉媚辞也。"

为远离战乱，年仅十八岁的西域人丁鹤年逃出武昌，奉继母往依在浙东作官的表兄吉雅谟丁（马元德），暂居镇江。

从此，丁鹤年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流离失所的生涯，直到明军取得武昌地区的控制权，才得以还归武昌。

丁鹤年（1335—1424），西域回回。本名不详，"鹤年"是表字。父祖之名都有"丁"字（曾祖父阿老瓦丁，祖父苫思丁，父职马禄丁），故以丁为汉姓。以字行，名为丁鹤年，又字永庚。曾祖父阿老瓦丁是西域巨商，阿老瓦丁和弟弟乌马尔曾"杖策军门"，倾家以出巨资资助"军乏饷"的忽必烈，因而世为元之显宦，乌马尔累官甘肃行省左丞[2]。父亲职马禄丁以世荫任武昌县达鲁花赤，全家定居武昌。父亲死在任上时，丁鹤年仅十二岁，是五个儿子中最年幼者。丁鹤年出生于后至元元年，卒于明成祖永乐二十二年（1424），活了九十岁。如果以至正二十八年为界，他在元朝生活三十三年，在明朝则是五十七年。有《丁鹤年集》（别本名为《鹤年诗集》《丁孝子集》），是流传颇广的别集。

丁鹤年的兄长，三个在至正年间登进士第，但他成年之后已是元末乱世[3]。这一年，武昌陷入战乱，他奉继母暂居镇江，继母死，素食五年。江南逐步为战乱波及，丁鹤年辗转到相对安定的宁波避难。浙东为枭雄方国珍占据，方国珍"最忌色目人"，丁鹤年只得转徙逃匿于异乡，靠为村镇子弟教私塾糊口，还过着"卖浆"乞食、寄居僧舍的动荡不定的日子。作为一个西域人，可以说他的生涯从元明易代的战乱中开始，他一生始终生活在这场战乱的阴影之中。他是个悲剧人物，陈垣概括为"丁鹤年亦回回教世家之儒

---

[1] 这两首诗的作者都有异说，见《元诗选》三集（中华书局排印本）第485页。但是它们原始出处是《岳忠武王庙明贤诗》，无疑是潘纯子素所作。

[2] 此据《明史》卷二八五《丁鹤年传》。

[3] 据元人戴良《鹤年先生诗集序》（《丁鹤年集》卷首）。这篇文章，分见《丁鹤年集》卷首与《九灵山房集》卷二十一，两处文字不同，内容也有差别。

者，然其后复由儒而入佛”[1]，而他避乱浙东时，将居室名为“逃禅室”。明初回到武昌，故居荡然无存，诗是惟一寄托。“晚年屏绝酒肉，庐父墓以终其身”[2]。

丁鹤年的友人瞿佑在《归田诗话》卷下记载了一则轶事：

丁鹤年，回回人。至正末方氏据浙东，深忌色目人。鹤年畏祸，迁避无常居。有句云：“行踪不异枭东徙，心事惟随雁北飞。”识者怜之。作诗极工。……《逃禅室与苏生话旧》云：“不学扬雄事草玄，且随苏晋暂逃禅。无锥可卓香岩地，有柱难擎杞国天。谩诧丹霞烧木佛，谁怜玉露泣铜仙。茫茫东海皆鱼鳖，何处堪容鲁仲连！”感时书事，而炼句精致如此。后至杭，见予所集《鼓吹续音》，翻阅再过，惜其中有未尽善者，谓余：“当以此为限，更博求诸作，得一善者，则易去一疵者。此亦著述之法也。”因手抄所作序文而去。今此集久已散失，而鹤年言犹在耳。可为太息也！

丁鹤年是定居中原几代人的西域回回。《鹤年诗集》，是元末战乱的实录，也是华化西域人最后的存在。入明虽然生活了半个世纪，但其间所写的诗则不多见。

危素为张仲深的《子渊诗集》作序。

张仲深，字子渊。鄞县（浙江宁波）人。早孤，自幼明敏好学，以事母至孝闻名乡里，与郑奕夫为童稚交。一生未仕，曾漫游江南，与杨维桢、迺贤、乌斯道兄弟、夏庭芝、张可久、张雨、韩性等人都有唱和酬答，与迺贤交谊尤深。诗受时人推重，《四库全书总目》认为他“古诗冲淡，颇具陶韦风格；律诗虽颇涉江湖末派，格意未高”，然而五、七言警句“亦皆楚楚有致，其见重于当时名辈，亦有以也”。有《子渊诗集》，最初结集于后至元五年，至正十二年又经重编，托迺贤携诗稿到京师请危素作序。《子渊诗集》久已亡佚，未见各家书目著录，今存《子渊诗集》六卷，是清乾隆时编《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除危素序，卷首尚有至正十六年郑奕夫序；后至元五年单弘序；至正十六年杨彝序。

① 《元西域人华化考》卷三。

② 清人顾嗣立《元诗选》初集，丁鹤年小传。

本年，战乱波及周霆震家乡安福，他不得不迁居吉安。

元末江西是“重灾区”，战火波及四裔，如同犁庭扫穴，形势一再反复。吉安也并非避秦桃园。在流离转徙中，周霆震写出大量直面现实的诗篇，至正年间江西诗人人才辈出，也正因为如此。

周霆震（1292—1379），字亨远，号石初。安福（今属江西）人。出身书香门第，颖敏好学，受宋朝遗老刘将孙、龙仁夫等器重，乡贤刘诜尤喜爱他的诗。延祐元年以来，数次参加江西乡试，均未中，不再关心仕进，专意写作诗文。迁居吉安后，在郡城设馆，闭门课徒。江西屡经兵燹，他忧时伤乱并付诸于诗，《石初集》被比之于汪元量《水云集》，甚至目为“元末之诗史”（《四库全书总目》）。《石初集》中的《古金城谣》《二月十六日晚青兵逼城……》《断臂吟》《李浔阳死节歌》等篇，都可称为“并叙乱离，沉痛酸楚，使异代尚如见其情状”的杰作。

历经兵燹，胡天游乡里村舍皆成丘墟，只有其宅岿然无恙，因之自号“傲轩氏”。

胡天游，原名胡乘龙，字天游，以字行。号傲轩，又号松竹主人。岳州平江（今属湖南）人。七岁能吟诗，元末乱世隐居不出。生平很少赞许他人，独与余牧山友善，两人常泛舟于清溪，放歌岸帻，謼声如雷。晚年更加孤僻，但徘徊于乱世而缅想太平的心境更强烈，为此，他写有《述志赋》以寓长饮之恨。乡人艾科为他作传①，传中说：假如胡天游能多活若干年，得遇明太祖朱元璋，必为刘基、宋濂。他死于至正年间，死后诗稿散乱，后人补辑残丛，编为《傲轩吟稿》一卷，流传至今。

王逢写了两首诗，为至正十一年与起事红巾军交锋时战死的二十二个官员张本②。

王逢所作是两首五言律诗，在第一首诗后，以“后序”逐一论列了13个蒙古、色目死节臣属；第二首诗后则是9个汉人、南人死节臣属，共22人。它的特殊性在于，王逢以此将借诗“写时事”发挥到极致，诗成了“传单”“战报”甚至“讣告”。在至正后期，这类诗篇日渐增多。多少有些奇怪的是，不论作者原来对元廷抱什么态度，对起事义军却是异口同声予以讨伐。

① 艾科为胡天游写的小传，附载于丁丙旧藏《傲轩吟稿》。

② 这两首诗的题目是《杭城陈德全架阁录示至正十一年大小死节臣属其秃公以下凡十三人王侯以下凡九人徵诗二首并后序》，见《梧溪集》卷一。两首诗未纪年。在此前的干支是癸巳，此后的干支是壬辰。故暂系于本年。

这种一边倒的“义愤”，还成为社会的凝聚力。

秋。释清珙去世。享年八十一岁。

清珙留下一卷（184首）《山居诗》，是纯说佛理的偈子与诗的中间类型，在明清释子中相当流行。

清珙（1272—1352），字石屋。常熟（今属江苏）人。俗姓温。嗣法于及庵禅师，元统时住嘉兴当湖福源寺，后退居湖州霞雾山。至正年间，朝廷专门赏赐给他一套金襕衣。有《石屋山居诗》一卷，自序中，他把自己写诗说成是在山林多暇、瞌睡之余，“偶成偈语”，后来因云衲之请，将诗作书抄写成卷，以示“山林之趣”。并且指出：读者“慎勿以此为歌咏之助”。清珙的诗的确为山居消遣之作，而且比较直露浅近，近于寒山、拾得的风格。

苏天爵去世。享年五十九岁。

苏天爵（1294—1352），字伯修。真定（河北正定）人。苏天爵少从安熙学，由国子学生公试第一，授蓟州判官。泰定元年改翰林国史院典籍官，升翰林应奉。至顺二年升翰林修撰，擢江南行台监察御史，判狱详明，入为监察御史，改奎章阁授经郎。元统元年复拜监察御史，在职四个月，上章疏45次，弹劾5人，举荐109人。次年迁翰林待制兼经筵参赞官。后至元二年上刑部郎中，改御史台都事，后至元三年迁礼部侍郎，后至元五年出为淮东道肃政廉访使，宪纲大振，一道肃然。入为枢密判官，改吏部尚书。至正二年拜湖广行省参政，至正四年为集贤侍讲学士，兼国子祭酒。曾任京畿奉使宣抚，关心民间疾苦，共处置783件兴除之事，纠劾949人，有“包公”之誉，为之得罪了权臣，竟以不称职罢归。至正七年复起为江浙行省参政，至正九年，召为大都路总管，告病辞归。又复起为两浙都转运使，至正十二年仍任江浙行省参政，以忧深病积，卒于军中。苏天爵为学，博而知要，长于纪载。时在元末，中原前辈相继去世，他独以一身任一代文献之寄，老而不倦。因居滋溪，学者称“滋溪先生”。文章严谨舒畅，叙事清楚；诗被目为“尤得古法”（顾嗣立语）。著述颇丰，其文编为《滋溪文稿》三十卷，今存，是重要的元人文集。其诗编为《滋溪诗集》七卷，已佚。今存之诗仅不足十首。另有《治世龟鉴》一卷，亦存，其他著述尚有《刘文靖公遗事》一卷等。除《滋溪文稿》，他对元代历史与文学的主要贡献在于编撰这样两部书：《元朝名臣事略》十五卷，是元代碑传集成，保存了许多已经不存的史料；《元文类》（即《国朝文类》）七十卷，是元代仅有的、也是权威的诗文总集。

五月。张士诚部陷高邮，驻节高邮的淮西佥宪李齐逆战，被执而死。

当时有人将自己对包括李齐在内的四位状元在战乱中“结局”的评判写成一首诗，大书于位于交通要冲的驿站的墙壁，而且通过过往的人员一站一站向四方传播。

元末战乱的前期，四个状元的不同下场，成为时论关注的焦点。李齐（字公平）是元统元年左榜进士第一。在此之前的至正十二年，台州路总管泰不华（字兼善）死于方国珍之手；江州路总管李黼（字子威）在城破时力战而死，而时任湖广宪佥的王宗哲（字元举）面对起事者畏缩不前。泰不华是至治元年右榜进士第一，李黼是泰定四年左榜进士第一，王宗哲是至正八年左榜进士第一。从平江的一个驿站开始，出现了《吊四状元》诗：

> 四榜状元逢此日，他年公论定难逃。空令太守提三尺，不见元戎用六韬。元举何如兼善死，公平争似子威高。世间多少偷生者，黄甲由来出俊髦。

时人的评论是：“此四公者，或大亏臣节，或尽忠王事，或遇难而亡。故云：若论其优劣，则江州第一，台州次之，高邮又次之，宪佥不足道矣。”[①]洪武二十八年（1395），有人在李嗣宗家里的烂纸堆中发现了李黼的一幅墨迹，予以装裱收藏，并请名人为之题跋，辑为《李江州遗墨》一卷[②]。其中也提到这首诗，明言诗是一个叫做常明善的士人所作，“当时舆论可见”。通过这两个不同来源的记载，足见“四状元”在水深火热的战乱时期不同的处境与结局，曾引起普遍关注。

九月。刚刚赴任的山东长清县尹张士明，以劝农事来县境灵岩寺，作诗刻石。

张士明，字德昭。河东曲沃（今属山西）人。至正二年陈祖仁榜登进士第，至正十三年任山东长清县尹，至正二十四年由国子监助教迁秘书监秘书郎。张士明《灵岩寺诗》是山东著名的摩崖石刻，诗序说：“至正癸巳三月吉

① 《南村辍耕录》卷十五“吊四状元诗”节。

② 《李江州遗墨》记录的这首诗，文字与《南村辍耕录》略有不同，前者明言，虽然时过四十多年，“予尚记忆其诗”，可见印象之深。

日，梦游山寺。是岁七月到任，九月劝农至此，恍然如梦中所见，因赋鄙语，录呈灵岩方丈。前进士、紫金山张士明题。”

民间流传颇广的题为谢宗可所作的《咏物诗》，由宣城诗人汪泽民写序刊行。

谢宗可及其《咏物诗》，是元代诗学的一大难题。原始文献中至今仍然未见到关于其人其书的参照性记述。

谢宗可，生卒年及字号不详。金陵（江苏南京）人[①]。仅知是《咏物诗》作者，汪泽民《谢宗可咏物诗叙》说：“谢宗可为咏物诗数百篇，涵盖精微，词必新，理必正，事必工，字必谨。绮靡而不伤于华，平淡而不流于俗，于是求公之心概可见焉。”《四库全书总目》曾这样概括说：谢宗可“始末无考，相传为元人。故顾嗣立《元百家诗选》（即《元诗选》）选录是编于戊集之末，亦不知其当何代也。”由于《咏物诗》中有咏《芦花被》七律，可知谢宗可应为元代中期人。《芦花被》是贯云石写于延祐初的一首诗，此后“芦花被”才成为典实。而且《咏物诗》有汪泽民序，汪泽民是元末诗选家，故《咏物诗》应作于元代后期，不晚于至正十三年。据明人瞿佑《归田诗话》所载，可知《咏物诗》在元末明初影响较广，“世多传诵”。但瞿佑又指出，《咏物诗》“难得全首佳者”。顾嗣立在《元诗选》谢宗可小传中则说：“大抵元人咏物，颇尚纤巧，而宗可尤以见长。”正因为这二卷（别本一卷）《咏物诗》，谢宗可才在元代诗坛留下了名字。

起事者陈国安部占据平阳，礼访郑昂，为其婉拒，携妻子避处西华山中，事情过去才还乡，不愿为任何一方所用。

郑昂（1289—1358），字处抑，又字崇阳，号密庵。永嘉平阳（今属浙江）人。志趣高洁，不谐于俗，隐居读书。年四十九始出为郡学师，元末兵兴，元佥宪伯颜不花行部，屡荐均不就。能诗，工唐律，诗存《东瓯诗集》《东瓯诗续集》《御选元诗》《宋元诗会》等总集。清钱熙彦《元诗选补遗》编录其诗16首。

王寿衍去世。享年八十一岁。

王寿衍（1273—1353），字眉叟，号玄览、溪月。杭州（今属浙江）人。道士陈义高弟子，至元二十五年提举杭州开元宫，元贞元年住持佑圣观。大

① 《千顷堂书目》卷二十九则注云：“临川人，一云金陵人。”

德五年接替陈义高提点住持玉隆万寿宫。至大二年还居开元宫，延祐五年授弘文辅道粹德真人、领杭州路道教事。他是元代中期知名道士，在文坛有广泛影响，长于诗文书画。在他住持下，开元宫成为杭州元曲家、诗文家的会集场所，张可久的许多散曲就写于开元宫。

张起岩去世。享年六十九岁。

张起岩（1285—1353），字梦臣，号华峰真逸。祖籍章丘（今属山东），后徙济南（今属山东）。荐为福山县学教谕。延祐二年廷试为左榜状元，授登州同知，特旨改集贤修撰，迁翰林待制。丁内艰，服除选任监察御史，拜太子右赞善。丁外艰，服除拜礼部尚书。因忤丞相，迁翰林侍讲学士，后屡司监察之职，论事剀直，无所顾忌。以翰林承旨参修辽、金、宋三史，为总裁官之一。三史修成，张起岩告老还乡，家居四年，卒，谥文穆。为人刚烈正直，轻财好施，死后家无余财。其先人仕于金，本人熟悉金源文献，对宋儒学流派原委尤多见解。博学多才，善篆、隶书法，有《华峰漫稿》《华峰类稿》《金陵集》等文集，今均不存。《元诗选》三集录张起岩诗 15 首，题为《华峰漫稿》，系辑自他书。

有“鲍博识”之称的蒙古语文专家鲍信卿去世，对于蒙古语言文学的研究与传播，他的作用无可替代。

鲍信卿（？—1353），蒙古名字“完泽”。其先汴人，南渡之后定居杭州（今属浙江）。从元贞年间开始，因为蒙古文字江南识者无多，就在州郡设立了蒙古学，“贵游子弟及民间俊秀，皆令肄业”，鲍信卿师从萧氏，选择正统史传中的故事 250 条，编译为蒙古文的《朵目》一书，受到关注。同时，鲍信卿将老师的学说结集，题名为《贯通集》《连珠集》等。还曾取蒙古、畏吾文学中的精华——“问答比喻之言”编成《选玉集》。他的成就为世所公认，以致“南北人为蒙古学，未有出信卿右者”。江浙行省参政宝哥将其称为“鲍博识”——“‘博识’，犹华言‘博士’也。”[1] 对此，王袆以“野史氏”的名义评述说：“国家起朔漠，风气浑厚，虽语言可译，而文字未通。世祖既统函夏，于是巴思八帝师至自西土，始因其语言，用谐声之法，创造文字，以定一代之制作。……自百年以来，声教所覃，凡人面之域，罔不同文，而欲精其学者，犹必赖夫专门之师如信卿者焉。呜呼，若信卿者，其可谓有功于其教道者耶。”

---

[1] 本节引文，均出自王袆《鲍信卿传》（《金华丛书》本《王忠文集》卷十七）。

至正十四年甲午（1354）

三月七日。本年科举录取的两榜状元，是薛朝晤、牛继志。

本届进士62人。其中有迈里古思、陈麟、曾坚、钱用壬。迈里古思、曾坚都是因为在战乱中的作为而知名。迈里古思后来成了《保越事迹》《越民考》等纪实之书的主角；曾坚一直与元廷坚守在大都，入明，却死在一次不明不白的事件中。

七月。杭州说书匠胡仲彬借在民间说唱历史故事的机会，酝酿起事，但为亲戚告发而失败。

胡仲彬在杭州城中勾栏里专门演说野史演义，他妹妹与他一起作说书人。他名气不小，也常常到行省官员家中去专场说书，并夤缘得以注授巡检之职。看来他完全沉浸在自己反复讲述的历史往事之中，同时并不甘心只做旁观者，而要亲自实践“乱世英雄”的经历。在本年七月中，他招募到不少人——其中主要想必是他历年来的忠实听众，在这些信徒的背上都写上“赤心护国，誓杀红巾”八个字，作为识别（如同“官号”），择日即将起事。在事发前夕为他的亲叔叔告发，还没有发动就烟消云散。官府在他家中搜出了三大本名册，只有其中的一册被缴纳给官府，另外两册被烧毁了。就凭这一册，便按名捕杀了360多人。这样看来，那两册的“无意”被焚烧，恐怕另有隐衷。

说书艺人凭借他从历史故事中学得的知识动手主持造反，这恐怕是仅见的一例，参与者背书“赤心护国”，不能不使人想起“精忠岳传”的关目。仅此也可以看出，元末社会情况是宽松又紧迫，谈虎色变又隔岸观火。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个胡仲彬打的旗号是“赤心护国，誓杀红巾”，可他首先不见容于红巾军的死敌——元朝官府。

昆山为战乱波及，张翥写出题为《京口海上口号》的十首绝句，通过南返的海船从海上寄给顾瑛，顾瑛则以一组十首“吴下时事”回复。

这时，张翥等于“拘禁”在京师，与避处江南的顾瑛已有多年不见。诗要靠海运送达，所以特别珍贵。顾瑛的和诗，全名是《张仲举待制以京中海上口号十绝附郯九成见寄瑛以吴下时事复韵答之》（《玉山璞稿》卷上），十首依次云：

估贩年来不受沽，徒劳踪迹走通衢。只缘尽要新交钞，除却天都到处无。

带号新军识未真，栏街作队动生嗔。官支烂钞难行使，强买盐粮更打人。

白昼惊风海上号，水军三万尽乘涛。书生不解参军事，也向船头着战袍。

官鼓冬冬报二更，船头风浪尽军声。不知海若缘何事，一夜癫狂直到明。

冉冉长蛇汉水东，嘘成黑雾满虚空。腥风怪雨重阴底，化作黄虬不是龙。

莫辩黄钟瓦缶声，且携斗酒听春莺。河西金盏新翻谱，汉语夷音唱满城。

红绿油牌去复来，长身碧眼更毰毸。口传催办军需事，一日能无一百回。

筑得吴城易得摧，年年风雨绕苏台。农家尽患时行病，总为修城染带来。

红缨白帽锦鞍鞯，铁甲金戈刺绣鞭。义士一千屯海上，自家供米又供钱。

和籴粮船去若飞，兼春带夏未曾归。用钱赠米该加七，纳户身悬百结衣。

这一唱一和之间，张翥离开了他的为朝廷代拟制词与官样文章的情思意绪；顾瑛也不再是诗酒觞咏之会的乐此不疲的好客东道主。“带号新军识未真，栏街作队动生嗔。官支烂钞难行使，强买盐粮更打人。”“莫辩黄钟瓦缶声，且携斗酒听春莺。河西金盏新翻谱，汉语夷音唱满城。”——这便是吴下的时事。这组诗与一年后写的《乙未书实》十首，足以证明顾瑛这个诗坛东道主，并非浪得虚名。

八月十六日。一梦之间，使杨维桢与去世整三十年的文坛怪才贯云石做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赛诗之会。揭示出“铁崖体”与贯云石之间的微妙联系。

在梦中，已经高踞当代文坛盟主的杨维桢，以《庐山瀑布谣》与贯云石《彭郎词》对决。尽管是在睡梦中，比赛仍然使人心向往之。这两首乐府诗当然都是杨维桢的作品，也难怪它们确实不分伯仲。这个著名的典故，出自杨维桢《铁崖古乐府》卷三。《铁崖古乐府》是杨维桢的得意门生吴复编集，

《三分事略》名为“至元新刊”，在扉页又有“建安书堂”“甲午新刊”字样。一般认为，《三分事略》是早于《三国志平话》二三十年出版的另一种小说，但通过分析却发现《三分事略》的内容文字与《三国志平话》基本一致①，它们都是图文并茂的书籍，版式完全一致，从插图看，两书实际是照同一蓝本描摹刻制的，只不过《三分事略》要粗率得多，显然《三分事略》是照《三国志平话》赶制的——两书文字的比较也能得出相同的结论。所以，这两部书不仅是“格式基本相同”，《三分事略》应该是《三国志平话》（或说“三国故事”）在民间流行，并受到欢迎之后，出版的一种坊刻本，也就是“盗版书”。所谓“至元新刊”，不过是托辞，表示它来历比《三国志平话》久长，也算是预防措施。“甲午”是《三分事略》的刊刻时间，也是书籍发卖的时间，这一般不会、也用不着伪题。就是说，它不是至元三十一年



上图是《三国志平话》的“水淹七军”；下图是《三分事略》的“水淹七军”。比较起来，很容易得出后者是前者的拙劣翻版的结论。

甲午，而是至治年间以后的下一个甲午——至正十四年甲午——刊刻行世。当然，这是一部小说受到广泛欢迎的例证，这也是三国故事在元代不胫而走的新的例证。

赵孟頫之子赵雍出任集贤待制，为宫廷作画。

赵雍（1290—?），字仲穆。湖州（浙江吴兴）人。赵孟頫次子。能书善画，有诗文名。泰定四年以父荫授昌国州知州，改任海宁知州，至正年间召

① 两书相比，每卷的后半部分《三分事略》都比《三国志平话》缺少一些内容。对此的一个合理解释是：《三分事略》出版实际比《三国志平话》晚（而不是早），它是“盗”前者而成书的。

入朝，为宫廷作画，至正十四年累迁集贤待制，两年以后以湖州路同知致仕，卒于至正二十年以后。有《赵待制遗稿》一卷。赵雍在各方面都没有取得赵孟頫那样高的成就，但几乎具备赵孟頫的所有特长。

吴镇去世。享年七十五岁。

吴镇（1280—1354），字仲圭，号梅花道人。嘉兴（今属浙江）人。工诗，善书画，书仿杨凝式，画源于巨然，每作画必题诗，时人称为“三绝”。早年与其兄师事毗陵柳天骥，曾垂帘卖卜。一生隐居未仕，足迹很少出于乡里，被称为“吴隐君”，是自甘寂寞的画家、诗人。居室号“梅花庵”，自署“梅花庵主”。明人把他列入“元四大家”，在画史上有较高的地位。后人曾将他的诗文辑为《梅花道人遗墨》二卷。

李存去世。享年七十四岁。

李存（1281—1354），原字明远，后更字仲公。饶州安仁（江西锦江）人。博学好古，精通医术，早年以诗文知名乡里。延祐初年重开科举，李存一试不第，便决计归隐。三次以逸士举荐，他都未应，李孝光曾举以自代，当权者拟荐入翰苑，但也未能如愿。一生主要居家讲授，与祝蕃、舒衍、吴廉志同道合，并称“江东四先生”。他把藏书室命名为竹庄，又题作俟庵，人称“鄱阳（番易）先生”。元末兵乱，门人何琛迎养于临川。有《俟庵集》三十卷，别本题作《李仲公集》。

史伯璿去世。享年五十六岁。

史伯璿（1299—1354），字文玑，号牖岩。温州平阳（今属浙江）人。自幼嗜学，博通经史，隐居不仕，笃志朱子之学，人劝之仕，则曰:“读书本以善身，为仕而学，岂我志也。”虽然不求仕进，但从诗文中可以看出，他一直与当地的官方有良好关系。有《青华集》四卷，今存。另著《四书管窥》八卷、《管窥外篇》二卷等。

至正十五年乙未（1355）

正月。朱右与刘基等人出游越中云门等名山，并写出《游云门五记》。

《游云门五记》（《白云稿》卷七）由《始游灵峰寺记》《自灵峰人云门

记》《游云门诸寺记》《自云门过法华山记》《饮天衣寺临清轩记》组成。在战乱前期，越中暂时保持平静，当时人们争夺的不是山水名胜，而是市廛集镇等人烟稠密之区。从这时开始，文人的关注点逐渐转向深山林莽、桃源秘境。此后，朱右又写出《游四明东湖诸山五记》。这些游记散文，明显受到李孝光《雁山十记》影响。

春。顾瑛又以一组七言绝句，回报友人孟昉的关注。

这一组名为“乙未书实”诗，是去年回复张翥的“吴下时事”诗的续编，表达诗人对自己的把握以及对世事变迁的无奈。

孟昉，字天暐，是占籍太原的西域人，久在江浙任职。他最有名的作品，是《拟古文》。入明，注册为北平籍，并写了〔天净沙〕《十二月乐词》。

《乙未书实和孟天暐都司见寄》（《玉山璞稿》卷下）共十首：

江头日日惜芳时，三月春光两鬓丝。拔剑自歌还自舞，邑人谁识虎头痴。

治安无策济时艰，始信金消壮士颜。怪底飓风翻涨海，浪头一直过狼山。

猎猎东风吹火旗，水军三万尽精肥。一春杀贼知多少，个个身穿溅血衣。

娄上人家不识春，檐头蛛网亦生尘。朱门桃李皆零落，只有东风未嫁人。

隔屋征人去不归，朝朝思妇泣春菲。大堤芳草连天长，莫信啼鹃怨落晖。

海口潮声挟雨来，西风一阵却吹回。书生此日愁如洗，斫地高歌是暮哀。

闻道君王日早参，每虚前席问江南。何人医国如秦缓，有客能棋似李憨。

尽说楼船水战鏖，西风烈火张天高。一从赤壁争雄后，千载功名只骑曹。

大户今年无老米，细民近日有新钱。街衢寂寂无车马，风景凄凄似禁烟。

梅雨今年多去年，青秧白水漫平田。端阳过了南风起，不见谁开漕运船。

顾瑛的家运，是与元海运息息相关。一直到死，他都忠于元朝，但他对“时事”的看法却早已超出了自己的信仰。“隔屋征人去不归，朝朝思妇泣春菲。大堤芳草连天长，莫信啼鹃怨落晖。”

五月。顾瑛再次以口号的形式，写了一组七言绝句。

在写出《乙未书实和孟天暐都司见寄》组诗之后，顾瑛又写了《乙未五月口号》（《玉山璞稿》卷下）五首。这些组诗都是吴中实录。5首诗一气呵成，真正打动人心的则是那个身处其中的诗人。这5首诗分别是：

二月修城五月过，修城不了奈城何。只因一夜斜风雨，到晓都坍一半多。

农家祈社种良田，尽卜今年胜去年。抱布贸秧都插遍，开门一夜水连天。

成队谁家青苎娘，头遮箬笠足如霜。入城籴米不归去，屋里踏车人正忙。

雨中卖鱼无买冰，沿村打鼓傍鲜秤。二斤十贯新交钞，只直仓黄米四升。

堤头放马是何人，两两三三辏作群。强把新钱买村酒，口称曾去做苗军。

“只因一夜斜风雨，到晓都坍一半多”；“强把新钱买村酒，口称曾去做苗军”，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能读之破涕为笑。

六月。顾瑛又作《长歌寄孟天暐都事》[1]，将写“乙未书实”时未能提炼出来的情绪，尽情倾吐。

读这首“长歌”（《玉山璞稿》卷下），就如同经历一次面对面的激情控诉，你不可能在中途打断诗人的话语。在诗酒文会上耽误了太多时间的“玉山草堂”主人，在不到一年间陆续写出“吴下时事”“乙未书实”“乙未口号”等作品，顾瑛已经成了另一个人：

忆昔春风吹少年，绣衣骄马珊瑚鞭。锦堂丝管迟落日，青楼莺燕迷花烟。即今未老嗟当日，坐卧便人倦行立。太平天下起干戈，从此百忧

[1] “都司”“都事”，都是原文。

如猬集。大儿服勤欲养亲，拟卜草堂聊远尘。前年天子赐金虎，命长千夫防海滨。百里离居将二载，我复治生给不逮。郭外薄田力作耕，原上柔桑训奴采。二亲头白笑语温，次儿行酒婿应门。有弟隔屋罕相见，我妇日牵龆龀孙。天子仁慈尚姑息，丞相南征兴重役。乘时饿虎昼吃人，谁与苍生系休戚。民力不堪供奉承，董责尽用尚书丞。新行交钞愈涩滞，米价十千酬四升。师出无功天子怒，一朝远放西河去。班师下诏慰黎元，四海歌谣满途路。今年顽民起西山，帕首举火烧阛关。城中六官奋六节，凯歌马上擒俘还。是时海寇集江下，水军杀之海为赭。元戎不识予何人，起作区区守关者。守关三月不得归，岂假威权属布衣。自谓一身本无事，又俾审理民间饥。补官使者招入粟，一纸白麻三万斛。频年官籴廪为空，数月举家朝食粥。时维五月梅雨多，眼见青田生白波。饥农仰天哭无食，今秋无成将奈何。吴江漫漫风波急，夜返扁舟及家室。坐看急电怒驱雷，骤雨打窗愁欲泣。我歌长歌行路难，闻者抚膺坐长叹。皇天流毒虐下土，自此天下何由安。呜呼，自此天下何由安！

诗的结句是重复加强的句式，战乱频仍，今秋无成，天下已如鼎沸，生民何由得安？这时在诗人的心目中，谁是这场持久战乱的胜利一方呢？经历了这样的灾难之后，究竟还有没有胜者？

七月。周砥、马治的合集《荆南唱和诗》成书。

从至正十三年起，三年间周砥、马治同馆于宜兴荆溪之南，随时唱和，并将所作诗积成一卷，题为《荆南唱和诗》，抄出两部，每人保存一部，是为了今后天各一方，能有所思念，“藉此以识忧患穷愁之岁月”①。《四库全书总目》评本集：“是集正元末丧乱之际，感时伤事，颇为情致缠绵。”在战乱中以唱和之诗作为互相的慰藉。马治历经大难而入明，将自己保存的一部交给高启，由高启等人再作序跋，便流传下来。

周砥，字履道。平江（江苏苏州）人。至正初是顾瑛玉山草堂的座上客，后为张士诚所用，平江为明军攻陷时，死于兵乱。马治（1322—?），字孝常。宜兴（今属江苏）人。入明，曾任内丘知县，迁建昌同知。洪武十七年（1384）尚在世。

九月。已经接受元廷招安的张士诚，又攻破元军驻守的扬州，使南北的

① 马治《荆南唱和诗序》。

交通再次阻断。

与张翥关系最密切的城市，除了大都，就是扬州。为此张翥给身在扬州的友人成廷珪写了《寄成居竹》诗。他终生视扬州为第二故乡①。而诗人成廷珪则是他与扬州维系的纽带。他有一首写给成廷珪的长题诗，诗题等于序文:“成居竹有书，报甥傅君亮至扬州，言其家与外表舅吴仲益，及妇家二叔、学生韩与玉全家无恙。喜甚有怀。”这首诗是一篇“平安家信”。《寄成居竹》诗，题下有注:“时张寇已受诏，而阴袭扬州”。这首写于至正十六年前后的诗，可以视为《七忆》中的《忆维扬》的注释，《忆维扬》诗云:“战骨填沟尘满城，尚书归说使人惊。方期渤海民沾化，岂意平凉贼畔盟。何日皇天知悔祸，中原故老望休兵。伤心扬子洲边月，忍听江流是哭声。”

对张士诚，人们一直是看不透的。其实元明之际人对“招安”的理解，主要就是出自对张士诚的理解。张士诚部占据扬州不久，丞相脱脱亲自统率部将，以号称百万的大军出征高邮。刚攻陷外城，城中震恐，突然元廷下诏解除脱脱的军权，安置淮安路。义军“勇气百倍，出城拒敌。诸卫铁甲军抱不平者，尽皆散去，或相聚山林为盗，高邮不可得而复矣。”② 经过这一劫难，对元廷来说江南大势已去。

熊太古记录自己游历天下山川的见闻笔记《冀越录》成书，并写出自序。

熊太古，是儒学宗师熊朋来之子。他平生足迹半天下，见闻赅博。熊太古和朱思本，是元代两个著名的旅行家，也是旅行纪实的作者。《四库全书》馆臣将《冀越录》列入“存目”，此后这部书几乎被“遗忘”。《四库全书》馆臣摈斥《冀越录》的理由，是熊太古在书中（“河源角端”节）提到：昆仑是葱岭的支脉，并不是河源。而这正是他（也是元人）超越前人之处，他的依据是元世祖时对河源的探险考察。明人李时珍对《冀越录》情有独钟，在写作《本草纲目》时“颇援据之”。

九月。张士明的同年傅亨因公赴山东路经灵岩寺，见到张士明《灵岩寺诗》，也题诗两首，刊刻在同一块岩石上。

傅亨，字子通。大都（北京市）人。后至元元年中乡试，此后科举停顿，直到至正二年才中进士。本年九月，他在旅途中意外见到同年的诗篇，立即赋诗两首刻石。明年三月，他奉旨到海岳降御香归途再次路经灵岩寺，

① 《尧山堂外纪》卷七十五，曾记载“张蜕庵在扬州，元夜卧病，赋〔风入松〕词云云”，这也是他与扬州感情联系的例证。

② 《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九“纪隆平”节。

仅过了不到半年，山石上除张士明与自己的诗，又增添了别的诗篇。于是他再和一首。这些诗，就构成著名的人文景观“灵岩寺诗刻”。“灵岩寺诗刻”是战乱年代对升平往事的怀念，也是特殊的、诗人之间通过摩崖石刻唱和的罕见形制。

十一月。顾瑛作《安别驾杀贼纪实歌》，记述了一场关系到昆山为谁所有的激战。

顾瑛写的是另一场“盛宴”。作为旧秩序的得益者，他和他的诗友们一直“立场鲜明”：反对战乱，并不管战乱因何而起。

《安别驾杀贼纪实歌》（《玉山璞稿》卷下）是长篇七言古诗，诗序无异一篇纪实文学：“昆山之石浦村有贼党，杀土豪胡氏父子及孙，火其屋，掠其妻女财物，巢于村之无相寺，将有助逆之意。州尹于阗彦晖公，外示以安。至次月廿三日，假以他事诣诉于郡，郡官闻于分省参政公，以本郡治中安公行剿伐事。公即率亲随精兵快马，声言发常熟，乃衔枚夜行至真义里，分符俾瑛与陈志学各选水军，协力剿捕，时廿四日夜。廿五日早，过江令集千墩寺，寺之去无相寺廿里。州尹率水军自此西进；义士张汉杰奇领各募义丁分把去路。治中公自江北浮马直入贼巢，擒贼焚寺，领军而回，是夜已半。此行也，计官军五百，水军六百，民之袒肩者千有二百人。往返者再宿，生擒首贼二十有六，杀死焚死者无算，胁从者贷之。得米若干石，银若干锭，他物称是，实用兵神速之力也。瑛忝从军幕中，谨歌长歌一章，以纪其事，且美治中公能奋勇效忠报国也。”诗中提及的“于阗彦晖公”，就是时任昆山知州的色目人坊蒙；于阗，即今新疆和田。在《玉山璞稿》这首诗之后，有《昆山知州坊侯平贼诗》，也是七言长篇。事件发生在十一月二十五日，连夜顾瑛就写出了这首长诗，诗的结句是“作歌更记杀贼时，乙未季冬廿五夜”。

汪泽民去世。享年八十三岁。

汪泽民（1273—1355），字叔志，号堪老真逸。宣城（今属安徽）人。早年家贫力学，通融经史，延祐元年以《春秋》中乡贡，荐上礼部，下第，授宁国路儒学正。延祐五年方登进士第，任平江州同知，迁南安路总管府推官，有廉明之称，再迁信州路总管府推官、平江路总管府推官，调兖州知府。至正三年，召入京授国子司业，参与修辽、金、宋诸史。史成，迁集贤直学士，不到两月移书告归。大学士和尚说：集贤本就是养老尊贤之地，愿少留以副上意。汪泽民回答：“以布衣叨荣三品，志愿足矣。”遂以礼部尚书致仕。归里后与门生故友往返唱和，忘情世外。死于元末兵乱，追封谯国郡公，谥

文节。有诗集《巢深》《燕山》《宛陵》等稿，均已散佚。与张师愚合编宋元宣城诗人诗选《宛陵群英集》十二卷，今存。另著《春秋纂疏》等书。

岑安卿去世。享年七十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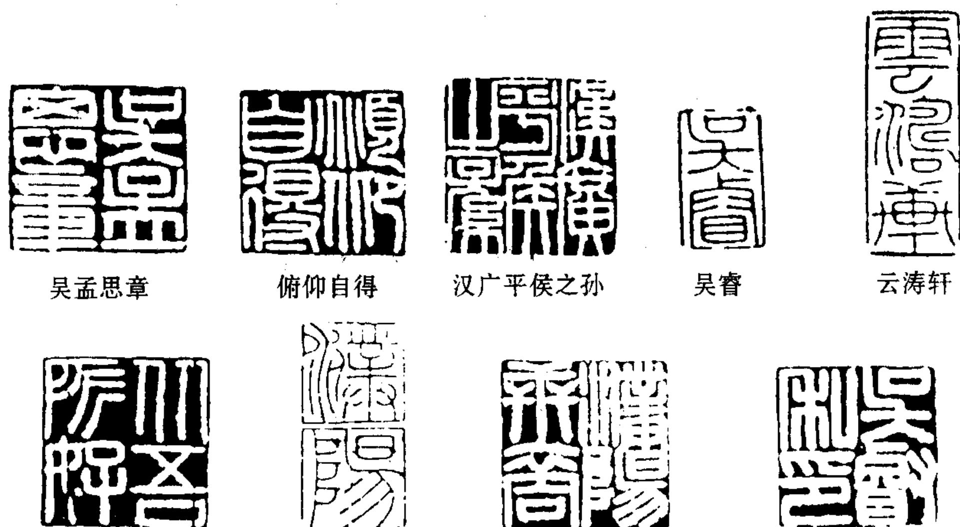
岑安卿（1286—1355），字静能，号栲栳山人。余姚（今属浙江）人。十岁就学，几年后，就能诵《四书》《五经》，或劝他应举，他却说："以吾一日之艺，而决终身之出处，吾兹不为。"兄弟并登进士，他仍然隐居乐道。家东南有栲栳峰，时常攀登山颠，坐览万物，移家山下，以"栲栳山人"为号。江浙宣政院判榜题他的居室为"栲栳精舍"。至治三年后，数被举荐，都辞而不就，后至元、至正间又屡被举荐，以年迈力辞。晚年放情山水，"每诗文成，辄委稿"，"不欲以此求人知"（王至《岑贞元先生行状》）。卒，私谥贞元先生。岑安卿以隐逸为平生志趣，能诗，又不欲以诗文成名，操守清高。早年师事宋遗民厉元吉，曾以"寡言笑、慎嬉游"为人称道，又曾辑居敬、集义、修身、理家等格言，是比较典型的儒生。其诗结为《栲栳山人诗集》三卷，所作主要抒写隐逸情怀。《四库全书总目》评《栲栳山人诗集》："其诗戛戛孤往，如其为人。惟七言古诗时杂李贺、温庭筠之体，盖有元一代风气如斯。然气骨本清，究亦不同纤媚秾冶之格。"

吴景奎去世。享年六十三岁。

吴景奎（1292—1355），字文可。兰溪（今属浙江）人。早年以好学闻名乡里，十三岁为乡正。至治初年，海道万户刘贞聘为浙东宪府掾，又任宪府从事，次年刘贞离任，吴景奎也辞归乡里，绝意仕进。后，部使者举荐署兴化路儒学录，以母亲年老为辞，没有到职。卒于家。吴景奎于书无所不读，不但长于写诗，还喜欢论诗。宋濂自称是他的"契家侄"，为他的诗集作序时提到"公尝与濂剧论至斯"，感慨"诗道亦几乎息矣"，为之"弹指三叹"。去世后，其子吴履与门人黄琪编遗诗为《药房樵唱》三卷，今存。另辑有《诸家雅言》，未见传。

吴叡去世。享年五十八岁。

吴叡（1298—1355），字孟思，号云涛散人。祖籍濮阳（今属河南），靖康之难南迁，定居钱塘（浙江杭州）。元至正间流寓昆山，工翰墨，尤精篆隶书，识者以吾衍、赵孟頫方之。有《云涛萃稿》以及《说文续释》《集古印谱》等，均藏于家。在书法篆刻方面，他直接影响到明初。按：吴叡，又作吴睿。刘基墓志铭明言，吴睿卒于至正十五年，享年五十八。但易恒《挽



吴孟思章　俯仰自得　汉广平侯之孙　吴睿　云涛轩

这都是吴叡自己刻的印章。在中国印章史上，吴叡是元代最主要的“印人”。

吴孟思》诗序（明俞允文《昆山杂咏》卷二十七）则说：吴睿“以疾卒于马鞍山顶塔院，年三十有九。归葬于武康县封禺山”。关于生卒年，从刘基说。

至正十六年丙申（1356）

正月。一则民谣使富庶之区松江的陷落，打上了地下秘密社会的印记①。

至正年间的吴中，虽然历经战乱，仍然是文学最发达普及的区域。当常熟州为起事者里应外合攻陷后，松江府特意印造了“官号”（特别身份证）发给游散人员与兵丁佩带，以便识别。这些“官号”竟然设计成了这样的图案：画上一个大圆圈，围绕着圆圈的是火焰，圆圈之中是官府的“府”字，再用松江府的大印加盖其上，大圆圈的四角，是主管官员的花押。在当时，这样的防伪措施（双重押印）已经是极其郑重。可是“官号”刚刚下达，一个民谣不胫而走：

满城都是火，官府四散躲。城里无一人，红军府上坐。

这个歌谣传遍街巷，使人们惶惶不安，为松江一个多月后的陷落，提前打开

①《南村辍耕录》卷五“松江官号”节。

了“城门”。松江陷落，使得元廷对江南的领有被架空，海运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

在后至元与至正年间，民间流传的歌谣空前之多，成了双方征战的第十九种“兵器”，而且对人心的潜在影响相当广泛。

除了民谣，流行于民间的还有谶语，这都与秘密宗教流行有关。

松江与平江相邻，先后陷落于张士诚之手。据说在几年前战乱初起时，平江始筑城池，有人挖出一通唐碑，碑上写着谶语。从至正十一年秋，这些谶语就流传不息，直到本年平江陷落，人们才明白目前发生的事，早在唐人谶语中作了预言[1]。这显然是受了“石人一只眼”的提示由人为安排的。

正月。乱兵占据玉山草堂，顾瑛失去了根基。

据郑元祐《白云海铭辞》（《玉山名胜集》卷五），本年春，战乱突起，

顾瑛奉母避难于商溪。商溪在吴兴东南之绝僻处。“人以君平昔尊贤下士，虽危险殆艰，裹糇粮、具舟楫以从君于商溪者，相望不绝。溪之上有大慈隐寺，寺僧闻君名，延款礼遇，如子弟之于父兄。故夫人甘膬之味，温凊之奉，一切如家庭。居无何，病气决而卒。君痛母客死旅次，号恸顿绝。事平，即奉函骨归，附葬绰墩之先陇。仲瑛念母不见，结楼于碧梧翠竹之堂后，而名楼曰‘白云海’，时时登楼，踯躅四顾。”使顾瑛特别痛惜的是，逃亡时未能将七八十卷友朋宴集时的题咏诗文带走。

二月。张士诚据平江，并开始筹划以海运救济京师。

据《元史·顺帝本纪》，“张士诚陷平江路，据之，改平江路为隆平府”。并将附近的湖州、松江、常州都纳入势力范围。元廷对此无力追究。危素为司农丞，当浙西刚刚失陷，海运不通时，他着手于京师雄、霸等州，屯田种粮食，以供大都不时之需。他已经预感到完全依靠江南海运会有问题。这些新屯出产的粮食，叫做“京粮”。（《庚申外史》）

张士诚占据平江时，以著名的佛寺承天寺为自己的行宫。《南村辍耕录》说:“至正丙申春，今张太尉士诚未归顺时，伪称诚王，国号大周，改元天佑，历曰明时。由淮渡浙，攻破平江，即承天以居，尽撤去殿上像，设座于其中。”“高邮兵破城，张士诚据（承天寺）以为宫，佛像悉毁，坏铜观音铸

[1] 《至正直记》卷四“平江筑城”节。

为钱。既投降作太尉，别造府。越四五年，复为寺。”[①] 承天寺似乎是元明之际历史的一个聚光点。著名的郑思肖《心史》即出自承天寺的古井之中；“吴中四士”之首高启就是因为为魏观的苏州太守府写上梁文，而惨遭腰斩，这个太守府，正巧是建立在张士诚的伪王府基础之上。

四月。董旭画《长江伟观图》，并自题五言古诗一首。

《长江伟观图》卷末，有许德彝、唐元寿等二十余位元人的题诗数十首。这些题《长江伟观图》的诗曾汇为一编，题名《伟观集》。

董旭，字太初。新昌（今属浙江）人。以画山水知名，元末社会动乱，隐居山中，方国珍曾想罗致幕下，他作诗云：“君子慎其微，草露不可行”。方国珍强之，因不从而被害。《长江伟观图》这幅画，表现出纵横中国的长江奔流入海的奇观，董旭题《长江伟观图》诗，则以超越时空的视野，展示作者高屋建瓴的时空感。他从江源水不容舟，写到江河奔涌，容纳百川，浩荡入海。他的诗句又远远超出画面：“中流一长啸，宇宙争百忧”；“时事翻覆间，桑海变蜉蝣”。“酹此一杯酒，净洗千古愁”则是促使他作此画、题此诗的原始冲动。在他之后，虽有数十人题诗，但没有一人达到这样的高度。

七月二十八日。离开玉山草堂避居溪山的顾瑛，坚持在野外避难地的即将开败的海棠花下举办了新的会集。

初秋，山溪两岸海棠花开放，顾瑛得以与同在溪中避难的陆仁（字良贵）、王楷（字叔正）相聚，相约在即将开败的海棠花下集会。这是玉山草堂之外的一次“末日之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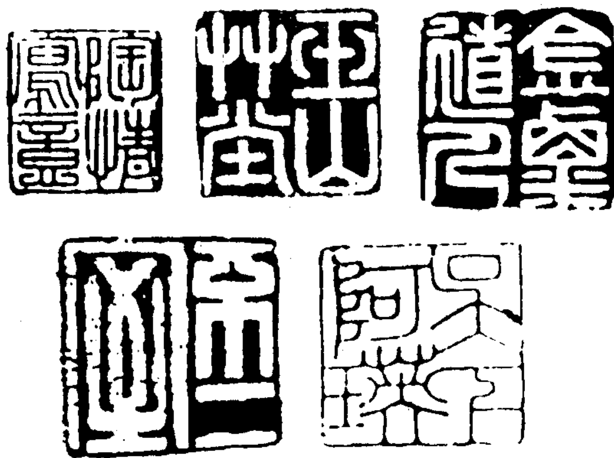
顾瑛《秋日海棠花开》（《玉山名胜集》卷五）诗序说：“明月东上，顿思匡山寓于越，香山阻于杭，龙门归吴江并而无信。道路梗绝，莫知何在。予子元臣，孤身守忠，存没未保。向之看花觞咏者，惟汝阳一人而已。对花伤感，渐成不乐而罢酒。越五日，而河南陆仁良贵、太原王楷叔正，同舟泊溪上。是晚郁蒸尤甚，而是花尚留数十朵在，亟命书童张席，露坐树傍。相与折花剧饮，各永言之。呜呼，花不以寒暑而间，而人乃有吴越之阻，世殊事异能不慨然。余向时绛雪亭诗卷，兵至时为乱军中好事者持去，就俾莒城貌图于前。余赋唐律一首于后，请坐客相次以纪，时丙申七月廿八日也。”诗序中，使人印象深刻的不是避兵逃难的顾瑛的狼狈，而是他对举办觞咏之

① 以上两则文字俱见《南村辍耕录》。前见卷十一“承天阁”节；后见卷二十八“承天寺”节。

会的执著，对诗友天各一方、不通声息的难堪，这，便是他反对颠覆秩序的原因。

八月。顾瑛削发为僧。一个意外喜信是：正月兵乱中失去的七十多卷友朋之诗画，竟然失而复得。

据《补辑玉山草堂诗卷记》（《玉山名胜集》卷五）说："余家玉山中，亭馆凡二十有四，其扁题书卷，皆名公钜卿高人韵士口咏手书以赠予者，故宝爱甚于古玩好。今年春正月，兵入草堂，书画无长物。夏四月，有军士数百持戈特来索予甚急。时予与家累辈尚在山中，由是获免。然不知其故，后三日，始知为不义者诬。及归草堂，而诸卷皆为之分挈而去，每与汝阳袁子英叹诸朋辈手泽不可复见。秋八月，予欲谢世缘而无策，不免削发作在家僧。一日，通守冯秉中下车问讯，茗供之余，游观诸作，为余言曰：君家诗卷，向为军士持去，予知君好事，皆为君收得之，明当奉送。不数日，囊贮七十余卷以归，予点检诸亭馆卷中，惟柳塘、绛雪、绿波三卷不在焉，呜呼！物之聚散，岂偶然哉，向之大变而无所失，忽罹细故皆星散而去，又得贤守于众手中裒辑以归，使吾之亭馆愈增其颜，然不忍独使三亭馆处寂寞也，暇日与袁子英、马孟昭分补其阙，各书一卷，予得此卷，以前书钞为续卷，因纪其得失云。时丙申岁己亥月庚申日，玉山顾瑛书于绿波亭。"



这是顾瑛使用过的印章。印文分别是"陶情写意""玉山草堂""金粟道人""不二室""吴下阿瑛"。

九月。一场出乎意外的动乱突然爆发，原本看似牢固的社会秩序顷刻颠覆，亲历者刘尚质将自己的困惑写进《吉州诗》。

面对突如其来的"乱民"，本来是专程主持陕西地方科举考试的刘尚质为之震惊不已，特写《吉州诗》，并刊刻在石，记录了自己的心理脉冲。

刘尚质，字仲殷。曲沃（今属山西）人。泰定四年进士，授稷山县尹，历翰林编修，国子助教，监察御史，至正十六年，曾亲历临潼兵乱，至正十八年察罕帖木儿命为济宁路总管，后以潞州知州致仕。有诗文名，惟诗文主

要写于战乱中，流传不广。

在《吉州诗》[1] 序中，他写道：

至正十六年丙申岁，九月三日。予与同考试官张叔重，别丞相□□第，驲骖至长乐坡，东逢一使者，醉怒掣刀，拟于叔重及予。予以好言辟之，遂追佩旨者，于宣筒上斫数刀，遂将回马者左臂斫三刀，继而追予至淡河，以有长住军，其贼遂回。予从者李璞报于丞相，命三人驰驿追其贼。越明日到临潼，损马，行二十里逢使臣，知潼关贼入，华阴火烧。予遂策马过渭，宿于交口。五日晚，至同州。同州之民，空城而走。七日至合阳。八日至韩城。与岐王位下察罕等□征进马匹，及渑池县尉吕中孚相随至独泉。十一日饭后，过韩城。郭弓手纠合人众，弓器枪刀，劫夺将骡马□□进马□□。十五日，谒程□□、苏社长，赁雇马匹。十六日，到宜川，又得王主簿推一□□□筵检讨出身。慨有取马及护送人员。十八日，渡河，宿王弓手家。十九日，上马过五口，河东山川，人民熙熙，禾稼丰登，牛羊散野，余粮栖亩，——俨然太平气象也。翻思畴昔，渭南渭北之民，老幼襁抱。富者贫者号哭之声震天地，迤逦奔逃于延安诸山。又红贼一二马邀数千人，驱而前，劫夺戮辱，不胜其苦。渡渭之际，徒涉随水而没，不可胜数。又无赖之徒，假贼之名，劫略杀虏，不胜其难。有司官挈家而走，殊不见为国为民者。吁！使守令得人，有司效职，团结有方，政守有策，彼苍生者，何以有此流离劫夺之患哉？又岂有红巾盗贼之乱哉！因述二语，留张仲达□生、刘逢吉卿□，以纪此行实事云。是月十九日，曲沃刘尚质仲殷父作。

刘尚质来吉州，原是件美差——主持陕西行省至正十六年的乡试。久在京师，他显然没有想到地方时局崩坏到了这个地步。他可能认定：在这天地错位时刻，刻诸岩石要比写在纸上持久。他也正是这样做的。目睹了这一切秩序顷刻灰飞烟灭的动乱，他不但忠实记录了自己的见闻，还写出"地覆天翻"之变给自己的印象。这篇序——还有以下的两首诗——至今读之，仍然使人不能作壁上观。

刘尚质的诗写道：

九月潼关有贼兵，渭南渭北震惊腾。愚民□马弄弓箭，野老临渊怀

[1] 《吉州诗》，见清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三十九。"□"，是石刻原缺的字。

战兢。人□战心行讨劫，褰衣策杖过崚嶒。渡河此日来慈吉，天朗霜清瑞日升。

西州气象已升平，处处农家碾谷声。石径峻崖容马走，山原细险有人行。关中闻说难中息，渭北免教黎庶惊。安得廉颇真将帅，挥戈横朔定咸京。

这一切怎么能如此突如其来，如同无情水火，仿佛天降灾难，一俟渡过黄河，抵达河东，升平景象简直使人以为是在梦中。这种经历总给人不大真实的感受，但他终生再不曾忘却。

九月三日（庚辰）。汝颍红巾军攻陷山陕关隘——潼关，述律杰战死。

其实对于整个中原战事来说，潼关的失守意义并不亚于余阙的安庆陷落，但这一战始终被低调处理。

述律杰（？—1356），一名铎尔直（朵儿只），字存道，一字从道，别号鹤野。契丹人，居太原阳曲。其先本辽贵族，赐姓萧；金灭辽，改述律为石抹，含义是奴婢，以折辱之。祖上从成吉思汗征战有功，授蜀之世袭保宁万户。述律杰袭职，抗言于朝，恢复述律之姓。泰定末至京师上屯耕便宜，元文宗立，受命抚晋冀关陕，又出平云南大理。元顺帝即位，授云南宣慰司都元帅。送其离京赴任，成了当时文坛一大会集。虞集、吴师道、陈旅、周伯琦、王沂、许有壬、班惟志等数十人均以诗文相送，赠诗多达300余首，并编成《群玉集》，由黄溍作序以行。至正十五年，以陕西参政防守潼关，潼关失陷时战死，所作散佚，《群玉集》也失传。

吴郡大家闺秀郑允端在平江为张士诚攻陷之后，死于病患中。

郑允端留下了一卷诗集《肃雝集》，存诗150首，是沧桑之变的印记。凭这一卷诗，郑允端成为元代存诗最多的女诗人。

郑允端（1327—1356），字正淑。吴郡（江苏苏州）人。宋丞相郑清五世孙女，祖父在吴郡作通判，徙居于此。家境富裕，被称为“半州”，又称“花桥郑家”。郑允端恣禀秀慧，尤善诗歌。丈夫施伯仁，是吴郡儒雅之士，夫妻相敬如宾。张士诚人据平江，郑允端的家毁于兵燹，郁郁致病，死时年仅三十岁，私谥贞懿。郑允端病中曾将诗作抄写成帙，藏于家塾，由施伯仁编次成书，并请钱惟善、杜寅等作序，题为《肃雝集》。郑允端《肃雝集自序》阐述了作诗宗旨，她认为近世妇女作诗“率皆嘲咏风月，纤艳委靡，留连光景而已”，她对此表示不以为然，而力主“铲除旧习，脱弃凡近”，要求

诗歌更接近生活——她的生活是社会秩序崩坏时期的典型。《四库全书》编者对郑允端诗评价相当低，认为“其诗词意浅弱，失粘落韵者不一而足”，以至未将《肃雝集》收入《四库全书》，仅列名于存目类。

去世之前，郑允端写了一首《吴人嫁女辞》。在这首诗的诗序中，她说：“余见寻常百姓家，多以女嫁达官贵人，虽夸耀于一时，而终不得偕老。故作是诗以警之。时至正丙申岁也。”这首诗则写道：“种花莫种官路傍，嫁女莫嫁诸侯王。种花官路人取将，嫁女王侯不久长。花落色衰情变更，离鸾破镜终分张。不如嫁与田舍郎，白首相看不下堂。”这是诗人的敏感，抑或是诗人的天真，她预感到社会秩序将要倾覆，她也为青春不得长久颇为感伤。但她自己就是“殉葬”。

松江失陷，文化生活彻底改变。夏庭芝家为烽火所毁。

夏庭芝《封氏见闻记跋》① 说：“予素有藏书之癖，凡亲友见借者，暇日多手钞之。……至正丙申岁，不幸遭时艰难，烽火四起。煨烬之余，尚存残书数百卷。”张择（张鸣善）《青楼集叙》进一步说：“张氏据姑苏，军需徵赋百出。昔之吝财豪户，破家剥床，目不堪睹。伯和优游衡茅，教子读书。幅巾筇杖，逍遥乎林麓之间洎如也。”松江大家闺秀郑允端家毁于兵，她也死于病患中；文献故家之后夏庭芝则写出了《青楼集》。

在平江死于张士诚之难的，还有诗人陈方。

陈方，字子贞，号孤篷倦客。镇江（今属江苏）人。因参加省试来吴郡，元帅王某招致宾席，便留寓吴中。娶龚璛女儿为妻，与顾瑛、郑元祐、张雨、倪瓒等交往密切。曾在无锡华氏（华幼武）家中教家塾，死于张士诚之难。有《孤篷倦客集》一卷，今有传本。

闰九月。苏杭战火四起。顾瑛从避难地平安返回玉山草堂，并坚持在草堂景点之一可诗斋举行了预期的觞咏之会。

关于玉山草堂可诗斋的这次会集，袁华作的诗序（《玉山名胜集》卷四）云：“至正乙未秋九月，平江等处水军都万户纳麟哈剌公，拜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奉旨统兵常镇，时宁海正千户顾元臣在行间。越明年二月，宁海君由无锡，道太湖，入杭。维时，姑苏、槜李之壤沓如，吴越音问不相知者二载。今年春二月，宁海君以功升水军都府副都万户，奉省檄，道天台，杭海而归，

① 《雅雨堂丛书》本《封氏见闻记》卷末。

时秋闰九月也。玉山嘉子之归，乃置酒会友朋于可诗斋。宁海君彩衣金符，照耀左右，奉觞行酒，侃侃愉愉，呜呼！父子之亲，君臣之义，鲜有能两全者。今宁海君能摅诚致义，升秩三品，居重庆之下，奉温凊之养，可为上不负圣天子，下不负所学矣。座客皆能赋者，遂以‘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以平声循次分韵。予得从字，敬序其端。”当场写出诗篇的共有五人。

顾瑛的儿子顾元臣正在军旅中为元朝能够保有江南征战，顾瑛已经有两三年没有得到儿子的消息。二月，顾元臣因军功升为副万户，秋九月，还家省亲，这次会集就为此而举行。在会集中，顾瑛以《可诗斋燕集分韵得方字》作祭献。诗云："海上风帆似马狂，归来仍喜佩银章。三年报国存忠直，一旦见亲全义方。祖逖誓江期复晋，董徽仗节乐还乡。圣恩已见金鸡放，醉饮宁辞累十觞。"

秋冬之际，昆山形势日趋平静。十月，另一次聚会仍然在玉山草堂的景点可诗斋举行。顾瑛亲自为会集诗写了序（《玉山名胜集》卷四）。序中说：

海虞山人缪叔正，扁舟相过，以慰别后之思。予谓兵后朋旧星散，得一顷相见，旷如隔世，遂邀汝阳袁子英、天平范君本、彭城钱好学、荣城赵善长、扶风马孟昭，聚首可诗斋内，诸公亦乐就饮，或携肴，或挈果，共成真率之会，由是皆尽欢。饮酒酣，各赋诗以纪，走笔而就。兴有未尽者，复能酬倡，以乐永夜。予以诗先成，叔正俾予序数语于篇首。缅思烽火隔江，近在百里，今夕之会，诚不易得，况后会无期乎。吴宫花草，娄江风月，今皆走麋鹿于瓦砾场矣，独吾草堂，宛在溪上。予虽祝发，尚能与诸公觞咏其下，共忘此身于干戈之世，岂非梦游于已公之茅屋乎？善长秉笔作图于卷，予索孟昭楷书以识，时丙申岁己亥月乙亥日[1]，斋之主人顾瑛序。而复赋诗曰：

木叶纷纷乱打窗，凄风凄雨暗空江。世间甲子今为晋，户里庚申不到庞。此膝岂因儿辈屈，壮心宁受酒杯降。与君相见俱头白，莫惜清谈对夜缸。

这些文字不是亲历者不仅写不出来，而且也体会不到其中蕴含的沧桑之感。

舒頔、舒远、舒逊兄弟三人避兵绩溪山中，被乱兵捉住，舒远要求替舒頔一死，后来兄弟都被释放。

[1] 丙申岁，为至正十六年，己亥月为十月，乙亥日，为二十九日。

舒頔（1304—1377），字道原，号贞素。绩溪（今属安徽）人。十五六岁时，与同郡郑玉、程文等讲明经史之学。成年后，受业于李青山之门，受



舒氏三兄弟（左起）：舒頔、舒远、舒逊。因元末战乱中“弟代兄死”，在文人中分外知名。三人的画像出自《绩溪舒氏族谱》。

到马祖常等人器重。后至元三年，江东肃政廉访使燕只不花举荐他出任贵池教谕，任满，调丹徒教官，至正十年转为台州学正。由于社会动乱，他弃职携带书籍隐居山中。至正十七年，朱元璋部将邓愈攻占徽州，礼聘他出山相助，以有病为由辞不就，并筑草庐为读书之所，名为“贞素斋”，以明自守之志。明洪武十年（1377）死于家中，享年七十四岁。有《古澹稿》《华阳集》等诗文集，今均未见。现存《贞素斋集》八卷，是明嘉靖年间辑刊。舒頔常以陶渊明自比，诗文也力求古朴清淡。尽管他不愿出仕新朝，表示怀念故国，但文章中多有为明朝兴起而歌功颂德之处。《四库全书总目》曾说：“頔不忘旧国之恩，为出处之正；不掩新朝之美，亦是非之公。”他的弟弟舒远、舒逊都有诗名，诗均附见《贞素斋集》。

潘伯修死在本年。

潘伯修，字省中。黄岩（今属浙江）人。至正间三中省试，但会试都未能得中，还归乡里，以教授学生度日。元末社会动乱，方国珍占据浙东，以武力将潘伯修劫至庆元，想使他归附。潘伯修力辞，要求回乡，方国珍派人在还乡路上将其杀害。时人因此很器重他，应梦虎作诗吊唁，其中有“嵇康未必轻钟会，黄祖何曾爱祢衡”之句。他的诗出入于晚唐二李，《元诗选》二集有潘伯修诗 39 首，题为《江槛集》。

边鲁去世。

边鲁（？—1356），字至愚，号鲁生。高昌畏吾人，入中原家族先后占籍魏郡（河北临漳）、宣城（今属安徽）。擅长画花鸟竹石，亦工古文奇字，至正初参与集咏《西湖竹枝词》，以善古乐府诗知名诗坛。元末战乱，曾侨寓鄞县，死于以南御史台宣使身份出使红巾军郭子兴部时，追赠南台管勾。



边鲁用过的印章

张渥去世于本年前后。

张渥，字叔厚，号贞期生。祖籍淮南，寓居杭州。博学多艺，画宗李公麟，长于白描。明经善属文，屡举不中，于是放意为诗章。与顾瑛友善，并为他作《玉山雅集图》，由杨维桢作序。

至正十七年丁酉（1357）

三月七日。廷试录取两榜状元倪征、王宗嗣。

本届录取进士共51人。两榜状元，全不知名。进士中，李延兴在文学上较有成就。

李延兴，初名李守成，字继本，晚号一山。大都（北京市）人。李士瞻长子，至正十七年中王宗嗣榜第三甲进士，授太常奉礼郎，兼任翰林检讨。元末政局紊乱，辞官隐居，"于势利澹如，若将终身焉。而河朔学者尊仰德业，担囊负笈，不远数百里来学"（李敏《一山集序》）。入明，河朔诸郡邑曾聘请他担任过教职。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尚在世。有《一山集》九卷，今有传本。但顾嗣立《元诗选》未收入李延兴的诗，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五曾这样评价李延兴："一山，北方之学者。其诗文颇拔俗，长歌尤擅场。"

七月。脱脱木儿由京官奉调出守陕西奉元，并作《帅正堂漫成》组诗。

宋人张先《十咏图》[①] 有一则元人题诗，署名脱脱木儿。脱脱木儿本是

① 关于《十咏图》的作画者，是不是词人"张三影"——张先，尚有异说。

蒙古色目人常见的名字，这个脱脱木儿究竟是谁，曾有不同推测①。《十咏图》著录于《石渠宝笈》②，题诗原署“高昌脱脱木儿再拜”，并钤三方印章:“清白堂”“五城世家”“高昌氏脱脱木儿时敏印”。所谓“五城”，就是“别失八里”，即北庭，入居中原的高昌畏吾人，习惯以“北庭”为郡望。《陕西金石志》等书曾记载，在陕西兴平有一幅石刻，是“高昌脱脱木儿”手书的十首绝句《帅正堂漫成》，但编者们却认为“诗不佳”，所以从未录出原作。所幸在传世的石刻拓片中找到了《帅正堂漫成》的原文。《帅正堂漫成》有序:“至正丁酉夏，诏宰臣内外通调，以济时艰。秋七月，余以户部侍郎，迁奉元守。顾惟樗散，恶足以当是任也。暇日因感兴类成十绝，用勒府石，聊以志岁月云。进士、高昌脱脱木儿松轩书。”③

这组诗，是一个色目诗人面对世事沧桑的“感遇”，一部首尾完整的“咏史”：

日影才移戒石亭，午衙无讼怡心宁。西风吹动阶前叶，铿若琅玕不少停。

慈恩寺里曲江头，欲往题诗不自由。知我终南山上月，清光直照读书楼。

走马长安八月时，一冬未到鬓如丝。赵张已去三王远，羞把樗材作吏师。

檐间野雀乱生成，阶下辰牌聒耳鸣。却忆内园春昼永，柳荫池畔坐闻莺。

长安西望旧咸阳，禾黍秋来一半荒。见说军储催似火，不能为主漫情伤。

心在朝廷迹在秦，干戈犹自触边尘。云间黄鹄高如鹤，那得乘风过析津。

秦川高处望燕台，朔漠云深一雁来。垂暮异乡访祭子，眉头忧国几时开。

关河日日卷风沙，十月羁人不到家。北望交游零落尽，倚窗独嗅腊梅花。

典却春衣意自融，小僮何事愧龙钟。床头一瓮黄齑菜，未必膏粱似得侬。

① 见周笃文《艺苑奇珍十咏图》，载《文学遗产》1996年4期。

② 见《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合编》，上海书店影印本第5册第1513页。

③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片汇编》第50册。

严寒侵透黑貂裘，浊酒沽来日唱酬。莫回东阑叹霜雪，春光不到树枝头。

诗写于至正十七年，那时陕西已经陷入玉石俱焚的战乱，时局势难挽回。关于这些诗是否杰出，可以有争议，但诗人确实是直面现实，倾吐积郁。元廷要求当时的官吏们“内外通调”，实际是想分散压力，而高昌畏吾人脱脱木儿也确实想为朝廷分忧。可他所能做的也就是写诗抒发情愫了。《帅正堂漫成》与刘尚质《吉州诗》都是在亲身经历了动乱后写于陕西的，而且都尽可能使其完整摹刻上石，写作时间也仅相差一年。但是，作者一个是汉人，一个是色目人，他们对于时局的感受就是不同。刘尚质写出的是家山即失的惊恐（曲沃在山西，离陕西华阴不远），脱脱木儿则写出了没有家园的惶惑。脱脱木儿应该依靠元廷，可他最怕的就是与元廷一起沦没，成为殉葬。

八月。张士诚占据平江并降元，元廷诏以张士诚为太尉。

元末的起事群雄中，张士诚是最有争议的一人，由于平江易帜，文人发生分裂，依附张士诚的马玉麟被委任为太尉府掾史。张士诚为了站住脚根，虽然一直在笼络文人，又有元朝为背景，但真心辅助他的文人，除陈基、马玉麟，并不多见。

释无诘活动于此前后。

释无诘，里贯生平无考，元诗总集从无其名，仅《永乐大典》保存有释无诘《兰雪轩诗集》，存诗10余首。据释无诘《赠圭斋承旨二首》（《永乐大典》卷一〇一一五），他与欧阳玄大致同时。修成辽、金、宋三朝史之后，欧阳玄于至正五年进翰林承旨，据诗意，应写于欧阳玄休致之后。

十月七日。姚琏与友人出游四贤书院，十六人赋诗而别。

一同出游的人有王祎、宋濂、吴沉、朱升，还有戴良。这些参与者除姚琏自已，在此后都为战乱裹挟，而《诸友分韵别诗十六首》等于是他们在歧路的临别祝词。《诸友分韵别诗序》（《云山一懒翁集》附刻）说:“元至正丁酉十月七日，诸友游四贤书院，既而觞于叔器氏之西轩。是日也，气肃景幽，礼洽情畅。归途步月，兴犹未已，取《赤壁赋》四句十六字分韵赋诗，明日集而为卷。未几，二三诸友皆告归山中，各书一通以赠。噫，朋友之道阙，伐木之诗所由作矣。而况离乱之余，边陲之地，存者如晨星，游者如流电。今日之聚，岂不系后日之思乎。会稽屠性书引诗左。”诗序的作者屠性，字

彦德，一名申屠性，在元末的战乱之中比较低调，入明隐居不出。《元诗选》三集录其诗 15 首，题为《彦德集》。

姚琏与唐桂芳一同受到朱元璋召见。

姚琏，一名廷用，字叔器，号云山一懒翁。祖籍成都，世居歙县（今属安徽）。八岁失母，早年从胡炳文游，以《诗经》举乡试，授紫阳书院学官，历松江青龙镇儒学教谕，累迁太平路儒学教授。元末战乱初期，由董抟霄委任为理问所知事，乡邑沦没，子亡家破，弃官日与友人长吟穷日，受到世人推重。明兴，与唐桂芳受到朱元璋召见，但备顾问而已。元明之际终老于乡里的凤池地方，教授生徒，从学者称为"凤池先生"。有《凤池山房集》《青溪云山集》等，均未见传。诗文集《云山一懒翁集》三卷、诗集《姚叔器集》一卷，都是后人辑刊。

唐桂芳（1299—1371），一名唐仲，字仲实，号白云、三峰。歙县（今属浙江）人。唐元之子。早年师从洪焱祖，至正中荐授崇安县学教谕，迁南雄路学正。入明，摄紫阳书院山长。有《白云集》七卷。

黄溍去世。享年八十一岁。

黄溍（1277—1357），字晋卿。义乌（今属浙江）人。早年即以文名见知于时。延祐二年进士，授台州海宁县丞，为官清廉正直，曾以私访得实情，为县民平冤狱。在诸暨州判官任上，打击酷吏豪强，颇有声望。入朝授翰林应奉，转国子博士，视弟子如朋友，未始以师道自尊，学生有许多成为闻名的文士。出为江浙等处儒学提举。以秘书少监致仕，不久又授翰林直学士兼经筵官，又上书告老，不等批复就起程还家，为朝廷遣使追回，仍任直学士。至正十年始得致仕，优游乡里七年，卒于绣湖私邸，追封江夏郡公，谥文献。号称"博极一古之书，而约之于至精，剖析经史疑难及古今因革制度名物之属，旁引曲证，多先儒所未发"（《元史》本传）。在朝时典册诏令多出其手，平日求文者盈门，时人比做宋代欧阳修。有《黄金华集》四十三卷、《黄文献集》十卷、《日损斋笔记》一卷，均存。

十二月。欧阳玄去世。享年七十六岁。

欧阳玄（1283—1358），字原功，号圭斋。浏阳（今属湖南）人。自幼母亲亲授《孝经》《论语》，八岁从乡先生张贯之学，十四岁从遗老学词章。延祐元年诏设科举，欧阳玄以《尚书》中乡试，明年登进士第，授平江州同知，调芜湖县尹。在县勘平冤狱，压抑豪强。至治三年秋，以校阅江浙考试



元人画《名贤四像》或《四学士像》。画中的四人（右起）是：吴澄、虞集、欧阳玄、揭傒斯。除吴澄，三人均曾在奎章阁任职。现藏美国辛辛那提美术馆。作者佚名。

卷至杭州，与贯云石游。入朝为国子博士，升国子监丞，致和元年迁翰林待制。天历改元，文宗亲署欧阳玄为艺文少监，主持编纂《经世大典》。元统元年拜翰林直学士，编修四朝实录。顺帝时，因足患风痹，告病南归就医，未允，修辽、金、宋诸史，为总裁之一。以后屡次辞官均未获准。奉敕定国律，又再次乞致仕，特授湖广行省右丞致仕，将行，顺帝再次降旨挽留，未能退休。元末社会动乱，中原道梗，欧阳玄准备由四川还乡，仍未允。至正十七年十二月戊戌（1358 年 2 月 7 日）卒于大都崇教里寓舍，追封楚国公，谥曰文。一生两为祭酒，六入翰林，三拜承旨，屡主文衡，两知贡举及任读卷官。朝廷典册多出其手，天下碑传往往以得欧阳玄文辞为荣。有《圭斋集》十五卷，是流传较广的元人文集，另著《拯荒事略》，今存。欧阳玄与虞集齐名，虞集任国子助教时，其父在潭州任教，见欧阳玄文，大惊，写信给虞集，说:“他日当与汝并驾齐驱。”后来果然名声相埒。

欧阳玄有一篇简短的《自赞》（《圭斋集》卷十五），解嘲说:“不古不怪，不清不奇。置之竹篱茅舍似无不可，供之玉堂金马亦无不宜。噫，百年三万六千日，与吾相对，吾亦不知其为谁。”真是通脱。他在出任福建廉访使途中，行次浙西，就因旧病复发，一面“上休致之请”，一面“作南山隐居，优游山水之间，有终焉之志”。可朝命复拜翰林学士承旨，而且屡辞不允。但是，至正十四年“汝颍盗起，蔓延南北，州县几无完城”，欧阳玄勉力“献招捕之策，凿凿可行”，却又“不能用”——实际他已经是元廷的“人质”。

王思诚去世。享年六十七岁。

王思诚（1291—1357），字致道。兖州滋阳（今属山东）人。早年从汶

阳曹元用游。至治元年登进士第，授管州判官。至正二年累迁监察御史，出任河东宪佥，召为国子司业，修辽、金、宋三朝史，调秘书监丞。超升兵部侍郎。丁忧归。起为河间路总管，历礼部尚书、国子监祭酒，升集贤侍讲学士。出为西台治书侍御史。至正十七年重任国子祭酒，入京时，卒于途中，谥献肃。有诗文名，死后所作散失。他今存的诗文几乎全部是至正战乱期间，写在山西（在西台任御史时）。

释悟光去世。享年六十六岁。

释悟光（1292—1357），字公实，号雪窗。新都（今属四川）人。俗姓杨，住四明天童寺。有诗名，与虞集交往密切，至治三年寓居京师，与贡师泰唱和。《新续高僧传》卷四《悟光传》提到："所为诗，清丽可传，有《雪窗集》稿二卷。"但《雪窗集》原本已佚，仅《文渊阁书目》卷十曾著录"僧雪窗集，一部一册，阙"，元诗总集从无悟光雪窗其人其诗。《永乐大典》有套红标出的"僧雪窗诗""僧雪窗诗集""僧雪窗集"之目，三目总计存诗19首。元代有两个号"雪窗"的释子。一是释普明，号雪窗。松江（上海市）人。俗性曹，能书画，画兰花有时名。一般以"明雪窗"相称。二是释悟光。有诗名、与当时诗人唱和的释子雪窗，又称为"光雪窗"，所以无疑是悟光雪窗。

吕思诚去世，享年六十五岁。

吕思诚（1293—1357），字仲实。平定（山西阳泉）人。泰定元年进士。历翰林编修、国子司业、监察御史、广西廉访司佥事、刑部尚书、礼部尚书，出任湖北宪使，入为中书参政，因议更行钞法，被御史弹劾为狂妄，左迁湖广行省左丞。在武昌申明号令，整饬部伍，以拒围困省会的起事部队，不久又召还京师，复为中书左丞。在职以廉洁自律、为官劲拔著称，历任要职，三为国子祭酒，并总裁修纂辽、金、宋诸史，文章政事皆有过人之处。死后诗文散佚，《元诗选》三集有其《仲实集》，存诗仅12首。《桂林八景》是代表作，写于在广西廉访司任职时。

关于吕思诚，有这样一个故事：未显时家贫，一日无米下锅，欲携布袍贳钱办晨炊。妻子有难色，他戏作一诗："典却春衫办早厨，老妻何必更踌躇。瓶中有醋堪烧菜，囊里无钱莫买鱼。不敢妄为些子事，只因曾读数行书。严霜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1] 他的清贫与这首诗同样著名。

---

[1] 《南村辍耕录》卷十二"文章政事"节。

安徽、江西形势日益紧迫，投笔从戎的诗人吴讷战死。

吴讷（1331—1357），字克敏。休宁（今属安徽）人。少学兵法，习骑射，随父亲吴礼驻守靖江时，就亲自参加征战。至正年间，红巾军攻破徽州，郑玉、杨维桢向江浙行省举荐吴讷，授建德判官，兼义军万户，与元帅李克鲁合军收复了徽州。至正十七年，朱元璋部大军压境。吴讷败走，随元帅阿鲁辉退保浙西，与明军力战不克，自刎死，年仅二十七岁。有《吴万户诗集》五卷，未见传本。《元诗选》三集选入吴讷诗10首，题为《万户集》，收入的诗全写于征战之中。《破红巾》以“君不见蕲黄儿，纷纷白马张红旗。去年陷湖北，今年陷淮西”，反映出红巾军的浩大声势。他曾以诗卷谒见杨维桢，杨维桢大奇其人，认为“其才勇忠义，实得诸天性”，并说“则知向所为诗，皆笔椟之余耳”（转引自《元诗选》小传）。

正月七日（丙午）。余阙死守成为孤岛的安庆。城池为陈友谅所部攻陷时，余阙自刎身亡，妻妾子女均投井以殉。

作为元明之际不多的例外，余阙是元明两朝都认可的忠臣。元西域人之中，他是著名的诗文家，但他的名气很大程度上是得自安庆的死守与殉难。

余阙（1303—1358），字廷心，一字天心。河西唐兀氏。占籍合肥（今属安徽）。早年丧父，靠教书以养母。元统元年右榜一甲进士第二名，授泗州同知，不久入朝任翰林应奉，转刑部主事，以不愿阿附权贵，弃官归。修辽、金、宋三朝史，再次以修撰召入翰林院。拜监察御史，改礼部员外郎。曾因母丧避居庐州，至正十二年，江淮受到战乱波及，起用余阙为淮西宣慰副使、都元帅府佥事，分兵镇守沿江重镇安庆。在安庆几年间屡挫陈友谅兵锋。当时已南北阻绝，义军蜂起，元军形势日蹙，无援可待，无兵可徵，全靠余阙苦心孤诣，支撑大局，一再转危为安，他也一再迁升，由都元帅、江浙行省参政，直至淮南行省左丞。至正十七年秋，陈友谅部倾尽全力围攻已经成为孤岛的安庆。余阙自刎，沉尸清水塘，妻妾子女都投井以殉，追封豳国公，谥忠宣（或作忠愍、文贞）。朱元璋得天下后，对余阙礼敬有加。宋濂还执笔亲撰《余左丞传》（《宋文宪集》卷四十）。余阙诗文均长，诗以汉魏六朝为宗。戴良《鹤年诗集序》中，曾以“余公之诗则与阴铿、何逊齐驱而并驾”相比。在元末文坛，余阙是主流之外能自成一格的重要诗人。

二世祖幽國謚忠宣闕公像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像



刘基与余阙，是元统元年的同年。余阙殉难，刘基成为朱元璋的谋主，是后来的事。余阙殉难时，刘基还在处州为石抹宜孙作参谋，安庆陷落，就轮到处州了。刘基像出自《诚意伯集》，余阙像出自家谱。

《元统元年进士录》卷上的一则记载，是关于余阙生平的重要资料：

〔余阙〕贯庐州录事司。唐兀人氏。字廷心，行四。年三十一，正月十一日〔生〕。曾祖铁节，祖铁节，父肩耳为。母尹氏。慈侍下。兄□、少刺八、供保，弟福。娶耶氏。乡试河南第二名；会试第二名。授〔淮〕安路同知泗州事。

这是参加会试时余阙自己填写的档案，是有关其族属、家世的准确的资料。《元统元年进士录》还收录了余阙廷试制策，但已残缺过甚。他留心经书，《五经》都有传注，并精于书法，以篆、隶等体见长。曾读书于青阳山中，学者称“青阳先生”，诗文集就题名为《青阳集》或《青阳山房集》。《青阳集》是元人文集中流传较广的一种，有四卷、五卷、六卷、九卷等不同版本。清嘉庆八年（1803）张祥云校勘《青阳山房集》六卷（正文五卷，附录一卷）较常见，诗全部编入卷一，存诗颇完备①。

① 六卷本编排比较合理，错讹也少，而且六卷本比九卷本多出4首诗。

在元江浙行省参政石抹宜孙主持下，处州成为诗文家避难的乐土。

石抹宜孙受命驻守处州。当时处州城中的妙成观修建了一处景点，叫做“掀篷”，妙成观观主何宗姚首倡集咏其事，一时参与者有数十人之多，并将所作编成《掀篷倡和诗》①。在处州受到石抹宜孙庇护的诗文家刘基、胡深、叶琛、章溢等，都参与了这次会集，在两浙影响颇大。处州妙成观“咏掀篷”，与此后余姚的“续兰亭会”，是战乱中举行的两次大型同题集咏活动。



章溢像。出自清代肖像画家上官周的《明太祖功臣图》。

石抹宜孙（约 1301—1359），字申之。契丹述律氏，即萧氏，台州（浙江临海）人。袭职为沿海上副万户，至正十一年行省檄守温州，以功升浙东宣慰副使，分府处州。此后长期驻守处州，至正十七年迁行院判官，明年拜江浙参政。处州为朱元璋攻破，死于乱兵之中。在处州，石抹宜孙用刘基、胡深等居于幕府，与文人投壶赋诗，是诗坛东道主，这一期间的唱和之作曾编为《少微倡和集》②。由于他的倡导，处州如同海盐、余姚等地，在较长时期内成为战乱中的诗人聚集之地。

刘基自元统元年中进士，曾任江浙行省儒学副提举。为当道者扼制，一

---

① 《掀篷倡和诗》作于石抹宜孙在处州时，处州在至正十九年为朱元璋占据，石抹宜孙死之。暂将此条系于本年。

② 关于《少微倡和集》的命名，王祎《少微倡和集序》（《金华丛书》本《王忠文集》卷四）说：“诗作于是州，州以星名，故亦因星以名集也。”

度弃官归青田山，隐居著述，作《郁离子》针砭时政。至正中随石抹宜孙守处州，受到礼敬，他与石抹宜孙两人唱和于战乱中的孤岛处州，并将作品结为《唱和集》。在《唱和集序》（《诚意伯集》卷五）中，刘基说："予至正十六年，以承省檄与元帅石末公[①]谋括寇。因为诗往来，凡有所感辄形诸篇，虽不得达诸大廷，以讹君子之心，而亦岂敢以疏远自外而忘君臣之情义也哉。"两人唱和的篇章，石抹宜孙所作一篇也没有流传至今。

元廷起用大儒吴澄的孙子吴当，为江西行省参政，但江西形势已经无可挽回。

吴当是当时的最佳选择，江西是战乱的"重灾区"，除了有出将入相之才的诗人吴当，没人能力挽狂澜于既倒——但这一切为时太晚。

吴当（1297—1361），字伯尚。崇仁（今属江西）人。幼侍其祖吴澄至京师，补国子生，吴澄死后，吴当教其弟子卒业。至正五年荐为国子助教，诏修辽、金、宋诸史，吴当参与修纂，书成，授翰林修撰。至正七年迁国子博士，次年升国子监丞，至正十年升国子司业，至正十一年迁翰林待制，至正十三年擢监察御史，不久又复为国子司业，除翰林直学士。诏授江西肃政廉访使，主持平定起事的征战。形势好转后，却又以"通寇"的指控而被解除兵权。至正十八年朝廷始知其诬，乃拜为江西行省参政，未赴职而陈友谅已陷江西诸郡，吴当便改著道士服，闭门不出。被陈友谅拘留了一段时间，后隐居庐陵吉水，不久就病死了。著有《周礼纂言》及《学言诗稿》。《学言诗稿》六卷，今存。吴当的诗以五律成就最高，如《咏怀旧隐十五首》《述感十五首》，风格质朴悲凉，对国运、家运兴衰作了深刻的反思。在元明易代时明确表示"事业已随兵燹尽，青门惟守邵平瓜"（《浔阳舟中三首》其一[②]），所以《四库全书总目》这样评述他的为人与为文："有元遗老，当其最矫矫乎。其诗风格遒健，忠义之气凛凛如生，亦元季之翘楚。"并认为："当不受僭窃之辟，则高于张宪诸人；乃天下已定，仍不降礼于万乘[③]，尤在杨维桢诸人上，盖生死久付之度外，其不为谢枋得者，特天幸耳。"

为元驻守富庶之区绍兴路的西夏人迈里古思，死于内部冲突。

迈里古思与余阙虽然都名位不显，但他们的生与死对于民心的影响却大

① 在刘基诗文中，一般均称"石抹宜孙"为"石末宜孙"。

② 这首诗的题目与文字，在不同版本的吴当诗集之中有所不同。此从《元诗选》初集（中华书局排印本）第533页。在《学言诗稿》中，题目为《九江杂咏书怀》。

③ 有的文献说，吴当曾入明。故四库馆臣如是说。

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迈里古思是西夏人，汉姓吴，又名为吴善卿[1]。占籍松江。家贫，授徒以养母，至正十四年进士，授绍兴路达鲁花赤，改行台镇抚。以平定处州山区之乱，擢江东宪司经历，仍留绍兴。至正十八年，整军准备出战方国珍，却为行台大夫拜住哥忌而杀之，他的死，对浙东民心影响颇大。生前，他与江浙文人交往密切，宋濂曾为《迈里古思平寇诗》作序，杨维桢为其写墓铭。时人与其唱和之作以及写的挽诗，均颇常见，还有《保越事迹》等文章为其鸣不平，《南村辍耕录》卷十"越民考"节，则是一篇微型的迈里古思评传。这都是民间为其遭遇不平的反弹。

在提到谶语时，《至正直记》（卷三"平江谶语"节）也记载了一则关于迈里古思的事：

> "平江"二字，识者云"淫"字也。是以平江人多淫，男女淫奔，恬不为愧。张九四（张士诚）陷平江，僭改"隆平府"，谶者云：隆平二字，远观似"降卒"，不久当归正。果然。吴善卿[2]守绍兴，集民兵号曰"果毅"，以篆书二字悬于兵卒之背，谶者云，是"果杀"二字，不久当败。果然。

另一则与其有关的记载是：至正十六年，御史纳璘开行台于绍兴，纳璘之子安安竟袭杀了余姚路同知秃坚、县尹陈文昭以及潘纯等人，以巩固自己的势力。杀秃坚这个举措是潘纯出的主意，杀了秃坚，潘纯也为安安缢杀于途。杀潘纯灭口的主意是出于辛敬所，辛敬所怕危及自身，又间关投奔了张士诚，最后死在平江僧舍。拜住哥代替纳璘出守绍兴，又不能容迈里古思，将其"挝杀于其私第"。拜住哥入朝，兄弟诛戮，"家无噍类"[3]。——这就是同一壁垒的冤冤相报。类似的情况颇常见于元人记载，可见元代民间舆论走向一直与政治向背息息相关。

五月二十四日（辛酉）。道童死在江西抚州城为陈友谅部攻陷之际。

这一年间江南各地守臣纷纷战死，如同推倒了骨牌。但正是这一系列的殉难，才得以止住近于崩溃的形势，使元廷在江南多延续了整整十年。

---

[1] 丁鹤年有一个表兄叫吴惟善，《鹤年诗集》附录有其诗数首。此吴惟善，不见于其他记载，但丁鹤年另一个表兄吉雅谟丁（马元德）则有赠迈里古思之诗。两人均汉姓吴、均是西域回回，不能排除就是同一人。如是，吴惟善则字善卿。

[2] 《至正直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第 89 页，将"吴善卿"误为"吴善乡"。

[3] 《南村辍耕录》二十三"造物有报复"节。

道童（？—1358），字石岩。高昌畏吾人。历信州、平江二路总管，至正元年，除大都路达鲁花赤，累迁江浙行省平章，至正十一年移江西平章，至正十八年，形势日蹙，不得不退保抚州。卒，谥忠烈。是双语的西域文学家，诗文书法均有时名，《书史会要》卷七说他："姿仪雄伟，威惠著名。尤工大字，能作双钩书。"

五月。色目人伯颜宗道（颜宗道）全家死于战乱。

伯颜（1295—1358），一名师圣，字宗道。又名颜宗道。西域葛逻禄氏，居开州濮阳（今属河南）。早年从宋代遗民黄坦习经书，以学行闻名乡里，从游者颇众。至正四年以隐士徵至京师，授翰林待制，预修《金史》，书成辞归。再除江西湖东道廉访佥事，不久即辞去。至正中，战乱从河南蔓延到河北，伯颜结乡民自保，在形势窘迫时，渡漳水北上，门生乡里从之者数百家①。途中被劫持，与妻子俱死之，享年六十七岁。作为色目人，他是乡里认可的大儒。他与余阙等不同，不愿为元朝之官，但在元朝面临土崩瓦解之际，则出面保境安民，并不惜以死相殉。

八月一日。为义军朱元璋部俘获的"师山先生"郑玉，拒绝劝降，自缢身亡。

郑玉的死，与李黻、余阙甚至与伯颜宗道都有不同，对元廷他本来没有任何义务尽忠。

郑玉（1298—1358），字子美，号师山。歙县（今属安徽）人。敏悟好学，对经书有独到见解。两应进士举不中，遂弃举子业，专心在家乡执教，学生多得连居室都无法容纳，于是就在当地建师山书院来安置就学者。至正十年，朝廷以翰林待制之职召郑玉入京，郑玉以身体有病为由婉言辞谢。至正十七年，朱元璋的部队进入徽州，要郑玉参与起义，郑玉说："吾岂事二姓者耶！"因此被拘禁。在拘禁中自缢而死。郑玉为文不事雕琢，受到文坛名流揭傒斯、欧阳玄称赏。尽管忠于元室，但也不愿为元朝之官，身处社会动乱的末世尚能独善其身。他曾以诗明志："何时四海收兵甲，还向师山理旧书。"有《师山文集》八卷，后人另补辑遗文五卷。所著《春秋经传阙疑》四十五卷，今存。

---

① 此据元人潘迪《伯颜宗道传》（《述善集》卷三；〔正德〕《大名府志》卷十）。《元史》卷一九〇则说邦人从之者数十万家。

九月。陈友谅攻陷赣州，负有守土之责的全晋（全普庵撒里）战死。

全晋（？—1358），字子仁，原名全普庵撒里。高昌畏吾人。阿鲁浑撒里之孙，因阿鲁浑撒里之父乞台萨理法名释万全，故家族以全为姓氏。初为中书省检校，历仕监察御史，广东肃政廉访使，至正间累迁赣州路达鲁花赤，至正十六年升江西行省参政，分省赣州，为政苛酷。在战乱之中过分执仗武力，民间口碑不佳。死后，谥傲哀。是知名的元曲家，《录鬼簿续编》说全子仁"资性聪敏，风流潇洒，人莫能及也"，并提到"其居官声名赫然"。他与刘婆惜的逸事在文坛流传颇广。

十二月九日（癸酉）。红巾军关先生、破头潘所部攻陷上都。

在上都，关先生等纵部焚烧宫阙，并留驻七日，然后转略辽阳，遂至高丽。从元宪宗六年（1256）忽必烈在滦水之阳龙冈地方兴建开平城起，经历近百年间上都终于毁之一炬。元代的"上京纪行诗"至此不得不彻底封笔。

十二月。西夏人杨崇喜，为不忘家世出处，将有关诗文编成《述善集》三卷，由张以宁作序，作为传家之宝秘藏。

杨崇喜（1300—1372以后），西夏人，原名唐兀崇喜，汉姓杨，字象贤。祖籍武威（今属甘肃），家族入中原定居开州濮阳（今属河南）。早年袭百夫长，为国子生。至正十六年，为助平叛，主动报效军粮500石，草10000束。在家乡创建书院，朝廷赐名"崇义书院"，并名居室为"亦乐堂"。杨崇喜身处末世而固守旧俗，力图使家族聚居地保持安居环境。因战乱频仍，他在大都避难十余年，明初曾出游金陵。他编辑时贤所赠诗文以及与家族出处有关的文献为《述善集》三卷①。这部书一直由其后裔秘藏，历经四五百年，没有为岁月淹没。该书保存了大量元代（主要是元后期）诗文家的作品，其中许多是仅见。〔正统〕《大名府志》卷六、〔嘉靖〕《开州志》卷六，都有杨崇喜的传略。

孙华去世。享年七十九岁。

孙华（1280—1358），字元实，晚号果育老人。永嘉（浙江温州）人，侨居华亭（今属上海）。年十三，郡守课诸生作《春阴》诗，操笔立就，受到称赏。年十七，以《树萱堂》诗知名乡里。诵经考史，尤好岐黄，精于医

① 焦文进、杨富学编校有《元代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

术，用荐为医学教授，有旨待诏尚方，辞免。江浙行省欲署使庸田，亦不就。修洁自好。杨维桢曾以“白首飞熊”期之。以诗书知名乡里。所作诗篇散见《大雅集》《吴兴艺文补》《乾坤清气》《文翰类选大成》等以及书画题跋之中。按：孙华，一些著述作孙华孙。

释祖铭去世。享年七十九岁。

祖铭（1280—1358），字古鼎。奉化（今属浙江）人。俗姓应。二十五岁出家，为天童寺掌书记。后遍拜高僧，到灵隐寺谒见行端，经过点拨，豁然开悟。元统元年自径山出住昌国州隆教寺，历住普陀、中天竺，至正七年还主径山，锡号“慧性文敏宏学普济禅师”。至正十七年，退居妙明庵，至正十八年书偈而逝。所著《四会语录》及文集若干卷，未见传本。《元诗选》二集录其诗11首，题为《古鼎外集》。

偰哲笃去世。

偰哲笃（约1296—1358），字世南。高昌畏吾人。偰玉立之弟，延祐二年进士，历高邮县尹、泗州同知。上太常博士，出为西台御史，天历二年迁南台御史，改广东肃政廉访司佥事，因忤大臣意旨，被劾，弃官寓居溧阳。他在溧阳买田起宅，请名师教育子弟，为寓居当地的色目人首领。后起为吏部尚书，转任工部尚书，至正九年授江浙行省参政，官终江西行省右丞。今存诗文仅数篇，《元诗选》三集附其诗于偰玉立《世玉集》之后。

至正十九年己亥（1359）

正月一日（甲午）。高昌回鹘王后裔伯颜不花的斤，在信州城破之际自尽。

伯颜不花的斤（？—1359），号苍岩。系高昌回鹘王国的王族，“的斤”是高昌王直系后裔的尊称①。伯颜不花是书法家鲜于枢的外孙，以荫授信州路同知，改任建德路同知、达鲁花赤。至正十六年改衢州路达鲁花赤，升浙东都元帅，并曾任江东廉访副使。至正十九年回守信州，城池失陷，自刎死，谥桓敏。诗文作品传世不多，长于书画，现存真迹有《古壑云松图》。他的战死，是元代不再在江南具有战略优势的明证之一。

---

① 《元诗选癸集》戊集下，误称为“的斤苍崖”。

正月。陈友谅围信州，伯颜不花的斤参谋海鲁丁在死守信州时战死。

元末战乱中，曾被时人誉为“三凤”的海鲁丁三兄弟，皆死于国难：其兄穆鲁丁守建康、获独步丁①居福州、海鲁丁自己在信州②，三人均在城破之际死之。海鲁丁兄弟出自西域回回世家，在当时较有影响。

三月三十日（壬戌）。战乱波及越来越广，流离失所的人越来越多，朝廷不得不为科举特设“流寓”人士名额。

这是战乱期间的便宜之计，因为战火已经燃及大江南北，背井离乡（家乡沦陷）或因战乱阻隔不能及时返回乡里应试的人员成为社会问题。然而即便如此，科举仍然是文人最佳的出路。为此，元廷最终议定的名额是，增设“流寓”类，蒙古、色目、汉人，各15名；南人，20名。

夏秋之际。京师大饥，百姓饿死近百万。

实际是海运的不通畅“配合”了饥荒，使大都及附近的百姓成为战乱的牺牲品。据权衡《庚申外史》，大都十一座城门之外，各掘万人坑，填埋尸体。鸱枭百群，夜集乱坟岗，鸣叫到天亮，一连几天不止。名扬世界的“汗八里”——大都——成为“死城”。

九月。朱元璋驻军金华，王冕入其幕，但不久就因病去世。

王冕（？—1359），字元章，号煮石山农。绍兴诸暨（今属浙江）人。少年时即好学不倦，由于家境败落，曾就读僧舍。受知于大儒韩性，以博学多才知名于时，著作郎李孝光想推荐他作府史，他拒绝了。屡应进士举，不中，就叹道:“此童子羞为者，我可溺是哉!”于是就不再应举，遍游名山大川，以古豪杰自居。北游大都，回到绍兴，他携全家隐居于九里山，盖了三间茅屋，自题为“梅花屋”。曾仿照《周礼》著书一卷，秘不示人，说:“吾未即死，持此以献明主，可致太平。”朱元璋在群雄并起的夹缝中得到了喘息的机会，驻军于金华，王冕与许瑗去拜见朱元璋，被任为咨议参军，但没过多久就病死了。王冕以画梅花最工，并首创用胭脂作没骨体。每逢作画，他总要题诗助兴，他的诗不拘常格，接近他的为人。《四库全书总目》说他的诗“无杨维桢等诡俊纤仄之习”“高视阔步，落落独行”。他的《白梅》诗颇负盛名:“和靖门前雪作堆，多年积得满身苔。疏花个个团冰雪，羌笛吹他

---

① 获独步丁，字成之。据元人李世安《伊洛渊源后叙》，至正九年温州路刊刻《伊洛渊源》时，获独步丁是温州路“幕长”，与“郡守萧侯仁甫”“克相其成”。

② 事见《元史》卷一九五、卷一九六。

不下来。”并由此派生出一些有关的轶事，论者历来认为这首诗表明王冕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王冕是元末文坛相当活跃的人物，但他主要得名于绘画。有《竹斋诗集》四卷，今存，还著有《梅谱》。

秋。隐居中的高明为释来复作《天香室铭》，此后不久即去世[①]。

高明《天香室铭》是来复于至正十九年秋请杨彝代约高明作，并编入《澹游集》卷下。

方国珍起义，元省臣招高明为阃幕都事，并授以翰林国史院典籍官[②]。因论事不合，避不治文书；方国珍降，强留幕下，不从；以礼延教子弟，亦不就，即日解官，旅寓明州栎社之沈氏楼，“以词曲自娱”（《留青日札》卷十九“琵琶记”节）。相传杰出的南戏《琵琶记》即撰成于此时。“永嘉高经历明，避乱四明之栎社。惜伯喈被谤，乃作《琵琶记》雪之。”[③] 高明“学博而深，文高而赡”（赵汸《东山存稿》卷二《送高则诚归永嘉序》）。词曲之外，工诗文，擅书法。与当时名士如谢应芳、顾瑛、刘基、赵汸等皆有交往。别集《柔克斋集》二十卷，已佚。冒广生《永嘉诗人祠堂丛刻》有《柔克斋诗辑》。高明最有成就的是制曲，《琵琶记》是代表作。据《南词叙录》，他还有《闵子骞单衣记》戏文，今无存本。散曲今存小令2首，套曲1套（据《全元散曲》）。

十月。元朝徵海运于张士诚，以解大都困境。

据明人吴朴《龙飞纪略》的记事，本年冬十月[④]，“兵部尚书伯颜帖木儿

---

① 此从《文史》第一辑（1962年）湛之《高明的卒年》。关于高明，一个来历颇久的说法是：入明，明太祖慕其名，遣使召，他“佯狂不出”，不久病卒。也就是说他死于明初。但这种看法未得到其他文献支持。所谓“入明”，很可能就是如同王冕一样，在元末曾受到朱元璋的注意。

② 对于高明是否有“国史院典籍官”之职，论者或执否定意见。但《澹游集》卷下的《天香室铭》，署名是“国史院典籍官永嘉高明撰”，并有“附记一则”。这个铭，是在至正十七年来复主定水寺，并请杨彝作《天香室记》之后，由杨彝代请高明作。而杨彝的《天香室记》写于“至正十九年龙集己亥秋七月晦日”。那么高明如果真的死在至正十九年末，这篇《天香室铭》就是他的“绝笔”。这个在至正十九年秋自署“典籍官”的高明，与《琵琶记》作者为同一人当无疑义，因为在《澹游集》中还有释来复为高明写的小传，全文是：“字则诚，号菜根居士。永嘉人。至正乙酉张士坚榜登进士第，仕至翰林国史院典籍官、福建行省都事。有文集行世。”

③ 徐渭《南词叙录》。

④ 《元史·顺帝本纪》系此事于九月。九月当是下诏的时间。

以御酒龙衣赐张士诚，徵海运粮"，张士诚"乃运粟一十一万石至京师"。对此，吴朴评论说："胡元盛时，岁运东南米五百万石至京师，之直沽。……今因盗贼之梗，假于士诚，其所得只如此。"

当元朝赐的御酒龙衣到达吴中时，民间反映复杂，杨维桢有一首"竹枝体"的小诗《席上作》，在元末战乱期间流行颇广：

江南烽烟处处起，海上年年御酒来。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怀抱几时开。

诗咏时事，明快流畅，针砭中穴，正是杨维桢"竹枝体"风格。通过这首诗，反映出杨维桢对元朝、对张士诚均存腹诽。笔记、诗话与地方文献都记载过这首诗的本事。《元诗纪事》卷十六引《遵闻录》说："张士诚以厚币招杨廉夫甚急，勉至姑苏。适元以龙衣御酒赐士诚，廉夫因饮御酒，遂作诗云云。士诚闻之默然，遂不强留。"

十一月。处州失守，石抹宜孙战死，林彬祖退往福建。

林彬祖，字彦文。处州（浙江丽水）人。至正五年张士坚榜登进士第，至正十四年为永嘉县丞，至正十九年迁青田县令，元将石抹宜孙守处州，以其为参谋，屯兵葛渡。葛渡兵溃，处州失守，林彬祖又任元行枢密院都事，改福建行省检校。死于战乱时期。

张士诚占据吴中期间，始终受到时论讥讽。张择所作以《讥时》为名的小令，成了元代散曲名篇。

张择，字鸣善（或作明善），别号顽老子。祖籍平阳，寓居扬州（今属江苏）。后为江浙提学，久居吴中。杨维桢、苏大年皆服其才。有《英华集》以及杂剧《十八公子大闹草园阁》《包待制判断烟花鬼》《党金莲夜月瑶琴怨》，今均不传。散曲今存小令13首，套曲2套（据《全元散曲》）。

据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七十六），张士诚据苏州，他弟弟张士德攘夺民地，以为自己的园林，在园林中侈肆筵乐。而每次宴集，只要没有张择，席间就没有乐趣。一次正在盛大的酒宴中，有艺妓作陪，突然风雪大作。张士德要张择作咏雪之曲，张择提笔写道："漫天坠，扑地飞，白占许多田地。冻杀万民都是你，难道是国家祥瑞?""士德大愧，卒亦莫敢谁何"。张择的另一首散曲〔水仙子〕《讥时》则流传得更广，内容也更愤世嫉俗：

铺眉苫眼早三公，捋袖揎拳享万钟，胡言乱语成时用。大纲来都是烘。说英雄谁是英雄？五眼鸡岐山鸣凤，两头蛇南阳卧龙，三脚猫渭水非雄。

这首小令相当出名，在《南村辍耕录》《尧山堂外纪》《艺苑卮言》等书中都作过引证。特点是倾向性鲜明，但就讥刺对象而言，则没有具体指向。

高启在一次会集时听到京师教坊名妓顺时秀的亲传弟子演唱，写了一首七言古诗，怀念元文宗时杂剧盛行于朝野的盛况。

高启《听教坊旧妓郭芳卿弟子陈氏歌》（《高青丘集》卷八）诗云："文皇在御昇平日，上苑宸游驾频出。仗中乐部五千人，能唱新声谁第一？燕国佳人号顺时，姿容歌舞总能奇。中官奉旨时宣唤，立马门前催画眉。建章宫里长生殿，芍药初开敕张宴。龙笙罢奏凤弦停，共听娇喉一莺啭。遏云妙响发朱唇，不让开元许永新。绣陛花惊飘艳雪，文梁风动委芳尘。翰林才子山东李，每进新词蒙上喜。当筵按罢谢天恩，捧赐缠头蜀都绮。晚出银台酒未消，侯家主第强相邀。宝钗珠袖尊前赏，占断春风夜复朝。回头乐事浮云改，瘗玉埋香今几载。世间遗谱竟谁传，弟子犹怜一人在。曾记霓裳学得成，朝元队里艺初呈。九天声落千人听，丹凤楼前月正明。狭斜贵客回车马，不信芳名在师下。风尘一旦禁城荒，谁是花前听歌者。从此飘零出教坊，远辞京国客殊方。闭门春尽无人问，白发青裙不理妆。相逢为把双蛾蹙，水调凉州歌续续。江南年少未曾闻，元是当时供奉曲。朝使今年海上归，繁华休说乱来非。梨园散尽宫槐落，天子愁多内宴稀。始知欢乐生忧患，恨杀韩休老无谏。伤心不见昔人歌，汾水秋风有飞雁。此日西园把一卮，感时怀旧尽成悲。含情欲为秋娘赋，愧我才非杜牧之。"诗题有注："时至正己亥岁作。"这一年高启年仅二十四岁，自谓"江南年少"，而元文宗在位时，高启尚未出生。元文宗的时代成了与当前乱世作为对比的话题。陈氏来到江南追寻繁华，然而战乱已将繁华扫荡为废墟。海运勾连着大都与江南，但大都也已"梨园散尽"。强作欢颜的会集并未因陈氏的清唱增添情趣，反而引动人们对往日繁华盛况的怀念。

程文去世。享年七十一岁。

程文（1289—1359），字以文，号黟南生。婺源（今属江西）人。壮年客居京师，居穷守约。预修《经世大典》，并在翰林院、国子监任职。元统二年，任休宁县黄竹岭巡检，调怀孟路儒学教授，历南台御史，升任礼部员

外郎，奉使江南。因战乱四起，道路梗阻，无法还朝，便寓居绍兴、杭州，死于钱塘西山僧舍。程文在京师时受到虞集称赏，两人过从较密切。著有《程礼部集》，原本亡佚，诗文数百篇保存在《诗渊》等总集之中。

吕良佐去世。享年六十五岁。

吕良佐（1295—1359），字辅之，号璜溪处士。华亭（今属上海）人。不乐仕进，至正中在家乡开“应奎文会”，以诗较艺，用金帛为彩头，邀请四方能诗者来参加诗会，因为届时聘请了杨维桢作主持人，由他亲自评定参赛诗篇的等次，轰动一时，四方士子蜂拥而至，使三吴舆论为之耸动[1]。杨维桢本人也为吕良佐撰写了墓志铭[2]。

王士点去世。

王士点（？—1359），字继志。东平（今属山东）人。王构之子，王士熙之弟。至顺元年为通事舍人，历翰林修撰。至正二年迁秘书监管勾，出为淮西廉访司佥事、四川行省郎中，升四川廉访副使，与入川刘福通部将李喜喜战，被擒，绝食死。有诗文名，长于书法，所撰《禁扁》五卷、《秘书监志》十一卷，今均存。

至正二十年庚子（1360）

三月三日（上巳）。已经成了元朝“飞地”的余姚，由刘仁本主持举行了纪念王羲之会集兰亭的修禊活动，名为“续兰亭会”。

在战乱频仍的两浙，这次“续兰亭会”是一次人数众多的诗坛盛会。参加者有东南各地避居余姚的诗文家42人。在此之前，石抹宜孙在处州时曾主持“掀篷唱和”，但规模比“续兰亭会”小。

刘仁本（约1308—1367），字德玄，号羽庭。天台（今属浙江）人。以乙科进士（乡贡进士），历温州路总管，至正十九年任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元末江南鼎沸，刘仁本在浙东与名流迺贤、谢理、盛熙明、朱右等人过从较密切，影响较大，并使浙东在战乱年代保持了大致正常的生活秩序，同时有

① 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六。据《东维子集》卷十七《归隐记》，杨维桢在至正九年春为吕氏“塾宾”，主持“应魁文会”应在此后。

② 《东维子集》卷二十四。

较活跃的诗坛。至正二十年春天，刘仁本治师会稽余姚，余姚与山阴相邻，为纪念王羲之等前贤的兰亭会集，特意在当地龙泉建造“雩咏亭”，并于三月三日在台州州治附近的秘图湖举行了曲水流觞之会，修禊赋诗，参加者有“文武士”朱右、谢理、王霖等42人，其中31人当场赋诗，11人未能成篇。这42人大部分是从瓯越等地避难来此的各地知名诗人。在刘仁本主持下，取《兰亭会图》为例，凡原来参与兰亭会者没有写出诗的，一律为之补齐，并亲自写序。这次“同题集咏”是元末战乱中影响颇大的诗人聚会。为了接续前贤，连参加者的人数都与当年王羲之的兰亭会一致。写的诗曾刊刻在当地，并由刘仁本作诗序，但只有12人的诗篇流传下来（每人四言诗、五言诗各一首）[①]。

三月七日。本年录取两榜状元买住、魏元礼。

本届录取进士共35人，是元代科举进士人数最少的一届。《元史·顺帝本纪》:“乙卯，会试举人。知贡举平章政事八都麻失里、同知贡举翰林学士承旨李好文、礼部尚书许从宗、考试官国子祭酒张翥、同考官太常博士傅亨等奏:‘旧例：各处乡试举人，三年一次，取三百名，会试取一百名。今岁乡试所取比前数少，止有八十八名。会试三分内取一分，合取三十名。如于三十名外，添取五名为宜。’从之。”科举还在正常进行，可战乱的影响随处可见。

三月十五日（壬寅）。孔齐为《至正直记》的“杂记直笔”部分作跋。《至正直记》成书在此后。

孔齐，一名孔克齐，字肃夫，号行素、静斋，别号阙里外史。祖籍曲阜（今属山东），其父孔文昇曾任建康书吏，家于溧阳（今属江苏）。孔齐以荐授黄冈书院山长，召为国史编修。至正间，避居四明（浙江宁波）之东湖，记所见所闻，成《至正直记》（全名《静斋至正直记》）四卷，是元人重要的笔记，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影响广泛，涉及文化、文学的篇幅历来受到重视。而四库馆臣因孔齐在书中“播家丑”，对其颇有微词，但这正是它真实可信的例证。《杂记直笔》是《至正直记》的一部分，孔齐为其作跋说道:“杂记者，记其事也。凡所见闻，可以感发人心者；或里巷方言，可为后世之戒者；一事一物，可为传闻多识之助者，随所记而笔之，以备观省，未暇定为次第

① 诗序，见陶宗仪《游志续编》卷下；诗及诗序又见清阮元《两浙金石志补遗》。在《元诗纪事》《静志居诗话》《列朝诗集小传》等书中，均有关于这次修禊觞咏之会的记述与评论。元明之际人朱右写有《上巳燕集补兰亭诗序》（《白云稿》卷五）。

也。至正庚子春三月壬寅记，时寓鄞之东湖上水居袁氏祠之旁。”通过这段文字，可以大略了解《至正直记》的写作情况。

三月。杨瑀《山居新话》成书。

《山居新话》四卷的主要内容，是自己数十年间的见闻，与抄撮旧籍而成编的笔记截然不同。这四卷文字，关于元末至正年间的记载最有价值。本年三月，杨瑀为《山居新话》写了“后序”介绍了写作情况，说:“国家承平日久，制度文物礼乐之盛，无不著在大典，布之成书。其底治于我朝，实比隆于三代。予归老山中，习阅旧卷，或友朋清谈，举凡事有古今相符者，上至天音之密勿，次及名臣之事迹，与夫师友之言行，阴阳之变异，凡有益于世道，资于谈柄者，不论目之所击，耳之所闻，悉皆引据而书之。积岁月而成帙，名之曰《山居新话》。其不敢饰于文者，将欲使后之览者，便于通晓，抑且为他日有补于信史之一助云耳。爰是而为序。至正三月庚子既望中，奉大夫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杨瑀识。”本年四月十六日，杨维桢也应邀为《山居新话》作序。

四月。玉山草堂历经战乱之后，顾瑛在春晖楼举办了例行的会集。

这是较晚的一次玉山草堂会集，当时江南已经处在战乱之中长达十年之久。岳榆《春晖楼赏芍药宴集序》（《玉山名胜集》卷七）说:“至正庚子孟夏，黄鹤山人岳榆，与相台翟君文中，自吴城挈舟至海虞，复过昆山，访顾君仲瑛草堂。值春晖楼前芍药盛开，仲瑛重置酒楼上。是日雷雨新霁，风日淡荡，赵善长折金带围一朵，插瓶中，及以红白花擎绕攒簇，朱伯盛督行酒。同集者七人，天基道士□方外暨伯盛、善长先醉。仲瑛谓人事惟艰，天时自适，友朋盍簪，宁无一语以纪其行乐乎！遂以‘红药当阶翻’一句，分韵赋诗。而文中、仲瑛、子英、并榆得药字。诗成，为序其首。实四月十一日也。”

能如此无视世事沧桑，也只有这几个诗人了。

四月十六日（既望）。《青楼集》成书，夏庭芝作《青楼集志》。

《青楼集》是专门记载元代女艺人事迹的笔记。全书从“梁园秀”开始，到“李定奴”止，涉及杂剧艺人珠帘秀等、南戏艺人龙楼景等、诸宫调艺人赵真真等一百多人的生平与艺技。以“青楼”相称，是时尚使然。

夏庭芝，字伯和，号雪蓑钓隐。松江华亭（今属上海）人。吴中故家子弟，一生黄金买笑，有藏书之癖，文章工致，长于乐府隐语。杨维桢曾是他

家的塾师。至正十五年[1]写出初稿，历时多年著力撰写了为女艺人立传的《青楼集》。如同《录鬼簿》等书一样，《青楼集》也曾数次编定，传世有不同版本，内容不完全一致。可见资料收集与编定的不易。除至正十五年，本年四月编订的本子是通常所见的版本。此后在至正二十六年（与《青楼集》有关的最晚一个纪年）五月，同郡人夏邦彦为《青楼集》写的跋，引前人之语，表达了对元代（元曲）全盛时期的缅怀："观全盛时风尘中人物尚如此，呜呼盛哉！"这也是夏庭芝在战乱频仍的条件下写《青楼集》的初衷。

五月。张士诚海运的首批十一万石粮食抵达直沽。大都的粮荒得到缓解。

据《元史·顺帝本纪》：至正十七年八月，张士诚降元。至正十九年九月，元廷赐张士诚龙衣御酒。至正二十年五月，张士诚海运十一万石粮食接济京师。至正二十一年三月，张士诚海运十一万石粮食接济京师。至正二十二年五月，张士诚海运十三万石粮食接济京师。至正二十三年五月，张士诚海运十三万石粮食接济京师。此后，中断了与元廷的交往。在至正二十年以后的几年间，张士诚的海运是大都得以维持的生命线。

张翥是与元朝共终始的诗人。他出生时，文天祥死去仅三四年。他又几乎成了元明交接"仪式"的"观礼人"。他对张士诚始终相当反感，在《寄成居竹》诗中明言"张寇已受诏，而阴袭扬州"，愤慨之情溢于言表。可是以他的身份，当然知道元廷不得不接受张士诚的主要原因，就是需要以海运接济大都。张翥写给在江南的郑韶的一组七言绝句[2]，第一首就说：

> 一日粮船到直沽，吴罂越布满街衢。新诗将作如干首，为问郑郎有买无。

郑韶是张翥在至正初年于玉山草堂结识的诗友。诗写张士诚（张寇）的粮食通过海运到达直沽海港的盛况。

八月。经历兵燹的诗人们集会在嘉兴南湖，举行了在当时条件下最隆重的会集，并将会集延续到下一年（二十一年辛丑）。

---

① 《说集》本《青楼集》的夏庭芝自志署"至正己未春三月望日录此，异日荣观，以发一笑云"。至正无"己未"，一般认为是"乙未"之误。乙未，即至正十五年。

② 这组诗题为《读瀛海喜其绝句清远因口号数诗示九成皆实意也》，见《蜕庵集》（《四库全书》本）卷五。

嘉兴诗人这两次会集，所作结为《至正庚辛唱和诗》[1]。这是与余姚“续兰亭会”遥相呼应的活动。所谓《至正庚辛唱和诗》，是指“庚子兵后作”与“辛丑避暑作”两次（跨年度）的诗篇。至正十九年，嘉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元朝的嘉兴路同知缪思恭在杉青闸击退前来略地的张士信、张士德，当时，张士诚的两个弟弟顺流而下，樯橹蔽天；缪思恭在杉青闸两岸堆积了大量的芦苇，一旦南风大作，就纵火焚烧植被，大火凭借风势，使张士诚纠集的船队无处躲藏。火势绵延四十里，玉石俱焚，在所难免。此战虽胜，但受到战火波及，郡人信心大减。据郁尊《至正庚辛唱和诗序》，“至正己亥兵后，明年庚子八月之望同守缪公（思恭）招同彦小集南湖，以杜甫‘不可久留豺虎地，南方犹有未招魂’为韵，人可一字，即席而成。亦足以纪一时之变，且辛丑此会为不易得云尔。”——缪思恭将这种集会作为稳定人心的举措。

本年（至正二十年庚子）会集的参加者有：缪思恭、高巽志、徐一夔、姚桐寿、释克新、江汉、陈世昌、鲍恂、乐善、金絅、潘泽民、殷从先、朱德辉、郁尊。每人写诗一首。

缪思恭（1321—1364）[2]，字德谦，号菊坡。吴县（江苏苏州）人。至正十三年辟充令史，至正十九年任嘉兴路同知，至正二十一年调杭州路同知，至正二十二年升淮阳路总管，两年后以病卒于乡。身处战乱，力图保境安民，所历均有政绩。曾说服张士诚向大都海运粮储，对元廷竭尽忠诚。与刘仁本、石抹宜孙等，都试图通过举行诗人会集稳定一方形势，争取民心。

拂林籍诗人金元素（哈剌元素）的诗集《南游寓兴》结集。

金元素，原名哈剌，字元素。晚号葵阳老人。西域拂林（即茀林）人，也里可温氏。天历三年（即至顺元年）进士，元文宗赐姓金，又称金元素、金哈剌。至顺间任钟离县达鲁花赤，至正四年改刑部主事，累官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佥事、淮东廉访副使；至正间曾任监察御史，出为福建海道防御，升江浙行省参政、左丞，与刘仁本等为保持元朝对东南的领有，殚精竭虑。入为工部郎中，历中政院使、参知政事，拜枢密院使，至正二十八年，追随元顺帝放弃大都北遁。在北元，是元老重臣，对朝政颇有影响。最后不知所终。诗及散曲均有时名，其子金文石、金武石，也是元曲家。有《玩易斋集》《南游寓兴》行于世。《玩易斋集》从未见著录，诗集《南游寓兴》（不

---

① 见《槜李诗系》卷六。槜李，就是嘉兴的古称。

② 关于缪思恭生卒年，据卓说（字习之）撰《淮扬路总管缪思恭墓志铭》，这个墓志铭仅在〔道光〕《东台县志》卷三十四“冢墓”有节略。

分卷）亦长期隐而不显，仅日本内阁文库保存有一部江户时期钞本，存诗364首。《永乐大典》残帙亦有金元素《南游寓兴》佚诗20首①，此外还有少数集外佚诗。《南游寓兴》是名副其实的元佚诗诗集，不但清初顾嗣立编《元诗选》时未见，清乾隆时在全国范围内徵求古籍，也从无其书。据明人杨士奇《文渊阁书目》“余（按：余是金字的笔误）元素《南游寓兴》一部，阙”的记载，说明在明英宗时清点内阁藏书，编《永乐大典》时使用过的《南游寓兴》已散佚不存。

金元素是元代有诗集传世的西域诗文家、元曲家。除金元素，目前仅知的元代（也是整部中国文学史）拂林籍诗人还有达德越士。但达德越士影响没有金元素大，存诗仅数首。

受战乱影响，鲁贞不得不从家乡迁往人迹罕至的深山。

鲁贞，字起元，号桐山老农。开化（今属浙江）人。元统三年中乡试，会试取消，即隐居不出。余阙曾拟举荐，但为其婉言辞谢。元末兵乱四起，他一直在家乡居住，至正二十年，迁居于梧板的平安坞，因四面皆山，便名居室“万青轩”，并写《万青轩记》（《桐山老农集》卷一）。他借《迁梧板四首》（《桐山老农集》卷四）表述了处世态度，第四首说：“旧友程刘许，时还到我家。论文嫌晷短，惜日畏年加。相见浑无厌，劳生未有涯。吾衰方著述，安得笔生花。”入明，以遗民自居，诗文中只以干支纪年，不提新朝年号。别集《桐山老农集》四卷，今有传本。还有《春秋案断》《古今文典》等著述，均未见传。

周闻孙去世。享年五十四岁。

周闻孙（1307—1360），字以立。庐陵（江西吉安）人。早年以孝行闻名乡里，至正元年以经义中乡试，至正二年会试落第，荐入史馆，参修辽、金、宋三朝史，在正统归属等问题上所论不合时宜，才数月，弃职归。出任鳌溪书院山长，学者称“鳌溪先生”，揭傒斯又荐任贞文书院山长。元末战乱期间，保境安民，受一方信赖。至正十六年，行省以便宜除白鹭洲书院山长，不久又任命为袁州儒学教授，未及赴任，袁州失陷，家亦毁于兵乱。受到元江西行省参政全普庵撒里（全子仁）器重，但建言亦不为其所用。避地新淦之石洞。有《鳌溪集》二十卷，原本不传。今存《鳌溪集》三卷（文一卷，诗二卷），是明人辑刊。另著《尚书一览》《河图洛书序说》等。

① 这些诗，《永乐大典索引》分属金元素与哈剌元素。

辛敬去世。

辛敬（？—1360），字好礼。汴梁（河南开封）人。至正间曾任检校，改进贤县尉，在任七年，郡守荐擢县尹。升龙兴路判官，兼水军千户。至正十九年调官汀州，次年卒于任。工诗，其诗散见于《光岳英华》《元艺圃集》《文翰类选大成》等总集，清人钱熙彦《元诗选补遗》编录其诗24首。

至正二十一年辛丑（1361）

身在大都的张翥写出元诗名篇《寄浙省参政周玉坡》[1]，并以组诗《七忆》倾吐对饱经战乱的江南的关注之情。

这一年，张翥已经七十五岁。《寄浙省参政周玉坡》是诗人对现实的反馈，与其大致同时写的组诗《七忆》，则可以看成诗人在提前清理一生。至正二十年以后，张翥的诗是"围城"时期诗人们情绪波动的记录。

张翥《寄浙省参政周玉坡》历来受到元诗选家的重视：

> 天子临轩授钺频，东南无地不红巾。铁衣远道三军老，白骨中原万鬼新。义士精灵虹贯日，仙家谈笑海扬尘。都将两眼凄凉泪，哭尽平生几故人。

"周玉坡"，即周伯琦。周伯琦至正十七年至十九年任江浙行省参政，张翥仍以"浙省参政"相称，说明已得不到友人确切消息。《南村辍耕录》（卷十四"张翰林诗"节）录出这首诗，并说："夫翰苑词臣，而寓言如此。则感时之意，从可知矣。"张翥《前出军五首》《后出军五首》《中秋望月》等，都直接写元朝守臣在江南的拼死搏杀，而《寄浙省参政周玉坡》等于为友人——甚至是为自己和元朝国运——预定的"安魂曲"。

张翥代表作《七忆》作于此前后。《七忆》由《忆钱塘》《忆姑苏》《忆会稽》《忆维扬》《忆金陵》《忆吴兴》《忆闽中》组成[2]。

---

[1] 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四"张翰林诗"节。《元诗选》初集《蜕庵集》所录，诗题作《授钺》，文字亦有小异，《大雅集》卷六题为《寄周伯温》。

[2] 组诗《七忆》，没收入四卷本《蜕庵诗集》，见《元诗选》初集《蜕庵集》与五卷本《蜕庵集》（卷三）。因《元诗选》较常见，这里是据《元诗选》录出。

平湖十里碧漪风，歌舫渔舟远近同。天竺雨余山扑翠，海门潮上日蒸红。伤心花月随年换，回首闾阎委地空。白发故人零落尽，浮生怅望梦魂中。（《忆钱塘》）

让王城外暮云黄，忍使行人哭战场。台上麋游香径冷，陵头虎去剑池荒。竹枝夜月歌仍怨，莼菜秋风兴漫长。不是不归归未得，五湖烟水正茫茫。（《忆姑苏》）

千层秋色彻层霄，忆昔来乘使者轺。翠袖屡扶蓬阁醉，篮舆时赴宝林招。山阴客已无春会，溪上风犹送暮樵。此恨古今消不尽，西陵寂寞又回潮。（《忆会稽》）

蜀冈东畔竹西楼，十五年前烂漫游。岂意繁华今劫火，空怀歌吹古扬州。亲朋未报何人在，战伐宁知几日休。惟有满襟狼藉泪，何时归洒大江流。（《忆维扬》）

昔年曾上凤凰台，二水三山眼界开。六代繁华春草歇，千年兴废暮潮哀。灯窗禅坐时联句，山馆仙游几引杯。最是令人愁绝处，夕阳双燕自归来。（《忆金陵》）

忆泛苕华溪上船，故人为我重留连。半山塔寺藏云树，绕郭楼台住水天。白榜载歌明月里，青帘沽酒画桥边。计筹山下先茔在，欲往浇松定几年。（《忆吴兴》）

漫漫际海涨天涯，万里曾乘使者槎。梓泽重寻仙客洞，草堂频醉故侯家。人多熟酒烧藤叶，市有生蛮卖象牙。安得梦中真化蝶，翩然飞上刺桐花。（《忆闽中》）

写这组诗时，南北不但有天堑阻断，更由战乱割裂。他深情相忆的地方，大多仅是元廷的政治飞地了。

张翥一生最后二十多年主要生活在大都，开始为职务拘牵，马上身不由已了，在一篇诗题中他为“予京居廿稔，始置屋灵椿坊；衰老畏寒，始制青鼠袍。且久乏马，始作一车出入”。而就在这期间，天下鼎沸，江山无复旧观，诗人再也无家可还。他晚年在大都的诗无论质量还是数量超过以前，可也一直处在饮酒过量的状态①。“精神全藉酒，筋力半支藤”（《蜕庵岁晏百忧熏心排遣以诗乃作五首》其二）②；“饭粿任嘲诗骨瘦，糟丘能遣客怀宽”（《答马易之编修病中作》）等等都是自白。即便如此，他仍然以《元夜独

① 成廷珪《居竹轩诗集》卷三《张仲举书来言其老健能夜书小字仍饮量不减》。

② 据《元诗选》初集《蜕庵集》。这组诗第一首开篇说“开岁七十五”，所以诗也写于至正二十一年。

坐》《世事》等诗篇，表达诗人的通脱与透彻："过去豪华春似梦，老来心赏冷于冰。苏耽仙后还为鹤，房管生前本是僧。""世事纷纷在目前，故园无复可归年。吴东城陷仍为沼，沧海尘生欲变田。"围城期间滞留大都的张翥和密友廼贤、陈肃、李升、危素父子、大梓等人成了精神人质。《蜕庵岁晏百忧熏心排遣以诗乃作五首》是辞岁之作，其五写道："久悟无生说，从容与化迁。机忘桴俯仰，道悟密中边。宇县犹多垒，干戈已十年。吾惟待其定，归种故山田。"其实张翥并非不知道，此生是不会再有还归故园、终老家山的结局了。

七月十三日。居住在嘉兴的诗人们继去年兵后会集的余兴，再次于南湖会集。

去年南湖会集，对嘉兴的民心趋于平稳起了作用。本年（至正二十一年辛丑），会集仍然举行，但主持者由缪思恭改为儒学训导曹睿。诗序（《槜李诗系》卷六）说："至正辛丑秋七月十有三日，永嘉曹睿以休假出西郭，憩景德寺，诸公携酒相慰藉，环坐，以唐人'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之句分韵赋诗。云海师裒集成什，以纪一时之良会云。"参加、并各写诗一首的计有：吕安坦、鲍恂、牛谅、释智宽、常真、丘民、张翼、王纶、来志道、闻人麟、曹睿、徐一夔、尤存、周棐。作品与去年所作一并结为《至正庚辛唱和诗》，由周伯琦作序。

曹睿，字新民。永嘉（浙江温州）人，徙居华亭（今属上海）。参与杨维桢倡导的集咏《西湖竹枝词》，并是顾瑛玉山草堂座上客。明初，曾出任松江儒学教授。

赖良以个人之力编选的江浙诗人总集《大雅集》八卷成书，并呈请杨维桢审阅。

赖良，字善卿。天台（今属浙江）人。他积三十年之劳选编成诗总集，"不惮驾风涛，犯雨雪，冒炎暑，以采江南北诗人之诗（钱鼒《大雅集序》）。"为此，倪瓒专门写有《送赖善卿采诗》（《清閟阁全集》卷六）。杨维桢题为《大雅集》，为之作序，并就所选之诗作了评点。《大雅集》以李孝光为开卷第一人，赖良的编选宗旨是力图以此书"传隐而未白"的江浙诗人及其诗篇在元末社会动乱中保存一脉斯文。而赖良本人长期在云间（江苏松江）占耕，对三吴诗人特别留意。书成，友人卢仲庄亲自手写刻板，由于受到战事波及，未能如期问世。乱后，赖良在云间士人支持下，终于使其得以流传。《大雅集》所选诗人，多数是乡贤一类人物，名不振、位不显，在江

山易代之际却以其诗干预社会生活，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十月。在大都的江西籍文人曾坚、危素分别为《四明洞天丹山图咏集》作序。

余姚州南百里，有四明山，山中的名胜“丹山赤水洞天”是道教圣地，据说汉代的上虞令刘纲，曾在此修炼飞升，当地建有道观，名为“祠宇观”，傍屋名为“石田山房”，由毛永贞住持。道士薛毅夫到此，乐其幽胜，首为赋诗。至正二十一年他来到京师，请当朝的士大夫与寓居京师的文人为《丹山图》题咏，并结为《四明洞天丹山图咏集》，曾坚应邀为这些包括唐人、宋人特别是元人的诗文作了序。在序文中，曾坚说：“兵兴十年，自夫维扬河南蕃富甲天下者，划削蹂践无余，昔之东阡西陌者，荒烟野草矣；凉台燠室者，颓垣败础矣。欲求仿佛石田山房者也，可得乎?”在《四明洞天丹山图咏集》中元人诗文很容易辨认，它们大都寄托着沧桑之感。

蒋堂以荐授嘉定州学教授。

蒋堂，字子中。吴郡（江苏苏州）人。从学于永嘉林宽，泰定三年江浙行省乡试第三名，虞集作《赠蒋子中》（《道园遗稿》卷七）相勉。广东廉访司辟为书吏，辞而不就，居家讲学，嘉定州学教授秩满，以疾终。有诗文藏于家。与徐达左交往密切，是耕渔轩座上客。

十一月二十一日（戊辰）。黄河清七日，为此，朱右上《河清颂》。

在《河清颂》（《白云稿》卷二）序中，朱右说：黄河上一次河清，距今有一百四十六年，本次“黄河清七日，自平陆三门碛下至孟津，凡五百余里”。但这个“祥瑞”已经不能使元廷借以振作士气。朱右专门入朝献颂，却不遇而归。

杨瑀去世。享年七十七岁。

杨瑀（1285—1361），字元诚，号山居。钱塘（浙江杭州）人。天历年间署广成局副使，升中瑞司典簿。后至元六年擢太史院判官，进同佥，未几辞归。至正十五年起为行宣政院判官，改建德路总管，至正十七年以浙东宣慰使致仕。与傅若金、陈旅、柳贯、钱惟善、张翥等交游唱和，颇知名。著随笔《山居新话》一卷，是元人笔记中较有影响的一种。《元诗选癸集》庚集上录存其诗9首。

林泉生去世。享年六十三岁。

林泉生（1299—1361），字清源。永福（福建永泰）人。与卢琦、陈旅、林以顺都以文学为闽中名士。林泉生精研《春秋》，至顺元年登进士第，授福清州同知，转泉州经历，再迁永嘉县尹，调漳州推官，擢为福清州知州。后任翰林待制，以年老为由辞而未就。迁行省郎中，曾知漳州。召入朝，拜翰林直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不久去世于任，谥文敏。林泉生以学问才略自负，不能下人，后来稍为自抑，号谦牧斋，晚年更折节读书，更号“觉是轩”。有文集《觉是集》二十卷，未见传本。《元诗选》三集录林泉生诗19首，题为《觉是集》。他的文章宏健雅肆，诗则以豪宕遒逸见称。现存诗篇主要是五、七言古诗。还著有《春秋论断》《诗义矜式》等，均未见。

至正二十二年壬寅（1362）

夏。松江府一处勾栏坍塌，压死了42人，惟独歌女天生秀全家安然无恙[1]。

《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四“勾阑压”节）云:“至元壬寅夏，松江府前勾栏邻居顾百一者，一夕，梦摄入城隍庙中，同时被摄入者约四十余人，一皆责状画字。时有沈氏子，以搏银为业，亦梦与顾同，郁郁不乐，家人无以纾之，劝入勾栏观排戏，独顾以宵梦匪贞，不敢出门。有女官奴，习讴唱，每闻勾栏鼓鸣，则入。是日，入未几，棚屋拉然有声，众惊散，既而无恙，复集焉。不移时，棚踣压。顾走入抱其女，不谓女已出矣，遂毙于颠木之下。死者凡四十二人，内有一僧人、二道士。独歌儿天生秀全家不损一人。其死者皆碎首折胁，断肠溃髓，亦有被压而幸免者，见衣朱紫人指示其出，不得出者亦曲为遮护云。”

天生秀的母亲天锡秀，是元中期著名的艺妓，以演出“绿林杂剧”著称。勾栏一次事故就死42人，显然当时勾栏正在演出，而且观者云集。《青楼集》云:“天锡秀，姓王氏。侯总管之妻也。善绿林杂剧，足甚小，而步武甚壮。女，天生秀，稍不逮焉。后有工于是者赐恩深，谓之‘邦老赵家’。”可见当时杂剧名角的演出普遍受到欢迎，而绿林剧成为一个门类。

---

[1] 《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四“勾栏压”节。《南村辍耕录》原文是“至元壬寅夏”，但至元无壬寅，而且天生秀是天锡秀的女儿，也不应活动在至元年间。故暂系于至正二十二年壬寅。

八月二日。王行为徐达左编录成集的《金兰集》作序。

徐达左"耕渔轩"是吴中另一处文人聚会之所。为此，徐氏将友朋投赠之作结为《金兰集》（又名《耕渔轩诗》）四卷，并由王行、释道衍等作序。与顾瑛玉山草堂相比，徐氏耕渔轩的兴起要晚一二十年，基本属于至正战乱的产物，与会者大多是更年轻的一代。"北郭十友"基本在其中。但《金兰集》显然受到《草堂雅集》的影响，只是无论徐达左，还是耕渔轩；无论是东道主的支持力，还是与会者的执著热情，都不能与后者比肩。在吴中，顾瑛无人可以替代。

徐达左（1333—1395），字良夫，号耕渔。吴县（江苏苏州）人。早年从邵弘道学《易》，从董仲仁学《书》。元末战乱，隐居光福山中，以其所居名为"耕渔轩"，往来名士多为题咏。其家富庶甲一方，他本人又特别好客，四方名士往往延至家塾。洪武二十二年，聘为建宁儒学训导，卒于任。所著有《孟子内外篇》二卷、《四子书》十卷、诗文集六卷。

色目人买闾中江浙乡试。

买闾，字兼善。西域色目人，占籍会稽，家于上虞（今属浙江）。王逢《梧溪集》卷四下《赠买闾教授》、卷五《怀哲操》这两篇诗的小序是关于买闾生平的主要资料。《赠买闾教授》诗序说："买闾，字兼善。西域人。元初，祖哈只仕江南，遂家上虞，父亦不剌金力资兼善学。以《礼经》领至正壬寅乡贡，浙省臣因北向途梗，权擢和靖书院山长。既航海赴会试而后期，不果。礼部尚书李公尚絅特言之朝，敕授嘉兴儒学教授，及还，会政属淮阃，屏居幽遐且十余年，曲奉二亲甚至。今春访余最闲园，风雨花落，离索满目。观其志尚孤卓，殆忘世之荐变，而身之益穷也。"哈只、亦不剌金，都是典型的回回名字，买闾是色目人之中的回回。与王逢、释祖铭（古鼎上人）、叶以清（字子澄，号雪篷）、闻人枢等唱和交游。所作主要保存在《大雅集》《文翰类选大成》之中。

秋。借一篇四六体的"大字报"，参与乡试的江浙文人们受到了新的"拷问"。

本年的江浙行省乡试，又出现了如同至正四年的情况：落第者群情激昂，流言蜚语四处传播，真假难辨。有人就此写出一篇四六体的"弹文"，使得考试的种种弊端公开于世人面前，而且牵涉到的人全部点出真实姓名。

其实，这一年江浙政局相当不平静，元代统治早已是死而未僵的"百足

之虫”，但一省乡试，仍然牵动了文人的神经：或是紧密关注，或是身在其中。与至正四年的《非程文》一样，这篇弹文仍然指名道姓，仍然捅出隐情。但至正二十二年，与十几年前毕竟不同，这篇弹文仍然涉及如此之多的当时或以后活跃于文坛的中青年，颇使人意外。文中说:“白头钱宰，感绨袍恋恋之情，碧眼倪中，发仓廪陈陈之粟。俞潜、徐鼎，三月初早买试官；丘民、韩明，五日前预知题目。”——不论世事变迁，对文人来说科举的不公仍然是头等大事。元明之际的“会稽二肃”之一唐肃，也在受到抨击之例，“唐肃以词赋而见收，明经安在”。多少有些费解的是色目人孟昉，他早已出名，并任职于行省，却出现在“弹文”中:“孟天暐每称好嘴，奈举业之久疏，大坏士风，难逃舆论。”① 抨击的主要是以行贿获取中试，以致说“科场作弊，丑声莫甚于今年”。

寄寓云间的杨维桢来到海盐的姚桐寿家中作客，使“乐郊”的诗人受到一次集体的额外“考评”。

这时，刚到任的嘉禾县尹杨本中，委托杨维桢编选吴越两地的诗作，以备结集刊行。江南陷入战乱已经十年，一部时人诗选竟成为一个事件。

杨维桢到达海盐，当夜快要截稿时，东道主姚桐寿听到门外人声杂乱，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门外都是嘉禾地方的能诗者。他赶忙退回，从壁间窥之，夤夜来访者人人手执金帛——是专门来找杨维桢——请他在这部诗选中不要遗漏自己的作品的。杨维桢听到这个情况，笑了，说:“平生于三尺法亦有时以情稍借。若诗文，则心欲借眼，眼不从心，未尝敢欺当世之士。”于是挥笔只选取了鲍恂、张翼、顾文晔、金炯四个海盐籍人士，每人一首诗。而这四人，不在门外那些手执金帛的托请者之中。门外聚集的人“相目惊骇，固乞宽假，得与姓名（使自己得以名列诗选中），至有涕泣长跪者。杨挥出门外，闭关灭烛，骂曰：风雅扫地矣！”② 果真是风雅扫地，可这并非承平时期，在这时文人仍然如此看重诗名，却颇具代表性。这是出自姚桐寿（在场的目击者、杨维桢的居停主人）笔下，不是小说家言。而当时，海盐是一块战火中的小小“乐郊”。只要可能，文人更愿意做诗人。

西域人吉雅谟丁（马元德）由定海县尹调摄奉化州事，马元德最大的愿望是在战乱频仍的时期，能保一方安宁。

---

① 《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八“非程文”节。

② 见姚桐寿《乐郊私语》。

马元德曾任南御史台掾史，授定海县尹，至正十九年擢尹鄞县，至正二十二年摄奉化州事，为此，刘仁本专门写有一篇序为他送行。后调任昌国知州。虽处于战乱岁月，在职仍然不忘劝农耕稼，丁鹤年写有《观太守兄昌国劝农》诗，诗中说:"东皋风日媚新晴，太守躬耕晓出城""岂意兵荒南北遍，化行沧海独升平"（《丁鹤年集》卷一）。但这毕竟不能挽回时局，江南即将为朱元璋囊括之前，他战死在浙东元帅任上，死后，"平生诗词流落人间者，六丁取之殆尽"（戴良《题马元德伯仲诗后》）。

秋。西域人廉子祐通过运粮海船南归，并肩负起沟通大都与江南文坛的诗文联系。

尽管战火燃遍疆域，通过一切可能，大都文人仍尽力与外地同行保持联系。战争使这一联系分外困难，又使这一联系至关重要，这也用以抵消很长时期以来没有新人加入而伴生的寂寞感。从至正后期起，大都文坛主要是通过往返的海运巨舰，与江南的文友们保持联系。海运不单是元朝国脉所系，也成了南北文化交流的渠道。《草木子》卷三下"杂制篇"这样记述元代的海运:"元海运自朱清、张瑄，岁运江淮米三百余万石，以给元京。四五月南风至起运，得便风十数日即抵直沽交卸。"这是元初情况。到至正后期，海运已经成为畏途。实际每一次出海，人们预先就已经知道只有不到三分之二的人员、船只可以平安回到始发港口。

《澹游集》① 是元明之际释子来复编辑的友朋投赠诗文。战乱期间，来复住持的四明慈溪定水寺成了文人栖息的净土。《澹游集》中，大都文人占有重要一席，据此可知大都—江南联系从未中断，尽管颇艰难。其中两次值得一提：一次是廉子祐至正二十二年渡海南还；一次是至正二十四年廼贤奉旨南来代祀南镇、南岳、南海。

廉子祐，是世居金陵的色目人②。南天战火正炽，他从大都乘海船南还，想赶回籍贯所在的金陵探家，并在金陵参加至正二十二年乡试。动身时，人们托他带了大量书信，其中有张翥致来复信，并附诗数首，作为来复赠诗的答谢。同时，张翥以诗送廉子祐南还，有"归舟总是伤情处，一路残山剩水

① 《澹游集》，有瞿氏铁琴铜剑楼抄本。顾嗣立编《元诗选》利用过本书，但只涉及个别人，所遗极多。

② 廉子祐，应是元史名臣、畏吾人廉希宪后裔，廉希宪从子廉惠山海牙（廉公亮）的子侄辈。马玉麟《东皋先生诗》卷四《送廉子友入闽》，作于他返回大都途经苏州时，廉子友是廉子祐之误。

中”之句[①]。廉子祐所乘海船遭遇飓风，严重损坏，漂流到高丽属国耽罗（即今韩国济州岛），不得不在海外滞留近半年。在这期间，廉子祐携带的信函“好事者多发缄传诵之”。至正二十三年春三月，廉子祐才抵达吴中太仓，错过了至正二十二看秋的乡试，但没有遗失大都人郑重托付的文书[②]。

除《澹游集》，《金玉编》[③]《述善集》[④]《四明洞天丹山图咏集》[⑤]等都为当时困守大都的文人与南北同好保持联系提供了例证。

如果不是这些总集“失而复得”，有作品传世的元诗文家名单，就会因改朝换代而略去许多活跃在最后的大都文坛的人物。较重要的有：

潘迪，字履道。元城（河北大名）人。至正间任国子监司业、集贤学士，以礼部尚书致仕，死于元明易代间，所作不传。是定居濮阳（今属河南）的西夏人杨崇喜（唐兀崇喜）在国子监时的业师，杨崇喜编《述善集》，收潘迪佚文多达14篇，重要者如《唐兀公碑铭》《伯颜宗道传》。

曾坚（？—1370），字子白。金溪（今属江西）人。至正十四年进士，至正十八年任江西行省左右司员外郎。元最后十年，在大都任职，明军兵临大都，与危素、张以宁谒见徐达于军门。以元故官，遣送金陵，授礼部员外郎。洪武三年（1370），以感符玺事作《义象歌》，被诛。文名与宋濂并称，其集今已不存。文章仅见《四明洞天丹山图咏集》的二篇序、《述善集》卷一的一篇赞。后者写于至正二十八年二月十八日。

胡益，字士恭。浚仪（河南开封）人。至正间任国子助教、博士，是大都文坛活跃人物。元亡，所作散失，今存之诗，分见《澹游集》《述善集》《四明洞天丹山图咏集》《余姚海堤集》《麟溪集》等。

张士坚，字师允。大名（今属河北）人。至正五年左榜进士第一，授翰林修撰。历监察御史、福建闽海道肃政廉访副使。元代文学文献本来全无其

① 《蜕庵集》卷四《廉子祐归省金陵且就秋试作三绝句赠别》。

② 见《澹游集》卷上，来复为张翥《教墨至辱示以佳制五章展玩钦挹辄次高韵首章以仆元韵而置之其四章录似印可》诗所写的跋。

③ 《金玉编》三卷，释克新辑。与《澹游集》相同，《金玉编》收入的是当时人投赠给克新的诗篇。

④ 《述善集》三卷，几百年间一直以抄本保存于河南濮阳西夏遗民杨氏家族。前些年才披露，此前从未见引称。笔者所据原抄本影印件，系杨富学先生见示。

⑤ 《四明洞天丹山图咏集》即《石田山房诗》，《元诗选癸集》曾以其为资料来源，但只涉及极少内容，而且主要部分是误收入的宋人之作。

名，《元诗选癸集》已集下有张士坚诗一首，但此张士坚是四明人[①]。然而，《滄游集》不但有其传记，而且保存了佚诗。

黄哻（1308—1368），字殷士。抚州金溪（今属江西）人。至正十七年，以左丞太平荐，授淮南行省照磨，未行，授国子助教，迁太常博士，累官国子监丞，擢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明兵入大都，赴井死。有《黄殷士诗》，但未见传本。史称“明经博学，善属文，尤长于诗”。

杨维桢为门下士袁华删订所作诗篇，编成《可传集》。

袁华（1316—?），字子英。昆山（江苏太仓）人。学诗于杨维桢，被视为杨维桢的得意门生，并出入于顾瑛玉山草堂。杨维桢在袁华写的的千余首诗中，选出 84 首，编成一卷，视为可以传世之作，故题名为《可传集》。入明，袁华仕为苏州训导，其子袁生申为县吏获罪，袁华坐累逮系，死于京师。除《可传集》，另有《耕学斋诗集》十二卷（别本十卷）。他的传世之作，纪年最晚者为《癸丑正月风雨中偶成》，癸丑是洪武六年，他本人的死，大约就在此后不久。

李士瞻上万言书言时政是本年重大事件。

这个万言《时政疏》没有保存在李士瞻的《经济集》中。据《元史·顺帝本纪》，《时政疏》共 20 条，全是关乎政局成败的大事，但这时已经谈不上改弦更张了——谁也做不到这一点。

贡师泰去世。享年六十五岁。

贡师泰（1298—1362），字泰甫。宣城（今属安徽）人。贡奎之子。贡师泰早年为国子监诸生，泰定四年授太和州判官，荐为应奉翰林文字。曾出任绍兴路总管府推官，以治狱廉明见称，治行为诸郡第一，秩满，复入朝为翰林应奉，累迁翰林待制，国子司业，擢礼部郎中，拜监察御史。自元世祖朝以后，省台之职不用南人，南人复居省台，始于贡师泰。至正十四年除吏部侍郎，此后屡膺要职，并在江南主持对抗张士诚等部的军政行动。至正二十年，授户部尚书，分部闽中，并委以由海道向大都运粮的重任。至正二十二年，召为秘书卿，行至海宁，得疾而卒。贡师泰既以文学知名，而最后约

---

① 这首诗出自《玉山名胜集》卷七。《元人传记资料索引》（第 1107 页）说明，“四明张士坚”与至正五年的状元张士坚，不是同一人。至正五年的状元张士坚，在《元人传记资料索引》竟没有列名，整部《元史》也只是在两处提到他是至正五年的状元，此外再无一言。可见资料之缺稀。

十年间却成为维系元朝国运的支柱之一。贡师泰少承家学，又受业于吴澄，曾与虞集、揭傒斯、袁桷、马祖常、吴澄并称为元代“六大文章家”。诗文曾数次结集，身后由门人谢肃等类编为《玩斋集》十卷。宣城贡氏是江南世家，贡师泰父贡奎著名于泰定、天历年间；其兄贡师谦、表兄贡师道均有名于时。

卢琦去世。

卢琦（？—1362），字希韩，号立斋。泉州惠安（今属福建）人。至正二年进士。至正十二年任永春县尹，在任息讼安民，延师兴学，文风翕然。次年泉州发生饥荒，死者枕籍，百姓纷纷就食于永春县，卢琦分派豪富及寺院出面救济饥民，存活不可胜计。至正十四年战乱波及永春，卢琦率乡民保境安民，一再击败入境之敌，附近州县汹汹不宁，只永春安然无事。至正十六年，改调宁德县尹，又升任福建盐课司提举。至正二十二年任平阳知县，未赴任就去世了。由于卢琦世居圭峰之下，因以“圭峰”名其集。《圭峰集》二卷是明人编刊的元人别集中相当粗率的一种，卷上所收大半为萨都剌的诗，而且误收了陈旅、同恕诸人的诗。顾嗣立编《元诗选》初集，专门对此点作了考订工作，指出《圭峰集》编辑于“兵燹之余，收拾采掇，不无传抄之误”。顾嗣立同时说：“良吏高风，情词婉约，蔼然自见于言外，是则《圭峰》之真而已矣。”卢琦死后，元人陈诚中曾将遗作编为《圭峰集》十三卷，后来由于“病其杂”，经过“庄、吴二山人”及董应举两次删削，“盖存者仅十五六，而古风独全”。成《圭峰集》二卷。虽经删削，仍杂有不少萨都剌、陈旅等人的作品。

至正二十三年癸卯（1363）

三月。姚桐寿的笔记《乐郊私语》成编。

姚桐寿，字乐年。桐庐（今属浙江）人。姚椿寿之弟，后至元五年为余干州教授，解官归里，以“桐江钓叟”为别号。至正间，撰写随笔《乐郊私语》一卷，记述战乱中的“乐郊”海盐的文化生活与文人处境，是元人笔记中较重要的一种。当时江南战祸频仍，但海盐未被兵火，“尚得以闭户安居，从容著述。故以《乐郊私语》为名，虽若幸之，实则伤乱之词也”（《四库全书总目》）。姚桐寿为《乐郊私语》写的序实际是一篇自叙传。自序中他说，

至正十三年他考虑到"世方扰扰，桐江迫处孔道，所必被兵。且此州（海盐）僻悬海上，亦自可托，何必故乡？遂定居州城，往来于丰阳别业之间，称此州寓公也"。在海盐，"既而与新故知交若云间杨廉夫，嘉禾贝廷臣、潘泽民、张子晦，本州杨友直，时于春林夏泽寻讨旧迹，遣拨旅怀。凡耳目之所睹记，有触于中，辄为条载。数年，不觉丛果成帙，私为之叹曰：天下土崩，余犹得拈弄笔墨如此。海上真我之乐郊也，遂题之曰《乐郊私语》，以就正于后之博达君子云。"在至正间，除这部笔记外，姚桐寿未留下其他著述。

三月七日。廷试录取两榜状元宝宝、杨輗。

本届进士共62人，人数比上一届有所回升，其中不少是"流寓"者。这届进士，状元宝宝是有诗传世的蒙古人，宋讷则是元明之际的闻人。

江浙的元廷守臣月鲁不花逃离张士诚势力范围。

张士诚完全领有浙西，自封为吴王。元廷任命的浙西肃政廉访使月鲁不花自度与其不可能相处，便安排了一只船，船上载着妻子，自己则藏在一个巨大的木柜之中，柜子上覆盖蒿草，逃出平江。刚到达庆元，就为张士诚的部下察知，立即派出百余骑兵追至曹娥江，没有追上，才不得不返回。月鲁不花躲过此劫①。

张士诚中断了对元朝大都的海运，为重新运作，元廷派刘汶主持东南的漕运。

刘汶浮海南下，抵达江南仍然为元所领有的沿海飞地四明，起到"敷广德心，驱驰上下，开诚布公，大慰人望"的作用。于是"贡职既修，舟师戒具"，明年的漕运可望极大改观。于是在他即将还朝覆命时，四明士大夫为其举行了盛大的送行仪式，"供帐祖道，赋诗执爵，追饯鄞江之浒"②。可他离开后一去全无消息，始终未能回归大都。他的使命也无形中止，成了元史与元代文学史的下落不明的"失踪者"，大约归途中为大海波涛吞没。

刘汶，字师鲁。鄜州（陕西富县）人，占籍钱塘（浙江杭州）。南宋名将刘琦后裔，以文艺擢高科，由端本堂司经拜西台御史，为官纠劾不法，不避权贵，曾受到打击。在户部尚书任上，前往江南重整海运，便再无音信。

① 《元史》卷一四五本传。

② 朱右《送户部尚书刘公督漕还京诗序》，见《白云稿》卷四。

早年受到任士林的赏识，并与杨载齐名。杨载《寄刘师鲁》说："迹寄天涯远，诗传海内多"，"天下文章弊，非君孰起予"（《杨仲弘诗集》卷二）。《元诗选》三集选录其诗7首，题为《师鲁集》。

廼贤《河朔访古记》成编，刘仁本、王祎先后为《河朔访古记》作序。

《河朔访古记》是考古游记，这种体裁在元代不多见，作者对辽金时期北方从民族文化整合为区域文化的过程，有脉络清晰的观察与思考。原书已散失，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据《永乐大典》辑出三卷。刘仁本《河朔访古记序》（《羽庭集》卷五）说，本书原为十六卷，王祎序（《王忠文集》卷二）说是二卷，《千顷堂书目》（卷八）则著录为十二卷。据张仲深《子渊诗集》[1]，《河朔访古记》有"黄晋卿、危太朴、许可用"三篇序，但黄溍、危素、许有壬的序都未流传。

王祎是廼贤友人，他在序中说：

> 易之少力学，工为文辞。既壮，肆志远游。乃绝淮入颍，经陈蔡以抵南阳。由南阳浮临汝而西，至于洛阳。由洛阳过龙门，还许昌，而至于大梁。历郑、卫、赵、魏、中山之郊，而北达于幽燕。于是大河南北，古今帝王之都邑足迹几遍。凡河山、城郭、宫室、塔庙、陵墓、残碣、断碑、故基、遗迹，所至必低徊访问。或按诸图牒，或讯诸父老，考其盛衰兴废之故，而见于纪载。至于抚时触物，悲喜感慨之意，则一皆形之于咏歌。既乃裒其所纪载及咏歌之什，以成此书。……惜乎今日小史、外史之职阙，而观风之使不行。此书不得达于朝廷之上，以备纂录。……故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然则，学士大夫观乎此书，其亦可知吾易之之为人矣！易之，名廼贤。其北游岁月，具见篇中。兹不著。

相比之下，刘仁本的《河朔访古记序》要客套得多。

成廷珪去世。享年七十二岁。

成廷珪（1292—1363），字原常，一字元章，又字礼执。扬州（今属江苏）人。一生不求仕进，以吟咏自娱。好读书，尤有诗名。奉母居市廛，家中庭院植竹无数，绰有山林意趣，题居室为"居竹轩"。与张翥为忘年交，

[1] 见《子渊诗集》卷四《用蒋威伯韵贺马易之自京回》诗自注。

载酒过从，殆无虚日。他曾对张翥说："吾仕宦无天分，田园无先业，学术无他能，惟习气在篇什，朝哦夕讽，聊以自娱而已。"晚年遭元末战乱，奔走艰险，死于华亭。死后，由故友郜肃、刘钦搜辑遗作，编为《居竹轩集》四卷，今有传本。危素《居竹轩集序》（《居竹轩集》卷首）中说，成廷珪"忧时而悯俗，愤世而疾衰"，"要皆发乎至情，非有所勉强矫揉而为之者"。成廷珪诗名颇大，与当时文坛名流交往较多，但常见应酬之作，使人读之有雷同之感。总体面貌显然与元末诗坛占主导地位的杨维桢一派并不一致，以自然冲淡为特点，也符合他隐逸之士的身份。

定位去世。

定位（？—1363）字子静。西域色目人。至正元年乡贡进士，长期在江南任职，张孟循有《次定子静侍郎泊南湖韵》（《永乐大典》卷二二六五），居室名为阴山草堂，并由马九霄（马昂夫之弟）篆额。元末战乱中，他依附于陈友谅，为陈氏守临江，在陈友谅与朱元璋的鄱阳湖决战期间战死。临江人周所立《哭定位》（《元诗选癸集》庚集上）诗说："绿锦池头旧使君，近传消息不堪闻。的卢竟死檀溪险，鹦鹉翻成鄂土坟。"定位死后，所作诗文散失殆尽。《光岳英华》卷五有定位诗二首，《文翰类选大成》卷六十、《元诗选癸集》癸集上都据以编入[1]。

至正二十四年甲辰（1364）

二月。郝经将自己的居室题名为"炙背轩"，贝琼为其写《炙背轩记》[2]。

是时，郝经正在华亭主"邵氏义塾"，将居住处所题名"炙背轩"。在致贝琼的书信中，他对自己的题名作了解释："当穷阴苦寒，吾身犹蛇之纠而不得申也；吾口犹蝉之喑而不得鸣也。""又恶知炙背为快？"而贝琼引申为："方海内兵争，智勇之士，各欲自衒以徼一时之富贵，朝暮奔走于形势之途，触风埃，履冰雪，而未遑炙背如田夫野老者。""则炙背之快，无适而不在焉。"——这是元末战乱中文人的活动空间越发狭窄的反映。至正前期，出

[1] 关于定位，比较重要的一篇文章是周闻孙《赠宋君良玉之临江谒子静太守序》（《鳌溪集》卷一），文章中说："癸巳、甲午之间，临江之城不守矣。其时……子静以水军战新喻，并力复临江而守之。""临江之兵祸惨矣，不有子静，高城深池不为墟乎？"

[2] 见《清江集》卷九。

现了“潜窝”这样的书斋名①。至正后期近二十年的无秩序状态下，近似于“容膝轩”（小得只能容纳一个人拘束而坐）②“炙背轩”（可以晒背的朝阳处）、“秀野轩”（朱德润的《秀野轩图》是元代传世名画）这类的居室之名，相当常见。仅贝琼《清江集》中，就有“岩壑深居”“一粟乾坤”“半间云”“方寸地”“味菜窝”“剪韭轩”等等的名目。作为参照，谢应芳《龟巢稿》充斥卷帙的则是为“龟巢”（“差可容膝”）“云半间”“斗室”“野人居”“映雪斋”等写的记序。——哪怕与“二十亩地一头牛”相比，这也不是文人向往的彼岸世界。屈身在潮流之外的人们，保持能够自由转个身的地方都相当难得。城镇，越来越局促；逃离市廛，躲入深山密林是另一种选择。

四月。周伯琦为释克新的诗集《雪庐稿》作序。

克新，字仲铭，号雪庐，又号江左外史。鄱阳（江西波阳）人。俗姓余。元至正间住嘉兴水西寺，他力图以水西寺与释来复定水寺并列，除将自己的诗结为《雪庐稿》③一卷，还编辑了友朋投赠之作，题为《金玉编》。

六月。郏经为《青楼集》作序。

在这篇序中，郏经说：“我皇元初并海宇，而金之遗民若杜散人、白兰谷、关已斋辈，皆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留连光景。庸俗易之，用世者嗤之。三君之心，固难识也。”对杜仁杰、白朴、关汉卿等人的创作心态与处境，做了探讨。此后，至正二十六年时吴中在张士诚治下，张择（张鸣善）为《青楼集》写了另一篇序，记述了《青楼集》作者夏庭芝的身世经历，并表达出对元全盛时期的向往。

秋。朝廷祭祀南镇、南岳、南海，迺贤正膺此命，于深秋渡海南还，回到家乡。

迺贤，西域葛逻禄人，汉名马易之。世居鄞县（浙江宁波）。至正初游历北方，写有《河朔访古记》。在大都与危素定交。危素将迺贤早期诗编为《金台集》二卷。至正十四五年间，迺贤回到家乡。至正二十二年三月，朝廷任命迺贤等四人为翰林编修。由于道路梗阻，至正二十三年五月，迺贤才

---

① 见黄溍《潜窝记》（《黄金华集》卷十五），同时黄溍还提到戴表元的书斋名为“缩轩”。

② 宋讷《西隐集》卷五有《容膝轩记》。

③ 克新另有《元释集》一卷，《元释集》与《雪庐稿》都结集在元末，收入至正年间作的诗，两书内容互有异同，但《雪庐稿》存诗比《元释集》多一倍。

由海道入京。此行，携带了大量的江南文人致大都友好的信函，其中重要的有：来复邀张翥撰《蒲庵记》；乡贤郑觉民请危素在身后为自己撰写墓铭[1]。时隔一年，又回到家乡，廼贤向来复转呈张翥信函，张翥除以《蒲庵记》复命，并赠新作，在信纸空余处还写下“近诗三首”求教。此外，张翥代他与廼贤的共同友人释大梓向来复求诗：请来复为大梓作《衡山福岩寺二十咏》——这就是当时的诗坛往还。张翥手札中说：“衡岳释北山大梓，清才苦行而喜诗。有《福岩寺》诸题。马易之行，并题已寄上，乞大手咏之，将入山刻板。仆为申请，请便风希付下为祷。北山，亦方外胜缘也。”[2]

廼贤与上一年的色目人廉子祐，成了大都文坛与被隔绝的江南联系的特别“信使”。而此次南还的诗篇，则编入《海云清啸集》，《使归》（《元音》卷十二）等都是《海云清啸集》中的佚诗。

十月。慈溪定水寺住持释来复，将友朋投赠诗文结为《澹游集》。

这是仅次于《草堂雅集》（也明显受到《草堂雅集》影响）的“友朋投赠”诗文总集。许多至正后期的江南与大都文坛许多原已缺失的内容，依靠这部总集得以恢复重现。

至正后期，《澹游集》至少编订过三次。第一次，是本年，由刘仁本作序[3]。刘仁本在序中说：“（来复）汇所得于翰林虞文靖公、欧阳公、揭文安公以下若干诗，并自酬倡者，为三卷，寿诸梓，徵余引言。”第二次，是一年后（至正二十五年），有五篇序：揭汯序，至正甲辰冬十月刘仁本序，至正二十五年释廷俊序，至正二十五年杨璲序，释至仁序。揭汯在序中说：“……《澹游集》者，见心复公所集与游者赠答倡酬及凡文章之相及者也。然其所与，或爵为公卿，或位当权要，或儒家者流，或道家者流。不独其丛林之中。而总谓之‘澹游’者：吾之游以澹耳，非以其爵，非以其位，又非以其道之不同而姑与之面也。彼之与吾游者，亦以其澹，而非有所挟也。记所谓：君子之交澹如水是也。”杨璲则说：“时公方类录《澹游集》，命工锓刻印缮成帙，余得受而读之。”如是，这一年《澹游集》曾刊刻行世。目前，这以上两种本子都有孤本传世，它们的内容并不一致，无论所收诗人，还是在其名

---

① 此据郑觉民《送廼贤易之赴任编修序》（《四明文献集》卷二十一）。

② 见《澹游集》卷下，张翥《蒲庵记》附记；卷上，张翥《野望》诗附记。《蜕庵集》卷一，有《衡山福岩寺二十三题为梓上人赋》。

③ 这个本子，国内未见传，日本有“武山版”刻本。

下的作品①。至正二十五年结集本《澹游集》共收入近150个元人（少数人入明）的诗312首，还不包括释来复自己所作约百首诗。而且这些诗人每人都有比较详尽的小传，特别是注明了科第（如果有的话）。卷下，有17篇文，再加卷首五篇序，共有22篇文。顾嗣立《元诗选》与席世臣《元诗选癸集》都引据过此书，但相当不彻底。显然本书还曾有第三次修订，顾嗣立所见，就与今存本（两种）均不同。《诗渊》有十数首虞集与见心的唱和，大多不见于今本《澹游集》，特别是《登樵隐亭有怀方丈》（《诗渊》276页），注明是“元澹游集虞伯生”，但此诗亦不见今存《澹游集》。张翥与见心的唱和，也与《澹游集》不是一个出处。刘仁本《羽庭集》有两首与见心唱和诗:“瞿昙丈室小蓬莱”“金粟如来骨已仙”，均未见于今存《澹游集》。肯定还有第三次结集，只不过这个本子尚未见到。

十二月。大名府文人刘性初到草玄阁求见杨维桢，请杨维桢作《破窗风雨记》。

周伯琦曾为刘性初写了四个篆字“破窗风雨”。刘性初将“破窗风雨”作为自己身处乱世而守身如一的标榜，此行专门请杨维桢就这几个字作一篇文字，阐明它的意蕴。几年后，它竟成为一次集咏的题目，对江南文人影响颇深。

十二月。释克新为至仁《澹居稿》作序。

《澹居稿》（未分卷）是吴兴人皇甫琮编刊。皇甫琮先为释克新编刊了《雪庐稿》，继而又成是书。《澹居稿》中的诗，全作于至正年间，释至仁入明之作已经散失。

释至仁（1309—1382），字行中，号澹居子，又号熙怡叟。鄱阳（江西波阳）人。俗姓吴。早有诗名，得法于径山元叟行端，以博综经传见称于贡师泰、黄溍，虞集比做“宗门之子长（司马迁）也”。元末主苏州万寿寺、绍兴崇报寺。入明后，改主虎丘寺。

释寿宁发起上海“静安八咏”之会，将名人题咏编为《静安八咏》诗集

---

① 至正二十五年结集本，国内只有一部，现藏国家图书馆善本室，是瞿氏铁琴铜剑楼抄本，四册，有“臣瞿启甲呈进”字样，当是修《四库全书》时的进呈之书。《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三卷，实际只有两卷。上卷诗，下卷文。张翥第一次出现时，胶卷空了五六页之多，也许是原来确实分作三卷，今本脱去数页。书名一般均著录为《澹遊集》，但原文是《澹游集》。

一卷。

释寿宁，字无为，号一庵。永嘉（浙江温州）人。主上海静安寺。早年与袁桷唱和，至正间作《静安八咏》诗，以8首诗咏静安寺景点（即赤乌碑、陈桧、虾子禅、讲经台、沪渎垒、涌泉、芦子渡、绿云洞），广求当时名人参与题咏，并由杨维桢评点，写出《绿云洞志》，钱鼒作后序，编成一卷专集，题为《静安八咏》，今存。《元诗选癸集》壬集上存其诗9首。

"静安八咏"参与者有贡师泰、成廷珪、杨瑀、郑元祐、王逢、张昱、孙作、钱惟善等名流以及韩壁、唐奎、马弓、顾彧、钱岳、释如兰、赵觐、余寅、释守仁、陆侗、吴益等地方人士。《静安八咏》与《澹游集》《金玉编》等不同，是以集咏寺院景点徵诗。《静安八咏》影响不能与克新《金玉编》特别是来复《澹游集》相比，但《静安八咏》入明之后，能一直流传下来。这显然是与释来复、释克新在明初的最终处境有关。

罗贯中与天各一方的朋友相会，这个"忘年交"在六十年之后写《录鬼簿续编》[①] 时，为此特别记了一笔。

《录鬼簿续编》说："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据著录，罗贯中作杂剧3种：《三平章死哭蜚虎子》《忠正孝子连环谏》《宋太祖龙虎风云会》，仅后者今存。这个罗贯中是否就是《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尚有异说。

处在朱元璋部眈眈虎视下，据有浙西丰饶之地的张士诚，居然发属下卒役二十万人，兴修水利，疏浚了白茅河水道。

早在泰定初年，吴人周文英就向当地政府建言：彻底疏浚水系之后，应将石桥港与刘家港沟连，然后再浚昆山等地的盐铁塘，以达太湖之水。这是一个完整的改变当地水系，以利于民生的计划，但当时竟没有人能拍板。至正二十四年，张士诚在翻阅元遗留的档案时，重新发现了周文英的计划书，立即就决定付诸实施，而且不为怨议所夺。首先投入力量重堑白茅港，清理九十里的水道，一时间所经县邑为之扰动。这个工程是上马快，见效立竿见影。在开工时，有一首民谣《白茅夫》反映出当时的怨怼情绪[②]：

---

① 《录鬼簿续编》未注明作者，也有人认为作者是贾仲明。

② 见〔崇祯〕《常熟县志》卷三"水利"。据《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编第2分册第507~508页转引。在地方志中关于白茆河（白茅河）的议论颇多。

白茆夫，何蚩蚩，耰锄版锸二十万，尽是吴中一十二郡良家儿。道旁过客问夫事，但闻将军有令开江堤，延袤九十里，息肩弛担知何时。自从去年秋，迄今犹未归。层水凿凿堕血指，北风猎猎吹单衣。父母不得见，儿寒妻啼饥。巡烽入夜急，羽檄流星驰。纵劳里中裹粮食，长年苦役家亦堕。费伯帅师速如火，弱者已死壮者羸。白茆夫，良可悲，岂无新店猎，岂无赵光奇？天关隔下土，尔诉那由知。生男信是生女好，尔生不辰逢百罹。君不闻晋阳之水沉灶产蛙民弗离。又不闻，瓠子决，天命殆非人所为。水可航，山可梯，在德不在险，先言犹足规。承平之世，念未及此，况今四海皆疮痍。我愿将军心，推德怀庶黎，靖八荒，平四夷。上书太常旗，下立襄阳碑。男耕女织天下一，坐令四海歌雍熙。

开始是“民惮其劳”，因而作歌，“然而功卒告成，民大便利”。

另一首民谣则说得简明扼要：“丞相要开河，功深怨亦多。”实际“民谣”

都有文人参与。诗人贝琼写了一首纪实之作《白茅歌》（《清江集》卷三），读起来，就如同一首“加工”了的“民谣”。当时至关紧要的毕竟是在战乱的夹缝中求生存，水利之便，民生之利，是长久之计。到了尘埃落定，张士诚开白茅河的功过才是非分明。洪武九年——张士诚自焚“未遂”整整十年后——长洲县百姓的一个“诉状”明明白白说[1]：“苏州之东，松江之西，皆水乡，地形洿下。上流之水迅发，虽有刘家港，难泻众流之横溃。张氏开白茅港，与刘家港分杀水势，自归附以来，十余年间并无水害。”据《常熟县志》，洪武四年，郡人居然为这个“败则贼”的张王，在白茆市建“张太尉庙”以祀之。

陈基将诗文结为《夷白斋稿》，并请戴良作序。

陈基（1314—1370），字敬初。临海（今属浙江）人。早年和兄长陈聚受业于黄溍，随黄溍入京，并被授以经筵检讨之职。曾为别人起草谏章，力陈元顺帝及皇后的过失，元顺帝想置以罪，他只好避祸还乡，在吴中出入于玉山草堂。后来奉母到吴郡，为张士诚参谋军事，受张士诚信任。张士诚称王，惟有陈基进言劝阻。张士诚割据时他出任内史，迁学士院学士，军旅倥偬，征战书檄多出其手。张士诚失败后，朱元璋召他入修《元史》，书成，赐金而还。洪武三年（1370）冬去世。张士诚败亡，他的臣下往往被逐杀，陈基却得以善终。居室有夷白斋，文集名为《夷白斋稿》，那些为张士诚指

---

[1] 《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编第2分册第509页。

斥朱元璋的书檄大都在集中。今存《夷白斋稿》三十五卷、外集一卷、补遗一卷。文章一般较古简，某些檄文写得相当雄辩，而且颇能反映民意。

许有壬去世。享年七十八岁。

许有壬（1287—1364），字可用。汤阴（今属河南）人。二十岁时，畅师文拟荐入翰林，未果。至大初与贯云石同游京师，得预廉园之会集，后任学正，改山北廉访司书吏。延祐二年进士及第，授辽州同知，有治绩。延祐六年除山北廉访司经历，至治元年迁吏部主事，次年转江南行台监察御史，打击贪官污吏，部内肃然。拜监察御史。元英宗暴卒，许有壬尽力稳定政局，并向泰定帝上《正始十事》，受到嘉许。泰定元年任中书左司员外郎，泰定三年，升右司郎中，天历三年擢两淮都转运盐使，元统二年拜治书侍御史，转奎章阁侍书学士。中书平章彻理帖木儿奏罢进士科，许有壬廷争不能夺，便称病告归，未允。有人建议禁止汉人、南人学习蒙文、回鹘文（古维吾尔文），因许有壬极力反对，未能施行。后至元初，政局不稳，许有壬告归彰德，并南游湘、汉间，后至元六年起为参知政事。次年转中书左丞，后累受权臣攻击，数辞数起。至正七年曾任御史中丞，至正十三年拜河南行省左丞，至正十五年任枢密副使，复拜中书左丞。其时中原烽火遍地，许有壬极力出谋划策，力图稳定政局。至正十七年以老病致仕，诏给俸禄终身。卒，谥文忠。许有壬历事七朝，从政近五十年，以直言敢谏、不避权贵见称。有《至正集》一百卷，今仅存八十一卷。另有《圭塘小稿》十三卷、别集二卷、续集一卷。晚年得康氏旧园，名曰圭塘别墅，许氏兄弟（有壬、有孚）、父子（其子许桢）及友人的唱和之作辑为《圭塘欸乃集》二卷，今均存。其词有辑本《圭塘乐府》四卷、别集一卷，收入《彊村丛书》。

刘鹗去世。享年七十六岁。

刘鹗（1290—1364），字楚奇。永丰（今属江西）人。皇庆间以荐授扬州学录，至正元年累迁秘书郎，升翰林修撰。至正十二年，任江州路总管。至正十七年迁广东廉访副使，擢广东宣慰使，拜江西行省参政。守韶州，被起事义军围困在城中，城池失陷后被俘，绝食而死。死前，关押在慈云寺，作绝笔诗："生为元朝臣，死作元朝鬼。忠节既无惭，清风自千古。"并把这首诗交给儿子刘述。有《惟实集》七卷（别本四卷）。任翰林修撰时，曾与虞集、欧阳玄、揭傒斯等人同游浮云道院，并作《浮云道院诗二十二首》（《惟实集》卷四），感慨世态炎凉、人情翻覆，是其代表作。他还写有《野史口号碑》（《惟实集》卷七），以44首七言绝句，对元末的社会动乱作了颇

有力度的反映。文章则以文理缜密见长。

郑元祐去世。享年七十三岁。

郑元祐（1292—1364），字明德。处州遂昌（今属浙江）人。早年随父寓居钱塘，郑元祐曾遍游南宋遗老之门。父死，侨居平江，因博学能文，声名藉甚，优游吴中近四十年。至正十七年辟平江路儒学教授，任职仅一年，因病去职。至正二十四年授江浙行省儒学提举，但不久便去世了。儿时因乳母失手，致伤右臂，成年后学用左手写字，左手楷书被称为一绝，他便以“尚左生”自号。张士诚占据平江，东南文士多为其所用，郑元祐是其中最知名的耆宿。所著有《遂昌杂录》一卷、《侨吴集》十二卷，今均存。文章有古作者风，吴中有碑碣不贵馆阁名士而贵郑元祐所作的风气。诗清峻苍古，五、七言古诗沉郁雄浑。与顾瑛关系密切，是玉山草堂的座上客。草堂文酒之会，名士毕集，而记序之作，往往公推郑元祐执笔。

唐棣去世。享年六十九岁。

唐棣（1296—1364）字子华，晚号遁斋。湖州归安（江苏吴兴）人。以茂才异等起家，历江阴州儒学教授、嘉兴路照磨，至正五年除休宁县尹，在任五年，政通人和，民为立生祠，以吴江州知州致仕。文章清丽，工书善画，尤长山水，师法高克恭、赵孟頫，曾为嘉禧殿画御屏称旨。在吴中预顾瑛玉山草堂之会，所作结为《唐子华诗集》《休宁稿》《味外味稿》等编，但均未见传本。诗存《草堂雅集》卷八。

郑觉民去世。享年六十五岁。

郑觉民（1300—1364），字以道，以字行。号求斋。鄞县（浙江宁波）人。郑真之父。博究群书，文章典雅，以孝行知名乡里，长期居家教授，廼贤即出自其门。至正中荐授龙游县儒学教谕，到任仅三月，即弃职归，又除处州路儒学教授，不赴。有《求我斋集》三十三卷，由戴良、贝琼作序，但未见传。总集与地方文献中，郑觉民诗文均常见，《元诗选癸集》误为宋遗民，编入甲集，存其诗6首。

郭翼去世。享年六十岁。

郭翼（1305—1364），字羲仲，号东郭生，又号野翁。昆山（江苏太仓）人。早年习《易经》，不屑为举子业，专一于古文，诗尤精悍。曾借东郭先生的故事，命其居室为“雪履斋”。有《雪履斋笔记》一卷、别集《林外野

言》二卷，今均存。杨维桢为郭翼诗集作序时指出：郭翼早年失怙，中年丧子，家境清贫，理应在诗中大号疾呼，鸣不平，但他的诗“皆悠然有思，淡然有旨，兴寄高远而意趣深长”（《东维子集》卷七）。杨维桢还认为郭翼诗精悍者在李商隐间，流姿媚者，不在玉台之下，这个风格则正是杨维桢最为推崇的。他是杨维桢“铁崖体”代表诗人之一。元末社会动乱，他以豪杰之士自负，尝献策于张士诚，但未能为其所用，只好归耕娄上。晚年出任训导官，却又因不合时宜而无所作为。《雪履斋笔记》是一次江行中所作，在江中他遇到“大风浃旬，拥楫七昼夜”，一旦风向转顺，冲波侧帆而去，其快意可知，于是他就写出这部笔记。

至正二十五年乙巳（1365）

春。王翰避处福建，在出游名胜时一再题名于摩崖石刻。

从本年春开始，西夏诗人王翰（字用文）与一些在福建避难的政治难民不断出游山水，并以摩崖石刻表明自己的存在。第一则题铭是:“辽东薛朝晤流寓闽中，闻永阳方广之胜，至正乙巳春同灵武王用文、莆田郑烨、会稽胡温来，信宿而去。”仅据《福建通志》的“金石志”卷十三，这个时期的题名共有五则，时间有春、秋八月朔日、秋、冬以及仅书“至正乙巳”的一则。出游的地点，除永福方广岩，还有闽县鼓山、连江宝华山、罗源补陀峰、永福高盖山。薛朝晤，字子颙，辽东人，蒙古族，至正十四年状元。

王翰（1333—1378），字用文，蒙古名为那木罕[1]。色目唐兀氏，祖上从征江淮，以领兵千户镇庐州，便居于庐州（安徽合肥）。年仅十六就由省府交荐，除庐州路治中，又以同知升理问官，综理永福、罗源二县，擢福建行省郎中。陈有定据有福建，留王翰于幕府，敬且惮之，表授潮州路总管。陈有定失败，王翰企图从海上远遁，但未能成功，便隐居于永福的观猎山，为黄冠，自号友石山人，与樵夫、牧竖、渔父、农夫杂处，改朝换代后一直这样生活了十多年。

四月二十七日。王蒙在吴中名人卢恒（卢山甫）家中的听雨楼作《听雨楼图卷》，并为其题跋。

---

(1) 那木罕，一作那木翰。

以此开始了一次文人“盛会”——为《听雨楼图卷》题诗[1]。这次题咏的“起因”是张雨于至正八年二月为卢恒题其家的听雨楼，而王蒙作画，是卢恒与其听雨楼得到普遍注意的原因。王蒙在画的题记中说:“至正廿五年四月廿七日，黄鹤山人王叔明，于卢生听雨楼中画。生名恒，字士恒。时东海云林生同在此楼。”先后为《听雨楼图卷》题诗的有一二十人，所作大多“借题发挥”写出自己在战乱中的感受，成为至正后期的重要文学活动。时在元末战乱中，许多为听雨楼题跋者在大乱平定后，很快为岁月淹没。明永乐五年，王达特意撰写了《听雨楼诸贤记》。

释克新将近年来友朋投赠之诗编为《金玉编》。

《金玉编》三卷收录的作品大都不见于其他别集总集，但它是未经最后编定的稿本。全书没有序跋（尽管克新确实曾经邀请友人比如张翥为其写序），它的编辑过程显然受释来复《澹游集》影响，但克新交游面不如来复

广。实际《金玉编》《澹游集》，又都受到道士张雨《师友集》、诗坛东道主顾瑛《草堂雅集》《玉山名胜集》《玉山纪游》等编的影响。这类总集纷纷结集，是至正年间推动诗人写作的一个动力。只是在长期战乱之后，许多资料已经散失，连《师友集》《澹游集》《金玉编》也都在隐显之间，除《草堂雅集》，其他几乎不为人所知了。

夏文彦撰《图绘宝鉴》五卷成稿。

夏文彦，字士良，号兰渚生。华亭（今属上海）人。夏浚之子，历余姚州同知。精于画艺，《图绘宝鉴》是元人作于战乱期间的著述，与《青楼集》不同之处在于，它涉及元人的内容只占很小一部分。

十二月十日。被张士诚变相软禁在姑苏城中的饶介，力图以诗与朋友“交谈”。

在一张保存至今的纸上，饶介分别写了四首诗，并一一附记[2]:“病中对梅花一株，欣然有作，若有会也。录似西塾孟载、季迪两先生一笑。”“书后见剩纸，就写上所有者。”“至正廿五年十二月十日，在采莲泾梅花树下写。”“昨赋此送秦仲文博士还三沙。”孟载指杨基，季迪指高启，都是滞留在平江

---

[1] 明人朱存理《珊瑚木难》卷一与赵琦美《铁网珊瑚》卷十五，两处分别著录的题咏听雨楼的文字（比如王蒙的题记）有不同之处，这是因传抄所致。一般来说，《铁网珊瑚》的文字较准确。

[2] 见明朱存理《珊瑚木难》卷六。

的诗人。十二月初，梅花尚未开放，他独坐在梅花树下，悬想春光乍露的景象，饶介等待的不是春天，而是解脱。“书后见剩纸，就写上所有者”写的是一首《夜坐》:“学默三年漫不应，流光一去意无征。缘如发白因循染，道似山青自在凝。犹有形骸生影迹，却将文字寄名称。一川月色多于水，更著秋霜见底澄。”这一张饶介的诗笺，披露出十多年间他的实际处境。饶介比“北郭十友”“吴中四士”等大一辈，但“十友”“四士”们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写诗的。

刘君贤不应郡守举荐，并赋诗明志。

刘君贤，字文定。泰和（今属江西）人。元末兵乱依母族袁氏于赣州雩都（江西于都），遂冒姓袁。隐居于城西，授徒著书，至正中，王荣忠为赣州路判官，分治雩都，高其学行，上书荐之，刘君贤赋诗明志，未应举荐。有文集《昌雩集》二卷，罕见流传，清后期才有刻本行世。还曾著《学问要编》六卷等。

陈樵去世。享年八十八岁。

陈樵（1278—1365），字君采。东阳（今属浙江）人。幼年承继家学渊源，号称于天下之书无不读，读无不解。学成后，隐居圃谷，以种药、著书为乐，头戴华阳巾，裁鹿皮为衣，自号“鹿皮子”。一生足迹未出里门，有《易象数新说》《洪范传》《鹿皮子》《飞花观小稿》等著述，共数百卷，今均不存。仅存诗文集《鹿皮子集》四卷。

朱德润去世①。享年七十二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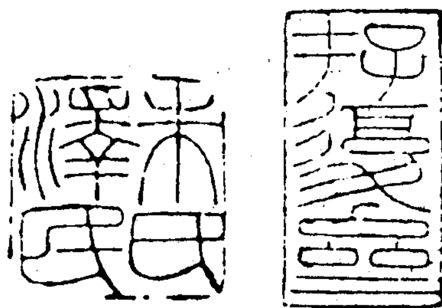
元末的文人之中，朱德润有一定的类型意义。曾身为天子近臣，元英宗去世又长期退居江南，这与柯九思颇近似。但他在江南或仕或隐，都有积极入世的特点，则与其他因受挫折而退居乡里者截然不同。

朱德润（1294—1365），字泽民。昆山（江苏太仓）人。延祐六年，以荐授翰林应奉。元英宗即位，任征东行省儒学提举，以献《雪猎赋》见知，主持金书佛经事。英宗去世，归隐江南。至正中战乱频仍，至正十二年由江浙行省平章辟为行省照磨，参议军事。曾摄守长兴，使流离失所的难民暂又还乡。能书善画，画法宋代山水画家郭熙。有《存复斋集》十卷、《存复斋

---

① 周伯琦《朱德润墓志铭》（《存复斋集》附录）说，朱德润死于至正十五年乙巳。但至正十五年是乙未，乙巳是至正二十五年。在此之前，墓志铭中又说，朱德润在延祐末年，年方二十五，出游京师。如是，至正十五年当是二十五年之误。

续集》；另著《古玉图》二卷等。元末“铁崖体”风行一时，乐府诗（新题、古题）充斥诗坛，朱德润《存复斋集》中，有一组新乐府诗《德政碑》《无禄员》《外宅妇》《富家邻》《官买田》《水深围》《前妻子》。《富家邻》（《存复斋集》卷十）诗云：



朱德润用过的印章

富家邻，食缺衣单如鹄身。自言本是儒家子，家世凋零二十春。少时学得钟王法，长作书工佣倩人。人称书好争求写，日得千钱归养亲。一朝富室居邻右，构堂买屋栽花柳。柳绿花红子女多，欲广宅居延好友。不免令人相诱言，书生此屋宜先售。生云屋乃父祖传，不忍卖之从别迁。由此富家生怨恶，约连亲友来亏侮。造言间谍激众怒，欲绝人间衣食路。阴构凶人发祻机，官差横役时时赴。贫士箕裘那可守，妻儿对泣寒窗暮。悔不蚤从邻右言，致使饥寒无处诉。富家自喜奸谋遂，密使里人相假贷。年深本利逐时登，低价准房犹不追。我闻古人一亩宫，五家为比常和雍。岁时吉凶相庆吊，何曾百屋容豪侬。嗟哉圣王礼制久不闻，移风易俗宁无因。寄语世间贫贱士，莫羡富家同结邻。

这一组诗，是元末社会生活的实录，立意更贴近白居易“新乐府”。

郑采去世。享年五十七岁。

郑采（1309—1365），字季亮，号曲全。温州平阳（今属浙江）人。郑东之弟，自幼父母双亡，秉性狷介，州里不能容，郑东在昆山教书，他便离家往就。郑采读书相当刻苦，不分寒暑，几乎是见书就读，晚年寓居苏州。由于刚毅忤物，不合时宜，以致终身坎坷。明初，其子郑思先仕为磨勘司令，将郑东、郑采遗作汇为一书，题为《郑氏联璧集》，共十四卷。有郑采文三十篇，诗百首，已不见传。

郭奎去世。

郭奎（？—1365），字子章。巢县（今属安徽）人。早年有诗名，与汪朝宗、吴去疾师事余阙。慷慨尚志节，在元末战乱中，出参朱元璋幕府，至正二十一年，朱元璋之侄朱文正开大将军府于南昌，主持江西战事，郭奎为其参谋。朱文正获罪死，郭奎受株连处死。有《望云集》五卷。他是元末较

早站在朱元璋一边的文人。

亦速歹去世。

亦速歹（？—1365）[1]，字鼎实，号西埛。蒙古札只剌歹氏，居龙兴（江西南昌）。元统元年同同榜登进士第，授瑞州路同知新昌州事。与慈溪定水寺住持来复为方外交，至正二十五年授武州监州之职，但已经不能赴任，竟客死鄞县，家贫不能理丧事，由来复在定水寺之西择地为之安葬。其子在来复门下剃发为僧，法名昙铉。

至正二十六年丙午（1366）

三月初。王立中为刘性初作《破窗风雨图》[2]，以配合文人的题咏诗文。

这是元末与《听雨楼图卷》齐名的集咏活动。王立中为此写的题识说："刘君性初，以'破窗风雨'自居。诸公赋诗成卷，因作此图，并题绝句于左。至正廿六年岁在丙午，暮春之初，遂宁人王立中彦强。"至正二十四年，杨维桢为刘性初作《破窗风雨记》，实际从至正二十三年以来，文人就陆续在为"破窗风雨"题咏，直到王立中的《破窗风雨图》画成而形成高潮。先后为其题跋的作品有40多篇，包括3篇记，36首诗，3阕词。历经十多年的战乱，到至正二十六年已经是"乱后图治""分久必合"的前夕，敏感的文人迫不及待地借题画表述自己对彼岸世界的向往。

王立中《破窗风雨图》在当时相当有名。画幅上，王立中自己题诗："纸窗风破雨泠泠，十载山中对短檠。老矣江湖归未遂，画间如听读书声。"一时间，历经长期战乱而硕果仅存的江南闻人们为其题诗写跋成为时尚。刘性初本人是大名人，题跋者有不少是滞留江南的精神难民。特殊的是，元末以《破窗风雨》为题的绘画，竟不止一件。除王立中为刘性初作，还有赵原

---

① 亦速歹，名列《元统元年进士录》。一般进士录中均注明年龄，但亦速歹的年龄阙失。

② 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四十九著录有"王彦强破窗风雨图并题卷"；卷五十一又著录"王叔明破窗风雨图并题卷"。"王叔明破窗风雨图"卷末，有明人董其昌的跋，说此图与王蒙《听雨楼图》"绝类"。实际这个"王叔明破窗风雨图"是一个"高仿"，它的蓝本就是《听雨楼图》。王立中与王蒙两卷《破窗风雨图》的题跋基本一致，应是后者据前者仿录。

（字善长）所画《破窗风雨图》，图上也有画家自己的题诗一首："一室萧然谁与同，清如独鹤寄樊笼。诗成春草池塘上，梦绕玉堂云雾中。花气每随岚气入，书声时与竹声通。从容更觉新晴好，卧看东窗日影红。"[1] 文人就是文人，在山河破碎、风雨飘摇中，他们时时结记在心的是独善其身，不能去怀的仍然是等待东窗映出日影。这样题目的画以及为这样境界的画题诗，是元末时尚。

至正初在吴中盛行的觞咏会集，以顾瑛玉山草堂为代表。进入战乱期之后，规模较大的文人会集，举办有实际困难，十数年间烽火遍地，一是地点难觅，二是想在同一时间请到合适的人也不容易。除玉山草堂，坚持继续活动的诗文"沙龙"已经极其罕见，不但成本高，危险大，机会也难得。于是，传统的"传观题咏"就替代了需要环境保障的觞咏之会，成为"集咏"的流行式。在这一时期的"咏秀野轩""咏风雨楼"等，也是"因地制宜"的文人"竞技"活动，介于觞咏会集与题咏书画之间。传观题咏书画，成了文人活动的特定形式。在这之前，题《山村图》、题《郑思肖墨兰卷》、题《夜山图》、题《水村图》，也是一时之盛，但至正后期更具有时代气息。"破窗风雨"，仅这个题目已经足以使旁观者跃跃欲试，写出自己的感受。

三月七日。廷试录取两榜状元赫德溥化、张栋。

本届录取进士共72人。这是元代最后一届科举。这些进士在元已经不可能有什么作为。

六月。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三十卷成书，这是元代篇幅最大、影响颇广、内容丰富的笔记。

孙作《南村辍耕录叙》谈到陶宗仪与《南村辍耕录》的写作说："余友天台陶君九成，避兵三吴间，有田一廛，家于松南，作劳之暇，每以笔墨自随。时时辍耕休于树荫，抱膝而叹，鼓腹而歌。遇事肯綮，摘叶书之，贮一破盎，去，则埋于树根，人莫测焉。如是者十载，遂累盎至十数。一日，尽发其藏，俾门人小子萃而录之，得凡若干条，合三十卷，题曰《南村辍耕录》。……九成，名宗仪。少工举子业，晚乃弃去。阖户著书，此其一云。至正丙午夏六月，江阴孙作大雅序。"陶宗仪的这种写作方式，对笔记写作颇有影响，一直到蒲松龄写《聊斋志异》都有其痕迹在。

---

[1] 见明人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一。对这幅画，李日华的观感是"疑其稍薄未真"，即便这是一幅伪作，也可以看出当时的风向所趋。

面对明玉珍所部红巾军的压力，元朝的世袭云南领主梁王杀死了女婿、大理总管段功，并嫁祸于女儿，自毁长城。

当时云南还在元代册封的蒙古裔梁王统治之下，梁王女儿阿禚未能阻止父亲，又未能保全丈夫，本已悲痛欲绝，还要承担毒死丈夫的恶名。在一定程度上，这个事件是通过诗歌反映出来的，它不但是《阿诗玛》的政治版，也是中国14世纪的《阴谋与爱情》。最早是经流放云南的明代大才子杨慎将其记入《滇载记》①，特别是现代学者郭沫若以其为素材写出话剧《孔雀胆》，更使这个事件具有了浓郁的传奇色彩。

杨慎《滇载记》中说：

云南第九代大理总管段功，有勇有谋，而且深受部下爱戴。在至正二十三年时，明玉珍亲自统率三万大军，由四川攻略滇南。与战，梁王败绩，全靠段功与其部下杨渊海鼎力相助，迫使明玉珍败退。梁王感段功相救之恩，妻以其女阿禚，并奏授段功为云南平章。段功也留在梁王驻节地善阐，而不回大理。他在大理的夫人高氏，特意写了一首乐府，促其还家，其中说“好语我将军，只恐乐极生悲冤鬼哭”。段功见到书信，回到大理，但不久又离开大理返回善阐。梁王的亲信们认为“段平章复来，有吞金马、咽碧鸡之心矣。盍早图之”。其实，恐怕他只是舍不得新婚的阿禚而已。梁王有了疑心，密召其女，说:“亲莫若父母，宝莫若社稷。今功志不灭我不已，脱无彼，犹有他平章，不失富贵也。今付汝孔雀胆一具，乘便可毒殪之。”孔雀胆有剧毒，阿禚拿着孔雀胆潸然泪下。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她对段功说出了父亲的秘密，表示愿意与段功一同返回大理，并且出示了孔雀胆。可是段功却不信任自己的妻子，说：我对你家有功啊！一次我受了伤，还是你父亲亲自为我处理的创口。怎么能相信这个谣言？阿禚反复申辩，但段功根本不听。次日，在前往佛寺时，段功的坐骑突然逃逸，一群梁王的侍卫将段功击杀在途中。阿禚闻讯失声痛哭，并欲殉情，但梁王防范极严，几乎寸步不离人。阿禚作诗以泄愁愤。这首诗不但回顾了自己的身世经历，表达了对夫君“心悬明月”的思念，因为其中有不少是蒙古语的音译，可能原是使用蒙文写就的。段功的部将、员外杨渊海题诗粉壁，仰药自杀。其诗曰:“半纸功名百战身，不堪今日总红尘。生死自古皆由命，祸福于今岂怨人。蝴蝶梦残滇海月，杜鹃啼破点苍春。哀怜永诀云南土，锦酒休叫撒泪频。”梁王本意想留杨渊海为己用，见到绝命诗，只得将段功与杨渊海一同归葬大理。不久，明玉珍再次入侵，梁王不支，派人借兵大理。大理已是段功的儿子段宝为总管，段宝

① 明人徐树丕《识小录》卷二“滇载记”节，大致录出了“孔雀胆”的节要。

写了一封信回复梁王：

杀虎子而还喂其虎母，分狙栗而自诈其狙公。假途灭虢，献璧吞虞。金印玉书，乃为钓鱼之饵；绣闺淑女，自设掩雉之网罗。况平章既亡，今止遗一獒一奴，奴再赘华黎氏，獒又可配阿䕶妃。如此事诺，我必借大兵。如其不可，待金马山换做点苍山，昆明池改作西洱河时来矣。

在这封刻毒的书信之后，段宝也附了一首诗，其中说“平章枉丧红罗帐，员外虚题粉壁图”。可见当时人普遍认为，段功是被孔雀胆毒死在妻子帐下。段功的女儿段僧奴自从父亲死后，就在母亲的教诲之下恨死了梁王。在她即将出嫁建昌阿黎氏时，拿出自己亲手刺绣的旗帜，交给段宝，并题诗二首，表示此仇不报将含恨九泉。——在这时，觊觎云南的已经不止是那个乱世枭雄明玉珍，而是定鼎金陵的朱元璋了。

阿䕶是这个悲剧当之无愧的主人公。她不见容于其父，又不能取信于其夫，还受辱于其夫的继承人，为时论所不齿。她没有殉情，实际是一种特殊的惩罚。而梁王是真正的阴谋家，他不惜牺牲女儿，散布（或默认）段功死于“孔雀胆”的谣言，是为了给自己留后路。他是没有理由杀害段功的，但女儿有——为了嫉妒，为了不让丈夫回大理。父亲嫁祸与女儿，女儿不能为洗清自己而揭露父亲的阴谋，所以阿䕶的悲剧是多重的，正是因此，它才能深深打动人心。

上述诗篇，有的具有明显的咏唱性，有的则是基本合格的格律诗。可以认为，这些诗的原作，不止是出自中文，还有蒙古文、云南当地文字或本是山歌。当事人用这样一组诗歌，突出表达了对这个事件的情绪与困惑，有激愤，有缠绵，也有无奈。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凡正面人物，才有诗篇流传。

江南形势已经不可挽回，戴良离开家乡，携全家渡海潜往山东，将恢复旧业的信心寄托在扩廓帖木儿（王保保）一身。

戴良（1317—1383），字叔能，号九灵山人，又号云林。浦江（今属浙江）人。早年学文于柳贯、黄溍，并受余阙影响。至正二十一年以荐授淮南行省儒学提举，但浙东已非元朝所有。又避地吴中，张士诚将亡，他携家人渡海抵达山东登州，准备投归元朝重要将领扩廓帖木儿（王保保）军中。由于战争阻断，难以抵达，便侨寓山东昌乐数年，访求齐鲁之士，想有所作为，但一事无成。等尘埃落定，于明洪武六年（1373）才南还，隐姓变名隐居四

明山中。明太祖派人寻访到他，洪武十五年召到京师，试毕想授以官职，戴良以老病为由辞谢，惹怒朱元璋，次年四月以待罪之身自杀于寓所，享年六十七岁。戴良在元亡后仍不忘故国旧君，曾自赞说：处荣辱而不二，齐出处于一致。歌黍离麦秀之诗，咏剩水残山之句。他是有代表性的元遗民作家。有《九灵山房集》三十卷、《九灵山房遗稿》四卷。戴良另著《春秋经传考》三十二卷，由宋濂作序，今未见传本。戴良的诗往往体现出慷慨激烈情怀，不少篇章颇具感染力；他的文章直抒己见，较少有学究之气。但诗文都比较直露，某些作品给人以浅显粗糙的感觉。戴良生处元明易代之际，元亡，他不仅以遗民自居，还"跋涉道途，如子房之报韩"；"彷徨山泽，如正则之自放"（苏伯衡语）。《四库全书总目》评戴良诗云："风骨高秀，迥出一时。眷怀宗国，慷慨激烈。发为吟咏，多磊落抑塞之音。"

月鲁不花逃离即将倾覆的江南前往大都述职，途中，在海上为倭寇所杀。享年五十九岁。

月鲁不花（1308—1366），字彦明，号芝轩。蒙古逊都思氏，居会稽（浙江绍兴）。成吉思汗大将赤老温的后裔，家族在蒙元史上号称"四大根脚"之一。父脱帖穆耳久居江南，为汉族文人接纳，与汉族通婚，儿子受教于名儒韩性。月鲁不花是第三子，早年即有诗名。至顺三年江浙乡试居右榜第一。元统元年进士。顾嗣立《元诗选》三集有月鲁不花《芝轩集》，是据《澹游集》所录月鲁不花诗编成。关于月鲁不花与诗人的交往，一则轶事提到[1]：元末画家、诗人王冕旅居大都"既不遇，惟落落自放。尝谓月鲁不华公曰'余欲买一黄牛乘之，挂书角上以游'。会月鲁公南辕，传闻士大夫间，故有'燕市骑牛'之语。而实未尝骑也"。从此，"燕市骑牛"成了蔑视权贵、独往独来的典故。

月鲁不花是元后期主要的蒙古族诗人。今存月鲁不花诗全出于《澹游集》，尽管战火正炽，月鲁不花与来复唱和频繁，他们不只是泛泛的诗文之交。来复《奉寄彦明中丞》曾说"共知出处心无愧，自信经纶志未疏"[2]。高明有《寄月彦明省郎》诗，则写出共同的失落感与没有未来的苦衷："摇落关河万木空，征途日暮感飘蓬。天寒为客吴江上，夜雨读书山寺中。伯乐何时

① 见《霏雪录》卷上。

② 见《文翰类选大成》卷六十二。在这一卷中，与月鲁不花有关的释来复之诗还有：《芝轩中丞以诗见寄次韵兼谢二首》《奉简彦明中丞兼寄伯防工部二首》《次韵奉谢芝轩中丞》等。

过冀北，扬雄谩自赋河东。黄尘冉冉貂裘老，殊愧南邻桑苎翁。”①

江南大局已定之前，一些文人坚持不为任何一方所用，隐居避世。

这些人在历史上没有特别的作为，但作为文学家，在文学史上则是未能被删节的内容。其中有叶杞、王份、长桢、顾观、何景福等人。

叶杞，字南有。京口（江苏镇江）人，居华亭（今属上海）。先世是京门宦族，有别业在松江吴汇。其父叶以清隐居好义，叶杞自幼好读书，负才具，在松江鱼鳞泾上筑草堂，名为漪南。杨瑀出守建德，辟为掾史，辞而不就。至正中战乱波及乡梓，叶杞曾向受命经略江南的李国凤密陈时事十条，为李国凤嘉纳，准备授以镇江路丹徒县主簿，但形势骤变，未能如愿。诗文均有时名。

王份，字仲质。永嘉（浙江温州）人。身处元末战乱，隐居吟咏以终。其诗流传不广，《御选元诗》选录5首，明赵谏《东瓯诗续集》卷五据地方文献录存其诗31首，清钱熙彦《元诗选补遗》编录其诗32首，并云有《玉雪台集》，但未见著录流传。

顾观，字利宾。金坛（今属江苏）人。其父顾岩寿曾任建康推官，便移居丹徒（江苏镇江）。顾观曾任星子县尉。少工诗，随父宦游期间，从赵孟頫游，受世人推重。至正年间兵兴，一时名公欲荐入馆阁，但因道路梗阻而不果。遇乱，避地流寓绍兴。所作流传不广，《御选元诗》选录其诗4首，清钱熙彦《元诗选补遗》编录其诗18首，并云顾观有两卷《容斋集》。

何景福，字介夫，号铁牛子，晚号铁牛翁。淳安（今属浙江）人。宋大理寺卿何梦桂族孙。以任重致远自期，因所遇非时，累辟不赴。元末战乱，曾避地武林，大乱始定，便还归乡里，以诗酒自娱，终其身不出。有《铁牛翁诗》，已散失。仅存《铁牛翁遗稿》一卷，附何梦桂《潜斋集》以行。除诗，卷末还有一篇《锡策楼赋》。

吴皋，字舜举。临川（江西抚州）人。宋丞相吴潜诸孙，早年与梁寅为豫章郡学的同学，师从吴澄，后任临江路儒学教授。元亡，不愿出仕新朝，隐于乡里。曾对友人胡居敬说：“郡承大乱之后，民皆习武事，厌儒行，弦诵绝响，教无所敷，吾甚耻之。”他屏居闾里，惟以奉亲训子为务，遗民逸士纷纷请他去教家塾，文名颇大。有诗文集《吾吾类稿》，原本亡佚，今存《吾吾类稿》三卷，是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辑出。

---

① 见《东瓯诗续集》卷五。《元诗选》三集，这首诗题作《同月彦明省郎》，同时另有《寄月彦明省郎二首》，这几首诗都写于江南战乱期间。

沈贞，字元吉，号茶山。长兴（今属江苏）人。元末隐居于横玉山中，避世自处。入明不仕，安贫乐道，特立独行。有文集五十卷，今不传。今存《茶山老人遗集》二卷。

洪希文去世。享年八十五岁。

洪希文（1282—1366），字汝质，号去华山人。莆田（今属福建）人。父洪岩虎，号吾圃，宋代贡士，曾任兴化教谕。洪希文与父亲在山中隐居，生活清苦，但父子倡和无愠色。洪岩虎死，洪希文嗣为乡先生，郡县名族争致西席，郡学聘为训导，大宾延请无虚岁。一生几乎与元朝相终始。洪岩虎诗集名《轩渠集》，洪希文便把自己诗集命名为《续轩渠集》。现存《续轩渠集》十卷（诗八卷、词一卷、杂著一卷），是经明人蔡宗兖删定的本子。

王鉴去世。享年七十三岁。

王鉴（1294—1366），字明卿。晋州安平（今属河北）人。父王瑁曾任吴县尹，王鉴早年随父宦居吴中，介然自处。受学于虞集，北游京师时，朝中士大夫举荐他以茂才任侍仪司舍人，他不愿为官，收拾行囊连夜离去。随父亲寓居盘门，杜门隐居二十年。家贫无积蓄，只有老婢应门，有人来拜访，他就向邻居家借酒，有酒助兴，便高谈阔论，极为豪爽。张士诚占据吴中，曾单独到他家拜访，并对别人说："明卿，高士也，吾之益友。"死后，由张士诚出面，主持了葬仪。他喜爱唐诗，尤其是唐人的近体诗，所作以平实沉毅为特点。与顾瑛是世交，《草堂雅集》有他的 11 首诗。

徐舫去世。享年六十八岁。

徐舫（1299—1366），字方舟，号沧江散人。睦州桐庐（今属浙江）人。少年任侠，好驰马试剑，稍长，翻然改悔，折节读书，治举子业，为文灿然成章。但不久又表示悔悟，说："曷习古歌诗以吟咏性情，庶几少遂其愿耳。"睦州自古是诗人之乡，世称睦州籍诗人为"睦州诗派"[①]，于是徐舫把睦州诗派各家之作一一研读，时间一长，自己的诗也写得很出色。曾出游江、汉、淮、浙之间，与诗坛名流互相切蹉。苏天爵任江浙行省参政，欲荐之，他说："吾诗人尔，其可縻以章绂耶?"竟弃而不顾。"诗人"，是他的自我定位。他苦吟于云烟出没之间，仿佛与世隔绝。元末战乱，更是隐而不出。有《瑶林

① 这个称呼应该是出自《睦州诗派》一书。据谢翱《睦州诗派序》（《晞发集》卷十），在至元三十年时，睦州人翁衡取唐代"自元和至咸通间以诗名凡十人"之诗，编成《睦州诗派》一书。

杂咏》及《沧江散人集》两部诗稿，都未见传。《元诗选》二集选人其诗15首，题为《沧江散人集》。还有《唐诗通考》等。文献中往往将徐舫作为明人，不但收入钱谦益《列朝诗集》等总集，郡志也说他少年时与青田刘基游，明洪武初刘基被征，路经桐庐时邀请徐舫同行，徐舫戴斗笠来见，纵酒赋诗而别。而且《明史》还有其传略[①]。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二的胡翰节，开头就说“明初浙东有徐舫诗派”。这或是因为他与明初的著名文人宋濂、王袆、刘基交往密切所致。

徐舫不但是睦州诗人冠冕，而且是诗在元明之间的津梁。睦州，元属江浙行省建德路。一般又以“浙东”代指包括睦州在内的江浙行省东部区域。自古睦州多诗人，唐有皇甫湜、方干、徐凝、李頎、施肩吾等；宋代有高师鲁、滕元秀等。宋濂在《故人徐方舟墓铭》（《宋文宪集》卷二十四）中，将徐舫视为睦州诗派在元代的传人。这个提法对诗论家影响颇大。宋濂在墓铭中写道：一次天降大雪，徐舫却泛舟独钓寒江，见之者疑其非世间人，并题自己的居室为“沧江书舍”[②]。他是标准的隐士诗人，现存的诗篇几乎全部是山水诗，未见有应酬、干谒之作，这在元代诗人当中（即便是隐士诗人当中）并不多见。

昂吉去世。享年五十岁。

昂吉（1317—1366）[③]，字启文，一作起文。河西唐兀氏，家族入中原后占籍太平（安徽当涂）。汉姓高，名高起文。久在吴中，至正七年中乡试，至正八年进士，授翰林编修，改绍兴路录事司参军，迁池州录事，至正末为福建行省检校官，卒于任所。为人廉谨，寡言笑，出入于吴中诗坛，至正前期不时去玉山草堂拜访顾瑛，是“草堂雅集”的主要参与者之一，顾瑛说他“非独述作可称，其行尤足尚也”（《草堂雅集》卷十）。

赵偕去世。

赵偕（？—1366），字子永，学者称为“宝峰先生”。慈溪（浙江宁波）

---

① 对于这一点，清人顾嗣立在《元诗选》二集的徐舫小传之中，特意做了辩驳。

② 《东山存稿》卷三、《王忠文集》卷五，都有为徐舫“沧江书舍”所作的记。

③ 生年，据唐肃撰《故福建等处行中书省检校官高君墓志铭》（《丹崖集》卷八）序云“至正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七日，福建行省检校官卒于官所”，高君，是指昂吉，因昂吉以高为汉姓。卒年，据墓志铭铭文“起身以儒，五十而殁”推定。唐肃《故福建等处行中书省检校官高君墓志铭》，是墓志铭文体的一个特例：关于生平事迹，仅有百余字（序），全文主要是铭文，铭文篇幅是序的五倍以上。

人。宋朝宗室之后，早年欲攻举子业，及读南宋理学家杨简的《慈湖遗书》，恭默自省，得出“道在是矣，奚事他求”的结论，遂隐居于大宝山之东麓，教授学生，乡里子弟乌斯道兄弟等多从之学。元末社会动乱，县尹陈文昭不时来请益，赵偕则告以治县权宜方略。方国珍据浙东，赵偕以授徒侧身避乱，方国珍一再让他出山做官，坚拒不从。时与二三门人援琴鼓瑟，乡里赖之以安。有《赵宝峰集》二卷。

至正二十七年丁未（1367）

二月。姑苏为朱元璋部围困，吴哲作《丁未二月廿五日西江有感》

吴哲，字子愚，号淡云野人。华亭（今属上海）人。以能诗知名乡里，与陆居仁、董纪相颉颃，所作受到杨维桢、钱惟善诸名家称赏。至正间江南战乱，尝出佐戎幕。归而教授于乡。《大雅集》选录其诗16首，《丁未二月廿五日西江有感》（《大雅集》卷六）① 诗云:“姑苏台上白云飞，城郭人民半是非。方寸有时忘匕箸，梦魂无夜不庭闱。从来北地音书绝，漫恐还家骨肉稀。孝道未全那敢死，暗将孤泪湿征衣。”这是一首“招魂”之作。

元末战乱期间，一些滞留或定居在江南的蒙古色目人，避居杭州与吴中。

苏杭原本繁荣富庶，人烟稠密，被接纳的“外人”早已经是社会的一部分，无论是隐于市朝，还是隐于林薮。这些在苏杭渡过战乱的蒙古色目人，仅见于《录鬼簿续编》的，除了知名度较高的邾经（西夏人）、邾启文父子，杨讷（蒙古人），还有：

丁埜夫，西域人，故元西监生。羡钱塘山水之盛，因而家焉。动作有文，衣冠济楚。善丹青小景，皆取诗意。套数、小令极多，隐语亦佳，驰名寰海。

赛景初，西域人。大父，故元中书左丞；考，浙省平章政事。公天性聪明，姿状丰伟。幼从巎文忠公（按：指康里巎）学书法，极为工妙，文忠深嘉之。后授常熟判官。遭世多故，老于钱塘西湖之滨。

沐仲易，西域人。故元西监生。读书教授。工于诗，尤精书法。乐府、隐语，皆能穷起妙，一时大夫士交口称赞。公貌伟隽，有自赋《大鼻子》〔哨遍〕，又有〔破布衫〕〔要孩儿〕盛行于世。

① 诗题，《大雅集》原作《西江有感》。此据清钱熙彦《元诗选补遗》。

虎伯恭，西域人。与弟伯俭、伯让以孝义相交爱，日以考经行史为事，发明性理之学。诗学韦、柳，字法献、羲。至于乐府、隐语，靡不究意。与余为忘年交，不时买舟载酒，作湖山之游。当时钱塘风流人物，咸以君之昆仲为首指云。

据《录鬼簿续编》，丁埜夫作杂剧5种：《俊憨子》《清风领》《赏西湖》《浙江亭》《双鸾期凤》。赛景初、沐仲易、虎伯恭，没有具体举出作品。

六月。姑苏围城之中，张羽画了一幅题为《怀友图》的水墨山水，并在图后，写下二十三首《怀友诗》。

水墨山水《怀友图》，画的是“遥山密树，溪阁对谈”。画幅之后，是张羽写的诗序：“周道方殷，犹歌伐木。陶情无慕，尚赋停云。况属时艰，久乖朋好。欲摅契阔，实藉篇章。自牛文学而下，得廿三首。因怀成咏，不以齿爵为序。余需续赋，用继末篇。”这是一种特殊的表述，借以表达对已经不在围城之中的友人的追忆与思念。23首五言诗之后，是作者自书跋语：“至正丁未六月一日，苕轩高士过余，命书敝作《怀友诗》。时天气郁暑，时事纷纷，极无欢悰。姑此塞命，少暇当别缮写。浔阳张羽顿首苕轩高士先生。”——除了留在记忆中的往日情怀，诗人已经一无所有。而友朋相聚，也只能期待于“遥山密树，溪阁对谈”的世外桃源。通过长达23首的组诗，张羽表达的是对世事的极度失望。这二十三位友人是：牛谅、冯允实、王钦、韩桐、莘野、周复、陈恂、陈尧咨、莫士安、方彝、年鲁、叶广居、唐肃、安处善、宇文材、朱武、董在、倪瓒、释怀渭、沈梦麟、胡铉、潘牧、李讷。他们大都是至正后期相当活跃的吴中诗人，他们的共同特点之一，是极少有人曾出入于顾瑛的玉山草堂。也就是说，属于年辈较晚（除张复、倪瓒等之外）或是名气较低者。除张羽自己以及牛谅、叶广居、唐肃、沈梦麟、倪瓒等不多的几人，其他则淹没在元明易代的长期战乱中。

除《怀友诗》23首之外，张羽还写有《续怀友诗》5首[1]，《续怀友诗》也有小序。小序中，他回顾了自己“在吴围城中作《怀友诗》二十三首”的起因，并写了对在战乱中结识的、“流连诗酒间，若不知有风尘之警”的志同道合者的追思，而这五个人在大乱始定时，却“或谪或隐，各相暌离”，他们是：余尧臣、杨基、王行、高启、徐贲。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四人并称“吴中四士”，是明初诗坛冠冕，论者方之“初唐四杰”。可以说，张

---

[1] 前见《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合编》4册1010页，并见于《式古堂书画汇考》《铁网珊瑚》等书。后见《静庵集》卷一。

羽与这近三十位共同经历了元明之际战乱的文人，最大的愿望是到达彼岸世界，但彼岸世界还不是他们劫难的终点。张羽与他所思念的友人入明之后的处境分别是：

张羽于洪武十五年授太常司丞。几年后，坐事谪岭南，途中奉召还京，自以为不免一死，竟投龙江自尽。

杨基任荥阳知县，累官山西按察使。以故罢官谪服劳役，瘐死工所。

高启因为替新的苏州府衙写《上梁文》事，被腰斩。

徐贲累官河南布政使，以对过境的军队犒劳不及时，死于狱中。

王行受开国功臣、凉国公蓝玉特别器重，馆于其家，数以兵法说蓝玉。蓝玉被诛，王行父子俱为其株连而死。

余尧臣在明初例谪濠梁，不久放还，授新郑丞。以后在会稽郊区结茅隐居。

除余尧臣，可以说没有一人得以善终。

“北郭十友”也罢，“吴中四士”也罢，他们都是元明易代之际的年轻一代文人，与顾瑛玉山草堂的诗友们，与追随杨维桢唱和《西湖竹枝词》的南北文人们相比，他们本有更多的选择。这些才华横溢的人，没有为历史潮流所淹没，但他们经历的与他们得到的却并不相称。

七月。姑苏陷落，张士诚为朱元璋攻灭。

姑苏城即将陷落时，张士诚将其亲族聚拢在齐云楼，举火自焚。张士诚自己却没有死在城破之际，为明军擒获。处在他的割据下，文人心情复杂。瞿佑《归田诗话》（卷下《哀姑苏》）说：“该张氏据有浙西富饶之地，而好养士。凡不得志于前元者，争趋附之，美官丰禄，富贵赫然。”可当生死存亡之际，竟然无一人死难，“武夫健将，惟束手卖降而已”。在他败亡之前，民间有一首散曲（“北乐府”）讥讽他的官员们：

> 皂罗辫儿紧扎梢，头戴方檐帽。穿领阔袖衫，坐个四人轿：又是张吴王米虫儿来到了。

他败亡之后，杨维桢写了《蔡叶行》《周铁星》等“新乐府”诗[1]，王逢写了《刘夫人》《闻吴门消息》[2] 等叙事诗，以咏时事。

---

① 均见《铁崖逸编注》卷二。

② 均见《梧溪集》卷四下。

七月。马玉麟死于平江城陷落之际，临终前做《丁未遗墨》。

当时马玉麟已经决心以死相殉，仰药而卧，仆从想扶他起来拜见刚刚入城的朱元璋部的总兵官，他却说:“我疾不能屈膝矣。”吴中文人中，真正对张士诚兄弟有影响的，就是马玉麟与陈基。

马玉麟（？—1367），字国瑞（一作字谷璲），又字伯祥，号东皋道人。海陵（江苏泰州）人。幼有诗才，被称为“奇童”，早年“昼经夜史、枕藉不厌”（王逊《东皋先生传》）。荐授赣榆儒学教谕，不久因母丧去职。张士诚占据吴郡，降元拜太尉，开府平江，辟马玉麟为太尉府掾史，升长洲县尹，官至江浙行省员外郎。作为周伯琦的助手，力图效忠元室。丞相达识帖木儿甚至说:“分省有马员外，事无忧也!”又升为郎中，改平江路总管，再升江浙行省参政。他曾上疏数千言，张士诚未加理会，忧愤成疾。明军攻破平江，他赋诗明志，说“囊中短疏成遗恨，身后佳名愧昔贤。玉石俱焚嗟此日，中原消息尚茫然”，就服毒自杀了。马玉麟在元末与王逢、倪瓒交往密切，而且早有诗名，有《东皋诗集》（即《东皋先生诗》）五卷，编成于至正二十五六年间，本集最后一首诗为《丁未遗墨》，丁未是至正二十七年，是年明军攻破平江，马玉麟作诗，仰药而死。《丁未遗墨》系七律、七绝各一首，是绝命诗。这两首诗当系明洪武年间由后人补入集中。

张士诚败亡，饶介亦被俘，卒于姑苏。

饶介（？—1367），字介之，自号华盖山樵、浮丘公童子，又号醉翁、醉樵、芥叟。临川人。诗人丁复之婿，并为丁复编订遗作。为人倜傥豪放，由翰林应奉出为浙西佥宪，累官淮南行省参政。至正中，张士诚据吴，杜门不出，张士诚慕其名，强起之，仍官参政。家于采莲泾上，日以觞咏为事。张士诚败亡，饶介亦死。早有诗文名，并善草书，在至正后期，时名颇高。释道衍评论饶介说：书似怀素，诗似李白，气焰光芒，煜煜逼人。但又为其志大才疏，终无所成，深表婉惜。

从江南“沦陷区”潜往在扩廓帖木儿治下的山东的陈高，去世于客寓之中。

陈高（1315—1367），字子上，号不系舟渔者。温州平阳（今属浙江）人。至正十四年进士，授庆元路录事，任职未满三年，弃官而去。方国珍据浙东，想招纳陈高为幕僚，但未如愿，又任为慈溪县尹，也没有就职。平阳城陷落，他弃家往来于闽浙间。至正二十六年春，浮海到达山东，谒见了元朝的河南王扩廓帖木儿（王保保），扩廓帖木儿是朱元璋惟一敬畏的元朝大

将，在元明易代的战争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陈高向扩廓帖木儿密论江南虚实军情，扩廓帖木儿很高兴，准备重用，但他却因病去世。陈高作举子时就有时名，在京师受到欧阳玄、张翥、贡师泰、程文的器重。他审度时局，看到江南形势已于元廷不利，又毅然浮海北上，对元相当忠诚，在江南文人中，陈高与戴良都是具有影响力而且矢志不移地为元廷能保有江南而献身者。明初苏伯衡访得陈高遗作，编为《子上存稿》刊行于世，但已不见传。今存陈高《不系舟渔集》十五卷。



陈高像。出自陈氏族谱。古人的画像大多出于想象，但人们将陈高「想象」成如此儒雅，却颇奇怪。他与戴良是对元明易代最不能接受的诗人，其激烈程度远远超出一般「遗民」之上。

至正后期对朝政有影响力的江南籍大臣李士瞻去世。享年五十五岁。

李士瞻（1313—1367），字彦闻。祖籍南阳（今属河南），后徙荆门（今属湖北），久寓大都（北京市）。至正初，以布衣之士受到公卿的接待，聘为知印。至正十年领乡荐，改任广源库知事，再任中书省掾。除刑部主事，迁枢密院经历，历升至户部尚书。出督福建海漕，并拜行省左丞。奉召入朝参议中书省事，进参知政事，改任枢密副使、翰林学士承旨。封楚国公。至正二十七年去世，他的死，是元朝国运终结的征兆。李士瞻有经济之才，襟度弘远，是元末政界有影响的人物，为维系元朝国运竭尽其力。有《经济集》六卷，今存。诗文多表达忧国之思，较有感染力。其子李延兴（即李继本）也是元明之间的诗文家，有《一山集》。《经济集》与李延兴的《一山集》，都是后裔李伸所编，曾题为《济美集》合刊行世。李士瞻遗作“烽火之余，仅存什一于千百中”（《经济集》李伸序）。他的文章主要是往来柬札，多达七十通，几乎占全书一半篇幅。《四库全书总目》评李士瞻的书信说：“虽多一时酬答之作，而当时朝政之姑息，兵事之乖方，藩臣之跋扈，多可藉以考见。其弥缝匡救，委曲周旋，拳拳忧国之忱，亦不在所上《时政疏》下。”他的诗主要是七律，约占诗作半数。

刘仁本为朱元璋部俘获，死于酷刑。

方国珍占据温、台，刘仁本入方国珍幕府。方国珍从海路为元朝运粮，实由刘仁本主持其事。明将朱亮祖攻占温州，捕刘仁本，押赴行在，朱元璋数其罪，鞭背溃烂而死。原来朱元璋曾保证方国珍及属下凡归顺就不杀，但一见刘仁本立即食言。刘仁本早有诗文名，在浙东与廼贤、谢理、盛熙明、朱右等人过密切，影响较大。诗文集有《亦玄集》《羽庭诗稿》等，都已亡佚。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刘仁本诗文，重编为《羽庭集》六卷（原题《亦玄集》之作也包括在内）。由于诗文集早佚，刘仁本很少受到诗选家、诗评家的注意。

身经战乱，魏寿延将友朋唱和投赠之作结为一编，题作《敦交集》，以示珍重。

《敦交集》共收24位作者所写的76首诗，都是与魏寿延酬答唱和之作。魏寿延，字仲远，别号竹深。上虞（今属浙江）人。有诗名，主要活动于元末，被称为“处士”“高隐”。王冕、张翥、宋濂等文集中皆有与其往还之作。魏寿延明初仍在世，仍居住在县城西四十里的山麓。宋濂曾为他的见山楼作记，在《见山楼记》[1] 中，宋濂说:“夫自辛卯兵兴，阖庐所在，往往荡为灰烬。狐狸昼舞，鬼磷宵发，悲风翛然袭人，君子每为之永慨。自非真人龙兴，拨乱世而反之正，含齿戴发之氓，孰不在枯鱼之肆哉？纵有佳山日在眉睫间，将不暇见之矣。”编辑这些作品成集，是怕它们被遗忘散乱于战乱中，当然也是担心自己在战乱之际为友人忘记。

元明之际一些文人死于乱离之际，其中有杨铸、钱应庚。

杨铸，字季子。南昌进贤（今属江西）人。杨镒之弟。至正初年北游京师，以荐入史馆为校勘。修史事毕，调唐兀卫教授。历德庆路知事、广东帅府都事，除中书检校。至正后期朝廷遣使经略江南，辟为从事。行至闽中，一病不起。工诗。王祎《杨季子诗序》（《王忠文集》卷二）认为：杨铸承家学，所为诗体裁风致醇厚典则，浸淫乎汉魏。死于异乡后，所作《杨季子诗集》三卷散失不传。

钱应庚，字南金。松江（上海华亭）人。曲家钱抱素（钱霖）之弟。元末战乱中隐于乡，以诗词知名乡里。曾久在淀湖谢氏作馆。与邵亨贞、徐一夔等唱和交游，徐一夔并为其诗集作《钱南金诗稿序》（《始丰稿》卷三）。

---

[1] 《见山楼记》见《宋文宪集》卷七。

至正二十八年戊申（1368）[1]

三月。大都文坛的领袖人物张翥死于寓所。

张翥（1287—1368），字仲举，号蜕庵。晋宁（山西临汾）人。父亲在江南为吏，自幼随父生活在南方。受业于江东大儒李存，又从仇远学诗，以诗文知名。后至元末，年逾六十以"隐逸"荐，为国子监助教，分教上都生员。任满，退居淮东。至正初，与修辽、金、宋三史，书成，历任翰林应奉、修撰、直学士、侍讲学士，迁太常博士。仕至翰林侍读学士、国子监祭酒，以翰林学士承旨致仕，封潞国公。致仕后，寄居大都，对朝政仍有影响。至正二十八年三月去世，几个月后，明大将军徐达即挥师占据元京。他是北方人，却在南方度过了求学写作的前半生。后半生基本在大都翰林院任职，经历了整个围城时期。在大都二十几年，是诗坛核心。与危素、廼贤、释大梓、李升、陈肃等，维持了一个无视世事的环境，与大都以外的文坛联系广泛。他是贯穿元前后期的诗人，也是打破南北地域分野的诗人。身在江南，而不受"铁崖体"影响；任职朝中，则没有熏染馆阁气息。与大都文坛共终始，使他得以高据元代文学史前排位置。

可以说，张翥之死启动了大都文坛终结过程。至正二十八年，张翥八十二岁。几年前他就说："区区衰年近八十，去岁山妻去世，今惟一女，甫十一岁，行影零丁。虽与致仕，而带职仍故，凡制作典章、大事议论，独许与闻。乃不得飘然南归，首丘山中。"[2] 而他女儿，也在他去世之前死去[3]。他死后不久，大都易主，"其薨也，卜地燕京城南而安厝，北山（按：即释大梓）之力居多。"

释大梓（或来梓），又名大杍，号北山。是大都文坛颇关键的人物。庐陵（江西吉安）人。早年受业衡山福岩寺，游燕京三十年，住持城南报恩寺，"虽佛之徒，而喜从吾儒者游。与公（张翥）交最善"（苏伯衡《苏平仲集》卷五《张潞国诗集序》）。大梓不但为张翥营葬，还保存了其诗文稿，大都落入明军之手，大梓立即携带张翥遗稿还归江南。在洪武十年（1378）刊

① 本年与洪武元年重合。

② 见《澹游集》卷下，张翥《蒲庵记》附记。

③ 苏伯衡《苏平仲集》卷五《张潞国诗集序》云：张翥无子，去世前"一女亦先卒"。

刻了张翥《蜕庵集》四卷[1]。

五月十一日。出参桑哥实里军的廼贤，死于东蓟州军中。

张翥死时，廼贤已不在大都，此前被派往枢密院同知桑哥实里军中，任从事官。桑哥实里所部驻守蓟州，与大都守军成犄角之势，也为了接应海运物资，保护海港直沽。因老病廼贤艰于军旅，日以为忧，在军中，他携带未定稿的诗集《海云清啸集》时时批阅。李升[2]到蓟州军前时，廼贤刚中风，庸医误以为伤寒，"以顺气汤下之"，以致大小便失禁，而且失语。此时，朝命下达，擢廼贤为著作郎，但他只能"含糊微笑"。张翥死后仅两个月——五月十一日，他死在军中。由于明军日益迫近，草草棺殓，葬于静明寺栖霞亭附近的松林。死时，身边没有家人环绕，由诗友李升、陈肃[3]、大梓等陪伴。大梓从廼贤遗物中取走几种书籍《事文类聚》《文献通考》，而衣物则分赠给军士。李升取走廼贤诗集《海云清啸集》[4]。只是，他未能将《海云清啸集》刊行于江南。廼贤死后，军队就换防了，他的葬地也为易代而无封植可寻。



李升用过的印章。

廼贤死后，陈肃也死在与明北伐军对垒的军旅之中。

陈肃（？—1368），字伯将。无锡（今属江苏）人。元进士，举博学鸿才，仕为兰溪州判官，累迁翰林学士、兵部尚书、河南行省左丞。至正十一年受任行军司马参将，至正二十八年/明洪武元年，陈肃在东蓟州军中，卒于元明易代之际。他的死是大都陷落的先兆。《录鬼簿续编》收入陈肃，并在小传中说:"文章政事，一代典型。和曲填词，乃其余事。打球蹴鞠，举世服

---

① 今存张翥《蜕庵集》有四卷、五卷两种，前者存诗594首；后者519首。但二者都出自大梓所录。

② 李升，字子云，号紫筼生，诗文家、书画家。是大都文坛的活跃人物，入明，以元朝故官被流放临濠。

③ 陈肃，是诗人、元曲家，所作散失，《元诗选》三集有其《伯将集》，存诗16首，主要是据偶桓《乾坤清气》辑成。

④ 据郑真《荥阳外史集》卷九十八《濠梁录》。郑真明言，以上情况都直接得自目击者李升的回忆。据《荥阳外史集》，廼贤除《海云清啸集》，还有另一种诗集《铙歌集》，他死后，两种诗集都被人带回江南，但均未见传本。估计前者是至正二十四年代祀南海前后所作；后者是大都陷落前在军旅中所写。

之。卒于军前，营中将士，无不恸哭。”仅知作杂剧一种《晋刘阮误入天台》，今不存。陈肃与戴良、张翥、廼贤等有诗文往还。

除张翥、廼贤、陈肃，大都陷落时赴死的诗文家还有黄㝷、庆童、陈祖仁等。

陈祖仁（1314—1368），字子山。汴梁（河南开封）人。至正二年左榜进士第一，授翰林修撰，历太庙署令、太常博士，迁翰林修撰，升翰林侍讲，除中书参议。至正二十三年出为甘肃参政，四转为翰林学士，改太常院使。大都城破，死于乱兵中。王逢作《闻台中丞陈子山死节兼怀陈东流》诗（《梧溪集》卷六），表示哀悼。诗文均有时名，但死后所作散失。

闰七月。元临川人张佶起笔撰写日记——《北巡私记》。

这部日记的开篇，就是七月二十八日夜晚在大内清宁殿的最后一场元廷君臣议事。议事的主题竟是：面对明北伐军兵临城下，逃归蒙古草地是不是惟一可行之计。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沉潜于元史的柯劭忞，购得独山莫氏藏书，并发现了一件珍贵文献：元临川人张佶的笔记《北巡私记》。他将这视为“平生第一幸事”[①]，因为笔记记述的是至正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夜元顺帝决计北遁的经过以及追随北元皇室在漠北几年间的经历。这历来是备受史家关注、而又缺失的内容。张佶时任枢密院属官，是整个过程的亲历者。笔记这样开篇：“至正二十八年闰七月二十八日，惠宗皇帝御清宁殿，召见群臣，谕以巡幸上都。皆屏息无一言，独知枢密院事哈剌章公力言不可，大意谓：贼已陷通州，若车驾一出，都城立不可保，金宣宗南奔之事可为殷鉴……。”但元顺帝去意已定。是夜，夜漏三下，车驾匆忙出建德门北走。关于元顺帝有许多传说，其中一个说他实际是南宋皇室后裔。据说他还是“不嗜酒，善书画，又善观天文”的人。

追随元顺帝（即元惠宗）北遁者百余人，有知枢密院事哈剌章、枢密院属官张佶。哈剌章，即元曲家、诗人金元素[②]。金元素最终“随元驾北去，不知所终”，其子（也是元曲家）金文石“因其父北去，忧心成疾，卒于金陵”[③]。金元素本名哈剌，西域拂林人，也里可温，入京任职前，任江浙参政，在江南所作诗篇曾结为《南游寓兴》。但入京后情况不详，所作也未见

---

① 《北巡私记》（见《云窗丛刻》丛书）柯劭忞跋。柯氏将笔记作者著录为“临川刘佶”，然而笔记中作者自云，名为张佶。

② 参见《元西域诗人群体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第 3 章第 4 节。

③ 见《录鬼簿续编》。

流传。这一走，永远离开了研究者视野。而张佶，以一部无意流传下来的、记录大都最后一刻情况的“私记”，代大都文坛封笔。

不知为什么，至正年间那则元世祖定都北京时“思太祖创业艰难”，从蒙古故地移植沙生青草于“大内丹墀之前”的故事，突然不胫而走。民间所传柯九思《宫词》和大司农达不花《宫词》都有咏“誓俭草”之作，而且连文辞都大同小异，简直就是“抄袭”。元人张昱《辇下曲》[1] 也就此写了内容相似的一首绝句。元亡后，诗人王逢在追念胜国故主时，其《后无题五首》其四[2]也说:“君心不隔丹墀草，祖誓无忘黑水河。”可见在元明之际，朝野都将所谓“誓俭草”（或作“示俭草”[3]）作为元朝国运的象征。浙西奇人叶子奇于明初系狱，在黑牢里开始撰写《草木子》。《草木子》记录了众多的元亡征兆，也写下“誓俭草”本事。这都说明，元朝从未融入中原文明的那一部分已经意识到返回草原故地是大势所趋。

夏季，朱元璋的北伐大军已日益逼近元都。明军一路如摧枯拉朽，势不

可挡，大都指日可下。《元史·顺帝本纪》所载大都失守前的情况有:

> 秋七月，癸酉，京城红气满空，如火照人，自旦至辰方息。乙亥，京城黑气起，百步内不见人，从寅至巳方消。
>
> 闰七月，壬午，白虹贯日；乙丑，白虹贯日。

“白虹贯日”自古就是君主将遇危险的天象警示，先秦刺客聂政、荆轲行刺时均有“白虹贯日”天象出现。《元史》是成于换代之初的史书，或有附会之嫌。但野史《草木子》卷三上也记录了大都失陷前的不祥之兆:“元京未陷数日前，有一饿鸱鸣端明殿上，作‘灭胡’之声。帝命善射者射之，终莫能中。”更典型的一则纪事是:

> 庚申帝召文武百官军民，议战守之计。迟明，会议端明殿。及开门，忽有二狐自殿上出。帝见叹且泣曰:“宫禁严密，此物何得至此？殆天所以告朕。朕其可留哉！朕不可复作徽钦衔璧求活，为天下笑！”即命北狩。未三日，元京遂没。

---

[1] 见《张光弼诗集》卷三。这组《辇下曲》其实就是《宫词》。

[2] 见《梧溪集》卷四下。

[3] 《析津志辑佚》（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第 230 页“物产”说:“示俭草，在大明殿下，丹墀之东。以米栏护之。世皇旨。”

元顺帝终于决定离开巍峨的宫阙，回到青草没膝，狐兔出没的故乡，以避明军兵锋。据说元顺帝写过《答明主》[1] 诗："金陵使者过江来，漠漠风烟一道开。王气有时还自息，皇恩无处不周回。莫言率土皆王化，且喜江南有俊才。归去丁宁频属付，春风先到凤皇台。"据《剪胜野闻》说，这首诗的背景是："元君既遁，留兵开平，犹有觊觎之志。太祖遣使驰书，明示祸福，因答诗云云。"虽然没有反证，但这几乎不可能是元顺帝所写的，尽管他确实可以写汉语的诗篇。

八月二日。明军入踞大都。元亡。

从此，元不复存在，元顺帝置换成北元第一个君主。围城时期的大都文人的结局不外是赴死、归降、逃离，难说那个结局更好。逃离大都的，还有大梓。正是他的"逃离"，张翥才是一个"完整的"诗人，最后的大都文坛，才有了更权威的见证与较多的鲜活内容。大都易主之际，"围城"期间活动在大都的文人们，除死节者，更多的是归顺了新朝。代表人物有危素与张以宁、曾坚、李升。至正年间，危素在江南文人中人望颇高。元最后的十年间，他一直在大都。至正二十年累迁中书参政，二十四年拜翰林学士承旨，他不愿出任岭北行省左丞，弃职闲居京郊房山。四年后，大都形势危殆，元顺帝决意北遁，命淮王帖木儿不花、色目人庆童留守。顺帝离去后，帖木儿不花立即以翰林学士起危素于房山，危素刚进城，明军也接踵而至。危素赶到城内的居所报恩寺，置官帽于水井旁，"两手据井口，身将就沉"，报恩寺僧大梓（又是大梓）大呼："公毋死！公毋死！公不禄食四年矣，非居位比。且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之史也！"将危素救起于井口[2]。为与危素作比较，应该提到另一个投井以殉的黄哻。京城陷落，黄哻召仆人张午吩咐：要他将自己的尸骨送还家乡，说完就"解衣，投居贤坊井"，张午"仓皇大恸，拾级下救之"。从水中捞出尚未淹死的黄哻，张午唏嘘着说："今南兵宾礼儒臣，可幸无事。"又说："为国尽忠，未闻以小官儿死社稷也！"他叫人环守在黄哻身旁，怕他再寻短见。到太阳平西时分，黄哻将张午支开，乘其他人稍倦不备，再次赴井死[3]。

除了张翥等人，在大都易主之际活动于大都文坛的诗文家有南人曾坚、潘迪、黄哻、毛元庆、孙予初等，汉人胡益、张桢、贾俞等，也有蒙古色目

---

① 诗题，《御选元诗》《元诗选》等均作《赠吴王》。这等于说：元顺帝并不承认朱元璋的地位。但吴王也是朱元璋自己所封。

② 宋濂《宋学士文集》卷五十九《危公新墓碑铭》。

③ 〔康熙〕《金溪县志》卷五，黄哻传。

人金元素、庆童、雅理、廉子祐、邬密执理等。大都文人们的代表性不成问题。这些人都是当朝精英，本应流芳史册，只是时逢改朝换代，他们又站在了失败的一方，才几乎不为人所知。大都最终陷落，文献典籍散乱，人物星散。新朝百废待举，提起这些最后一刻为元“殉葬”的人不但不合时宜，还会触犯忌讳。但文学史上，这些人应该有一席位置。

危素、张以宁、曾坚等人已仕于新朝，都该是《明史》列传的传主了。可作为文学家，他们仍属于元。同是归附的元朝故官，同被集中到金陵，李升在甄别中未能过关，被流放临濠。明初流放地临濠，则是大都文坛的归宿地之一。

文坛神秘人物大梓，在大都陷落前的活动值得注意。他始终隐显于生死、荣辱之间，并额外“负担”起结系主要研究对象的作用：至正二十八年三月，张翥死，大梓办理后事；五月十一日，迺贤中风死于京东军前，大梓竟也始终在场；八月二日，黄哻两次投井，以身殉国，居然是“同知溯州事陈介、北山僧梓共营葬事，以其月某日瘗于西山，且刻石记之。”[①] 八月三日，报恩寺僧大梓以保存国史的理由，活危素于井栏前。——这个住持报恩寺的诗僧大梓，成了大都文坛（也是元代文坛）的“殡葬人”[②]。

王逄作《无题五首》《后无题五首》[③]，成为元廷退出中原的挽歌。

元末长期动乱时，王逢与战火保持合理的距离。明初，他将自己与退归漠北的元朝皇室用诗篇结系在一起。钱谦益在《列朝诗集》中评述说:“《无题》前后十首，皆感悼王师入燕，庚申北狩之事。”“前后《无题》十首，伤庚申之北遁，哀王孙之见俘。故国旧君之思，可谓至于此极矣。”钱谦益是超一流的诗评家，他一面批评这些诗“狂悖”，但又将其尽数录入《列朝诗集》。

---

① 宋濂《元故翰林待制黄殷士墓碑》（明洪武十年郑济刻本《宋学士文粹》）。这篇墓碑没有收入《宋文宪集》，因此也不见于《元人传记资料索引》。

② 释大梓，即“梓北山”；也就是释大杼——杼北山。他是元明之际影响颇广的释子。在元明诗史的接续上，他相当关键。至正二十八年，西域葛逻禄诗人迺贤死在东蓟州军前时，他也在场，并为迺贤处置了后事。张翥死后，就是他冒着明军随时会入城，致使玉石俱焚的险情，搜集了张翥的遗稿，并带到江南，在明初编辑出版了张翥的《蜕庵集》。这个梓北山是个颇为神秘的人物，在原始文献之中罕见他的传记资料，但在《余姚海堤集》卷四，他自署为“庐陵”人。

③ 均见《梧溪集》卷四下。

年仅三十四岁的丁鹤年，作《自咏十律》，表述自己在元末战乱中的感怀以及对新生活的企盼。

《自咏十律》（《四库全书》本《鹤年诗集》卷二）诗云：

长淮横溃祸非轻，坐见中流砥柱倾。太守九江先效死，诸公四海尚偷生。风云意气惭豪杰，雨露恩荣负圣明。一望神州一搔首，天南天北若为情。

腐儒避地海东偏，凤历颁春下九天。再拜帝尧新正朔，永怀神禹旧山川。庙堂久托君臣契，藩阃兼操将相权。只在忠良勤翊戴，万方行睹至元年。

一夜西风到海滨，楼船东出海扬尘。坐惭黄歇三千客，死慕田横五百人。纪岁自应书甲子，朝元谁共守庚申。悲歌抚罢龙泉剑，独立苍溟望北辰。

羲轩道德久荒唐，荡荡宏图起世皇。天入清都逾广大，日临化国倍舒长。渥洼万里来骐骥，阿阁千年下凤凰。圣子神孙承宝祚，长令亿兆乐时康。

堂堂至正最多材，万国同文寿域开。漠北诸生登第去，越南计吏进贤来。凤韶九奏黄金殿，鹤驾三朝白玉台。回首黄尘扬碧海，五云无处觅蓬莱。

金银宫阙五云乡，曾见群仙奏玉皇。济济夔龙兴礼乐，桓桓方虎靖封疆。自沦碣石沧溟底，谁索玄珠赤水旁。独有遗民负悲愤，草间忍死待宣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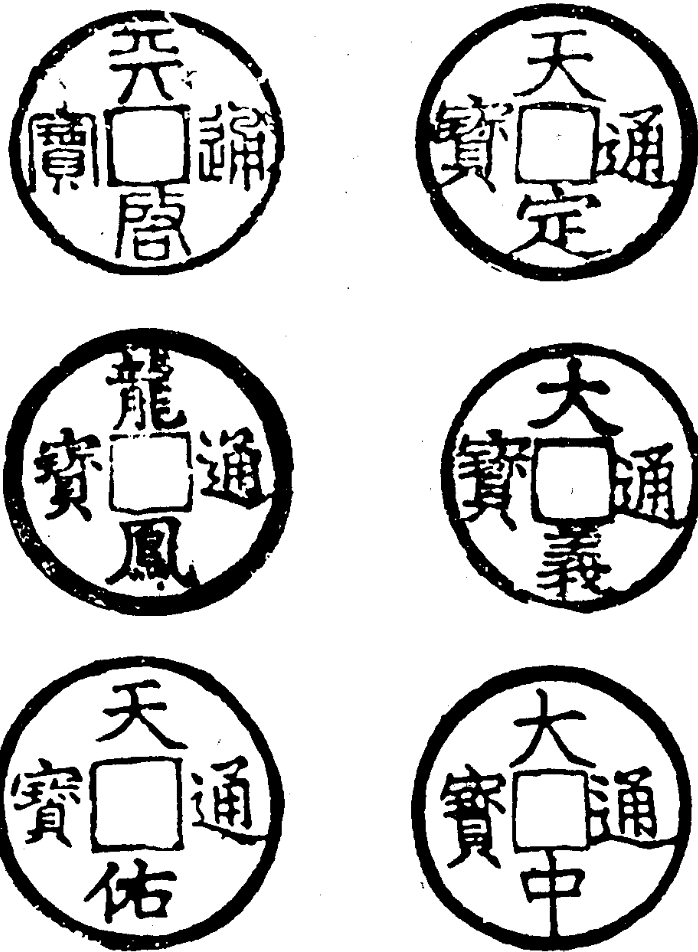
千官何处扈宸游，回首风尘遍九州。黄竹雪深迷玉辇，苍梧云断见珠丘。令威不尽去家怨，精卫岂胜填海愁。大禹胼胝天所眷，肯教纶邑久淹留。

六军遥驻黑河濆，故国丘墟讵忍闻。露冷金铜应独泣，火炎玉石竟俱焚。虞渊日暮无还景，禹穴秋深有断云。草泽遗民今白发，凭高无奈思纷纷。

皇天辅德本无亲，兴复宁论地与民。纶有一成终祀夏，楚虽三户竟亡秦。昆虫咸被生成德，草木犹怀化育仁。洪运未移神器在，周宣汉武果何人。

九鼎神州竟陆沉，偷生江海复山林。频烦谁在隆中顾，憔悴唯余泽畔吟。啮雪心危天日远，看云泪尽岁时深。百年家国无穷事，可得忘机老汉阴。

读了这一组诗，就如同经历过一次轮回。



元末，纸钞已经成了过街老鼠。地方割据政权纷纷铸造了在自己辖区通行的铜钱。“天启”是徐寿辉铸，“天定”也是。“龙凤”是韩林儿铸。“大义”是陈友谅铸。“天佑”是张士诚铸。“大中”是朱元璋铸。

俞希鲁去世。享年九十岁。

俞希鲁（1279—1368），字用中。丹徒（江苏镇江）人。俞德邻之子，俞庸之弟。举授处州独峰书院山长，移饶州长芗书院，除庆元路儒学教授，擢归安县丞，升江山县尹，秩满，改永康。所在皆著治迹，至正十七年以松江府同知致仕。他学业浩博，淹贯群籍，宋濂视为先辈。乡里碑碣，多所撰述。有《竹素钩悬》二十卷、《听雨轩集》二十卷等，均未见传。诗文传世不多，所著《至顺镇江志》二十一卷是元代地方志中的名著。

俞希鲁生年是南宋最后一年祥兴二年，其卒已是至正二十八年/明洪武元年。享年与元朝兴亡完全重合。





【后　录】



洪武元年（1368）—永乐二十二年（1424）



洪武元年戊申（1368）

避居永新的李祁已经不属于旧朝，也不愿接受新朝。入明，生活寂寞无着，其生死已不为人知。

在至正初，李祁一度相当著名。长期战乱中，他对改朝换代相当不适应。他的《汪子文诗集序》（《云阳集》卷三）通篇是愤世嫉俗，但对于一个被时代遗忘的“前进士”，也并不过分。《汪子文诗集序》全文不长：

> 诗道之废久矣。黄尘涨天，黑风倒海，士君子救死偷生之不暇，而奚暇与言诗哉？羁寒牢落中，偶得与新安汪子文相遇旅邸。听其言，既可竦敬，解其装，复得所著吟稿一编。人情物理，俯仰变态，无所不有，亦无不可爱。最后，乃得《与程甥论诗》云：“近来熟读草堂诗，终日沉吟夜复思。雅淡之中见奇崛，艰危已历出平夷。笔端欲革从前弊，胸次当如太古时。始悟少年颠劣甚，长歌短咏墨淋漓。”如此霜林乔木，收英敛华，而苍然之色，凛乎有不可犯者。以此论诗，虽古人复兴，不易其言矣，而予又奚辞哉？又奚辞哉！三叹之余，书此为识。

在李祁心目中，“诗道之废”是乱世象征。

闰七月。李祁流落异乡，成为最早的死于明的元代遗民诗文家。[1]

李祁（1299—1368），字一初，号希蘧，又号危行翁、不二老人。茶陵（今属湖南）人。元统元年左榜进士第二，授翰林应奉文字，次年以丁父忧还乡。终服，以母老求就养于江南，得授婺源州同知。至正四年升江浙行省儒学副提举，因母亲去世而解职，寓居吴中，暂住文正书院。又授江西肃政廉访使，但那时江西为兵乱波及，道路梗阻，不能就任，便隐居江西永新山中。明兵至永新，李祁被砍伤，僵于道旁，千户俞子茂救护了他，并以礼待之。李祁死后，由俞子茂汇辑遗文，刊刻了《云阳集》十卷。李祁是至死仍忠于元朝的遗民，他与余阙是同年同榜进士，曾为余阙《青阳集》作序，常以不能如余阙那样效死军前为恨。他死于元顺帝放弃大都返回漠北的时刻。

十一月。大明从金陵向邻国高丽派出的第一个使团，由色目人偰斯率领。

明定鼎金陵，并将元廷驱逐出大都，已经当之无愧地“承继大统”。高丽与元关系特殊，而北元仍在应昌，于是处理与高丽的关系就排到议事日程上来。作为归附不数年的西域色目人，选择偰斯出使，与其家族背景有关。偰斯是著名的华化家族高昌偰氏入居中原的第六代，偰哲笃之子，偰逊的弟弟。在他出使时，他的族人（长兄一支）已经是高丽国的臣民：自偰逊在至正中期入居高丽，被封为高昌郡公，目前已经定居在庆州，他的儿子偰长寿，是高丽国有影响的人物。这样，在高昌偰氏就站在了国界的两边。

偰斯，字公文，原名偰吉思；偰逊，字公远，原名偰伯僚。自其祖父偰文质起，便定居溧阳（今属江苏）。至正末，偰斯仕元为嘉定知州，至正末归附朱元璋。本次出使高丽还朝，受到朱元璋信任，并于次年再次出使高丽。历任知泰安州、河间府，以山西布政使入为吏部尚书，后以礼部尚书致仕。

十一月。年已六十岁的邵亨贞在仲冬之际冲寒扶惫踏上路途，前往新朝首都金陵。

此行的具体收获是一组（十四首）五言古诗[2]。这组诗的题目，就是此行的动机：“戊申仲冬，儿颖为馆人所连，得罪系狱。朋游咸谓，必老夫叫阍乃可昭雪。由是，冲寒扶惫戒途，凡越旬，始抵石城。道间记所见，得诗如左。”与这场突然降临的大雪一样使人产生苦寒之意的，是新朝毫不容情的苛酷刑罚。金陵是此行的终点，也是新朝的起点。邵亨贞将一生前六十年遗

① 李祁卒年，据明人刘崧《槎翁集》卷十五《故提举李公哀辞》。

② 见《蚁术诗选》卷一。

留在身后，去金陵“叫阍”，因为儿子的冤情要在那儿解决。舐犊情深的老父亲，就这样动启程了，此后，《澱湖》《吴门》《新安镇》《沙湖》……在十天之间一直写到（走到）《金陵》。到达金陵，正是亭午时分，寒雾初敛，红日当头，诗人笔下的《金陵》是：

亭午寒雾收，日色渐昭晰。行此既迢递，身世任曲折。四顾远近间，群峰俨环列。峨峨石头城，形胜天地设。龙虎相踞盘，王气故不辍。钟山一卷石，迥与他阜别。山川无情物，往往随变灭。粤从典午来，禹迹屡割裂。岂不祈永延，中自仁义缺。是知王伯资，初步恃险绝。谁其罪真宰，惆怅还结舌。白首匪壮游，吊古粗可悦。唐虞彼何时，长叹肝肺热。

他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他不知道是不是由自己——长者、父亲出面讼冤，真的能减轻儿子的刑罚，他也不知道唐虞盛世是不是真的再次出现。但他已经没有问题了：面对冉冉升起的红日，一切为寒雾遮掩的角落都清晰可辨。

朱元璋召张昱到京师，见他老态龙钟，说:“可闲矣!”厚赐遣还。

从此，张昱便以“可闲老人”为号。归老于西湖山水间，卒年八十三岁。

张昱，字光弼，号一笑居士。庐陵（江西吉安）人。早年师事虞集，得其诗法。元至正年间，江浙行省左丞杨完者委任参谋军府事，迁左右司员外郎，行枢密院判官。杨完者死，张昱弃官而去。张士诚占据苏州，以礼请他出山，坚辞不就，借题蕉叶以明志。明初，又不愿为朱元璋所用。与周伯温、杨维桢交游密切。生处元明易代之际，以诗酒自娱，退居西湖，宅第由友人资助建成。据说一次他乘醉为诗友瞿佑朗诵过自己的得意之作《过歌风台》，歌风台是刘邦还乡“歌大风”的地点，可见他对元末群雄逐鹿的观感。他又曾说:“吾死，埋骨西湖，题曰‘诗人张员外墓’足矣!”（瞿佑《归田诗话》卷下）可见非常看重诗名。有《张光弼诗集》二卷（别本七卷），又题《可闲老人集》或《庐陵集》。

洪武二年己酉（1369）

正月。元廷北遁前在大都任职的前朝官员，被明北伐军“接收”，并遣

送抵达金陵。

其中包括翰林学士危素、张以宁、王时，编修雷焕，刑部侍郎程徐，太常博士孙吾与、胡益，礼部员外郎曾坚、主事黄肃等，诏以新制衣赐之。

正在处理前元“遗产”的朱元璋颇重视甄别元朝故官，这些人以来自大都—北平的这一批人数多而且影响大。陛见后，很快以危素、王时为翰林侍讲学士，张以宁为侍读学士，曾坚为礼部员外郎，程徐为刑部侍郎，黄肃为礼部主事①。洪武初，朱元璋在南京先后亲自面见审查了300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元朝故官。将其中的一部分委以新朝之职，一部分暂时留在南京闲住（后陆续还乡，但不少人死在滞留之地），一部分流放。流放地主要是两处，一是中都临濠，一是云南。所以江山易主后，在元代出任官职的文学家，除了流散在各地（为官、潜逃、还乡）之外，主要聚集在金陵、临濠、云南。

较早的流放犯卞元亨遣戍辽阳。

卞元亨，至正间从张士诚起事，屡谏不听，便归隐于海滨。明太祖平吴之后，一再徵召，均不应。作诗有“恐使田横客笑人”之语。明太祖怒，将其遣戍辽阳。十年之后才遇赦还。

三月十四日。“玉山草堂”主人顾瑛死于流放地临濠。

顾瑛长子顾元臣曾为元朝故官（水军副都万户），因此明洪武元年（1368）全家都随顾元臣一同被流放临濠②。在“将发临濠”之前的三月二十六日，顾瑛还写了两首《登虎丘有感》，其一写道：“柳条折尽尚东风，杼轴人家户户空。只有虎丘山色好，不堪又在客愁中。”③ “杼轴”本意指纺织，这里代指诗社文友。诗人的旧日友人在江山易代之际，都淹没在时代潮流之中，自己“此行亦不知何日还乡”。到洪武二年三月十四日，仅一年后，顾瑛去世于临濠编管地④。诗人谢应芳得知噩耗，立即写了《祭顾仲瑛》诗⑤，诗回顾了当年玉山草堂和昆山顾氏的辉煌荣耀，也写出江山易代后灾难降临

---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三十八，正月己未纪事。

② 流放地临濠在明初的社会生活之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额。流放临濠，在明初长时期内都是文人士子的恶梦，民间有许多有关的传说。人们普遍认为危素也是“谪佃临濠”，死在了流放地，王世贞的《艺苑卮言》卷六就是这样说的。

③ 见《玉山逸稿》卷四，是据清人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十九的手迹录出。

④ 据殷奎为顾瑛所作《墓志铭》。见《强斋集》卷四，亦见《玉山逸稿》附录。

⑤ 见《龟巢集》（《四部丛刊三编》本）卷九。《元诗选》二集第1247～1248页，题作《祭顾玉山诗》。

的过程："朝廷更化初，召役事重稽。挈家赴临濠，星言去程速"；来到流放地，顾瑛尽快适应了恶劣的环境，"诗去秋复春，客来书满幅"；然而，身在戴罪流放之中，顾瑛随时感到恐惧与威胁，"自言多疾疢，经年在床褥。郁攸屡惊吓，使我常觳觫。尚需手颤定，亲札寄篇牍。安知仅逾月，遽尔闻不禄。初疑传者讹，细问泪盈掬"。实际在这首诗之前的《顾仲瑛临濠惠书词甚慷慨诗以代简》诗，谢应芳已经预见到结局。

经过元明易代的长期动乱，杨翮回到家乡。

杨基《悼杨文举博士》（《眉庵集》卷八）诗中说："白发苍苍老奉常，乱离终喜得还乡"，可见杨翮终老于上元。

杨翮，字文举。上元（江苏南京）人。其父杨刚中，大德间仕至翰林待制，有《霜月集》。杨翮与其兄均有文名，初为江浙行省掾，至正六年，任休宁主簿。历任江浙儒学提举，迁太常博士，至正后期，迁转各地。杨翮有《佩玉斋类稿》十卷，今存，十卷全是文章。《元诗选》二集亦选入《佩玉斋类稿》，存诗15首，除《金溪县孝女庙乐歌三章》，均不见于十卷本《佩玉斋类稿》。

乱后还乡的，还有朱希晦。

朱希晦，乐清（今属浙江）人。元中期即有诗名，和吴志纯、赵彦铭游咏雁荡山，并称为"雁山三老"。元末战乱，为避兵转徙各地，由梅溪迁居永嘉柯村。明初天下安定，才回到家乡。一生安贫乐隐，即使避乱时也喜结交文人学子，所至之处名山胜境游览殆遍，是比较超拔的隐逸之士。明初荐于朝，朝命未下就去世了。临终将数十亩薄田全捐给家祠，仅给后人留下《云松巢诗集》一部、端砚一方、《文选》一部，并遗言："汝可守此，无忘我素志。"朱希晦平生诗作多达千余首，明嘉靖年间，后人朱谏选刊为《云松巢集》三卷。

召杨维桢修礼乐书，事毕，欲授之官，杨维桢说："岂有八十岁老妇，去木不远而再理嫁者耶！"并作《老客妇谣》，明确表示不忘故国。

《老客妇谣》诗，是"铁崖体"在明初的样板。詹同《老客妇传》[1] 云：

老客妇者，会稽先生杨维桢。先生以高科进士仕有元三十年，今行

[1] 杨维桢《老客妇谣》与詹同《老客妇传》，均见明朱存理《珊瑚木难》卷八。

年几八十，而新天子以前朝老文学，思一见之，将延入礼筵文馆，遣翰林詹同文奉币诣门起之。先生以“老客妇”谢使者曰:“岂有八十岁老妇，去木不远而再理嫁者耶?”明年，又遣松江别驾追趣不已，赋《老客妇词》一首，彻黈听曰:“皇帝竭吾之能以用之，弗殚吾所不能则可，否则惟有蹈海死耳。”上允之。已而，赐安车诣阙廷，留百有二十日。礼文毕，史统定，即以白衣丐骸骨。上成其志。弗受爵赏，仍给安车还山。史馆胄监之士，祖帐西门外，行路之人，望之如神仙异人。吁，客妇之谣伸矣!

朱元璋召见时，杨维桢头戴自制方巾。朱元璋问，是为何巾？杨维桢回答：“四方平定巾。”朱元璋非常喜欢这个名字，于是“命以式颁行天下”。这便是明初的统一服饰“四方平定巾”的来历。

与顾瑛相比，杨维桢的下场要好得多，这是他在元明之际与不同方面都保持一定距离的结果。杨维桢得以还归，宋濂特意写了《送杨维桢还吴淞》[1]:“皓仙八十起商山，喜动天颜咫尺间。一代辽金归宋史，百年礼乐上春官。归心只忆鲈鱼脍，野性懒随鸳鹭班。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又回到了杨维桢的“出发点”——至正初为编三史，上《正统辨》。“一代辽金归宋史”是他立论的核心。

胡行简被徵，赴金陵修礼乐书，事毕辞归。

胡行简，字居敬。新喻（江西新余）人。元至正二年进士，授国子监助教，历任翰林修撰，除江南道御史，迁江西肃政廉访司经历。元末社会动乱，辞官还乡，以教授子弟为生。明洪武二年（1369）召至京师同修礼书，并准备委以官职，胡行简以年老有病为由辞归。著有《樗隐集》，久已不见原本，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胡行简诗文，重编为《樗隐集》六卷。胡行简与梁寅同乡，相交较深，两人文章风格也比较接近。《四库全书总目》评述道:“行简文章以冲和淡雅为宗，虽波澜未阔，而能确守法度，不为支离冗赘之词。拟之元末，殆李祁《云阳集》之流。其诗传者无多,《墨竹》一章于故君旧国之思再三致意，亦颇可见其节操。”

明廷以“贤良”徵召沈梦麟入朝，两次充任会试同考官，但不接受官俸。

① 见《珊瑚木难》卷八。

明初，沈梦麟曾三次应聘主持闽浙乡试的考试，明太祖朱元璋待之以礼，并当面称沈梦麟为“老试官”。

沈梦麟，字原昭。归安（浙江吴兴）人。通《易经》，元至正十三年中乡试，授婺源州学正，迁武康县令。兵乱四起，解职回归安花溪故里。刘基常到花溪看望沈梦麟，并赠诗说:“杜陵老去诗千百，陶令归来酒一尊。”去世时，年已九十三岁。有《花溪集》三卷，传本少见。七言律诗工稳得体，时人称为“沈八句”。一生著述丰富，死后其家罹祸，子孙谪戍北边，文稿也因之散佚。

明廷特派专人前往大都（北平），拆毁元朝的宫室，参与者萧洵将整个过程记录成《故宫遗录》一文。

《故宫遗录》卷首有洪武二十九年吴节序，万历四十四年赵琦美序。后者云:“《故宫遗录》者，录元之故宫也。洪武元年灭元，命大臣毁元氏宫殿。庐陵工部郎萧洵实从事焉。因而记录成帙。”元朝经营百年的大都，被人为拆毁，仅据《故宫遗录》，仍然可以看出元大都宫室的壮观气势。

朱元璋为扩大其政权的基础，一批又一批地从全国各地徵召遗逸。许多人来到了京师，但又以各种理由辞归，刘永之是其中之一。

刘永之，字仲修，号山阴道士。清江（今属江西）人。元末，其父刘应奇曾任归州知州。刘永之早年随父宦游，通《春秋》之学，有文名。家境富裕，但本人泊然布素，日以书籍翰墨自娱。元末社会动乱，他不问世事，常与同郡名流讲论风雅，颇受时论关注。明洪武初，徵召到京师，因听力不好辞归乡里。此后其子刘奉获罪被杀，他受牵连远徙莱州，途中病死。刘永之长于书法，宋濂曾称他“词翰双绝”，在赠诗中说“多少荐绅求识面，江南文价为君低”。诗文集名为《山阴集》。清康熙年间，顾嗣立辑《元诗选》二集时曾据《山阴集》选入刘永之诗133首。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已不见《山阴集》传本。今存《刘仲修诗集》六卷、《刘仲修文集》二卷。

张丁为谢翱《西台恸哭记》作注，受到文人广泛注意。

张丁的经历颇典型，他的另一个名字张孟兼在明初更广为人知。从一开始张孟兼就与朱元璋格格不入，其中也许有“张丁”是为谢翱《西台恸哭记》作注的人这个因素在内。《明史》卷二八五本传比较详尽地写出在几经迭宕之后，张孟兼终于被朱元璋从山东押赴都下弃市的过程，全文是:“张孟兼，浦江人。名丁，以字行。史成，授国子学录，历礼部主事、太常司丞。

刘基尝为太祖言：'今天下文章，宋濂第一，其次即臣基，又次即孟兼。'太祖颔之。孟兼性傲，尝坐累谪输作。已，复官，太祖顾孟兼谓濂曰：'卿门人邪？'濂对：'非门人，乃邑子也。其为文有才，臣刘基尝称之。'太祖熟视孟兼曰：'生骨相薄，仕宦，徐徐乃可耳。'未几，用为山西佥事。廉劲疾恶，纠摘奸猾，令相牵引，每事辄株连数十人。吏民闻张佥事行部，凛然堕胆。声闻于朝，擢山东副使。布政使吴印者，僧也，太祖骤贵之，宠眷甚，孟兼易之。印谒孟兼，由中门入，孟兼杖守门卒。已，又以他事与相拄。太祖先入印言，逮笞孟兼。孟兼愤，捕为印书奏者，欲论以罪。印复上书言状，太祖大怒曰：'竖儒与我抗邪！'械至阙下，命弃市。"

本年，张孟兼以荐来金陵参与修《元史》，他的《西台恸哭记注》却分掉人们很大的注意。为其题跋的有许元、危素、揭汯、陈基、胡翰、王祎、曾鲁、李著、徐赘民、刘丞直、吴沉、高延、刘永之、新安病士、郑涛等二三十人。这种题跋集咏曾是前朝文坛盛事，在明初则触犯了忌讳。

明初，与徵召遗逸同时，谴戍流放成为一道抢眼的社会风景线，也是文学家们的劫难。

临濠、云南等流放地出入着曾为元朝效力的人们，这些人往往是故旧部属或往日的对头，如今则一视同仁了。实际在明初流放与否没有标准，也没有期限，更近似于放逐。仅见于《录鬼簿续编》的曲家，曾被流放的就有谷子敬、郴经、须子寿、沈士廉等人。杂剧作家谷子敬在明初被流放，因为他是前朝的枢密院掾史。

谷子敬，金陵（江苏南京）人。曾写过5种杂剧：《城南柳》《枕中记》《闹阴司》《借尸还魂》《一门忠孝》。《录鬼簿续编》说他"明周易，通医道。口才犍利。乐府、隐语，盛行于世。蒙下堂而伤一足，终身有忧色，乃作〔耍孩儿〕乐府十四煞，以寓其意，极为工巧。"

洪武三年庚戌（1370）

为修《元史》，将当时的闻人集中到金陵。宋禧是其中之一。

宋禧，初名宋玄禧，字无逸，号庸庵。余姚（今属浙江）人。元至正十年中乡试，补授繁昌教谕。战乱四起，他不久便弃职还乡。明初，召修《元史》，其中《外国传》自高丽以下诸国都是宋禧所写。书成，不愿做官，再

次回到乡里。不久又同桂彦良一同被聘，主持福建的考试。宋禧与戴良、丁鹤年等有较密切的交往，戴良在《怀宋庸庵》诗中说："麦秀歌残已白头，逢人犹自说东周。风尘澒洞遗黎老，草木凋伤故国秋。"显而易见，他们都以元朝遗老自居。宋禧受杨维桢影响颇深，杨维桢在《西湖竹枝集》中介绍宋禧："少颖悟而好学，父欲夺其志于市井胥吏之事，辄哭而辞。母哀之，资其负笈不远千里从明师，讫明经史古文之学，诗，其余绪也。"有诗集十卷行于世，传本少见，《元诗选》未选入其诗。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宋禧诗文若干篇，与十卷本诗集合编为《庸庵集》十四卷。按：宋禧，《明史·文苑传》作宋僖。

十二月九日。邵亨贞与郏经在大乱已定的时节从吴中前往江阴，一路上，交替感受了民生凋敝与百废待举的印象。

邵亨贞〔渡江云〕词（《蚁术词选》卷二）序说："庚戌腊月九日，与郏仲义同往江阴。是日泊舟无锡之高桥，乱后荒寒，茅苇弥望，朔吹乍静，山气乍昏复明，起与仲义登桥纵目，霜月遍野，情怀怳然，口占纪行，求仲义印可。"词云："朔风吹破帽，江空岁晚，客路正冰霜。暮鸦归未了，指点旗亭，弥棹宿河梁。荒烟乱草，试小立、目送斜阳。寻旧游、怳然如梦，展转意难忘。　堪伤。山阳夜笛，水面琵琶，记当年曾赏。嗟老来、风埃憔悴，身世微茫。今宵到此知何处，对冷月、清兴犹狂。愁未了，一声渔笛沧浪。"途中，他们还联句赋诗。郏经《舟中联句序》（《蚁术诗选》卷八）则说："洪武庚戌腊月八日，余与严陵邵复儒生辈自云间之澄江，早发向吴门，挂席波上甚适也。因相率联诗，以摅客怀。日夕过苏台，穷其韵而成章，凡得句百有廿。"

十二月十五日。宋濂为《雅颂正音》作序。金陵诗文家荟萃，成为新的文化中心，一部总集《雅颂正音》应时而成。

与元初一样，历经战乱，最先聚拢起的仍然是诗人与诗。洪武三年前后，出入金陵的文人，有应召待命者，有窥时而动者，有待罪阙下者，有参与撰写前朝史的，有受到审核的胜国旧臣或群雄幕宾……。以荐应召至京的刘仔肩，将同时人（主要是同在京师滞留者）的诗篇编辑为《雅颂正音》五卷。在《雅颂正音》中，诗大都是写于明初的新作，但诗人还是原来在战乱中成名的那些。其中吴志淳与孟昉比较特殊。

吴志淳，字主一，以字行。无为州（安徽无为）人，寓居四明（浙江宁波）。能诗善书，诗宗唐人，书工古隶。元至正间以父荫历靖安、都昌二县

主簿，浙东帅府都事，元末战乱避兵徙豫章，再迁鄞之东湖。曾以翰林待制荐于朝，但为权佞所阻，未果。入明，隐居不仕。前期作品受到虞集推许，其诗在元明间独具风格。有诗集《环碧轩集》《柳南渔隐集》行世，均未见传。《元诗选》二集有吴志淳《主一集》，存诗14首，应是顾嗣立自辑。

《雅颂正音》卷二录吴志淳《春日遣怀二首》：

四顾山河归一统，明君文德似唐尧。幽燕地阔干戈息，吴楚春深雨露饶。中古衣冠存旧制，南来律令有新条。腐儒击壤茅檐下，为拟讴歌答圣朝。

贫病相兼气未舒，田园虽少乐耕锄。为儒已作他州籍，垂老频收故国书。夜雨湖山人去后，春风门巷燕来初。潘生喜遂闲居志，阮籍从教礼法疏。

他的《春游》诗几乎可以看成前一个题目的延续①：

湖上轻风吹柳丝，湖边细雨湿花枝。百年总有三万日，一日都来十二时。杜老每寻崔氏宅，山翁偏爱习家池。乘闲取醉真吾事，度水看花也自奇。

山中兰麝香满林，故人清游能远寻。燕来已觉社日近，寒退始知春意深。山光入眼凝远翠，华影到湖生夕阴。慈云咫尺不一去，薄暮还家空复吟。

上日开筵曲水滨，年年相忆在兹辰。千家榆火催寒食，万点杨花照暮春。紫燕却归寻旧主，黄鹂到处唤游人。东来巢父如相问，为觅风流贺季真。

吴志淳通过诗篇，将改朝换代的沧桑之变化解为如同自然界时序的更替。“为儒已作他州籍，垂老频收故国书”是对“腐儒击壤茅檐下，为拟讴歌答圣朝”的回应。

元至正间，孟昉已相当知名，顾瑛的一些杰作就是与他唱和。与吴志淳不同，他是色目人。入明，仅知曾至金陵。以他的身份，应是等待甄别的元朝故官。

① 《四库全书》本《雅颂正音》卷二，只录出本诗的其一、其二。其三据《元诗选》二集《主一集》补出。

孟昉，字天暐（一作天伟）。河西唐兀人，占籍大都（北京）；一说占籍太原（今属山西）。好学工古文，早年入国子监，会试不第，辟掾宪司。至正十二年历官翰林待制，迁南台御史，行枢密院判官。江淮兵乱，弃官隐居。明初，以“北平”为籍贯。孟昉有诗文名，元末与虞集、贡师泰、陈基、顾瑛、张昱、张翥、许有壬等唱和，以制作“拟古文”著称。有《孟待制文集》，由陈基、程文、余阙等作序跋，著录于《千顷堂书目》卷二十九，未见传本。《雅颂正音》卷三《十二月乐词》是代表作，不但收入《列朝诗集》《御选元诗》《元诗选癸集》等诗总集，又见于《全元散曲》（作为小令〔天净沙〕）。还不能说他的《十二月乐词》与吴志淳的《春游》《春日遣怀》有相近的写作契机，但《十二月乐词》写的是同一主题：鼎故革新与春去秋来一样，顺应其规律实属必然。

明初，金元素父子的不同遭际引起同情，《录鬼簿续编》中，特别为他们记上一笔。

在写到金元素时，《录鬼簿续编》说：“名哈剌。故元工部郎中，升参知政事。风流蕴藉，度量宽宏。笑谈吟咏，别成一家。尝有《咏雪》〔塞鸿秋〕，为世绝唱。后随元驾北去，不知所终。”此后则是金文石的小传：“金文石，元素之子也。至正间，与弟武石俱父荫补国子生。因其父北去，忧心成疾，卒于金陵。幼年从名姬顺时秀歌唱，其音律调清巧，无毫厘之差，节奏抑扬或过之。及作乐府，名公大夫、伶伦等辈，举皆叹服。”明军进入大都，金氏父子就分处在敌国了，是词曲将这天各一方的父子结系在一起。

当年语惊诗坛的才子“袁白燕”出任御史，无端获罪，几乎导致灭门之祸。

清顾嗣立《寒厅诗话》总评元诗，涉及袁凯说：“明初袁海叟（袁凯）、杨眉庵（杨基）为开国词臣领袖，亦俱出铁崖门。”袁凯，字景文，号海叟。元至正年间，常熟诗人时大本写了一首“咏物诗”《白燕》，录呈诗坛盟主杨维桢，杨维桢极为叹赏，当时袁凯在座，表示：“诗虽佳，未尽体物之妙。”杨维桢不以为然。第二天，袁凯拿出自己所作《白燕》诗：

故国飘零事已非，旧时王谢见应稀。月明汉水初无影，雪满梁园尚未归。柳絮池塘香入梦，梨花庭院冷侵衣。赵家姊妹多相忌，莫向昭阳殿里飞。

杨维桢击节称赞，一连抄录了若干份，并分赐座上客。袁凯就因此而出名，被称为“袁白燕”①。这是元末著名典故，在“铁崖体”与“咏物诗”流传过程，无人不知。直到清初，松江城里还有一个叫做“白燕庵”的地方，相传就是袁凯故居。袁凯得盛名于元代，明初任御史之职。朱元璋命太子朱标复审自己已经定谳的案例，太子多所宽免，朱元璋问袁凯:“朕与太子孰是?”袁凯回答:“陛下法之正，东宫心之慈。”这个答复被朱元璋认为是猾持两端，相当厌恶，怒形于色。袁凯吓坏了，立即装疯辞官归。据说朱元璋还派人去家中窥视，不放心他，他疯装得相当彻底，才没受到进一步追究，终老于家。有《海叟集》四卷，是明初重要别集。明人何景明甚至说“我朝诸名家集，独海叟诗为长”②。但《白燕》只是“铁崖体”的一个“标本”，明人李梦阳甚至讥讽为“最下最传”（《海叟集序》）——水平最差，反而最流行。

五月。杨维桢去世。享年七十五岁。

杨维桢（1296—1370），字廉夫，号铁崖、铁笛道人，晚号东维子。山阴（浙江绍兴）人。泰定四年进士，授天台县尹，改任绍兴钱清场盐司令，因亏损而久不升调。元至正初，授杭州四务提举，转建德路推官。升江西儒学提举，时逢战乱，他避兵富春山而未赴职。又迁居钱塘。张士诚据苏杭，他不应其召，浪迹浙西山水之间。入明，不受官职。杨维桢是元最主要的诗文家之一，作品数量、影响与成就都相当可观。他的诗务求新奇，号称“铁体”或“铁崖体”，风靡一时，使至正间诗坛风气为之一变。其中乐府与竹枝词流传最广，他的“古乐府”能面对现实，比较客观地反映出元末社会现实；同时他倡导竹枝体“小乐府”，并编有《西湖竹枝集》，至正后期所作“新乐府”影响颇大。文章风格，与诗并不一致，以使人易读易懂为特色。明人胡应麟对他的经典评价是“大器小成”（《诗薮》外编卷六）。有《东维子文集》三十卷、《铁崖古乐府》十六卷、《铁崖咏史注》十八卷、《铁崖赋稿》二卷等多种诗文集。还写有《春秋合题著说》三卷、《史义拾遗》二卷，今均存。影响较广泛的是《宫词》《西湖竹枝词》等若干组七言绝句。《宫词》第二首即:“开国遗音乐府传，白翎飞上十三弦。大金优谏关卿在，伊尹扶汤进剧编。”这是元诗直接咏及杂剧之盛的仅见之作。虽然在明初只生活了区区数年，而且态度鲜明地自归于元，但对诗歌史来说，杨维桢既属于元，

---

① 见《明诗纪事》甲签卷十三，《列朝诗集》甲集。这个典故传说极广泛，元明间笔记也有记载。

② 见《明诗纪事》甲签卷十三。

又属于明——他对明初诗文的影响无人能比。

杨维桢之父曾筑楼于铁崖山，早年杨维桢曾读书楼中，因以“铁崖”为号。他的诗文影响较大，学习、仿效者不乏其人。《明史·文苑传》说:“维桢诗名擅一时，号‘铁崖体’。”其主要特点是刻意追求新奇，受唐代诗人李贺的影响明显。杨维桢的乐府诗可视为“铁崖体”的范例。被纳入“铁崖体”，仿效其艺术风格，并且与之比较接近的，有他的门生吴复及项炯、陈谦、郑东、郭翼等数十人，但受其影响者要远多于此。他在元明之际得享大名，成为诗坛领袖人物，与其“铁崖体”流行关系密切。

朱升去世。享年七十二岁。

朱升（1299—1370），字允升，学者称“枫林先生”。休宁（今属安徽）人。元末领乡荐，任池州学正。战乱中隐居石门，朱元璋所部攻克徽州，召问时务，朱升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作答。受到赏识。吴元年（即至正二十七年）授侍读学士，洪武元年进翰林学士，大封功臣的制词多由其代拟。次年告老归，卒于家。有《枫林集》十卷。他的作品是邵雍《击壤集》末流，“颇近鄙俚”（《四库全书总目》语）。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则是元明之际著名的答问，朱元璋能以后起势力，统一全国，与此不无关系。

张以宁去世。享年七十岁。

张以宁（1301—1370），字志道。古田（今属福建）人。元泰定四年进士，与杨维桢同年，授黄岩州判官。历翰林侍讲学士，元亡之前，他与张翥、曾坚等人一直在大都任职。元亡，又与危素等被解送金陵。经过甄别，仍拜翰林侍读学士。洪武二年出使安南，使归，在途中去世。有《翠屏集》四卷、《春王正月考》二卷。

四月。释善学去世。享年六十四岁。

释善学（1307—1370），号古庭。吴郡（江苏苏州）人。俗姓马。年十二出家大觉寺，年十六抵杭州受戒，明年，受法于光福寺林屋清公。不数年，尽通玄文要旨，宣政院请开法于昆山荐福寺。当路者欲令其出自门下，善学赋《曹溪水》四章拒之，还东林隐居，专修白业。明初，居浒溪之光福寺。著有《十玄门赋》《法华问答》《法华随品赞辨正》《教门关键录》以及诗文若干卷。清钱熙彦《元诗选补遗》辑录其诗 43 首。

元最后一个省级政区——辽东行省——平章刘益，向明递上降表。

刘益在至正二十八年/洪武元年（1368）临危受命，出任此职，在《元史》《明史》，都是身影模糊的人物。降表本是官样文章，但至元十三年南宋朝廷为寻找写降表的人煞费脑筋，与之相比，刘益递上的表文真是杰作①：

> 圣明启运，殆千载之难逢。遐迩归心，岂一夫之能抗。非由人力，实乃天时。钦惟皇帝陛下，大德有容，至仁无敌。乘弊于板荡栋挠之日，开基于龙蟠虎踞之乡。灵旗举而中原底平，温诏下而遐方欣戴。伏念臣益叨荣华要，委质戎行。援绝势孤，誓死本期于君素；力穷兵败，舍生何让于子明。然天道靡常，人事不一，故伊挚保身而去夏，微子全祀以归周。乃去就之明规，由废兴之有数。兹者盘桓辽海，惭于涸辙之鱼；瞻望京云，痛若丧家之犬。势因穷蹙，计出仓皇。谨遣右丞董遵、佥院杨贤等，航海朝天，望风投款。休兵待命，希洞烛乎愚衷；卖剑买牛，乞放归于农亩。

要言不烦，就凭结语"休兵待命，希洞烛乎愚衷；卖剑买牛，乞放归于农亩"，这篇文章就不能忽略。经历数十年的战乱、割据，生灵涂炭，破坏如同犁庭扫穴。当天下终归一统时，胜利者究竟是谁已经不重要了。铸剑为犁，是大势所趋。关于刘益，以他的名义上呈的这篇降表，是他在史册的惟一的立足点。

陆居仁去世之后，与杨维桢、钱惟善同葬于干山，他们的坟墓被当地人称为"三高士墓"。

陆居仁，字宅之，号巢松翁，又号云松野褐、瑁湖居士。华亭（上海松江）人。以《诗经》中泰定三年乡试第七名，后隐居乡里，教书度日。与王逢、杨维桢、钱惟善交往密切。去世于明洪武四年（1371）以后，王逢在挽诗中称颂说："游戏清真帖，优长雅颂文。世方趋赵孟，天竟滞刘蕡。"（《梧溪集》卷五）《元诗选》三集选其诗12首，题为《云松野褐集》。

① 明人任洛《辽东志》卷七《平章刘益归诚表》。

陶安去世。享年五十七岁。

陶安（1315—1371），字主敬。当涂（今属安徽）人。早年师事乡贤李习、李翼兄弟。至正四年举乡试，授明道书院山长。避乱家居，朱元璋渡江，陶安出迎，留参幕府。洪武初为江西参政，卒于官。他在元明文坛都不居前列，但他是元末文人较早主动投向朱元璋的，朱元璋曾为其亲书门子：“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有《陶学士集》二十卷，另有《姚江类钞》《辞达类钞》等著述。



陶安像。出自清代肖像画家上官周的《明太祖功臣图》。

洪武五年壬子（1372）

马琬出知抚州。

马琬，字文璧。秦淮（江苏南京）人。至正间客居松江，有志节，工诗善画，诗工古歌行，画长山水。诗、书、画时号“三绝”。元末隐居，早年从杨维桢学《春秋》，诗亦受其影响。至正初，参与杨维桢倡导的“西湖竹枝词”集咏，出入于顾瑛玉山草堂。马琬曾将所作五百篇结为《灌园集》，由贝琼作序，但今无传本。在抚州知府任上，“慈祥恺悌，辨决不滞。文昌



马琬用过的印章

桥坏，前肇修未竟，文璧捐俸督工，期年告成。璧学博才敏，为政知大体，民深德之。”①

江西吉水人杨允孚作追忆上都生活场景的《滦京杂咏》②（又名《滦京百咏》），为已经避处漠北的元廷补写出挽歌。

《滦京杂咏》是“最后的”上京纪行诗和自成系统的元宫词。“滦京”，

指上都，因位于滦河之阳而得名。这些诗并不是当时诗人杨允孚在上京所写，而是离开北方回到江西老家，特别是经历了元明易代的沧桑之变，才提笔写出，并借以消愁。

杨允孚，字和吉，号西云③。吉水（今属江西）人。与诗人郭钰是知交，郭钰《静思集》有《题杨和吉滦京诗集》（卷三），《杨和吉西云亭赏菊》（卷四），在杨允孚死后，还曾以诗相吊④。明人金幼孜《金文靖集》卷七、杨士奇《东里续集》卷十九，都有为杨允孚《滦京杂咏》写的序。郭钰曾说:“茫茫天壤名常在，赖有滦京百咏诗。”如果没有《滦京杂咏》，杨允孚早已被历史进程淹没。

《滦京杂咏》一卷（别本析为二卷），实际是一部“元宫词”与“上京纪行见闻诗”集。元顺帝在位时，杨允孚由江南前往大都，再由大都赴上都，“以布衣从当世贤大夫游，袱被出门，岁走万里”⑤，在顺帝宫廷之中任尚食供奉之官。元皇室每年夏天都要前往位于滦河岸边的上京避暑，杨允孚

---

① 〔光绪〕《抚州府志》卷三十九“职官志”。

② 《滦京杂咏》写于明初。但具体时间尚待考证。庐陵人罗大已为《滦京杂咏》作跋，时间署“岁在室困子敦”，“困敦”是子年，故暂定于洪武壬子（五年）。

③ 《千顷堂书目》卷二十九有“杨和《滦京百咏》一卷。号西云，翰林供奉。一云名和吉，金幼孜序”之说。

④ 见《静思集》卷九《哀杨和吉》。

⑤ 本段引号中的话，都引自元明之际人罗大巳的《滦京杂咏诗卷跋》，见《滦京杂咏》卷末。

也随驾北上，见识了塞外风光与上都情韵。作为世代生活在江南的南人，不仅宫闱秘闻，异域景致也使他终生难以忘怀。“耳目所及，穷西北之胜，具江山人物之形状，殊产异俗之瑰怪，朝廷礼乐之伟丽，尤喜以咏歌记之”。若干年后，明朝已经取代了蒙元，在江西，“兵燹所过，莽为丘墟”。这时再“回视曩游”，使他不禁“慨然咏叹”，“滦京”生活又从记忆中复活。杨允孚想到应该将这闻所未闻的秘闻讲述给故乡亲人听，以免忘却，这就是他写下《滦京杂咏》的原动力。

《滦京杂咏》共收入七言绝句108首，言其“百咏”，是举其成数。这108首诗的大部分，都有简略的注释，涉及元宫情事亦颇可观。这对于宫词，甚至对于以诗纪事题材的流行，都有示范作用。《滦京杂咏》结尾的五首诗写道：

塞边瓶牧长儿孙，水草全枯乳酪存。不识江南有阡陌，一犁烟雨自黄昏。

急管繁弦别画楼，一杯还递一杯愁。洛中惆怅二千里，塞上凄凉月半钩。

帝里风光入梦频，凤城金阙一般春，故乡不是无秋雨，听过匡庐始怆神。

试将往事记从头，老鬓征衫总是愁。天上人间今又昔，滦河珍重水长流。

玉京贯识别离人，勒马云关隔世尘。不比江南花事早，家家儿女解伤春。

在诗人提笔时，滦京已经被夷为平地。实际在至正十八年十二月，辉煌的夏都滦阳就已经为红巾军焚毁。但是草原长在，绿水长流，生机也在周而复始。在上京被战火彻底摧毁后，杨允孚却使它“复活”了：“塞边瓶牧长儿孙，水草全枯乳酪存”，“故乡不是无秋雨，听过匡庐始怆神”，“不比江南花事早，家家儿女解伤春”……台阁诗人们的雍容典雅之作总使人不免有隔岸观火的“距离感”，而杨允孚笔下的上京之行与上京生活，是用若干细节充填起来的，是以诗人的情感在化解隔膜。

明廷要求各地举荐人才，有司以陶宗仪举。在此前的洪武四年，诏徵天下儒士，也涉及陶宗仪。但他均引疾不赴。

陶宗仪，字九成。黄岩（今属浙江）人。元至正间曾应乡试，不中即弃

去。元末，避兵松江之南村，因以自号。元南台御史与张士诚都曾想罗致，均不为所动。入明，累辞辟举，躬亲稼穑，教授生徒，自食其力。晚年，聘为教官，亦非其所愿为。洪武二十九年，率家乡诸生赴礼部试，赐钞归。卒于永乐初年，享年八十余。工诗文，富著述，著有《南村辍耕录》《书史会要》《南村诗集》《沧浪棹歌》等，还著意搜集文献，编成《说郛》《草莽私乘》《游志续编》《古刻丛钞》等，皆行于世。他是元明之际典型的隐士与民间著述家。

明初，大乱已定，一些著名文人则下落不明。这些人包括屠性、金涓、贡性之等。

屠性，字彦德。会稽余姚（今属浙江）人。早年有文名，号称“隽才”。元延祐年间，受知于黄溍，与张雨、泰不华等文坛名流都有交往。明《春秋》，至正四年领乡荐，嘉定儒学聘为经师，又任歙县教谕、婺州月泉书院山长。栖迟教官十几年，元亡，隐于乡里。卒于明初，死因不明，被称为“以不幸死”（《苏平仲集》卷五）。杨维桢曾说屠性的诗“清明深重”。元明易代，诗稿毁于兵燹。明初其子搜集成编，并请胡翰、苏伯衡作序，但未流传至今。诗主要见《草堂雅集》。

金涓，字德原，号青村。义乌（今属浙江）人。原姓刘，故又称刘涓。早年受经于许谦，学文于黄溍，博通经籍，卓识过人。受到虞集、柳贯的推许，并举荐于朝，但辞而不就。与宋濂、王祎同出于黄溍门下，而且交往密切。入明，坚拒州郡举荐，教授乡里而终。著有《湖西集》《青村集》，共四十卷，久已亡佚。明嘉靖年间，六世孙金魁搜求遗稿，编为《青村遗稿》一卷，刊行于世。

贡性之，字友初（一作有初），世居宣城南湖，因号“南湖先生”。宣城（今属安徽）人。贡师泰的族子，元末以胄子除簿尉，后补福建理官。洪武初，徵录贡师泰后人，为此，贡性之避居会稽，更名为贡悦。他的表兄弟出仕于明，曾请他到金陵或回宣城原籍，他都没有前往，躬耕渔樵自给。死后，门人私谥贞晦。有《南湖集》藏于家，明弘治间六世孙贡钦把《南湖集》拿给李东阳看，李东阳称赞贡性之诗清新可传，并略作删削，贡钦便把李东阳删定的本子刊行于世。今存《南湖集》有六卷本、二卷本数种，但内容相同。

龙云从，字子高。永新（今属江西）人。有经济之才，元末社会动乱中，曾佐江浙行省左丞杨完者，力图恢复元对局势的控制。历官福建儒学副提举，以诗名与元进士李祁并为时人所重。杨完者战死后，龙云从挟策避居

四明，在慈溪构屋建宅，隐于临溪水上，每日在溪上垂钓，居室题名为“钓鱼轩”。在四明时，龙云从与廼贤、边鲁、戴良、张庸、高明等人赋诗作文、论书讲学。著有《钓鱼轩诗集》，未流传至今，仅张以宁撰《钓鱼轩诗集序》保存在《翠屏集》卷三。按：龙云从，《元史》卷一一七作龙从云，《元诗选癸集》也称龙从云。

甘复，字克敬。余干（今属江西）人。少年初涉笔砚，以临川罗尊闻为师。后频经战乱，避地江西，往来临川、金溪等地。至正间，张翥居云锦山中，与甘瑾、张可立到云锦山师事之。明洪武初，以元遗民为士林推尊。甘复诗文篇什散漫，今存《山窗馀稿》一卷，存诗仅15首，是明成化中里人赵琥据手稿辑刊。《四库全书总目》评《山窗馀稿》说：“虽零篇断简，所剩无多，而诗格文笔一一高洁，疑复当日自择其最得意者手录此帙，篇篇率有可观，转胜于珠矶杂陈，务盈卷帙，徒供覆瓿者矣。”

郑洪，字君举，号素轩。永嘉（浙江温州）人。元末曾任府掾，顾瑛有《郑君举府掾分幕西关次韵以寄》诗（《玉山璞稿》卷二）。与杨维桢、陈基、顾瑛等人交游唱和，在诗坛比较活跃。入明情况不详。顾嗣立编《元诗选》，二集收入郑洪诗55首，题为《素轩集》，依据的是侍郎曹溶收藏的郑洪诗一卷，另据《大雅集》《乾坤清气》等作了增补。

十二月。危素去世。享年七十岁。

危素（1303—1372），字太朴，号云林。金溪（今属江西）人。早年出于吴澄、范梈之门。至正元年荐授经筵检讨，与修辽、金、宋三史，书成，赐金及宫人，皆不受。由国子助教迁翰林编修。历任监察御史、礼部尚书，至正二十年拜参知政事，不久又除翰林学士承旨。元末朝廷党争中，受到排斥，此后四年弃官隐居京郊房山。其实，他对留居已久的北方感情复杂。他为《赵文敏饮马图》写的题诗，就以“千年沙漠射黄羊，我马飞行云雪冈。谁挽天河洗甲兵，但骑款段还家乡”[1] 做结，含义颇深。“赵文敏”，就是他的前辈赵孟頫，在明初，他的处境略似赵孟頫在元初，但下场比赵孟頫差得多了。洪武二年（1369）授翰林学士，不久就以“失朝”细故被劾罢。复官后，一度受到朱元璋的礼遇，但不久竟被谪居和州，看守余阙庙。这是一种特别的羞辱：元史名臣余阙扼守和州殉难，被比为唐朝的张巡死守睢阳。明初，余阙仍然是忠臣典范，而归顺了明朝的危素，却要为元亡担待骂名，成

(1) 见清人高士奇《江村销夏录》卷一。

了谁也不待见的千古罪人。在和州仅二年，危素就死去了[1]。终于明，危素为时论不齿。有文集五十卷，早散失不传，仅存诗集《云林集》二卷，其中的诗都写于元末。除诗集，还有《说学斋稿》四卷（别本十卷）、《危太仆文续集》十卷，另撰《草庐年谱》二卷。

汪克宽去世。享年六十九岁。

汪克宽（1304—1372），字德辅，一字仲裕，号环谷。祁门（今属安徽）人。元泰定三年领乡荐，明年下第归，从此居家讲学著述。入明，洪武二年徵入朝，与修元史。史成，以老疾辞还。有别集《环谷集》八卷。另著《经礼补逸》九卷、《春秋胡传附录纂疏》三十卷。

洪武六年癸丑（1373）

二月。在对百姓起名字所用字作了规定的同时，朱元璋下令禁止乐人在戏曲中扮演圣帝明王、忠臣义士。

《明太祖实录》（卷七十九）云："壬午，诏礼部申禁教坊司及天下乐人：毋得以古先圣帝明王忠臣义士为优戏，违者罪之。"同时，还以元代为对比："先是，胡元之俗往往以先圣贤衣冠为伶人笑辱之饰，以侑燕乐，甚为渎慢，故命禁之。"对于文学创作来说，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倒退。此后，明廷进一步重申了这个禁令。

与元相比，朱元璋这个起自草莽的豪杰"忌讳"多，当然，最忌讳的还是与"胡元"有关的。甚至连"元"字都成了问题。在明初，类似"吴元年"（至正二十七年），"洪武元年"这种文字，都改成了"吴原年""洪武原年"[2]，虽说是关中"民间相习如此"，但根子显然在上头。

---

① 明初人朱右《白云稿》中有几篇关于危素的诗文，读之使人颇感凄切。卷十《危学士哀词》中提到洪武三年冬"公去居含山。明年辛亥六月，得公手札。又明年壬子，八月既望，梦公访予寓，止临水。"壬子"十二月卒于含山"。这是危素之死的第一手材料，看来当时普遍忌讳提到危素以及其死。壬子，是明洪武五年（1372）。《四库全书》本《白云稿》是不全之书。笔者所据是国家图书馆藏明刊十卷本。

② 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一"国初讳用元字"节。

王祎[1]在出使云南时遇害。享年五十二岁。

王祎（1322—1373），字子允。义乌（今属浙江）人。早年师事黄溍，至正中参与顾瑛的《草堂雅集》，以古文博时名，上书论时政，不报，归隐青岩山。朱元璋取婺州，召而用之，历官漳州通判。洪武二年修《元史》，为总裁官。书成，擢翰林待制，在文坛与宋濂齐名。洪武五年出使云南，招谕元领主梁王，一年后遇害。有《王忠文集》二十四卷、《大事纪续编》七十卷。



王祎像。这是相当传神的作品。出自清代肖像画家上官周的《明太祖功臣图》。

揭汯去世。享年七十岁。

揭汯（1304—1373），字伯防。豫章丰城（今属江西）人。揭傒斯之子，由著作郎起家，至正十年以荫补秘书郎，迁翰林编修，历太常博士、翰林修撰，改礼部员外郎，累官至南台监察御史、户部员外郎。至正十八年出为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司佥事，守建宁，却敌有功。入为秘书少监。元亡，称疾不出，寓居慈溪以终。有文集行世，但未见传，作品散见于《澹游集》《元音》等编。

许恕去世。享年五十二岁。

许恕（1322—1373），字如心，号北郭生。江阴（今属江苏）人。生性沉静，博学能文，精通医术。元至正中，部使者荐为澄江书院山长，由于兴趣不在于此，不久弃职而去。正值天下动荡，离家避地海上，以行医为生，与山僧野客相往还，一直没人识破他的行藏。入明仍隐居不出，友人王逢《俭德堂怀寄》（《梧溪集》卷五），专门有一首怀念许恕："有怀吾北郭，隐趣遂归心。楼幌含芸气，庭除入杏阴。"有《北郭集》十卷（别本六卷，补遗一卷）。《元诗选》三集选入 81 首诗。顾嗣立在许恕小传中评论说："诗得古体，思深旨远，论事多激昂。篇中每多感时伤乱之作，亦王原吉（按：指

① 王祎，文献多作王袆，此从《元人传记资料索引》（第 1 册第 135 页）。

王逢）之流亚也。”

郑渊去世。享年四十八岁。

郑渊（1326—1373），字仲涵。浦江（今属浙江）人。事亲以孝著闻。早年尝登黄溍、柳贯、吴莱之门，初学举子业，以《诗经》试艺，省试落第，遂不复进取。师从宋濂，为古文辞。书斋名“遂初”，周伯琦题斋名，李孝光为之铭。其家又有鸣鹤轩，宋禧为之铭。元至正间以荐授月泉书院山长。洪武元年（1368），诏徵，称疾不起。卒，门人私谥贞孝。有《遂初斋稿》十卷、《续文类》七十卷等，均未见传。

洪武七年甲寅（1374）

叶颙写《云鼎天民独乐歌》，时已七十五岁高龄。

在《云鼎天民独乐歌》（《樵云独唱》卷二）中，叶颙自称“从教世俗骂痴狂，任彼时人笑愚鲁”。早在元至治年间他就与贯云石、张可久唱和，经历半个世纪，度过整个元末战乱，到明初仍然不改当初“独唱”者面貌。

叶颙，字景南。金华（今属浙江）人。少年肆力学问，不事干谒，无意仕进，隐居芙蓉峰下，与樵夫为旅。早年结识贯云石，并为其赋《第一人间快活丸歌》，传诵一时。结庐于城山东隅，又移家城山之西隅，往来两地，寄情吟啸，以自为乐。他自称:“仆江左遗民，东阳逸叟，学问不高，天资素下，寡于游从，懒于趋附，断牧论交，渔樵同调。采山钓水，饮酒赋诗。”（《樵云独唱》后序）入明，生活志趣丝毫未变。所作结为《樵云独唱》六卷。叶颙是志趣异于凡俗的独行之士，在元盛世、元末社会动乱及易代之后的明初，都能以较超然的态度对待名利荣辱。他的诗“皆高旷之言，绝无及仕宦者”（顾嗣立语），即使在隐士诗人中也十分少见。

高启受到“腰斩”酷刑，年仅三十九岁。

高启是元末吴中诗坛的青年领军，明诗“零公里”起点标志，为一篇应景而无谓的文章，惨死在百废待举的升平时期。关于高启的死，有一种说法流传广泛，说他写了《宫女图》诗，涉及明初宫闱秘事，被朱元璋“假手”

写《上梁文》杀死[1]。《明史》本传说“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嗛之未发也”。然而《宫女图》是一首“元宫词”，和明初宫禁了无干涉。元宫廷贵戚以至皇室，并不在乎宫词中写了些什么，所以“宫词”流行，并备受关注。

以高启为代表的“吴中四士”（高启、杨基、徐贲、张羽），是明诗的起点。在元末，他们又都在“北郭十友”之列，是元江南诗坛的活跃人物。他们经历了元末战乱的漫长过程，满怀诗情进入明朝，但没有一个得到善终。

高启《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写于几年前他来到金陵参修《元史》时：

> 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钟山如龙独西上，欲破巨浪乘长风。江山相雄不相让，形胜争夸天下壮。秦皇空此瘗黄金，佳气葱葱至今王。我怀郁塞何由开，酒酣走上城南台。坐觉苍茫万古意，远自荒烟落日之中来。石头城下涛声怒，武骑千群谁敢渡。黄旗入洛竟何祥，铁锁横江未为固。前三国，后六朝，草生宫阙何萧萧。英雄乘时务割据，几度战血流寒潮。我生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

洪武二年（1369），高启与汪克宽、胡翰等16人一同应诏入京（金陵），与修《元史》，他的一些优秀诗篇写于这个时期。不能想象，写下这样诗篇的人，不几年后就因细故而遭受腰斩酷刑。已经回到吴淞青丘，靠教书自给的高启，应邀为苏州太守魏观重建府衙写一篇《上梁文》，其中用了“龙盘虎踞”四字，就因此被处死。不能排除是因为他不愿为朱元璋所用而获罪，加上对张士诚态度暧昧。

因苏州知府魏观一案受到牵连的，除高启，还有王彝。

在此前杨维桢“铁崖体”风靡一时，王彝几乎是惟一的公开抵斥者。而魏观则是游离于诗坛之外的诗人。

王彝（？—1374），字常宗。其先蜀人，父亲任昆山儒学教授，便卜居嘉定（今属上海）。少孤贫，读书天台山中，学宗金履祥之说。他曾极力抵斥杨维桢，将其“目为文妖”。洪武初，参修《元史》，书成，赐币还。又以荐入翰林，以母老乞归。在元明之际，王彝属于主流之外的文人。有一种说法认为，他可以替下张羽，成为“吴中四士”之一。有《王宗常集》四卷。

---

[1] 见《高青丘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725页，《宫女图》诗注；第1010页，年谱最后一段。

魏观（1305—1374），字杞山，号梅初。蒲圻（今属湖北）人。元末避乱隐居。明兴，聘为平江州学正，迁国子助教，历两浙都转运使。洪武元年曾受命侍太子与诸王读书。后致仕。但洪武五年又超授苏州知府。因在张士诚宫殿旧址上兴建衙署，触犯朱元璋忌讳，被杀，并因此牵连到高启、王彝等人，苏州文人因之人气大伤。但朱元璋很快就为此案平反。魏观的诗在元明之际别具一格，与主流派“铁崖体”迥不相同，特别是五言古诗，成就“不减元道州”（朱彝尊语）。有诗集《蒲山牧唱》。

明初著名的“中朝四学士”之一的詹同，致仕归里。

詹同，原名詹书，字同文。婺源（今属江西）人。早年虞集誉其为才子，并妻以弟女。元末任婺州学正，避乱寓居黄州时为陈友谅委任翰林学士兼御史。至正二十四年，归附朱元璋，洪武元年任翰林学士，并赐名詹同。与宋濂、吴沉、乐韶凤并称“中朝四学士”。卒谥文敏。诗文均有时名，今存《天衢舒啸集》二卷。

洪武八年乙卯（1375）

四月。宋濂为《郑氏联璧集》十四卷作序。

郑东，字季明，号杲斋。温州平阳（今属浙江）人。自幼酷爱读书，通《春秋》，指导学生习举业颇有成效，但自己一再赴试均不第。后寓居常熟，刻意写作，尤其著力于古文辞。与顾瑛友善，至正间常到玉山草堂作客，并为顾瑛品题书画。欧阳玄很器重，正欲举荐，他却因病故去。其弟郑采文名与他相埒。元末兵乱，遗文零落残缺，郑采之子郑思先在明初搜集到郑东、郑采诗文，合编为一书，名为《郑氏联璧集》，并请宋濂作序。《郑氏联璧集》十四卷已不见传本，宋濂《郑氏联璧集序》（《宋文宪集》卷十二）说：“杲斋（郑东）之文，则气韵沉雄，如老将帅师，旌旗金鼓，缤纷交错，咸归节度。”

十一月十日。元遗民胡布因为“高蹈”不出，有忤时政，获罪系狱。

乾隆年间编《四库全书》，征集到一批此前不为人知的古籍，其中一种是《元音遗响》十卷，这部书的前八卷是胡布诗，又名为《崆峒樵音》，卷九是张达诗，卷十是刘绍诗。四库馆臣感到奇怪：这些诗“格调高古”“不

失汉魏遗音”，可是，这三个诗人与这部《元音遗响》竟然是“他书未有叙及之者”。通过披读诗篇，可知这三人是“元之遗老”，在元明易代之际隐居不出，将所作结集，竟然以“元音遗响”标榜。据胡布诗，可知他在“乙卯十一月初十日”曾“罹难”，原因是“以高蹈有忤时政”，致使打入“理问所”，在监狱中度过了丙辰（洪武九年）元夕。“丙辰十月初五发龙江”，被遣戍。这十卷诗，都是他们三人在明初所写。类似这样的诗人与诗，在大乱初定时显然不少见，不过已为时间淘汰。

刘基去世。他的死，是历史疑谜。

元至正间，刘基曾隐居青田山中。明兴，朱元璋下金华，礼聘他出山，



刘基像。出自清代肖像画家上官周的《明太祖功臣图》。与明人出自家谱的刘基像相比，他们的共同点显而易见。

为其谋主。他是经过历史“修正”的谋士。“刘伯温”成了后世文学作品中的一种人物类型：与诸葛亮近似，又有明显差别。明建国，刘基即任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封诚意伯。受到李善长、胡惟庸等排挤，在明初颇不得志。洪武四年赐还乡，抑郁而死，一说为胡惟庸毒死，或说系朱元璋主使，也有传

说说是为朱元璋“赐死”。他写在元朝的作品，编集在《覆瓿集》二十四卷中；写在明初的作品，则保存在《犁眉公集》五卷，由后人归并为《诚意伯集》二十卷（别本十八卷）。

元明之际以集咏其家中的“春草轩”知名的华幼武去世。享年六十九岁。

华幼武（1307—1375），字彦清，号栖碧。无锡（今属江苏）人。家业丰饶，少年时父亲去世，由母亲养育成人，受文坛名流的推重，有人荐其作官，力辞不就。家中建春草轩以侍奉母亲，杨维桢等数十人都为他写过《春草轩辞》或《春草轩诗》。所著有《黄杨集》三卷，据几篇原序，可知华幼武将集题名为“黄杨”的含义，陈方说:“世传黄杨之为木，遇闰岁则厄而不长”，陈谦说:“题其集为《黄杨》，盖勉其无厄闰云。”《四库全书》未收入《黄杨集》，仅列名于“存目”类，《四库全书》编者对华幼武诗评价不高，认为“其诗未足名家，世以重其人品传之耳”。

张宪寓居杭州僧寺而终[①]。

张宪，字思廉，号玉笥生。山阴（浙江绍兴）人。少负才气，薄游四方，不置产业，年逾四十犹独居。或劝他为生计，他说:“吾身未立，天下事未已，此大丈夫以国不以家之秋也。吾岂不知有旧田庐足以资衣食无乏，而此拓落耶?”张士诚据吴中，辟为枢密院都事，张士诚被朱元璋攻破，张宪也变姓名，匿迹藏身。有兼济天下的远大抱负，但身处乱世，难以施展才略，而张士诚又非有为之主，所以张宪未能建立勋业，只求得避祸全身而已。他曾从杨维桢学作诗，被认为是杨维桢学生中的矫矫者。所著《玉笥集》十卷，是流传较广的元人诗集。

释怀渭去世。享年五十九。

释怀渭（1317—1375），字清远，号竹庵。南昌（今属江西）人。俗姓魏，系释大訢（笑隐）之甥。初主会稽宝相寺，后迁杭州报国寺、湖州道场寺。入明后住持杭州净慈寺。长书法，善鼓琴，据宋濂《净慈渭公白塔碑铭》（《宋文宪集》卷二十八），“其诗文曰外集者若干篇，不待结集而盛行于时。”但其诗颇少见，集亦未见传。《千顷堂书目》有其《竹庵外集》，但未注卷数，似当时已不见传本。诗主要保存在《诗渊》《永乐大典》《明诗综》等书中。

---

① 张宪卒年不详。暂系于本年。

洪武九年丙辰（1376）

五月。鲁渊写出长篇“自叙传”——《鲁道原先生自序》，回忆元末经受的苦难坎坷，表达对承平之世的向往。

《鲁道原先生自序》见其《青溪集》卷首。在篇末鲁渊特意说：“妻亡子夭，命也。罹难全身，亦命也。使自保首领以殁于牖下，俾题墓曰‘前进士鲁渊之碣’，余之志愿毕矣。”这样写不但需要精神支持，更需要勇气。“自叙传”中写到吴元年（至正二十七年）进京谒选的过程，使人读之对世态炎凉感触颇深：“同选十有八人悉陛见宣谕，予深惧弗称，以不材衰病恳辞。上方以事怒，近臣同列惶惧失色，忧在不测。有顷，上霁威顾左右曰：鲁渊老实人也，宜放为民。既而，同列进士有以谗言间者，上弗听。明日所司以余被黜，弗许居官舍，依故人张讷。茅檐疏漏，不蔽风雨。凡故旧亲戚谓予违时异俗，藐然无情，有相视若仇雠者。”① 挟扫平天下群雄的余威，朱元璋毕竟有开国君主的气概，这段记述，真实反映出明兴对时人的心理影响。那个进谗言的“进士”，那个一听说他没有被授以职务立即要将其驱逐出官舍的“有司”，那些因其不趋时，马上对他视若仇雠的“故旧亲戚”，在鲁渊笔下无不栩栩如生。这就是一个作家心目中与笔下的改朝换代。

九月十五日。周巽作《拟古乐府》一百五十四首，编为二卷，读之不免联想到杨维桢与风行一时的“铁崖体”。

《拟古乐府》（《性情集》卷一、卷二）是元倾覆近十年，对元末风行的“铁崖体”的回忆与祭奠。周巽《拟古乐府序》说：他对郭茂倩《乐府诗集》“服膺岁久，粗会其意，因以汉鼓吹、横吹、相和、清商、舞曲、琴曲、杂曲，并近代新乐府辞，仿其体制，杂以平昔见闻，积成百五十四篇。……以俟知音者相与正焉。岁在丙辰九月望日龙唐髦艾周巽谨识。”周巽，字巽亨，号巽泉。吉安（今属江西）人。生于元季，曾从征道州、贺州的部族，因功授永明县主簿。受知于刘诜、虞集。入明后事迹不详。诗集《性情集》，久已亡佚。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自《永乐大典》中辑出周巽诗，并重编为《性情集》六卷。

---

① 清人查继佐《罪惟录》卷七《鲁道原传》说：当鲁渊拒绝为官后，朱元璋竟惩戒性地要鲁渊在宫中庭院拔草。烈日当头，别人到阴凉地方去拔，只有鲁渊呆在烈日下拔草。朱元璋派人查看，得知这个情况，产生了一丝恻隐之心。就因此，才放其还乡的吧。

洪武十年丁巳（1377）

翰林学士宋濂致仕。明太祖他问谁可以替代，宋濂举荐苏伯衡。据《明史》卷二八五，宋濂对朱元璋说："伯衡，臣乡人。学博行修，文



宋濂像。出自清代肖像画家上官周的《明太祖功臣图》。与同属上官周画的刘基略作对比，就可以看出前人对宋濂的观感：他是个有思想的学者，不是一个政治家。

辞蔚赡有法。"朱元璋徵其入见，但苏伯衡以疾辞，赐衣钞而还。洪武二十一年，聘主会试，仍然是事竣而还。不久出任处州教授，却因为"坐表笺误"——写上了触犯忌讳的文字，下狱死。他的两个儿子苏恬、苏怡，为救其父主动承担罪责，反被一同处死。

出任山西按察使的一省行政长官杨基，竟以事罢免，谪服苦役，最后死在工所，葬于乱坟岗。

杨基，字孟载。其先蜀人，祖上宦于吴中，遂家焉。元至正中，隐于赤山。张士诚辟作丞相府记室，不久辞去。为元淮南行省参政饶介的门客，明初，因此受到“安置临濠”的清理，但又徙河南。洪武二年（1369）放归，不久起为荥阳知县，又谪居钟离。荐为江西行省幕官，以省臣得罪，杨基再次落职。洪武六年，再起，奉使湖广，召还，授兵部员外郎……。在山西按察使任上，被谗夺官，卒于苦役所。明初杨基经历颇典型：历尽荣耀苦难，屡踣屡起，仕至一省封疆，也不免死同苦役工卒。元至正年间，一次杨维桢在座会集，杨基赋《铁笛歌》，杨维桢极为欣赏，竟指着杨基对从游者说：“吾在吴又得一铁矣。”杨基的《眉庵集》与高启《青丘集》，是元诗特别是“铁崖体”的“遗响”。作为明诗的开端，则起了“调音”“定调”的作用。

郭钰去世。享年六十二岁。

郭钰（1316—1377），字彦章，号静思。吉水（今属江西）人。出身书香门第，世守朱子之学以为家法。中年正值元末，曾奔走他乡，以卖文为生。入明，以胜国遗民自居，洪武四年（1371）诏举秀才，他以耳聋足跛为由不与试，但县司强迫他参加了考试。去世于家。在元末社会动乱中，他曾“一穷到骨，薪米不给”（《静思集》卷一），但他“遇事感触，情之所至，勃郁于中，不能自已，则辄形之歌咏，或登高而啸，或临流而叹，扣壶击节，慷慨激扬。商歌之声，隐隐动林壑，闻者知其为妙也。”（罗大已《静思集序》）以其所作为时代留下了一部诗史。有《静思集》十卷。诗清丽有法，格律严整，涉及乱离穷愁之作尤其凄惋动人。在《感怀》《残年》《风雨舟中作》《和寄从弟铨》《和刘渊见寄》等一系列七言律诗中，表达出对国计民生的忧思，显然受到杜甫影响。郭钰与周霆震是元末最有成就的江西籍诗人。

黄枢去世。享年六十岁。

黄枢（1318—1377），字子运，将所居故址让于二弟，于后圃构室而居，故号“后圃先生”。休宁（今属安徽）人。出身诗书世家，早年师从朱升、赵汸，元至正中江浙行省欲授以学官，未果。至正十二年起事者至休宁，黄枢避兵山谷，筑垒自保，坚持隐居讲学于乡里。入明，有司荐为校官，以左躄之疾，辞不就。有《后圃黄先生存集》四卷（诗三卷，文一卷），今存。

洪武十一年戊午（1378）

郏经赴金陵，就养于其子郏畋。

郏经早年是玉山草堂座上客。经历战乱，老境已至。郏畋，字启文，亦曾列名于《录鬼簿续编》。

郏经，字仲谊（一作仲义），号观梦道人，又号西清居士，其姓或误作朱。西夏人，占籍海陵（江苏泰州）。《录鬼簿续编》有郏经传，并说“所作乐府，特其余事”。郏经长期寓于杭州，并屡客苏、松间，故自号“鹤巢”或“借巢”。为人旷达，早年应元科举，中乡贡进士，并曾任学官。入明，于洪武四年（1371）为浙江考试官，“权衡允当，士林称之”。与杨维桢、王逢、贝琼、徐一夔等名流有交往，并受到时论推重，以博学多闻、于人慎许可见称。洪武十一年赴南京，以后情况不详。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五说：郏经诗曾辑入明人沐昂编的《沧海遗珠》，“盖明初徙滇者”。总之，其晚年景况不佳。郏经多才多艺，精书法、善琴操，长于隐语。有《观梦集》等曾行于世，今皆不存。作杂剧4种：《玉娇春》《死葬鸳鸯冢》《西湖三塔记》《胭脂女子鬼推门》，仅前两种尚存佚曲。诗见《沧海遗珠》等书。

叶子奇因一点小事被牵连系于狱，在狱中写出《草木子》四卷。

本年二月，巴陵县祭城隍，因群吏窃饮猪脑酒，与县学生引发争执，时任巴陵县主簿的叶子奇正好经过县学，以株连下狱。在狱中他“恐一旦身先朝露，与草木同腐。实切悲之。……圄中独坐，闲而无事，见有旧签簿烂碎，遂以瓦研墨，遇有所得，即书之。日积月累，忽然满卷。”就这样写成四卷笔记，命名为《草木子》。他写的主要是对前朝的回顾，对元代历史与文学的重要性自不必言，这也是一个文人在元明之间的感情选择。叶子奇，字世杰。龙泉（今属浙江）人，元末与刘基、宋濂同为浙西名人。

二月乙丑。王翰最终接受元亡现实，以自刎表示对元朝最后的忠诚。

王翰避处福建十多年，有人向朝廷举荐了他[1]，明洪武十一年（1378）辟书至，徵其入朝，他正在病中，把九岁的儿子王偁托付给友人吴海，赋诗

---

[1] 吴海《友石山人墓志铭》（《闻过斋集》卷五）说是“妄一男子上书荐之，君闻命下”，有病“不肯服药。逮有司迫就道，遂引自决”。吴海《闻过斋集》之中，关于王翰的资料颇多，除墓志铭，重要的还有《友石先生传》（卷六）、《故王将军夫人孙氏墓志铭》（卷五）、《友石山人真赞》（卷七）

明志，自刎而亡。吴海以这样的赞语与王翰告别："松柏受命夭也特，太阿淬锋孰与隔。"此后由王偁把他的遗诗编为《友石山人遗稿》一卷，今有传本。而王偁成年后，成为明初闽派的重要诗人。

入明受到朱元璋礼遇的答禄与权，以年迈致仕。

答禄与权，字道夫。西域乃蛮氏。祖上是乃蛮部大将，归降蒙古后立有战功，廼贤曾赋有《答禄将军射虎行》（《金台集》卷一）。至正二年进士，任职于秘书监，至正十年曾为《云林图》赋诗。元末出为河南北道廉访司佥事。入明，寓居于永宁（河南洛宁）。洪武六年（1373）以荐授秦王府纪善，改任御史，请求重刊律令，并请以瑞麦荐宗庙。洪武七年出为广西按察佥事，未赴职，又改为御史。改翰林修撰，因事降为典籍。不久又进翰林应奉。洪武十一年以年老致仕，朱善《一斋集》前集卷十有《赐翰林应奉答禄与权致仕敕文》。他是西域色目人仕于新朝而得善终的人物之一，入明仍得到信任。有《答禄与权集》，久已散佚，现存《永乐大典》残帙尚可辑出他的数十首诗与少量的文。他的《杂诗四十七首》是代表作[1]，名为《杂诗》，实为咏怀之作，内容与表现手法均比较丰富。《永乐大典》还有他的《进嘉麦颂》，该颂就是他在洪武六年任御史时请以瑞麦荐宗庙而作。

方从义去世于本年之后。

方从义，字无隅，号方壶子、不芒道人、鬼谷山人。贵溪（今属江西）人。江西信州龙虎山上清宫道士，晚年居金门之小洞天，故又号金门羽客。工诗文，善古隶、章草，尤长山水画，取法董源、巨然，自成一家。洪武十一年（1378）尚在世，享年九十余。其诗文主要保存在书画题跋之中。

洪武十二年已未（1379）

春。蒋惠为王羲之所书《曹娥碑》作题跋[2]。

蒋惠，字季和，号紫芝山人。鄱阳（江西波阳）人。博学多通，机敏有才干，善书法，工草书。能诗，尤长五七言律诗。洪武十二年春尚在世。诗

---

① 《杂诗四十七首》，见《永乐大典》卷九〇四；《进嘉麦颂》，见《永乐大典》卷二二一八二。

② 见《石渠宝笈》卷四。

存《大雅集》《文翰类选大成》等总集。

徐贲在河南布政使任上，一支出征洮岷的部队过境，上告他“犒劳不时”，最终因此瘐死狱中①。

徐贲，字幼文。其先蜀人，徙常州，再徙平江（江苏苏州）。曾在张士诚属下为官，但不久谢去。入明，受到追究，谪戍临濠。洪武七年荐至京师，两年后，奉使山西、河北。还京时，检其行囊，惟有纪行诗数首，朱元璋大悦，擢给事中，历任御史、刑部主事，以政绩卓著，升河南左布政使。看上去徐贲深受重视，可一个似是而非的“罪名”，竟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徐贲不但工诗文，还长于绘画，本是才华横溢，但明初并不是特别需要才华的时期。

畏吾人伯颜因不愿出山，写《七哀诗》明志，仰药自尽。

伯颜（1327—1379）②，字子中。高昌畏吾人。祖上仕于江西，定居进贤（今属江西）。自幼好学，从钓台夏溥习举业，四次以《春秋》领乡荐。梁寅《送贡士颜子中》（《石门集》卷二）诗中称许“北庭贵胄多才华”。授龙兴路东湖书院山长，改建昌路儒学教授。元末战乱，极力维持元对江西的领有，受到行省参政全普庵撒里、元赣州守臣哈海赤器重。江西大势已去，又间道入闽，割据者陈友定对其颇感敬畏。曾特意浮海前往大都献捷，为朝臣指陈江南缓急之势。江南大局已定，卜居于彭蠡祖坟之侧。元亡，朱元璋视作腹心之患，妻子没入庭掖，自己变姓名，冠黄冠，才得以逃脱，十年间随时以鸩自随。洪武十二年朝廷侦知下落，召其入朝，闻知使者将至家门，伯颜作《七哀诗》言志，仰药自尽。早有诗名，所作结为《伯颜子中诗集》，未见传本，元人王礼于至正十八年写有《伯颜子中诗集序》（《麟原集》前集卷四）。《元诗选》二集，顾嗣立辑伯颜诗为《子中集》，存诗 14 首。

《七哀诗》③云：

有客有客何累累，国破家亡无所归。荒村独树一茅屋，终夜泣血知者谁。燕云茫茫几万里，羽翮铩尽孤飞迟。呜呼我生兮乱中遘，不自我

① 此处系年，从陈高华《元代画家史料汇编》（杭州出版社 2004 年）之说。

② 生年，据《七哀诗》第二首“岁维丁卯兮吾以生”推定。

③ 见明朱善《一斋集》前集卷六《伯颜子中传》，郎瑛《七修类稿》卷十六。两本文字略有异同，《七修类稿》所录晚于《一斋集》，但明成化刊本《一斋集》文字略有阙失。

先兮不自我后。

我祖我父金月精，高曾累世皆簪缨。岁维丁卯兮吾以生，于赫当代何休明。读书愿继祖父声，白头今日俱无成。我思永诀非沽名，生死逆顺由中情，神之听之和且平。鸣呼祖考俯鼹假，笾豆失荐我之责。

我母我母何不辰，腹我鞠我徒辛勤。母氏淑善宜寿考，儿不良兮负母身。肴维新兮酒既醇，我母式享毋悲辛。鸣呼母兮毋远适，相会黄泉在今夕。

我师我师心休休，教我育我靡不周。四举滥叨感师德，十年苟活贻师羞。酒既陈兮师冀止，一觞我奠涕泗流。鸣呼我师兮毋我恶，舍生取义未为暮。

我友我友全公海公，爱我爱我兮人间谁与同。惟公高节兮寰宇其空，百战一死兮伟哉英雄。鸣呼我公我公兮斯酒斯酌，我魂我魂兮惟公是托。

我子我子娇且痴，去住存没兮予莫汝知。汝既死兮骨当朽，汝苟活兮终来归。鸣呼汝长兮毋我议，父不慈兮时不利。

鸩兮鸩兮置汝已十年，汝不违兮汝心斯坚。用汝今日兮人谁我冤，一觞进汝兮神魂妥然。鸣呼鸩兮果不我误，骨速朽兮肉速腐。

伯颜所欠惟有一死了。

周霆震去世。享年八十八岁。

周霆震一生未仕，足迹不离江西，曾亲历元朝盛世，又亲见元朝由起事民众摧毁，为明朝取代，所作诗歌沉郁苍凉，感愤深切，反映了元末江西实况，素有“诗史”之称。以先世住家石门田西，自号石西子初，又省略为石初，文集题名《石初集》。《石初集》十卷，今存。他虽然已入明十余年，但他与他的诗文只属于元。

贝琼去世。享年六十六岁。

贝琼（1314—1379），字廷琚；一名贝阙，字廷臣，学者称“清江先生”。嘉兴崇德（浙江桐乡）人。后至元年间在云间教书，四十八岁时领乡荐。张士诚占据浙东，屡召不就。洪武初，聘修《元史》。洪武六年以儒士举，授国子助教，与张美和、聂铉齐名，并称“成均三助”。宋濂任国子司业，两人交往密切。改任中都国子监，专职教勋臣子弟。致仕一年后去世。早年师从杨维桢，元末以《真真曲》著名，但作品受“铁崖体”影响并不明显。有《清江集》四十卷。

洪武十三年庚申（1380）

贬谪途中的汪广洋，为朱元璋派专人追杀而死于太平。

汪广洋（？—1380），字朝宗。高邮（今属江苏）人，流寓太平（安徽当涂）。早年师从余阙，元末举进士。明兴，朱元璋渡江，召为元帅府令使，拜江西参政。是江南文人中及时归属朱元璋的一个。洪武初，历中书参政、左丞，封忠勤伯。洪武十年进右丞相。洪武十二年受胡惟庸"谋反"牵连，贬广南，行至太平，为朱元璋派人追杀，或说派人诏数其罪，自缢死。可以说起于太平，终于太平。汪广洋在元明之际文坛，据有一席之地，所作自成一家。有《凤池吟稿》十卷。论者认为，他的文名虽然为宋濂诸人所掩，"然观其遗作，究不愧开国之音"（《四库全书总目》）。

洪武十四年辛酉（1381）

明开国文人之首宋濂，在流放途中病死于夔州。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濂溪、玄真子。浦江（今属浙江）人。早年师事吴莱、柳贯、黄溍等。至正间荐授翰林编修，以亲老不赴，隐居东明山十余年，著述授徒。明兴，朱元璋礼聘为江南儒学提举，洪武二年，为《元史》总裁，一年后《元史》书成，累迁翰林学士承旨。洪武十年致仕，两年后，因长孙宋慎牵连进胡惟庸"谋反"一案，全家谪茂州，途中染疾，卒于夔州旅次。于学无所不通，并深明古学，明初礼乐制作多由其裁定。对文坛影响至巨，被称为"一代文宗"。平生著述繁富，就连来到京师的高丽、安南、日本使者，也纷纷出重金购买其文集。有《宋文宪集》《宋学士文集》等传世，另著《浦阳人物记》《龙门子》《萝山杂言》《周礼集说》《孝经新说》《篇海类编》等。在政治上，宋濂纯属于明，但在文学上，是元明两属，他可以说是将文学（文学界）引入新朝的领位员。

洪武十五年壬戌（1382）

以郡县举荐，朱元璋召隐士邓雅赴京朝见，准备擢用，邓雅以年老有病为由恳辞，获准还乡。

邓雅，字伯言，号玉笥。新淦（江西新干）人。早年勤苦力学，以能诗知名乡里。元末隐居未仕。入明，生活一如其旧。在元末就与梁寅友善，两人志趣情操也很相近，他晚年著力于写诗，有诗集《玉笥集》九卷。

俞和去世。享年七十六岁。

俞和（1307—1382），字子中，号紫芝生。钱塘（浙江杭州）人。不乐仕进，至正初诏江浙行省缮写辽、金、宋三史，以备刊刻，有司聘任俞和为校正官。事毕，欲授官，辞不受。诗书均有时名，书学赵孟頫，往往人莫能辨。其诗多以手迹流传，清钱熙彦《元诗选补遗》编录59首。

释至仁去世。享年七十四岁。

至仁（1309—1382），字行中，号澹居子，又号熙怡叟。鄱阳（江西波阳）人。俗姓吴。得法于径山元叟端和尚，元末住苏州万寿寺。工诗能文，博综经史，贡师泰、黄溍等名流对他都很推重。虞集曾称赞至仁的文章醇正雄简有史笔，并比做释子中的司马迁。顾嗣立很欣赏至仁诗中的某些警句，并认为“稳秀有法”。有《澹居稿》一卷，由皇甫琮编次，释克新作序。

洪武十六年癸亥（1383）

春。随军出塞的郑桓，写出组诗《洪武癸亥春以公事出会宁北境》[①]（八首）。

这是明代“闭关”（封锁嘉峪关，阻断西行之路）之前，对西部寄以关注的一瞥。明对于前朝“遗产”相当谨慎，“拒绝”西域就是一例。

郑桓（？—1403），字居贞[②]。歙县（今属安徽）人。郑潜之子。早年从

① 《新安文献志》卷五十七。

② 郑桓，《明史》作“郑居贞”，附见于卷一四一《方孝孺传》，但说是闽人，以明经历官巩昌通判。《新安文萃》卷十二有郑恒，似应是郑桓之误。

贡师泰游，仕明至河南左参政。“靖难”后，坐方孝孺党死。这几首七绝如同“西域竹枝词”，留下了大元帝国最后的遗憾：

达纳城边春水生，百花原上骨纵横。荒郊露宿不成寐，一夜大风吹到明。

解鞍夜宿索欢川，漠漠平沙只见天。睡觉忽惊风露冷，仰看斗柄已西旋。

北出长城古塞边，荒松落日少人烟。隔河又是河西地，过得敦煌是酒泉。

云山高耸入青云，下有黄河一带分。粉堞数家高作塞，黄羊千万动成群。

沙葱野韭随时采，芦酒黄牛取次尝。万里驱驰关塞外，忽惊风物忆江乡。

山下荒城古会州，唐家当日此防秋。英雄已矣空形胜，惟见黄河水自流。

黄河岸上雪山前，驼马如云记昔年。部落一从星散后，却抄民籍学耕田。

荒原人家今少存，好田俱是官军屯。前山遥见黑城子，渴饮不知河水浑。

达纳城、索欢川、酒泉、敦煌、会州、黑城子（喀喇浩特）……从此就退出诗人视野，离开史册文书，两三个世纪消息全无。

四月。戴良暴卒于京师。《明史·文苑传》的说法是“盖自裁也”。

戴良与王逢，是影响最大、态度最坚决的元遗民作家。王逢和戴良同时被徵召，但王逢没有死在京师。

戴良（1317—1383），字叔能，号九灵山人，又号云林。浦江（今属浙江）人。早年学文于柳贯、黄溍，并受余阙影响。至正二十一年以荐授淮南行省儒学提举，浙东已非元朝所有，又避地吴中。张士诚将亡，他携家人渡海抵达山东登州，准备投归元朝重要将领扩廓帖木儿（王保保）军中。由于战争阻断，难以抵达，便侨寓昌乐数年，访求齐鲁志同道合之士，想有所作为，但一事无成。明洪武六年（1373）南还，隐姓变名隐居于四明山中。明太祖派人查访（“物色”）到他的下落，洪武十五年召到京师，在京师以礼相待，“试以文，命居会同馆。日给大官膳”（《明史》卷二八五），想邀其出

仕，他“以老疾固辞，忤旨”。“暴卒”是其必然结局。戴良在元亡后仍不忘故国旧君，曾自赞说：“处荣辱而不二，齐出处于一致。歌黍离麦秀之诗，咏剩水残山之句。”有《九灵山房集》三十卷、《九灵山房遗稿》四卷。另著《春秋经传考》三十二卷，宋濂作序，今未见传。

徵召隐士遍及全国，刘履被徵至京师，但拒绝接受官职，死于金陵客寓。

刘履，字坦之。上虞（浙江绍兴）人。入明隐居，自号草泽闲民。著《风雅翼》十四卷，前八卷，是“选诗补注”，取《文选》中的诗篇作删补训释；卷九、卷十，为“选诗补遗”，对《文选》作了增补；卷十一至十四，是“选诗续编”，从唐宋诗中选取159首，作为《文选》的“嗣音”。本年，诏求天下博学之士。浙东布政使强起之，使刘履到京师陛见，欲授以官，刘履以老病固辞，赐钞遣还，未动身，就去世于金陵。其实读过《风雅翼》，就知道他不可能适应新朝。

周南去世。享年八十三岁。

周南（1301—1383），又名周南老，字正道。常熟（今属浙江）人。元至正间以荐补永丰县儒学教谕，累迁淮南行省照磨，改权江浙行省理问。明洪武初徵赴太常，议郊祀礼，礼成，发临濠居住。放还，卒于乡。早年即有诗名，曾预杨维桢集咏《西湖竹枝词》之举，有《姑苏杂咏》一卷，遍题吴中风光名胜。

王沂去世。享年六十七岁。

王沂（1317—1383），字子与，号竹亭。泰和（今属江西）人。早年师从乡先生杨升云学《易经》，习科举文辞，因元末兵乱，未能应试。至正十三年江西参政全普庵撒里（全子仁）分省赣州，恢复设科取士，王沂以《易》领乡荐，但赣州至京师道路梗阻，只把名字报给了朝廷，临时授予福建照磨、吉安治中等职，他都没接受。明洪武三年，王沂主持了广东科举考试的评卷，次年被荐至京师，为诸王说书。留居京师数年。后以年老辞去福建盐运司副使的任命，回归乡里。在家乡优游山水，尤喜赋诗，与当时名流交游唱和，以商榷雅道为己事。死后，所著诗文门人仅搜集到很少一部分，辑为《王徵士诗》八卷。明初曾把王沂诗和他弟弟王佑诗（四卷）合刊为《二妙集》。他的文集名为《竹亭退稿》，未见传。

张端去世。

张端（？—1383），字希尹，号沟南。江阴（今属江苏）人。以博学好修知名，被举荐出任绍兴路和靖书院山长。元末历官海盐州判官、江浙行枢密院都事。入明家居，其子张宣在洪武初与修《元史》，擢翰林编修。张端本人则未仕于明。有《沟南漫存稿》，未见传本。曾参加澄江诗社，并以《宾鸿吟》知名。

洪武十七年甲子（1384）

元诗总集《元音》问世。

据乌斯道序，《元音》十二卷为孙原理采辑，陈孟凝编选，张中达校正。据曾用臧序，系张中达出任定海县丞时刻板行世。本书共选入176位元诗人的诗篇，并于诗人姓氏之下，略记字里简历（个别的未记）。首选刘因，终于龙云从。卷十二附有无名氏7首，并有一组补遗。自从《元音》问世，由于去取较公允，无后世选家的门户之见，而且涉及面比较广泛，所以很快就形成“此板几于遍传”（曾用臧《元音序》）的局面。许多名不见经传的作者，正是有赖此书，才在诗史上留下了名字。本书选诗最多的是虞集，共106首，编为一卷（卷五），补遗中另收虞集诗5首。其次是范梈、杨载，两人诗合编为一卷（卷四）。所选除七言律诗颇见特色，还特别留意选入篇幅较长的作品。另外，宋代遗民一般未收。选录诗歌时除照顾不同风格，还尽量辑入集外佚诗，比如所选廼贤（目录误作“延贤”）诗4首，都是其《金台集》所未收。洪武十七年（1384）刊行后，建文三年（1401）曾再版。

《元音》编者孙原理，是元明间诗人、诗选家；陈孟凝应洪武初年科举，并作过古田县令，“尤精于诗”（乌斯道《元音序》）；张中达亦有诗集刊行于世。三位编选者并未以胜国遗民自居，而力图以本书概括有元一代的诗坛面貌，开明人选元诗之先河。

有广泛社会影响的胜国遗民王嘉闾去世。

王嘉闾（1305—1384），字云升[1]。晚字景善，号竹梅翁。高昌畏吾人，占籍余姚（今属浙江）。后至元六年授松江等处财赋提举，五年后离职家居。

[1] 王嘉闾表字，《元诗选癸集》庚集上误作“雪升”。

至正二十年擢绍兴路总管府同知，以亲老辞不赴。至正二十三年，受到割据者方国珍疑惧，着黄冠野服，隐于山野。他在元明之际收留了进退失据的元江西行省参政哈剌不花、福建理问大都[1]等受到追缉的蒙古色目人，并为潜匿在他家的无家可归的蒙古色目人治葬。明初与戴良来往密切，并在烛湖之梁山建居室，名为思爱庵。戴良为他撰写《竹梅翁传》（《九灵山房集》卷二十七），并特意回避了他的色目人身份。

张羽以细故谪岭南，行至途中，又有诏催促他还京，他自认为不免一死，为不受羞辱，遂投龙江自尽。

到洪武十七年，张羽已是“吴中四士”在世的最后一人。其实除高启，“四士”中其余三士都不是祖籍吴中。吴中文化积存丰厚，在战乱、动荡、迁转、坎坷中造就了“北郭十子”“吴中四士”这些杰出人才。

张羽（1333—1384），字来仪，后以字行。本是浔阳（今属江西）人，元至正初徙居吴中，在吴中经历了元末战乱。洪武四年徵至京师，应对不称旨，放还。不久再次应征，授太常司丞。朱元璋本来特重其文章，洪武十六年指名要张羽撰滁阳王庙碑，但很快又坐事窜岭南。还京途中，还不免一死。有《静居集》四卷（别本六卷）。

洪武十八年乙丑（1385）

九月十日。王蒙死于刑部大狱。

王蒙（？—1385），字叔明，号黄鹤山樵、香光居士。吴兴（今属浙江）人。赵孟頫外孙，元至正初，曾北游京师，以诗文书画获时名，所画山水在元末引领风气之先。是“元季四家”（画家）之一，曾预吴中玉山草堂之会。张士诚据有浙东，一度聘其为理问，战乱期间长期隐居黄鹤山。明初，任泰安知州，因曾在丞相胡惟庸家中作客，



王蒙用过的印章

[1] 大都，是元人名字。

并与几个不相干的人观画，就这些“案底”，竟牵连进胡惟庸一案，瘐死刑部狱中[1]。正是他的山水杰作，将元末人的眼界引入幽邃深山，探索空谷。从创意来说，他应该是元最好的山水画家。死后作品散失，仅存比较优秀的诗文都与书画有关。

关于王蒙，有这样一则逸事[2]:“惟允（陈汝言）与王叔明契厚。叔明知泰安州，厅事后有楼面泰山，叔明张娟素于壁，兴起捉笔，三年而图成。惟允自济南往访，方看画，雪大作，欲改为雪景，而难于设色。惟允沉思良久，曰:‘得之矣。’为小弓，夹粉笔，张满弹之，俨如飞舞。叔明叫绝，以为神奇，题曰《岱宗密雪图》。”据明人姚绶（号丹丘，又云东外史）手札：王蒙的《岱宗密雪图》原藏在他家中，他晚年曾遭“回禄”,《岱宗密雪图》也被烧毁，致使姚绶“每言及，辄陨涕”[3]。

洪武十九年丙寅（1386）

王礼去世。享年七十三岁。

王礼（1314—1386），字子让，原字子尚。庐陵（江西吉安）人。元至正十年中江西乡试，至正十一年授安远县学教官。至正十六年任兴国主簿，以亲老为由辞官还家。江西行省参政辟为幕府参谋，迁广东帅府照磨，不久，便辞职归隐。在家乡教书度日，学者称“麟原先生”。入明隐居不出，曾聘请他作为科举考试的考官，他也没就职。有《麟原文集》二十四卷，所收入的都是文章。他还把同代人的诗篇辑为《长留天地间集》（或名《天地间集》），李祁曾为此集作序。他的文名较大，颇受时人推重，李祁《麟原集序》说:“观其所为文数十篇，皆蔼然仁义之辞，而凛然忠愤之气，深切恳至，无不可人意者。”

吴海去世。

吴海（约1333—1386），字朝宗，号鲁客。闽县（福建福州）人。博学有气节，受贡师泰、林泉生等名流推重。平素不取悦俗流，十分倾慕齐鲁之

---

(1) 陶宗仪《南村诗集》卷二有《哭王黄鹤》一诗，题注云:“乙丑九月初十日，卒于秋官狱”。

(2) 见《列朝诗集小传》甲前集“陈经历汝言”节。

(3) 明人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四。

风，曾打算迁居山东，但未能如愿，便以“鲁客”为号。元末战乱，家中十分清贫，居室题为“闻过斋”，学者称他为“闻过先生”。明洪武初年，徵修《元史》，力辞不就。与诗人王翰为至交，明廷强徵王翰入朝，王翰自刎死，吴海为王翰经纪其家，并抚养王翰遗孤王偁。吴海去世后，王偁把他的遗作编为《闻过斋集》八卷。

洪武二十一年戊辰（1388）

吴会去世。享年七十三岁。

吴会（1316—1388），字庆伯，号书山，以一足病废，自称“独足先生”。金溪（今属江西）人。幼颖异，从学于危素，受知于乡贤黄𣈶、葛元喆、曾坚。至正四年举江西乡试第一，以足疾未应进士举，优游乡里，教书卖文为生。明初，屡荐不起，卒于家。著有诗集《独足雅言》二十卷，久无传本，清乾隆年间其裔孙吴尚絅搜辑佚作，重编为二十卷，改题《书山遗集》，刊刻行世。有《天文图说》《易经纂微》《杜诗评释》等著述，均未传。《四库全书》将《书山遗集》列入存目，《四库全书总目》评其诗“雕缋有余，而兴寄颇浅”，但又认为“在元末明初尚未能独立一帜”。

王逢去世。享年七十岁。

王逢（1319—1388），字原吉，号席帽山人。江阴（今属江苏）人。弱冠有文名，曾师事陈汉卿，而陈汉卿出于虞集之门，所以王逢的诗文受到虞集影响。元至正中作《河清颂》，行台及宪司都曾举荐，他又以有病为由而不就。在元末社会动乱、战火频燃的情况下，据说他曾“以一言活乱党者数千人之命，以一檄降恶少五千之众”（周伯琦《梧溪集序》），而且在无锡敛葬过许多死于乱兵的尸骨。曾因避乱转徙于无锡梁鸿山、松江青龙江等地，并劝张士诚降元以拒朱元璋。朱元璋灭张士诚后，要录用他，他坚卧不起。隐居上海乌径，筑草堂名为“最闲园”，自号“最闲园丁”。王逢身逢末世，虽然未仕于元，但始终忠于元朝，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胜国遗民。有《梧溪集》七卷，今存。他的祖母曾手植双梧于故里的横河，他为了表示不忘故里，曾将寓舍命名为“梧溪精舍”，自号“梧溪子”，并以其名集。在洪武十五年，他与戴良都是朱元璋欲必致之的人物。有司曾一再敦促他上路，那时他的儿子王掖为通事舍人，向朱元璋叩头泣请，说父亲年事已高，不能出山。

由吏部下了文书，才免于徵召，寿终于家。戴良则“暴卒”于金陵。

洪武二十二年己巳（1389）

陈秀民在元明之际消沉已久，本年因参加同题集咏活动，复现于文坛。

陈秀民，字庶子。温州（今属浙江）人，寓居嘉兴（今属浙江）。元至正中曾北游京师，并前往滦阳，在《滦阳道中杂兴》诗中，他说：“我本吴越人，二年客幽燕。幽燕非我乡，而复适乌桓。”“役役何所求，吾将返林泉。”后出任武冈城步巡检，官至常熟知州。张士诚占据吴郡，他曾为张士诚的参军，并任江浙行省参政、翰林学士。入明事迹不详。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甲前集）说：陈秀民“入国朝，未详所终。周玄初《鹤林集》载庶子作‘来鹤诗’，在洪武己巳二十二年。”说明洪武二十二年尚在世。诗集未见传，《元诗选》三集选人陈秀民38首诗，题为《寄情稿》。还著有《东坡文谈录》一卷、《东坡诗话》三卷等。《东坡诗话》又名《东坡诗话录》，因其中有些内容涉及唐人言论或引证了明中期人的著作，历来对其存有疑问。

洪武二十三年庚午（1390）

梁寅去世。享年八十七岁。

梁寅（1303—1390），字孟敬。新喻（江西新余）人。家贫，以务农为生，但自幼勤于学，博通经史。元末累应举而不中，后至元年间，就馆建康。荐为集庆路儒学训导，至正十五年以亲老辞归。明初，徵入京师修述礼乐书，书成，以老病辞官，回到家乡，结庐石门山，四方学子多来就学，被称为“梁五经”，又称为“石门先生”。洪武十年（1377）讲学于石门书院。洪武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390年1月10日）去世。《四库全书总目》评其诗文说：“其文理极醇雅，而诗论多有根柢”，“诗格尤春容澹远，规仿陶韦”。有《石门集》七卷（别本十卷），另著《诗演义》十五卷、《周易参义》十二卷、《策要》六卷，今均存。

胡惟庸“谋反”一案发生已有十余年，本年释来复仍以胡惟庸党羽凌迟致死。享年七十三岁。

释来复（1319—1391），字见心。丰城（今属江西）人。在元末，以慈溪定水寺为中心，活动于江浙，受到文坛器重。他重要的文学成就，是持续



释来复像。元人（佚名）画。这幅画大约在元明之际就流传到日本。现藏日本佐贺万岁寺。原画已经看不大清了，这是经过修复之后，用红外线技术拍照的。在画像上方有来复的自赞，还有张翥、杨彝分别作的像赞。画与赞均作于至正二十五年乙巳仲春。当时来复四十七岁。请注意他的胡须。后来就是这部长髯，使来复受到朱元璋特别关注。

编辑《澹游集》，推动诗在战乱中进一步发展。

作为释子，来复以“长髯数尺”著称。入明见太祖，朱元璋怪之曰：“汝不欲仕我而为僧，吾亦任汝，然留须亦有说乎？”对曰：“削发除烦恼，留须表丈夫。”朱元璋笑而遣之。其实，在至正二十五年的画像中，来复也是长髯疏朗，而那时他正是接近知天命之年[①]。民间传说，他是因文字而得罪的朱元璋。据说，朱元璋曾召见赐食，来复写“谢诗”有“金盘苏合来殊域”，“自惭无德颂陶唐”。朱元璋见诗大怒曰：“汝诗用殊字，是谓我为‘歹’‘朱’耶？又言‘无德颂陶唐’，是谓朕无德，则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何物奸僧，敢大胆如此！”[②] 当即杀了来复。拆字法用得如此纯熟，罗织罪名如此无孔不入，确实前无古人。

另一个确实牵连进胡惟庸案、但被特旨宽恕的释子宗泐，去世于石佛寺。他是在明初闭关之前西行求法的高僧，并有纪行之作传世。

宗泐（1318—1391），字季潭，号全室。临海（今属浙江）人。俗姓周。住持南京天界寺，明太祖见其举止异于常人，派往西域求经。历时五年，回京，授右街善世，并要他还俗，他力辞。有《西游集》，但未流传至今。别集《全室外集》十卷，其中保存有个别的“西行诗”。宗泐、来复、克新，是入明的三个影响最大的释子。与释来复相比，宗泐幸运得多。为胡惟庸案，朱元璋杀人杀红了眼，一直追究十多年，来复未能幸免，但他竟决定宽宥已经“跌进”胡惟庸案中的宗泐，免于究治。元末，克新将自己住持的嘉兴水西寺提升为江浙名刹，以与来复的慈溪定水寺分庭抗礼。入明，召至京师。派宗泐往西域求经前后，又派克新往青藏招谕吐蕃。但这两次西行，都没有明确的下文。

偶桓应秀才举，在此前后编成元诗总集《乾坤清气》十四卷。

偶桓，字武孟，号海翁，因眇一目，又自号“瞎牛”。太仓（今属江苏）人。元末隐于乡里。尝以诗谒杨维桢、倪瓒，倪瓒极称之[③]。洪武二十四年举秀才，授崇安从事、桂林河泊大使，官终荆门吏目。生卒年不详，享年八十二岁。有诗名，但他的《乾坤清气》更有影响。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六说：“明初诗家操选政者”“皆有所蔽，惟瞎牛《乾坤清气》一编，能别开

---

① 上页来复画像，今藏日本佐贺万岁寺。款识为“皇元至正乙巳春，鄞定水住山来复”。画像质地已经暗弊过分，但来复的面容清癯可辨。

② 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七十七。

③ 明方鹏《昆山人物志》卷三。

生面。"全书篇幅适中，"去取极为不苟"（《四库全书总目》语），同时接受了《皇元风雅》开创的体系，以刘因为元诗第一人。《乾坤清气》体现出明初对元诗的甄别，影响颇大。

洪武二十五年壬申（1392）

九十七岁高龄的谢应芳去世。

由元入明的文人，享年九十以上者并不罕见，而谢应芳是其中年寿最高的一人。

谢应芳（1296—1392），字子兰，号龟巢。武进（江苏常州）人。自幼笃志好学，潜心性理之说，以道义名节自励。元至正初，隐居于白鹤溪上，建居室名为"龟巢"，并以为别号。地方政府请他教乡校子弟，执教颇有成效。江浙行省曾举荐他出任衢州清献书院山长，但没有就职。元末兵乱四起，离家避兵吴中，吴人争相延致为塾师。入明，徙居芳茂山。晚年学行益劭，达官缙绅路经本郡，必到他家相访，他家中一室萧然，仅以布衣韦带与来访者接谈。有《龟巢稿》，诗文共二十卷。篇幅不特别大，但它确实是元人文集之中极其特殊的一例。《龟巢稿》包容了类似《清容居士集》《秋涧集》《道园学古录》等编不会纳入其中的实用文字，可以说，它实际是"民间版"的文人作品集，只有读过《龟巢稿》，才知道什么叫做元代的"应用文"——人的生老病死出行婚娶……全有文章可做，这类文章想必馆阁之士即便做过，也不会将其编入文集，传之后人。江湖诗人将自己写诗称为耕"五字田"，文人将自己的职业比做"笔耕"，亦颇贴切。除《龟巢稿》，谢应芳还辑有《辨惑编》四卷、《思贤录》五卷、《思贤续录》一卷。

洪武二十六年癸酉（1393）

明开国功臣、凉国公蓝玉"谋反"，为朱元璋处死，并再次株连九族。王行父子皆坐死。

王行，是吴中"北郭十友"之一。北郭十友包括：高启、王行、徐贲、

高逊志、唐肃、宋克、余尧臣、张羽、吕敏、陈则[1]。这实际是“吴中四士”的扩展版。“北郭十友”的经历虽然不尽一致，但大多为才所累。除了居于末位的陈则，其他人不是下落不明，就是不得好死。这是改朝换代的“代价”。

王行（？—1393），字止仲。吴县（江苏苏州）人。自幼随其父依卖药徐翁家，徐媪好听稗官小说，王行能够日记数本，为其诵之。早年授徒齐门，为豪富沈万三延至家塾。洪武初，入蓝玉幕，成为蓝玉的谋主。平时以知兵自负，蓝玉诛，终于以知兵及于祸。他的经历在元明之际亦颇典型，他与刘基的不同，只是朱元璋与蓝玉的高下差别。他本可以大有作为于乱世，但最终一事无成。王行的诗文在死后已经散失。但他有一种不大为人提及的文论专著《墓铭举例》四卷，流传至今。

《墓铭举例》专门研究写作墓志铭的方法。据《墓铭举例》归纳，一篇所谓墓铭大致应包括十三个要点：讳、字、姓氏、乡邑、族出、行治、履历、卒日、寿年、妻、子、葬日、葬地。潘昂霄《金石例》与王行《墓铭举例》，都是不多见的文论。

因被划入“蓝玉党”而受到株连的文人，还有孙蕡。

孙蕡，字仲衍，号西庵。顺德（今属广东）人。元至正间，何真占据岭南，开府辟士，与王佐、赵介、李德、黄哲并受礼遇，称为“五先生”，此后“五先生”（“广中五先生”“南园五先生”）成为明初广东文人的代称。朱元璋部将廖永忠出兵广东，孙蕡为何真草降表。洪武三年行科举，孙蕡中举，一年后召为翰林典籍。曾参与《洪武正韵》的编集。此后，为细故“坐累逮系”，最终遣戍辽东。在遣戍地几乎过了十年，本年开始大肆纠治蓝玉党，而当年孙蕡曾为蓝玉题过画，为这一点事，一直追究到辽东流放地以蓝党论死。临刑，作诗长吟而逝——有他那样经历的人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孙蕡，加上王佐、赵介、李德、黄哲，是明初岭南诗派的主要阵容。孙蕡一生著述丰富，但大多不传，《南园五先生集》第一种就是孙蕡《西庵集》。

吕诚去世于此后。

吕诚，字敬夫，又名吕肃。昆山（江苏太仓）人。自幼聪敏，喜读书，与文坛名士多有交往。在自家园林中养了一只鹤，后来又有其他的鹤飞来与之为侣，便建“来鹤亭”以纪其事。他家中还有梅雪斋，常与同里郭翼、陆仁、袁华在此唱和。地方官屡次打算聘请他出任儒学训导，都没有就职。入

[1] “北郭十友”都包括谁，文献记载各有不同。此据《明史》卷二八五。

明，于洪武初年谪居广东，不久赦还乡里，终老于家。《草堂雅集》收入他的诗26首。据《元诗选》三集所载吕诚小传，他有诗集《来鹤亭集》《既白轩稿》《竹洲归田稿》等编，而且清初仍存，但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只存《来鹤亭集》八卷。他的诗颇受杨维桢、顾瑛等文坛名流重视，杨维桢曾把他与袁华并称为“吕袁”，认为是昆山才子之魁首。顾瑛则说他“诗意清新，不为腐语，东沧之人多诵之”。他的诗与杨维桢所倡导的“铁崖体”并不一致，一些小诗还略带民歌风韵，是元末明初诗坛有自己风格的诗人之一。

洪武二十七年甲戌（1394）

李延兴去世于此后。

李延兴，初名李守成，字继本，晚号一山。大都（北京市）人。李士瞻长子。至正十七年王宗嗣榜第三甲进士，授太常奉礼兼翰林检讨。元末政局紊乱，辞官隐居，“于势利澹如，若将终身焉。而河朔学者尊仰德业，担囊负笈，不远数百里来学。”（李敏《一山集序》）入明，河朔诸郡邑曾聘请他担任过教职。有《一山集》九卷(诗二卷,文七卷)。朱彝尊曾评价李延兴说：“一山，北方之学者。其诗文颇拔俗，长歌尤擅场。”（《静志居诗话》卷五）

洪武三十一年戊寅（1398）

宁王朱权作《太和正音谱》二卷。

《太和正音谱》与《录鬼簿》都是关于元曲最重要的文献。

朱权是朱元璋第十六子。早年自称大明奇士，晚号臞仙、涵虚子、丹丘先生等。洪武二十四年受封于大宁，永乐元年，改封南昌。谥献王。燕王朱棣“靖难”，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宁王所部的精兵。改封南昌，是一种“迁谪”。他将一生精力放到词曲等方面，也有不得已处。除《太和正音谱》，朱权还有两种杂剧传世：《冲漠子独步大罗天》《文君私奔相如》。另有十种仅存曲目。《太和正音谱》的重要在于，它对元曲、元曲家作的评述不可替代。没有这部书，今天对元曲就不可能有清晰完整的认识。在《太和正音谱》卷首，有朱权自序，署“时岁龙集戊寅”，并钤葫芦形印章“洪武戊寅”，一般

认为这就是它的编订时间①。

建文三年辛巳（1401）

邵亨贞去世。享年九十三岁。

邵亨贞（1309—1401），字复孺，号贞溪或清溪。祖籍淳安（今属浙江），徙居华亭（上海松江）。博通经史，对于阴阳、医卜、佛老诸家之书也十分精通。富于文才，并以书法见称。曾建宅溪上，故以贞溪为号。明初为松江府学训导，由于受儿子牵联，遣戍颍上，后遇赦还乡。邵亨贞与元明间曲家郏经、钱霖，诗人钱惟善、王逢，画家曹知白等交游唱和长达半个世纪以上。有《野处集》四卷、《蚁术诗选》八卷、《蚁术词选》四卷，今均存。《野处集》是文集，故又称《蚁术文集》。《四库全书总目》评他的为文："亨贞终于儒官，足迹又不出乡里，故无雄篇巨制，以发其奇气。而文章大致清快，步伐井然，犹能守先民遗矩者。"《蚁术诗选》《蚁术词选》二书传本较少，编《四库全书》亦未见到，所以评《野处集》时，将两书误书为《蛾术诗选》《蛾述词选》。

永乐四年丙午（1406）

二月。周王朱有燉为其《元宫词》百首写序。这百首《元宫词》成为元诗一大门类宫词的终结点。经钱谦益作笺注，朱有燉《元宫词》流传颇广。

《元宫词自序》云：

> 元起自沙漠，其宫廷事迹乃夷狄之风，无足观者。然要知一代之事，以记其实，亦可备史氏之采择焉。永乐元年，钦赐予家一老妪，年七十矣，乃元后之乳母女，常居宫中，能通胡人书翰，知元宫中事最悉，间常细访之，一一备陈其事。故予诗百篇皆元宫中实事，亦有史未曾载，

① 但是，《太和正音谱》正文有些是出于洪武三十一年之后的内容。可以推测它与《录鬼簿》一样，曾经有数次增补的过程。

外人不得而知者，遗之后人，以广多闻焉。永乐四年二月朔日，兰雪轩制。

朱有燉，是明第二代周王，谥宪王。“兰雪轩”是他的别署。朱有燉的《元宫词》则“走进”元宫，以亲历者“代言”的角度，反映出世人对宫闱秘事的关注。而此前的《滦京百咏》以及萨都剌、柯九思、张昱等的《宫词》，都是以旁观者的视角探视宫闱秘事。世人又常以元人《宫词》作为了解元典章制度的窗口。

永乐宫廷，有两个元遗老杨讷（杨景贤）与汤式（汤舜民）。他们能得到明成祖朱棣始终如一的宠信，本身就是不大不小的“奇迹”。

杨讷是蒙古族，原名已失传。他是写作杂剧的“名家巨手”之一[1]。因姐夫之姓而姓杨，也说明他是依靠姐姐与姐夫抚养长大。最初叫杨暹，后改名杨讷。“暹”是旭日初升之意；改名为“讷”，可能是因为他外表质朴，拙于言辞，实则内秀。景贤，景言，都是他的表字。字景言，当然应该与他改名杨讷有关。他不但能作杂剧，还擅长弹琵琶。为人幽默滑稽，则是许多元曲家的本色。生卒年不详，但应该和贾仲明（1343—1422以后）、汤舜民（汤式）大致相当。约1335—1415年间在世。《录鬼簿续编》小传中提到杨景贤“永乐初，与舜民一般遇宠”。舜民，即汤式。

汤式，字舜民，号菊庄。经历与杨景贤有相似之处，不但写有杂剧剧本，而且是著名散曲家。有意思的是：在郑振铎、马廉、赵万里三人宁波访书期间，不但发现了蓝格抄本《录鬼簿》，还同时发现了汤舜民的散曲集《笔花集》。而这《笔花集》之中，就有散曲《送景贤回武林》。

《录鬼簿续编》发现后，在《元曲家考略》[2]中，孙楷第考证了杨景贤生平，并指出杨景贤与杨景言是同一人，籍贯为钱塘（浙江杭州）。明周宪王《烟花梦引》提到：“尝闻蒋兰英者，京都乐籍中伎女也，志行贞烈，捐躯于感激谈笑之倾。钱塘杨讷为作传奇而深许之。”看来杨讷或曾久居杭州，或因姐夫是杭州人，便占籍于此。另外，孙楷第首次考证出杨景贤在明初受到永乐皇帝宠信，因为他是解谜语（诗谜）的行家。明人李开先《闲居集》卷六有一篇文章《诗禅后序》。据此，可知李开先曾编集隐语（谜语）为一书，而且他说：“诗禅，取容于东方朔，而朔实滥觞。鲍照、张可久，及我朝杨景言，皆千枝一本，千流一源者也。”张可久即长于隐语。事实上，除张可久，

① 见孙楷第《戏曲小说书录解题》449页。

② 《元曲家考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43—44页。

元曲家钟嗣成、王日华、乔吉等人，都是解谜语的专家，曲家们解谜语似乎成了“业余爱好”，还曾成立“谜社”，并将诗谜编成《千文虎》《包罗天地》等书[1]，杨景贤竟也是谜社中人。看来他只是表面拙于言辞，实则内秀。

杨景贤今存小令2首，套曲1套（据《全元散曲》），套曲〔二郎神〕《怨别》历来受到元曲选家重视。他的成就主要在杂剧方面。据《录鬼簿续编》，杨景贤一共写作了18部杂剧，但流传至今的只有《西游记》[2]。

《西游记》六卷（每卷四折）二十四折，在今存元杂剧中，只有它与《西厢记》突破了杂剧通常的规模。杂剧《西游记》主要情节出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与吴承恩《西游记》小说之外。它与旧题王振鹏的《西游记》连环画册、《朴通事谚解》中披露的《西游记平话》有怎样的关系还是有待研究的课题。它们的共同点是证实了在元代确实在《全相平话五种》之外还有《西游记平话》。元代西游故事还没有汇人“主干道”，距离吴承恩《西游记》颇远。元代应该是三部著名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酝酿期。

汤式，字舜民，号菊庄。象山（今属浙江）人。元末经历不详，入明补本县吏。燕王朱棣受封于北平，以汤式为文学侍从。他是杨景贤密友，永乐间一同出入于宫廷。他的散曲集《笔花集》，共收入小令172支，套曲46套。是元明之际惟一有原本传世的散曲别集。杨景贤仅存的散曲就有〔中吕·红绣鞋〕《嘲汤舜民戏妓》，而汤式〔双调·夜行船〕《送景贤回武林》开篇赞赏杨景贤说:“花柳乡中自在仙，惹春风两袖翩翩。酒社诗坛，歌台舞榭，百年里几番相见。”结尾的〔离亭宴〕进一步写道：

> 珊瑚文采天机绚，珍珠咳唾冰花溅。霜毫锦笺，品藻杜司空，褒弹张殿元，出落双知县。一襟东鲁书，两肋西厢传，相看黯然。朝雨渭城愁，夕阳南浦恨，芳草阳关怨。休言鸡黍期，谩结樱花愿。咱两个明年后年，湖上吊苏林，花间觅刘阮。

这套套曲应该写在晚年，表达对杨景贤的推重、关切之情——也许略含有一点惋惜。对一个入明的蒙古族杂剧作家来说，汤舜民对杨讷期望颇高。

---

[1] 参见明人郎瑛《七修类稿》续稿卷五“谜序文”。

[2] 杂剧《西游记》作者原署吴昌龄。孙楷第《元曲家考略》考证为杨讷作。此从其说。

永乐二十年壬寅（1422）

八月十五日（中秋）。年已八十的曲家贾仲明重新阅读过《录鬼簿》之后，为其中部分人物补写了"吊曲"，并特意以一篇文字记其事。

贾仲明在天一阁蓝格抄本《录鬼簿》书后，写出跋语云：

> 余因雨窗逸兴，观其前代故元夷门高士丑斋继先钟君所编《录鬼簿》，载其前辈玉京书会燕、赵才人，四方名公士夫编撰当代时行传奇、乐章、隐语，比词源诸公卿士大夫，自金之解元董先生，并元初汉卿关已斋叟已下，前后凡百五十一人，编集于簿。前有董解元等，皆省院台部翰苑路府要路公卿大夫者四十四人，未纪挽词为吊。又编集传奇名公，自关先生等五十六人，惟纪其所编传奇，亦未吊之。与钟君相知者，自宫大用已下一十八人，皆作其传，各各以〔凌波仙〕曲吊挽。已后才人与先生不相识者，王思顺等三十三人，止列其姓名，书其学问，俱无词吊之。余虽才浅名轻，不舍先生盛文高韵，美乎前辈诸贤大夫名公士出处文学列于簿，凡宫大用等已吊之，余者皆无文焉。余今暮年衰耄，首先公卿大夫四十四人，未敢相挽，自关先生至高安道八十二人，各各勉强次前曲以缀之。呜呼！未敢于前辈中驰骋，未免拾其遗而补其缺。以此言之，正所谓附骥续貂云也，愧哉！永乐二十年壬寅中秋，淄川八十云水翁贾仲明，书于怡和养素轩。

元亡时，贾仲明不过二十五六岁。在他行将就木时，以〔凌波仙〕曲，向自己心向往之的、兴盛一时的元曲，特别是元曲家们作了告别。这篇题跋也是与自己、与已经成为遥远记忆的朝代告别。

永乐二十二年甲辰（1424）

丁鹤年去世。享年九十岁。

丁鹤年的一生，在元代度过了三十四年，在明代生活了五十六年。但他自己和后人，仍然将他视为元代遗民。他是最后一个去世的遗民。

丁鹤年（1335—1424），西域回回。父亲职马禄丁曾任武昌县达鲁花赤，

就定居于武昌。元至正十二年避兵，徙镇江，又徙四明。在四明时或旅食渔乡，教学童度日；或寄居僧舍，卖药以自给。他读书很多，过目成诵，学问广博，尤工于诗。元末方国珍割据浙东，深忌色目人，丁鹤年为全身避祸，到处躲藏，有诗句说："行迹不异枭东徙，心事唯随雁北飞"，明初，回到武昌，千方百计找到母亲遗骨并修坟敛葬。他在父亲坟墓附近修建了房舍，守墓以终。晚年曾受到楚王的礼重。在元末明初隐逸诗人中，丁鹤年颇有影响，有诗集《丁鹤年集》四卷（别本有《丁孝子集》三卷，《鹤年诗集》四卷）。戴良评论他的创作生涯，说："凡幽忧愤闷、悲哀痛苦之情，一于诗焉发之。""但一篇之作，一语之出，皆所以寓夫忧国爱君之心，愍乱思治之意，读之使人感愤激烈，不知涕泗之横流也。"（《鹤年先生诗集序》）以此也可以看出丁鹤年对元明易代的感受。





附　记

从2002年12月《元诗史》完稿，我开始了《元代文学编年史》的写作。2004年9月，《元代文学编年史》定稿并提交结项。

1980年代初，我从新疆乌鲁木齐的一个煤矿，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并为其录取。一开始，研究方向是唐宋，但我总感到与自己十多年的西部生活经历更接近的，是元代。1983年，研究室领导建议我以元代文学（主要是诗文）为研究方向。孙楷第先生、吴晓铃先生、乔象锺先生都支持这个建议，为此，我专门去看望一位师长，听取他的指教，他不赞成我转到元代，并说："元代没有大诗人，没有好诗，你施展不开呀。"我认真思考了一星期，又读了一遍孙楷第先生的《元曲家考略》，最终表示同意今后以元代文学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因为我想，研究的对象不决定我们的研究水平。元代文学（特别是诗文）将有比较开阔的前景。

1983年，我出版了第一部专著《贯云石评传》，这实际是正式出版的第一部元代文学家评传。此后，陆续对薛昂夫、迺贤、丁鹤年、答禄与权、鲁明善等等元代华化的西域人作了专题研究。又将范围扩展到散曲家，比如张可久、冯子振等。进而，在《中国文学大辞典》等书中，为1000多位元代文学家、300多种元代文学文献，写出了传记与题要。1998年，出版了专著《元西域诗人群体研究》，2003年出版了《元诗史》；1997年发表了论文《元佚诗研究》，2002年发表了《元诗文献研究》《元诗研究与新世纪的元代文学研究》，2003年发表了《元僧诗与元僧诗文献》，2004年发表了《元蒙古色目双语诗人新探》《元代文学的终结：最后的大都文坛》，这些论著，实际都是《元代文学编年史》的阶段性成果。

我的元代文学研究，是从蒙古色目双语文学家入手的。"元西域人华化"，是现代史学家陈垣先生创制的课题，历来是元代历史与文学研究的难点，也是我的出发点。进一步，对元诗文献作了长期的搜集整理工作，建立了数据库，对近6000位有诗歌作品流传到今天的元代各族文学家有了比较清

晰的认知。而《元代文学编年史》则是一个新的尝试。对文学文献的关注，是一切研究的基础。

元代文学研究过程中，先后得到孙楷第、吴晓铃、宿白、邓绍基、李修生、陈高华、吕薇芬、杨铸等先生的指教；多年来得到台湾萧启庆教授、香港何贵初先生的关注，并一再提供了海外学术信息。《元代文学编年史》初稿完成后，北京师范大学李军、山西大学牛贵琥等学友阅读了原稿，并提出许多中肯意见；插图得到《文学评论》郭虹的帮助；山西教育出版社的领导王宇鸿、张金柱、责任编辑薛海斌不但给与支持鼓励，还非常细致地审阅了原稿。对此，我始终铭感在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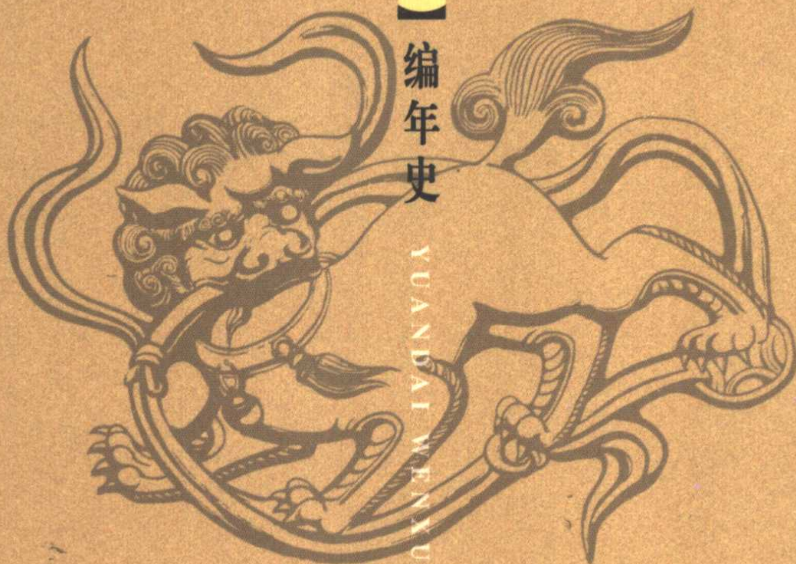
杨镰

于山西大学引凤楼

2004年11月3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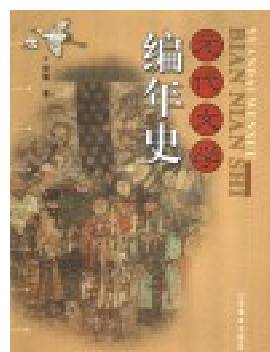
元代文学编年史

YUANDAI WENXUE BIAN NIAN SHI





ISBN 7-5440-2928-X
G·2633 定价:58.00元


编年史
BIAN NIAN SHI